六四日記

廣場上的共和國

封從德 著

晨鐘書局

A Tiananmen Journal by Feng Congde



六四日記

廣場上的共和國

封從德 著

晨鐘書局

書名題簽：司徒華

六四日記 —— 廣場上的共和國

作　　者：　封從德

出　　版：　晨鐘書局
地　　址：　Flat 1522, Nan Fung Centre
264-298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Hong Kong
電　　話：　852-24167803/63001750
傳　　真：　852-24167803
電　　郵：　xldhk@yahoo.com.hk

總 發 行：　田園書屋
地　　址：　Flat B, 1/F, Wing Lee Industrial Building
28 Ivy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Hong Kong
電　　話：　852-23948863
傳　　真：　852-23937051
電　　郵：　gfbook@netvigator.com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定　　價：　港幣 108 元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7804-8-5

六四日記

司徒華題簽

1990-1991 草撰於法國巴黎
2008-2009 刪訂補註於美國

封從德《六四日記》原稿第195頁，内容記錄1989年5月3日他以北大籌委會常委和北高聯主席身份，與北大校長的會談情況，及隨後主持北高聯會議的情況。

封從德《六四日記》原稿第522頁（末頁），內容記錄1989年6月4日指揮部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回到北大後，他和柴玲無路可走，誓言活下去，然後開始逃亡的情況。

封從德《六四日記》原稿在1991年4月寫成後，即向當時在海外的當事人徵集意見，並希望大家都來書寫這段歷史。此徵集意見稿最後頁有相關當事人的名單。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Please Read Instructions on Page 2

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 - For Academic and Language Students

Page 1

This page must be completed and signed in the U.S. by a 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

1. Family Name (surname): FENG
First (given) name (do not enter middle name): Congde
Country of birth: China
Date of birth (mo./day/year): 03/05/66
Country of citizenship: China
Admission number (Complete if known):

2. School (school district) name: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School official to be notified of student's arrival in U.S. (Name and Title): Nancy T. McClintic, Assistant Registrar
School address (include zip code): Santa Clara, CA 95053
School code (including 3-digit suffix, if any) and approval date: SFR 0507000 approved on 4/10/54

For Immigration Official Use
Visa issuing post / Date Visa issued
Reinstated, extension granted to:

3.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the student named above for: (Check and fill out as appropriate)
a. ☐ Initial attendance at this school.
b. ☒ Continued attendance at this school.
c. ☐ School transfer. Transferred from
d. ☐ Use by dependents for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e. ☐ Other

4. Level of education the student is pursuing or will pur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only one)
a. ☐ Primary e. ☒ Master's
b. ☐ Secondary f. ☐ Doctorate
c. ☐ Associate g. ☐ Language training
d. ☐ Bachelor's h. ☐ Other

5. The student named above has been accepted for a full course of study at this school, majoring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report to the school not later than (date) 12/01/90 and complete studies not later than (date) 06/92
The normal length of study is 2 Years

6. ☒ English proficiency is required:
☒ The student has the required English proficiency.
☐ The student is not yet proficient, English instructions will be given at the school.
☐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required because

7. This school estimates the student's average costs for an academic term of 9 (up to 12) months to be:
a. Tuition and fees $ 6,798.00
b. Living expenses $ 7,578.00
c. Expenses of dependents $
d. Other (specify): Health Insurance $ 375.00
Total $ 14,751.00

8. This school has information showing the following as the student's means of support, estimated for an academic term of 9 months (Use the same number of months given in item 7).
a. Student's personal funds $
b. Funds from this school (specify type) $
c. Funds from another source (specify type and source) $ 15,648.00 Oak Technology, Inc.
d. On-campus employment (if any) $
Total $ 15,648.00

9. Remarks:

10. School Certification: ...

Nancy T. McClintic, Assistant Registrar 11/07/90 Santa Clara, CA

11. Student Certification: ...

Congde Feng CONG DE FENG Nov 27, 1990

I-20 SCHOOL

封從德在1990年秋轉入美國硅谷圣塔芭芭拉大學計算機系修讀兩年碩士學位，這是獎學金的資料，但他最終決定棄理從文，回到巴黎書寫《六四日記》。

目　錄

1. 前面的故事

2. 偶然的捲入（4.15-4.18）

3. 籌委會草創（4.19-4.24）

4. 五人常委制（4.25-4.28）

5. 主持北高聯（4.29-5.6）

6. 低潮到絕食（5.7-5.13）

8. 廣場指揮部（5.24-6.2）

9. 最後的時日（6.3-6.4）

余英時序

在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中，封從德是我最後遇到的一位。12年前（1997年）他到普林斯頓來看我，我們有一個下午的談話。他當時正準備撰寫「六四」的歷史，徵詢我的意見。我很坦率地表示了我的猶豫：當事人寫親自參預過的歷史很難擺脱主觀的成見。我為甚麼有這個想法呢？因為中國近代史上有前車之鑒。梁啟超逃亡到日本之後，寫了一部《戊戌政變記》，雖然立即風行天下，但史學界卻不承認它是信史。陳寅恪便曾指出：「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所以我建議從德寫下他個人的回憶錄，那才是最可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從德早在「六四」後不到兩年已寫出了一部三十五萬字的《八九學運備忘錄》。接著在1991年7月，他又邀請了17位流亡海外的「六四」學生在巴黎開了七天的會，集體回顧並核對了記憶中的種種事件，1993年出版了《回顧與反思》。最後從德又在2001年以後創建了「六四檔案」的網站，到現在為止已收集了三千萬字文字和五千幅照片。這部《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便是從上述的大批資料中提煉出來的。大體説來，《日記》正文出於《備忘錄》而六萬字的注釋則是到海外以後集思廣益的新收穫。主觀和客觀融合為一，這部《日記》確是關於六四學運的最可信、同時也最詳盡的一部記載。

限於時間，我不能對本書多作介紹，但有一句話卻不能不説。在我認識的「六四」參與者之中，從德是最為特立獨行的一位。他參加「六四」出於偶然，但他的內在動力則是始終一貫的。這個「一以貫之」的力量我稱之為精神世界的追求。流

亡海外之後他的追求表現得極為清楚：他先後出入基督教、伊斯蘭教、錫克教，當然還有中國流行已久的儒、釋、道三教。他最後因為遍讀我的先師錢穆先生的著作而皈依於儒家。這一點當然更激動了我的心弦。正是由於他追求的是內在的精神世界，因此他從參加運動之始，便遠離名利之場，而默默地在人群喧嘩的後面從事於實際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固執於運動自發的本色，拒絕扮演明星。」他悟道很早，所以斬釘截鐵地說：「守不住本色，名與利就是最大的毒品，比海洛因還容易讓人執著，但將終受其害。」為了要守住「本色」，他事實上超越了運動，但所作所為卻又是在一個更高的精神世界中推動著運動。這確實是儒家的「本色」。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一句名言：「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這部《日記》完全印證了這八個字！

〇九、四、廿三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國思想史著作甚豐。

嚴家祺序

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歷史上，「天安門事件」發生過兩次。30年前，我與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同事共同寫了《四五運動紀實》，這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詳細「記實」。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則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詳細「記實」。兩次「天安門事件」都對和平抗議的民眾進行了清場和鎮壓，但不同的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1976年4月5日「清場」時，雖然打傷了人，在天安門廣場留下了鮮血，但「清場」時沒有死一個人。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清場」，動用了坦克和機槍，造成了數千人的慘重傷亡。

歷史事件可以從近處看，可以從遠處看，可以「拉長或縮短時間尺度」看，可以用「顯微鏡」或在太空中看。從太空中觀察地球表面事物的技術，就是「遙感技術」。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從遠處看，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是從4月15日到6月3日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和平抗議運動；二是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的大屠殺。在「六四大屠殺」發生20年後的今天，北京仍把「和平抗議運動」稱為「動亂」，把「六四大屠殺」稱為「暴亂」。封從德《六四日記》一書，一天又一天地、詳細地記述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這兩部分的歷史事實。事實證明，1989年的北京，以學生為主體的、由廣大民眾參加的和平抗議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事實證明，北京沒有發生任何「暴亂」，所謂「暴亂」，是政府對和平抗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的大屠殺。

封從德在「六四」前的專業是「遙感」。「六四」改變了他的命運，在經歷一連串驚險的逃亡並安全來到法國後，封從德

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他自己的話說，他的人生發生了「四個方面撕裂」。他與柴玲離了婚，離開了其他「天安門明星」，離開了他多年希望留學的美國，他放棄了「遙感」、放棄了從事科學技術的目標，進入巴黎索爾邦(Sorbonne)大學宗教學系(Religious Sciences)，在道教研究界公認的泰斗級人物、施舟人教授（Kristofer Schipper）的指導下，從事宗教學、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2003年，封從德獲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讀《六四日記》的《後記》，可以瞭解到封從德到國外後「大轉變」的原因。

2009年的今天讀到《六四日記》，可以發現封從德近幾年來似乎又在經歷一次巨大的轉折。這是從「宗教學研究」重新回到了「現實人生」。封從德認為：「所謂中國精神，就是『當下即永恆』，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道不遠人』，『當下』（here and now）就能找到價值的中心。」今天的封從德，又像20年前那樣，全力傾注於「天安門事件」，竭盡全力地投入《六四日記》的寫作出版工作。不過，他沒有用「遙感」來觀察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而是在近處、逐日逐時地進行詳細記述。

封從德出身於技術科學，是一位有自然科學基礎的宗教學專家，他能「遙感」的方式觀察中國儒家和中國宗教。但當人們談起封從德時，他的名字還是更多地與「天安門學生運動」、與擺在你面前的這本著作——《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連在一起。

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相比，「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要複雜得多。30年前，記述「四五運動」的著作只有幾本，而記述「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著作已經出版多本。《六四日記》是記述「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最新出版的著作，這本書用大量的事實推翻了今天北京仍然堅持的「動亂、暴亂」的不實之辭。我相信，「六四大屠殺」的真相一定會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得到

揭露，中國大地上一定能夠重新恢復正義。

2009年4月18日，寫於紐約

嚴家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與高皋合著）。

陳小雅序　八九紀事之絕響

2009年4月，乍暖還寒，與每年此時一樣，是一個「二四八月亂穿衣」的季節。這一天，我正奔忙於離家兩里開外的一個建材市場，試圖為更換家中朽壞的窗紗採購一些材料。之所以要自己動手，原因是街頭民工的要價太高(一米索價三十元人民幣)。自己更換雖然也有一些困難，如有些窗框取不下來，直立窗外作業既不安全，也容易變形。不過，無論如何，在立夏蚊蠅興起之前，要把母親房間的換掉。父親新逝，癱瘓在床已17年的她成了我唯一的「心肝」，她的喜怒哀樂，絲絲都扣在我的心弦上。

滿載而歸的路上，我意識到今天是4月15日。20年前的今天，正是母親告訴了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時，身材嬌小的她，正走在從景山公園散步回家的薄暮中，感覺到我在身後，她故意放慢腳步，等我快走到和她並排時，她用輕柔的聲音傳達了這個噩耗。我感到有點異樣，因為母親從不與我談論時事。她對胡耀邦是有感情的。文革結束後，她做了兩個義無反顧的決定：一是把文革凍結的工資（一萬多元）全部交了黨費；二是調北京時，她自動要求到農口工作，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農村貢獻微薄的力量。當時，在社科院黨委工作的黃克誠的夫人，把她介紹到農村發展組。這個小組，正是胡耀邦為推動八十年代農村改革而成立的一支「小艦隊」……。

20年後的今天，回顧當時，誰也沒料到，那竟是一個歷史裂變、世事驟轉、命運改弦的信號，撫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

恰在這時，封從德給我寄來了他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是他積20年心血所撰成的一部回憶錄。由於他身

為學運領袖，親歷八九學運從校園到廣場——由激情開場到悲壯落幕——的各個階段的操作細節與演變過程，有許多為新聞界報導、為史書紀錄的事件也是出於他的手筆，加之新近發生的所謂「天安門之爭」始終沒辯出個高低，所以，我對該書的問世，早已引頸而望。

沒有想到的是，它比我期待的寫得還要好。

20年來，海內外與八九民運有關人士和親歷者的回憶、反思類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外已經出版了不少。或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或為了謀生存求發展，或為了替自身行為的合理性辯駁，或為了放下包袱重新起步，許多人都奉上了那一段生命中最珍貴的記憶，那一段歷史最沉痛的思考，還有許多難得的人生體驗……這類作品，雖然也有良莠之分，但較之於史學研究的需求，依然可稱「虧空」。原因是由於各種原因，許多關鍵歷史事實的真相仍然被掩蓋，許多重大轉折的心理活動依然有待揭開。1991年，為澄清學運過程各種大環節的真相，封從德曾在法國邀請有關當事人作了一次為期一週的對質式討論，研討成果結集為《回顧與反思》，是我所接觸到的八九民運最深入、最具研究價值的史料。而眼前的這部《六四日記》，顯然站在了前書成果的肩膀上。而且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且充滿人性發見。通過這部作品，讀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領域內——無論高尚與卑微，奮發與無奈，希冀與苟且，權變與堅持，愚昧與賢明——窺見當日學運與天安門廣場的真實狀況。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的復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進入了永恒的行列，其珍如恒河金沙，其稀如鳳毛麟角。

歷史的誤會，抑或生命繞不開的「結」？

這本書吸引我的，首先是真實地記敘了作者和妻子——同時也是八九學運中唯一的女性領袖柴玲——的鮮為人知、且充

滿人情味的故事。從他們的戀愛，到先後投入學運，到並肩作戰，直至漸行漸遠，勞燕分飛，既有細膩的筆觸，也有粗略而達意的暗示。

令我意外的是，不論是封從德還是柴玲，原本都不是政治的愛好者。二人都是由於偶然的原因被捲進了學運。在這方面，促成二人相識的「第一個故事」，也許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這個故事，起始於「反自由化」運動中，北京市政府禁止遊行請願「十條」的出臺。為此，北京大學學生在1987年元旦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次抗議遊行。當時，在北大計算機系遙感所讀碩士研究生的作者，抱著好奇心前往觀看，不料，遊行隊伍突然掉頭——把隊尾變成隊首，將作者裹挾入內；又因他身邊打橫幅的一個學生突然溜之大吉，作者不得不填補這個重要空缺，最後，誤被混入隊伍的「工人老大哥」當作遊行組織者推到警察的手裏。

事後，作者雖然被學校保釋，但此事卻成了他一個放不下的包袱。該書寫道：

> 政府的狡猾，我的種種觀察與感受，事後我很想講給人聽，作為大家日後的參考。真正從頭到尾饒有興味聽我講的只有一個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級的學生，這時已轉到了心理系，正忙著准備考研，我們站在圖書館大樓的走廊上聊了兩個小時。柴玲也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那天幾千同學遊行，她與幾個同學攔了一輛公共汽車。『司機真好。中途停車是違規的，但見是學生，一揮手就讓我們上了。』一個同學徒步走到天安門又走回來，到宿舍發現鞋底已經沒了。
>
> 這是我們第一次長談，但並不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起點，那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沒有甚麼理由認為，作者是在用這個自以為「光榮」的經歷吸引小女孩。以作者的眼光看，柴玲既不懂政治，也不是一個激情洋溢、善於表演的人。如果認為她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訓練有素」，那更是一種誤解。她熱愛生活，充滿靈性，嚮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操，對家庭和周圍人充滿責任感；為人處事的特點是善於傾聽，有親和力……

彷佛是命運的安排，1949年4月15日這一天，作者用以寫論文的計算機出了故障。而此時的作者，不僅已經以633的高分通過了托福考試，在四通旗下的一家計算機公司有了一份工作，還考取了北京市首屆「高級程序員」資格證書。湊巧的是，這一天也是妻子柴玲的生日。後來，當作者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磨難，周遊於世界尋找心靈歸宿時，他發現，這一天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4月15日　星期六

……

我沒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於是去一家蛋糕店，買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著自行車，穿過曲曲彎彎的小胡同，進入房東的鐵皮門，再向左拐，便是我們小家外的庭院了。我興冲冲地叫一聲，柴玲從房裏跑出來，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徑自回屋。從她眼中流出的一絲驚喜中，我知道是因為我比她預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們的家在北大南門外不遠，海淀蘇公家廟7號。……

那間屋外有個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樹雖老，枝葉卻繁茂，夏天招來無數青蟲，俗稱『吊死鬼』，掉得滿地皆是，發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葉還可以生火。樹上常有鳥，拉屎掉到我們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楣，斑斑駁駁格外分明，平添我們不少的煩惱。

我們住的房間很小，十一平米，是在西廂房外再加蓋的一間。只有一面窗，不過很大，對著小院，除一扇小門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頂用雪白的計算機紙一糊，還蠻像樣的。屋裏所有的家俱，加起來只花了五十六元。這是柴玲的傑作——床是她從學校木棍廠買的兩張學生單人床拼起來的，加上一個衣櫃和一張桌子，屋子就全佔滿了。

我照例在小院內小馬紮上坐著發了一會兒呆，思考我論文中的計算器程序。只有在這時，心如置身塵世之外，分外地清明。這種緊張構思的狀態亦是一種莫大的解脫和愉悦。她將飯做好，我們就在屋裏一道吃。天色濛濛，黑白電視閃爍的光線照在我們臉上，我們沒有開燈。

蛋糕上插著23支小蠟燭，柴玲吹蠟燭時，鼓著臉，用足三口氣才吹滅，然後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樣子。燭光穿透黑暗，給我們無盡溫馨的空間。

電視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覺得有些突然，他是少數幾個我知道名字的中共要員。他們高高在上，與我們老百姓何干？……我還暗自擔憂這消息會擾亂她生日的恬靜。這份恬靜，後來總使我覺得有無限意味。……

飯後我又坐在小院中，構思著我的計算機程序。我6月12日就要碩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遙感衛星圖像識別專家系統』，是要設計一種複雜的軟件系統。我很喜歡軟件設計，從大學二年級就一直去計算機系聽課。我認為工業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計算器則將解放人腦，而專家系統程序則可能將人解決某類問題的經驗收集處理後，代替人腦作種種重複而單調的動作。我研究了種種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對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的偉大驚嘆不已。

和往常一樣，我沉浸在這種無外事紛擾的構思中。柴玲也拿了張馬紮出來，靜靜地坐著。白練似的月光灑在小院裏，只有樹葉在微風中輕輕作響。

這是北京初春時節。

如果沒有八九民運，他們溫馨的小日子，很可能就這樣延伸下去了。只不過地點可能從中國的大學移到美國或歐洲的某個大學或科研單位，日子會更富裕，他們還會在異國的土地上生兒育女，成為某個移民部落的祖爺爺、祖奶奶……。但是，這一天是他們命運中繞不開的一個結，與很多人一樣，他們沒有繞過去。

不幸的證人，真誠的「放下」

作為一個離異丈夫，對前妻充滿細膩感情的回憶和執著辯護，是本書的一大特點。也正是由於這種不幸的關係，我以為，作者於柴玲的許多敘述是真實可信的。惟其真實，所以感人。而封從德的書寫，最大的感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向讀者捧出真心。不論這份「真心」是對是錯，作為一種客觀經歷，他把它交給了讀者，交給了後來人，交給了歷史。

能夠真誠地回憶，真誠地寫作，是作者天生純潔的本質使然，就像他的戰友常勁所說的，作者的許多優秀品質使然；同時，也是作者歷盡劫波、堪破生死愛恨的經歷使然，及其之後對宗教生活的體悟，惟其具有如此之多的經驗，他才能夠徹底「放下」。

封從德的《六四日記》，清楚地記敘了自己和柴玲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學生被推向民運巔峰的。這個推力，有他們自己對於國家前途和自由圖景的新嚮往；也有無數同學、教師社會改造文化更新的新期待；有被小孫子牽著手，到學運捐款箱投下50元的駝背老漢帶來的感動；有同學趙體國「如果不把參加運動的人看得最重，這場運動註定失敗」的警告而帶來的震驚；有丁石孫校長期待教育改革的設想而帶來的遐想；有像林昭男友沈澤宜老師那樣一直陪伴在二人身邊，直至最後的廣場的無聲支援；更有像劉光那樣忠誠、機敏、識大體而又甘於默默無

聞的無數同學、市民、知識分子的信任、愛護和奉獻的鼓勵……還有作為個體的學生，孤獨時的恐懼，對政府「秋後算帳」的疑慮，對無功而返的羞恥，以及對默默死亡的不甘心……我相信，當善良的讀者瞭解了這一切以後，我們原先對於學運諸多犬儒式的推測，貴族式的指責，將會化為更多的同情。

讀罷本書，我再次感到，八九民運，作為一場使命有限的「公民意見表達運動」，之所以能夠以偉大的形象彪炳史冊，衍生出那麼多精彩的故事，以至於那樣令人難忘，不僅在於她目標的正義，而且在於人性的光輝！正如作者所説，這種光輝是學運集體所散發出來的，是普通百姓散發出來的，就如芳香的花，並不都是鮮艷奪目、佔據高枝的一樣。

同樣，作為一場歷史準備不足的「突如其來」的群眾運動，它之所以能夠持續那麼長，現在看起來甚至持續過長，而連最起碼的目標都沒有達到，也是因為集中了太多的願望，被寄託了太高的期待。這個責任，也是很難由個人承擔的。

説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談到柴玲「被拋棄」的問題。

我完全相信，所謂「天安門之爭」中，「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是一個被剪輯後拼接起來的概念。我也完全相信，無論在柴玲還是在封從德，從表層意識到潛意識，即使存在愛惜生命的念頭——這很正當，都不會坐視別人流血，更不會以別人的流血換取自己的生存和榮升。這是柴玲和封從德可以用他們投入運動的全部經歷所證明的。

同時，我也相信，當柴玲屢次帶領廣場絕食或靜坐學生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時，第一，她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內的。第二，她和所有學生、市民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根本就不相信會有「斷頭、流血」的場面出現。直到六四凌晨，當呼嘯的子彈從耳邊擦過，大家還以為是橡皮子彈！而正因為這種「信念」頑固地存在，直到流血的事實已確鑿地擺在眼前，許多人還有夢幻的不真實感。封從德至今對於外界

散佈的「死亡人數」的不信任態度，或許也是註腳之一。

革命文化對廣場的困擾

既然沒有「斷頭，流血」的真正準備，那麼，所謂的「宣誓」不就成了做秀嗎？筆者認為，那不過是學生受中共黨文化長期薰陶，在新的語言尚未誕生之際的一種借用，既是暫時的，也是權宜和無奈的，就像他們用《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鼓勵士氣一樣。既然那些歌聲與共產主義信念和民族危亡並無干係，那麼，所謂「斷頭、流血」不過是一種犧牲和承擔的抽象的代名詞而已。

如果這種分析是合理的，那麼，所有主動參加過八九民運，並情願地為之付出了代價、經受過苦難和犧牲的人們，不論或早或晚離開了廣場，或者根本不在廣場，他們均沒有違背自己的誓言。

至於「人民廣場」的稱謂，筆者認為，那更是一個模糊到糊塗的概念。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人類最早最原始的崇拜，是對於生殖的崇拜，文明誕生以後，逐漸發展出祭祀的活動，由對於生殖器的崇拜轉化為對於直系祖先的膜拜，這種每年一度的「認祖歸宗」的活動，因擁有凝聚氏族力量的心理效用，逐漸被延續下來，並擴大到民族和國家的畛域。所謂「人民廣場」，不過是這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道統，以蘇式共產主義模式為範式的共和國的「根器」所在地罷了。眾所周知，只有認同於這個道統的人（就如原始的同族人一樣），才會在對這個場地產生一種莊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感情。對於外道（相當於外族人）來說，那不過是一個地標式建築物罷了。正因為如此，當日廣場的學生及其領袖、乃至想像中的仰望著他們的「全國人民」，把廣場當作一塊神聖永久的地盤來佔領，乃至堅守，本身就是一個道統認知的錯誤。幻想能夠以此為根據地，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就更是一種青春浪漫的無稽之

談！

《六四日記》的「棄」與「揚」

我完全同意常勁的序文《封從德的堅守》中，對於《六四日記》的學術及歷史價值的評價，也完全同意他對於作者人品、人格的評價，在此不加重複。在我個人，還有一層要特別感謝本書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八九民運史》中，或多或少地也同樣犯有作者所批評的錯誤，那就是誤信誤採傳媒出於「造星」需要而生產的信息。不論有多少客觀原因，這是一個史學研究者所不應犯的錯誤。

說到這裏，我們不得不談到《六四日記》「秉筆直書」的特點。他不僅直言不諱地袒露了作者的心跡，還直截了當地揭露了學運和民運領袖的一些作為。這種坦言，對於讀者和歷史來說，是負責任的。可以說，沒有這種直率和追求真相的執著，就沒有封從德，也沒有《六四日記》。但作者過多地著墨於自己所不喜歡的品格（如搶風頭，慕虛榮，說謊話，犯自由主義），而對於其他黑暗面卻著墨甚少（如以「準備自焚」作為參選絕食總指揮條件的騙局），難免給人以「網開一面」的印象。

不過，讀者可以信任的是，封從德是一個有道德底線的人。我有一事可以為證：2004年，我和他同被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邀請，參加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舉辦的「紀念六四15週年學術研討會」，我們準備的發言稿，都涉及到「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操作問題。但是，面對突然爆發的「二王事件」(即王軍濤、王丹等人被中國大陸媒體指控接受台灣扁政府情治機關資助案），我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放棄有關二人的內容，僅只在後來的刊出文章中作了筆談。

讀《六四日記》，讀者會發現，八九學運的確湧現了不少的人才，廣場就是這些人才的聚集地。其中，一直與封從德夫

婦並肩戰鬥的李祿，就得到作者的誠心贊許。這裏引用的兩段文字，多少可以滿足讀者對這位神秘人物極其微妙處境的好奇心：

> 五一上午（北大籌委會）記者會中，三天前才從南京來的李祿也在三千同學之中。
>
> 記者會後，李祿到籌委會遇到王有才。這個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極濃的南方口音對他說：「呵，你是南京大學來的，那就談談南京方面的情況吧！」說著便埋頭準備記錄。這自然傷了李祿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將他當情報員了。如果這時沒遇到柴玲，李祿可能就走了。李祿分析問題的機敏給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建議也引起她極大的注意。她當即讓李祿直接找我，而我那時卻已疲倦於眾多動口不動手的建議，顯得遲鈍冷漠，還是將他氣走了。……
>
> 柴玲做了進一步的努力，希望將李祿介紹給我，但又被另一偶然情況阻礙了。這天傍晚柴玲找到我，希望一起吃一次晚飯，於是我帶她到燕春園飯店去。我想同她一道去這裏，本想補償近日來難得陪她造成的感情上的虧欠，不期半路又遇著了日前見過的清華附中的兩個中學生。他們似有要緊話對我說，於是我又拉了他倆吃飯。柴玲在飯菜還沒全上來便忍不住走了。她甚至把本來要向我介紹的一大堆有用信息，隨著那股怒氣拋到九霄雲外。

作者在這個時候突然想到了對於妻子的「感情虧欠」，不能不說與才華橫溢的李祿的出現有關。而他突然又決定拉上兩個中學生一起吃飯，很可能也是一種隨機應變的借題發揮。他也許想通過這個讓妻子不快的舉措告誡妻子：如果你把「革命工作」看得比丈夫還重要的話，那麼我也會以牙還牙。

但是，封從德畢竟不是一個小氣的丈夫。他的光明磊落與他的認理服輸一道，既構成了他崇高的人格，也是其生命沉重

的一部分。僅僅半個月，他就被李祿的才華征服了。

他寫道：

> （16日，絕食第四天，柴玲在饑寒交迫勞困交加中暈倒，無法理事。）在這晚的代表大會上，我真正認識了李祿。他比我們都有才幹。我雖代理總指揮，但對主持絕食團二、三百代表的大會還是感到很吃力。這時，作為副總指揮的李祿，逐漸用他的才識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鬆了一口氣。我驚訝地發現並欣賞起他主持會議的秩序和效率。
>
> 李祿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二三百人的大會上，他能從廣場上昏暗的燈光下辨認出誰不是某校昨日來開會的代表。他還能記住幾天來所討論過種種紛亂議題的細節，指出當前講話同學的矛盾之處。大家發言後，李祿所作的歸納性小結，既準確又精煉。
>
> 我看見一個高效而有秩序的會議：首先宣佈討論範圍和議題，經大家增刪後，將各議題按優先順序排列為議程，然後嚴格按議程討論。討論規則：不許插話；舉手發言；發言限時三、五分鐘；只講論點、不作闡述。最後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通常發言的人總喜歡長篇大論，既多餘，又易橫生枝節引發無休止的爭論。
>
> 議題討論完，李祿便將大家基本一致的觀點歸成一大類，將其他不同的方案明確描述出來，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細分ABCD，讓代表們記下，回各自學校的絕食同學中去，將每個絕食同學對各項爭議議案的投票數字統計上來，匯報指揮部，然後在廣播站宣佈各項投票結果。絕食團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爭論的問題，都經過全體絕食成員的投票。
>
> 我相信，凡開過這些會的人，都會記得李祿的才幹。那晚，我對李祿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頭腦那麼清晰，

對民主程序那麼在行——這正是運動當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頭腦讓更多人頭腦清晰，開會時他總說「要相信別人的頭腦」，使許多自大狂覺悟；他說「只講論點，不許闡述」，使大家發現闡述細節的不合適宜；在同我與柴玲商討局勢與戰略時，他一句「要用大思維」，使我們衝破了廣場上瞬息萬變的現實事務的局限。那時，我對李祿的才能佩服得可謂五體投地。從此，我絕對信任了李祿。

廣場秘聞知多少？

八九民運期間，我曾經懷疑，柴玲在絕食運動中的形象設計，是出自王軍濤的手筆。並就此詢問過包遵信先生。包先生也回答說：「有點像。」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一是覺得柴玲本人比較單純，走到這個地步，後面不可能沒有人。而在我的視野中，偌大個北京城，具有這種「政治想像力」，有這樣「大手筆」的，除了王軍濤，沒有第二人。但以後更多的信息證明，王在學運中物色的代理人，是與方勵之、許良英等思想界領袖人物過從甚密的王丹，而不是政治背景單純的柴玲。而真正對柴玲具有影響力的，正是李祿。《六四日記》證明，柴玲的許多行動，都是在李祿的建議下發生的。所謂用「準備自焚」來限定絕食總指揮參選資格的主意，就是李祿的手筆。自然，圍繞著李祿的內部傾軋，當更加凶險。2004年，我應邀赴美期間，在普林斯頓的一個聚會中，就曾聽蘇紹智先生說過，在廣場，曾有人策劃把李祿裝進麻包袋「沉江」了事。之所以沒有得逞，從《六四日記》我們可以得到答案。原來，李祿有一個絕對效忠於他的「〇〇八」支隊。

此後，我也在紐約見到了李祿。出乎我的意外，他比我想像的更有氣魄和血性，而不是更有韜略。我曾向他提出兩個問題：

「當柴玲遭到『圍剿』時，你在哪裏？」

「我在教堂，我在為人們祈禱……」李祿回答說。

我又問：「當時之所以沒有作出從廣場撤退的決定，你是怎麼考慮的？」

李祿回答我說：「我意識到，這種（較量的）機會，人生可能只有這麼一次，歷史也只可能有這麼一次。我想試一試。」

顯然，他是1989年5月天安門廣場真正的中堅和靈魂。不過，如此有能力的他始終沒有被廣場同學選舉為總指揮，不能不說在那裏的同學中，埋藏著一股制約的力量，對於注重秩序的作者來說，這可能是一股不服從的力量，但對於追求民主的事業來說，它未必是壞事。

現在已經清楚，如果說，在吾爾開希背後站著的是劉曉波的話，那麼，在王丹與柴玲的背後，分別站著的就是王軍濤和比他更年輕的李祿。令我震驚的是，正是這個李祿，在六四當天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前，竟對柴玲說出了「你應該死」這樣鐵石心腸的話。好在他的話沒有「命令」的效力，只是一個僅供采納的「建議」而已。

同樣令我震驚的是，《六四日記》寫道：據王軍濤的妻子侯曉天透露，1989年6月1日，震驚廣場的綁架總指揮、副總指揮的事件，就是王軍濤一手策劃的。封從德曾就此向王軍濤進行過求證，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當時廣場的角逐之無規則性，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而當社會的全體(包括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和試圖擴大軍費預算的軍頭)都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廣場時，廣場的格局之複雜、鬥爭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從《六四日記》我們尚不能窺其全豹，但也可見一斑。當然，那些鬥爭，有些是因為理念的不同，有些是因為戰略的不同，有些則是因為爭權奪利，有些是為了角逐虛榮……凡此種種，都是大規模自發的群眾運動題中應有之義。

科研工作的移情？

相對於人們的期待，我們不得不說，無論是學生領袖還是知識分子，真正懂得政治、懂得群眾運動的其實不多。閱讀本書，我常常感嘆，作者之所以能夠對學生運動如此投入，且心甘情願地放棄美國波士頓大學遙感所提供的五年博士生全額獎學金的深造機會，如果不存在一種類似於科學追求的執著，以及計算機編程研究和實驗快感的移情，種種犧牲都將是不可思議的。作者在這方面優秀的素質，無疑在眾多方面提升了本次學運的檔次，就像眾多學生在各自的崗位分別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一樣。

但是，讀《六四日記》，也時常引起我的一些擔憂和不解。為甚麼思維如此精密、做事力求完美的人，往往在一些常識的問題上失去判斷能力和事後的反省能力？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是關於「是否撤離廣場」的表決。營地聯席會議曾就此作過兩次表決，頭一次是「不撤」的票數多於「撤退」的票數，指揮部作出了「順應民意」的決定；最後一次口頭表決，也是「不撤」的呼聲高於「撤退」的呼聲，但封從德本人作出了「撤退」的決定。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但是，這一次他為何竟敢違反「民主」原則，斷然做出了決策呢？是否因為危急時刻，他那根科學家的神經暫時地得到了休眠，而人的本能和良知重新浮升到主宰的地位？我注意到，他突然意識到，人之為人，是有恥感的。而公開表決這種方式，難免使一部分人對於看似軟弱的行為羞於啟齒。我們不能不說，這真是一個堪稱「偉大」的發現。但在此之前，他為何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他難道沒有注意到，後期廣場實際上已經陷入「旗多人少」和被「旅遊革命家」佔領的局面？他難道沒有感覺到，圍繞廣場最高權力的「政變」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本書證明，他不僅是發現了，而且是引起了重視的。只不過，這種種信息，在他的中樞神經發出的不是改變路向的訊

號，而是在原有的計劃中，追求無限完美的指令。這正如科學家在實驗中遇到了困難一樣，他所要做的只能是創造條件，克服困難，而決不會因出現困難而放棄試驗！寫到這裏，對不起，我不能不想到毛澤東的那些更大規模、更艱難的社會實驗。而且想到，他老人家是怎樣用他那「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去戰天鬥地和整治人類的。雖然二者決不可比，但恐怕都有某種共同的盲點。

第二個是關於「如果撤退，對不起堵軍車的學生和市民」的問題。我不知道這個道德詰問出自何方。但是，我想，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它才是成立的：第一，學生所在的位置，是在比市民、學生更危險的前線；第二，市民和學生所面對的，只有玩具軍車和虛擬的軍隊。如果不是這兩種情況，按常識思維，學生只要撤出廣場，市民和學生就不必在前線與軍隊對峙，不必為廣場付出更大犧牲，廣場上的人才對得起一直支持他們的廣大群眾，而絕沒有讓群眾付出更大犧牲才對得起群眾的道理。這個簡單的邏輯，不知為何到了廣場的領袖們那裏，卻成了一道歷史的難題？

筆者現在尚不敢斷言，究竟是運動領導人骨子裏存在「遊戲潛意識」？還是其浪漫的性格過分追求象徵的意義？或者是過度疲乏使之已喪失正常人的思維？抑或是對群眾生命價值的忽略？這最後一條，王軍濤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已承認有紅色教育的原因。我想與封從德探討的是，是否也有科學家思維的局限？科學的起點，就是「假設」，科學實驗本身就是對環境的「虛擬」。在生物學家的眼中，「生命平等」的概念往往並不意味著把生物、生物社會提升到與人或人類社會等量齊觀的地位，而是習慣於把和自己一樣的人和人類社會等同於生物和生物社會看待。在物理學家眼中，人類的需求很可能被化約為「力的運動」來處理……在一個編程專家那裏，你從處理群眾運動事務中得到的快感是甚麼？你有沒有可能在有意無意間，用

處理無生命事物的方法，處理人類的事務？六四後你長期處於「無歸屬感」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如果真的存在一種「移情」的話，人們所贊揚的你的一切優點和長處，又同時將是你的缺點和短處。

也許，我的問題過於苛刻，對於小封這樣受過大苦難的人來說，也過於殘酷。但我認為，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解答，或許對於今後中國的健康意義更重大。

2009年4月24日於北京

陳小雅，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八九民運史》作者。

熊焱序

從德博士已差不多著作等身，這次又出了一本《六四日記》；他經常地恭維我，以致到了要我為他著作寫序的程度，而我很少會説受寵若驚之類半真半假的話。我説，當然是我，非我莫屬。

話雖這樣講，仔細讀其書，心情卻十分沉重。這本書我曾經在1992年來美國時讀過其初稿，其實，從德有隨身記事的好習慣，在天安門的日子裏他就開始記錄。因為書裏頭寫我的事很多，出於謙虛的緣故，那時我不便對其發表評論。沒想到從德花了近20年的功夫，幾易其稿，在紀念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20週年之際得以出版，意義非凡。

中國古人説：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我説從德已是：從德功夫深，天安門磨成針。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以第一手材料記錄了天安門大事的過程及許多細節，他的可真是名符其實的第一手材料，我們那時一邊打架開會，他就一邊記錄著；更在於其幾乎花了20年心血的註釋筆記。這個註記不是一般的我們做博士論文的那種學術註腳——只要手眼快，及時，懂規則就會做好。《六四日記》的註記，從德用的是時間，是生命，是心血，更是他品行、操守、作風的真實記錄。大凡熟悉從德的人，都説他給人的印象是認死理的那種。他原來學理工，後來又愛上了人文，並常常以歷史學者自勉自戒。每個話，每個詞在他的筆下都力圖求真求實。

我和他的觀點雖然不盡相同，我知道Facts and Brute Facts這些東西的局限性；但從德有一次對我説：事實的記錄，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憑空揑造更壞。聯想最近我在網上讀到戴晴女士筆下所寫天安門的人和事，我才知道對歷史事件的憑空揑

造有多壞，那是要很壞的人才可以動筆的啊。

天安門事件過去20年了，從第一天開始就有寫作騙子流行，我們這些還沒死的人，當然有責任盡自己最大的可能把真相寫出來。可是，在我所知道的人中，只有我們這位從德老兄才真真實實踏踏實實花了20年時間做這件應該做的事情。

在天安門運動中，作出最大犧牲的當然是那些死難者，其次是傷殘者，再其次是他們的家屬親人，還有那些坐牢經年者，他們是真正的英雄。但是為1989天安門運動終日殫精竭慮者，首推封從德，這裏有書為證。讀者若是買幾本回去好好看看並收藏之，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提起八九六四，又提及封從德，就自然會想起另一位久違了的朋友——柴玲。天安門那一代人對柴玲美好的回憶無法抹卻，那位聰明美麗、活潑熱情又頗有學生領袖才情的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算是永遠與八九春夏的溫暖、激情和理想一併定格在我們記憶的深處。

願上帝安慰天安門事件中一切受到傷害的人，抹去他們的淚水，撫平他們的傷痕，賜福給他們！阿門！

2009年4月16日

寫於US Army Fort Rucker Aviation Center

熊焱，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召集人，現任美國陸軍軍中牧師。

常勁序　封從德的堅守

4月14日突然收到老封電郵來的《六四日記》的徵求意見稿，我禁不住為老封舒了一口氣。從我九零年第一次看見這本書的手稿至今19年了，這次終於要出版了，我打心眼裏為老封高興，我知道這是他的嘔心瀝血之作。

記得那時老封和柴玲剛剛逃離中國，在海外受到了英雄式的關注。他們在全美巡迴演講時來到舊金山，被安排住在一家五星級賓館。但老封卻刻意避開媒體的追逐，跑到遠在東灣的坎星頓來看我，在我那裏住了幾天。我那時寄居在一個美國老太太的家裏，在附近一家中餐館打工。那次是我們逃亡後的第一次相聚，我們徹夜長談，一起回顧八九年學運中的夥伴和經歷，比較和印證我們的記錄。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份手稿（當時好像叫《八九備忘錄》），也是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老封內心的痛苦和矛盾。

與其他知名流亡「學生領袖」不一樣的是，老封對媒體的聚光有一種強烈的抗拒情緒。一方面，他一直覺得八九學運的輝煌是很多同學們一起付出的結果，對媒體將柴玲和他塑造成明星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對學運以流血失敗告終有一種很強的負疚感。再者，出來後在海外看到的大量的報導與他個人經歷和記憶的巨大出入也使他對媒體報導的真實性感到疑惑。

在海外媒體對八九學運報導的真實性這方面，我也曾有同樣的疑惑。來到海外後我所看到的很多有關報導和回憶錄使我對自己的記憶產生懷疑（當時我也的確因為過度疲勞和對屠殺的震驚而出現了一些失憶的症狀），甚者一度懷疑過這場運動的自發性。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慢慢意識到，媒體報導裏大量戲劇化的描述、對當事人作用的誇大以突出英雄的形象以及把對

細節的猜測當作事實來寫的手法，很大程度上已經歪曲了歷史的真相。當然，國內對有關史料的封鎖，中共因宣傳需要而釋放的大量虛假信息，一些當事人出於虛榮或個人需要而編造故事，學運中學生組織（特別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對幹部接受記者采訪的嚴格限制，學生組織在特殊環境中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特別是學運後期領導中心的混亂，進一步增加了揭開八九學運真相的難度。

當然，對老封來講，解決的辦法是很簡單的。如果我們所有的當事人都能尊重事實，盡力準確地把個人的經歷記錄下來，八九學運的真相就可以展現出來了。這也是九一年老封在巴黎召集17名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召開「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的初衷之一。在那次會議上，柴玲、李祿、封從德、王超華、梁二、沈彤、張伯笠、白夢、老木、張倫、蔡崇國、辛苦、劉衛、劉燕、楊濤、李蘭菊和我等17名當年的學運骨幹聚集在一起，花了一週的時間回顧八九學運期間的經歷。我們面對面地回憶、對質和解疑，其間老封的發言主要基於這份手稿。後來老封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出了詳細的會議記錄，並在徵求了每一個與會者的校對後出版了《回顧與反思》一書。該書目前仍然是對八九學運中學生方面的組織活動描述最全面和真實的一本史料。

這份手稿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在於老封是八九學運裏唯一一個橫跨了「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絕食團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首都各界聯合會」等核心決策組織並參與核心決策的「學生領袖」，他的見證無疑給人們瞭解這段歷史的真相提供了一個最權威的原始記錄。

儘管老封在八九學運的發起和發展的過程中比其他組織者們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從來不貪功，也從來沒有自認為領袖。他的謙虛和低調使他在流亡早期只是作為「柴玲的丈夫」

為人所知。作為學運的組織者，我們都知道在這場民主運動中，其實並沒有甚麼傳統意義上的領袖，也沒有人能夠以少數人的意志操縱學運。如此大規模、有秩序的學運是無數組織者和普通學生的集體奉獻和努力的結果。這是一場民意至上、領袖意志勢微的運動，民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這是一場個人意見自由發揚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人們找到了言論自由的感覺。這也是一場民主實踐的運動，學生自治組織在民意基礎上存在和發展，以民意為決策依據，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重大的決策。「學生領袖」們不過是民意代表，一旦他們喪失了民意基礎，也就同普通的學生沒有兩樣了。

這份手稿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老封在其中用毫無修飾的樸實筆觸忠實地、巨細無遺地記錄了他所做的一切、看到和聽到的一切、以及內心的感受和想法，讓人們可以一窺八九學運中一個核心的組織者、決策者的內心世界，對這個事件的起因、發展和結束以及其中各種各樣的決策困境和爭議有更深入的瞭解，為後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寶貴的歷史資料。

在八九學運中，老封在同伴眼中是一個認準一個理堅持得近乎偏執的人，也是一個為了理想可以不顧一切地沒有城府的人，可以在最危險的時刻奮不顧身，也可以在最光榮的時刻捨己而退。他是一個理論家——可以為了一個細小的規則而追究到底，也是一個實幹家——可以將別人看起來完全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但不管他身上有多少你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你都會在心裏百分之一百地敬重他、信賴他。不管你認為他所堅持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你都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發自內心的。他的誠實就象一汪清水，清澈見底。

我們每個人從小就被教導誠實是做人最基本的美德，但做一個誠實的人卻是極其不易的。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東西在誘惑著我們，虛榮、欲望、仇恨、妒嫉、權力、財富——一點小小的人性缺陷加上一點小小的外部誘惑就可以突破我們的道德底線。直面事實和真相難，直面真實的自我更難。在這本書

中，老封毫無忌諱地記錄了他在八九學運中的缺陷、幼稚和錯誤，並對當時的個人偏見進行詳細的注解。而對他的夥伴們，他也毫不吝惜譽美之詞和犀利的批評。他這種對原則的堅守成就了他誠實的美德。

在我看來，這份手稿的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老封在八九學運中對民主的思考和理解、對學生組織如何在民主的框架內有效運作的思考和努力、對學運的定位和策略的思考與實踐，以及後來對八九學運的歷史遺產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對學運的組織者(包括他個人)在學運中的偏見和錯誤的反思、以及對民主運動中個人意志凌駕於群體民意的現象和根源的批判。

雖然八九學運只持續了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並沒有給予組織者們足夠的時間進行民主實踐的活動，但仍然出現了像「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這樣比較成熟的自治組織，不僅具有強大民意基礎和組織能力，也為學運的發展貢獻了許多的優秀人才。在這本書中老封詳細記錄了他所參與的各學生自治組織成立、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也詳細記錄了這些組織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早在學運初期老封就是少數幾個能從理論上和戰略上思考學運發展方向的組織者。他對民主程序的堅持為「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民主化運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言論自由的堅持使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在他的主持下成為民眾自由發言和辯論的平臺。他對民意的堅持使他在戒嚴部隊的槍口下，沉著地應用民主程序統一大家的意見，和平地將示威學生和民眾帶離天安門廣場。他從學運一開始就提出成立公開活動的學生自治組織，把學運定位為民主啟蒙運動，把學運的目標定為爭取校園民主而後擴大到啟動全國性的民間自治運動，自下而上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原則。這些思路也是這場運動所保留下來的最珍貴的遺產，對今天中國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這本書的出版也可以説是老封過去20年的人生總結。20

年的人生是漫長的，也是短暫的。當年一起在學運中手挽手激情吶喊的青年人一晃眼都已人到中年了。對於當年的理想，有的人還在堅守，有的人已經背棄了，大多人則是遠離，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老封依然是堅守的一員，而且一貫如昔堅守得近乎偏執。從流亡出來後棄理從文專研歷史和宗教到〇三年十年寒窗獲得博士學位；從九一年的《回顧與反思》，到九八年的《天安門之爭》、二〇〇〇年的「六四檔案」，以至於今天的《六四日記》，在過去的20年裏，他的人生悲歡、喜怒哀樂都同這份堅守連在了一起。或許他可以用那頂得之不易的博士帽換個學者的清閑，亦或用他一流的編程能力混個中產的優裕，但他把他渾身可以賴以謀生、甚至發財的技能以及無數的不眠之夜都用在了「六四檔案」的網站開發和資料收集上了。這份執著讓我汗顏羞愧。

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的經濟實力提高了，富裕的人口增加了，建築設施現代化了，社會文化多元化了，當年學生們所爭取的一些自由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現，八九年所發生的一切也已經被很多人淡忘了。然而，六四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權者仍然不敢勇敢地面對它，仍然在忽視那些受難家屬的呼號，仍然在強迫人們忘記那血腥的一幕。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們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仍然在賣力地詆毀八九學運，扭曲和掩蓋歷史真相，壓抑著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無論當權者能不能面對歷史的真相，歷史總要向前走，人們遲早會從歷史的傷痛中得到教訓，中華民族終究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人生的確沒有多少個20年，但對於一個古老的民族來說，20年是極其短暫的一刻。因為有無數的人們還在像老封這樣堅守，不管是在行動上還是在心裏，這個民族是幸運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

堅守誠實的品德、堅守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堅守對理想的追求，這不僅是一個歷史研究者的堅守，也是一個理想實踐

者的堅守。作為八九學運的一員，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為老封的堅守而驕傲！

2009 年 4 月 20 日
記於美國加州洛杉磯

常勁，原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副主席，現在美國自創公司。

作者前記

寫給未來

這是我的嬰孩，帶著血污，降生了。這是一次難產，從孕育到降生，20年。這是一個見證，記錄了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理想，和我們對中國的希望，對一個公正的共和國的大希望。這個希望指向未來——也許，我們付出的生命代價，還不足以構建這樣嶄新的共和國，但我們無怨無悔，因為在那個炎熱又寒冷的春夏之交，我們用自己的青春、血淚和熱情，竭盡全力呼喚過這樣嶄新的共和國的誕生。我們，自由地活過。我們，依然是自由人。

1989年4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國大陸爆發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這場公民抗命的非暴力民主運動，以學生為先鋒，以學運組織為中堅，以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為後盾，波及到全國300多個城市及更為廣大而鮮為外界關注的農村地區，全球華人不分黨派不分地區實現了空前規模的大聯合，數百個自治團體自發成立，近萬人參與了長達一週並準備捨身的絕食請願，數千萬人在全國各地參加了千百次遊行，數百萬民眾和學生一道阻攔20萬軍隊，致使當局無法在北京實施戒嚴長達兩個星期。這場原本非常和平的民主運動，最終被專制政權用機槍和坦克極其殘忍地鎮壓，據當時紅十字會、學運組織和學者的統計，6月3日至4日一夜之間約三千人喪失生命，數萬人受傷，更多的人被捕、流亡或遭整肅。這就是永載史冊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

從更大的時空來看，八九民運是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轉型的一個分水嶺，是全球共產主義運動走向終結的開端。從橫向

而言，雖然八九年中國的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但在「六四」後的東歐，蘇聯所有的衛星國皆土崩瓦解，柏林牆垮了，齊奧塞斯庫遭處決，就連蘇聯本身也在不久後解體。從縱向而言，中國自晚清以來，嘗試了無數種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直到今日尚未定型真正與世界接軌，而八九民運則是由民間自發的超大規模的社會嘗試，希望以自組織的方式由下而上重新構建一個公正的社會，呼喚一個理想中的共和國。

這個嘗試無疑是朦朧而早熟的，無論從理念架構到實體運作，都遠遠不夠成熟，胎死腹中並不奇怪。實際上，自1905年取消科舉以後，中國的社會政治構建模式發生根本性的顛覆，傳統模式逐漸消亡，借鑒西方的模式最終以非主流的極左共產陣營佔上風，再與中國非主流的法家酷吏統治相結合，也就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模式，集西中糟粕之大成，橫行大陸數十年，構成中土政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反者道之動」，八九民運就是對這種大倒退之反動，試圖結合中西主流的政治構建模式，一方面呼喚經濟自由化，一方面追求政治民主化，總之要重構社會的公平與公義。然而，倉促崛起的運動，缺乏堅實的理念架構，既缺乏綱領又缺乏藍圖，四十年積累的民氣沒有方向的引領，無法凝聚成強大的力量。形而上的理念既已闕如，形而下的構建自然不固，最終無法與中共專制機器相抗衡。這就是我們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所感受到的「務虛」與「務實」兩方面的困境。但無論如何，有了需求就會有思考就會有探索，最終也將有所供給。

本書記錄的就是這些需求，及這些需求產生的來歷，即以非暴力原則自發形成的民間組織——八九年是學運與民運組織，以後則可能是維權或政治組織——在驟然而起的形勢中，如何儘快建立民主程序以穩步發展，又需要哪樣的理論和實際的指導。對此我雖有20年的思考與探索，但遠遠不能供給完備的答案。這需要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承前啟後不斷努力和積累。積累的第一步就是記錄，可靠的如實的記錄。因此，

本書是寫給未來的，寫給未來的探索者。

共和國的大希望

本書副題為「廣場上的共和國」，這裏解釋一下。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也譯為《共和國》，作者無意梳理其希臘原意到拉丁轉譯再到近代法英譯文（從Politeia到Republic），而是借用「理想」與「共和」二詞，想說明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和民眾也有一個理想中的共和國理念，即對真正的公共空間和公平的社會管理的追求。其實，拉丁語Respublica就是指公共事務，柏拉圖要討論的也是公共事務如何合理而公平地管理。八九民運的基本理念與之非常接近，即希望中國不再是一黨之私，公權力要回歸公共空間，以便公共監督與公平管理。而學生們首先從自己做起，自發地組織起來，從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門廣場，從嘗試校園民主到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乃至要求人大取消違憲的戒嚴甚至罷免李鵬政府。「廣場」就是指公共空間，「共和國」就是指這個理念。

這裏舉些書中的記錄，來說明八九學運組織很強調民主程序與公共意識。外界對此瞭解甚少，以至有人懷疑那是不是一場真正的和自發的民主運動。

在胡耀邦去世四天後，4月19日晚，北大學生就利用一個公共空間——三角地的大型集會——公開組建了籌委會，設定運動的兩點目標：直選學生自治會和創辦獨立校園報刊，即校園民主。由此自發地由下而上組建的北大籌委會逐步壯大，並經歷多次民主改選，成為八九學運最為堅實的自治團體之一。4月26日晚，北大籌委會的中層骨幹頂著當局「四二六社論」的巨大壓力，面對北高聯和籌委會一些常委的軟弱表現，根據章程中規定的民主程序，成功地推翻常委會的決議，做出了次日出校遊行的正確選擇。當時作者在設定和推行民主程序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得到籌委會同學的廣泛支持。另外，書中還

有大量的記錄，描述了我們這些在專制教育下並無民主體驗的學生，如何在很短時間內摸索並掌握了民主的一些基本要領，包括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設定民主程序並監督其運行。

三角地是北大的小廣場，廣場是擴大的三角地。它們的共同特徵就是公共空間。在三角地，北大學生不僅創立了籌委會，還舉辦「自由論壇」，將籌委會原先封閉在室內唸稿子的廣播站，搬到三角地由大家自由發言。這樣的溝通形式很快就消除了籌委會與同學之間的隔閡，許多有創意的方案就是在這裏的腦力激蕩中產生。後來「自由論壇」有了更大的空間——天安門廣場，在那裏同學們的聲音響徹全國，傳遍世界。在這個巨大的公共空間上，各地來的同學和無數的民眾盡情享受自由的空氣，並自我組織自我管理。300多所高校學生代表幾乎每日都有依據民主程序的營地聯席會議，決定廣場上的大政方針。無論甚麼樣的觀點和建議，都可拿到這個「學生議會」上辯論，但最後須經投票表決方能生效。

廣場上不僅有了「學生議會」這樣的立法機關，還有指揮部這樣的行政機構。其實，在北大籌委會，我們也逐步摸索出三權分立的基本道理，將議決與行政分開。但這些也只是二權的分離，直到廣場後期，才有建立第三權——司法權威的需要，在出現貪腐現象後準備開一個法庭來審理，只因「六四」而沒來得及。其實，在運動中還出現第四權——我們自己的媒體，廣場上的幾個廣播站都經歷過從行政機構分化出來、趨於獨立媒體的過程，雖然不純粹，但這個趨勢也說明新聞自由在一個民主實體中的自然趨於中立的普適性，並非西方民主的專利。除了這些民主特徵在運動中有成熟與不成熟的表現外，我們還有自己的強制力量——糾察隊，以至於北京一些市區的交通都由他們指揮。我們雖然還沒有自己的貨幣，但已有其雛形——用學生證換取食品等供給。最有趣的是，我們的執行機構還簽發過結婚證書。

總之，在這些自組織的實踐摸索中，我們在廣場構建了一

個小型的「共和國」；而我們最終的希望，是一個民主因而公正的共和國。這個希望雖然朦朧，缺乏具體的藍圖，但就這麼一個朦朧且缺乏藍圖的大希望，已足以讓千萬人捨身忘己，赴湯蹈火，在坦克和機槍面前毫無懼色。八九民運證明，中國民眾並不缺乏實踐民主的勇氣與智慧。

另外，一些人對於八九民運自發性的質疑，本書也有一個清晰的答案：這場運動雖有各種政治勢力的介入，但從主體上看，它很難說不是一場由下而上自發的運動。這可以從本書中找到證據：如果不是自發的運動，而是受到無論是官方還是某些民間勢力操縱的運動，像本書作者這樣毫無背景的普通學生，怎麼可能在很短時間內佔據運動的主導地位？其實，本身作者參與運動的機緣純屬偶然，可以說毫無準備，但很快成為主導學運方向的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的常委和主席，且在辭職後又很快進入運動的新的核心組織：絕食團與廣場指揮部，及聯席會議。如果背後有黑手在操控，怎麼會留給毫無背景的作者這麼多機會？

《日記》的撰寫過程

本書是在19年前列出提綱、18年前寫就的《八九學運備忘錄》基礎上刪訂註釋而成。《備忘錄》草稿共522頁35萬字，精煉刪節12萬字枝節瑣碎部分，又加了6萬多字的註，而成今日之《日記》。本書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日記，稱日記只是順口而已，其實稱備忘更準確。那是1990年春我到海外後不久的記憶，先按時間順序擬出一個提綱草擬一個初稿，並與一些同學核對過，尤其是在舊金山的常勁，他在北大籌委會是最為重要的骨幹之一，「六四」受到當局內部通緝（像常勁這樣的學運骨幹很多，他們踏踏實實在組織內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只因遵守紀律不見記者，又沒正好置身於外界關注的熱鬧場景，所以外界對他們瞭解甚少）。準備一段時間後，於1990年底動

筆，91年4月草就。當時擔心日後遺忘，遂將所有關於學運的記憶逐日記下。那其實是接受我在巴黎的學業導師的建議，為自己作為一種心理療法而寫的，本不打算出版，導師每週上課時就收下一週來我寫的備忘，積五月之功而成（見目錄前圖一、二）。備忘錄寫作過程中，我已發現外界對八九學運與民運的認知幾乎都在表層，對運動組織內部的情況多不瞭解，報導出來的部分又多有謬誤，因此除了用作時間順序的標定外，我儘量不參考其內容，而是以自己的記憶為主。

但個人視野畢竟有限，記憶錯誤與混淆在所難免，於是我花了18年時間來核實和修訂。在《備忘錄》草就後，我立即傳給一些當事人，請他們做些修訂，並希望大家都來記錄這段歷史（見目錄前圖三）。與此同時，我組織了一次研討會，邀請17位當時流亡海外的六四學生，於1991年7月在巴黎的法蘭西學院討論了7天，做集體的回顧與當面的核對。經過兩年的努力，法、德兩國的留學生將會議錄音整理出來，於1993年出版了《回顧與反思》一書。1995年，影片《天安門》造成對柴玲和學運的嚴重誤解，我寫了許多文章為之辯護，進一步發現澄清史實的重要性，於是集結舊文加上從備忘錄整理出的一些關鍵史實，於1998年出版《天安門之爭》一書，並開始構思建立「六四檔案」。2001年，《天安門文件》出版，我發現其中有不實之處，比如將幾年後的回憶文章抄入卻稱之為中共情報部門當時的內部報告，因此更感覺維護史實的重要性，於是創建「六四檔案」網站(64memo.com)。經幾年的積累，「六四檔案」網站收集了三千萬字文字和五千幅照片，及一些音像內容公佈上網，成為內容最為豐富的全面記錄八九學運和民運的六四資料網站。另外，1997年曾得到余英時教授指導，他建議我將自己作為當事人的回憶寫下來，留給史家去研究。

「六四」20週年將近，我感覺應將備忘錄整理出版，於是從2008年5月開始，斷斷續續地整理到現在，方才完成刪節與注釋。本書著重於外界不甚瞭解或多有誤解的學運組織內部運

作情況與決策過程，雖然是個人視野，但用註記形式補充了350多條考訂及相關事件的簡述，可謂集十幾年整理六四資料之大成。作為個人的努力，本書希望為這一段曾經影響千萬人命運和中國政治走向的歷史做一可靠的見證。

這裏說明一點，由於十幾年積累的素材過於龐大，最終匯總加註時才發現時間不夠，拖延了一個多月，才給幾十位當事人通過電郵發出徵求意見稿，並請幾位良師益友寫序。這時又得到不少修訂意見的反饋，這在註中用「據某某修訂」的形式標出。因為時間倉促也許部分當事人來不及修訂，另外大約十位當事人的電郵已不存在或我根本沒有其電郵，不過這也不要緊，此後還可繼續修訂本書，本書以後還可出修訂版，「六四檔案」網站為此開辟一個專門空間，鏈接是：

http://www.64memo.com/64riji

下面匯報一下《日記》撰寫過程中的幾重困境。

羅生門的困境

我相信，羅生門的困境，是所有歷史研究者都會遇到的，「六四」研究尤其如此。著名影片「羅生門」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人性的弱點與局限，導致利益相關者只會說出對己有利的一部分事實，掩蓋對己不利的一部分事實，甚至為了有利而編造故事，而有利不利則因時勢而變化。電影中，四個人物在衙門受審時就是這樣：強盜自誇英勇無比殺死武士贏得美人心(而不是之前騙取武士信任強暴了武士妻)，武士則透過靈媒自稱壯烈切腹，武士妻自詡為貞女烈婦，唯一明白真相的樵夫則因偷了武士的短劍不肯吐露真相，最後才在「羅生門」和盤托出。

「六四」資料因為數量龐大，這類「羅生門」大量存在。這裏僅舉一個例子——5月14日十二學者上廣場。

在後來對此事有記述的當事人中，如果一定要排一個光

譜，從支援絕食學生的要求，到希望無條件撤離廣場，大致可以這樣排序：鄭義、蘇煒、嚴家祺、于浩成、李洪林、蘇曉康、王超華、戴晴。根據各方面資料、尤其是當時的錄音，重構出的事件經過是這樣：戴晴得到當局首肯，在絕食第二天，14日下午，幾乎在學生與政府對話的同時，召開一個「著名學者關於形勢的座談會」，以便次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王超華跑到會場上，希望學者們去廣場勸撤。學者們經熱烈討論，草擬了《緊急呼籲》，一方面呼籲政府答應三點要求（承認學潮愛國；承認學運組織合法；不採取暴力，不秋後算帳），一方面呼籲學生暫時撤離廣場，並誓言若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將和同學們一道奮鬥到底。會後大家被接去對話現場，王超華發現政府方面並沒按之前答應的那樣實況轉播，就衝進對話現場喊停。學者們對學生唸了《緊急呼籲》，隨後又到廣場學生廣播站唸了一遍；戴晴則單獨去見統戰部長，私下（而非戴晴自稱的是「被推舉的代表」）商量了一個方案，然後再去廣場。等《緊急呼籲》唸完，學者們又做了一些演講，這時戴晴才亮出那個私下方案：只要領導人到廣場說一聲同學們好，並答應將下午的會議內容見報，同學們就撤離廣場。至此同學們恍然大悟，沒接受這一荒唐的方案，學者們只好離開廣場。之後學生們又有廣泛討論，有的支持戴晴方案（當時都以為是學者們的共同意見），有的則堅決反對，包括王超華也堅定地說：她代表的北高聯，與對話團和絕食同學完全一致，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下面我們來看看對此同一件事，這些當事人回憶的差異有多大，又如何隨著時間而演變。「六四」後不久，蘇煒的文章記載了他們對戴晴暗中做手腳的不滿，李洪林講：「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12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但蘇曉康卻憑借文學家豐富的想像力，說了一個虛構的故事，以此證明

學生的「非理性」，及他和戴晴的「理性」；而在1992年的回憶中，戴晴因為那天做的手腳露餡，被知識界孤立，於是將怨氣發在學生身上，廣泛傳播蘇曉康的這個虛構故事，並掩蓋她與當局的私下協議，而把自己說成被推舉的代表；王超華一直回顧她如何殫精竭慮勸學生理性從廣場撤離，而不提最後反對戴晴方案要堅持到底；鄭義的回憶則見證戴晴方案的荒唐與適得其反，及隨後的孤立；2001年于浩成的回憶也很不滿戴晴暗中做的手腳，指「戴晴這樣做完全沒有與其他11個學者、作家商量」，其方案「與原來12人一致協議並鄭重簽名的《緊急呼籲》中所提出的條件相差甚遠」，他又引用高皋（嚴家祺妻）的文字：「過於想表現自己能力的戴晴，沒有與其他知識分子溝通，便即興言論一番，希望學生體諒政府，在戈爾巴喬夫到訪時讓出地盤，以便完成歡迎儀式，結果引來學生一片噓聲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抱怨。」可嘆的是李洪林，在海外長年沉默後，2005年在大陸寫了一篇回憶性的評論，這時他的立場有了很大轉變，不僅全盤接受了戴晴廣泛傳播的虛構故事，更將《緊急呼籲》說成是單方面針對學生的勸撤呼籲，還說學生代表也都接受了；直到最近，戴晴還在傾向有問題的香港媒體《明報》上將《緊急呼籲》扭曲為單方面的「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戴晴廣泛傳播並讓李洪林掉進陷阱的那個虛構故事，是這樣的：就在戴晴提出那個私下方案後，封從德立即帶領廣場上的人唸了三遍《絕食宣言》，由此廣場情緒突然逆轉，學生們才開始反對戴晴方案。這個故事其實很容易證偽，因為帶領廣場十幾萬人唸三遍《絕食宣言》絕非小事，那會長達數十分鐘且吼聲震天。這麼宏偉的場面，不僅作者沒有記憶，當時的音像記錄和媒體報道也都沒有——原因很簡單，那根本沒有發生過。一些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憑空捏造了故事，另一些人則掉進了記憶的陷阱，且因「羅生門」效應而甘願掉進陷阱把自己裝進這個虛構的故事。其實，掉進陷阱的並不只是李洪林老先生，還有美國學者為之背書的《天安門文件》，其中幾乎完整

拷貝了這個虛構故事，卻赫然納入那天中共三個情報部門向中央遞交的報告內容。這說明《天安門文件》至少有一部分資料抄襲了後來的回憶，卻很不幸連戴晴的「羅生門」錯誤也抄了進去。

這個「羅生門」錯誤其實很好理解——「六四」後，因為大屠殺帶來的責任問題，許多當年支持廣場學生的人，輕則不敢承認當時的支持，或喜歡強調自己在一些私下場合也有勸撤的意思，重則不惜罔顧事實編造故事，來證明自己的「理性」和英明。這就是為甚麼「六四」史料有如此之多「羅生門」的緣由。

為了說明「六四羅生門」的繁多，這裏再簡單舉兩個例子。第一個很簡單——關於溫傑——只有兩個當事人截然對立的回憶。一個是王超華，她說溫傑同她一樣反對長期堅守廣場，因此記得溫傑也反對成立民主大學：「這民主大學一辦，可就不好往回撤了。你們必須阻止他們。」但張伯笠的回憶卻截然相反，對於民主大學，溫傑不僅「同意了，並且要求參加民主大學的籌建工作」。很有意思的是，二人相互矛盾的回憶，刊登在同一份報紙的同一個版面（《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2月21日）。溫傑已逝，死者不能復生，這個公案恐怕會是永遠的謎團。另一個「六四羅生門」則複雜很多——五二七聯席會議的撤留問題——與十二學者上廣場一樣，有太多相互矛盾的回憶，很多當事人都扭曲了事件的原貌，而自稱當時主張撤離廣場。篇幅限制，這裏不擬細究，讀者可參考《日記》中5月26日至28日的註。當然，「六四羅生門」並不限於撤與不撤的問題，在許多與當事人利益攸關的事情上都普遍存在，撤與不撤只是其中最常見的公案。

本書的羅生門與局限

那麼，我自己能否避開羅生門呢？我相信不能，哪怕是有意識地避免它們。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我自己的主觀局限。

這裏不是說我自己的經歷局限了《日記》的記載範圍——這本來就是任何當事人的回憶都難以克服的，當事人只能記錄自己經歷的事件，最多通過註記來擴充一些重要事件，因此，本書對外界重視的一些焦點問題也缺乏探究，尤其是官方決策過程、知識界和民眾的參與過程、及「六四」屠殺的過程——而是說，我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本身就是我的主觀判斷；如何算是重要，則會受到自我合理化傾向的影響。面對負面評論而力圖證明自己正確的心理定勢，容易造成對事實描述與考訂的扭曲，雖然本書有意識地避免，但也難說完全杜絕；看見別人的錯誤比較容易，而對自身的錯誤就可能視而不見；而對外界的批評，則會傾向於搜尋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積少成多，偏重就會成問題。

舉例來說，因為外界存在眾多針對柴玲和廣場指揮部的誤解乃至偏見，本書的註記由於是經年的積累，就會大量列舉糾正這些誤解和偏見的證據，而忽視了批評中合理部分的證據。這類問題在本書中是否普遍存在？同樣的，註記中引述的大量回憶和報導，可以梳理出幾位明星在學運中鮮為人知的奇特軌跡，包括如何熱衷於找記者開記者會，如何編造被便衣追蹤的故事以「製造緊張氣氛」並不顧學運組織的紀律和反對發起「個人絕食」以保持在運動中的地位，與李鵬會談時如何在當局的安排下要求其他學運骨幹不要發言，如何不斷假裝暈倒，如何在「六四」後貶低學運組織以抬高自己並隨意扭曲史實以修飾成一直主張撤離等等，這些記述和我的選材，是否能夠擺脱羅生門的局限？對這些問題，陳小雅的觀察非常敏鋭，我認為她的批評很有道理；嚴家祺老師讀了書稿後也有類似的委婉提醒。看來這是本書的一個重大缺陷，只能留待日後進一步修訂補充了，如用上面公佈的「六四檔案」網站上的專門空間，補充資料並開放收集其他人的修訂。

其次，友情與時勢帶來的困境。不僅對自己容易自我合理化，對友人也會有此傾向。我們通常會將友人描寫得好一些，

對其私德欠缺則難以下筆。這是人之常情，我不敢自稱鐵面無私，只能說在涉及公共事件的方面，還是盡力不受友情的影響，對那些事後看來是錯誤的行為和選擇，也會如實記錄。這樣做其實很難，畢竟日後還得面對這些友人，他們不願意外界知道的事情，在我的書中講出來，友情難免受損。尤其是也許當時就出於我的誤解，我的記錄本身就是錯誤的，那豈不白白受損且將問題複雜化？有時顧慮會反過來，對於自己反感的人，反而會擔心將其負面行為的細節寫出來容易受到讀者的誤解，因此一些細節會語焉不詳甚至略去。另外，對外界已經有刻板印象的明星人物，我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不一樣的地方，要寫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還在獄中或國內隨時面臨官方打壓的人。這時，追求真實與道德規範有時就會衝突。而這個時候，大量當事人對他們的記述，都會有所偏向，「為賢者諱」，這些記述是否採納、如何採納？是否應該等待日後更可靠的記錄？還有，對一個人的判斷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包括「六四」後各人的行為會反證他當時的操守，因此對此人的筆調也會不同。凡此種種，都是此書會經過這麼長時間才可以出版的一些原因。我知道，這些變化會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因此還是盡量保留原稿中的筆調，對於明顯錯誤的判斷，我會在註記中加以說明。

另外，我還得承認，即便在 1991 年完稿的備忘錄，也受到當時閱讀的資料的影響。譬如，原稿中將5月18日的見面稱為「對話」，這是當時很多資料中的普遍說法，如胡平「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很強調當時政府已經與絕食學生有了電視直播的對話，直到 1995 年我才發覺「對話」一說與 89 年的事實不合，如果是那樣，同學們堅持在廣場就成了無理取鬧；許多人稱之為「對話」，只是方便而已。這類明顯的錯誤在《日記》中就直接修改了。還有一些細節純屬記憶錯誤，經當事人指出也直接改正了，如常勁、趙體國是 86 級學生，而非 85 級畢業班學生；他們不是同屋，而是住在隔壁等等。

本書之特色與內容簡介

本書在兩個意義上有其特殊之處。一是對八九學運和民運組織過程的內情有第一手的和較為完整的披露。

迄今為止，「六四」資料林林總總，但對運動的組織與決策過程，除了極少數當事人有些零星的回憶以外，絕大多數的資料都是關於運動的外在過程的片面而不可靠的描述。這包括官方的資料、記者的記述和事後的採訪與研究，但裏面都有諸多嚴重缺陷。首先，官方資料極不可靠。除了時間標定可能比較準確以外，官方資料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掩蓋和誇大事實的情況比比皆是，有目共睹，這裏不必贅述。其次，當時的記者涉及到的運動內部過程的描述，也是片面而零碎的。實際上，八九學運的一些關鍵組織，譬如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都有嚴格的紀律以約束重要成員不得私見記者。因此，記者們容易見到的「學生領袖」，幾乎都是不太守紀律、因此在學運組織內部被邊緣化了的一些人。這些人非常熱衷去見記者，召開個人記者會，有的甚至每天都去記者們住的酒店，而媒體也樂於製造明星以便形成焦點追蹤報導。因此，外界以為瞭解到的運動內部過程，主要由這些明星人物的言說構成。但因為這些明星與運動主體和核心組織已然脱節，他們的言説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對組織內部的民主決策既不清楚，又常常刻意回避甚至貶低，因為他們其實早已失去了對運動的主導，卻又不得不繼續扮演學運領袖和明星，從而容易為了證明自己依然在位、或為了做秀而發出一些驚人的言説，並採取一些脱離組織藐視民主程序的行動。最後，事後的採訪與研究也難以擺脱當時表面化的報導的影響和誤導，繼續追蹤明星，從而缺乏深度的挖掘。本書力圖彌補這些缺陷，使「六四」史料更加厚實，這得益於作者在運動中貫穿全程參與了幾乎所有的重要組織的特殊經歷。從最早的北大籌委會，到運動中期主導學運的北高聯，到後期舉世矚目的絕食團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作

者都是這些關鍵組織中的幾個主要負責人之一，直到「六四」凌晨撤離的決策過程，作者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書具備其他資料所沒有的內部透視。

本書的第二個特殊之處，是結合當事人回憶與史料研究，主觀與客觀融為一體。古今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回憶汗牛充棟，史料研究也浩如煙海，但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結集出版，同時具備個人的主觀回憶，與大量其他資料進行客觀分析的，大概還沒有先例。關於這兩方面的寫作歷程，除了前面交待的情況，本書在「後記」中還有更詳細的說明，在此不贅。

本書第一章記述1989年以前的相關事情，尤其是1987年元旦被捕的經歷，及一些後續情況；第二章是胡耀邦去世最初幾天，我偶然捲入學運的心路歷程，即我在出國留學與追求中國剛升起的希望之間的內心掙紮，最後情不自禁地選擇了這個希望；第三章描述北大籌委會草創初期的情況，我們遇到的民主建制、人事問題和危機；第四章「五人常委制」，講述籌委會25日改選及之後的經歷，尤其是四二七大遊行前夕民主程序的成功運用；第五章「主持北高聯」，是我受北大籌委會之托，到北高聯後當選主席，組織五四遊行的經歷，當時因為缺乏經驗，被人貿然越俎代庖宣佈全面復課，我感到難辭其咎而辭職；第六章「低潮到絕食」，敘述辭職後我自己想「復課」完成論文而不得，再回來創建北大廣播站的「自由論壇」，直到絕食的經歷；第七章回憶絕食後創建絕食團廣播站，參與指揮部運作，直到戒嚴後廣場指揮部成立前的經歷；第八章敘述我在廣場指揮部中參與種種決策和行動，尤其是5月27日聯席會議前後「空校」計劃和撤與不撤的討論，及整頓廣場財務的種種努力；第九章「最後的時日」，描述6月3日至4日的經歷，尤其是「六四」凌晨主持撤離表決、指揮部帶領同學撤回學校然後逃亡的情況；最後，在「後記」中，我簡述了逃亡經歷、我在海外流亡的情況、及與本書相關的逐步探尋和認識八九學

運真相的過程。

順帶說明一下，從5月13日絕食開始，本書標明每日氣溫，那是《北京日報》的天氣預報，並不一定是廣場上的實際溫度，廣場因為是石板地，溫差應該大幾度，譬如5月27日天氣預報是「晝30℃夜15℃」，而據報導那天白天36℃、晚上則只有10℃。

鳴謝

本書得以面世，我首先要感謝在巴黎的學業導師施舟人先生（Kristofer Schipper），他是我一直佩服和敬仰的學者。本書內容雖與道教研究不相干，但施先生是本書正文原稿《八九學運備忘錄》的最初推動者，沒有他的理解、指導與幫助，我在1990至91年就不可能完整地用五個月的時間寫完那個初稿，也不可能在法蘭西學院召集17位六四流亡學生開一週的會，最後成就《回顧與反思》一書。另一位給予我切實指導的是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如果沒有1997年余先生的指導性建議，這部《日記》也許不是今天的形式，而很可能變成較為主觀的描述。還要感謝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輩嚴家祺先生，他在八九民運中具有極大影響力，尤其對我們這些學生，他在流亡生活中的高潔品德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實際上在巴黎時，嚴老師就很鼓勵我整理出版《備忘錄》，「廣場上的共和國」就是那時討論的名稱。另一位也參與了八九民運的知識界前輩陳小雅女士給我的幫助尤為直接，在過往近十年間，我們有許多關於八九史實的交流，許多關鍵線索在這些交流中明晰起來。這三位前輩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很快地為本書寫序，實在是我不可多得的殊榮。這裏還要感謝丁子霖教授，她雖不能寫序——由於蔣培坤教授去年因警察騷擾而心臟病發作臥床至今，丁老師又不懂電腦，加上本書定稿拖延太久只有一週時間徵求序言——但他們長期對我的關愛一直令我感懷。本書在一定意

義上是為他們而寫的，我一直不能忘記他們在許多年前的呼籲，殷切希望運動骨幹提供「原原本本的事實，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我特別感到榮幸的是，司徒華先生在最近推動紀念「六四」的北美之行後，剛回到香港就為本書題字。華叔的書法名滿全球，他題寫的書名無疑為本書增添莫大的榮光；他領導的香港支聯會一直是我心中的聖地，那是民主女神依然高舉的火炬，許多大陸人都去維園參加每年的大型「六四」紀念，從那裏接回民主的火種，而我也是支聯會的網絡義工，那個火種在我心中從未熄滅。

在流亡學生中，我要特別感謝常勁對我一貫的關注與支持。在《備忘錄》之前還有一個綱要性的初稿，1990年夏天和秋天我兩次到舊金山時，就與常勁核實一些史實並釐清時間順序，後來我們還有多次討論，許多我記不清的北大籌委會的情況都是常勁幫我釐清的。另一位北大籌委會的摯友熊焱博士，則在精神上給我極大的幫助，本書的一些重大線索，也是與熊焱討論後才清晰起來。這二位的序言有其特殊的價值，因為他們也是這本書中的當事人，他們的補充和觀點能夠修補我的不足。還有一位當年的戰友王有才，他2004年在出國後與我有多次長談，討論八九學運的史實，並一直鼓勵和支持我完成此書的寫作，與他的交談打消了我很多的顧慮，使我更有勇氣秉筆直書。另外，當年是清華駐高聯常委的周鋒鎖，也一直給予我極大的支持與鼓勵，最近我們又同在灣區，他的幫助就更加直接，他的淳樸、剛直與勇毅一直是我欽慕的品質。這四位朋友也都接受過六四檔案「口述實錄」的採訪，這裏也一併感謝接受採訪的李海、蔡健、彭嶸、張智勇、王治新、江棋生、程真、馬少方、項小吉、王磊、劉蘇里、李進進、翟偉民、魯德成和韓東方等朋友，及所有曾將自己的經歷如實發表出來的當事人，他們的回憶極大地豐富和修訂了這部《日記》。當然，如果沒有孟浪兄的熱情與膽識，如果沒有他的細致與勤力，如果沒有他的鼓勵與督促，這部書也很難在「六四」20週年前出

版。最後，我帶著極大的歉意特別感謝我的女友Crystal，如果沒有她的理解與支持，給我一個溫馨而安靜的環境，本書的順利面世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2009 年 1 月 5 日至 4 月 27 日
封從德 謹識於美國舊金山

1. 前面的故事

八七年元旦，我被捕了

獨自去天安門

早晨一覺醒來，便覺嚴冬寒冷的空氣裏有些異樣。同學將收音機開得很大聲，《新年賀詞》的語氣惡狠狠的：極少數敵視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膽敢趁新年之機鬧事，必將嚴懲不貸！海淀區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也在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同樣威脅說不得參加未經批准的非法遊行。昨晚約好今天一道去天安門的幾位同學，開始閃爍其辭，有的要洗衣服，有的約了女友。一位黨員同學不久前得了台灣反叛作家柏楊的真傳，老將「你不搞政治，政治就會搞你」掛在嘴邊，昨晚還對我高談闊論「出世入世」，此刻卻沉默不語了。

在一種莫名的悲涼中，我獨自去了天安門。

我是去看熱鬧的。這熱鬧已經好些天了，我不想放過觀察歷史的好機會。[1] 北大冬天的校園本來冷清清的，但從12月中旬以來，三角地便沸騰起來。貼在三角地的大字報說，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同學，為了爭取民主權利，已經遊行請願好些日子了；請願之風已波及上海、武漢、南京、天津等地——現在，全國高校都看北大的舉動了。[2]

「民主不是賜予的」

後來又傳說萬里到了合肥，督陣處理學潮，其間說了一句

話：「黨給你們的民主已經夠多的了」。這句話，把北大同學激怒了——民主不是賜予的，而是與生俱來！——許多大字報這樣回應。但同時又出現一個難題：萬里近年來明顯是個開明的改革派人物。於是同學們又爭論起是否應該抨擊萬里，從而引發對改革中的種種問題弊端的反思，特別是政治改革等問題。我饒有興味地閱讀那些酣暢淋漓的文章，頗覺新奇和興奮——在沒有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大字報成為我們的精神食糧。

對於這些爭論及事件經過，我起初並不清楚。我是理科研究生，對社會問題和文化思潮瞭解甚少。大概為了轉移學生的注意力，當時校內連續放了好幾部優秀的外國影片。後來三角地的大字報才鋪天蓋地。年底前幾天，三個穿風衣的神秘人物站出來，自稱北大經濟學院研究生和講師，說應該給改革派時間，並警告同學們不要蹈波蘭、匈牙利覆轍，要求改革反而引發流血和經濟危機。後來我才知道，這之前兩天，鄧小平已在黨的高層講了類似的話。

《十條》激發元旦遊行

12 月 20 日左右，三角地有人倡議元旦到天安門遊行。26 日，限制遊行示威的《十條》便出臺，即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於在北京地區遊行示威的暫行規定》共十條。《十條》明顯針對同學們而來，這可把大家氣炸了。有的說，這「橡皮圖章」從未這麼高效，一週就能訂出個法規！有的則要上訴，說《十條》的制定程序非法，且嚴重違憲。

當時真有按《十條》要求去申請遊行的，是三個物理系的同學。剛把申請遞上，公安局立即打電話叫來北大校黨辦要員，對三人曉以利害：要麼撤回申請，一切好說；否則今後的畢業分配則無法保障，上級也不會批準遊行。最後三人只得撤回了申請。

《十條》的出臺，申請的被拒，激起同學們的義憤。有人

憤然貼出大字報，號召同學們於元旦上午十點去天安門，用實際行動否定《十條》。

廣場三層人牆、灑水結冰

我本來只是想去看看，因此還遲到了。從前門地鐵站出來時已十一點了，比倡議的時間晚了一小時。當時我並不知已有同學申請過遊行，心想既有《十條》規定，公然反抗就違法了；若有同學以身試法，一定非同小可，我得去看個究竟。以前每次與父親爭論，他總拿黨報和文件說「我相信這上面說的，你有甚麼根據？」

前門地鐵站就在天安門廣場南面。廣場已進不去，三層人牆，隔一米站一人，團團圍住中間偏南的紀念碑。最外一層是武警，中間中學生，最裏是少先隊。除了這三層人牆，廣場空空蕩蕩。當局為了阻止同學們衝進廣場，在地上灑水結了厚厚的一層冰。本想在節假日到天安門來觀光遊玩的人們，現在只能在遠處驚異地望著這戒備森嚴的廣場：今天一定有甚麼大事情發生了！[3]

寒風中，我裹著黑大衣，從前門向廣場東面的歷史博物館走去。博物館門前的空場和人行道聚有上萬人，學生、市民、遊客及便衣，乃至穿制服掮著攝像機的武警，全都混在一起，彷彿沒有主體，也沒有圍觀的人群，誰都像是看熱鬧來的。大家都靜靜的不說話。武警肩上的攝像機對準最活躍的地方，靈活地轉動著。沉寂中，大家都在等待著甚麼事情的發生。

這時是十一點一刻左右。

我輕聲問旁邊學生模樣的人，才知一小時前同學們已在新華門有次集會，並試著衝了一次廣場，並有同學被捕。後來，同學們就聚在這裏，吸引了許多群眾圍觀，結果混雜在一起，毫無戰鬥力。

歷史博物館前的小插曲

這時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一個老人掉了甚麼東西在地上，彎腰摸索，鄰人好奇，目光聚集過來，攝像機也跟著對準這裏。小老頭見狀慌忙躲閃，結果莫名其妙地領著眾人兜了好幾個圈。有的同學喜形於色，以為有了轉機要遊行了呢！在政治高壓下，願意跟從的人群有的是，卻無人敢領頭。

另一段插曲則顯出政府的狡猾。人們佇在那裏呆若木雞，突然一股人流向北，大家也跟著向北，以為北面天安門方向發生了甚麼事。我趕到人流的源頭，已是長安街了。只見一隊整齊的中學生隊列兵分兩路，一路朝東向王府井方向，一隊朝西向天安門去。人群跟著走，越走越茫然，最終就散了。

老天爺，政府多有手段！它把中學生利用得那麼好，早已謀算好了怎麼疏導人群，也早就預備好讓幾千中學生站在冰天雪地的廣場上作盾牌——誰又能衝擊祖國的花朵而免遭譴責呢？望著分散的人流，我心中既悲憤又感慨：大字報上說，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上海交大講，「我就是搞學生運動出身的！」是啊，我們這些毛頭學生，怎是這些鬥爭高手的對手呢？

這時，我看到警察打人。長安街對面，天安門東側觀禮臺下，幾個警察舉著警棍追打一個青年，打完後拖進一輛非常普通的公共汽車。我這才注意到，周圍還停著好幾輛相仿的公共汽車。我急忙奔回歷史博物館，希望大家去救那青年。但是，沒組織的人群毫無戰鬥力，你能講給幾個人聽？誰又會跟你走呢？幾經努力無結果，我只好放棄。

遊行始於國際歌

又是令人窒息的十分鐘過去了。終於，人群開始不那麼沉默。面對幾臺攝像機，大家閉著嘴哼唱《國際歌》——「滿腔

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歌聲越來越大，勇敢的學生和市民站在中央，膽小的退避兩旁。歌聲把示威者凝聚在一起，大家開始張口高歌。

嘹亮的歌聲振奮了大家，有人呼口號，有人把揣在懷裏的標語打了出來，人群開始移動，向北遊行。圍觀的人群鼓起掌來，攝像機慌了，卻趕不上隊首。這時大約中午十二點。

遊行的人流向北浩浩蕩蕩湧去。橫幅、標語越來越多，口號越來越響。口號喊些甚麼已記不太清，想來應有「廢除十條、遊行自由」以及「支持改革」、「民主萬歲」之類。隊伍北行到長安街向東轉，要去王府井，那兒人多、宣傳效果大。向東還未走出百米，便一片回頭的喊聲：「到天安門去！到紀念碑去！廣場才是我們的目標！」

於是大家折回頭，我正好走到了這回頭向西的隊伍前面的人群中。直到此時，我還只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想看個究竟而已。這時我還心想，這樣回頭去衝廣場武警，是不是有點暴力的味道，心裏並不大贊成。

從旁觀到參與

一幅場景改變了我的角色，使我從旁觀變成投身參與。當一輛警車迎面開來時，隊伍前面打橫幅的人手軟了，橫幅的一角歪倒下來，人也不見了。我心裏罵了一聲「膽小鬼！」立即熱血沸騰，一面鄙視那人，一面也為沒加入隊伍而自感羞愧。於是我擠到隊前，接過歪倒的橫幅，同另外三個學生一道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仗著人多，我們繞過警車，車上幾個武警全被淹沒在人海之中。車子小心地對著人群慢行，他們還想勸阻學生，卻全無效果。

我們依然高唱《國際歌》，呼口號。我看看手中的橫幅，上書「改革到底、民主萬歲」幾個大字。我心裏好笑，這不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不過，同學們確實希望堅持改革開放，



〔圖1〕1987年元旦，北京大學學生遊行隊伍衝進廣場前的情景。標語後穿大衣的是封從德，右面戴鴨舌帽的是偽裝成工人的便衣。

也很擔心這次遊行被阻礙改革的保守派所利用，橫幅倒是頗有深意。〔圖 1〕

這時，四個戴鴨舌帽的人走進隊伍，熱情地說：「我們工人支持學生。」同學們甚為感動，以為有了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就成功一半了。我還握住其中一個中年人的手說：「歡迎工人老大哥！」就像電影裏共產黨鬧革命時的情景。

前面就是武警隊列，在廣場東北角。武警們一片忙亂，有的手拿對講機急促呼叫。十幾輛警車很快從廣場各處開來，載著上百武警來增援。此時，遊行隊伍已一發不可收，只聽到一片「衝啊……！」的喊聲。

四個鴨舌帽將我推給武警

因為灑水結冰，地上很滑。武警提著警棍插進人群，隊伍亂了起來。這時我倒益發平靜，依然同另二個學生打著標語

（又已溜走一個），心一橫，充滿了對真相的渴望：「進監獄也要看個究竟！二十多年的壓抑受夠了，現在活得要像個人！」當時的心情比這複雜，一面維持作人的尊嚴打著標語往前衝；一面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恐懼還沒有到來，我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這群體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願，這心願給了我力量。【4】

然而不久，我感到背後一股推力把我送到武警手中。回頭一看，正是剛才那四個「工人」。那鴨舌帽這時急急地喊：「這傢夥是帶頭打標語喊口號的！」一起打標語的同伴大約也被帶走了，我單獨被兩個武警拉住。當和群體分開時，一股因隔離而失去力量的恐懼感襲入心中。後面的同學還要衝上來救我們，但隊伍已被武警衝得越來越亂，越來越小了。我掙脫武警的手，自己走向十幾米外的警車。警車是吉普車改裝的，只在車頂加個警燈而已，停在空蕩蕩的廣場中。車上後排坐了另一個學生。前排一個軍官，摘下帽子，擦著頭上的汗，灰白的頭髮籠罩在白色的熱氣中。

這時，又見兩個武警架著一個青年向警車走來。青年向武警辯解著甚麼，武警摘下掛在青年脖子上照相機往地上摔，我忍不住衝過去高喊一聲：「私人財產，不許損害！」武警吃了一驚，呆在那裏，青年趁機拾起像機，和我一起上了警車。我們進車時，軍官兇狠地瞪著我，顯然是對我膽大包天、鎮住了他手下的兵而氣惱。他指著我的鼻尖，手顫巍巍的，喊道：「你們這群大學生，國家白養活你們了！」

見我昂著脖子對著他笑，他手一揮，我以為這一巴掌是挨定了，心想我們到底有甚麼仇？我覺著滑稽，也覺著他們這一代人怪可悲的。他們多少都是階級鬥爭的受害者，怎麼對共產黨還能保持忠心？對中國的苦難與落後，是沒看見還是麻木不仁？我依然微笑著對視他的眼睛。那眼神由兇狠變成困惑，抬起的手垂了下來，鼻中發出重重的呼氣聲。

中山公園派出所

警車穿過空曠的廣場向西北急駛。會被帶去哪裏？我心裏一陣發緊，那是黑暗中對未知的恐懼。反革命罪？判刑四年？十年？吉普車晃得厲害，心也隨著晃動，我為自己的怯懦而羞愧。很快到了中山公園大門口，沒有熙來攘往的遊客，只有兩排士兵像儀仗隊似的佇立兩旁。我們三個「罪犯」惶惶不安地立在士兵行列間的空地上，在凜冽的寒氣中，小心翼翼地吐著白氣。

陰沉的烏雲像床大棉被籠罩著天空，使人有點沉沉發醉的感覺，心頭的恐懼在這沉醉感中漸漸散去。腳一落地，心裏踏實不少，充滿了好奇。警官下車，與立在門口的幾個軍警嘀咕幾句後，我們被帶進中山公園。中山公園在故宮西側，這時寂靜得可愛。我們經過一道牌樓，叫「公理戰勝坊」，心想我們終將勝利！

來到中山公園派出所，我們先被拘在傳達室。報上姓名單位暫時沒事，就坐在木條凳上等候發落。記者先被帶進去，我便同另一個學生聊起來：

「哪個學校的？」

「人大歷史系。你呢？」

「北大遙感所。怕嗎？」

「不怕。法不治眾，這麼多人，不怕。」

我們目光對視了一下，彼此感到安慰，不再說甚麼了。半個小時後，人大同學被帶進去。又過半小時，我也被兩個警察帶走，穿過彎彎曲曲的小路，我的心情又被公園美景所感染，曲徑通幽，步伐也輕快起來。真是奇怪，那時全沒想將面臨甚麼。

「不算審訊」

審訊室是間小平房，不足十平米。中間擺張木桌，一架單

人小木床靠在牆邊，安坐三人，二男一女都很年輕，將近三十歲。女的作記錄，男的提問。他們問我年齡、姓名、單位，我警覺起來：

「是審訊嗎？」

「這個……不算審訊」，中間的男警察顯得有點吃驚，沒料到我會反詰，「算是談話記錄吧。」我心裏好笑，若是談話，那我有不談的自由嗎？看他們還算客氣，沒有逼供的意思，我決定直話直說，乘機向他們宣傳學生的主張。

「你的動機是甚麼？」

「沒甚麼動機，民主是大家的事，民主權利也有你們一份。我本來沒想參加，但遊行集會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十條》違憲，剝奪了《憲法》中保障的權利。市人大在一週內就定出這麼個法規，也太草率了。」

「和誰一起來的？」

「就我自己。」這是實話。他們不信，又問了一次，還是這句。

「你們喊過甚麼口號？」

「『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支持改革』、『反對倒退』、『取消《十條》』……」

「還做了甚麼？」

「唱《國際歌》、《國歌》、《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拿出那條橫幅，問是否我舉過，我承認了。問為甚麼還講「支持改革」，我說我們只是反對《十條》。我儘量顯得輕鬆。他們其實很想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甚麼，也想知道大學生在想些甚麼。在他們心目中大學生是了不起的，當他們知道我是北大研究生，目光中更現出欽佩和不解。不過，他們還是設下陷阱，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軟硬兼施。這時我往往笑而不答，或者避開他們企圖引我上鉤的地方。最後，記錄衣著、相貌。

「談話記錄」大約有三頁，要我簽名。我仔細讀了一遍，發現並不全，把我想說的話截掉了，意思也有些改變。我本想

拒絕簽字，想一想也不必硬碰，於是在簽名前面加了「基本屬實」幾個字，以防將來被他們利用。

北大環境中心六研究生

回到派出所，我被領進裏間的拘留室。拘留室約二十平米，進門我吃了一驚，沒想到這麼多人被抓。二十幾個「人犯」坐在靠四壁的長木凳上，中間一張大木桌，桌上放兩隻保溫桶供飲水用。只有一隻骯髒的杯子，沒人敢用。清冷的寒屋中瀰漫著呼出的熱氣，氣氛很是沉悶。看守五十來歲，坐在門口台階上的小凳上，表情冷峻而茫然。

我走進去，看見六個北大環境中心的研究生，高興地同他們聊起來。「不許交談！」看守突然大喝一聲，屋裏頓時沉寂下來。大家瞪著看守，見他像隻充足氣的皮球，拿著架式漲著臉卻沒甚麼底氣。不一會屋內又嗡嗡地嘈雜起來，看守也洩了氣，呆坐在門旁。

環境中心的六人中，譚飛我認識，四川老鄉；XX，為人老成；另一個披一頭長髮，像個嬉皮；還有兩個原是法律系的女生，一個很溫柔，也是四川人；另一個是黨員，姓張，很幹練的樣子。彼此介紹後，我對黨員被抓很感興趣。原來他們並沒參加遊行，只是拍了幾張照想留個歷史見証，不料便衣盯上，將他們一網打盡。

黨員很後悔，埋怨譚飛「都要上公車回校了，又跑去拍照，這倒好，哪兒都別去了」。然後又熱切地介紹起她怎麼在受審時理直氣壯，背出各種法律條款，引經據典地論証警察抓他們是非法，最後她拒絕在記錄上簽字。「我們一定要讓公安局和學校說清楚啊！我們並沒有犯罪，而且這麼抓我們是非法的，要公安局道歉」。我聽著也似乎壯了些膽，琢磨其中的味道又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

鴨舌帽的陰影

門突然打開了，遊行時那個鴨舌帽探頭進來，後面跟兩個官樣人物，有個據說是副局長。鴨舌帽用微顫的手指著我：「這就是那個學生，帶頭打標語、喊口號。」然後故作忿忿狀，表功似地看看兩個大人物的表情，連呼吸都不勻稱了，一副非借此升幾級不可的架勢。我坐著沒動，心中疑惑：階級仇恨真這麼深嗎，我哪兒招惹你了？三人進屋不一會兒就走了。看守接著坐在門旁抽悶煙。

他們會把我怎樣？——我正悶悶地想著，忽見窗外紛紛揚揚飄起了鵝毛大雪，心中頓時一股柔柔的感覺，我像是吸了口清新的空氣，心裏踏實多了。望著白雪，不知外面同學是否知道我們關在這裏。我們決定收集大家的名單，若有一個能出去，就去學校報信。

二十幾人的名單

我承擔了收集名字的工作，下面是我記得的 15 個高校學生的名單：人民大學 2 人；清華大學 1 人；石油機械幹部管理學院 1 人；北京大學 11 人（環境中心 85 級研究生 6 人，物理系 3 人，遙感所研究生 1 人，還有一人記不得哪個系的了）。

北大物理系中一個叫周家華，戴副白框眼鏡，很像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他知識非常廣博，得過全國知識競賽的亞軍，獎品一台彩電運回家孝敬老母，一套音響送給系裏，系裏又送回他宿舍，我後來還去過他宿舍聽音樂。另二人是一對情侶，天津人，後來雙雙通過赴美留學的 CUSPIA 考試，1990 年我在美國時，得知他們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物理系。

不是學生的大多很沉默，聽說審他們時就比對學生嚴多了。元旦社論既然說一小撮煽動「鬧事」，公安局就得找出那「一小撮」。有幾個工人記不清了。其中一個叫張一渤，很喜

歡與和學生交談，獲釋後還來北大看過我們。他的工作是籌備博覽會，人很熱情，對社會問題也非常關心。

此外還有一個中學生、一位記者和一個農民。那農民很有意思，非常老實，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靠牆斜臥，頭枕在一個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上。問了好半天，他才講出被捕經過。他從山東來看親戚，順便揹一袋花生上京城來賣，正趕上學生遊行，便講了句俺支持你們，沒想到被便衣盯上抓了進來。「俺犯了甚麼王法？說句心裏話也得坐牢嗎？不過，這倒省了店錢。」

被砸相機的記者原來竟是《法制報》的，真是天大諷刺。他一見我便說，我可沒像你們那樣遊行啊。原來，他在我們衝軍警線時拍了好些照，便衣和警察來阻撓，他出示記者証也沒用。一個警察威脅他「再拍就砸相機！」他沒聽，惹惱了警察，然後就是我前面見到的那一幕。我問「你親身經歷敢寫下來發表嗎？」「不行，」他沉吟片刻，「那不光砸我的飯碗，社長的飯碗怕也要砸了。」他苦笑著。記者為社長著想，社長也來幫他，看來他們關係不錯，很快把他保釋出去了。

中學生的反抗

窗外，大雪依然下個不停。時間緩緩過去，大家一個接一個被傳呼接受第二次審理，唯獨沒叫我。我感到那鴨舌帽的陰影，有些惶恐起來。

下午五點過，咕咕叫的肚子提醒我今日滴水未進。大家可能都一樣，經過一番抗爭，終於有人抱了一箱麵包放在長桌上，此時已是六點半。看守要收錢，每塊麵包七毛五。我們哄起來：監獄還管飯呢！你們非法抓我們，憑甚麼收錢？看守只好拿個本子，每人領一塊麵包後簽個名。不清楚是以後再要帳，還是向「人犯」的單位要錢，總之以後再沒下文。

我們當中那個中學生，修長的個兒，顯得機靈而又倔強。

麵包的外殼發硬，他鄙夷地把剝了扔在地上。看守見了逞起威風來，揪住中學生：「撿起來！吃了！」

「我不！」中學生一側身，不睬他。

「撿起來！吃下去！」看守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高聲喝道。

屋裏突然靜下來。

見看守對中學生無禮，我衝上前去：「你講點人道。你有孩子沒有？你也讓孩子撿地上的東西吃嗎？」眾人也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像是開看守的批鬥會。農民把麵包皮拾走了，看守見情勢不妙，溜回門口抽他的悶煙。

這場較量滅了看守的氣焰，大家的談笑暢快許多。我依然同環境所的同學們混在一起，大家邊吃邊研究起包裝紙上印的小梅花，於是自稱「梅花黨」。又講了許多故事和說笑，以打發這漫長的夜。

九點半，《法制報》社長來把那個記者保走。大家興奮了一陣，感到希望，然後又是低沉的交談，間或靜默。屋裏既嘈雜又煙霧瀰漫，日光燈射出的白光照在臉上，讓人覺不到夜色的昏暗。談笑間我又感到隱隱的恐懼：會把我怎樣呢？無從想像。

營救與獲釋

十二點半，門再被打開，北大校黨辦和研究生會的五個人走進來。其中有研會主席馬伯強，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主席，不過比預料的黨性少些，人很實在的樣子。黨員張同學興奮起來，拉著校黨辦女幹部的手，嘰嘰喳喳講了許多。原來，不只中山公園，前門、東郊民巷和王府井派出所都抓了人。後來得知，共抓了 82 人，其中 34 個大學生，多是北大的。

我們還得知，中午我們被捕後即有同學趕回北大報信。下午三點半，幾千同學包圍校辦公大樓，丁石孫校長站出來保

證：全力向公安局爭取放人。部分同學不願等，從西門衝出學校到中關村遊行，結果五千人冒著大雪遊行去天安門。學校派車中途勸返大部分同學，因為公安局已同意放人，但仍有七八百同學不信，堅持步行到天安門，全程十六公里。

我們聽到這些情況，既興奮又感動。畢竟是北大同學！我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其他各校的同學羨慕地看著我們，也感到巨大的希望和振奮。

獲釋回校

我們十一個北大同學隨著校方的人走出派出所，來到公園的停車場。二輛小車、三輛麵包車停在那裏，當中還有校長的小車。公園裏壓著皚皚白雪，好一派北國風光。我們在這裏留了幾張影。是校方的人拍的，後來沒寄給我們。

我們坐二輛車返校，另三輛車去其他地方接同學。從中山公園西北門經北海返校的路上積著一尺厚的雪，北京沉睡在一片白色中，靜極了。車怕滑開得很慢，路上偶爾見到三兩成群的學生，在冰天雪地中走向學校。我想招呼他們上來擠一擠，搭車回校，但校方的人說已另有安排。

車上，黨員已開始傳達校方指示：「我們不能再給學校添麻煩，學校為救我們已很不容易了，所以回校後，我們就不要到同學們聚會的地方去了，免得又有遊行。」當麵包車駛過北大南校門時，依然有上百個同學佇立在紛飛的雪中，等候被捕同學的歸來。我非常感動，想打開車窗向外揮手喊：我們回來了謝謝你們回去吧！然而轉瞬間車子已溜了過去。大家可能和我同樣感受，但都只是沉默著，一言不發。麵包車繞進西門，我們下車後默默地走向宿舍區。過了校醫院大家分手時，約好第二天同去校長辦公室，要求對今日事件作一定論和解釋。最後，黨員還是沒忘記說：不要到同學中去。

我心裏惦記著校門口的同學，就說：「我們應該到校門口

去感謝那裏的同學，叫他們回去休息不要再等了。是他們救了我們！」見我話語激動，幾個同學上來勸我，相信他們也有同感，但沒人敢違抗黨員的說法，最後還是各自散去。我在黑暗中停留片刻，最終還是沒獨自去南校門。一來恥於出風頭，不願獨自一人充英雄，二來也沒法解釋其他人為何沒來，還破壞了他們默認不去的決定。

回到宿舍，三個同學已睡著了。夜靜得很，只有些微的鼾聲。我連夜將這一日發生的所有經過詳細記在了日記本裏。

那次被捕後的一些經歷

這裏記述一些 1987 年至 1989 年學運開始前的一些經歷，後來都與八九學運有些關係。

譚飛的憂鬱

獲釋回校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們六七個「難友」一齊到校長辦公室呈交請願書。辦公室的人表示願意轉交，又打官腔說不保證結果，此事後來便無下文。黨員最積極，看來洗刷清白對她非同小可。

六個環境所同學中，我的老鄉譚飛很憂鬱，大家都去寬慰他。我說，關鍵是這個行動不是他自己選擇的。心中的想法似乎被我說中了，他後來對我很信任。他的恐懼很正常，參加學運會影響到以後的分配，而他們被捕卻並非因為主動加入了運動。

另一張陰鬱的臉也令我印象深刻。那是法律系的一個女研究生，見我們幾個「難友」的熱情，既流露出一絲羨慕，又憂鬱地搖搖頭：「你們很有熱情，但現實卻是……我們去過法院實習，中國的事很難說啊……」她語焉不詳地講起一些在法院

實習時遇到的黑暗現象，眼中充滿「中國的事情你們還根本不瞭解」那種神情。

隔壁同學的自殺

第二天晚上從圖書館回宿舍，走近樓時發現一輛警車停在近處，嚇得我躲一旁偷偷觀察動靜。起初以為是公安局來抓我了，仔細一想又覺得沒道理：下午到校長辦公室時，還說不處理我們呢。在樓外徘徊了半小時，最後鼓足了勇氣，躡手躡腳地閃進單元門，快步上樓，小心翼翼打開房門側身進屋，這才噓了一口氣。

原來，是隔壁的一個同學跳樓自殺了！

同屋講起如何抬遺體到醫院；隔壁則講這同學平日沉默寡言，極少言笑，半年前才從清華考來北大計算機系讀研究生。此前大家已發現他不正常，有一次是在五道口的鐵軌上把他找回來的，看來尋死的念頭由來已久，據說可能是因為失戀。[5]

此事雖與我無干，卻也讓我感到沮喪與不解。我向來不認同自殺，無論落到何種地步，人生都可從新開始；如果真是上帝造了人，肯定也不會允許人自己結束生命。我們的人生才剛開始，因此隔壁同學的自殺，給了我極大的衝擊。

與柴玲的第一次長談

政府的狡猾，我的種種觀察與感受，事後我很想講給人聽，作為大家日後的參考。真正從頭到尾饒有興味聽我講的只有一個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級的學生，這時已轉到了心理系，正忙著準備考研，我們站在圖書館大樓的走廊上聊了兩個小時。柴玲也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那天幾千同學遊行，她與幾個同學攔了一輛公共汽車。「司機真好。中途停車是違規的，但見是學生，一揮手就讓我們上了。」一個同學



〔圖2〕1987年1月5日，北京大學學生不滿北京市頒佈限制遊行的《十條》和歪曲報道，聚眾焚燒了《北京日報》。

徒步走到天安門又走回來，到宿舍發現鞋底已經沒了。這是我們第一次長談，但並不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起點，那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元月5日，北大同學不滿北京市頒布限制遊行的《十條》和歪曲報導，聚眾焚燒了《北京日報》。〔圖 2〕

胡耀邦下臺

1月底，在寒假回家的火車上，聽到新聞聯播「胡耀邦辭職」的消息。這時我才明白，原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竟同情學運。我覺得他只是個替罪羊，覺得他很冤枉。後來聽說他對於撤銷總書記一職，只說了一句「能理解黨中央的決定」，但這個「黨中央」其實是幾個八十歲的老朽。八九年撤銷趙紫陽總書記一職的，又是這幾個老朽。

與父母的爭議

還未到家，學校已先寄來一封鉛字紅頭信，希望父母管教好在大學的兒女云云。父母一見慌了一陣，後來覺得這鉛印的東西所有家長都應該收到，才安下心來。不久，父母不知從何得知了我參加遊行被捕的事，於是有天晚上，他們要與我單獨談談。

談話的前半段很困難。父親沉默良久才開口，繞著圈子問我對報紙上說的「學生鬧事」怎麼看。我說報紙歪曲了事實，這次我心中有數。難道中央文件也不對嗎？我講了我的見聞，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新思想。中央文件和報紙上的話，以前大躍進、文革中多少謊話，你們不是很清楚嗎？為甚麼還硬要我接受，況且這次是兒子的親身經歷，你們為甚麼不信呢？父親沉默了。

母親終於忍不住：你也要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你這樣下去，以後怎麼辦？我們管教不了你，社會就會管教你。看來這才是關鍵。母親說話時急切而小心，目光投向地面。我看得出她內心的衝突，她不希望我受苦。父親雖然默認了母親的說法，卻不願意像母親這樣露骨地說出真正的擔憂，而是繼續用報紙中的說法，試圖要我相信黨永遠正確「即使有錯也能改正」云云，最後總有一句「要不是共產黨領導，怕是你還在地主家放牛呢！」之後，連續三個晚上，我與父親都有激烈爭論。

最後，我不得不緘默。不孝的感覺越來越強——我在動搖父親的精神支柱，我實在不忍，也實在不能。我感到父親不是同我辯論，而更像是同他自己辯論。我感到他自己也在懷疑卻說不出口。

我的父母

父親小時候放過牛，後來進了工廠，然後入團、入黨，進

團校、黨校學習，最後還上過北京中央黨校。他很想讀大學，終究沒能如願。母親的家境比父親好，土改時劃為富農，但母親對五十年代的社會風氣非常眷戀，常常講起那時共產黨幹部的好作風，幾人與縣委書記一道下鄉調研，下飯館每人只用了八分錢。母親非常善良，她總是默默地上班，默默地持家。小時候聽大哥與其他孩子一塊攀比父母，有的說父母作甚麼官，有的說他家怎麼有錢，大哥想了一會，驕傲地說：我父母從來不吵架！其他孩子一愣，只好甘拜下風。

每次家裏做甚麼好吃的，母親總會邀來一位因患糖尿病而生活無望的同事，給他一絲安慰；或是父親邀來的同事，回顧往日的好時光或驚心動魄的場面。從這飯桌上，我隱約知道了父母過去的夢，知道了母親怎樣熬了藥悄悄地送到牛棚給廠裏的幹部。有一次，他們悄聲議論六〇年前後的大饑荒，如何餓死大批大批的人，包括我的一個叔叔和一個叔公。他們發現我在旁邊偷聽，嚇得趕緊要我保證不能對外講。

文革前父親是廠裏的車間書記，文革中就成了保皇派。一次武鬥中，造反派在軍隊支持下包圍了城市，輕易打敗了保皇派。那天父親躲進鍋爐房，最後一個被搜出，與其他保皇派一起遊街時，險些被一根鋼釬刺死。若不是穿著雨衣，鋼釬沒找準地方，一定就刺進肝臟了，至今父親腰上還有傷疤。被拉去遊街時，十幾斤重的厚木牌用根細鐵絲掛在脖子上，木牌上寫著「走資派的小爬蟲」。有時還要到街上擺張桌子，陳述自己的罪狀。被捉的那天，三十多人關在十幾平米的小屋裏，只能坐著睡覺，根本無法側身。其中一位大腿挨了一鋼釬刺中股動脈，也不讓請醫生，當晚就死了。

小時候偷聽父親與同事悄悄聊這些往事，我暗自感謝那件雨衣，沒讓我一生下來就成為孤兒。我常見父親在昏暗的燈下寫檢查，還以為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文革後恢復高考，父母非常鼓勵已上山下鄉一年的大哥回家復習備考。父親那時的熱忱，我很久以後才能理解——這是他當年大學夢的延續。而

今，我們三兄弟都是博士，父母很自豪，在廠裏也頗受尊敬。

回校差點被開除

寒假很快過去，回校後又出了一件事。我們研究生這時要確定導師，我希望跟隨的馬老師，她在所裏學術最好。她很不高興我參與學潮，差點不願指導我。後來我們關係較融洽後，她才向我透露：所務會上差點把我開除。八九年學運時馬老師則有很大改變。她以前一直相信共產黨，五七年被打為右派開除出黨，八三年重新入黨。她放棄了在美國執教的機會，但中國的現實又令她極度失望。八九年她對我説，這幾年越來越感到沒有希望，心想過一天算一天；現在你們學生起來抗爭，我又感到了希望。

馬老師透露的內情，讓我想起寒假期間聽從黨員的建議，給所領導寫了一篇七大頁紙的陳情書，敘述被捕經過，返校後卻沒人找我提及此事。我本科時管思想工作的老師則四處散佈：遙感所快要開除封從德了！——這是我從另一位老師那裏聽來的。

準備出國與辦托福班

我是八六年秋季保送上研究生的。到八七年秋，研究生課程很輕鬆，見研究生會社會實踐部招人，我就報名參加了。第一次聚會來了十幾人，籌劃社會實踐活動，去哪裏調查甚麼的，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熱鬧。我提議辦托福(TOEFL)班，為準備留學的同學培訓英語，這時卻幾乎沒人響應，可能大家都覺得太難了。

辦托福班其實是為我自己，我的留學夢已經十年了。十年前，77級上大學的大哥差點被選派去日本留學。電報都發到我們廠，全廠一下子轟動起來，所有人見到我都笑瞇瞇的，很羨

慕我們家。但是很快又得到消息，大哥去不成了，名額被某某高官的子女搶走了。這個反差給我印象很深。那時人們都將離開中國當成一件最幸運的事，誰能出國就像要去天堂一般，整個80年代也都這樣。中國沒希望，知識分子在中國更沒希望，越來越沒希望，這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校園內的一種普遍感受。在這種氛圍下，出國留學就成了學生的最高出路。整個校園都在學外語，學生一半時間用來學外語。我準備留學美國，這就要考托福。美國好一點的學校都要550分，頂尖院校則要600分以上，我用舊題試了幾次都達不到。另一個困難是考試費，28美元到黑市得用240元人民幣，我們兩人考得500元，相當於研究生半年多的津貼，若要參加托福班，費用就更大了。於是我決心自己來辦托福班。

我的提議只有一人贊同，他是生物系87級的研究生彭嶸。從此，從租場地到請老師，從選教材到打字印刷，一切聯繫安排都歸我，買磁帶收報名費等跑腿雜務則歸彭嶸。我的生意經是：最高的酬勞、最高的質量、最高的收費。為保障質量，我用當時教師工資的20倍延請老師，主要來自國際關係學院和北外，他們是最好的托福英語培訓教員；又租用北大西語系的語音實驗室，是第一流的設備。第一期收費標準和外界一樣，收到的錢基本上都給老師和租場地了。因為成績顯赫，平均成績從培訓開始的480提升到590，近半學生都過了600分。這個成績外界根本沒法比，因此從第二期起，收費標準逐步提高，直至外界的三倍，而每次報名都人滿為患。

辦了兩期利潤已經可觀，研會和團委開始插手，派了一個女生進來管帳，有一次竟然拿著我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大宴賓客，跑到高級餐廳去大吃大喝。那些學生官僚冠冕堂皇的說辭讓我感到很噁心。不久，我就去找他們做個了斷。我提議將當時每期利潤的一半也就是幾百元交給研究生會和團委，其餘我們獨立核算。白得這麼多錢而不用費事，他們爽快地答應了，和我簽訂了協議。權責劃分清楚後，我們的幹勁更大了，規模

BOSTON UNIVERSITY GRS/ENG ISO COVER SHEET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FROM: GRS & ENG ADMISSIONS/AID OFFICE (ext. 3-2748)
GRS RECORDS OFFICE (ext. 3-2694)

The applicant named below meets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of GRS or ENG and we are prepared to admit him/her pending your review and approval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requirements.

IT IS UNDERSTOOD THAT NO LETTER PROMISING ADMISSION OR FINANCIAL ASSISTANCE OR CHANGE OF DEGREE STATUS IS TO BE SENT TO THE APPLICANT/STUDENT BY EITHER THE GRADUATE SCHOOL OR THE DEPARTMENT UNTIL WE HAVE RECEIVED YOUR APPROVAL.

Applicant's name: FENG Cong De　I.D. Number: 000 52 2305
Department: Geography　TOEFL: 633
Degree Program:
.... M.A. (8 courses) - Max. 3 years to complete
.... M.S. or M. ENG - 1 year to complete
.... post-Bachelor's Ph.D. (16 courses) - Max. 7 years
XXX post-Master's Ph.D. (8 courses) - Max. 5 years
.... M.A./Ph.D. in Political Economy (courses) - Max. 3 years
.... M.A. in Economic Policy (12 courses) - Max. 3 years
Special Status: .... Non-Degree　.... CELOP Bridge
Admission for:
September 19 89　January 19....
Boston University Financial Aid: XXX Offer attached　.... Aid Decision pending
.... Aid Not Requested　.... No Aid
Offer of admission to remain open until: July 3, 1989
Remarks: Awarded Research Assist'p. $2200 stipend, plus scholarship to cover full-time tuition.
PLEASE CONTACT EITHER ANDREW SHEBLOCK OR CURTIS WOODCOCK (X2526) IN GEOGRAPHY DEPT. THEY WILL MAIL TO STUDENT.
College Officer: Peter Law　Date: 5/22/89

TO BE COMPLE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Recommendation: .... Approve - meets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requirements
.... Deny - does not meet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requirement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Signature: E.K. (J-1)　Date: 5/25/89

A WHITE COPY OF THE FORM WILL BE SENT TO THE GRADUATE SCHOOL AND TO THE DEPARTMENT AS SOON AS A RECOMMENDATION HAS BEEN MADE.

〔圖 3〕1989 年 5 月，美國波士頓大學遙感所提供 5 年博士生全額獎學金的錄取通知書，內有封從德 1989 年 1 月托福成績（633 分）。

也擴大，還多請了一個同學幫手，很快利潤就翻了幾番，研會和團委只能乾瞪眼。我們白手起家從無到有，規模越辦越大，業績越來越好，如果沒有「六四」，或許就沒有後來的「新東方」了。

這樣一來，我不僅賺到不少錢足夠交考試費，還免費學了很多期，結果在1989年1月我的托福考了633分，比我的英文老師都高。當然那個分數是虛的，其中有20分是因為語法滿分而加的分，而我的聽力直到現在都很差。托福成績高，後來自然就得到美國波士頓大學遙感所提供5年博士生全額獎學金的錄取通知書。〔圖 3〕

在這期間，我和柴玲於1988年5月20日領結婚證，22日請了我大哥大嫂和幾位要好同學辦了一桌酒席，算是婚宴了。這一年，我還完成了另兩件大事：找到一份計算機公司的工作，四通旗下的一家公司；考取了北京市首屆「高級程序員」



姓　名　封從德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一九六五年
考核机构
编　号　京高88015號

封從德同志参加了一九八八年计算机应用软件人员　级水平考试，成绩合格，特发此证。

北京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科技干部局

签发日期八八年十二月　日

〔圖 4〕1988 年 12 月，封從德獲得北京市首屆「高級程序員」資格證書。

資格證書。〔圖 4〕

八八年行動委員會

1988年6月初發生了柴慶豐事件——北大研究生柴慶豐被流氓用鐵鍬和氣槍打死，同學們聚在三角地反復播放哀樂、集會講演。我也站起來講了幾句，當時的氣氛有些緊張，很快人群就散了。我感覺不對，想再說甚麼，地球物理系一個青年教師將我拉開，叫我和柴玲去22樓他的宿舍去喝口水。他其實是怕我吃虧，所以將我拉開，那裏便衣很多。

這天晚上，我們一群人詭秘地聚在 43 樓後面的小樹林。這就是「行動委員會」。子夜前後，月明星稀，氣氛緊張而神秘。會上討論了一些行動方案，但我一直堅持應該公開活動，我堅信秘密行動既無效又會帶來不必要的危險。我的想法可能超出了大家能接受的範圍，許多人不贊同公開，或許以為秘密

活動尚能維持一段時間，一旦公開，則必受當局重創。於是我就退出了。[6]

註：

---

[1] 那時我完全沒想到，在當今中國觀察歷史尋求真相，可能會付出高昂的代價。1987年我只是被捕，1989年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則被坦克壓斷了雙腿，更多人還因此失去了生命。最近我為「六四檔案」的口述歷史專欄採訪了方政，他作為黨員同學，對八九學運本有些距離，我問他六三晚上為甚麼還留在廣場，他説為了見證歷史。看丁子霖教授收集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中的記錄，有的就是帶著照相機要見證歷史而中彈喪生的。

[2] 這次學潮的起因大致是：安徽合肥開始選舉區人大代表，科技大學所在地區的黨委已算不錯，沒指定全部候選人，七名讓出三名由師生自由選出。但同學們有強烈的民主意識，一聽候選人已被安排好，就據理力爭，連夜聚會，商議遊行請願。當時知名的改革派學者溫元凱表示支持同學們的民主要求，副校長方勵之也表示支持民主，但勸阻遊行。三千餘學生依然遊行至市政府靜坐請願。

[3] 天安門廣場是世界最大的廣場，南北長880米，東西寬500米，面積達44萬平方米，可容納百萬人舉行盛大集會。

[4] 從我作的口述實錄採訪看，「六四」那夜很多人也是這樣的感受。

[5] 我至今也不清楚這位同學自殺的真正原因。另一位北大學生的自殺後來引起很大的關注——北大法律系畢業的詩人海子。1989年3月26日他在河北山海關臥軌自殺。他們的自殺表明八十年代後期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悲觀情緒。海子是「北大四才子」之一，另外三人是：駱一禾，八九年絕食時死亡，本

書後面會提到；老木，八九學運後期廣場宣傳部長，「六四」後流亡巴黎，精神出現問題；九十年代我在巴黎見到整理出版《海子詩集》的西川，依然堅守著詩的天地。

【6】 1989年北大籌委會中的熊焱、王有才、邵江和沈彤等人也參加了1988年的行動委員會，另外還有武運學、馬學禮、楊通學、肖旭起的作用應該較大。邵江說行動委員會持續了大約10天，以張貼公告、各系串聯、在其他高校張貼大字報、講演、開會等方式組織學運，後來因為成員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壓力，這次學潮以6月17日的廣場散步為結束，之後行動委員會成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熊焱記得沈彤起初並不積極，後來行動委員會成員受清查時，沈彤變得很活躍，四處打聽某日某次會議某人是哪個系的叫甚麼名字。沈彤1990年的自傳提到熊焱和我與他如何相識，但我都不記得。我對沈彤的第一印象是在1989年4月20日凌晨那一幕，參見20日「沈彤說要警惕王丹」一節。據王有才修訂，當時沈彤在行動委員會負責跟各西方國家駐北京大使館聯繫，王有才負責與其他高校聯絡。王有才和熊焱的「六四口述實錄」對行動委員會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回顧，從人員構成看，許多和後來的民主沙龍重疊。

2. 偶然的捲入 (4.15-4.18)

4月15日　星期六

1989年4月15日對我來說，本是一個平凡日子。然而隨著後來所發生的種種，使我常常憶起那天，越來越感覺到它的不尋常。這天是柴玲的生日，而我們結婚後，就一直住在廉價租來的小院裏，已快一年了。這天也是胡耀邦逝世的日子。然而，當時的我對政治全然懵懵懂懂，雖然當晚間新聞中聽到胡的死訊，除了聯想起兩年前的學潮令他下臺以外，我並沒有甚麼特別感懷。後來才知道，我們與胡耀邦的宿緣，遠未了盡。

電腦壞了

更為湊巧的是，這天我作論文的電腦壞了。這一偶然，沒想到竟徹底改變了我此後的人生。若無此偶然，我將繼續我的論文，二個月後北大碩士畢業，然後去美國讀博士。這「偶然」後面的路，一半出於激情一半出於召喚，否則若早知此路如此波折，我可能會做出別樣的選擇。然而，這天甚麼預想也沒有，格外的平靜。

上午我同師兄去修電腦。這台可憐的PC-AT計算機，是馬老師用了全部的科研經費買來的，是我們研究的支柱。我們用三輪車將電腦從北大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遙感所蹬到中關村「四通」公司。將機器交給修理的人，[7]我到電子一條街上閑逛各種電腦商店。不知不覺已日薄西山，肚子咕咕叫起來。

我沒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於是去一家蛋糕店，買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著自行車，穿過曲曲彎彎的小胡同，進入房東的鐵皮門，再向左拐，便是我們小家外的庭院了。我興沖沖地叫一聲，柴玲從房裏跑出來，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徑自回屋。從她眼中流出的一絲驚喜中，我知道是因為我比她預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在北大南門外不遠，海淀蘇公家廟7號。房東是對老夫婦，五間平房一字排開。租給我們的那間，是文革中被擠佔的，三年前落實政策才要了回來。他們說以前厲以寧也在這裏住過。房東有五個孩子，小女兒嫁人了，房空著就租了出來。兩夫婦圖清靜喜歡讀書人，於是將月租從60降到40元，租給我們兩個窮學生。租金實在很低，以至於他們都不願對外人提及，怕別人恨他們殺價太低。我們兩人當時都是研究生，月收入加起來才120元，後來增為150元。

那間屋外有個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樹雖老，枝繁卻葉茂，夏天招來無數青蟲，俗稱「吊死鬼」，吊得滿地皆是，發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葉還可以生火。樹上常有鳥，拉屎掉到我們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楣，斑斑駁駁格外分明，平添我們不少的煩惱。

我們住的房間很小，11平米，是在西廂房外再加蓋的一間。只有一面窗，不過很大，對著小院這邊，除一扇小門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頂用雪白的計算機紙一糊，還蠻像樣的。屋裏所有的家俱，加起來只花了56元。這是柴玲的傑作——床是她從學校木棍廠買的兩張學生單人床拼起來的，加上一個衣櫃和一張桌子，屋子就全佔滿了。

我照例在小院內小馬紮上坐著發了一會兒呆，思考我論文

中的計算機程序。只有在這時，心如置身塵世之外，分外地清明。這種緊張構思的狀態亦是一種莫大的解脫和愉悅。她將飯做好，我們就在屋裏一道吃。天色濛濛，黑白電視閃爍的光線照在我們臉上，我們沒有開燈。

柴玲生日、胡耀邦逝世

蛋糕上插著 23 支小蠟燭，柴玲吹蠟燭時，鼓著臉，用足三口氣才吹滅，然後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樣子。燭光穿透黑暗，給我們無盡溫馨的空間。

電視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覺得有些突然，他是少數幾個我知道名字的中共要員。他們高高在上，與我們老百姓何干？若非兩年前的學潮令他下臺，我可能一點感覺也沒有。柴玲同樣的默然，我還暗自擔憂這消息會擾亂她生日的恬靜。這份恬靜，後來總使我覺得有無限意味。我們是多麼沒有預見力，在暴風雨來臨前，一點預感也沒有。〔圖 5〕

飯後我又坐在小院中，構思著我的計算機程序。我6月12日就要碩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遙感衛星圖像識別專家系統」，是要設計一種複雜的軟件系統。我很喜歡軟件設計，從大學二年級就一直去計算機系聽課。我認為工業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計算機則將解放人腦，而專家系統程序則可能將人解決某類問題的經驗收集處理後，代替人腦作種種重復而單調的動作。我研究了種種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對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的偉大驚嘆不已。

和往常一樣，我沉浸在這種無外事紛擾的構思中。柴玲也拿了張馬紮出來，靜靜地坐著。白練似的月光灑在小院裏，只有樹葉在微風中輕輕作響。

這是北京初春時節。



〔圖5〕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不久，民眾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獻花並要求民主。

4月17日 星期一

去三角地看大字報

就因電腦壞了，我才有時間去三角地看大字報，關注起校園內的動向，否則我必是起早貪黑在機房內苦幹。這兩天，北大三角地逐漸熱鬧起來。〔圖 6〕

廣告欄上最初是輓聯，「沉痛悼念胡耀邦」之類。很快味道就變了，從中可嗅出滿腔的怨忿：

「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去了！」[8]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真誠的人死了，虛偽的人卻活了下來；熱情的人死了，冷漠將他埋葬。」〔圖 7〕

我大吃一驚。這分明是指桑罵槐，矛頭直指鄧小平。當時許多人還是感激鄧小平的，他推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很快變了個樣。八四年北大學生在國慶遊行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得到全國一致的贊許。鄧成了治國安邦的明君，「小平」二字也頗使人感到親切。依老子的聖賢理念，最好的統治者使百姓感覺不到其存在，以為一切成就皆出於自己的努力（很像現代民主制度下的情況）；二流統治者使人民感到親近；三流則用行政手段管制百姓；最差的就用暴力手段來強制民眾。八四年的鄧小平做到了第二流；八六學潮時他的嗜血本性暴露，退步到第三流，因此開始受民眾詛咒；「六四」屠殺後，鄧小平只能歸入末流的統治者而載入史冊。

而胡耀邦則得到廣泛的愛戴。從那幾日的其他輓聯，特別是有一晚我進入電教樓「靈堂」，看到環屋陳列的許多教授和幹部敬獻的輓聯，才明白胡耀邦對許多人的恩惠。他曾為許多人平反，加上開放的心胸，被譽為「民主的先鋒，知識分子的知音」。「靈堂」離三角地不遠，在電教樓104會議室。許多學校、機關都被批准設立，大概是為了避免人們匯聚天安門悼念



〔圖6〕1989年4月15日，北大三角地——歷次學運的發源地。



〔圖7〕1989年4月15日，「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去了！」明顯是在借悼胡影射鄧小平。

而引發群眾運動。

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

悼胡的情形，讓我想起七六年悼念周恩來。當時我才十歲。記得那夜下著大雪，淩晨三點被叫醒，全廠二千人在紛飛的雪片中走到大禮堂，觀看悼念周恩來的電影。三個月後，突然聽廣播說出現「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民眾在清明節聚集到廣場悼念周恩來，並借此在廣場上高聲宣讀「反動詩詞」，還有人集合起來燒汽車。

中國是個「死亡崇拜」的國家，幾千年都極重喪葬慎終追遠，因此常常「借死人壓活人」：悼念周公，人們借此發泄對文革的不滿；悼念胡公，也近於此道。周恩來的死，民眾在天安門紀念他，導致了鄧小平下臺，卻為他日後上臺贏得民心。胡耀邦的死，民眾也要到天安門紀念，卻導致鄧小平動武殺人，使他失去民心，在他個人和國家的歷史上留下陰暗的一筆。

17日中午，我端著飯盒從學三食堂出來，到三角地看大字報，見有同學當街設一木桌，上擱著一臉盆，要為悼念活動募捐。地上的錄音機一遍遍高聲放著哀樂。哀樂聲中，我掏出兜裏所有的菜票，快捷地放在臉盆中，裏面已有足足半盆的各式紙幣、硬幣和票券。【9】

4月18日 星期二

這天最大的事情，是去天安門送麵包。

去天安門送麵包

中午在三角地，讀到一則消息「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和

一則「建議」，大意是說：今晨，一位在天安門靜坐請願的同學打來電話，說200多名請願同學已20小時不吃不喝了，請北大的同學們今天送些麵包和水去支援他們。[10]〔圖 8 、 9〕



〔圖 8〕1989 年 4 月 18 日，貼在北大三角地的「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



〔圖 9〕1989 年 4 月 18 日，封從德和柴玲看了三角地的這則「建議」，就買了食物騎車去天安門支援。

我和柴玲讀後，傍晚就買了一袋麵包和一些香蕉，騎車去天安門支援。

道旁楊柳的枝頭已抽出綠綠的嫩芽，春天孕育著正在成熟的希望。我的心中也生出一個大希望，但卻幼稚朦朧尚未成型。在寬敞的長安街上騎著車，我試著與柴玲討論我們的人生計劃，講我的論文、以後到美國留學。我感到內在很深的衝突，心底裏有另一個希望在萌動，與我所講的留學計劃格格不入。

中國的大希望

「六四」後平靜下來反觀內照，我才明白那時的徬徨，來自一種希望，對中國的大希望，沙漠中望見綠洲的那種大希望。這希望洋溢在5月的廣場上，在千百萬參加遊行的人群中蔓延，向四面八方輻射，傳遍全國，感染世界。「五四」前夕，校長丁石孫對參加校慶的老校友說：「今年的校慶，最可觀的是現在的在校學生。中國的希望在哪裏？你們去看看他們，便可感受得到！」而我的導師也對我說：「這幾年我逐漸感到沒有希望，只是一天天混下去，現在你們學生帶頭起來遊行，我又感到了希望，中國又有希望了！」這希望，是中國的希望，是全球華人的希望。這希望牽引了千百萬人數十次遊行靜坐及阻擋軍隊的運動，直至最後以死相搏。

但在那天，1989年4月18日晚，我在這即將來臨的大風暴面前不禁彷徨起來：近半年來，我同柴玲努力準備留學美國，實在是因為對中國失望；如今即將出國，忽然看到中國有一線曙光，這大希望召喚著每一個熱血青年，我們的許多同學都已投身到這為理想的奮鬥中去了，而我卻還徘徊在十字路口。這讓我感到慚愧。

這種徘徊由來已久。一個半月前，我在三角地讀到方勵之妻子李淑嫻寫的「一年來作區人大代表的工作匯報」，內心感

動，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自己即將出國留學，但離國的原因卻是對中國的失望；走後不知還願不願意回來，我怕失掉自己的根，多希望對祖國有一種發自心底的歸屬感與自豪感，但現在中國的腐敗，使我難以生出這種感情。方勵之的一篇文章談「中國的失望與希望」很打動我，但你們夫婦倆卻成了當局批判與防範的對象。沒想到一星期後，我收到了李老師的回信，信中多是鼓勵的話，說到海外，更可報國之類，最後還引用朋友去國前的一首七律，充滿對故土的眷念。這是學運前，我同所謂「黑手」唯一的一次接觸。

紀念碑演講的人

到新華門時天色已黑。新華門是中南海的入口，三千學生和群眾圍在那裏，將長安街的交通堵了一半。學生們靜坐在新華門前，外面圍上了一堆厚厚的人牆，並無大的動靜。看了幾分鐘，我們便去天安門廣場。【11】

廣場中心的紀念碑，已黑壓壓地圍上了一圈人。我們費力擠到臺階上，不一會兒就有人起來大聲演講。起來演講的高個兒青年長得很帥氣，衣著也極俐落。他自稱某廠工人，邊上還有幾個「哥們兒」護著。他演講極富感染力，言簡意賅地說明一些大家不曾留意的道理。譬如為甚麼要民主？他問大家：我們在單位中誰沒有受過書記的欺壓？這激起大家的聯想。為甚麼要自由？他說，我們為甚麼不能換地方到別處工作？為甚麼我們的檔案由別人來寫而自己看不見？每問一句，便有許多人叫好。也有些人插科打諢，氣氛熱烈而歡快。

然後一個學生起來演講。他穿一身黑風衣，做派神色都讓我聯想起八六年底出現在三角地的便衣。我對柴玲說了這一聯想，她張大眼睛疑惑地望著我。幾天後我才知道他叫周勇軍，北高聯的第一任主席。【12】

圍著紀念碑的人們如饑似渴地聽著演講，這時有人從新華

門跑來説，那邊武警要對學生動手了，希望大家去聲援。那個演講的高個兒工人站在高處，徵詢大家的意見，然後向著新華門方向一揮手「走！支援新華門去。」

新華門前

我們騎車先趕到新華門，那裏依然人山人海，不少外國記者在那裏問些糊塗的問題。這時我們才想起此行的目的，於是將麵包和香蕉送給一個學生。那同學道聲謝，就大大方方收下了。共同的心願，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我們沿右牆根慢慢擠到富麗堂皇的新華門下，離堵在門口的士兵只有二米。前面是圍觀的人群，一直站到士兵的跟前。士兵正前方一米開外，便是靜坐的學生。雖是初春清涼的夜晚，士兵額上卻滲出了汗珠，目光一片茫然。學生安靜地坐在中間，間或喊幾聲「李鵬，出來！」邊上是圍觀的人群，不時有同學起來演講，或徵詢同學們怎麼辦，想阻止少數人衝門的欲望。站起的同學中，又有那個穿風衣的周勇軍。



〔圖 10〕1989 年 4 月 18 日，周勇軍穿一身黑風衣站在新華門前演講。

我們退了出來，受不了裏面污濁的空氣。這時紀念碑的人趕來，高個兒工人舉一面小旗站在隊伍前面，領大家在靜坐學生後面也坐了下來。陣容增強，前幾排的學生鼓起勇氣準備衝進大門。周勇軍竭力勸阻不要往前衝。〔圖 10〕

有些同學議論説，領紀念碑人群來的那個高個兒工人，在這裏又自稱清華學生，擔心他是便衣。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韓東方，是到了九〇年「六四」紀念期間見到幾個被捕人士的頭像時才恍然明白的，因為在後來的運動中，我一直沒印象再見過他。

我們邊上有個人大新聞系的新生，拿著照相機忙碌地記錄下這歷史場面。當同學們再次要衝大門時，他請我頂住他站在牆沿上，拍了不少照片。有陣子學生群中有些混亂，有人將筆、帽子、甚至鞋子擲向士兵，有一隻運動鞋擦過我的臉，打在人大同學的腰上。這次湧動的原因，是同學們選出的三個代表，[13] 獲准進去遞交請願書，半天不見出來，因而著急上火要往裏衝。穿過人頭間的縫隙，我看見士兵們頭上的熱氣和汗水，和他們驚恐的表情。

「軍警來了！」

柴玲受不了擁擠與惡劣空氣，我們又擠出了人群。柴玲想回家，我説再待會兒，想看個究竟。正在這時，忽見長安街上的人群嘩啦啦地向西撒丫子就跑，新華門前的空氣突然凝固了下來。只有人們奔走的響聲，沒有其他聲音。接著有人喊「軍警來了！」等我們到長安街上一看，東邊是兩排軍警，西邊是飛奔作鳥獸散的眾人，如上千人的賽跑。兩排軍警前的街道上空空蕩蕩，足顯其威風。[14]

軍警的清場方式極有趣，他們手挽手密密地橫排著，直到街邊的牆根，保證沒人漏網。前排如推土機一樣向前推進，後排則步步為營，並與前排保持相當的距離，中間形成一個空曠

地帶。如果人群向他們衝去，這樣的緩衝陣勢是最牢固的。這陣勢，後來在四二〇、四二二、四二七等幾次遊行中皆能見到。後來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學了這陣勢來抵擋軍警的衝擊。

柴玲和我本想去取自行車然後回家，但士兵已橫在路上，我們想順牆根進去也不可能。無論我們如何說，都是簡短而嚴厲的吆喝，最後是一聲兇猛的威脅。我們放棄了一切希望，趕快逃開。

等我們在西長安街上隨著少數一些人走時，又見那個黑風衣的周勇軍，對一群小青年講著甚麼。究竟說了甚麼，現在一點也記不得。半小時後，軍警散去，我們才騎車返校。

註：

【7】修理人員說是硬盤壞了，需要兩個星期。

【8】張伯笠說這是作家班的同學寫的。王超華記得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當天中午北大三角地就貼出大字報悼念。很可驚異的是，類似「該死的是鄧小平」的標語，同時廣泛流行於各個高校，除了北大、人大，在西安的「陝西師範大學的一幅示威橫幅這樣寫著：『應該死的不是胡耀邦，而是鄧小平』」見香港《華僑日報》24日2版。

【9】4月17日下午，政法大學遊行到天安門紀念碑，向胡耀邦獻花圈。傍晚，北京大學的學生拉起巨幅的「中國魂」，也遊行到天安門。參與者張伯笠「長歌當哭」一文中對此有詳細描述(《中國之春》1993年6-7月號合刊43-51頁)。〔圖11〕

【10】這則消息雖未署名，但據官方資料記載，是王丹給李淑嫻打電話請求支援(《70天大事記》第4頁、《驚心動魄的56天》第19頁)。這樣，李淑嫻和其丈夫方勵之便成了「幕後黑手」。



〔圖 11〕1989 年 4 月 17 日，北大學生拉起巨幅「中國魂」，遊行到天安門。

那時我還根本不知道王丹和民主沙龍。官方說法致使外界普遍認為新華門請願是王丹帶領的，但據李進進回憶，他的組織作用應該更大些。另外還有郭海峰、張伯笠、丁小平、張智勇、吾爾開希和周勇軍等人的作用。張伯笠說請願的幾條最初是他建議並草擬的，而非官方說的王丹，王丹當時並不知道要去天安門幹甚麼。見李進進「六四口述實錄」和《回顧與反思》第 50 頁。

【11】當時已有人大代表接見學生代表，但我們沒看見。據《70天大事記》第 4 頁，「晚上 8 點，全國人大代表劉延東、陶西平、宋世雄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與北京大學學生代表李津京〔李進進〕、郭海峰見面，李、郭二人遞交了請願書。」香港《華僑日報》19 日 2 版對這一天的集會有較詳細的報導。

【12】在1990年寫備忘錄時，我還對這種疑慮深感內疚，但後來種

種事情表明，這種疑慮並非空穴來風。除了1989年中周勇軍幾次損害運動的離奇行為外，1993年熊焱告訴我，周勇軍出獄後向他痛哭流涕地承認了一些事情，包括他與當局的關係。周到海外後的種種作為也讓許多民運人士產生類似的顧慮，尤其是他在氣功師張宏堡死亡案及隨後的巨額財產糾紛中所起的作用。所有這些分析與傳言，終需等到中共檔案開放後才能得到證實或證偽。

【13】據各種資料，那天的學生代表有郭海峰、李進進、張智勇、王丹和周勇軍。有些在場的同學對王丹和周勇軍的作用有質疑，詳後。

【14】據楊繼繩記錄的趙紫陽回憶，當時喬石分管政法，在第一線處理學潮問題，但李鵬和趙紫陽等人也是知情的，可以看到錄像；4月19日晚新華門事件時李鵬還打電話質問趙紫陽為甚麼不處理；22日允許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是趙紫陽在常委會上提議的。見《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98-600頁。

3. 籌委會草創 (4.19-4.24)

4月19日 星期三

這一天，是我投身學運的開始，也是學生自治組織成立的開始。

三角地的一則通知

上午照例去三角地讀大字報。許多同學拿著筆記本抄寫，或用錄音機和照相機為歷史留證。記得以前我同宿舍一個高年級同學曾為我們講述八零年北大選舉風潮，聽得我們一片神往。他每拿出一份珍藏箱底的筆記或一張照片，就感嘆一番：「可惜你們沒有趕上。」彷彿那是他一生最大的收獲。

這天，一則通知引起我的注意：今晚十點半在三角地舉行露天討論會，請同學們自由參加。通知沒有署名，[15] 但十點半正是下晚自習的時間，同學們回宿舍大半得經過三角地。前兩次學潮的經驗告訴我，這將是大規模學潮的開端。我立即去圖書館，覓得了一大堆書研讀了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黨章》、《甘地傳》、《美國的政府與政治》等等。當時朦朧覺出這次學潮會比以前進步，應該利用改革開放的寬鬆環境，以法律為武器，組織起自己的團體，作公開而合法的抗爭。

當晚十點從家裏出來時，我還對柴玲保證只去講幾句，不會捲得更深。那晚她做飯時，見我神色凝重，便有些憂慮，試

圖勸阻我，但後來還是給了我一個小時獨處的時間，去準備演講內容。她自然不願捨棄我們共同建立了一年的家庭，也放不下即將實現的留學夢，更放不下她作為長女而對父母家庭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對中國的大希望，她也自然受到感染，這希望會感染每個真正渴望自由生活的中國人，讓他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晚上三角地的演講

晚上十點半，等我與柴玲到了三角地，已聚了上千同學，且越來越多。開始時大家站著圍成一圈，有人站在中間演講，周圍必形成一小圈，越圍越緊。圈外的人便喊十幾遍：一、二，坐下！喊到大家都坐下為止。到最後，有人乾脆站到了水泥廣告欄頂上。這時已約有二三千人了。

柴玲同我慢慢擠到中間插空坐下，極有興味地聽演講。起初漫無主題，是一些抨擊時弊、要求政治改革的即興演講。起來演講的人我多不認識。【16】只有熊焱在去年學潮時就在三角地聽過他的演講。他湖南口音極重，給人印象很深，他說：「現在的改革不過是下去一批飽鬼，又上來一批餓鬼！」

後來漸漸集中到了一個主題：這次學潮的方向和組織問題。同學們一致感到，八六、八八年兩次學潮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成立自己的組織。起先同學們挑戰校學生會：請自稱「代表廣大同學意願」的學生會幹部站出來，帶領這場學運。這是一個考驗，看官方學生會是否真能代表同學。結果不出所料，沒人敢站出來。過了二十分鐘，同學們當即宣佈不再承認學生會的代表性，醞釀成立自己的組織。【17】

這期間我起來演講了幾次。先是提出憲法與黨章的矛盾——中共黨章稱黨員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而憲法又規定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若共產黨違憲，誰來裁處？後來，我又講到形成公開的自治組織的重要性，以前學

潮的失敗即在於沒有人敢站出來公開組織大家協調行動，不能集中力量並延續下去。然後，我分析當前學潮所處的形勢，講到幾個巧合：五四 70 週年，法國大革命 200 週年，建國 40 週年，而戈爾巴喬夫也即將訪華——這些知識其實是這幾天讀大字報和書得來的。

最後，我提出這次運動應當追求的兩個具體目標：（一）建立一個學生自己的組織並能保持下去，這是「結社自由」的起步；（二）創辦一份獨立的校園報刊，這是「言論自由」的起步。有了這兩個具體的成就，全國的高校、知識界、工人、農民等各界必將效仿、響應，這便將在全國推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成立「北大籌委會」

當我們談到組織時，有同學起來說：乾脆就你們演講過的同學組成一個學生會，我們信任你們！在場同學都贊同這個建議。這時，那個演講十分積極的高個兒同學站起來建議，[18] 就叫「團結學生會」。我極贊成這一叫法，以波蘭「團結工會」為榜樣極能鼓舞士氣，於是我提出兩條：（一）參與者公開姓名與單位；（二）這個組織在運動期間領導學運，運動之後要籌備選舉新學生會，但組織的成員不得參加競選。鑒於如此限定，我建議這個組織稱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當時得到熱烈的贊同。後來「團結學生會」逐漸被「學生自治會」代替，簡稱「籌委會」。強調「籌備」性質，在於促使其開放與無私：我當時甚至提出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日後的正式的學生會競選。我認為，這樣才能保障參與者的無私與團結，因此才能服眾，防止投機分子進入，同學們也才有積極性來支持和參與籌委會的工作。但後來同學多有異議，認為只有在運動中的表現，才是判斷競選人是否真能代表同學利益的最好尺度。

於是，我們開始了籌委會首批成員的登記。剛才演講過的一些同學自報家門，我拿了一張紙記下九個同學：[19]

熊　焱，	法律系	86級研究生（畢業班）
封從德，	遙感所	86級研究生（畢業班）
丁小平，	力學系	88級研究生
常　勁，	地球物理系	86級本科生
趙體國，	地球物理系	86級本科生
楊　濤，	歷史系	88級本科生
王　丹，	歷史系	88級本科生
孟昭強，	歷史系	88級本科生
楊丹濤，	地理系	88級本科生

從這份名單上看，成員主要來自歷史系和地球物理系。其中，楊濤、王丹與孟昭強是同學，前二人更是同屋，也是民主沙龍的老搭檔。[20] 常勁與趙體國住隔壁，非常好。以往極愛組織類似活動的物理、生物兩系卻沒有人在這時站出來，可見這批初期成員並沒概括北大的「活動精英」，尤其是去年「行動委員會」的主要骨幹。當我登記名字時，發現有幾個人是抱成一團的，他們似乎在悄悄聚會討論是否參加「籌委會」。但實際上從一開始，便沒人能左右這場運動。丁小平年齡比我們都大一些，非常熱忱，瘦臉長身，一副專註的表情。後來他自薦任召集人，大家沒仔細考慮便認可他作臨時的首領。[21]

我沒有料到會這樣捲入運動核心，根本來不及與柴玲商量。同學們的信任令我沒法退卻，否則我將羞愧於言行不一，鼓勵別人鋌而走險，自己卻在需要時縮了頭。

清華隊伍來北大

正當北大學生熱切討論組織建設時，一個消息傳來：三千清華學生已到北大門口，被攔在大門外，希望北大同學去聲援，將清華同學迎進校門。這消息立即在三角地引起爭議。清

華同學是來邀約北大同學一道去天安門聲援靜坐請願的。若在平常，北大同學一定興高采烈。但今天不同，若是一同去天安門，北大剛開始的組織建設很可能無疾而終。有些同學喊著要去迎接清華同學，另一些則堅持要將北大的事務討論完再說。幾千同學的目光盯著我們九個籌委，經過簡短討論，我們決定由常勁、趙體國帶一部分同學去迎接清華同學進校，其餘遷到圖書館東門外空場上，那裏空間大一些，可與清華同學一道協商諸多問題。

就這樣，我們轉移到圖書館東面。這時約十二點。

籌委會的第一個決定

北大圖書館東門前的臺階有四五級高，正好可作講臺。本來門前有一尊碩大的毛澤東塑像，也在不久前推倒了，只留下一個方方正正的座基。北大同學繼續在圖書館東面討論，清華同學來時表示了歡迎，但他們見北大在討論自己的組織事務，便要自行去天安門。籌委會只好臨時決定：北大同學願意去天安門的就去，不願去的回宿舍休息；籌委會則連夜開會，繼續討論組織建制問題，明日發佈公告；並選派熊焱和我與清華同學一道去天安門，同時與清華同學商量好明日去清華協助籌建籌委會。

熊焱與我一見如故，便領了去天安門的差事，藉機好好敘談一番。圖書館外空場上的人開始散去，這時柴玲找到我，叫我回家。她找了很久，我只好作出一副身不由己的苦笑，寬慰她一番後便同熊焱一道騎車去天安門了。我們一路暢談，非常投機非常愜意：一年前我非常喜歡的演說家，現在成了朋友，那種愉悅真是難以表達。

熊焱與我去新華門

我們騎車到西單郵電局附近便走不動了，兩排武警橫在長

安街街上封鎖了交通。來聲援的清華隊伍尚未趕到。幾十個學生模樣的人在街邊佇立，幾群北京青年市民在街心興奮地遊走。一輛警車停在安全島邊上，不時有市民和學生結隊想衝過去，見武警有所動作又趕快退回來，來來回回和士兵捉迷藏。

大約三點四十，一輛宣傳車開來了，車上的喇叭反復播通知，勒令長安街上的人在20分鐘內離開。我同熊焱爬上郵電局窗臺，瞭望天安門方向，除二盞華燈外甚麼也看不見，卻能隱約聽見陣陣口號聲。新華門前必定又有成百上千同學在那裏靜坐請願。宣傳車開來不久，有同學從新華門方向跑出來。我們趕忙上去探聽消息，有個北京青年團校的學生說，軍警要準備抓學生了。

我們剛取了自行車準備返校，這時又急匆匆跑出一個清瘦帶眼鏡的同學，告訴我們他是北大的，軍警已對靜坐學生下手，要我們一道回校求援。[22] 熊焱和我趕緊去找車。這時，有三個記者攔了一輛麵包車，我們也趁機跟著上去。我們將自行車放在電報大樓下，請兩個來時認識的同學留下觀察動靜。

三個記者分別來自《光明日報》和《天津日報》。他們非常同情請願學生，很想真實報導，卻明白希望渺茫。他們在魏公村下車。車到中關村司機便不走了，只收了十元錢，說是支持學生。

沈彤說要警惕王丹

回到學校才四點過，這時叫醒同學去天安門並不現實。瘦臉同學急得不行，一個人也要返回宿舍樓去叫同學。後來知道，他就是張智勇，國際政治系87級研究生，後來在人大會堂下跪請願的同學之一。

三角地昏暗的燈光下，有幾個人影。寂靜的夜色裏，我們壯著膽走了過去。其中一個學生說他叫沈彤，生物學85級本科生，很快便與我們交談起來。他知道我們是籌委會成員，便對

我們講起我們走後發生的情況。其中有二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一是淩晨三點左右，一輛小轎車在三角地邊上停下來，幾個人對著大字報拍了許多照片，最後還貼了一張大字報，然後揚長而去。那張大字報是說，要注意學潮背後有人，其中點了王丹和方勵之妻子李淑嫻的名。[23]

另一件事更玄。沈彤說加入籌委會的人中，王丹、楊濤和楊丹濤（或孟昭強？）是民主沙龍的骨幹，他們有所圖謀，要搞小集團控制籌委會。沈彤說，楊濤比王丹更沉著更有謀略，需更加提防，「楊濤是幕後指揮，王丹是前臺」。沈彤的話讓我猛然想起在我登記名單時留意到的那個小圈子。[24]

沈彤還告訴我們，八點半在28樓433房間籌委會開會。這時已五點了。熊焱家住北大西門外的蔚秀園，他對我說他妻子要到清華去上班，我們可以去他家休息。這段路有二十分鐘，我們暢談起來，完全憧憬在籌委會的民主機制建設的設想中。我們一致認為，關鍵是建立民主機制，不要少數人把持決策權，搞幕後黑箱操作，而是讓更多同學有機會有規則地參與決策。

熊焱新婚住在地下室

熊焱所謂的「家」，在蔚秀園28樓的地下室。地下室走廊只有一米，又窄又矮，很像戰備地道。穿過昏暗的地道，便到他家。他先叫起裏面熟睡的妻子，讓我進去。她甚麼也沒問熊焱，臉上沒一絲埋怨，端個面盆默默去水房洗漱去了。這是一間九平米的地下室，一張床就佔了一半，中間橫一張大布簾把屋子分成兩個世界。簾內是床，簾外一隻小木書架、一張課桌、一張鐵椅，與學生宿舍一樣；一盞台燈，一隻木箱躺在地上，大約是他們放衣服的；一個煤油爐，幾張碗筷盒，一隻鐵水桶，一面臉盆，兩條毛巾；一隻電燈泡，在屋中央搖晃。這便是他們全部的所有！在這所有中，唯獨小書架上歪歪扭扭地

放著的書籍，能顯出主人的富有。這樣陰濕擁擠的房間，學校還每月收房租 30 元，而他每月的助學金只有 68 元。

這便是那時中國知識的「價格」！

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先鋒是學生與知識分子，與這離奇的「價格」不無關係。南方的朋友告訴我，那裏同在一個涉外企業工作的年輕人，沒上大學而有權力關係的每月1600元，而分去的碩士每月只有120元。但我知道，熊焱並非因為清貧才挺而走險的，他絕不是追求物質的人，這從他的婚姻就可看得出。

熊焱的妻子叫錢立筠，他們元月剛結婚。立筠是北大教授的女兒，除了欽慕熊焱的才智與人品以外，實在看不出她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要嫁給這麼個窮學生，況且她還是違背父願嫁給他的。熊焱湖南人，生就湖南人勇猛好義的性格，熊焱常與岳父爭執，這又是他那率直的性格惹出的麻煩。後來甚至有一次在「三角地」的自由論壇上，他還不點名地指責岳父阻撓他參加學運。八九民運就是靠了多少這樣不求名利活生生的勇士，才成就了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偉業！在這以後的風風雨雨中，立筠承受了種種磨難，「六四」後熊焱在獄中一年多了，她是如何熬過這些黑沉沉的日子？【25】後來柴玲同她接觸過幾次，也對我說立筠實在是個賢妻良母。這是一個柔弱女子，又是怎樣一個剛強的人吶！我到海外後只在很少場合演講，但每次總願講他們的故事，他們倆的情懷讓我感悟到中國人的真精神，這精神曾洋溢在校園在廣場，是記者和電視無法傳達的。

熊焱從湖南農村考到北大，天生的野性使他受不了一點拘束。天馬行空的性格讓他吃了許多虧，也受到更多的讚賞。這一點從他的學業上也可看出一點來。他不願死記硬背那些學究教條，但作為代培生卻得到法律系老教授的賞識，也是因為不拘教條。師生感情篤深，「六四」後不久，聽說熊焱被捕，老教授正在屋外澆花，一頭便栽倒在地，從此離開人世。

我隨熊焱去洗臉，穿過昏暗走廊一段水牢般的水域，才到

臭氣沖天的陰冷水房。立筠已去上班，我不知她是用了多大的耐力才能忍受這樣的新婚生活。但我沒從熊焱身上發現一絲不快，他依然興高采烈地與我談論組織學運的事。我受他這股熱情的感染，實在比任何人給我的都多。

我們終於躺到床上時已七點了。我把鬧鈴調到八點，圖一個安然的短睡，但一小時後我們起身時，都說：我沒睡著。一夜沒睡，精神依然這麼好，這是我平生第一次。

4月20日 星期四

籌委會第一天會議

八點半我們趕到28樓433房間，開始了北大籌委會第一天的工作。433是常勁和趙體國的宿舍，最初幾日我們都在這裏開會。他們的同屋也都非常支持籌委會。看得出來，趙體國與常勁非常重義氣，他們與同屋的關係非常好。

丁小平主持會議。熊焱和我介紹了去天安門的情況，尤其是新華門前的遭遇。於是大家討論如何組織抗議遊行、如何修訂請願「七條」。[26] 但首當其衝的是要寫一個公告，宣告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的成立，並公佈委員名單、設立機構、招募人才。除了與大家商討事務安排，我在會上強調了民主機制對組織建設的重要性，並提出一些具體辦法，如召集人和委員責權劃分之類，並建議成立捐款部、聯絡部等機構。那時我們還不知道秘書處的重要性，幾天後民盟一人告訴柴玲這些組織經驗後才補上這關鍵一環。最初幾次會議王丹好像都沒參加，後來也很少來開會。

為了吸收新成員，我們設立了「擔保制」，現任委員發誓擔保即可加入。初期擔保加入的有：沈彤、張智勇、歐陽與郭海峰（國政系研究生）。沈彤由常勁擔保，張智勇由熊焱擔

保，郭海峰是21日凌晨由我介紹、大家推舉為召集人的。四二二大遊行之後全市罷課，運動升級組織壯大，成立了各個部委，便在各部吸收自願者，而決策層開始由選舉產生，擔保制就淘汰了。但在最初幾天，我們還只是按「行動委員會」模式構建籌委會，有甚麼需要行動的就由這班人合力組織，因此剛開始時並沒想到細致分工，組織系統是逐步摸索改進的。

這個逐步摸索改進的過程，一方面雖證明民主程序的普適性——對於民主程序毫無經驗的一群人，只要本著民主精神和原則，在實踐中定能摸索出一套日趨合理的民主程序來；但另一方面，在運動爆發時，這樣的摸索，卻浪費了許多寶貴的精力和時間，喪失了許多稍縱即逝的機會，回想起來十分可惜，這也是我寫這個備忘錄的一個重要原因。歷次民主運動被中共隔斷，無法承前啟後，每次從頭摸索、從零做起，這是民主運動的一大難題。

就我們的經驗而言，首先是要學會開會。

我們不會開會

起初我們完全不懂怎麼開會。沒有議程，缺乏規則，人人爭著發言，別人發言時想著自己要說甚麼，等到他發言時，不是離開了當前要討論的問題，就是一股腦將要說的所有問題內容全倒出來，生怕再無機會發言，或是長篇大論地爭辯、闡述一些細節。結果，往往討論了二三個小時，卻一個決議也作不了。

這便是我們第一天開會的情形。後來我到北高聯，也發現同樣的問題一直在重複，甚至在廣場、在海外的許多組織，都不會開會。黨文化讓我們不具備開會的能力。從小由班主任訓話，沒有平等發言、討論和投票的訓練，一旦有了機會，卻爭先恐後搶著同時發言，毫無效率。這一缺陷平常覺不出，運動一來就暴露無遺。

西方有一本《羅伯特規則》，專講如何開會作決議；孫中山的《民權初步》也是教如何開會。若是當初我們有一點基本常識，會爭多少寶貴的時間啊！若是我們將復雜的《羅伯特規則》配合中國國情加以簡化，出版到大陸，必將為以後的運動提高效率。我向許多學者、組織作過多次建議，效果卻不顯著。[27] 89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至少有一個月全國數百個城市都有組織和遊行。那時，參加過各種會議的人應以萬計，這批人將是未來民間力量的組織者，他們自然會知道此書的價值。

抗議「四二〇血案」

上午的會大約十點結束。昨晚與我們同回的張智勇第一個傳回「四二〇血案」的消息。抗議「四二〇血案」的各式大字報紛紛貼出，甚至有學生在28樓與三角地之間拉起一根鐵絲，上面掛著軍警的皮鞋與銅頭皮帶，據說就是打學生的器具。籌委會也作出行動，開始收集人證物證，準備起訴野蠻的軍警和《北京日報》歪曲的報導——那報導給人的印象不是軍警打學生，反倒像是學生打了軍警。〔圖 12〕

熊焱與我提著話筒冒著雨，到各宿舍樓去鼓動大家參加遊



〔圖 12〕1989年4月20日，新華門血案中軍警打學生用的皮鞋與銅頭皮帶。

行。從29樓開始，經37、38樓到研究生樓群(45、46、47樓)，我們一路喊「為了悼念胡耀邦同志，為了抗議軍警打人，籌委會決定遊行抗議」。二十餘人自發地跟著我們助陣，熊焱拿著話筒在各宿舍樓下喊，直到把嗓子喊啞了。每走到一處，便有許多打開的窗戶與探出的頭。

這當中我可能去了一趟47樓找郭海峰，但沒見到他。因為會上有人提到他，大概是因為18日請願時他的表現很好，希望請他加入籌委會。從47樓出來，我到「勺園食品部」找了硬紙板和一根竹竿，回到28樓找人寫了幾個大字「高校學生聯合起來！」做成一個標語牌，準備去清華時用。【28】

中午與熊焱去清華

中午我與熊焱去清華，鼓動他們成立自己的籌委會，並介紹北大的情況。我們的自行車還在西單，只好步行去清華。我們擔心遲到讓清華同學久等，便在校門外攔了二個騎車的同學帶我們去。

進清華南校門時，我們將標語牌藏在身側想溜進去，偏偏被門衛發現。這時，四五個清華同學已等在門內，幾經交涉，花了半個小時，他們用清華學生會的名義，才取得校領導認可後讓我們進了校門。【29】

清華接待我們的同學很熱情。兩個清華同學騎車領著熊焱和我，另幾個去作相應的安排。騎車帶我們的兩個學生一胖一瘦，是清華計算機系的。繞過小橋，來到一座亭子，就是朱自清筆下「荷塘月色」的地方。這裏極幽靜，這時又下著雨，很少人來。原來，清華同學希望我們去演講。

這時是十二點半，演講安排在一點鐘，我們插空交流。熊焱介紹了北大成立籌委會的情況，希望清華也能成立自己的學生自治組織，好與北大聯合行動。兩個清華同學也介紹了他們的情況，看來，清華籌建組織比較困難。從他倆處處緊張小心

的神色中，我感到在這個學校的氣氛遠沒有北大自由活躍。他倆屬於計算機系暗地串聯的一個小群體，沒有廣泛的代表性。不過他們說，今天下午清華也準備在禮堂召開全校學生大會，成立籌委會。

最後我們互留聯繫方法，便趕到清華的第四食堂。這裏相當於北大的三角地，午飯時同學很多。食堂東邊有一處五、六級階梯的高臺，可為演講場地。北邊是一座十幾層高的研究生宿舍樓。

我們站到高臺上演講。我們晚到一些，學生並不多，本來等在這裏的許多同學已經走了。幾個計算機系的同學便拿著話筒到處去通知，十幾分鐘就來了五六百人，邊上宿舍樓的窗戶也一扇一扇打開。一胖一瘦兩個清華同學先簡單介紹了我們和北大的情況，便請我們演講。我簡單講了幾句，把喇叭遞給熊焱。

熊焱口才極好，幾百人站在雨中聽，不時發出陣陣掌聲或歡呼聲。開始是我們講，介紹北大新近的情況、闡述時局與請願要求。後來，受到鼓舞的清華同學也上來演講。漸漸地，話筒在清華同學手中傳遞開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作為火種，我們已點燃了許多清華同學的熱忱。他們熱烈地討論起清華該怎麼辦。【30】

突然通知下午遊行

正熱烈處，一個北大同學送來通知：「北大籌委會決定今天下午二點出發遊行到天安門示威請願。」這通知有些突然，熊焱與我都不相信，因為上午開會時有約定，籌委會五人簽字才有效，而這麼重要的通知卻沒有簽字。送信的同學急得無可奈何，只好又派一人回北大。半個鐘頭後常勁來確認要遊行，希望清華同學也參加。

清華的同學也許還記得昨晚北大同學沒一道去天安門，許

多同學便說我們下午要開大會成立組織！同昨晚的情形一樣，幾個清華活躍分子商量了一下，宣佈下午大會照樣開，願去北大參加遊行的自便。集會就此結束，清華同學騎車一直送我們到北大門口。路上，我們看到成群結隊的清華同學，也趕去北大參加遊行。

回到北大，大飯廳外已聚了許多同學準備遊行。我們直接回到28樓433，這裏已成了籌委會此後幾天的辦公處。

王丹等人退出籌委會

下午的遊行起先由趙體國、張智勇和沈彤帶領，中間傳來一些混亂的消息，所以又派常勁與孟昭強去處理。因此下午在433開會的不多，只有丁小平、熊焱、歐陽、楊丹濤和我等幾人。

楊濤與王丹也不在會場。後來常勁告訴我，在我與熊焱去清華後，王丹與楊濤提出辭職，[31] 原因是有人不信任王丹，三角地也貼出攻擊王丹的大字報，指責他兩點，一是在18日作請願代表時出賣同學，二是用捐款買高級煙。後來常勁依據許多當時在場的請願同學回憶，請願代表還有李進進（北大研究生會上屆主席）和周勇軍（政法大學學生會幹部）。[32] 五四遊行時，周勇軍擅自以北高聯名義宣佈復課，後來北大有同學很反感他，就對我講周勇軍在18日做學生代表出來時，其他幾個代表都挨打，便衣唯獨保護他，說不要打這個同學。常勁發現，李進進與王丹的關係非常不好，20日上午去請李進進時，他說只要王丹在就不參加。

這麼複雜的情況，我當時根本想不到。我開始對李進進有印象是在4月24日全校大會失敗後的挽救會上。而王丹在最初幾日的籌委會上出現太少，以至於大家想開除他。有天晚上王丹開了一陣會就要走，我便拉他到樓道僻靜處，提醒他多參加會議，否則將可能被除名。後來他到會的次數多些，但依然來

去匆匆。大家想開除他的原因，還包括他這種神秘感使大家覺得確實如沈彤所說他另有小圈子，而他發言既少且來去匆匆心不在焉，似乎對籌委會有保留不實之處。[33]

王丹是否留任籌委，其他成員大概覺得無關宏旨，所以才有將他除名的提議。我挽留王丹，只是不希望見到有人離開籌委會。事後想來，王丹當時可能非常為難，因為我們一開始便吸收了沈彤，並請李進進參加，與這些曾經與他或民主沙龍有隔閡的同學一道在籌委會裏，必然產生許多矛盾和麻煩，這是他與楊濤不願見到的。也許這就是他們辭職的主要原因。[34]

沈彤與王丹的隔閡，我想是他們各自組織的學生團體間存留的歷史問題。沈彤所在的「奧林匹亞」，與王丹所在的「民主沙龍」有競爭關係。據說奧林匹亞大有取代民主沙龍的趨勢，矛盾在所難免。好在後來籌委會很快建立了民主機制，使他們之間終未發生大衝突，但互信不足，也在籌委會平添一些不該有的煩惱。

冒雨遊行、趙體國發火

這天下午的遊行很不妙，遇到大雨。[35]從下午三點到深夜，雨時大時小，令我們幾個坐在宿舍裏開會的委員非常擔憂。三點過傳回消息，遊行中指揮混亂，張智勇要帶隊伍去清華，而清華同學明明已到了北大，孟昭強很生氣，要拉回隊伍經人大去天安門，於是在清華門口有些衝突。我擔心大雨將軍心弄散，就寫了張便條給常勁和趙體國，請他們去協調並見機行事，若多數同學願意返校，便撤回來。〔圖 13〕

遊行的情況是後來常勁告訴我的。他們冒雨遊行，情緒高昂，時而呼口號，時而唱歌。六點到了政法大學，受到熱烈歡迎，被帶去食堂吃飯，那裏的學生會還捐給北大三百元以示支持，但勸他們別再冒雨遊行。北大同學哪裏肯聽，繼續情緒高昂地遊行到天安門，這時已晚上八點了。在天安門逗留不



〔圖 13〕1989 年 4 月 20 日，北大籌委會組織的第一次遊行，抗議新華門血案。前排有趙體國、常勁、張智勇、沈彤（由右到左）。

久，沿長安街西行直到公主墳。雨中同學們實在走不動了，最後在公主墳公共汽車總站，好不容易才說動一輛車送大家回校。【36】

那晚趙體國回來時火氣很大。籌委會剛成立，組織建設、職權劃分是當務之急。但體國感覺，幾百同學冒雨走了十個小時，而他們的指揮卻在忙著分官，在這位將軍兼詩人二種氣質集一身的漢子眼中，簡直是無情無義。實際上那晚籌委會已與校方交涉，告知遊行同學遇雨的情況，校方也派了二輛車但沒找到他們。

趙體國當時一句話令我感觸頗深：「如果不把參加運動的人看得最重，這場運動註定失敗！」這股豪氣與義氣，使我暗地佩服並十足地信任他。他的義氣贏得了二百多糾察隊員的擁戴，使他自然成為糾察部長，籌委會初期舉足輕重的人物。但也是這種豪氣，使他忍受不了政治漩渦中必然產生的矛盾與污濁，在籌委會成立一週後，他便不顧一切地貼了張「辭職聲

明」，痛斥某些人「沽名釣譽，沒有人性」，「在危險面前是一副面孔，在榮譽面前是另一副面孔」，[37] 這同樣使我佩服，同時又極惋惜他的離去。八九學運中糾察隊之整齊，給很多人以深刻印象，其首功當歸趙體國。這二百多位糾察隊員的作用，已大大超出維持秩序這一點：學運初期北大籌委會與各校的聯絡，便主要依賴這群高度組織化的人。

聯繫食堂、保薦郭海峰

大家推選我去辦理迎接同學的工作，我於是帶了433寢室的一個同學去學二食堂，請師傅為遊行同學開飯。這時已深夜一點，食堂師傅十分不樂意，說得請示伙食科長，於是進屋去打電話，伙食科長又說得請示校黨委。

正感到希望渺茫，郭海峰和一個同學來了，說他們有辦法找到校方叫食堂開飯。半小時後果然答應開伙了。起初說在學五食堂，我便到校門，正好迎到一批搭車返校的同學，我帶他們到學五食堂，同時派人在校門口繼續迎接。在學五前等待開門的時候，郭海峰與同學們有說有笑。後來改到學二去吃飯，他與同學們依然有說有笑。那晚，郭海峰顯得極有能力，也易被同學們接受，給我極好的第一印象。於是，當夜我便保薦郭海峰加入了籌委會。當時大家正想撤換丁小平，於是推選郭海峰擔任籌委會第二任召集人。

籌委會初期的恐怖氣氛

現在回頭說一下 20 日下午和晚上的籌委會開會的恐怖氣氛。

中午去清華前遇到一個黨員同學，他是我本科時的同班同學，我很信得過他。他一把拉住我，神情緊張而關切地說：「老封，你別幹了！昨晚你們在三角地的演講，已被校保衛科

用紅外攝影機拍了下來，今天上午我在校黨委看到，才知道你也參加了。」我緊張了一陣，後來就忘了。晚飯時，黨員同學又找到我，說：「老封，別再幹了！那盤錄像已經送到國安部了！」這個消息干擾了我整個晚上。

深夜十一點，同學們已關燈休息，我們五六個籌委點上蠟燭繼續開會。夜深人靜，微弱的燭光將對面同學的影子映在背後的牆上，搖曳不定。這時，一股強烈的孤立無助的情緒襲來，離開了人群就失去了安全感。一時間，我感到便衣們正在四處搜尋，說不定我們已在包圍之中。我想像著在沉寂的夜色裏，我們被堵上嘴綁架走；或隨時可能有顆毒氣彈落在我們桌下，然後在無聲無息中，我們被拖走……胡思亂想之際，我也感到大家的沉默和沉默中的不安。

恰在此時，柴玲找來這裏，說找了我一天，語氣頗有嗔怨。於是我就說要回家，向大家告辭。熊焱坐在桌子對面，身體猛然向前一匍，抓住了我的手：「老封，你不能走！」我既慚愧又猶豫。我看了看柴玲，乾脆勸她也留下，從此我們便在一起，為這場運動共同奮鬥下去。

柴玲的加入

柴玲這時雖是北師大的研究生，但她後來一直在北大籌委會。一來因為她本科在北大，二來我們住在北大附近，生活與自習都在北大。後來有人指責柴玲虛榮，說她總以北大學生自詡，實在是不瞭解情況的想當然。

柴玲父母都是軍醫，她從小生活在優越的環境中。讀中學時，她受一個履經挫折卻自強不息的「右派」教師啟蒙，發憤讀書，提前一年參加高考，竟考上了北大，也獲得「全國三好學生」的獎勵。進北大後學的不是她喜歡的專業，很快辭去班團支部書記職務，奮力自學，通過考試轉到了心理系。轉系後，又在二年內完成別人四年的課程和論文。考研時只因「政

治」科目分數不夠，進不了北大研究生院，最後進了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

柴玲是長女，對父母家庭有極強的責任心。她之所以進入籌委會主要是因為我。她不願生活在惶恐與期待中，而要與我同舟共濟，於是決計要麼拉我回家，要麼同我一起奮鬥。進入籌委會後，她的才能逐步顯現出來，天性中的熱忱、待人的親切自然與善解人意，立即感染了許多人，受到大家的愛戴。她又和趙體國一樣，對同伴極為關切，認為人是運動中的首要因素。[38]她更有一些女性特出的感悟力，經常使同學與她初次交談便能道出心裏的隱秘，包括個人情感、精神苦悶乃至生活瑣事。她極有靈性，因此很容易同有靈性、有感情的人交流。

這晚，柴玲不願聽我們有關組織建制、請願內容之類的激烈辯論，只顧同一個北師大聯絡員聊天。[39]但當我們爭論不休、亂得無法繼續下去時，她便充當會議調解人，協助決定發言順序並監督會議的秩序。

摸索如何開會

前面說過，我們是從對開會的無知到趨於完善，從混亂到趨於秩序的。經過了二天的練習，我們已明白，大家同時說話，討論不出任何結果。這時歐陽儼然是會議監督，每每大喝一聲「舉手發言」，奮力打斷插話的人。但很快又有問題：如何安排發言的順序呢？起初自然由召集人丁小平包辦。不巧丁很專斷，往往不顧舉著的幾隻手，只顧自己大講一通，急切地灌輸他的意思，要「統一大家的認識」。最後大家的認識終於統一了，那就是取消召集人獨霸發言機會的權利。

我們訂立規則：會議主席不得隨意參與辯論，因此要輪流來當。主席的權責是確立議程、將討論控制在當前議題、選擇發言人、主持投票等。為了防範主席濫權，我們又設一會議調解人，其權限是指定發言人和制止插話。調解人有監督權，但

不得參與辯論、也沒有投票權。這樣的角色，自然落到了柴玲的肩上。

運動初期，學生組織逐步探索、設立了形形色色的機構和職位，但全然沒有權力的誘惑，純粹是維護組織運作的需要。這是權力自然發生的階段。這個階段，讓我發現了社會組織中，權力的形成既自然又必要。後來，隨著運動的日益發展和組織逐漸的複雜化——不僅在規模、結構上，而且指導思想、人員成分也日趨複雜——又讓我發現權力對許多人的魔力，與毒品極為相像，它很容易讓人異化，悖離初衷。人一旦有了權力或影響力，就會像吸毒一樣上癮，難以自拔。從自己參加的民主運動中，我窺見使中共墜入專制權力泥沼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原因。

丁小平因專斷而被罷免

有了規則，會議順利多了，丁小平的毛病便凸顯出來，且越來越令人無法接受。丁小平是力學系88級研究生，[40]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臉，顯得精神而嚴峻。他說話總是急急的。被取消了對會議的主導權後，他更是急急地向大家灌輸他那套長篇大論，誰要不同意，他便亮出自己的老資格：我參加民主運動十幾年了，搞民主我有深刻的思考和豐富的經驗。他才27歲，怎麼就有十幾年的民運經驗？我們既驚嘆又疑惑。丁小平忍受不了不同意見，遭大家反對時，他就說「列寧同志講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此言一出，大家只好用民主程序，將其召集人的職務給罷免了。我還記得大家批評丁小平時的誠懇態度，這是運動中我見到的最真誠的場面之一。運動之初，沒人有權威，也沒人顧慮權威，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運動著想，對同伴的批評更顯得坦然。

被罷免後，丁小平很不甘心。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他四處演說，稱自己是籌委會的主任委員，籌委會公告沒他簽名，所以

是非法的；又稱他在47樓的宿舍才是籌委會的總部。這大出我們所料，商量怎樣去阻止他，具體採取了甚麼行動我已不記得，或許根本沒有甚麼行動。總之過了幾天，丁小平的聲音便消失了。平心而論，丁小平是運動中最堅定的一分子。他的缺陷，在於急切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意志，因而極易自卑，擔憂別人不相信他，於是極易自大，越發急切地要大家接受。柴玲用了一個心理學術語，稱他是「強迫症」。但正是這種熱情，也使他堅韌不拔百折不撓，雖在孤立中也堅持為運動出力，5月底我還在廣場附近見過他，他鼓勵我們堅持到底。

對丁小平的處理並不妥當，暴露出籌委會初期工作上的缺乏經驗。不錯，召集人這個職位很重要，丁小平也確實不適任，但我們沒有想到給他一個光榮的臺階，也沒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事情做。我們沒能體諒到他的失落與傷痛，他雖還想為運動盡力，卻從此遊離於組織之外。如果那時我們對他多些理解與安慰，他也許還會做一個普通成員而與大家共事。後來我們在工作中逐步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便能較妥善地解決了新舊交替的問題。【41】

罷免了丁小平，就得找人接替。我推薦熊焱接任召集人，他熱情、公正、極有口才且富感召力。但熊焱含糊地拒絕了，大意是說天性奔放受不了拘束。也有人推薦我，我堅決推辭，我自知自己性格上的弱點。於是我又推薦郭海峰，因為他的才能與質樸。海峰爽快地答應下來。這時接受做召集人，危險比榮耀大得多，需要極大的勇氣。在運動初期，勇氣是第一美德。

4月21日　星期五

21日的記憶有些模糊。現僅將記得的部分零星寫下來。

21日晚到22日下午的首都十萬大學生的大遊行，是北大

籌委會在郭海峰領導下最成功的一次行動。這時的北大籌委會的聯絡部已有一二百同學，與北京五十多所高校保持聯繫，共同舉行了中共建國以來首次大規模的非官方遊行。

籌委會開始募捐

21日，籌委會買了二台油印機和一台速印機。這時籌委會已開始組織募捐。幾個募捐隊上中關村街頭募捐，帶回裝有各色錢幣的紙箱和一些令人興奮的消息，譬如某公司準備捐幾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

最先上街募捐的是生物系學生會，他們一上午便募集二千多元，全部上交了籌委會，後來又有法律系學生會去募捐。籌委會由此瞭解到原官方學生會的重要性，這便是各系「分籌委會」的開始。上交的錢歸財務部管，最後直接由郭海峰掌握。他老兄管錢的方式令人驚駭，有一次私下對我解釋，他要將三千元收入改為一千多，原因是顧慮以後各種帳目混亂，這樣做便能保證帳面收支平衡。「反正都是用到運動中」他最後這麼說。

海峰的顧慮我雖能理解，許多細小支出過於瑣碎也不必拘泥，但我卻不贊同他作帳的手法，海峰似乎也聽從了我的意見。我認為只要老老實實公開，帳面即使出了差錯也容易得到大家的諒解——這麼危險的運動，誰也不會只圖幾個小錢而拿著自己的前程性命作賭註。如果一開始就認為帳無法管好而放任它混亂下去，僅僅這一部糊塗帳尤其是作假便足以使學運名譽掃地。好在北大籌委會不久就有專人管帳，後來財政部在蔡健、王有才這些認真負責的同學的手中，我再也沒擔心過。

藉此機會說一下我對郭海峰的顧慮表示理解的原因。我自己就有幾筆難以入帳的經歷，這裏我一併把我在整個運動中的經濟情況作一徹底的公開，因為我曾總管過廣場後期的財務與後勤。

學運期間我經手的錢

運動初期，柴玲將家裏存的三百多元取出給我。這筆錢支持了我在學運初期的各項花銷，包括遊行時給同學們買水和食物，代表北大捐給北高聯二百元（後報銷），及5月2日安排秘密接觸鄧小平而給柴玲和趙體國五十元錢作路費。後來絕食前兩天一位教授給我四百元捐款，我還沒來得及入到北大帳上，兩天後便用於廣場建絕食團廣播站，還借了一個香港記者一千四百元。當時天安門廣場上還沒有財務管理，我也不能專為此事跑回北大，也就沒有同任何人講起。5月21日準備轉入地下，李祿請我準備一些錢，我便到紀念碑上北高聯的財務部領了一箱子毛票，共有1094元。後來高聯遷回北大，指揮部接管廣場，這筆錢也沒清帳，就用在廣場廣播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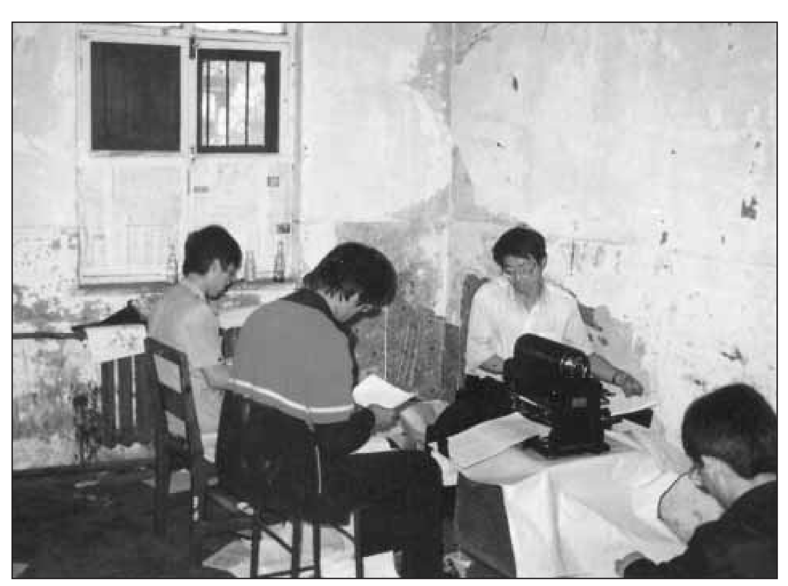
5月24日我開始主管廣場財務，建立財務制度和班子，五月底每日對外報賬，主張外界直接捐贈物資。到六三前有二次氣氛緊張，各種情報都顯示軍隊會清場，於是我將財務部的所有外幣幾千美元親自掌握，以備指揮部不時之需。第二次交還財務部時，我將其數目與第一次的混了，於是有所出入，這時已有財務督察組，組長鐵面無私，把這出入記在帳本後面，財務部的同學對我十分信任。5月28日我從北大帶三萬元人民幣回廣場，當時形勢險惡，張伯笠說要潛藏起來寫書記錄歷史，我自作主張給了他兩千元。5月30日我從香港人手中接收一萬元捐款交給財務部。

「六四」凌晨紀念碑上，有個同學將身上所餘的公款交給我，120元；又有一南海來的同胞捐出他最後的100元。這晚轉移財政部時，我以為和以前一樣，有希望天亮後依然會回到紀念碑上，因此我只取了五千元人民幣留給指揮部，後來這筆錢給了李祿、辛苦等三人共六百，另一組同學一千，留下三千四，加上紀念碑上的二百四，再加上北大籌委會在我們離開北大前給的五千元，共計8640元，全憑這筆錢作經濟上的支持，加上所遇到各階層人士的支持，我同柴玲經過十個月的逃亡，

沒依靠海外的一分錢，逃離了大陸。這便是我在運動中經手的錢的情況。

第一次非官方大遊行

21日晚上，十萬大學生走出校門，成就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如此規模的非官方大遊行。北大籌委會本來決定22日遊行，因為在人民大會堂要開胡耀邦的追悼會。但後來聽說天安門廣場將從21日子夜起戒嚴，於是提前到21日晚遊行，通宵佔領廣場，以免與執行戒嚴的軍隊衝突。這個決定21日上午已作出，但是否已有一個高校間的聯合行動組織，我不清楚。那時由學生自發成立的組織，應該只有北大籌委會一個是正式宣佈成立的，而在聯絡、組織這次北京高校學生大遊行的行動中，北大籌委會起了決定性作用。當時籌委會的聯絡部是最大的一個機構，有一兩百聯絡員，許多原先都是趙體國手下的糾察隊



〔圖14〕1989年4月21日，北大籌委會宣傳部的同學正在用油印機印刷傳單。

員。[42]

21日買的油印機起了一些作用，但因下午才開印，加之經驗不足，傳單的質量和數量都不理想。晚上七點列隊遊行時，我裝了滿滿一書包的傳單，並要求繼續趕製，還派了幾個同學隨時傳遞新印出的傳單。遊行是一時的，傳單能更長久地流傳。這次遊行所用的傳單，主要內容有幾點：一、「四二〇」事件真相，批駁《北京日報》歪曲報導；二、悼念胡耀邦；三、新擬定的「請願七條」；四、遊行口號。〔圖 14〕

比較這幾天的請願與口號，可看出一些趨勢。最明顯的是提出民眾易於接受的口號，使運動從書齋走向社會。運動中最響亮的口號莫過於「打倒官倒」，但在最初的請願「七條」與籌委會「十一條基本綱領」中，都沒提到「官倒」二字，僅要求高幹公開收入。即使21日新擬定的「請願七條」中，「官倒」也不在明顯位置上。提出「打倒官倒」，是在20日遊行中與市民廣泛的接觸才提出的。因此，普通學生走在了學運組織前頭，也走在知識精英前頭。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臨出發前，我發現大家竟忘了謄寫「請願七條」，到天安門請願時如何交上去？於是我趕緊請人寫在大白紙上，卷起來，一路小心翼翼護著去天安門。

傍晚七點，隊伍正式出發。[43]

各校到師大會師

這次的遊行路線，按通告晚上十點各校先到北師大集結，再去天安門廣場。北大隊伍從南校門出發，受到中關村市民的熱烈支持。中關村是北京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中國科學院總部和幾所全國最好的大學如清華、北大、人大都在附近，對學生請願活動反應也最熱烈。我手中的傳單在中關村已散發了一大半。

郭海峰與幾個委員走在隊首，昂首挺胸十分威風。還未到人民大學，清華的隊伍趕了上來，從我們左邊急速穿過。我趕

到北大隊伍前，乾脆令隊伍停下讓清華同學先行，以免交通混亂。當時各校都爭先恐後，都想像五四運動那樣載入史冊。人大隊伍也衝出校門，人山人海堵在那裏，我們又滯留了十幾分鐘才能通行。過了人大向東轉，轉彎要對角穿過十字路口，但同學們竟能遵守紅綠燈的指揮，成百成千的集中穿越，同時不影響前後左右的行人和車輛，可見這個整體的素質。我還是前後來回奔走，傳達籌委會的指令，解決交通的問題，偶爾散傳單。到北太平莊前，我請一騎車的同學帶我到前面，買了一大箱盒裝桔汁，放在路當中散發給同學們。從北太平莊向南二站地，便是北京師範大學。因為柴玲的緣故，北大到師大的路我很熟。

晚上十點，我們準時到達師大，和其他高校同學匯集。在北師大，有三人來北大隊伍找到籌委會。其中一個大鬍子的青年教師劉蘇里，後來在絕食時又見過。[44] 他對我們介紹了一番情況，具體內容記不清了，可能是關於各校的聯合行動。在



〔圖 15〕1989 年 4 月 21 日，晚上，十萬大學生舉行建國以來第一次非官方大遊行。

師大停留了半個多小時，便一道聲勢浩大地向天安門挺進。因為沒有水賣，我到一家私人鋪子又買了一箱啤酒，搬到北大隊伍中，果真受歡迎，既解渴也頂餓。這兩次都是用柴玲在家裏塞給我的那些錢。

這時已接近十一點。從師大向南再走十里才到長安街，中途經過新街口、西四、西單，是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人多街道窄。市民擠到街邊鼓掌支持，一遍一遍地跟著喊「打倒官僚！」北大計算機系一個同學將「官」字頭衝下寫在一個大紙牌子上， 市民們見了都會心一笑。倒寫的官字有兩重意思，一是官倒，一是官「倒」，加在一起就成了「打倒官倒」。〔圖 15〕

孟昭強指揮清華隊伍

由於天安門廣場可能在子夜戒嚴，我請一個騎車的市民帶我趕到隊首，以觀察動靜指揮應變。那市民真不錯，他原有一同伴，並不是專來看遊行的，但聽我是學生組織者，二話沒說便與同伴一道帶著我飛馳到六部口。民心所向，可見一斑。到了六部口，只見長安街上全是人，清華隊伍居首。他們的糾察線非常嚴，隊伍兩邊手拉手，圍得水泄不通。每個同學都非常自覺性，很守紀律。我好不容易才穿過糾察線到了清華隊首，也就是整個遊行隊伍的龍頭。

這個龍頭好不威風！寬敞的長安街上，清華糾察隊在最前面形成一個長寬各二十米的方陣，陣中空空蕩蕩只有四個同學，舉著一面巨大的橫幅。方陣前還有一橫排糾察隊開道；方陣後也空出一段，一班人馬手挽手走在裏面，打著一面大紅旗，上書「清華人」三個醒目的大字，他們便是清華的組織者。

方陣的行動錯落有致，向左、向右、前行、停止都齊刷刷的，非常協調。仔細一看，方陣四角都有一同學舉面小旗壓陣，一致聽從前面一人的指揮。這人對著方陣，背對行進方向

倒行，臂紮紅帶子，左手拿了兩面小旗，右手一面旗在空中揮舞。旗分紅黃綠三色，口裏銜著隻鐵哨，配合旗子的揮動發出陣陣嘯聲，成了流動的交通指揮。浩浩蕩蕩的隊伍，全在他一人指揮之下。這架勢令我想起戰場上威風凜凜的將軍。我實在驚嘆清華隊伍的氣魄，這股強大的氣勢，代表了時代的風貌，蘊涵著十億人的希望。

走近仔細一瞧，指揮清華隊伍的竟是孟昭強，真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清華個人素質非常高，基層組織也很堅固，就是缺乏領頭人。[45] 孟昭強大約是昨天冒雨遊行時，練出這一套指揮本事。他個子本不高，這時站在隊首卻顯得格外高大。後來他一直熱心糾察工作，在5月絕食後的廣場，還組織了各種特別糾察隊，是廣場上的「001」之一。

廣場秩序難以整合

凌晨一點半，學生隊伍開進了天安門廣場。軍警並沒有封鎖廣場。清華隊伍佔據廣場中央地帶，在紀念碑北面整齊地坐下，兩層糾察圍在隊伍外面，中間留一大通道方便向紀念碑獻花。

我聯繫到清華、人大、法大、師大等校的七八個組織者，在紀念碑上開會協調各校行動。首先要安置各校隊伍。廣場上許多市民堵在隊伍兩側，很難挪動他們。各校隊伍陸續進入廣場，隊伍越來越亂。人大同學提議，將學生與市民分開，然後將各校帶入劃分的地段，使整個學生隊伍整齊地鋪排在廣場上。具體方案是：依靠清華現有的糾察隊，將其膨脹開，遇各校糾察線便將其併入，遇市民則向外推，這樣便可調整好各自隊伍，又便於協調行動。試了一個小時，這個方案沒能實行，因為我們並無統一的組織，許多學校甚至連鬆散的組織也沒有，首先清華糾察隊就難以調動。結果我們只好放棄，無法抗拒群體的惰性。若無統一的組織，這惰性難以克服。

三點左右我回到北大隊伍。北大隊伍在紀念碑西邊正對著人大會堂，軍警隨時可能衝出來。同學們非常困乏，東倒西歪躺在水泥地上，糾察線也十分鬆散。這樣鬆散的隊伍毫無抵抗力，軍警一衝必定四散奔逃，混亂中踩死人的危險也很大，我心裏十分焦急。於是，我找籌委會成員重組糾察線，並將大家聚攏，背靠背既能取暖禦寒，也能加強隊伍的抵抗力。但同學們實在太睏，我們的努力也只在局部起作用，依然於大局無補。我突然感到四肢無力，便到紀念碑上找個地方躺下，不久便睡著了。

這時大約四點半。這是三天來真正好好睡的一覺。那時的熱情與精力不可想像，似乎宇宙萬物的意義都凝聚在自己的行動中，其餘一切包括自我皆已蕩然無存。這種忘我的境界，當時不知令多少青年沉醉。那時，我們對未來並無明確的預期，沒有一絲雜念，單憑一種朦朧的希望，便在這忘我的奮鬥中徹底地滿足了。給我們動力的，與其說是美好的希望，毋寧說是這種精神的滿足。如果生活狀態可以選擇，我選擇這種忘我的境界。

4月22日 星期六

官方指定的警戒線

當我醒來時，東方已朦朦發白。清晨七點，我從紀念碑回到廣場西部的北大隊伍中，聽說「胡耀邦治喪辦公室」已與學生代表談判過，答應三個條件中的第一條：廣場同學的安全可以保證，但須退到警戒線以外。這意味著廣場集會得到了官方的許可。沒答應的兩條是：學生代表進大會堂參加追悼會，公佈四二〇事件真相。在我熟睡時，一個臨時的19所高校聯合行動委員會似乎已經形成，郭海峰與熊焱代表北大參加了聯合會

議，及與官方的談判。[46]行動委員會似乎對談判結果感到滿意，至少保障了人身安全，以後的事便好說。當我回北大隊伍時，便見到有同學組織撤到警戒線以內。

所謂警戒線，在紀念碑以西6米。這條件實際上很苛刻，因為紀念碑以西的廣場有80米，撤到警戒線內，便意味著龐大的學生隊伍要向東挪動70多米。經過昨夜整合各校隊伍失敗的經歷後，我對學生代表答應如此嚴苛的條件感到不解，為何不爭取整個廣場作為合法地帶？雖然不解，但我們還是努力執行這個協定。

這時廣場上的隊伍，北大在最西，正對著大會堂，人大、師大在北大與紀念碑之間。清華在紀念碑正北，其餘各校分散在廣場四周，越晚進廣場離紀念碑越遠。因此撤到警戒線內的行動，北大最為艱難。我們與東面的同學商量，人大說後面有師大，師大說後面有清華，清華同學以佔據中央而自豪，不願挪動。我們幾個籌委會成員花了兩個小時跑東跑西，幾乎是白費力氣。

再次與官方談判

九點左右，19校聯合行動委員會要再次與官方談判，我以北大代表身份參加。我們幾個人進到大會堂外的鐵柵欄門，站在裏面的空場上，向治喪辦說明無法讓同學們挪到東面，最後他們答應只要不出廣場範圍即可。看來官方並非鐵板一塊，也可以屈從於壓力作出讓步。他們解釋為甚麼不能出廣場範圍，因為國家領導人的車要從東門進入，不能有遊行隊伍堵在馬路上。這也算合情合理，幾分鐘後我們便出來了。

談判回來，見廣場西側馬路上已有遊行隊伍。政法大學扛著一大木牌，上書《憲法》第35條保障公民言論、結社、遊行和罷工等自由的條文，威風凜凜地在大會堂前走過。社科院研究生也舉一個大橫幅，斗大的幾個字「新聞要說真話」。在西側路上我又努力了半個小時，試圖組織學生按談判協議退到廣

場範圍內，但最終都歸失敗。因為沒有指揮系統，也沒有足夠的擴音設備去傳達。成千上萬的人依然在馬路上遊行、呼口號，簇擁著這大木牌和橫幅。我又一次感到了無力，也進一步意識到組織的必要。

19校連署請願書

19所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只是一個臨時而鬆散的協調機構，在同官方談判、協調各校行動上必不可少，但由於這是在廣場上才臨時湊成的，因此有許多組織上的缺陷。首先是各校代表難以確定，這次來開會的代表往往與上次不同，代表資格很難審定。其次是議事與執行沒有明確分工，議題與實施常常糾纏在一起，討論既激烈又低效。無論我們怎麼努力，要調度同學符合談判協定都無法達成，最後還是因為大會堂內追悼會開始，才結束了我們的努力。

「先追悼、後請願」是19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基本策略，



〔圖16〕1989年4月22日，封從德拿著《請願書》紙卷在與19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同學協商。站立者為周勇軍。

並作了充分的討論和安排。第二次談判後的一次聚會上，我打開「請願書」，請各校代表簽了校名。我一直像保護生命一樣地保護它。當時風很大，打開時將紙吹破，已難以再捲好，後來郭海峰手執此請願書下跪時，紙卷已有點破損。〔圖 16〕

廣場悼念秩序井然

上午十點整，國歌在廣場上空響起，胡耀邦追悼會正式開始。同學們肅穆正立，為胡耀邦默哀。幾十萬人屏住呼吸，為國家的命運默禱，廣場上一片寂靜。鄧小平參加了追悼會，楊尚昆主持，趙紫陽致追悼詞。悼詞對胡1987年因學運而下臺一事沒作任何解釋，對當下的請願活動也沒絲毫反應。而在學生的所有請願中，第一條就是要求對胡耀邦被迫下臺一事有個公正的說法。〔圖 17〕

十萬學生的悼念發自內心，廣場秩序井然，但當局還是早已提防。有的同學守在西長安街兩旁，希望能看見胡耀邦的靈車，為他送行。照中共國葬慣例，追悼會後靈車應從大會堂東門開出，繞廣場幾周，再由長安街向西，至八寶山火化安葬。



〔圖 17〕1989 年 4 月 22 日，十萬學生悼念胡耀邦，廣場秩序井然。

但直到十一點半，追悼會早就開完，卻始終不見靈車從東門出來。這時傳來消息，靈車已偷偷從大會堂西南門出發，開到八寶山去了，沿途的長安街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這一舉動相當下作，防學生如防賊，對死者也極為不恭，同學們感覺受辱，情緒陡然高漲起來。

「李鵬，出來！」

十一點半，廣場上群情激憤，學生們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請願活動。這時，學生與群眾已衝過廣場西側路，湧到大會堂外的軍警線邊上。所謂軍警線，就是一根繩子橫在士兵與學生之間。兩排士兵一字排開，盤腿坐在地上，目光沉重，面無表情。學生們有秩序地坐在地上，群眾則有站有坐。整個廣場上紅旗如林，人山人海。

「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同學們對著大會堂齊聲高喊，要求國家領導人出來接受請願。十幾分鐘後，一批人從東門慢慢走出來，停在臺階上。這時有同學興奮地喊「李鵬出來啦！」這太好了！李鵬出來接受請願，問題就好辦很多，中國又會充滿希望，大家太期待這樣了。也許這就是後來官方說的謠言的心理原因吧。【47】

但是，李鵬終究沒出來。鄧小平也沒出來，趙紫陽、萬里、楊尚昆……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出來見學生。廣場上的人海在片刻沉靜的等待後，又開始騷動起來，繼續高喊「李鵬，出來！」一陣陣喊聲呼喚「人民公僕」出來履行應盡的職責。聲浪越來越高，越來越急，幻想著這群老爺出來，給民眾一個希望。【48】

提議攔駕遞交請願書

這時有人從大會堂東門臺階上走下來，南面開來兩部紅旗

轎車。我以為鄧小平或李鵬、趙紫陽將坐車走，腦海中閃現一個念頭——攔駕遞交請願書！於是我衝到軍警線，手中緊握著《請願書》，這時帶糾察隊的彭嶸也跟上來。我們對一個軍官表示希望入內遞交請願書，他先支吾一陣，最後答應去請示上級。[49]

這時，郭海峰氣喘噓噓地追上來，迫不急待地要我給他《請願書》：「我是召集人，你要聽我的！」他不由分說地從我手中拿走紙卷。我擔心他太在意要在這輝煌的歷史場面上成為一個聚焦點，而對請願行動卻全無周密的設想，於是示意他盯著南面軍警線內那輛小車，對他說「到路中去交給李鵬」。於是，郭海峰順著軍警線的繩子向南奔去。

郭海峰過去後，和幾個學生在同軍人交涉，有些著急的樣子。我想去看個究竟，於是同彭嶸順著繩子也奔了過去。還沒到，郭海峰等人已跨過軍警線。我們以為官方迫於壓力將接受請願了，便停下來，在學生隊伍中插空坐下。這是學生隊伍的最前列，對面兩排士兵雙手搭膝盤腿坐著，直視前方，面無表情。這時，還有同學想跨過軍警線，結果都被大家噓回來。只有一個穿軍綠上衣的學生，拿個喇叭跨過了軍警線。

這小夥子就是吾爾開希，當時很顯小，年紀和舉止都像中學生。只見他身體前傾，右手握著話筒放在嘴前，左手在空中揮舞，血氣湧到臉上，脖子上的青筋都很分明。他在官員與學生之間奔走，向同學們轉述請願情況、帶領同學們高呼口號，那份真摯與神聖的表情至今依然活脱脱浮現在我眼前。但一週後我到北高聯開會時，竟沒認出吾爾開希就是這個小夥子。

下跪請願 35 分鐘

十二點十五分，一幅悲壯的場面永留歷史的記憶中。〔圖18〕

幾經努力無人接受《請願書》，三名學生憤然登上大會堂



〔圖 18〕1989 年 4 月 22 日，郭海峰高舉《請願書》下跪請願，其左右是周勇軍和張智勇。

東門臺階，在莊嚴的國徽下，向「公僕」們跪下，在冰冷的石階上，跪請老爺們接受民眾的請願。郭海峰居中，雙手高托《請願書》。右邊是張智勇，左邊是周勇軍。周勇軍顯得很倔強，只是單腿跪下。下跪前他們商量了一下，我在前排，分明聽見十幾米遠的開希高聲說「我絕不下跪！」我在隊伍中也喊了一聲「不要下跪！」[50]

下跪請願在中國很有傳統，古時侯老百姓下跪攔住清官的轎子述冤。如今，幾個請願學生用這套傳統做法，來追求現代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不光令當局難堪，同學們也大出意外，感到分外屈辱。後來同學們回校貼了大字報，指責這是跪著求民主、哭著喊自由。悲憤之情可想而知。

但在廣場上，大家沒表示異議。事到如今，唯此才可能有希望打動「公僕」們的良知。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二十分鐘……，廣場上一片寂靜。時間凝固了，大家眼睛直盯著臺階上的三個請願學生。三個代表跪了35分鐘！在冰冷的石階

上跪了35分鐘！在幾十萬人面前，在上千位國家領導人和官員前，在莊嚴的天安門前跪了 35 分鐘！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一個十幾億人的大民族，竟然沒一個有情有義的領導人敢站出來面對民眾，傾聽他們對國家的意見與祈望。當時廣場上凝結的那層悲憤、抑鬱的空氣，我實在無法描繪，只是清楚而痛切地記得那個時刻給我的無限悲哀。我感到一個民族在衰亡，也為自己悲哀，居然容身於這麼個沒有希望的族群之中。老一輩已沒一絲熱氣，新一代也摻和了那麼多雜念。廣場上，一切都是冰涼的。石板冰涼，空氣清冽，士兵的面孔、大會堂的臺階都是冰冷的，巨大的石碑是冰冷的，國徽是冰冷的，一切都是徹骨的寒沁。這是國徽下的悲劇！由此開始了同學們徹底改造這個民族衰敗景像的決心，開始了千百萬人的新目標，開始了中國的新紀元。

激憤中寫血書

在這冰冷、痛切、悲傷、羞辱與憤懣中，我感到缺件東西，一件有熱度的東西——血書。對，寫血書！我決定咬破自己的指頭寫血書。回想五十多年前，在日軍大敵當前的危局下，蔣介石尚能接見請願學生；文革初期混亂的局勢下，周恩來還敢站出來與紅衛兵辯論。再今，幾十萬民眾平和地等在外面，學生不惜長跪，卻沒人敢出來接收《請願書》。我感到國運已跌向深淵。而這個由周恩來養大的李鵬，是怎麼一個無能的總理！這簡直是中國的恥辱。我認為李鵬只配一個小指頭，於是用牙咬破右手小指，將手絹鋪在地上，要以血相諫。

但我的指頭流不出多少血！

我用牙咬了十幾次，將指尖的肉一點點撕裂，然後從胳膊到手指尖順著擠，才擠出一點血。這時我身體冰冷，近二十個小時沒有吃喝，也許是指頭沒血的原因。這麼一點一滴擠出來

的血，只寫出四個字，每個字半個拳頭那麼大：「總理　人民……」我想寫「人民呼喚你」，想將血書請人遞進大會堂，給李鵬看看，我們是認真地期待著一個願意順應民情的總理。

但是，血流得太慢。寫到這裏，三個學生代表已絕望地退了下來。沒能實現自己的打算，於是先將其收藏起來，回家後給柴玲看了，便放在一個妥善的地方，以作永久的記念。至今，那塊手絹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大陸某個地方。

士兵向北大隊伍衝來

忽然，一位中年人從大會堂門裏踉蹌奔出，下臺階緊摟著三個學生，大哭，然後向他們跪下，求他們不要再跪，這是沒有希望的！後來才知道，此人是陳明遠，人大代表，早已載入《世界名人錄》。他師從郭沫若，古詩詞功底厚實，文革中有人將他的《詠石》[51]一詞誤認為毛澤東手筆。學運期間，他四處演講支持學運，口才令人傾倒。「六四」後傳聞這硬漢被捕後不堪折磨，竟然精神失常！

有同學在悲泣，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塊土地而哭。沒想到這個政府貌似強大，竟如此虛偽和懦弱。士兵們被同學們真摯的願望打動，也垂下了頭。

這時，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走出來，他抱了一大箱果汁給同學們喝。他以此感謝大家，卻甚麼也沒有說。

想起今日之種種，我悲從中來，震驚於對國家與人性的新認識。一種悲涼壓在心頭，似乎這片土地便是地獄，所有人都在魔鬼的統治下，身心都扭曲得可怕。我於是急急拉著彭嶸，讓他與我一道，「走，走，我們離開這個國家！」

此時，學生隊伍騷動起來。一張張悲傷的臉上現出了憤怒，許多同學站起來要衝向軍警線。我從迷亂中清醒，猛然意識到眼前的危處和責任，於是匆忙趕回北大隊伍。果然，北大隊伍也開始混亂，對面的軍警已站立起來，一副隨時準備衝入

學生隊伍中的架勢。軍警線後面，三排士兵退到高高的臺階上，即將向同學們衝來！也有同學紅了眼，要往前衝。他們似乎相信憑大夥的勇力，可以衝破軍警線、衝進大會堂。從他們冒著火的眼睛中，我看得出這種衝動，但衝進去後又怎麼辦？

回到北大隊伍，我清醒過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將學生隊伍組成一個堅強的緩衝結構，以應付隨時可能衝來的士兵。籌委會幾個成員，包括柴玲，在學生隊伍中奔走。同學們這時已和群眾雜在一起，失去了明顯的界限，而外圍群眾已現出恐慌，很多人在向後尋找退路。

緩衝結構擋住軍警衝擊

依我構想，緩衝結構分兩步完成。第一步是分離，將堅定分子與動搖者分開。一個群體中必然有堅定與怯弱之分，衝擊一來，只要部分怯弱的四處奔逃，便足以瓦解整個群體。有鑒於此，我們挑選一批強壯的男同學當糾察，讓堅定分子坐地留下，其餘散到後面去，糾察隊則在坐著的隊伍外圍，將靜坐隊伍與圍觀者分開，且不斷擴大坐地範圍。

第二步是構造，作個緩衝結構使軍警的衝擊失效。靜坐範圍確定後，再在隊伍最前部設一排糾察，然後騰出五米寬的空地，空地後前三排是身強力壯的男同學，隨後幾排也是男同學，而女同學則轉移到後面。也有堅強的女生不願意向後，有的勇敢市民也加入了頭排的隊伍。組織這樣的隊形我們全靠嗓子喊。柴玲很能理解我的意圖，在隊伍中奔走呼號，嗓子很快便嘶啞了。

形勢一觸即發。東門臺階上北大前面的三排軍警變成了六排，且作出更具威脅的姿態。也許官方已認準了北大，試圖以最堅固的北大隊伍作為突破口。在他們眼裏，這只是一群沒組織的小毛孩，北大隊伍一散，其他院校便不攻自破。此前，他們確曾多次輕易地衝散了人群。

穩住，要穩住。萬分緊迫中，我有一個非常明晰的概念：穩住。一定要穩住大家的情緒，既要阻止同學的衝動，又要給不安的同學以信心，最好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坐著不動，這樣隊伍既有尊嚴又不慌亂。於是，我衝著同學們反復喊：「北大同學們，關鍵時刻到了！我們是中國的理性！我們是中國的良心！我們就坐在這裏不動。」這樣呼喊，是要喚起同學們心底的崇高情感，鼓舞大家的勇氣和堅毅，相信這是關係民族的希望與未來的大事。我能感覺到許多同學的感動，我對北大同學充滿了信心和自豪。

這時，趙體國、彭嶸、孟昭強、熊焱、常勁等人在最前排組織好了緩解衝擊的空地糾察隊。我見軍警就要衝來，擔心柴玲被擠倒踩傷，就叫她退到後面。但柴玲卻堅定地站在前排，鼓舞著眾多的同學。這時，我們都感到彼此間的相通與信賴。【52】

一點半左右，考驗的時刻終於到了。

「嘩——！」六排士兵像脫韁的野馬，從大會堂臺階最高處



〔圖 19〕1989 年 4 月 22 日，軍警衝擊北大隊伍時的鏡頭，軍警最終被學生的緩衝結構擋住。

向北大隊伍猛衝過來。「嘩——！」如潮的人流一陣混亂，將我捲到後面。等我站定時，已到隊伍的中部，柴玲離我不遠。〔圖 19〕

我們成功了！前排空地的緩衝結構起了作用，一排排坐著的同學，只在人潮壓到跟前時才站起來後退。就這樣，士兵的衝力迅速消減，最後我們都站定時，北大隊伍後半部還堅定地坐在地上。我們幾個籌委被同學圍在中間，大家在危急中沒有忘了保護我們。守衛大會堂的士兵大約並沒有抓人的任務，而且我們人多，即使混有便衣也無法像八七年元旦那樣配合起來抓人。北大的隊伍經受住了考驗，沒人受傷，沒人驚慌，甚至沒人喊叫。

我下令「撤！」

第一次衝擊失敗後，士兵們退回臺階繼續保持威懾。我仔細觀察軍警的佈置，發現他們在繼續向北面增員。這次，他們整隊對準的似乎不是學生隊伍，而是北大北邊的市民。經過第一次衝擊，市民群體有些散亂。迎接第一次衝擊時，我們也試圖將北邊的市民組織起來，費了很大勁都沒成功。圍觀的市民太鬆散，又沒明確的共同目標，要讓他們在行動上團結一致，完全行不通。

面對士兵的威懾，市民群體恐慌起來，學生糾察隊已難起作用。帶隊的彭嶸氣喘嘘嘘地擠到柴玲和我面前，問我：

「怎麼辦？」

「撤！」我答道。柴玲也跟著喊「撤！」[53]

這是不得已的。首先，僵持下去已沒意義。官方既已下令士兵衝擊，就肯定不會接受請願。其次，同學們體能消耗太大。大家已近20小時沒吃沒喝，又在冰冷的石板上睡了五六個小時，再加經歷了如此悲憤的場面，身體既虛弱，情緒也不穩定，很容易失控。第三，我最擔憂的是，再受衝擊，若在慌亂奔逃中踩死踩傷，必將事態引向歧路，違背同學們和平請願的

初衷。

彭嶸帶領糾察隊開了一條通道，北大同學便向北撤出廣場。其他院校的學生見北大打著大旗撤走，也跟著陸續撤向長安街，然後向西，開始了撤回學校的漫長 16 公里。

這時，約下午二點。

返校罷課、柴玲的投入

撤出廣場時，罷課成了最響亮的口號。同學們無法忍受這麼個請願結果。醞釀罷課已好些天了，這時終於成為大家的共識，並且喊出「無限期罷課」以示決心。【54】

柴玲後來回憶說，她從這天開始才積極投入學運，可見這天對她的重要性。她其實早兩天就在籌委會幫忙，但這天大概才放下其他念頭，決心公開投身運動。返校遊行中，柴玲提個話筒，聲嘶力竭地帶著同學們呼口號。從這時起，她天生的感染力吸引了無數人的支持與投入。

長安街上很多群眾圍觀，柴玲提著話筒在路邊奔走，哪裏人多就去哪兒，為市民宣講學生請願的遭遇和目的。她帶著同學們喊：

二十一晚，七時出發；
二十小時，不吃不喝；
忍饑挨餓，為了甚麼？
為命請願，李鵬不見！
政府無能，學生罷課！

諸如此類，她隨口編出許多口號。這時正值驕陽當空，聽說學生20小時沒吃沒喝，市民們買來一箱箱冰棍飲料，以示支持。自此，便開始了學生遊行、市民簞食壺漿的動人場面。我們受到市民空前的歡迎與支持。我記得那天沿途吃了十幾支冰

棍。

1989 年 4 月 22 日，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大規模的反官方遊行。我們沿西長安街至木樨地，向北經釣魚臺、三里河、白石橋、魏公村到中關村。到了黃莊，我和柴玲離隊回家，進門便躺下呼呼大睡。

4 月 23 日　星期天

這兩天的記憶不很清晰，可能在時間上混淆。從天安門請願遊行回家，便陷入了更加緊張，繁忙的組織活動之中，幾乎整日都在開會、聯絡找人、看大字報中度過，沒有一刻空閑。

中年人傳授經驗

我們睡得正香，一大清早有人敲門。我們急忙起身，開門一看是個中年陌生人。我曾公開過校內宿舍的地址，他幾經周折才找到這裏。他自我介紹一番，說是北大研究生，姓林，具備鄉、區、縣基層選舉的直接經驗。他這次來，便是為了告知這方面的經驗，提議在北大搞直接選舉，如此方能鞏固籌委會的地位，使其合法化。他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於是我向他仔細請教組織直選的具體步驟。這便是此後我積極組織同學起草《北大學生憲章》，不顧一切要在 4 月 29 日進行全校直選的開端。

回到北大，籌委會依舊忙亂。柴玲很興奮地對我介紹一個來自民盟的中年人。從這中年人那裏，柴玲學到秘書處功能與建制方面的基本知識。我們這才明瞭，一個組織要正常運作，必須有一個健全的秘書處。秘書處最重要的功能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 建制則分「內保」與「外保」。「內保」即文秘工作，包括安排會議、記錄、歸檔保存各種文件，並設專門

小組保衛領導人物的安全；外保則是接待來訪、聽取建議、發佈公告等等。[55]

當天，柴玲當選籌委會秘書長。她的工作得益於此人的指點，加上她對周圍人的關切，及頗具感染力的個性，使北大籌委會的秘書處搞得非常出色，秘書們也很擁護她。我們再也不需為安排開會、發佈公告等雜事而發愁。[56]

在籌委會初期自願來看門、作秘書的幾個女生中，有一個叫湯葉，大約21號便來了，沒日沒夜地為籌委會把門兼接待。她對王丹的目光有些異樣，有一次還對王丹說「你要是坐了牢，我去給你送飯」之類的話。

「新官僚」的形成

這天是星期天，籌委會宣佈了「無限期罷課」，同學們有更多精力投入學運。到三角地看大字報的人，與到28樓籌委會來提建議的人，皆陡然增多。起初，我們試圖認真聽取每個來訪者的建議，但很快便發現做不到了。來的人太多，精力和時間都顧不過來。許多建議實際上籌委會正在研究如何實施；有的建議已試過行不通，我們得費很大勁解釋。提建議的人滿懷熱忱，卻要等很久才能見到籌委會成員，得知建議已討論過或行不通時，有的就很生氣，便在三角地貼出大字報指籌委會為「新官僚」。

無論如何，籌委會必須改進。成立之初，籌委會沒料到運動會發展得如此迅猛，基本上還是「行動委員會」的思路，在需要組織遊行、靜坐、請願或談判時，可以組織身份出現，發佈具號召性的公告，接受捐款或進行談判。那時籌委會比「行動委員會」只是稍微進步一點，公開了委員們的身份以取得同學們的信任與維護。起初兩三天，門口有人看門兼接待，籌委會委員則在裏面辯論緊迫而重大的問題。現在來訪的人迅速增加，將這麼多人阻於門外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於是那些看門兼

接待的同學，又找來更多的同伴，共同承擔這繁重的責任。於是，樓道中放了一張書桌和幾張椅凳，算是接待處的開端。

來訪者的誤區

來訪者常有兩種誤區。一是動口不動手，習慣於坐而論道，若請他去試著去實施他的建議，便藉故推託，很快就不見人影。二是偏執，總是試圖衝進正在開會的房間，而有幸闖入的人所提的見解，不是籌委會正在討論就是已實施或否決的，少有新鮮東西，卻白白佔用大量的時間。他們沉浸在自己的想像中，總認為自己的主意才可取。記得有位中年婦女，一趟趟跑來說不能罷課遊行。她精神並沒問題，但語言幾乎是文革式的。她總試圖插入籌委會的議程，我們雖再三解說也無濟於事。

就算建議切實，也會帶來困擾。這時籌委會的處理能力不夠，就像一台電腦，輸入的信息超過處理能力，系統就會拖遝甚至崩潰。大量的建議使籌委會疲於奔命，而那些關係大局及結構調整的問題卻沒時間處理。此時我們陷入繁雜的事務，缺乏冷靜的思考和全面的統籌。這樣的系統故障終於在24日的全校大會上爆發了。

彭嶸貼出公告召開大會

這次爆發的導火線是一張公告。22日遊行回來，彭嶸似乎沒和籌委會多數成員商討，便憤然在三角地貼出公告，要全校同學於24日午飯後在五四操場集合，目的是要罷免學生會。我沒有見到公告，郭海峰在今天中午會上告訴我們時，顯得無可奈何。

我與彭嶸早就認識。八七年秋我們就在一起辦托福班，白手起家從無到有，規模越辦越大，業績越來越好，他吃苦耐勞

樸實無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彭嶸是湖南人，圓臉大眼，嘴唇上蓄了濃厚的鬍鬚，頗顯英雄氣概。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宛如牽馬的兵勇，又像過河的卒子，有一股勇往直前的蠻勁。記得一年前柴慶豐事件時的一個晚上，他從47樓出來，一手提隻臉盆，一手拿個掃把，邊敲邊喊「運動了！」勾頭彎腰向前急走，後面跟著幾人，各拿半截掃帚點燃做火把，也喊「運動了！」影片《芙蓉鎮》中的這個經典鏡頭被用於學運，堪稱一絕。[57]

不過這次彭嶸冒然貼出公告，讓籌委會很被動。彭嶸本意很好，也許以為全校大會一開，官方學生會便可一舉罷免，根本不需費力準備。結果弄得籌委會措手不及，議案都沒仔細討論，明日要在全校大會上做甚麼全無準備。他的這種豪爽風格，後來還表現在強佔學生會、剃光頭堵軍車、「六四」後留在學校二度被抓卻還要到三角地貼大字報的種種豪邁行為上。

籌委會一度機構重疊

23日這天，北大籌委會的組織結構進一步完善，增加了許多骨幹。從20日設立的八個分部逐漸演化，各部人馬也起了變化。現在後勤主要有蔡健和王有才；理論信息部有常勁；王丹「民主沙龍」與沈彤「奧林匹亞」的人馬也加入籌委會，雖一度退出現在又都回來了，兩套人馬間的矛盾也隨著進來，使籌委會一度出現機構重疊的局面。譬如對外發言，楊濤、王丹有個新聞發佈組，沈彤與周培勝又組建了新聞發佈中心。他們兩套人馬還各自設立廣播站。我當時忙來忙去，弄不清楚這兩班人馬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好在運動中可做的事很多，籌委會的民主機制也逐步完善，兩方最終沒發生嚴重衝突。[58]

楊濤與王丹同宿舍，關係可想而知。沈彤說楊濤實際上是王丹的幕僚，大多數場合是王丹發言，他卻不動聲色。楊濤是福建人，當時才 19 歲，能有如此沉著穩健的性格，真令人讚

嘆。23日晚，北大籌委會在文史樓舉辦記者招待會，由楊濤主持。當時我有事，也不愛去這種場合。柴玲參加了，對楊濤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沉穩風度、應答記者時的機智與幽默，佩服得五體投地。

新聞導報與徐四民的大話

23日這天北大學生刊出《新聞導報》。這是北大作家班的張伯笠與沈彤一班人馬的功勞。張伯笠很早便加入了籌委會，幫助起草各種宣言和聲明。[59] 沈彤辦《新聞導報》時，他們便在28樓一個房間成立編輯組，購置油印機，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後來伯笠成為《新聞導報》主編，帶動北大作家班在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60]

出版民辦報刊本是籌委會的目標之一，以實際行動推進新聞自由。籌委會討論過請徐四民來辦報，[61] 他是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一年前曾在人大上誇口：如果大陸真可以辦份民間報刊，願出來作主編。有天晚上，我去作家班宿舍說起此事，作家班的才子們很快找到徐的地址，當晚就拍去電報，但後來沒聽到任何回音。

任畹町、陳明遠的演講

23日在廣播站演講的，有兩位口才很好的中年人。一是任畹町，曾因七九年民主牆運動入獄四年。那天他在廣播站講得較為激進，歷數共產黨的罪惡，甚至喊「打倒共產黨！」這在運動初期難以為多數學生和市民接受，即使心裏贊同，但為了不給中共抓住把柄找到鎮壓的藉口，大家都迴避這樣的口號。

另一個中年人是陳明遠，他的演講則溫和許多，且有理有節。大約受了昨日的刺激，他再也按捺不住，冒著風險在校園發表演說。他的口才令人傾倒，從平凡小處說起，沒有華麗的詞藻，全憑一股內在的熱情與勇氣震撼人心。他不喊空泛的口



〔圖 20〕1989 年 4 月 23 日，陳明遠在清華大學向學生發表演講。

號，有理有據地揭露腐敗和中共宣傳的無恥。他的演講很有技巧，使聽眾與他一同思考。他常提出問題，答案明顯而簡單，聽眾便齊聲回應，伴隨陣陣掌聲與歡呼，大家的情緒都隨著他的演説而起伏。〔圖 20〕

陳明遠首先磊落地報出姓名，講給便衣們聽，博得同學們熱烈的掌聲。大家欽佩他的勇氣，因為他隨時可能會被扣上「黑手」的帽子。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他對便衣的憎惡。後來我又聽過他一次演講，説到一個便衣被他抓住向他求饒。後來在 5 月的廣場上，他對李祿的身份非常懷疑，至使李祿氣憤地大罵。【62】

陳先生説，昨日下跪請願那恥辱的一幕令他難以忘懷。他以貴賓身份參加大會堂裏面的追悼會，見沒一個領導人出來接受請願，他悲憤不已，走去與下跪學生擁抱。他説，「這是中國人民的良心在向他們擁抱！」接著，他抨擊中共宣傳機器對學運的扭曲報導，建議大家聯名公訴。他又提到新聞自由，讚揚《科技日報》近來真實報導的勇氣。然後他講到官倒，講到

當前的經濟形勢。他以肉價從八毛漲到四、五元，來證明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的不可信。一個知名教授月工資才120元，現在連衣服都買不起！這讓我想起我的一個教授的感嘆：一個月工資只能買兩筐蘋果！陳先生如此平凡的例證，深刻揭露了社會的黑暗，令同學們激憤地跟著他振臂呼喊：「打倒官倒！鏟除腐敗！」最後同學們齊聲高喊「向陳老師學習！向陳老師致敬！」結束了近一小時的即興演說。

從此，陳明遠在同學中樹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常來我們學生組織中，提醒我們凡事要謹慎、周密，不給政府中的頑固勢力抓住藉口和把柄。24日，他的威望還幫助籌委會渡過難關。他是一隻公開的「黑手」。【63】

設立發言人制度

陳明遠還影響到我們對於記者的態度。那天演講前他先到籌委會，見到郭海峰，二人熱情擁抱，就像昨日在大會堂臺階上那樣。這時有外國記者希望採訪，郭海峰正要起身，陳明遠突然激動地按住他，嚴厲地說：「不能去！你知道魏京生是怎麼被捕的嗎？」

魏京生十年前因民主牆運動被判15年。民主牆時期，他從張貼大字報到主辦民刊，寫了許多有遠見的文章。鄧小平起初需要民主力量與華國鋒保守勢力抗衡，因此暗中支持民主牆運動；地位一旦穩固，鄧便要對民主牆下手。魏撰文直書鄧的獨裁趨向，終於鋃鐺入獄。和多數學生一樣，我當時對魏京生知之甚少，只隱約聽說他出賣了對越作戰的軍事情報，這自然是中共宣傳的結果。八六年學潮期間有人提到「魏京生辯護詞」，我才感覺他是民主運動中的英雄人物，而那篇辯護詞和「第五個現代化」，我到海外後才讀到。

陳先生對魏案瞭解多少我不清楚，但他一定認為與外國記者接觸很危險，容易會誣為「裏通外國，出賣情報」。我們相

信陳先生，又擔心學運組織者為追逐名利而去見記者，因此在籌委會定下一條紀律：「籌委不得私自會見記者」；同時設立發言人制度，對外保持統一的聲音。

籌委會即定下不得私見記者的規矩，後來王丹在 29 日開「個人記者會」，自然引起大家的不快和批評。除了王丹和沈彤以外，籌委會成員基本上都恪守這條紀律，因此多不被外界所知。後來我將這條紀律帶到北高聯和指揮部，但執行的情況遠不如北大。【64】

成立全市高聯時機不成熟

下午籌委會在文史樓開會時，聯絡部得知今晚在圓明園將有一個幾十所院校學生的聚會，準備成立全市範圍的領導機構。但當時各校幾乎還沒有成型的自治組織，【65】就算在北大，自治組織也都還沒穩固，因此我對形成更高的組織持保留態度，沒去參加這個後來成為學運最高組織北高聯的第一次會議。【66】

此事同另二件事相關聯。一是前面提到的全校直選計劃，另一件就是香港專上學聯的來訪。香港學聯昨晚便派人到北大，秘書長陶君行帶著李蘭菊等三人，給籌委會留下一份他們學聯的章程，希望能給我們做參考。收到章程我當即回了一封信，感謝香港學聯的好意，但認為目前成立跨校聯合組織的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是形成和鞏固各校內自治會的時候，不宜走得太快，以免頭重腳輕，官多兵少，因為代表性不足而難以形成應有的權威。

這個判斷也受發起運動時兩個基本目標的影響，其一便是成立學生自己的學生會。這時，我在各方面開始積極籌備直選，在我看來，如果趁目前的大好形勢，在北大成立由全校同學直選的學生自治會，即使運動過去了，學生自己的組織還在，又是依法定程序由同學選出的，那麼官方也無可奈何，同

學們至少可以據理力爭。因此，我一心撲在起草《北大學生憲章》上面。

起草《北大學生憲章》

歐陽與我觀點一致。我們約好晚上七點在46樓3單元歐陽的宿舍，與各系同學開會制訂《北大學生憲章》。那裏幾個數學系的同學對此很熱心，還有經濟、法律系的同學，共十來人。因為人來得多，宿舍裝不下，便改在活動室。這只是預備性的會，很快便開完，我講了一下我們的目標，大家討論分工，就各自回去起草。

這晚還有一幕場景，郭海峰總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從46樓出來，猛然發現牆根下黑黢黢的蹲著七八個人，都是農民打扮，個個神情嚴肅而沉悶。再仔細一瞅，郭海峰就在當中。原來都是他的親戚，有個老漢垂著頭抽著煙斗，看來是他父親。我能想像他們如何匆忙從鄉下趕來，勸説孩子不要造反，郭海峰又如何倔強不肯退讓。大概來得不是時候，我感到氣氛沉悶，問候幾句便匆忙告辭。郭海峰最終頂住了族人的壓力，始終活躍在運動中，無論同學們對他有何看法，他還是堅持到六四凌晨，直至被捕。

柴玲引薦王超華

柴玲作秘書長，遇到許多傑出的人。我認識王超華，就是柴玲引薦的。這天她正在接待來訪時，留心到一個人來回走動，不説話，只是看。柴玲便招呼她，這人大方地提了許多建議，令柴玲十分敬佩。

晚上一個會後，柴玲拉我到一邊，要我聽一個同學的好建議。樓道內太嘈雜，不時有人來找我，於是我們下樓在牆跟下談話。王超華對時局的分析極精闢，平易的態度更使我相信她的真誠與才能。她希望為學生組織做點事，卻不得其門而入，

我說「這好辦，我給你寫張條子，你隨意到甚麼部門給他們看，他們也會信任你的。」後來在北高聯，超華還掏出學生證，從中取那字條給我看，帶著一種感謝的口氣，使我既感到她為人的謙卑態度，又使我自愧不如。[67]

王超華當時已37歲，還有個7歲的小孩，在學生組織中應是年紀最大的一個了。[68]她丈夫不支持她捲入政治，她也偶爾對我們談起，然後輕輕一聲「我也不管」。後來才知道，她家就在北大，父親是北大著名的語言學教授王瑤，她自己則是社科院研究生，主修中國文學，以前學的則是建築。她年紀比我們大，經驗自然比我們豐富。她也曾狂熱地參加過文革，下過鄉。後來文革被徹底否定，她感到受騙，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69]這種反省必是深刻而痛苦的，否則以她如此年齡及有家庭、事業等顧慮，是不可能這樣不顧一切地投入學運的。在我認識的學運骨幹中，王超華最為儒雅。當大家辯論得熱火朝天的時侯，她總是細心地聽；當她發言時，你總會覺得這正是該她講的時侯，而她的見解往往令人折服。

這天還聽到趙紫陽出訪朝鮮一週的消息，覺得他是見勢不妙便出國躲避觀望。事後證明，趙這一舉動很失算，被李鵬和北京市委趁隙利用了。

4月24日　星期一

這兩天籌委會領導層有些混亂，沒有組織好今天的全校學生大會。我知道這事莽撞，卻沒順勢推行全校直選，痛失機會。

丁小平和張智勇的問題

23、24日兩天，丁小平和張智勇的問題成為籌委會內的

一個困擾。丁小平雖另設「中央」，但對籌委會不構成威脅，我們雖然反感，但對其熱情和動機沒有疑問。張智勇則不同，他是研究生會的副秘書長，加入籌委會時卻大罵研會如何官僚腐敗，似乎是因未能選上秘書長而洩私憤。本來我們對官方研會成員就缺乏信任，他的言論讓我們對他更產生疑問。加上20日冒雨遊行時帶著同學們去清華的奇怪舉動，趙體國、孟昭強當時對他很反感，擔心他是官方派來的。運動初期的緊張氛圍，便衣、竊聽器之類傳聞不斷，是構成這種擔憂的心理基礎。於是，當24日討論全校學生大會時，我們一致決定二人不能上臺講話，以免出亂子。

結果還是出了大亂子。這次大會安排得很倉促，怎麼開始的我都不清楚。直到大會前一刻鐘，郭海峰才到28樓開會討論大會最後安排。我很著急，催大家準時去會場。等我們開完會，匆匆趕到五四操場時，操場上已插滿紅旗站滿了人，還有



〔圖21〕1989年4月24日，北大全校學生大會對官方學生會投不信任票。

許多同學正排隊進入操場，最後共有上萬人參加。〔圖 21〕

糾察隊圍著操場，只在一處設了門；每個同學都得出示學生證才能入場，以防便衣混入。楊濤安排會場音響設備，[70]話筒設在點燃五四火炬的鐵臺上，三年前胡耀邦在此首次點燃了火炬。北大校慶日定在五月四日，以紀念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在許多層面創新中國社會文化，「科學與民主」從那時起成為中國人普遍認同的口號。

北大全校學生大會失敗

事後證明，這次大會是北大直選學生自治會的唯一機會。不知為何，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次大會是為了選舉新的學生會。我投入很多精力建設民主機制、起草《北大學生憲章》，但沒想這麼快直選。因此，直到我進入會場，還躲到五四火炬鐵臺背後，繼續準備關於籌委會民主機制建設的發言。我也沒有意識到，當時的形勢並不期待這樣的發言。

半個小時後大會終於開始。不知為甚麼是彭嶸主持大會，後來換了郭海峰。不久主持人便招呼籌委會成員上臺亮相，讓同學們認識。我們七八個人陸續登上火炬臺，在隨時可能踩空的鐵架上拿著話筒發言。〔圖 22〕

我的發言一定很枯燥，照稿宣讀籌委會民主機制的設計，下面的同學聽得雲裏霧裏。我匆忙換成感性的演說，套用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以激起大家的熱血：我有一個夢……。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曾經熟背過。八五年北大英語演講比賽我還得過第五名，便是反復聽他演講錄音的結果。但此時不是夢想的時候，同學們急迫想知道怎麼辦，需要的是行動——罷免官方學生會，成立自己的組織，這樣的具體成果。

接著是郭海峰等人的自我介紹。這時，最糟糕的場面出現了。丁小平和張智勇奮力要上鐵架，趙體國、熊焱等試圖阻



〔圖22〕1989年4月24日，北大全校學生大會，封從德（著西裝者）、趙體國（持話筒者）在五四火炬臺上。

攔，下面的同學見臺上出現了爭執場面，紛紛嚷道：「讓他們上臺！他們有講話的權利！」張智勇登臺上場，拿了話筒，講他對研會如何不滿，如何參加某日的靜坐，如何領導20日的遊行和22日的請願，似乎是在作競選演說。這時熊焱忍無可忍，上前奪過話筒，用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大吼一聲：「張智勇，是研會派來的奸細！」【71】

熊焱似乎還想講點甚麼，但會場已經譁然，秩序大亂。很快，同學們就打著旗幟散了。就這句話，斷送了北大籌委會實行直選的一個大好機會。大家料不到他的脾性如此火爆。我覺得熊焱其實是作犧牲，以阻止潛在的危險。好在大會還是有一項成果，即大家當場舉了手，對現存學生會和研會投了不信任票。

對於這次大會，後來知道的多了一點。有同學看見，當時一個瘦高個兒逼著丁小平、張智勇到臺上去：「你們得上去，上去就是英雄！否則……」說著就掀開衣角，腰間露出一把匕

首。次日改選籌委會時，這個瘦高個兒差點當選，引起那同學的注意，才想起昨日這人的異常舉動，報告給籌委會。

陳明遠李進進試圖拯救籌委會

回到 28 樓籌委會駐地，大家的情緒低迷到極點。這時籌委會的屋子在四樓已擴展成三間，因為太吵鬧常換地方開會，這時卻冷清多了。同學們沒有來這裏罵我們，有的徑直回去寫起大字報。後來我得知，這天下午有個二十多人的研究生組織，幾乎決定要在校園內發動「政變」，接管籌委會對學運的領導權。但最後，維護籌委會的意見佔了上風，使北大籌委會經受住了這次意外的打擊。

維護籌委會的人中，首先便是陳明遠。陳先生在我們回到28樓不久，就來到我們中間。一進屋便與郭海峰擁抱，給他許多安慰與鼓勵。陳先生很快感受到我們的悲觀情緒，於是下樓到三角地作了他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講。這次演講，挽救了同學們對籌委會的信心。他使同學們安定下來，為籌委會在危機中重組贏得時間，也許還無形中阻止了急躁同學的「政變」計劃。

另一位挽救籌委會的是李進進。本來，在 20 日籌委會成立的第一個白天，籌委會便要請他和郭海峰參加。但後來聽說他與王丹不和，18日在人民大會堂共同作為學生代表時分歧嚴重，致使他不能信任王丹，甚至說「只要王丹在籌委會，我就不參加。」【72】似乎這也是 21 日王丹等人退出籌委會的一個原因。如今，不僅王丹不能成為學運的領導骨幹，整個籌委會也搖搖欲墜。這時，一直關注學運發展的李進進，便不能再計較個人分歧了。

博士生們在 29 樓熱切討論如何拯救籌委會和學運。李進進作為上屆研究生會主席，法律系的博士生，既有組織經驗又有學運背景和熱情，於是成為拯救籌委會討論會的主角。這

晚，籌委會似乎自動解散或辭職了，我們這班人馬多數安靜地坐在屋裏，聽許多新面孔的熱切建議。於是旨在改造籌委會的「協調委員會」產生，以李進進為首，在這晚與次晨實際上代替了籌委會的職責，擔當起學運的領導角色。【73】

熊焱替代郭海峰

這晚籌委會開會，【74】大家對郭海峰的領導作風多有不滿，討論撤換召集人。這時籌委會有了許多部門，吸收許多同學參加實際的工作，而最初的成員則構成議事決策的常委會。這時的主要骨幹有郭海峰、熊焱、常勁、趙體國、楊濤、王丹、孟昭強、沈彤、柴玲、彭嶸、王有才、楊國忠、蔡健、謝劍、歐陽、應華江和我等人。

會上，大家對郭海峰提了許多批評，講他缺乏顧全大局的領導才能、愛花錢、愛浮誇、不扎實等。郭海峰在農村長大，武漢大學四年本科後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研究所，無疑為族人增光不小。這些經歷決定了他的矛盾性格，有時自負有時自卑，外加一些浮躁，這可能就是大家在認同他的熱情與能力之後又很快撤換他的原因。

大家想推舉我作召集人，我堅決推辭，說自己優柔寡斷。大家又想推舉柴玲，她當時也在場，我不同意，說她現在學籍不在北大，最多只能做秘書長。結果她還是繼續做秘書長。那時柴玲的才能已有所顯現，而她的同情心與善解人意更贏得了大家的喜愛。這幾天她作過幾次會議調解人，也相當勝任。

最後，熊焱接受了大家的推舉，同意做實際的召集人統領全局，但對外暫不宣佈，使籌委會維持一個穩定的形象。那晚熊焱表現得非常出色，當即分派任務，具體而周詳，讓人覺得他對全局胸有成竹。他不僅設定了各項任務，還設定了具體期限和監督，使每一項任務都能落實，真是個帥才！但不知為甚麼，第二天清早，他卻辭職不幹了。這讓我很驚訝也很

失望。[75]

註：

---

[15] 後來各種官方資料都說是那次是「王丹召集的民主沙龍」，甚至將我也列入民主沙龍的主要成員(如《驚心動魄的56天》第12、24、25、34頁)，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民主沙龍，更沒聽說過王丹，對政治也不感興趣。

[16] 據常勁回憶，這次聚會的主持人是武運學(《回顧與反思》第2頁)和丁小平，而非官方所稱的王丹(《70天大事記》第6頁、《驚心動魄的56天》第24、25頁)。後來知道除了下面提到的，還有楊通學、馬學禮等人。據常勁修訂，丁小平提出由勇敢地站出來演講的同學出來領導學運，其後扮演了會議主持人的角色，武運學這時可能因為插不上話或被人擠出去了不見了蹤影。

[17] 熊焱回憶說當時是他提議搞組織的。見熊焱「六四口述實錄」。

[18] 應該就是丁小平。他和其他人當時我都不認識，他們應該還講了很多，但我對不上號，也記不清楚了。

[19] 我記得當時有九人，但《驚心動魄的56天》上說是第二天公佈出來的是七人。見該書第28頁。當時北大學生辦的《新聞導報》也曾簡略介紹過籌委會的成立過程，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505頁。據常勁修訂，最初只有五人，是丁小平、封從德、熊焱、常勁、孟昭強。這時王丹、楊濤從廣場上回來，宣佈加入籌委會，然後向大家介紹新華門前的情況。後來又有趙體國和楊丹濤加入。熊焱在八九學運初期的經歷可參見其「六四口述實錄」，他因為參與此前歷次學運而被當局內控，但在19日晚的演講中還是勇敢地提出要組織起來。

[20] 民主沙龍原稱「草地沙龍」，由劉剛、邵江等人於1988年5

月4日創建，6月柴慶豐事件引發學潮，劉剛雖未參與行動委員會但仍不能見容於當局，草地沙龍就此暫停。88年11月由王丹等人接手，直到89年5月，邀請了許多著名的自由化知識分子來演講，行動委員會的一些積極分子也參與了民主沙龍活動。

【21】常勁回憶，丁小平自我任命為籌委會的主任委員是在熊焱和我去新華門後的會議上提出的，當時還有一些爭執。見《回顧與反思》第3頁。據常勁修訂，王丹等三人沒參加那次會議，只剩丁小平、常勁、趙體國和孟昭強四人到塞萬提斯像附近草坪上開會，歐陽旁聽。沈彤要求加入，但被丁以大部分籌委不在的理由否決。沈就留在附近放風，與地球物理系幾個同學一起。會上丁自薦主任委員，常勁和趙體國反對。會後，丁、常、趙和歐陽四人去到丁在人大的一個地下室裏，寫了宣佈籌委會成立通告。丁、歐寫通告，常、趙寫新聞紀要。

【22】新華門警察毆打學生的情況有很多記述。如張伯笠見「彭嶸拿著一塊玻璃，上面有這麼大一塊血。他說：這是血的罪證。」(《回顧與反思》第52頁)。另外，政法大學王治新(一些資料說他叫王志新)等三人「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20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為乘地鐵，走在大會堂南側街道上」，王遭軍警毆打直至昏迷(香港中文大學《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15頁)。而據政法大學的一張大字報描述，他們被二十多個軍警追打，王「被武裝帶猛擊數下，頭部被擊破，血流滿面，左腿被打腫，右肋被擊傷，被追至前面路邊昏迷。」大字報邊還掛出血衣為證。〔圖23〕
北醫三院出具的證明上寫著：「頭皮裂傷，輕度腦震盪，眼外傷」(《中國六四真相》第143頁)。另外，香港《華僑日報》攝影記者何澤當時在新華門現場採訪，「遭穿有公安制服之人圍毆受傷，被拆菲林[膠卷]，復被扣留三小時及被迫寫下悔過書。」《香港經濟日報》記者羅綺萍也遭公安毆打和扣



〔圖23〕1989年4月20日，新華門血案證據：政法大學王治新遭軍警追打，右面是血衣。

留。見《華僑日報》21、22日4版，有受傷照片。關於「新華門事件」，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一書中有很詳細的敘述和精到的分析，見該書第72-81頁，當中還提到《經濟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兩個記者遭毆打的情況，而官方資料只承認「有人受了一些小傷」。

【23】沈彤書中詳述了那張大字報的內容：除與李淑嫻秘密聯繫外，王丹等人用悼胡的捐款買香煙吃大餐，「軍警一來，王丹一夥總是最先逃跑。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說一套做一套？」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175頁。從內容看，很可能就是《驚心動魄的56天》第32-33頁記載的那張「署名為「一清醒者」的題為《原來是個陰謀》的大字報」。

【24】沈彤在書中不但隱匿了要熊焱和我警惕王丹和民主沙龍這一段話，反而改為他如何維護王丹。書中解釋說他之所以沒能成為籌委會首批成員，是因為他在三角地還沒來得及站起來發言，大家就轉移到圖書館了，而當晚籌委會上他又被丁小

平排除在外。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172-176頁（這裏面很多不實，熊焱專門同我核對過）。但據沈彤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的敘述，他提醒熊焱和我警惕王丹其實有兩個原因：一是王丹反對他加入籌委會，他後來還調查了王丹等人是否貪污但沒找到證據，「這個錢到哪里去了，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二是沈彤瞭解到，進人大會堂「交『七條』時，據見面的其他幾個代表通過張智勇對我説，王丹表現非常不好。王丹同出來接請願書的三位人大代表説：『你們就出去見見學生，糊弄糊弄他們就完了。』」見《回顧與反思》第56-57頁。據常勁修訂，孟昭強是民主沙龍的成員但不是骨幹，孟還曾經是常勁的「北大學生教育研究社」的成員。

【25】熊焱在秦城監獄關了19個月，我寫備忘錄時他尚未獲釋，所以説他「在獄中一年多了」。後來，1992年因受沈彤回國行動的牽連，立筠自己也有幾個月的牢獄之災，熊焱當時寫過一篇文章介紹她，見「記我的妻子錢立筠」，《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9月18日。2005年6月30日，錢立筠響應「三退」號召，發表《我的退團聲明》：「作為熊焱的妻子和八九運動的參加者，我在1989年6.4大屠殺後，遭到當局的整肅，在那時，我退出了中共青年團組織，後來還有幾個月的牢獄之災。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更是明白，再次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青年團，就是宣告與中共邪靈勢不兩立，故特此再次聲明退團。熊焱妻子 錢立筠」真是擲地有聲，巾幗不讓須眉。

【26】《驚心動魄的56天》記載了那天籌委會公佈的「十一條基本綱領」：1. 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3, 要求言論、出版自由；4. 強烈要求廢除遊行十條；5. 要求懲辦元兇；6. 要求新聞界公開報導學生運動；7. 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公佈自己的收入和家屬收入；8. 釋放魏京生；9. 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誤向人民檢討；10. 科學理順物價；11. 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

[27] 2004年在我的建議下，「公民議政」組織編了一本《開會手冊》。

[28] 香港《天天日報》21日12版上有一張照片，可能就是我當時舉的牌子，上書三行大字「高校青年/聯合起來/北京大學聯絡部」；同時還報導了北大籌委會的成立及其組織的抗議新華門流血事件的冒雨遊行。

[29] 2006年採訪周鋒鎖時我才明白，除了他和張銘之外，清華籌委會的主要成分原來就是原官方學生會和團委的。見周鋒鎖「六四口述實錄」。

[30] 熊焱那天充分發揮了他的口才與煽動力，四處「煽風點火」。20日晚九時近千人聚在三角地，「熊焱宣佈，21日至23日北京大學罷課，21日早晨每系派三名代表協商22日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活動的事宜」，並「宣讀了《全國高校聯合會宣言書》。」見《八九民運史》第95頁、《70天大事記》第7頁。

[31] 20日王丹和民主沙龍成員退出籌委會(何時再加入不清楚)、21日沈彤退出(23日重新加入)，從1991年巴黎會議上的討論看，與他們之間的矛盾及他們各有自己的意圖但又很難掌控籌委會有關。不過，這時有更多的同學加入，如蔡健、王有才、謝劍、彭嶸、楊國忠、李海等等。見《回顧與反思》第8頁。

[32] 還有北大國際政治系研究生郭海峰和張智勇。不過，據李進進回憶，4月18日的靜坐請願是他組織的，當時他們要求人大代表出來接受九條（後改為七條）請願信，官方則要求學生代表進人大會堂遞交，相持不下中李進進的妥協方案得到一致同意，他代表學生到大會堂臺階上將請願信遞交給三位人大代表，隨即宣佈解散，「但另一部分激進的同學則不滿意，希望把事情搞大，晚上遂有衝新華門事件。李進進覺得與自己的想法不合，就退了出來，不再出頭幹甚麼事」，直到絕食後幫助建立工自聯。見「六四與中國工運——訪李進

進」，《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12月及李進進「六四口述實錄」。李進進1955年在武漢出生，1970年入伍，77年復員後做過一年刑警，78年考入中南政法學院，後考入北大攻讀憲法專業碩士，畢業任教兩年又考回北大攻讀博士，87-88年任研究生會主席。

【33】王丹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情況，外界除了當時的記者採訪和一些捕風捉影的報導以外，並不真正清楚他參與組織活動的實際情況。大家都以為他在別的組織裏面發揮作用，後來各個組織的骨幹一碰頭，發現他在哪個組織裏都「不幹實事」，卻又同時代表這些組織對外發言。當局誇大王丹的作用，可能是想利用他與方勵之夫婦的關係，來證明「黑手陰謀論」，媒體則跟隨當局的誇大而想當然。1991年巴黎會議上對王丹的實際作用及外界的誇張印象有很多討論。見《回顧與反思》9、64、68、70、109、160等頁。

【34】王丹在1995出品的影片《天安門》中說：「4月19號晚上成立了北京大學籌委會, 成立的時候的這七個第一批常委都是自告奮勇站出來的, 可以說他們的成為常委完全是憑著勇氣, 並沒有經過那種程序化的選舉過程。」這段話雖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準確。沈彤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回憶，20日早晨王丹和楊濤等人退出，實際上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法控制籌委會。而奧林匹亞也在20日退出過籌委會。他們的矛盾可能還因為王丹反對沈彤進入籌委會(見《回顧與反思》第8、56-57頁)。相對而言，北大籌委會的民主程序遠比後來王丹任召集人、王軍濤實際掌控的「首都各界維憲會議」要嚴格得多，卻未見王丹對後者有何反思。習慣於小圈子運作，卻否定公共空間中形成的自發組織，是民主運動中的一些受黨文化薰陶較深的人常常出現的問題。

【35】我們萬萬想不到，這天下午鄧小平已下令調集38軍九千人赴京，以「維護首都秩序，保護胡耀邦靈車」。見《中國六四真相》第156頁。當時也有傳言說是「四二二進京，有六萬

人」，見《八九民運史》第149頁。

【36】常勁在《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5月29日上有篇文章簡述了籌委會成立到冒雨遊行的情況。另據常勁修訂，20日遊行由張智勇提出，加沈彤、趙體國三人負責組織，張煽動、沈籌款、趙糾察。隊伍出發後封從德、熊焱回北大，剩下的籌委決定走人大（不記得甚麼原因），派孟昭強去通知。但孟回來説張要衝清華，加上暴雨把隊伍沖散了，又派常勁去。出發前封從德寫了一個小紙條給常勁，叫他見機行事。

【37】趙體國當時因為對沈彤和王丹等人的作為有意見而辭職，詳後。

【38】既可笑又可悲的是，卡瑪的影片《天安門》加上戴晴與一些女記者的添油加醋，將她刻畫成一個不顧別人死活的妖魔，很多人看了這部影片也這樣詛咒她，包括一些民運領袖和理論家。

【39】據常勁修訂補充：20日晚他回到宿舍，第一次看見柴玲，在他的床上坐著同北師大的那位聯絡同學聊天。因為很累不記得那位北師大的同學為何來聯絡。

【40】此前他從佳木斯農業機械學院77級本科畢業。關於丁小平主持籌委會最初的會議情形，還可參見《回顧與反思》第7、22頁常勁與封從德的發言及熊焱「六四口述實錄」。熊焱認為丁小平的問題是「不能做出決定，只是表達觀點」，但較有政治觀念，「他一開始就發現其中有野心家，有搗鬼的。所以呢，他為了牢牢的掌握領導權，所以一定要自己做頭」。

【41】如沈彤被改選下去後，柴玲就建議我為他安排去對話團工作。

【42】當時已有一個「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它的實體其實就是北大籌委會。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95頁説：「4月21日，北京15所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下設糾察部、聯絡部、信息部，辦公地點在北大28樓4樓。當日上午，各校都貼出了這個委員會的通告，通知當晚十點集合到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要求學生穿

球鞋，帶足水和幹糧，集隊前往天安門廣場，給第二天出殯的胡耀邦遺體送行。並要求有條件的學校要組織糾察隊，以防止壞人破壞，給政府鎮壓提供口實。」而北大28樓4樓正是北大籌委會所在地。據《70天大事記》第8頁，這15所院校主要是北大、人大和政法大學。此前，北大籌委會剛一成立，就發出《告北京高校書》，倡議「各高校能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選舉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驚心動魄的56天》第25頁）。許多資料説是吾爾開希宣佈臨時高聯成立的那個通告，但按他自己或她當時的女友劉燕還有沈彤、常勁的回憶，雖然那天他自封臨時高聯主席，卻根本就是個光桿司令（見法文《北京地震》第478-480頁和《回顧與反思》第60-61頁），如何聯絡全北京市的十萬大學生？實際上當時有聯絡能力的只有北大籌委會。張倫説「劉剛與王丹、吾爾開希發起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即後來的『北高聯』」(「男兒熱血向山河——記我的朋友劉剛」，《爭鳴》1991年7月號81頁），應屬想當然或以訛傳訛，見24日「成立全市高聯時機不成熟」一節的註。據常勁修訂補充：「四二一遊行由郭海峰主持安排，趙和我負責糾察隊，記得那時楊國忠已經加入，負責宣傳。當時好像沒有分籌委部長，由籌委兼職。記得我和趙兼職糾察部。那次肯定是由北大牽頭的聯合行動，由北大派聯絡員通知各校，具體誰負責通知我不記得了。我和趙組織了糾察隊，設計了一套糾察管理體系。」

【43】此前，下午四點一刻，天津『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100多學生抬著胡耀邦畫像和花圈，打著校旗和『支持北京及全國學生的正義行動』等橫幅進入天安門廣場（《70天大事記》第9頁）。這是外地學生赴京聲援的開始。

【44】他是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戒嚴後被「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任命為聯絡部長。

【45】直到2006年從周鋒鎖那裏才明白其中的原委：除了周鋒鎖和

張銘，清華籌委會的成員多是從原官方學生會和團委的，他們對出來領頭自然有所顧忌。

[46] 這個聯合行動委員會，也許就是昨日的「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見21日「第一次非官方大遊行」中的註）加上昨夜我聯繫到的各校組織者形成的臨時組織。

[47] 據説是吾爾開希「宣佈李鵬已答應將在十五分鐘內出來會見學生」。見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和八九北京學運》第123頁、《回顧與反思》第29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103頁註25則稱最初來源可能是一個記者，被學生誤聽誤用了。

[48] 張伯笠説一個北大研究生和吾爾開希提出要衝擊大會堂，被他勸阻。見《回顧與反思》第55頁。

[49] 官方資料説，「請願書」內容是王丹18日在人大會堂前提出的7條要求（如《驚心動魄的56天》第31頁），其實並非如此：（1）18日的7條要求並非主要是王丹提出的；（2）21日「請願書」的內容是北大籌委會審訂的，內容與18日的7條有所差異。官方資料一直在刻意放大王丹的作用、貶低或遮蔽學運組織的作用。

[50] 張伯笠説是他對郭海峰和吾爾開希建議下跪請願的，見《回顧與反思》第55頁及張伯笠《逃亡者》第8章及英文版第37頁。不過，張智勇在2008年回憶説，就在這天上午，他遇到一個軍官，是北京衛戍區的連長，偷偷告訴他：衛戍區的三個師都已佈置在大會堂附近。因此他提議下跪請願，以避免流血沖突，因為當時吾爾開希一直在喊同學們衝進大會堂。見張智勇「六四口述實錄」。

[51]《沁園春 · 詠石》：白玉一方，晶瑩無疵，圓潤生光。豈怡紅公子，命根惟系；梁山好漢，天道所行。烈火難融，狂風不倒！石中迸出美猴王。傳千古，有幾多寶庫，龍門雲岡！

誰言鐵石心腸？有熱血沸騰恨滿腔。任離合悲歡，不動聲色，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上補青天，下填滄海，焚身碎骨自剛強。了此願，亦不枉平生，悲夢一場！（此詞有很多

版本流傳，這是陳小雅寄給我的較佳的版本。）

【52】據常勁修訂補充：「四二二時趙體國、柴玲和我在一起，跪交請願書前我們都不知道前方發生了甚麼事，柴玲因為看不見封從德以為他被抓了，哭了起來，請同學們救救『我的丈夫封從德』。我們衝到前面，發現封並沒有被抓。軍警衝擊時我也在你的附近（和趙、柴一起），因為當時非常擁擠，我們糾察隊手拉手保持秩序。」

【53】1995年的媒體跟隨卡瑪的影片《天安門》造出柴玲「期待流血，而自己求生」的噱頭，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柴玲在4月22日極力避免流血所做的努力，是這一噱頭的有力反證。1991年巴黎會議上柴玲也有近似的回顧，可與她5月28日錄影敘述相印證。見《回顧與反思》第54頁。

【54】不久後，「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委員會決定採取新的策略」：一，北京高校總罷課，直至《七條》被接受；二，聯絡全國總罷課；三，宣傳聯絡社會各界罷工罷市。見於「北京外語學院出現未署名的《告同學書》」。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32頁。

【55】柴玲在巴黎會議上也提到這兩位中年人和他們傳授的經驗，尤其是秘書處，當時就建立了「接待處，檔案處，還有一個會議記錄處及新聞發布中心等等」。見《回顧與反思》第29-30頁。

【56】據報導，這天柴玲作為北大籌委會發言人對外宣佈無限期罷課，及與上海、南京等地學生代表討論全國罷課問題。記者們弄不清楚她名字的發音，記作蔡玲或蔡凌。見《香港時報》與《大公報》4月24日頭版引述「法新社北京23日電」，及《中國六四真相》第172頁引述的美聯社新聞。有些人說柴玲是「在運動後期才不知從甚麼地方冒了出來」，其實她在運動早期就是重要的學運骨幹之一。據常勁修訂：「似乎柴玲此時並沒有被任命為發言人，因為籌委們忙著開會，由柴玲負責發佈公告，可能因為此間柴玲向記者報告籌委會決議，

記者誤解為發言人。」

【57】彭嶸參加過此前歷次學運，包括1985年九一八遊行、87年元旦遊行、88年行動委員會等。見彭嶸「六四口述實錄」。

【58】據陳子明的妹妹回憶，4月23日他們給了王丹3000元活動經費。這筆錢我在北大籌委會完全不知情，直到15年後才從一些回憶中得知，如《黑手備忘錄》第471頁。郭海峰也沒對我提到這筆錢，很可能沒有入籌委會的帳，否則郭手中就不止三千了。

【59】張伯笠說他公開出來是因為我，誤將他的名字在三角地公佈了(《回顧與反思》第187頁)。這件事我倒記不得了，可能與陳育國的情況一樣。

【60】據沈彤回憶，《新聞導報》從一開始便獨立於籌委會，因此他得到很多直接捐給他個人的捐款，「因為廣播站在我們那邊，我得到的捐款比較多些。」這些捐款應該沒入籌委會的帳。他還說「籌委會五個成員都有比較多的捐款」，不知是指「籌委會五個常委」還是「奧林匹亞在籌委會的五個成員」，總之我個人在4月份從未接觸過捐款。見《回顧與反思》第66頁。

【61】王超華說請徐四民來辦報是她提議的，見《回顧與反思》第35頁。

【62】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第52-53頁記錄了陳明遠那天演講錄音的部分內容。

【63】關於陳明遠與北大籌委會的關係，可參見常勁「中國人的脊樑——記陳明遠先生在八九民運中」，《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5月29日。

【64】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回顧與反思》第68、220頁。

【65】陳小雅列舉了4月22-23日成立的幾個北京高校自治組織(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社會主義民主進步領導小組、人大學生自治會、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北京高校聯合會北化分會、中央民族學院民主愛國會)，但這些組織在23日都未成型，有

的只有一個人（師大），有的很快就解散了（清華），有的剛成立（人大），其他的則未見在後來發揮作用。見《八九民運史》第183頁。

【66】官方資料說王丹參加甚至領導了籌建北高聯的圓明園會議(如北京市團委《70天大事記》第11頁、國家教委《驚心動魄的56天》第36-37頁），這個說法流傳很廣，且得到吾爾開希和王丹本人回憶的加強。1993年六四時，王丹與吾爾開希做了一個對談並整理成文(《新聞自由導報》1993年6月4日、6月11日），二人繪聲繪色地回憶起他們一道參與圓明園會議的情形。然而，據召集會議的劉剛後來的回憶及他出示的與會者簽名影本，北大只有兩個並不代表籌委會的學生參加，一個是劉剛的同學黃海新，另一個是張智勇，而張當時應已被北大籌委會除名。其實，劉剛那天下午到北大請過王丹，王丹要求保證北大佔據多數席位才去參加，劉剛拒絕了王丹的要求並希望他遵守民主程序（劉剛「北高聯成立的前前後後」，《黑手備忘錄》第151-160頁）。從劉剛的回憶看，他沒在「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見21日「第一次非官方大遊行」中的註)的基礎上構建北高聯，而是通過私人關係找了20多個院校的學生到他的住處開會，成立了臨時高聯，推選周勇軍為主席。

【67】據王超華回憶，24日晚柴玲通過她一道去見了戴晴。見《回顧與反思》第37頁。

【68】後來知道，對話團的一位重要骨幹江棋生應該才是最大的，當時已經41歲。江棋生當時是人民大學的博士生。張伯笠說，王超華的丈夫是他在作家班的同班同學，見《中國之春》1994年6月號57頁。

【69】王超華說，文革時她曾與被關牛棚的「右派」父親「劃清界限」，後來得到父親的原諒。見毛麗「訪學運領袖王超華」，《爭鳴》1990年5月號。

【70】擴音設備是校方暗地支援提供的，見彭嶸「六四口述實錄」。

【71】熊焱回憶說，大會前，法律系一位女黨員博士生對他講「張智勇是研會派來的」。看來不排除反間計的可能。見熊焱「六四口述實錄」。

【72】2008年初對李進進的採訪中，李對這一點比較淡化。

【73】《香港經濟日報》25日3版記載籌委會關門會議是在下午四點半至七點半。也許我記錯時間，也許有兩次會議。

【74】備忘錄原記在23日晚，參考熊焱「六四口述實錄」改為24日晚。也許是將兩個晚上的會議記混了。熊焱清楚記得，在24日那個失敗的全校大會後，北大同學非但沒怪他衝動，反而推選他做籌委會召集人。據熊焱修訂，博士生李進進和王遲英那晚也加入了籌委會並主導了會議，但見原來的籌委還是佔多數，於是當晚就退出了。第二天王遲英參選成為五人常委之一，李進進則未參選。

【75】據熊焱和常勁修訂，實際情況應該是25日上午郭海峰宣佈籌委會全體籌委總辭，下午重新改選。彭嶸也記得籌委會總辭，見彭嶸「六四口述實錄」。

4. 五人常委制 (4.25-4.28)

4月25日　星期二

這一天最能確切記憶的，是下午改組籌委會的競選。接管籌委會實權的「協調委員會」在 24 日晚及 25 日上午作了些甚麼，已記不清，可能主要就是籌辦下午三點半開始的這個改組競選會。[76]

籌委會改組競選

競選會場設在文史樓104。等我進去時，能坐四十人的教室擠了七十來人，講臺兩邊都擠滿了。說是各系各班來的代表，但門口沒有檢查代表資格，也未查學生證，使此次競選的合法性有所缺憾。講臺上的青年講師和博士生是「協調 2 委員會」籌備選舉的委員，或請來的貴賓。他們首先講形勢、任務之類的開場白和支持的話，隨即宣佈開始競選。

競選程序是先提名，後演說，再投票。在座學生代表和前籌委會成員可毛遂自薦，也可提名他人。願意參選的人站到前面，用五分鐘發表競選演說，等所有參選者演說完，大家便用一張小紙條，各寫五個中意的人，最後唱票選出籌委會「五人常委會」。提名很快完成。然後是每人五分鐘的演講。結果兩個新成員高票當選，原先籌委會成員則有三人當選，但票數較低：我是 37 票，沈彤、王丹依次排在最後。[77]

競選演講的順序記不清了，下面是一些印象深刻的記憶。

王遲英、孔慶東、姬軍

這次競選最突出的一點是年齡與閱歷的提升，博士生與研究生參選的比例增大。博士生們醒悟到他們的責任，昨晚便熱烈地討論應該介入學運組織。但人隨年齡增長則鋭氣減少，博士生們的熱烈討論險些開成「老鼠會議」——大家都覺得應該給貓繫一個鈴鐺，當討論到由誰去繫時便全體沉默。幸好有個勇者王遲英，英文專業的博士生，出來參選。他説參選的動機「僅僅是覺得應該有人出來」。在以本科生佔多數的競選會上，他以簡單樸實的演講，贏得大家的信任，以第二高票當選。

獲票最多的是孔慶東。他演講提到的非凡經歷給人印象深刻。他是法律系85級學生，身為共產黨員卻領導過「擦鞋運動」——北大學生去人民大會堂前擺攤為「人民代表」擦鞋。【78】這是一個黑色幽默、無聲的抗議，官方卻無可奈何。這既反映出知識的貶值，又諷刺了官員借改革而發橫財的現實。孔慶東給人感覺既沉穩又富於鬥爭藝術，於是在64票中，以47最高票當選，自然也就成為籌委會第四任召集人。【79】

另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黨員也來自法律系，87級的姬軍。姬軍圓圓的頭，濃眉大眼，高大結實。無論從相貌、表情還是語氣，都給人以樸素、誠實的印象。這品質為他日後的行為所證實。但他似乎沒有甚麼輝煌的事蹟，又説領導學運與他的共產主義信仰沒有矛盾，相信同學們的舉動是對共產主義的促進而不是反動，是愛國的表現等。也許是他這番老實話使他以幾票之差未能當選，卻讓我特別尊重他，第二天我便委託他繼續組織《北大學生憲章》的起草工作。最後見到他是在六三夜間，他滿身是血地跑到廣場指揮部廣播站來，對我們講長安街上一個九歲小孩如何死在了他的懷裏。

八九民運有許多共產黨員的積極投入。與我們並肩戰鬥的黨員同學，就有熊焱、張伯笠、孔慶東、姬軍、李祿等，他們

開始並不反黨甚至是為共產黨好，投入運動是為尋求強國富民的真理。「六四」的血腥，不知道讓多少忠誠如姬軍的中共黨員失去了信仰，使他們從頭尋求民族的出路，終將把一黨專制徹底埋葬。

我的競選演講

我的演講比較特別，多是些不討人喜歡的實際話題。我著重闡述籌委會工作中遇到的兩點問題：一是民主與權威。近來參加籌委會工作的同學日益增加，「民主」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字眼，事無巨細都要開會投票決定，這種民主過於寬泛效率極低，導致許多緊迫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籌委會被批為「新官僚」。我提議，新選出的籌委會必須有緊急情況下的「獨裁權」。用這個字眼是為了提醒大家目前形勢緊迫，不能泛民主。我舉例說美國總統在戰爭時期具有比平常大的行政權，林肯甚至被指為「獨裁者」。這個觀點應該給在場同學很深的印象，無論贊同與否。[80]

第二點，近來籌委會有脫離運動主體的傾向。這是迫於無奈，每日花在開會的時間太多，與同學溝通的時間太少。這是一系列連鎖反應中的一環。關起門來組織運動的方式使我們消息閉塞，呼吸不到激動人心的空氣，摸不到運動的脈搏。於是我在演講中說：「要是我再當選，請給我每天兩個小時閱讀大字報、與同學們交談的時間！」北大三角地的大字報，是我精神的源泉，不僅吸收到中國最優秀分子熱情的滾滾才思，還在讀者如饑似渴的神情中感染到他們尋求真理的渴望，並獲取很好的建議。

沈彤與王丹的演講

「奧林匹亞」的周培勝提名沈彤，很起勁為他說話。[81]沈

形的競選演說大略歷數了他的業績，如「奧林匹亞科學院」、「新聞導報」、新聞發佈中心等，其自誇的言詞卻也贏得在場的人相當的敬佩。王丹卻一如平常風格，慢條斯理地講他的理想與追求。如果換一個時空，不在運動高潮中，大家也不認識他，王丹的演講大概無法感染多少人。結果當選的五人中，王丹得到的選票最少。【82】

丁小平、張智勇應該沒來參選；郭海峰大約這兩天受了不少批評，也沒有來；但楊濤為甚麼沒有當選，是否參加了競選，來沒來開會，我已記不清楚。常勁這天辭職走了，三天後回來。趙體國對籌委會一些人的作風不滿意，他的同屋隨著不甚歡迎籌委會，我們開會辦公都只好另找地方，自然也沒來開會。【83】

「特殊身份」的進修生

一個瘦高個子的參選，令我很是擔憂。此人自稱王振群，是「北大唯一特殊身份的進修生」，因此沒有同學，也不住在校內。大家都睜大了眼睛——這是不是臨時安排「進修」的便衣？王振群還向大家晃了一下藍色學生證（我們的都是紅色），其實國安要做個假證件易如反掌。我不記得他說了甚麼有內容的東西，身上帶有一絲掩藏不住的痞氣。但是，就這麼一個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人，竟然只差兩票就當選，這使我更加擔憂在場代表們的成分。若說王振群有甚麼特出之處，只有他堂皇的外表：一米九的高個兒，一身黑西裝和一頭油亮整潔的黑髮，十分帥氣。這作派騙騙小女生可能綽綽有餘，但在今天這個場合也沒有幾個女生呀。

王振群雖然落選，後來又在籌委會的幾個宿舍東奔西走，一會兒到聯絡部說他腿長，適合於聯絡；一會兒又到理論信息部說他頭腦清晰善於分析；最後乾脆到秘書處對柴玲吹噓他有整潔的習慣，最適合做機要秘書。總之，他對籌委會的一切工

作都有興趣且能勝任。他最終跑到我面前，我一面給予高度讚揚，一面請他做些看門之類的工作。這樣，他乾站了一會兒，便自覺地不見了。從此以後，這個一米九的帥哥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不止一個同學舉報他，說他就是昨日在臺下慫恿丁小平、張智勇上臺的那人，但在競選會時我並不知情。

《忌禁的遊戲》

這天晚上，我與柴玲就在28樓找了一個宿舍休息，我們好幾天都沒在一起了。這是一間普通的六人宿舍，柴玲還很精神，與宿舍中另三個同學說笑，要「忘了運動，過一下輕鬆的生活」。他們都是趙體國的同學，說這話的更是其好友。我與柴玲對趙體國都有特別的好感，自然也與這同學很友善。但我睏極了，一個人躲到一個上鋪去睡，那同學便拿了吉他，彈起沉靜而優美的古典獨奏曲，其中一首是我最喜愛的「愛的羅曼史」(Romance d'Amour)。這是一首西班牙民謠，後來在法國電影《忌禁的遊戲》（Jeux Interdits）中作主題曲，從此風靡世界，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成為古典吉他愛好者的入門曲。彈琴之前，他說他對籌委會很敬佩，自己沒起甚麼作用，希望能用吉他使我們輕鬆一下。我躺在床上，心中感動，在恬靜中閉上眼睛欣賞。等他彈完和柴玲走到我床邊時，柴玲地說「他太睏了。」他輕輕地回了一句：「他是幸福的人！」其實我還沒睡著，他這句話讓我很感動。【84】

4月26日　星期三

四二六社論與學生的遺書

上午遇見張伯笠，我才知道中共已將學運定性為「動

亂」。他說，昨晚七時的全國新聞聯播著了慌，把今天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前播了。張伯笠這時成了消息靈通人士，他背後有一大班作家，社會關係極廣。他說，黨內對學運的性質有嚴重分歧，今天「四二六社論」判定學運為動亂，是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等人竄掇李鵬、鄧小平扣的帽子，這群人準備向學生開刀了。言語之間，張伯笠的緊張情緒十分具有感染力。【85】

午飯的時刻柴玲找到我，在28樓一個陰暗的樓梯口，伏在我肩上哭。她聽到且確信鄧小平已在黨內說了「不怕流血」之類殺氣騰騰的話。更使她感到恐怖的是，她知道一些學生領袖，不光是北大的，已經躲藏起來甚至逃走了，許多人還寫了遺書。她說她也給父母留了遺書，要我也準備一份。我只是盡力安慰她，直到她止住眼淚，一道去食堂吃飯。我們多少天沒有一道安靜地吃頓飯了。

張倫初次見面介紹戴晴

下午，柴玲突然拉我出去，一位瘦臉長身的男生站在那兒等我們，然後我們就在電教附近溜達。他叫張倫，身著深藍西裝，顯得很精神，說話時身子微微前傾，給人一種殷切而誠懇的印象。那日他對我們略帶神秘地說了許多，內容已記不全了。只記得提到戴晴。戴晴要他傳遞消息，中央要對學生動手或軍隊已進北京之類，總之是要我們小心，不要白作犧牲。【86】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戴晴這個名字，因此印象較深。戴晴是《光明日報》記者，由於是葉劍英的養女，改革言行頗為大膽。【87】張倫提到她時，很神秘地看了我們一眼，似乎是說，你們相信吧，這是可靠消息！不知為何，我想起了王振群。張倫的誠懇雖不致於讓我擔心他的背景，但我也沒有完全信任，只是淡然地想：「運動至此，轟轟烈烈，明天幾十萬人上街，

軍隊抓誰去？」柴玲聽得比我仔細，表情隨張倫的語氣語調而變化。傾聽是她的長處，比我強多了。

張倫後來在 5 月底的廣場上又同我們在一起。由於他個頭高，便擔任糾察總長，調度廣場上的糾察隊。幹了四天，他的胃潰瘍犯了，悻悻地對我說「我絕不是幹這個的料，我只適合做參謀」，便離開了廣場。再見到他，已是一年後在巴黎了。【88】

五人常委否決四二七遊行

4月26日晚，北大籌委會按照民主機制，否決了五人常委關於四二七不遊行的決議，讓北大學生順利參加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偉大遊行，避免了一次歷史性的笑話，也使我看到民主機制的優越性。

事情經過有些曲折，這裏稍微詳細地回顧一下。

北大本來反對四二七遊行。北高聯在 25 日晚便通知北大籌委會準備四二七遊行。開始我們接受了，但同學們抱怨近日遊行太多，每次都去天安門，路途太遙遠；我們也感到加強校園民主更為緊迫，因此又希望北高聯進一步研究。王丹在北高聯沒起多大作用，北大與高聯意見相左時也不力爭。當時高聯設在北師大，王丹從高聯帶來的消息，要北大服從的多，聽取北大建議的少。當大家問王丹為何不把眾人的意見明白傳達高聯，他便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低頭垂眼輕輕一聲：「我給他們說了。」【89】

恰恰這時四二六社論出籠，北高聯開始動搖，北大同學反而要遊行了。這篇將學運定為動亂的社論，等於是中共給學生們扣上一頂帽子，在這頂帽子之下，甚麼罪名都可能加到同學頭上。於是，被激怒的同學們又轉而堅持要遊行示威。大家知道，此帽不揭將永無寧日。後來有人分析，每當學運漸趨平靜時，中共總有舉動來刺激學生做更劇烈的反應，實際上是中共

強硬派所施的激將法。無論如何，正是四二六社論促成了四二七這規模空前的大遊行。

但北大籌委會五人常委多數比較保守，反復討論後以三比二票否決了參加四二七遊行的計劃。孔慶東、沈彤和王遲英堅持認為，中共態度強硬，以不出校門為宜，這樣既避免流血衝突，又可保存同學們的體力。[90] 王丹與我則認為，四二六社論出籠後形勢已有根本變化，此前還可與官方協商妥協，現在這頂帽子扣下，雙方衝突已升級，目前首要任務是施加強大壓力摘下帽子，否則一切努力都將被此帽子掩蓋；而且目前同學們情緒高漲，只宜順流，不宜逆流。當時我的一個信條是：運動應該是大家推著組織者走，而不是由組織者拉著大家走，組織者最多快半步。

鄧小平已調 38 軍赴京

會上王丹還轉達了一個消息，說鄧小平已調來他的嫡系38軍駐紮在北京郊區（軍車車牌以「V06」打頭），大有兵臨城下之勢。而且，鄧小平還給部隊下了一道奇特的命令：帶上棉衣準備在京過冬。現在 4 月底剛脫下棉衣，要到 10 月底才用得上。看來老鄧防的不是學生，因為學生運動從來不出個把月。[91]

雖然五人常委多數否決了參加四二七遊行的計劃，但我認為是否出校遊行實屬重大問題，須擴大範圍，由各部委與各系分籌委會聯合的擴大會議來進行公決。於是，我極力推動26日晚按照民主程序召開擴大會議。

據我觀察，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北大三角地出現了許多措辭激烈的大字報，多數師生義憤填膺，準備第二天上街遊行。如果因一票之差而反對出校遊行，這必將對籌委會構成致命威脅。本來四二四大會的失敗，已使籌委會的威信嚴重下降，如果在目前高壓之下，籌委會再不能順應多數同學的熱情，帶領

大家頂住壓力奮起抗爭，那麼籌委會必將失去代表性。很可能的場面是：北大同學完全拋棄籌委會，自發上街遊行。這樣後果會非常嚴重，一是缺乏組織的遊行很可能混亂不堪；二是籌委會被同學拋棄將更無威信，學運便會群龍無首。

擴大會議推翻五人常委決定

出於這樣的憂慮，我把希望寄託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上。五人常委否決出校後，大家一片嘩然，雖不滿意，但誰也不知該怎麼辦。大家對籌委會的組織程序還不熟悉，我便走上講臺，對大家說：

「你們有聯名否決權！按籌委會的民主機制，1/3 部委與分籌委會聯署，即可將任何議案交由擴大會議決議；擴大會議 2/3 多數便可否決常委的決議。按今晚的情況，只要有 8 個部委或分籌委會聯名，即可提交擴大會議議決。」

聽我解釋完，當即有 11 個部委與分籌委會聯名。於是召開擴大會議，經半小時激烈辯論後，最終以大大超過2/3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五人常委的決議。

這晚的擴大會議我特別注意審查代表資格。這次會是在三教103教室開的。我派了糾察隊在門口逐個檢查代表資格，以免決議無效或引起爭論。到會的除了常委五人外，還有部委七、八人，各系分籌委會約十五人。另有二位天津代表列席，其中一位女同學名字很奇特，叫梅菊。後來五月下旬我到天津，還同她見過面。

北大同學能夠順利參加四二七大遊行，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勝利。這說明了民主程序較少數獨斷為優，保證了能容納多數人的智慧，因此在重大決策上犯致命性錯誤的可能性低很多。四二六擴大會議也證明，只要本著民主的精神，即使缺乏經驗，也能闖出一條民主的道路和制度。

行政與立法二權開始分離

經過一星期的民主實踐，此時的第四屆籌委會已摸索出一套經驗，「行政」與「立法」二權開始分開：前者由七、八個部委及十幾個分籌委會來執行決議，完成日常計劃；後者由5人常委集中處理日常工作議案，重大問題則加入部委與分籌委會組成的擴大會議表決。所謂重大問題，由五人常委中三人認定即可，或由分籌委會與部委1/3以上聯署認定。

這時的北大籌委會的部委，已有七八個。

秘書處：秘書長柴玲；

糾察隊：隊長趙體國；【92】

外聯部：部長孟昭強；【93】

宣傳部：部長楊國忠；

理論信息部：部長常勁、歐陽；【94】

新聞發佈中心：周培勝；【95】

後勤部：蔡健；

等等。【96】

但這時的行政與立法二權分離得並不徹底，界限很模糊，常委還是常常干涉部委的具體行動，直到五一改選被進一步提出了才有所改進。

智囊團與分籌委會

智囊團在這兩天的籌委會上是個重要議題。四二四大會失敗後，大家迫切感到必須提高學運組織的眼光與知識。一批博士生和青年教師擔心學生吃虧走彎路，便熱心為籌委會出謀劃策。他們多有妻室兒女，所以不願公開。我曾不慎在公佈籌委會名單時，將智囊團中陳育國老師的名字當做學生抄上貼在三角地，陳育國的學生立即將公告撕下，我事後還給陳育國寫了道歉函。智囊團在北大籌委會存在並不久，因為無法將他們一

齊請到一個地點開會，後來實際上是籌委會重要成員各憑渠道，找些長者做參謀。既有三顧茅廬被動出謀劃策的，也有主動上門出主意的。

分籌委會有兩種情況，有原官方系學生會經改造後承認籌委會領導地位的，也有獨立於原系學生會新成立的。大約是姬軍領導的法律系學生會首先宣佈接受籌委會領導。四二二罷課後，彭嶸積極組織成立各系分籌委會，郭海峰在24日之後也投入此項工作。因此，在26日晚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便有15個左右的分籌委會派代表參加。

《北大學生憲章》的起草工作在法律系姬軍等人接手後，又提出得先起草《選舉法》。似有兩班人馬在做，後來移交給經濟學院的李明奇等人接手。這之後我只與其中主管的一兩人保持聯繫，基本上沒有介入他們的工作。

4月27日　星期四　晴

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

清晨六點半我被廣播吵醒。到28樓433，準備七點鐘與同學們集隊出校遊行。樓內樓外漸漸有人拉起五彩繽紛的旗幟和標語、橫幅，像是過節，又像是歡送上前線的隊伍。

但是，我卻不准去領隊遊行！這事來得突然。七點鐘，當我做好準備正要下樓時，孔慶東和沈彤出現在樓道中。孔慶東沉著臉對我說，他不同意我參加遊行，要我留校「坐鎮」。沈彤也附合了幾句，這時王邇英也過來了。我心裏又急又氣，知道這是他們不滿我昨晚啟動擴大會議否決常委的決議，也就是他們三人的意見，於是阻止我出校門。只要我不在，出校後隊伍由他們帶領，以王丹的性格也難以堅持獨自領同學們到廣場。

見我抗議，孔慶東便起用組織程序說，現在五個常委有四人在，可以開個常委會，討論封從德是否應該參加遊行。我盯著王遲英逼問他的態度，王遲英支吾了兩聲，不置可否。他總是這樣，似乎永遠沒有自己明確的見解，在籌委會裏幾乎沒聽過他提甚麼建議，哪種意見佔上風，他就附議。結果，我的申辯自然是徒勞。既然參加了組織，就得按組織程序辦事，我不再說甚麼，老老實實到28樓240宿舍廣播站，眼瞅著同學們浩浩蕩蕩在喜慶中衝出校門。[97]

孔慶東、沈彤等人的過度憂慮，可能同北高聯主席周勇軍的舉動有關。[98]面臨與軍警衝突的可能，周勇軍在當局的壓力下，終於承受不住，在27日凌晨連續派遣了幾十個聯絡員，到各校傳達他的「手諭」：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要求各校取消27日的遊行。[99]但這些舉動已無濟於事。學運組織不似共產黨那樣嚴密，並沒有「全黨服從中央」之類的紀律和體系，自發性、群眾性色彩更強，難以做到令行禁止。結果，四二七大遊行有百萬市民與學生上街，衝破了軍警一道道防線，成就了1949年後最大的一次反官方示威遊行。

後來聽許多同學講，這次籌委會的表現很不如人意。原來，隊伍一出校門，便在中關村遭遇警察攔截，孔慶東等人拼命要同學們返校，同學們當然無法接受。途中他們又屢次勸說同學們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學觀察仔細，發現官方學生會也從中作梗，派了他們的人馬，裝做積極的模樣扯開大旗，走在了隊伍的前列，但在該帶隊衝鋒時，他們卻要捲了旗幟回校。

但是，那一日，我全然不知這一切。我在空蕩蕩的北大，緊張而憂慮地守住籌委會廣播站的一間空屋，直到晚上同學們返校，才迎來一派喜慶。[100]

《我的民主宣言》

眼巴巴看著同學們拉起大旗轟轟烈烈走出校門，我呆坐在

28樓240，這裏是籌委會的廣播站。我仔細檢查過全部器材，然後枯坐空屋，寸步不離。無聊之中，請同學為我從圖書館借來《美國的政府與政治》，坐在屋裏翻閱。內心感動，於是提筆寫下《我的民主宣言》。

文中，我先問這場運動的目的，我們究竟要求甚麼。然後分析當今社會「百姓怕官又恨官」的現象，這樣的「官」終將為人民所拋棄。但是仇恨與暴力不能解決社會制度的根本問題，冤冤相報只是問題的輪迴，因此我還寄望於朝野合作。文中寫道：中國人民最善良又最講道理，他們會原諒那些犯過錯的公僕，只要向人民把問題交代清楚，原諒似乎是眼下最好的辦法。但我們要的不只這些，我們要的是一個嶄新的制度，來保證以往的過失不再重複。人民絕不是想推翻、打倒，而是想結束這種循環了幾千年的問題。最後，我引用熊焱的話：「我們並不是要讓一批飽鬼下臺，又讓一批餓鬼上臺，人民需要的是打鬼的武器，使共和國永遠不再有鬼！」

三千字一氣呵成，好像心中有股激流，使我下筆絲毫沒有乾涸與停頓。這是一種時代的感悟。想到昨日柴玲悲切的聲音，我在標題之下加了個題註：「僅獻給養育我23年的父母」，隱含此文也有遺書的性質，雖然我其實並不相信事態有那麼嚴重。寫完此文，我心安多了。找了漿糊，到樓下尋一不甚醒目處，仔細貼上。我只希望有那麼一兩個細心的讀者，能看出我心中的感動。這篇文章影響力果然很小，但我卻敝帚自珍，它淺白地說出了我想說的話。[101]

迎接遊行隊伍凱旋返校

籌委會的通訊員陸續回來匯報遊行盛況。我打開廣播，追蹤著遊行隊伍的行程：[102]〔圖 24〕

「北大隊伍在甘家口衝破了警察的第N道防線！」

「遊行隊伍已到西單！」



〔圖24〕1989年4月27日，軍警阻攔遊行隊伍的方陣，與4月22日學生們用來阻攔軍警衝擊的方陣幾乎一樣。

「今日上街遊行的市民比學生多得多，總共至少一百萬！」

「打頭陣的是人大隊伍，北大在中間。下午兩點人大隊伍經過建國門，北大隊伍到建國門時已經三點過了！」

沒有與警察衝突傷亡的報告，他們見學生隊伍一來，臨到跟前，虛晃一招便自行閃開。

下午五點後，越來越多的同學傳來各式各樣令人興奮的消息，28樓下也零零星星地聚集了一些留校的同學。騎自行車參加遊行的同學或乘車的同學先回來，沉寂的校園逐漸熱鬧起來。官方沒對遊行隊伍動手，兩天來籠罩在北京上空的烏雲似乎一掃而空，校園裏喜氣洋洋。【103】

我以北大籌委會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校長辦公室，讓一個同學送去。信中請求校方照顧遊行返校的同學，延長今晚食堂和澡堂的開放時間，並希望派校車去接女同學。沒想到校方

很快就答應了，指示食堂和澡堂，只要還有一個同學剛回來，就不關門。

晚九時許，遊行隊伍的主體正式返回學校。廣播站有國歌和國際歌的磁帶，等同學們整齊的方陣向28樓走來時，我用最大的音量，反復播送這兩首激昂的進行曲。【104】樓下的隊伍宛如軍隊得勝凱旋歸來，無比驕傲地通過三角地，然後才在一片歡呼聲中散去，各自回宿舍，取了飯盒和衣物，奔向食堂或澡堂。

學三食堂應華江與女友分手

晚上十點過，當我和柴玲拿著飯盒到學三食堂時，已經快沒東西吃了。郭海峰憑藉他與伙房師傅的私交，給我們十來個人下了一鍋方便麵。他還搞了點啤酒，要與我們一道慶祝今日的勝利。這幾天，他雖然顯得消沉一點，但好動的天性和青春活力使他克服了這些陰影，照常有說有笑，依然故我。自24日後，他被安排去同彭嶸一道做分籌委的工作，不致使他從高位上退下後無事可做，他也十分坦然的接受了這種變遷，比丁小平的狀況好很多。

在飯堂內，柴玲讓我回頭看遠處的一對，我認出那男同學是應華江，籌委會後勤部的。「他的女朋友要和他分手了」，柴玲幽幽地說。果然，那邊兩人起身靜默了一會兒，一個朝南，一個朝北，緩慢而沉重地走各自的路。時代的激流，形成許多漩渦，兩人平常不易覺察的差別，這時便得經受考驗，那怕細小的差異，也可能漸行漸遠，甚至勞燕分飛。

應華江是籌委會初期開會時，由於場面過於激烈雜亂，所選出的協調人之一。在他之前第一個協調人是謝劍。應華江中等的個子，略瘦的身材，說話熱切而諧趣，眼睛似乎常微虛著，讓人感到一種謙卑的微笑和善意。

4月28日　星期五

這日的記憶不甚清晰，可能時間順序有問題。與學生會最大的衝突應該就在這一天。

罷課不罷學

24日早晨，我見彭嶸在三角地率一隊帶紅袖章的糾察隊，提著喇叭向那些肩著書包，奔向教室的同學宣傳罷課的意義，希望大家團結一致。但效果並不顯著，中途退回的似乎不多。於是，彭嶸他們又想出絕招，將全校各教室的出席情況查個遍，然後在三角地公佈。這很有說服力，既讓罷課同學感到驕傲，又讓少數沒罷課的班級感到慚愧和壓力。這幾乎等於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指為學賊了。

這一辦法很有效，公佈兩天之後，幾乎所有的班級都參加了罷課。然而，北大即是中國最高學府，好學上進的同學自然不在少數，運動並非每個同學都須參加，自然要為這麼多同學找個出路，才不致於在校園中產生對立、反感的情緒。罷課是向政府施壓的手段，同學們如果還能堅持學習，於國於民都有好處。於是，我便在籌委會上提出了「罷課不罷學」的口號，在廣播站上廣為宣傳。結果，北大教室空了，圖書館自習室卻是滿的。

辦公地點成為問題

四二二罷課後，北大籌委會機構迅速擴大，辦公地點逐漸成為問題。運動規模越來越大，看來不會在短期內結束，我們總不能老是用常勁、趙體國他們的宿舍作為開會辦公的地點，而他們的同屋因為他倆對籌委會的某些人和事的反感，也逐漸對籌委會不太合作。寢室是他們的生活空間，籌委會不能要求

他們繼續犧牲。

籌委會本想遷到第三教學樓，因為罷課後這裏應該是座空樓。但當我們進到三教一間教室正準備開會時，上課鈴響了，一個中山裝走上了講臺。能容六十人的教室內，只有兩個學生。那老師似乎在宣告：只要還有一個同學，就要把課講下去。有人想勸說那老師，卻被數落了一番：你們這群毛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懂科學救國的大道，現在我可要教訓你們尊重別人的自由。這讓我們無可奈何，我上前向中山裝道歉，讓大家尋別處開會去了。

不過我們見到，三教十幾米高的牆壁上，寫了兩個巨大的黑字「罷課」，每個字都有一米多大。它們分明是用墨汁寫成的，我既吃驚同學們是用了何等絕技懸在空中寫成，又感嘆這場運動有千百個熱情的勇士暗中扶持。

彭嶸佔用學生會房間

在學生宿舍開會辦公不是長久之計，到教室樓又碰釘子，於是彭嶸提出「借用」原學生會的辦公室。校學生會在37樓，是學生宿舍區的中心地帶，他們的辦公室幾乎佔去半層樓，約有十個房間。

彭嶸的道理是：「我們才真正代表北大學生，官方學生會辦公室幹嘛不能用？！」話雖這麼說，雖然全校大會上投了官方學生會不信任票，但我們也只是處於籌備階段，並沒有法定程序上的依據說明北大學生由籌委會代表。因此也沒有足夠的道理要求校方將原來給學生會的資金、財產轉讓給籌委會。這是我們將來的目標，卻不能是現在的要求。我傾向於有理有節，一步一步地達到我們的目標，只要人心向著籌委會，我們就能堅持實現我們「校園民主」的目標。依我的意思，籌委會不須理會官方學生會的存在，只要堅持自治就好。

然而事實證明，彭嶸的衝闖似乎是合宜的。共產黨只認實

力，而規則、程序、道理，在他們面前則顯得迂腐。彭嶸不管這一套，只是依循籌委會的實際需要和心中的正氣，藉著學生運動大好形勢的壓力，硬是從學生會那裏借了一間辦公室。但衝突也隨之而來。

自行車棚下的秘書處

這天早上，秘書處柴玲等人興冲冲地抱著各式文件袋，跟著彭嶸搬到 37 樓 106 室。過了一會卻有人來報，那邊出問題了，彭嶸與學生會的人要打起來了，我便匆匆趕去。只見秘書們抱著紙袋站在門外，彭嶸在屋裏與兩個人爭吵。

「你們有甚麼權利佔用學生會的房間？！」

「我給你們學生會主席曹 XX 説過，他同意了，鑰匙是他給的。」

「平常是我們管這個房間，曹XX怎麼也沒有給我們講？」

「那你們找他來問。」

「我們才不去呢，要找你們去，房間是我們的，你們得出去！」

那兩個學生會的人嘴雖硬，氣勢卻不足，見我們這邊人多，有點發慌。過一會兒口稱有事，便去找幫手去了。

我讓秘書處不要立刻搬進來，而是抬了桌子，在 37 樓外的自行車棚下安紮，當空掛塊大紙牌寫著「北大籌委會秘書處」。我準備以退為進，待問題解決後才大大方方地搬進去。柴玲也十分領會我的用意，在車棚下領著一班人熱熱鬧鬧地開張了。籌委會是北大多數學生支持的，有了甚麼困難，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將問題暴露出來，在多數同學的壓力下，學生會自然會讓步。

「佔房風波」圓滿解決

彭嶸則覺得跟這班「學賊」沒甚麼理可講。他又將學生會

辦公室的鎖撬開，彭嶸還想進去，我阻止了。不一會兒，四五個學生會的人趕來。他們的模樣打扮不像學生，更像是地痞，卻罵我們是強盜入室搶劫。彭嶸與他們高聲爭辯。言語間，我瞭解到裏面還有道暗間，叫甚麼「星星髮屋」，我心裏有了底，知道這幫人為甚麼火大。原來他們假公濟私，用學生會公房開私店，髮屋收入是他們的外快。這內情同髮屋裏的黴氣一樣見不得光。

等蠟黃臉發洩一陣之後，我報上姓名，以籌委會的名義向他道歉，承認不應當撬門。為省去日後的麻煩，我請他們當場清點室內財物。他們看了看，承認一物不缺，但堅持要我們走人。這下輪到我們還擊了。我突然問：

「您能把學生證給我看一下嗎？」

蠟黃臉一愣，迴避我的目光，然後又氣粗地說：「你有甚麼權力查我的學生證？」我既已料定他怕曝光，就更緊追不捨，只是用了更平和的聲音：「我是沒有權力查，但我們不知道你是誰。你既然說這房間是你們的，我們無意間弄開了門，準備到三角地貼張道歉書，也得知道向誰道歉，你說是吧？」

這下子蠟黃臉慌了，連忙掏出學生證，又說不必寫道歉書，更不要將此事讓全校知道。我仔細端詳學生證，上面的名字是黃XX。我將學生證還給他，這些人急忙灰溜溜地走了。

與官方學生會的關係問題

「佔房風波」只是籌委會與官方學生會的關係問題的一個方面。與官方學生會的關係，一直是籌委會討論的一個問題。起初，我們想是沒有關係，而是分兩步走，第一步領導運動，第二步選舉學生自治會。但隨著運動的擴大，絕大多數同學支持我們，籌委會實際上已取代了學生會、研會的作用，就不可能沒有關係了。這時自然有同學在籌委會上認為校方給學生會的資金、辦公室等財產也應該給籌委會，甚至由籌委會接管；

廣播站有學生會專用的時間，也應該分配給籌委會用。

其實，學運組織與官方機構的衝突早就開始，也不僅限於北大。約在23日左右，聽說清華、人大的同學已佔領了學校廣播站，但後來又被校方收回。北大籌委會也試圖佔領過校廣播站，過程幾乎與上述風波一樣，彭嶸不管三七二十一，帶一批糾察徑直去了廣播站。具體情形我則不清楚，但最終沒能佔領校廣播站。

另外，原官方學生會成員也應該吸收。雖然學生會是官方的傀儡，但許多學生幹部人品並不壞，且相當有能力，籌委會應該主動吸收這批人參加運動。籌委會並未組織過「清算」學生會，但許多同學自發地揭露他們不可告人之處。其實，恰恰是那些參加過學生會或其活動的同學，才更清楚它不代表同學利益。如在三角地貼出《一個平凡的故事》的三個作者（馬學禮、楊通學等人，八八年「行動委員會」的組織者），就以親身經歷加廣泛調查，揭露了學生會選舉時的作弊現象與黨團力量的暗中操縱。解決「佔房風波」後不久，我看到兩張大字報，揭露黃XX利用學生會公房營利謀私，和諷刺學生會主席曹XX，語氣似他過去的一個相知，勸他識時務，不要做傀儡。我很擔憂這樣的大字報，可能將他們推向籌委會的對立面，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前途更加貼近官方阻撓學運。

也有原學生會幹部試圖加入籌委會。這天我正在29樓奔忙，研會新任秘書長蕭X來找我。去年底研會拿我們托福班的錢招待研會幹部，就是蕭X代表研會出席，那時他得意非常。如今蕭X找到我，客氣又謙卑，表示希望到籌委會工作。我知道他有才能，也不懷疑他的動機，很歡迎他來籌委會。結果他只是看了看，之後也沒見他來。不過，北大研究生會還是比學生會開明，四二七大遊行後，便將其在29樓的辦公室交給了籌委會作辦公基地。最有意義的是4月29日，其監委會按法定程序舉行投票罷免研會主席團，委任籌委會中的研究生為臨時主席團成員。這出乎意料地解決了籌委會研究生成員的合法性問

題。我不知道蕭X是不是起了作用。

自治會合法化的理論問題

在北大籌委會成立之初，經我提議和大家的贊同，我們確定了學運的兩個目標，即校園民主的兩個方面：成立學生自治會和辦一份獨立的校園報刊。其實質就是獨立於中共的領導，爭取校園內的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具體操作起來，其核心就是一條：爭取運動中自發成立的學生自治會的合法化，為此我又提出「兩步走」：先領導運動，後進行直選。這也是多數同學對籌委會的期望，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沒真正分這兩步來走，而是將這兩步混為一談。

混淆「兩步」區別的最常見錯誤，就是簡單化地將籌委會視為正式選舉產生的機構，而不願下苦功夫籌備嚴格意義上的直選。四二四大會的失敗，就是這種簡單化想法的體現。沒經過正當的程序，就將籌委會過渡為學生自治會，很容易被當局以種種名義否定和解散。在高壓之下，我們拿不出憑據證明我們的合法性，最終只得轉入地下，甚至解散。如此一來，運動將沒有連續性，以後新同學便一點也見不到過去奮鬥的影子。相反，如能舉行全校同學參加的直選，有大多數同學支持的記錄，運動才可能保存一個自治學生會，以後有甚麼活動都可以凝聚起力量，名正言順地同官方據理力爭了；辦一份民辦報刊的目標，也可以由這個自治組織來支撐。

但是，「兩步走」還有許多理論問題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是如何才算「合法」？要想運動後還能保存自治組織，就得讓官方承認或默許它是合法的。但這「法」從的大方面看，官方堅持《憲法》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本一條是堅持黨的領導，那麼，學生自治組織中要不要受校黨委領導？若接受黨領導，又怎麼與自治、與憲法中賦予公民的自由相容？從小的方面看，《十條》規定遊行必須申請得到批准，且不得在天安門

廣場等「國家重要地帶」遊行。這樣的法我們依不依？若依，實際上便是我們希望的遊行不可能得到批准，而能批准的遊行絕不是我們希望的方式。

這便是在國人看來，八九民運合理合法；而中共則每每聲稱我們為「非法組織」、「非法遊行」的道理。只要「四項基本原則」還在憲法中，便不可能「合法」地進行針對政府的遊行示威或成立組織。要迫使政府讓步，就必須走出校門，藉助社會的同情與支持。但這樣一來，政府則總有藉口指其違法，因為《憲法》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法」是由黨來解釋的，任何與政府有衝突的言行便是違法。【105】

實際上，當時我們作為學生沒法解決這些理論問題，就是知識分子也完全沒有提供任何關於學生自治會合法化的理論依託。我曾組織過「運動務虛會」，請青年教師和學生一起專門討論理論問題，討論運動發展方向，但一討論便是國際、國內形勢一大套，注意力並不集中在運動的實際需要上。那時的我們，包括大多數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對共產黨還抱有幻想，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官方的認可，至少在校園內搞「校園民主」建設而不被政府稱為「非法」。因此，我們的言行還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一旦有人喊了過激口號，大家都不贊同。

推動直選合法化

4月28日中午例會上，我竭力主張儘快進行全校直選，以使學生自治會名副其實地合法化。按我的設想，直選並不困難，只須再次召開全校學生大會，由糾察隊當場發選票；全校學生共一萬四，需70隻紙口袋作投票箱，每隻容納200張選票。大會程序也很簡單，在選票上加一項「是否同意罷免原學生會」，就看完成對原學生會的不信任投票，這樣學生自治會便有了合法基礎。在此基礎上當場進行競選演說，然後當場投票、點票和唱票，且當場公佈新當選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委的

名單。

在我推動下，籌委會通過了30日舉行全校直選，並發出通告，請有意參選的同學到籌委會報名。關於候選人資格，籌委會內部有過激烈辯論。許多人認為不能讓原來的學生會幹部參選，擔心官方學生會將有組織地控制選舉；也有同學堅決主張對候選人不作任何限制。我建議的折衷方案得到通過，即不限制參選，但候選人必須在報名及演說時，申明自己的政治背景，譬如是否黨員、是否學生會幹部等，這樣使同學心中有數，由他們來裁決。若施政綱領能得多數的贊同，即使參選人是黨員或原學生會幹部，也理應當選；而新的自治會有民主機制的保障，如果當選幹部日後違背初衷，做出違背同學利益的事，也能彈劾、罷免他。只要能保證新自治會的民主機制，我們不應害怕任何同學參選。

可惜當時大家的熱情還沉醉在罷課、遊行、上街募款、開會等熱鬧場面上，真正支持配合直選計劃的同學不多，報名參加競選的也很少。這時的糾察隊，由於趙體國的辭職，也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我奔波了兩天，最後籌委會還是決定延遲直選計劃，目前仍以推動運動發展為主。這一拖延，以後便再沒機會來組織選舉了。

直選計劃沒能完成，還有一些客觀原因。法律系同學說，要搞選舉須先制定《選舉法》和《北大學生憲章》，這樣才有一個完善的組織程序，這些都遲遲沒能拿出一個草案來，與我推動的直選計劃無法配合。另一方面，也許大家覺得籌委會在25日才作了新的選舉，如果再搞一個直選，感覺和重選一個新籌委會沒有實質差別，沒意識到直選的重要性，反認為多此一舉。我雖一直擔憂25日選出的第四屆籌委會的代表性，卻不能在籌委會上公開質疑，更不可能得到孔慶東、王遲英他們的贊同。因此，在遇到種種障礙後，我精疲力竭，只得作罷，空留遺憾。

註：

---

[76] 按當時的廣泛報道，王丹參加了上午在政法大學舉行的北京臨時高聯的記者會。不過，王丹應該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去的，當時北大籌委會全體總辭，並在當天下午進行了改選。另外，這天清華差點獨自與官方「對話」，但被清華籌委會中的周鋒鎖和張銘這兩個非官方學生會成員阻止了。見周鋒鎖「六四口述實錄」。

[77] 彭嶸、熊焱也有參選但未選上(見彭嶸「六四口述實錄」、熊焱修訂)；常勁、王有才參加了競選會議，但沒參與競選(見二人修訂)。常勁修訂補充道：「25日前我一直同趙體國一起負責糾察部。理論信息部是28日的事。24日五四廣場大會由我和趙負責糾察。當時我們對匆匆決定開大會非常不滿，因為籌委會隨便一個決定，具體工作最後還是要我們來做。當時組織糾察和各系學生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大會失敗後，我和趙非常失望，相約辭職。我24日下午貼出辭職公告，不再參加籌委會議，所以不記得熊焱當召集人的事。25日聽説郭海峰宣佈籌委會全體籌委總辭，中午封從德找到我説要召開各系代表大會選舉新的籌委，但不知道哪裏冒出來的代表，要我去參加以防壞人控制會場。下午選舉時我在場，但沒有出來競選。我好像投了封從德、王丹和沈彤的票，趙體國應該也在場，我們可能還拉了幾個地球系的代表。」

[78] 據張倫講，這次「擦鞋運動」是劉剛組織的，「為中國的教育籌集資金」。見《爭鳴》1991年7月號80頁。

[79] 前面三任是丁小平、郭海峰和熊焱。「六四」後孔慶東到內蒙古教了幾年中學，後考回北大獲文學博士。1998年起以一本《47樓207》火爆登場，人稱「北大醉俠」，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但他隨後的變化頗令人吃驚，如吹捧北韓統治者金正日，並稱專制不一定不好；2007年章詒和的書遭禁後，孔公開貶斥章詒和等等。

【80】緊急情況「獨裁權」的提法值得商榷，但當時確有改善籌委會效率的必要。我以此作為競選訴求，大家也竟然認可，讓我當選，說明北大同學對民主有深刻的認識。較之北師大自治會，北大籌委會的「獨裁權」還是太少，效率也不如師大高。當然，師大吾爾開希一人獨大的局面，對師大自治會的正常發展有哪些負面影響，北大與師大二校的模式哪個更適合當時的需要，尚值得研究。提出「獨裁權」，與我當時正在參閱《美國的民主與政府》一書有關，當中我得知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期，有臨時行使近於獨裁的變通作法。當然他在戰爭結束後便還政於民，這也是我為甚麼堅持運動結束後籌委會成員不得參加自治學生會的競選的原因之一。

【81】沈彤在回憶錄中說，是王丹問他要不要參選，結果在大家的催促下才不太情願地參選的，最後他和王丹得票相同(37票)，但王丹被排在第四沈彤排在最後(“*Almost a Revolution*”，第192-193 頁)。這與我的記憶有些差異。

【82】王丹在1995出品的影片《天安門》中說：「籌委會曾經幾次作出努力,就是希望能夠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選出自己的領導，但是後來事態的發展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緊湊，就沒有能夠把我們的這個設想逐步地推向實現。」這個評斷雖有一定道理，但掩蓋了一些基本事實，其傾向也有問題。實際上4月25和5月1日的改選雖不完美，但在各系代表基礎上的選舉還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4月29日，北大研究生會選舉籌委會中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會臨時主席團成員，完全按照既定章程經過嚴格程序作出的，也使這些成員完全合法化（見4月30日「北大研會成功改選」一節）。王丹幾次改選選票都很低，5月1日還差點落選（和沈彤等票，但沈不在場而落選），又非研究生，故有近乎官方口徑的否認籌委會合法性的奇怪傾向。

【83】常勁其實是離開了兩天，他修訂補充說明了那兩天的經歷：25日辭職後，「傍晚得到消息政府要對學運定性，我在地球

系團委辦公室睡了一晚，系團委書記、一個教授和我的同學們勸我出去躲一躲，我於是26日一早離開北大校園，去了我的一個親戚家，説明情況，在她那裏躲到27日。27日，遊行隊伍從她家門口路過，我產生背叛同學們的內疚感，於是於傍晚趕回學校，知道了27日的勝利。此間我有時間靜下心對學運的前途仔細思考。28日早上遇到封從德（好像我的室友已經把籌委會趕走了，但封從德和柴玲是受歡迎的，封常在那裏休息，可能是去我宿舍拿遺留的材料），我向封從德講述了我的幾點看法」，與封不謀而合，於是接掌理論信息部。

[84] 常勁告訴我，那晚我住的就是他的宿舍，那位彈吉他的同學叫陳東勝，追求自由和浪漫，幾年後在一次滑翔中失事身亡。我記不得為甚麼這晚沒注意到「四二六社論」的播出，實際上北大籌委會很快有了反應。「21時20分……『社論』播完後，北京大學『籌委會』在三角地『徵求意見』。有的學生説：『社論徹底否定了學生運動，要採取強硬措施了。』」「23時，北京大學自治會籌委會在北大第一教學樓召開記者招待會，孔慶東主持，宣佈：『籌委會聲明不反黨，不違反憲法，是為了推進民主進程。』並提出復課的三個條件：（1）同政府對話；（2）正確解釋『4.20事件』；（3）要求新聞立法。」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44頁。又見《八九民運史》第148頁，只是那三條是在晚上八點半在廣播站就宣佈了；另外，當天晚上還有七千北京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抗議這篇社論。

[85]「四二六社論」是按鄧小平在25日上午的講話（《驚心動魄的56天》第42頁），乘著趙紫陽不在北京，由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組織，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執筆起草的。這篇社論的一個藉口是西安、長沙在22日已經發生「打砸搶燒的動亂」，但有大量證據顯示那是官方刻意安排和製造的，據香港《華僑日報》24日2版報導，現場竟然有人「高呼打倒鄧小平」，顯然是故意做給鄧小平看以使他下

決心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喊打倒鄧小平在當時環境很不尋常。關於22日西安的真實情況，尤其是官方故意製造警民衝突導致一些市民和同學被打傷的情況，可參考六四檔案網站上的當時西安學運骨幹王磊的「六四口述實錄」。「四二六社論」出籠前，23日趙紫陽離開北京赴朝鮮訪問，李鵬等人在24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次日上午去鄧家匯報由鄧拍板。據楊繼繩記錄的趙紫陽回憶，「4月25日鄧同李鵬等的講話本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傳達」，並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鄧對李鵬大面積傳達他的講話很不滿意。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臺也很不滿意。」(《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602-603頁）。

【86】後來張倫否認介紹的是戴晴。據《黑手備忘錄》介紹，張倫是陳子明、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成員，他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在北大為該所網羅人才。劉剛、邵江、王丹等人就是張倫物色的。據張倫回憶，他和同學的接觸最早見的是柴玲，是在4月23日下午，而在24日下午六點又與我和柴玲「秘密地談了一個多小時」(《回顧與反思》第231頁)。但我記得第一次見張倫是在4月26日。

【87】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戴晴曾在中央軍委總參三所從事情報翻譯工作。總參三所是中共軍隊專門收集軍事情報的機構。戴晴因此常被指為「國安部的特務」，真實情況大概只有中共情報部門和戴晴自己清楚。

【88】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張倫已不是學生。那時他已在陳子明、王軍濤的社經所裏幹了一年。他是北大社會學系畢業的研究生，此前「上過中專，讀過大學經濟系」(《黑手備忘錄》第574頁)。廣場上我也不知道張倫任糾察總長實際上是王軍濤主持的聯席會議任命的，隨後離開廣場其實是在戒嚴當天就安

排好的逃亡計劃的一部分。

【89】外界有些誤解認為北大籌委會不服從北高聯領導。其實北大籌委會的主要顧慮是北高聯並非構建在各校自治會基礎上，其形成不合民主程序，因此對其代表性和正當性都有疑問，擔心其決定並無民意基礎。但一般而言北大還是服從高聯的，後來更派我去加強高聯。

【90】其實背後另有原因：沈彤和孔慶東那時與官方聯繫並有協議，但沒向籌委會講明。詳見27日「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一節的註。

【91】實際上，鄧小平早在4月20日下午即已下令調集38軍赴京，見20日「冒雨遊行」一節的註。其實，這個消息在23日中午已在人民大學的大字報中洩漏，見《中國六四真相》第169頁。

【92】糾察隊由趙體國總負責，常勁、彭嶸、熊焱也參與過管理。

【93】後由王有才、李海接任。

【94】這時分管理論信息部的可能還是我，後來交給常勁和歐陽。據常勁修訂補充，他在25日辭職，27日回來，「28日早上遇到封從德，向封講述了我的幾點看法：1. 學運定位應該是民主啟蒙運動；2. 應儘快完成自治會的普選使其在法理上合法化；3. 應該將爭取政府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作為這次運動的主要目標；4. 學生自治走出第一步，可通過學運的啟蒙和宣傳將自治的概念擴散到民眾中，推動實現民間自治。封從德覺得我講的同他想的一樣，提議我負責理論信息部。我接手後立即找了地球系的幾個同學負責收集三角地的各種信息，每天記錄整理後給我看，又找到幾個寫大字報內容比較好的學生組成寫作班子(其中包括李海和高興旗，李海寫了一個比較文革和學運的大字報，寫得很有深度，被我邀請加入籌委會，高和我一起起草了對話十二條，還有一個叫金聖元的，後來一直在宣傳部寫作班子裏)。我還找到中文系博士生馬相武給我出謀劃策，馬在4月19日發表過講演，給

我印象深刻。另外還有『教育研究社』的宋玉成、顧洪祥負責聯繫知識分子，顧同陳明遠也有聯繫。當時因為怕牽連知識分子，我們都是單線聯繫。」

【95】實際上有兩個新聞中心：沈彤等人的和王丹等人的，時常有些摩擦。這二人對見記者有極大興趣且常不守紀律，這是二人被籌委會邊緣化的重要原因。王丹、楊濤的新聞中心與秘書處的新聞發佈中心可能就是一回事。

【96】這個名單不全，應該還有財務部等，但我已記不清了。

【97】沈彤沒在回憶錄中提到阻止我出校，反而說我與王丹和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甚至繪聲繪色地描述途中我們的討論。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203-204頁。

【98】還有別的原因。直到1991年巴黎會議上沈彤才講了背後的原因：孔慶東和沈彤那時常與官方聯繫並有協議：「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建議北大籌委會不要遊行。這是一個條件，如果北大不遊行，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將以正式的方式幫助學生和政府之間搭橋。」但他們當時一直沒把背後的原因講出來，大家只知道他們常去校黨辦，有的同學甚至憂慮他們出賣學運，但更多是不喜歡他們的黑箱操作。實際上26日晚沈彤與孔慶東並沒有遵守擴大會議關於27日出校遊行的決議，而是暗自「作了許多準備」、「第三次與校方及團委接觸，商量時，提出搞校園靜坐」，凌晨還與師大吾爾開希(他也受到校方壓力）約好五大院校都不出校門，這些動作都是背著籌委會的。另外，周勇軍也說吾爾開希那晚「也曾提不出校遊行的建議」(《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8頁)，而馬少方等高聯常委也持類似意見。27日晨孔慶東要去廣播站宣佈取消遊行被楊濤阻止，於是又與沈彤試圖配合官方學生會半路將隊伍帶回，也沒成功(《回顧與反思》第63、65頁)。由此可見，至少政法、師大和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首領，都受到校方不同程度的壓力，且皆有與校方妥協的舉動，但最終沒能阻止同學們遊行。由此也可看出，八九學運其自發的成分比組織的

成分大得多。

【99】據香港記者記述，周勇軍是27日凌晨「在校方團委的陪同下，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簽發不遊行的信，並乘政法大學團委的車，逐間高校去送信，送到天亮。」見《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7頁。

【100】27日中午，就在同學們出校遊行不久，官方發言人袁木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但委託的是官方學聯安排對話。見28日香港《華僑日報》2版、《天天日報》5版。官方資料也提到袁木的表態(《驚心動魄的56天》第51頁、《70天大事記》第18頁)，但《中國六四真相》則說是在28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的，見該書第229頁。

【101】後來「六四檔案」收集了許多原始資料，但這篇文章一直沒有找到。

【102】四二七大遊行中打出了「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這類口號。其實，這些口號從26日臨時高聯成立時，周勇軍宣佈的「第一號令」中就有(《驚心動魄的56天》第47頁、《70天大事記》第15-16頁、《八九民運史》第153頁)。據馬少方回憶，這樣的口號是他建議的，見「歷史鞭打現實」，《「六四」參加者回憶錄》第101頁。

【103】據《驚心動魄的56天》記載，「20時許，北京大學28樓『籌委會廣播站』讓西單民主牆參加者、刑滿釋放分子任畹町發表廣播演講，題為《北京悼念胡耀邦為甚麼會爆發新的人民民主運動——論中國社會體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任在講話中大肆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見該書第51頁。我對此倒是沒有太深印象。

【104】國歌和國際歌的磁帶可能是王丹與楊濤的廣播站留下的，他們4月22日在廣場上就播放過，見《回顧與反思》第29、55頁。八九學運中的歌曲幾乎全是共產黨的，如《義勇軍進行曲》(國歌)、《國際歌》、《血染的風采》等。在黨文化的籠罩下，我們沒有選擇。不過，同學們還是有所創造性地

加以利用，因為所選的這些歌，確實也符合當時救亡圖存、反抗奴役及英雄主義的心理。只不過當時我們自然尚不知這幾種心態，也是黨文化之結果，對五四也全然如共產黨教育的那樣，呈無批判的接受態度，且以五四運動的繼承人自居。不過也存在覺悟者，周鋒鎖後來在「學運之聲」廣播站就曾禁止播放國際歌，見其「六四口述實錄」。

【105】其實，這個問題在非暴力理論中早已得到解決，可惜當時沒有在中國知識界流行。按照非暴力理論，非暴力的不服從首先就是進行「有意識的違法行為」，也就是公民抗命不服從惡法、公然挑戰惡法，最終達到迫使政府廢除或修改惡法的目的。實際上，當時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劉同蘇曾在1989年5月16日撰文「論非暴力的不服從」，其中就闡明了這一點。見《北京之春》第158期47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八九民運最重要的原則，但非暴力理論顯然尚未深入人心。

5. 主持北高聯 (4.29-5.6)

4月29日 星期六

從這天開始，我作為北大代表，參加北高聯的七人常委會。

北大籌委會從四二七大遊行之後，規定了中午十二點和晚上十二點開兩次例會，而從現在開始，我便要每天騎車半小時到北師大，參加北高聯總部下午七點的例會。

王超華要求我主持高聯

本來，王丹一直在北高聯代表北大，但北大籌委會總感到王丹沒有足夠的影響力申張北大觀點，尤其當北大與高聯有分歧時。許多次，王丹從高聯趕回北大，大家問起籌委會的建議是否在高聯通過時，王丹只是輕輕一聲「我提了，他們不聽。」故在王超華的提議下，北大籌委會選派我作北大籌委會駐北高聯代表。[106] 自從23日晚同我相見後，超華便很積極地列席北大籌委會的會議。她適時提出一些好建議，很得大家的欽佩。後來她便參加了北高聯，作為七人常委之一代表社科院。

王超華實際上是希望我去做主席主持高聯。周勇軍由於四二七前夕的違規表現，28日便被高聯罷免，由吾爾開希接任主席。當時七常委院校是：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北航、政法大學和社科院。超華對開希也不滿意，在推薦我去高聯

後，她對我講有意支持我做高聯主席，這樣北大就可領導這次學運，她認為北大籌委會在組織上最為堅固、最為完善。[107]

我隨超華騎車來到師大西北樓時，天還沒有黑。西北樓三樓中央活動室，是師大學生自治會所在地，也是高聯的基地。上屆主席周勇軍所在的政法大學離師大不遠，第二屆主席又在北師大，因此高聯就設在師大。北師大搞得有聲有色，我們一進校園宿舍區，便聽見廣播站一個女同學唸學運文稿，聲音高昂而振奮。沒想到三個星期後，這位女播音員成了廣場廣播站的中堅分子。

高聯開會情況

在西北樓活動室等了十幾分鐘，有人來説會場改在物理樓104教室，於是室內三十來人跟著去那裏，開今日的例會。

這時高聯開大會的情況，同一週前北大籌委會幾乎沒差別——沒有各校代表的資格審查，只憑學生證便能進入會場，有發言權和投票權；沒有會議秘書準備議題；沒人記錄會議要點與決議；沒有明確的議程，發言隨性之所至，往往前後兩個發言人的內容完全無關，有的人一講起來便滔滔不絕，聽者又似聽非聽，心裏盤算著隨之要發言的內容。總之，會場的氣氛激烈有餘，效率卻極低。北大自發摸索出來的民主程序和開會經驗，看來得在此重來一遍。

吾爾開希抵制袁木「對話會」

吾爾開希首先發言，介紹下午「對話」他拒絕入場的經過。[108]下午一時「對話會」在官方的全國學聯會議室召開，吾爾開希要求以北高聯身份發言被拒，只能列席旁聽，便憤然退出會場。出到大門口，已有許多記者圍在那裏，他當眾揭露這次「對話會」是個騙局。他在會前四小時才接到通知，時間倉促，無法準備。

這次由官方學聯安排的「對話會」，[109]官方主要代表是臭名昭著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級別顯然太低，學生希望至少是政治局常委；北京16所高校代表也由官方學生會選派，等於是導演好的「對白」。而且，這次「對話」根本不平等，學生一方被臨時通知，毫無準備；學生發言受到嚴格限制，每校只許發言一次，而且必需是提問形式，由袁木等人解答，幾乎就是「新聞發佈會」。

吾爾開希激昂地介紹完抵制情況後，接著主持例會。他宣佈臨時高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十個字，很好記，」他一字一頓地唸這十個字。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開希一人在講臺上，時而滔滔不絕講一大通，時而拿粉筆在黑板上寫幾個字，時而又走下講臺聽同學發言，上上下下不停走動。同學發言才講幾句他便截斷，趕緊接上回答，似乎是他的個人答辯會。不知為何，這時的開希與一週前大不相同，我到海外後看4月22日的圖片，才恍然大悟他就是大會堂前的那個小夥子。兩個開希的差距實在驚人。

大約八點半，吾爾開希稱有事，把會場交給周勇軍主持，[110]便同王丹等三人先行離開。我們當時並不知道，王丹與開希實際上是去香格里拉飯店開「個人記者招待會」去了。

高聯的代表性問題

這晚討論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各校自治會和北高聯合法化、如何籌備與官方真正的對話、如何選舉對話代表等問題上。周勇軍顯得很嚴肅，不多說話，會場的發言激烈而混亂。經兩個多小時激辯後，形成兩個決議：一是通告全國，不承認今日下午的「對話會」；二是由全市各高校選拔對話代表。會後我問周勇軍，兩項決議如何落實，他才臨時召集常委討論，最後決定由我轉告北大負責通告。

會上有個人引起我的注意。他自稱姓劉，是北京科技大學

的。然而，幾天前我在北大籌委會見過，當時他卻自稱北大學生，希望參加籌委會工作，尤其想列席籌委會例會。他說話環顧左右而言他，不像學生。許多同學希望我像對王振群一樣將他打發走，我試了幾次，他總有藉口要留在籌委會門外，說「這是我的自由」。我問他要學生證，他說沒帶。沒想到今天在北高聯碰見，這人竟跑來參加決定學運方向的會議。他有發言權甚至表決權，東拉西扯地講了一通。這使我越發擔憂高聯的代表性。

成立三個關鍵部門

我在會上根據北大籌委會的組織經驗，建議高聯立即成立三個關鍵部門：秘書處、聯絡部和宣傳部。這對高聯現階段最為緊要。秘書處可幫助七人常委安排會議、起草文書等工作；聯絡部是鑒於高聯這時是全市50多所高校的鬆散協調組織，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聯絡網；宣傳部的角色比較複雜，兼有戰略研究和政策推廣的作用，待日還可細分。【111】

我又提議各校捐款，因為這些機構都需要錢，如宣傳部總得買印刷機、紙張、油墨等。我代表北大首先捐出兩百元，是柴玲給我的私房錢，後來應該回北大報銷了。當時還規定北高聯財務由主席直接掌管，由於開希不在，就由周勇軍接收。當場拿出的現款不多，總共只有三、四百元，許多學校表示日後一定補交。【112】

王治新在4月底至5月下旬擔任高聯秘書長。他工作細心認真，總是帶個夾子作會議記錄、發通知等等。

散會後，王超華與我一同回校。她對我今晚在大會上的發言很失望，本來希望我能沉得住氣，顯出一種能作領袖的沉穩。其實，我並沒有足夠的信心去領導這場運動，此前就沒接受做北大籌委會的召集人。在我認為正確而大家又多意識不到時，用激烈的方式表達意見是我的風格，我不必為了作主席而

失去這種風格。我到高聯來，就是為了加強北大的影響力，我需要以此方式傳達北大籌委會的聲音。

「個人記者招待會」

回到北大後，繼續到籌委會開十二點的例會。會上，王丹介紹了他與吾爾開希在香格里拉開「個人記者招待會」，並講有便衣跟蹤他們。王丹的做法受到籌委會一些同學的批評，因為籌委會已經立過規矩：常委不得以個人身份見記者。【113】

那晚在文史樓101，北大籌委會舉辦了一次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柴玲對我盛讚楊濤主持與答問時的機智。後來我一直不明白，王丹與楊濤這對搭檔，為何那晚各自分開辦了個記者會？尤其是王丹與開希只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何就懂得要辦和如何辦「個人記者會」？不過，當時這些疑問也就是一絲掠過，沒有多想。

4月30日 星期日

北大研會成功改選

我推動全校學生直選的努力沒有成功，卻沒料到官方研究生會走到了前頭。上午，北大研會監委會貼出公告，宣佈79%的選票同意「罷免研會主席團」，98%同意「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會臨時主席團成員」。這個公告的內容是：【114】

> 根據校研究生會章程修正案第XXXX條的有關規定，校研究生會監委會委員17人聯名提議，於1989年4月29日19時30分召開了監委會。到會監委認為：上屆研究生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這次學運中猶豫不決，領導不

> 力，引起廣大同學的不滿。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舍一張，共304張。上午9時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244人。投票結果，同意罷免主席團的為241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的贊成票299張。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12小時內（從上午10點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關事項。

這樣，籌委會中的研究生領導學運的身份便完全合法了，這包括熊焱、王遲英、王有才、郭海峰和我等。研會的改選完全按官方認可的章程作出，但移交工作並未落實，因為校方並不承認，原研會主席團仗著校方的支持，自然不會讓權。當時我一天三個例會在兩校間奔忙，其他同學也沒甚注意，這事就此不了了之。其實，如果當時好好加以利用，可能會發展出一套值得推廣的模式。

王丹、開希任「掛名常委」

4月30日晚的北高聯例會，依然在北師大物理樓104召開。高聯例會前，還有一個常委會。這晚記憶較清晰的事如下：

一、王丹、開希以安全理由請求留任北高聯，作「掛名常委」。

開常委會時，吾爾開希和王丹顯得很緊張，說昨晚在香格里拉飯店開個人記者會後，中共便衣盯上他們的汽車，若不是幾個香港記者掩護，可能已被抓走。因此他們希望不再到高聯開會，但希望繼續留任，這樣可以利用高聯的組織而起某種保護作用，使中共不敢輕易下手。我理解這種在脫離組織孤立無援的恐懼感，也認為高聯有責任保護他們的安全，參加者在投

身時便決定了冒風險，組織也應該利用群體的力量來保護帶頭人，儘可能減低他們可能受到的傷害。由於我到北高聯替代了王丹的常委資格，因此在會上盡力為王丹的請求說話，結果大家決定他們可作為「掛名常委」。[115]

開希躲得很深，他從自己宿舍搬走，藏到一個同學的宿舍，一般人都不知他在何處，這幾天的常委會和例會也不來參加。周勇軍代理他主持會議。[116]

我當選高聯第三任主席

二、我當選北高聯第三任主席。

王丹和開希成為「掛名常委」，其他常委認為有必要撤換主席。王超華提名我為主席候選人，經八個常委簡單的投票選舉，我當選北高聯第三任主席。八個常委是因為這之前新增選了兩個，高聯形成九人常委制，而開希沒來，因此為八人。後來，梁二接替開希擔任師大駐高聯常委。新增加的兩個常委院校，是中央美術學院（趙少若）和中央民族學院（石翁）。美院代表北京八大藝術院校，這些院校認為應有一個常委席位給他們；[117]加上民族學院，則是從團結眾少數民族同學上考慮的。

由常委會選舉主席符合當時的情況。因為例會上的各校派來的代表流動性較大，對北高聯的主要人物也不熟悉，而常委則對高聯人事比較清楚。

因為我來是代表北大，且有提高北大在高聯的影響力，我就沒有推辭了北高聯主席一職。我之所以當選，除超華竭力推薦和大家對她的尊重與信任外，大概大家覺得還是由北大來領導運動較合適。另外，可能也同我在這幾天給大家的強勢印象有關。我懷著整頓和充實高聯的心情來這裏，因此顯得比較積極，希望高聯能夠健全組織，真正起到領導學運的作用。因此，我提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由於有北大籌委會的工作經

驗，我對高聯的許多毛病能講出些道理，提出許多在一些組織經驗較少的同學看來很新鮮的建議。我既充滿了自信，大家也就會覺得我既果斷又熱情可以信賴。這實際上掩蓋了我性格缺陷的一面。【118】

接任主席之後，我向周勇軍問起北高聯的財務問題。他說錢不多，也就是29日各校捐的那三百多元，都用到宣傳部購買設備紙張上了。

各校自治會合法化的情況

三、討論各校學生自治會合法化的問題。

在例會前的常委會上，幾個常委院校介紹了各自學生自治會的情況。清華是下層堅固上層鬆散，以班為單位，選出了班代表（名額以班大小而分配），參加全校的學生代表大會，因此他們的決策機構是學生代表大會，有二三百人之多。而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代表大會，則是按宿舍派代表，這辦法適合規模較小的學校。政法大學則直接改選了原學生會的領導班子，換上積極參加學運的活躍分子，以學生會作為學運核心，更是合法化了。我介紹了北大研究生會按章合法改選的情況。北大的研會改組了主席團，換為籌委會中的研究生，使籌委會部分合法化。

隨後的高聯例會，有幾十個院校代表參加。我將這些學校合法化自治組織的情況，簡單向大會幾十所高校代表介紹，使大家有個借鑑和啟示。

例會上還有三個天津代表列席，他們都是南開大學的。其中一位口才極好，不客氣地批評北高聯組織鬆散、戰略幼稚。當時的高聯會場確實缺少章法，氣氛熱烈有餘而冷靜分析不足，天津同學這麼說，大家都面有愧色。雖然對客人的自負頗不滿意，難以接受他那套「遠大的戰略」，大家還是有所反省，對他也保持客氣。

我主張分批復課

四、討論復課問題。

是否復課一直是這幾天高聯會議的焦點問題，但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不同的學校面臨的復課壓力也不同。規模較小的學校自治會的力量也較單薄，校方施加的壓力較大，因此比較希望早些復課。理工科學校課程的連貫性較強，少上一次課就不一定跟得上，少做一次實驗就無法補；而文科的課程則缺一次無大妨礙。因此，清華雖與北大規模相當，卻極主張儘快復課。

我主張分批復課，先部分復課再分期復課：堅持不下去的中小規模的和理工科學校首先復課，作為與官方對話的一種積極姿態；北大、師大、人大等較大的、文科成分重的學校，則可堅持罷課，保持對官方的壓力，以後視情況再復課。

對話代表按比例分配

五、討論對話代表的分配問題。

在組成對話團時，採用了比例代表制。我主張按學校規模大小不同，分級分配對話名額：小於三千人的學校選一名對話代表；三千至八千人的兩名；八千以上的三名。這個提案得到通過。兩天後，地質大學的代表到北大籌委會提出，願讓一個名額給北大，他們認為北大學生論辯才能好而名額卻太少。

比例代表制也是我對高聯常委名額的一個設想。當時高聯有點像聯合國，無論學校規模大小，代表都是一名，投票時都是一票。七常委學校則像安理會，作日常事物的處理與決策，但重要問題還是提交大會討論表決。這樣一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便被眾多小型學校的利益所掩蓋了，並不能代表最大多數同學的意願。因此我感覺有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必要，可惜後來一直沒能推行。

決定舉行新聞發佈會

六、決定舉行新聞發佈會。

這項任務交給北大去籌辦。我負責督促北大籌委會作一切準備工作。回到北大開完籌委會例會後，我找到新聞發佈中心的周培勝，他答應安排第二天的新聞發佈會。我又請他找趙體國帶一兩百糾察隊維持現場後，便找了一個宿舍休息去了。北高聯的宣傳稿中，有一封寫給聯合國的英文信，我讀了一遍，然後就睡了。

5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的記者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幕後卻有點小波瀾。

安排北高聯新聞發佈會

一覺醒來已七點半了。我有些不放心。周培勝通知的開會時間是八點半，地點開始說在圖書館東門，後又改為一教101 教室。我來到一教時已快八點了，門還鎖著。我有點急了，趕快返回28樓找到周培勝。他剛起身，輕描淡寫地說了聲「我不幹了」，一付無動於衷的樣子。見周培勝是靠不住了，我急忙去找趙體國。體國一副不滿意的樣子，說喊不動糾察隊的兄弟們。這下可把我真氣壞了，因為我們關係一向很好，而體國又一向是很負責的人。這時離預定的開會時間只剩十幾分鐘，我沒法再找別人，因此對他動起火來。這招果然見效，趙體國答應去叫人。即便答應，還是顯得很不痛快。

事後趙體國當眾對我道歉並說明理由，原來是對周培勝有意見。周輕易地要他帶二百糾察隊維持秩序，他說不行，周乾脆撂挑子。在趙體國心目中，講義氣最重要，不願「為了這點

屁事，就動用這麼多人」。他關心所有參加運動的人，視人為最重要，不把他們視為造勢的手段。體國對某些人借記者會出風頭甚為鄙視，但這次卻搞錯了。為了避嫌，高聯專門設立發言人，選聲音清晰洪亮的同學擔任；我作為高聯主席則側身人群中，外界幾乎都不知道。會後體國真誠地向我道歉，不該因為個人意見而放棄責任。[119]

我讓人到一教前面守著，通知來人會場改到圖書館東門。但東門地形不好，二三百人圍在那裏，許多人擠到臺階下，有的記者又在前面支起攝像機，場面很混亂。[120]見趙體國帶著糾察隊已在那裏，我靈機一動，見不遠處是二體的籃球場，四周有很高的鐵絲網，只有一道小門可以進去。我請趙體國他們搬張桌子和幾個凳子放在裏面，並將小門把好，除記者外先不放任何人進去。然後我回到圖書館東門，宣佈會場改到籃球場，立即得到一陣噓聲，那些擠到前面找好角度的人非常不滿。我站在前面一動不動，堅持換場地。見我這麼堅決，許多本來角度不好、在後面的人趕忙向二體籃球場奔去，於是人群才都跟了過去。

發言人宣讀九項聲明

北高聯的人已經來了，我請他們到中央的木桌附近。高聯設立了發言人，宣讀了九項聲明：[121]

1. 北高聯聲明

2. 北高聯對話要求草案

3. 聲明

4. 北高聯致各階層領導、各界人士書

5. 致香港同胞書

6. 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的公開信

7. 北高聯致全國高校同胞書

8. 留美學生致國內同學的公開信

9. 北大籌委會聲明不承認四二九對話會

英文稿的致聯合國公開信臨時取消了，因為有同學認為不宜用英文發表宣言。但因為這是中外記者招待會，到會的外國記者也有好幾十人，取消英文宣言其實有些可惜。港台和國內記者也有幾十個，總共有約百名記者到會，旁聽的學生約有三千人。

北高聯的對話要求

北高聯對話要求是在北大七條基礎上修改增補而成的：

1. 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對胡耀邦同志突然離職作出公開解釋；

2. 重新公正評價、報導這次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動，成立專門調查組，調查此次學運始末；

3. 維護憲法，追究侵權行為，懲處四二〇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4. 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康華問題；

5. 儘快修改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公開向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徐四民先生發出赴大陸辦私人報紙的請求；

6. 糾正十年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佈政協三個調查組對北京市五所高校教育經費的調查報告，並繼續派出調查組，調查中學情況，公佈調查結果；

7.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由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政府提供一切必需資料，分析去年通貨膨脹原因。

北高聯的新七條，實際上是作為學生對話提綱而準備的，其中第二條是針對「四二六社論」而新加的，其他條目中也加進一些明確的內容。如官倒問題，提到「康華公司」這個全國公認的最大官倒企業。經濟問題，則提出由政協組織調查八八

年的通貨膨脹；教育問題，提到政協的一次調查結果；新聞自由，明確要求一個政協委員來辦一份私人報刊。從最初的「請願七條」至此，學生的要求成熟多了，也明確多了，不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涉及到人人關心的一些具體而重大的問題。

這樣明確的要求，自然使中共高層疑心學生背後有「黑手」。袁木這幾天含沙射影地說，要揪出學生背後「長鬍子的人」。他暗示，「長鬍子的」知識分子與學生接觸，需冒「學運幕後黑手」的危險，而受到「秋後算帳」。

郭海峰為參加假對話辯護

記者會後，高聯常委加上郭海峰等人，在燕南園邊一條小路上聚會。記得是討論北高聯遷址北大的事，但後來為何沒馬上遷到北大來，則記不清了。【122】

郭海峰在三角地貼了一張大字報，為自己參加29日的「對話會」辯護。昨天，有人指責他在官方「對話會」上的發言水平太差，並指他出風頭，不能代表北大同學，甚至提出質疑，為甚麼與他一道去的另三個是官方學生會的，而不是籌委會的代表。郭海峰詳細說明了參加「對話會」的經過，他是在會前四小時才得到官方通知，來不及同籌委會商量。【123】

孔慶東、沈彤想選掉王丹

自從四二五選出第四屆北大籌委會以來，經過一週的發展，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大家都希望在「五四」之前調整領導班子，以適應「五四」期間的重大活動。

五一中午例會後，孔慶東在29樓外拉住我，對我講他有意將王丹選下去，希望我在晚上例會上支持他。我沒有說甚麼，只是靜靜地聽，心裏暗暗吃驚。過了一會兒，沈彤也對我做類似的表示，我感到是籌委會換屆的時侯了。

請熊焱「出山」

我決心請熊焱復出，因為今晚將選拔北大對話代表。熊焱的口才和熱情，我認為是組織對話團的不二人選。自從四二四大會上喊了聲「張智勇是奸細」後，熊焱便無奈地離開了籌委會，但許多人還記著他。雖然一週沒見到他，但我相信他不會閑著，一定是在家修煉了。

果不其然，當我下午到蔚秀園去找他時，發現他的心依然一直在學運上。我剛進單元門，就聽見他那熟悉的聲音興奮地叫住我：「老封！你可來了！」他奔過來，笑咪咪地看著我，又急切地拉住我的手，使勁地握。「一個星期了，我就知道你會來找我。」

我隨他下到地下室，進了他那八平米的家。熊焱抓起一張足足兩米長的計算機紙，給我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字。「這一星期我可沒有閑著，老封，」他對我解釋說，「我準備辦一份報紙！你看，這是……」他的熱情感染著我，覺得生命中也被註入一種強勁的力量。運動中正是無數這樣的力量，支持著我們不知疲倦地為一個共同的理想奮鬥。我沒講明來意。這時既沒有必要，又不忍心打斷他高昂的情緒。我只是靜靜地隨著他的手指，聽著、看著，心裏卻和他話外的精神相融合，這是怎樣一種快樂！

看完這張才華橫溢的「報紙」，我才說明請他「出山」籌組對話團重回籌委會的意圖，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高聯常委會形勢分析

五一高聯常委會由我主持。大家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分出有利與不利的因素。對學運有利的有十來條。除當前學運情勢在全國高漲外，還有幾個重大的紀念日，如「五四」70週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和建國40週年，加上戈爾巴喬夫5月15日訪華、5月4日亞洲銀行會議在北京召開、近年來

世界各國的民主化浪潮（如蘇聯、波蘭、匈牙利、南韓、台灣、菲律賓、緬甸、南非等），甚至最近日本的利庫路特賄賂案醜聞也被中國百姓與「官倒」聯繫起來，這些都是對政府有壓力而對學運有利的事情。不利條件也列出好幾條，但總的看來，形勢對學生運動相當有利，因此我們決心將運動堅持下去，爭取在民主化上得到實質的進展。開希和王丹既為「掛名常委」，高聯會議就沒出席。

這晚的高聯例會也由我主持。會前我叫人查代表們的學生證，有的學校來了不只一個代表，我們就按學校在前幾排安排座位，一校一位，而將列席旁聽的安排在後面。雖然暫時有些耽擱，但避免了以後的紛爭。1990年7月我在美國俄亥俄州參加全美學自聯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發現他們也用這種辦法解決類似問題。大會上我首先請大家討論議程，將議程明確下來，然後一項一項地討論，因此這次例會開得較順利，不到兩小時就討論完了。我介紹了常委會的形勢分析讓大家討論，以明確今後的方向。無論是否堅持罷課，大家都對運動充滿信心，準備堅持到勝利。

設定對話團相對獨立

大會還討論了對話團的建制。大家認為對話團應與高聯相對獨立，這樣才能加速對話。既然官方不承認高聯的合法性，若官方與高聯對話，便承認了它的合法性，這可能是當局遲遲不對話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對話代表由各校選舉產生，對話團專司與官方對話，而不帶任何政治色彩，這樣官方便沒有理由拖延了。對話團和北高聯相對獨立，算是高聯對政府作出的策略性讓步。【124】

大會還交流了各校選舉、改換代表的情況，並討論了紀念「五四」的計劃。由於後者沒有足夠成熟的意見，我做出下面的決定後便宣佈散會：

1. 明日高聯例會休會，各校集中精力搞好自身建設，各校代表回去後為下列兩件事作準備。

2. 5 月 3 日下午二點開大會，確定五四紀念方案。

3. 5 月 3 日下午四點，各校對話代表來此組成對話代表團。

柴玲父親來看我們

這晚回到北大後，我感覺得為籌委會改選作些準備。柴玲叫我同她一道回家，原來她父親已在29樓外面等了很久了。我無論如何得離開籌委會了，於是叫了趙體國與我們一道走。

柴玲的父親很重感情，柴玲對他很敬重也很牽掛。他實在惦念結婚不到一年的我們，於是借出差的機會來北京看我們，本想在五一這幾天聚一聚，沒想到我們已經捲入學運很深了。他已來北京兩天了，我除了在學校時匆忙中與他見過一面外，一直沒時間陪陪他。這晚柴玲來叫我，說父親在樓外轉悠了兩個小時，她眼眶都有點紅了。他實在放心不下我們，便脫下軍裝換了便服來學校看我們。他是個非常謹慎的人，見到我只說是「到學校來看看情況，聽聽學生的廣播。」對運動不作任何評價。他非常開明，曾對柴玲說：「你們青年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們這一代已經老了。」

選拔對話代表引發改選

柴玲與父親在前面慢慢走，趙體國和我跟在後面。我對趙體國講了孔慶東和沈彤找我的情況，也詳細講了改選籌委會的想法。他對五人常委的工作同樣不滿意，雖然不怎麼說話，但我清楚他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們都感到孔慶東、王遲英的領導能力偏弱，沈彤與官方的關係則很曖昧，為了提高組織效率、迎接五四的大規模活動，籌委會有必要改選。這是一個

光明磊落講義氣的漢子，我相信他一定會使改選行得公正。後來趙體國在籌委會上的非凡表現，更使我驚嘆他的深謀遠慮。

沒想到這晚北大例會引發改選的，卻是因為選拔對話代表。北大有三個對話代表名額，籌委會推舉由熊焱、沈彤與我參加，但我主張由熊焱負責專門的選拔。（因此第二天熊焱便在三角地搭臺舉辦演説競賽，當場由聽眾選舉對話代表。這本是最好的辦法，但不知何故沒能奏效。）這時，孔慶東自薦作對話代表，但他説話有點結巴，表達意見時觀點不鮮明，缺乏個性，甚至有點官腔，因此大家反對。孔慶東堅持説他有語言才能，大家便開始批評他，認為他缺乏領導能力。在一陣難堪中，他收回了想做對話代表的意思。

見大家開始批評起領導班子，我用新當選高聯主席為由提出辭去北大籌委會常委職務，我在兩校間來回跑也實在太累。大家吃了一驚，紛紛挽留我。這時，我對這屆籌委會的組織結構作了批評，希望五四期間由能力更強的人來領導籌委會。接著，我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五二五改選大會的代表性有問題，為此我舉了王振群的例子。籌委會中凡見過這個人的，幾乎都認為他是便衣，但他那次卻險些當選。我認為缺乏代表資格審查是一個嚴重問題，它是近來籌委會脱離基層的一個重要根源，又為日後留下了隱患。

趙體國的批評和方案

接著，趙體國激烈批評五人常委會獨攬大權，常委會不僅制定方針策略，還實際上指揮各部委，亂下命令，讓這些部長難以正常工作。他對此的改進意見立刻得到通過，即由各部部長與分籌委組成聯席會議，行使從常委會分離出來的行政權，及對常委的監督權即罷免、撤換常委的權力。

趙體國的方案站在部委的立場，多少還帶些情緒，除了監督權，在議政上也要求重大決策時由部委和分籌委會聯合參

與，這繼承了4月26日晚的作法。但常委對部委似乎沒有明確的督政權，這似乎使籌委會有些失衡，但因常委會的權限本身就比較大，結果後來的籌委會實際上還是相當穩固。

會上通過了擴大部委權力後，趙體國當即提議部委分籌委聯席會議行使權力，罷免了第四屆籌委會五人常委，並提議由籌委會全體會議改選新的常委，以適應五四紀念活動的需要。體國的謀略出乎我的意料，我沒料到他能把一個棘手的改選問題，安排得這麼順理成章、這麼漂亮！

三權分立的自然體現

趙體國的這個提案，是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理論在學運中的自然體現。學運初期還沒有司法權的需要與界定，但立法與行政二權已出現分化的雛形。這裏再回顧一下籌委會三權分立的演變過程。最初，議政與行政二權混為一談。比如，在四二○夜裏討論四二二遊行計劃時，我們幾個人不可能分開處理「是否要遊行」與「怎樣遊行」的問題。但罷課後籌委會迅速壯大，機構逐漸健全，問題就出來了。這時五人常委會不僅要議決一切議題，還被無數具體事項的執行細節弄得疲憊不堪，而各部委卻因沒有實權而無所適從。比如宣傳部需要油印機和大量紙張，這就涉及預算問題。雖然也有財務後勤部，但開始僅起會計作用，計算捐款收支；預算由常委控制，而常委又對宣傳部的實際需要不熟悉，這樣自然會造成各種混亂。加之五花八門的建議，無論是策略性還是事務性的，都擠到常委會上，致使籌委無法作出迅速反應。

因此，部委分籌委聯席會議的形成，反應了學運組織的成熟。這說明只要本著民主的精神，毫無民主經驗的一群人，完全能自發地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組織程序，與先賢聖哲不謀而合。這也說明，民主運動不可能事先提出一套完整的組織程序，而必需依靠不斷摸索調整、逐步適應新情況而總結出來。

當然，若有一批同學事先對民主程序有一些基本概念，或像柴玲那樣得到前輩的指點，還是能做到事半功倍。記得沈彤第一次與籌委會接觸時，便介紹了他們「奧林匹亞」的議事方法，「動議」、「附議」一堆名詞我們還搞不懂，後來在運動中也慢慢地摸索出類似的議事方法。

籌委會再度改選趨於穩固

北大籌委會全體會議的改選結果，我和楊濤、熊焱、常勁、王丹當選為新的五人常委。好像也是從這時開始，籌委會改為主席負責制，主席比召集人有更大的權力，這也是加強領導、明確分工的一項進步。商議誰作主席時，我推薦熊焱擔任，但他含糊地謙讓，這時有人提名楊濤，楊濤則比較爽快地答應下來。【125】從此以後，北大籌委會便由楊濤領導，直到「六四」。〔圖 25〕



〔圖 25〕1989 年 5 月，知名作家馬建在為北大籌委會寫公告，站立者是楊濤，最右是王有才。

這個選舉很不錯。這五人不光都是籌委會創始會員，既有工作經驗又互相信任，且各有所長，也都較得各部工作人員敬重。熊焱口才極好，熱情肯幹，善於宣傳鼓動；常勁工作細心認真，一絲不苟，掌管內務是最佳人選；楊濤則深謀遠慮頗有城府，這是他以 19 歲年紀卻能受眾人之託做籌委會主席的原因；王丹的社會聯絡面很廣，很適合對外聯絡；我則對民主程序往往比大家都更認真一些，有時甚至顯得死板。

沈彤與孔慶東忿忿不平

孔慶東對改選及其結果頗感意外，也十分憤怒。他認為是我起了關鍵作用，也一定記著他同我提過撤換王丹的籌劃，這時便衝我激動地吼起來：「老封，你搞甚麼鬼？！本來我們這屆籌委會，我剛剛把工作理順，剛開始正常起來，你就又……」眼睛裏充滿怨憤。但孔慶東畢竟有較多的社會經驗，能壓制內心的情緒，在籌委會內很快又找到新的位置，一直在學運中堅持工作。相對而言，王遲英的反應極平淡，完全隨遇而安，柴玲有一次對我說他還會算卦。

沈彤的反應與孔慶東差不多，他在會議快結束時才趕來，顯得既忿忿不平又很疑心：「兩次改選，為甚麼都在我不在的時侯？為甚麼每次都是把王丹選上？」另一次改選可能是指 4 月20日夜裏選出郭海峰那次，那時他正在雨中帶領北大遊行隊伍。沈彤生氣也有道理，實際上王丹與他的票數一樣，並列第五，但他不在會上，大家自然就讓王丹做了常委。【126】

這次柴玲找我做和事佬。以前丁小平被免職後就去搞分裂，為了避免這種問題，柴玲在29樓外將我拉到一邊，說：你最好推薦沈彤去高聯籌備對話團。我采納了柴玲的建議，對沈彤介紹高聯最近物色人選協助成立獨立的對話團，也許日後運動中將是焦點性的組織，會在全國電視上發生影響，而他的興趣又一直在宣傳方面。沈彤馬上就答應了同熊焱一起幹，情緒

也就很快平息下來。[127]

由此可見，落選人員的善後很重要，許多人因為落選有面子問題而脫離組織，甚至帶著情緒搞對立，實在是組織的損失。

我和王有才對李祿的冷漠

五一上午記者會中，三天前才從南京來的李祿也在三千同學之中。[128]他對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在圖書館東門前我執意要大家挪地方的那一幕。「我驚訝這人這麼執著」，他後來對我說，這意思似乎是我很頑固。我不僅頑固，而且還冷漠了些。

記者會後，李祿到籌委會遇到王有才。這個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極濃的南方口音對他說：「呵，你是南京大學來的，那就談談南京方面的情況吧！」說著便埋頭準備記錄。這自然傷了李祿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將他當情報員了。如果這時沒遇到柴玲，李祿可能就走了。李祿分析問題的機敏給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建議也引起她極大的注意。她當即讓李祿直接找我，而我那時卻已疲倦於眾多動口不動手的建議，顯得遲鈍冷漠，還是將他氣走了。一年後我們在法國相會，他提到我當時的官僚作風，也有點兒抱歉的意思，說那時他不該那麼高傲就走。而我也有些懊悔，如果那時我能耐下性子聽一聽他的見解，或許我們的信任就能提前建立，後面的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

柴玲做了進一步的努力，希望將李祿介紹給我，但又被另一偶然情況阻礙了。這天傍晚柴玲找到我，希望一起吃一次晚飯，於是我帶她到燕春園飯店去。我想同她一道去這裏，本想補償近日來難得陪她造成的感情上的虧欠，不期半路又遇著了日前見過的清華附中的兩個中學生。他們似有要緊話對我說，

於是我又拉了他倆吃飯。柴玲在飯菜還沒全上來便忍不住走了。她甚至把本來要向我介紹的一大堆有用信息，隨著那股怒氣拋到九霄雲外。

拾破爛爺孫的故事

這兩個熱血的中學生，給我講述了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情。原來，這天上午他們到街上為學運募捐時，來了一位彎腰駝背的老者，由一個七、八歲的孫子牽著，從衣兜裏摸索出一張50元的鈔票，雙手顫顫巍巍地將錢放進了捐款箱。老人與小孩衣衫襤褸，與這麼大面額的鈔票形成鮮明的對比，自然引起他們的好奇。原來，爺倆竟是以拾破爛為生，他們捐出的錢大概是他們的所有財產。「解放前我們還能吃上肉，現在只能靠拾破爛來養活我這小孫子。」對於共產黨教育下的學生來說，這實在太不可思議，因此他們問我：

「這老頭說的是真的嗎？」

「不知道。但花50塊錢來騙你們，又都素昧平生，他圖甚麼？」

這件事情，給我極深的印象，因為它同樣超出了我的認知範圍，讓我既感動又感嘆。後來又見北京市民的種種擁戴與關愛，卻都不及這老人的故事讓我沉思和鼓舞，使我遭遇艱難與挫敗時，清楚是在為著甚麼樣善良而無助的人們在奮鬥。這個老人，傾其所有，把他晚年的希望，交到一群素昧平生的學生手中，這份信賴，總讓我感覺市民給予我們的，實在比我們能為他們爭取的高出許多。老人究竟希望甚麼呢？我想到了他身邊的小孩。

這倆個高中生，一個叫興XX，一個叫雷XX，後來都與我保持很好的友誼；5月底的廣場上，我甚至請他倆做了兩天的財務部長。

5月2日 星期二

柴玲去找鄧小平未成

5月2日這天，柴玲與趙體國有一個重大而秘密的行動。幾天前（4月27日），有人自稱代表鄧小平女兒鄧林，來過籌委會找負責的同學。鄧林是知識分子，對學生似乎有些同情，但她的出發點更是怕老頭子糊塗，失了晚節。她向學生暗示說，「他現在也是身不由己」，這似乎是說，鄧小平是受到各方面壓力才定學運為動亂，也可能是說，鄧小平晚年就像毛澤東，聽到的匯報是片面的。鄧林也許是擔心老頭子根據不實報告作出不明智的決策，而鄧又不許家人在他面前議政，因此鄧林「願意協助安排學生代表秘密會見鄧小平，使雙方得以溝通。」

昨晚柴玲將這消息告訴我時，引起我極大的關注。我當時對鄧還保留許多好感。即使鄧在八六年底的學潮時的強硬態度令人擔憂，我想或許他那個位置使他不得不然，還是相信他是在努力將中國引向富強。有這種好感的，我相信不在少數。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快速得到改善，成為他受到讚譽的基礎。我也認為經濟改革在政治改革之先，較合適中國人求實惠與穩定的心理。八五年號召知識分子入黨，大家無不感到鼓舞；進入黨內改造執政黨的想法，激起了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幻想，也許熊焱、張伯笠、孔慶東、姬軍和李祿他們就有類似的想法。那時我對鄧小平知道的不多，既不知道是他抓捕了魏京生，也不知道文革中他的兒子鄧樸方就是在北大28樓跳樓殘廢的。總之，我當時相信鄧小平是個明智的人。

懷著這樣的想像，我希望能夠當面向鄧小平陳述學生的願望，使他相信我們對國事的憂慮與對他的尊敬並無衝突；使他明白我們是針對某些不良現象，而不是衝他個人；對他主導的改革計劃，我們更是熱切地支持。我知道，最能決定學運和中

國的命運的人是他。因此，我安排了秘密接觸鄧小平的計劃。為此，我交給柴玲和趙體國五十元錢作路費，他們在城中奔忙了一天。

但是，他們晚上空手而歸。

接觸鄧小平失敗的原因，柴玲把它歸結到那些「名片愛好者」身上。這種人的典型是林XX。他開始在聯絡部工作，後又轉到秘書處接待處。接待來訪時他很喜歡收集名片，一共收集了上百張。跟著林XX的一個同學竟借去複印，別人覺得怪異，他卻一本正經地說：「我是學歷史的，將來這都是珍貴史料！」鄧林的線索落到他們手裏，後來又到了郭海峰手中。柴玲怎樣向他們索取聯絡方式我不清楚，但她對他們有意無意地隱藏或丟失了這些線索非常地氣憤。她與趙體國在城裏跑了一天，最後找到了中間人，但最後還是沒見到鄧小平。中間人說，此前已有學生去過，但沒講是誰。【129】

五四遊行計劃拜託了歐陽

關於五四遊行計劃，我在北大籌委會之後，稍稍拜託了歐陽去構思。歐陽這時是理論信息部的部長，我相信他能提出一個好方案。由於歐陽一直行動謹慎，不願拋頭露面，因此我尊重他的風格，也只是在會下暗中拜託他。他慎重地答應我，5月3日中午北大例會之前，他為我提供上中下三策，並附帶各方案實施計劃的詳細說明。

熊焱組織選拔北大對話代表

熊焱在熱鬧的三角地擺上一張桌子，拿起話筒宣佈籌委會選拔對話代表的計劃，希望大家報名參加。在三角地附近牆下端著飯盒看大字報或拿著照像機、錄音機的人們，自然能清楚地聽見他那宏亮帶有湖南口音的宣揚。我無意中碰上熊焱的新

婚妻子錢立筠。她對我說，她正為熊焱抄記大字報內容摘要，因為他在籌委會太忙了。

對話12條與袁木的反應

這天下午，王丹與一些同學去中辦和國辦信訪局，遞交促請對話的《12條請願》。【130】這12條的大意，是要求平等對話、學生代表由學生公推而不是官派、政府代表應為政治局常委或人大副委員長或國務院副總理以上、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現場直播、不秋後算賬等。請願書要求當局在5月3日中午以前答覆，否則就會怎麼樣。

對此，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第二天上午的記者會上作了回應。他一面詭稱「政府願意對話」，一面指責學生「沒有誠意」、下「最後通牒」，想「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對手，甚至超越政府之上」，並稱北高聯為非法組織。

袁木在電視中的表演引起公憤，人稱姚文元復出。他說甚麼「平起平坐」，似乎民眾根本沒有資格與政府平等。後來遊行中有一條橫幅「我要求我的僕人來對話！」很形象地揭露了政府的虛偽，這個「人民政府」從來都自稱「人民公僕」，現在卻聲稱主人沒資格與僕人平等對話。袁木又大抓「長鬍子的」、「黑手」。提到這些字眼時，他咬牙切齒，一副欲置人於死地而後快的樣子，使所有知識分子對他更加憎惡。袁木原本也是知識分子，才具還頗高，卻作了御用之人，實在令人齒冷。

對話請願12條沒有署名，外界一直以為是王丹代表學生組織遞交的，其實並未經過北高聯或北大籌委會的決議。

張炳九與丁石孫

5月2日深夜，開完籌委會的例會，我隨郭海峰等到29

樓，悄悄進了3樓一個老師的宿舍。他叫張炳九，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131]宿舍兩間連通，其中一間顯得空空蕩蕩，除了三張單人沙發外，地上散著一些印有文字的紙張。帶我們來這裏的是經濟系研究生，和張炳九很熟，進屋不久就斜在沙發上睡著了。他們好像連續好多天沒怎麼休息，滿地的紙張是他們編寫的文章。

據說張炳九很得校長丁石孫的賞識，二人私交很好。張暗中也非常關心和同情學運，這晚他與我們的談話，是以一種長者式的關切來問詢我們的策略和手段。提到對話請願書，他極為關注地問到一個細節：你們是用北高聯的名義，還是普通學生署名？我不解他的意思，想了想說：應該是普通學生的名義。這樣就對了，他說，神情和語氣如釋重負，要是用學生組織的名義，他們很可能根本不理會。

這晚我們商量好，明日由他帶我們去會見校長丁石孫。我看不出這是他的意思還是丁校長的，不過我也覺得有必要親自探探校方的態度。

5月3日　星期三　晴

「一塔湖圖」

約好上午十點到未名湖北岸的紅一樓同張炳九會面，由他帶我們去見校長，而早晨醒來時已九點過了。忙亂中找來自行車，又找到能作速記的秘書同學，騎車按時到達。張炳九還未到，我們正好欣賞未名湖在春色下的嫵媚。這是半個月來難得悠閑的一刻。

未名湖連同周圍古色古香的中國園林建築，是北大人為之驕傲的校園美景。有人稱北大校園可概括為「一塔湖圖」，意思是一座博雅塔，一汪未名湖和一座藏書甚豐的圖書館。博雅

塔就在未名湖東岸，遊人總愛從各種角度，拍攝這九層水塔在湖中的倒影。湖岸邊的垂柳輕輕搖曳，在和煦的春風中發芽變綠，波光粼粼的湖水曾激發多少北大才子的靈感。

二百年前，未名湖周圍是乾隆寵臣和珅的私家花園，規模雖不比圓明園，園林風格上卻絕不遜皇家禦園。這座園林後來成了燕京大學校址，1952年院系調整時，與城裏的北京大學合併定址於此。共產黨將北大搬到郊區多墳場的海淀，大概是怕學生運動在城中心爆發。北大原在沙灘，故宮東北角，離天安門不過三、四里，而海淀則有三十多里地。北大同學遊行磨破腳板時，往往感慨中共將北大遷到城外的遠見，「要是在沙灘，我們天天高興了就出來走一趟！」

丁校長贊同校園民主計劃

張炳九帶我們進了紅一樓，找到該見的人後，便找理由走開了，一刻也不多待。首先見我們的是教務長和校長辦公室的副主任。他們很客氣，將我們迎進一個會議廳，說抱歉校長一會兒才能來。二十分鐘後，丁石孫校長終於到了。丁校長身材魁梧，神氣豪爽，說話顯得精力充沛。教務長恭敬地將我們先前談話內容大致講給校長聽，然後會晤進入實質階段。

我先取得他們的同意，將交談內容由我帶來的秘書記錄，以便回籌委會有個交待，免除同學的猜疑。在我之前，沈彤與孔慶東見過校長，許多同學很擔心他們的動機。然後，我感謝校長等人抽空接待學生自治會的代表，隨即陳明我們的立場：就近期而言，北大籌委會願意與校方協調五四紀念活動，以免時空上的衝突。丁校長說，除校友返校的紀念活動外，並沒有甚麼大型活動，甚至全校運動會也取消了。這解除了我的擔憂，這意味著校園許多場地籌委會都可以自由利用。

就長期而言，我向丁校長正式陳明籌委會的校園民主計劃。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長明確的贊同。丁校長說：「我支持

在校園內搞民主改革。學生會也可以改嘛！我願北大做為全國高校的校園民主改革試點單位。」丁校長說，校園民主不僅可以包含籌委會成立時提出的兩條目標，學生自治組織和校園獨立報刊，還可加上第三條：「教授治校」。

丁校長說他之所以遲到，是因為參加一個校友會。他對那些五十年代的畢業生說，「今年的校慶，最可觀的是現在的在校學生。你們不是在談中國的希望嗎？中國的希望在那裏？你們到校園裏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學吧！」

丁校長雖然同情學運，卻還是勸我們不可將運動擴大到社會上，不要老去天安門。最後，他講述自身的經歷，來說明我們罷課時間也嫌太長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產黨，那時我們在學校組織罷課，最多一個星期就堅持不下去了。我記得有一次還是國民黨特務同學用手槍逼著我去參加考試。」從四二二至今，我們已堅持罷課十二天了，歷史在作有趣的輪迴。

高聯討論四套方案

下午兩點半，高聯各校代表在北師大準時開大會，議決明天五四行動方案。為了提高效率，大會之前先開九人常委會，為大會預備各項議程議案。兩次會議都由我主持。

常委會上討論了四套方案。

一、北大荒地方案，由我提議，即在北大西門外的一片荒地上集會。歐陽在中午北大例會上將這套方案交給我，認為是上策。此方案較溫和，對政府既留面子，又有威懾作用，可進可退。中策為傳統的遊行，下策已記不清。歐陽去看過那片荒地，由於城建規劃，幾十畝水田荒蕪在一片不深的雜草中，足可容納20萬人，列出氣勢宏大的隊形。歐陽說，該方案既為省力，也為校園民主建設。近日不斷的遊行已使同學們疲憊不堪，走幾十里去天安門既單調又累人；高校人口重心在海淀，地點設在這裏，多數同學少跑路；最重要的是，只在荒僻地段

集會，不到鬧市區造勢，讓四二七成為遊行歷史的頂峰，這就象徵著學生對政府的克制態度，學運也轉向校園民主建設階段。

二、「手拉手」方案，王超華提議，十萬學生在二環路上手拉手圍成一圈，圍住北京城。這個方案很有趣，也說明大家不大願意老是單調的遊行。若能做成，可以一種嶄新的、富於象徵意義的形式顯示學運力量，對中南海內黨政要員們將帶來一股強大的心理壓力。

三、傳統遊行方案。提案人認為，一來組織起來方便，二來遠征式的遊行也不是白走路，沿途都能宣傳群眾，有利於擴大社會影響。

四、白布方案，由代表藝術院校的趙少若提出。他們準備買幾千米白布，將天安門廣場圍起來。白布上可寫醒目的標語，空白處還可徵集簽名，用幾十萬、上百萬的學生和市民的簽名向政府請願。這個方案頗為新穎，若能做到，也將起到極大的宣傳效果和威懾作用。

北大荒地方案差點通過

常委會上，趙少若的白布方案首先被否決。趙少若要幾千元經費，高聯當時只有會費幾百元，一時拿不出來。加上去商店買布已來不及，因此大家覺得不太現實就否決了。

超華的手拉手方案也有難度，幾十個學校怎麼在二環路上找到各自準確的位置，時間一到怎麼統一號令所有人同時拉起手來，拉手那一刻十字路口的交通會怎麼樣等等，都難以確定，以高聯當時的執行系統，怕是難以勝任。

我代表北大所提的荒地方案也受到眾多批評，主要是大家對局勢的估計不一致，在是否應當繼續擴大社會影響上看法不同。十幾萬學生採取克制的態度在一處荒地集會紀念五四，雖在海外媒體上會因其出人意料而得到宣揚，但在國內社會上

卻沒有多大影響；若不繼續通過社會影響保持對政府的壓力，同學們認為對話便會被政府繼續拖賴下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帽子依然扣在頭上。也有同學會覺得這不過癮，很難估計有多少人會來這塊荒地上看幾個人發表一通宣言，而我們也來不及準備其他甚麼有趣的節目。

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試圖說服常委會通過荒地方案，結果差點通過。清華代表首先支持荒地方案，在我說服後，又有兩個常委支持，但依然得不到常委會多數通過。那天有八個常委，結果四比四持平，最終只得交由大會議決。

最後通過遊行方案

雖然常委會上我爭取到一半票數，但在大會上則完全失敗，被淹沒在眾多中小規模學校代表的激情之中。經過大會激辯，只有五票支持北大荒地計劃，等於只多爭取到一票。在常委會上我能一個一個地說服，在大會上則無計可施。

北高聯最後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決定採取傳統而簡單的遠征式遊行方案。它雖失於單調，但組織簡便，組織者既有豐富的經驗，參加者也無需得到進一步的說明，不會產生絲毫的誤解與混亂。

當天下午，各校貼出的通告：

「經北高聯47所高校代表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動安排如下：

1. 8點從各高校出發，遊行到廣場，沿途散發傳單，不演講，少喊「打倒」。宣傳重點：

（1）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2）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

（3）要求對話；對話要有誠意。

（4）維護憲法的言論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132]

（5）集會，結社自由；北高聯合法化。

（6）反對官倒，打倒腐敗。

（7）全國高校聯合起來。

2. 下午四點，市高聯在廣場發表《五四宣言》，然後各校自由組織活動（集體活動結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學生代表上午7:30在師大門口集合。」

大會表決之後，我當即作了具體安排：周勇軍負責安排會場，王超華負責起草《五四宣言》。周勇軍的任務包括在廣場上選定發表宣言的地方和安排音響設備，並與各校常委保持聯絡，時間一到，便派聯絡員通知大家到選定地點開記者會。各校代表包括常委則隨自己學校的隊伍遊行，負責本校事務，到廣場後等候聯絡員接應。周勇軍與王超華當場接受任務。

王丹與開希還是沒參加這次大會。[133]

對話團成立大會

熊焱和沈彤列席了高聯大會。他們是為對話團成立會而來，見到北高聯開會的混亂場面，他們會後對我說「一群烏合之眾！」頗讓我有點難堪。

由於北高聯大會沒能按時結束，對話團成立大會也只好順延。各校對話代表在隔壁教室裏等了四十多分鐘。我在高聯大會後來到這二三十個對話代表面前，向代表們強調了對話團的相對獨立性，表示北高聯只是協助成立，現在大家已聚在一起，以後便是獨立的團體，完全自行運作。我只是給他們提了一個建議：可以先根據主題分出小組，各小組的成員依自願形式參加，根據公認的口才與能力推出組長和團長等領導。用了三五分鐘講明這些之後，我便離開了對話團的會場，真正讓他們自行運作起來。

後來對話團的運作情況，與我們的期望相距不遠。項小吉當選對話團長，我毫不奇怪。他是政法大學的研究生，幾天前我就聽說他研究國際談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辯論賽冠軍。四二九袁木對話會上，就他講得最好。稍稍讓我吃驚的是熊

焱，他的才能在對話團似乎沒充分顯露出來，未被選為副團長。實際上，後來在五一四和五一八兩次「對話會」上，都是熊焱講得最好。對話團的副團長是沈彤而不是熊焱，多少讓我有點意外。

吾爾開希的藏身地

從對話團成立會上出來，我想找王超華商討《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便被一個師大同學帶到吾爾開希藏身的秘密地方。這是一間博士生宿舍，門外還有同學放哨。開希這幾日因害怕中共逮捕，便藏身此處，卻依然同外界保持聯絡。

屋裏除了開希、超華，還有一個經濟系的博士生，大約就是屋主了。我進去時，他們正在討論，準備起草宣言。我坐著聽了一會兒，便向超華建議晚上到北大去定稿，那裏作家班的筆桿子比較過硬。商量好時間、地點後，我便告辭返校。

北大作家班起草新五四宣言

回到北大做完必要的交待，我便到作家班去待了兩個小時，在這裏得到如家的溫暖和休息。北大作家班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與其說是培養作家的班級，不如說是作家回爐溫習學生時代的地方。班裏的學員多是已經成名的作家、詩人，又都已成家立業的老兒童。如以《楓》、《老井》聞名的鄭義，【134】已四十多了，張伯笠在他們中只能算小兄弟。他們的妻子也常來，圍在宿舍裏做飯說笑，我便在他們的歡樂中琢磨他們生活的趣味。他們也認識柴玲，對我們既讚佩又擔憂。

九點過，我們約好的十個人終於在28樓238室聚在一起。我問王超華宣言準備得如何，她鎮定地回答沒準備好，出乎我的意料。這意味著今晚必須熬通宵，趕出這份宣言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一會兒，馬上發覺不是辦法，於是各自去起草一份，再來討論。

一個多小時後，何貴方起草了一份。他與王超華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章頗有文采，但大家認為過於激烈，許多地方明顯對抗政府，文字上很容易被抓辮子。超華好像與他爭論得非常厲害，他們從此產生出對立情緒，後來在廣場上尤其激烈。

最後，超華堅持著又起草了一份，等到討論近於完稿時，已近淩晨兩點了。我在屋內一張上鋪躺著，朦朧中聽他們爭論，漸漸沉睡過去。【135】

5月4日 星期四 多雲

五四遊行

早晨八點剛過，北大隊伍浩浩蕩蕩開出南校門時，軍警未作阻攔，只有十幾個帶步話機的官兵站在街邊，同熱情的市民與堵塞的車輛混雜一處，耐心地觀看學生隊伍的壯觀場面。〔圖 26〕



〔圖 26〕1989 年 5 月 4 日，北大隊伍出校後軍警未阻攔，校旗前是彭嶸，右邊著西裝者是封從德，再右邊就是「袁木求愚」那幅對聯。

在隊伍前排離校門還有十幾米遠時，我讓隊伍暫停，讓北大校旗、橫幅錯落有致地排開，然後才整隊邁出校門。隊首是給市民最重要的印象，隊形整齊而有氣勢，方能顯出一個學校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給市民一個學生守紀律、不胡鬧的印象。校門外的街道本來便擁擠，加上周圍的市民早已等候在路邊，為學生鼓掌，因此從南校門到中關村五百米的路，我們卻走了近半個小時。

按預定的時間，我們應該下午二點趕到天安門。正急著趕路，道中卻立定幾個外國記者，扛著沉重的攝像機對準我們。大家走到跟前他們也不動，隊伍只好分叉繞開。這樣反復幾回，我們便不再忍耐，大喊一聲「記者滾開！」記者終於走到一邊，我們也不再多說。

前幾天認識的清華附中的興 XX ，很高興做了我的「保安」。大約是為安全起見，糾察隊為每個常委都安排了一個，而他又正好認識我。興XX雖只是個十七八歲的高中生，卻長得比我高，但身體單薄，眉清目秀，說話總帶點靦腆的笑意，一副文弱書生的樣子，哪裏像是會武功的保安！但他在一路上對這件任務非常認真，無論我鑽到何處，他總跟隨左右，並且保持一定距離，外人一般看不出來。我並不習慣另一個人跟隨左右，一路上全拿他當個同伴，必要時只請他為我跑一些聯絡的事。

「袁木求愚」

我們一起走在隊伍前列，輪換著抬一副標語木牌，上面寫了副對聯：[136]〔圖 27〕

這副嘴臉政府何以立本
如此對話國家幾時東昌

橫批：「袁木求愚」



〔圖 27〕1989 年 5 月 4 日，北大隊伍遊行到長安街，兩個中學生舉著「袁木求愚」木牌諷刺四二九假對話。

這副對聯裏包含三個政府官員：袁木、何東昌與袁立本，他們主持了 29 日的假對話。「袁木求愚」是「緣木求魚」的諧音，諷刺袁木藉假對話愚弄百姓。開始時這幅對聯藏在隊伍當中，因為得到眾多市民的掌聲，我便請人抬到隊首，沿途顯示給人看，一路抬到天安門廣場經過人大後，見到幾排軍警自動退讓到路旁，大家便唱起了當時的電視劇《便衣警察》主題歌，以動搖軍心：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
風霜雪雨搏激流
歷盡苦難癡心不改
少年壯志不言愁……

記者參加遊行

這天軍警相當克制，當局勸阻遊行的通告口氣也比四二七



〔圖 28〕1989 年 5 月 4 日，聲勢浩大的「五四」遊行據說比四二七大遊行還是要遜色一些。

緩和得多。但同學們說，這天的規模也比四二七小許多。這天的口號，與四二七差不多，除高聯通知的提綱外，北大還印發了如下口號傳單：

「對話對話，平等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

「向《世界經濟導報》致敬，向欽本立先生致敬」

「言論自由，聲援《導報》」

「結社自由，捍衛籌委會」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貪污腐敗，懲治不貸；特權衙內，必須治罪」

「全國高校，聯合起來」

「發揚五四，爭取民主」

經過一座立交橋，便來到西長安街，沿途歡迎的市民更多。新聞記者參加了遊行，他們的橫幅上註明某某報社，寫上「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職務」、「不要逼我造謠」、「開放報禁」之類。記者的遊行，是社會力量參加運動的開始，這對

學生的鼓舞不小。〔圖 28〕

始終沒找到高聯聚會點

將近下午三點鐘，北大隊伍才進廣場。進到廣場忙了一陣子，用紅藍二色旗指揮進退，將北大的隊伍排在廣場正中，北面正對毛像，南面正對紀念碑。楊濤見大家口渴，起身帶了兩個同學，走出廣場去買冷飲，十幾分鐘後抱回一大堆冰棍，我也分到一支。

預定由周勇軍派的聯絡員還沒來，使我有點焦急，便派一個同學去聯絡。我和王丹在廣場上待了半個鐘頭，終於沉不住氣了，一道去找北高聯開記者會的地方。我們向南走，以為紀念碑一定會是聚集地。突然，見到一面北高聯大旗，便去追趕。

這面大旗很像美國的星條旗，藍白相間七橫條不知何意；代表北京高校的幾十顆紅星不集中在左上角，而是分散在三道白條中。我有點愕然，這樣的模仿既拙劣，而我作為高聯主席竟對「會旗」一無所知。這樣不經過討論而隨心所欲製作的會旗，更使我感到這個組織的實際運作中有許多漏洞，近乎少數人的兒戲。一年後王文在巴黎告訴我，這面旗幟是他做的。王文是北大農業工程大學的學生，後來的絕食發起人之一，以後與我和柴玲還有很多事情。在一張照片中，這面大旗飄揚在紀念碑上人能爬到的最高處，旗下佇立的五個人，其中有周勇軍。

我同王丹趕不上那面旗，忽然聽到同學異樣的聲音，抬頭望去，只見三個外國記者爬到了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上。像框足有十米多高，七八米寬，一米多厚，三人沿著後面的支架爬到頂上。孫中山是中國人的國父，爬到國父頭上，簡直是奇恥大辱。同學們用盡氣力，紛紛喊道：「下去！滾下去！」那三人好像沒聽見，在上面又待了一會兒，終於慌慌張張地原路退

下。【137】

返校途中的口號

我回到北大隊伍中不久，聽說《五四宣言》已宣讀完畢，各校要打道回府了。這消息讓我有點吃驚，卻也無可奈何，同幾個籌委會常委商量過後，便帶著北大隊伍返校，心中悶悶的。這種沉悶的心情，很快就在遊行隊伍的激昂氣氛中消失了。

上到西長安街，我發現柴玲和王丹很熟練地帶著同學喊口號，非常有趣，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王丹帶大家喊的口號頗有特色，有時選用《鄧小平文選》上的語錄，喊給路旁圍觀、鼓掌的市民們聽，還唸出第幾頁，證明鄧小平出爾反爾：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小平文選，第134頁。」

「一個人民的政黨，不怕群眾的呼聲，就怕鴉雀無聲！——小平文選，第134頁。」

隊伍過了西單，來到中央電視臺彩電中心新建的大樓下，同學們乾脆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這時，我拿了話筒，帶領大家衝樓上喊：

中央電視臺，請你站出來！
誰是幕後人，必須說明白。
要是說不清，馬上就垮臺！

這是我臨時編的順口溜，「幕後人」就是袁木說的「黑手」、「長鬍子的」。我們喊了十來分鐘，彩電大樓中毫無反應，更沒人站出來「說明白」。這時，有些性急的同學翻進鐵欄杆，聚在樓下，頗有預備衝進大樓之勢。我擔心造成混亂，給政府以把柄，於是釜底抽薪，讓隊伍起身繼續向前走。裏面

的同學見了隊伍一走，也自然散開，回到自己的隊伍中去。

Eric與建築工人

當我在長安街上帶著同學們喊口號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記者Eric追上來，要拍攝我在遊行隊伍中的鏡頭，我沒拒絕，照舊在隊伍中該做甚麼做甚麼。拍了幾個鏡頭後，Eric希望我講幾句話，我則沒答應。最後實在磨他不過，答應回校再說。

Eric是菲律賓人，三年前他也參加過菲律賓的民主運動。後來逃到美國做了CBS記者。因為命運相似，態度又誠懇，我便他保持了一種近於朋友的關係。Eric第一次見我是在四二五下午，我從籌委會開會出來，突然有個外國女記者興奮地指著我，用英文嚷起來：「就是他！他會講英文。」這女記者見過我，她和攝影師在秘書處接待處等了很久，一定要進屋拍攝影籌委會開會情形，很難纏。我開完會從屋裏出來時，林金松像見到救命稻草一樣，讓我用英語對他們講兩句。我堅決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解釋說這是籌委會的紀律，不讓個人見記者。沒想到那女記者隨後帶了Eric來找我，我又用籌委會紀律來搪塞他們，Eric便極真誠地介紹自己的經歷，說他對中國學運關心的理由，這自然引起我的共鳴，但還是沒有接受採訪。今天實在磨不過他，且以為回到南門時不過多拍幾個鏡頭，最多講幾句簡單的話，於是便含糊答應了，邁步繼續向前。

過了彩電大樓繼續向西，到公主墳北轉，沿三環回海淀。路口有個北京建築公司的工人，隨學生隊伍跑前跑後，十分興奮而殷勤。他知道我是個「頭兒」，便介紹自己的來歷和對運動的興趣。他對一個「小女孩」頗有讚譽，說她嗓子都喊啞了。他指給我看，就是柴玲，我心中暗暗高興。記得這工人姓韓，眼大而好看，說話真誠純樸，中等身材，很是健壯，走路低頭甩手，腳步異常輕快。

同學們走到公主墳，又乏又渴。這時，這工人講他有好友住在附近，可以為大家提些水來，於是低頭彎腰飛也似地跑遠了。過了幾分鐘，每隻手提兩個大塑膠桶，沉沉地趕了來，滿臉都是汗。他把四隻水桶分傳開去，滿意地看著同學們仰著脖子往肚裏灌，他卻不喝一口，只關心那些水桶，喝完好還給主人。此後，我們成為好朋友，後來在廣場上也多有接觸。我永遠忘不了他那雙誠實而純樸的眼睛。

半路得知已宣佈復課

在西三環的路上，我才聽同學說，高聯已在廣場上宣佈復課。我頗感驚訝，又預感到北大同學必會反對，甚至拒絕服從。我擔心形成學生組織分裂，於是在極不情願中寫了一張便條，請同學騎車帶回北大，一方面希望常勁等留守北大的籌委會人員組織車輛來接同學們，一方面希望他們服從高聯宣佈的復課。

廣場上宣佈復課的詳細過程，我至今也不完全清楚。聽到消息時，我以為是聚到一起的幾個常委臨時作的決議，絕沒想到又是周勇軍擅自以組織的名義發表個人意見。[138] 至於後來台灣編的書中記載的情況，我則更不清楚。書中說，宣佈復課後「包括吾爾開希在內的幾位領導者發生一場短暫而激烈的爭吵」、「擠在紀念碑前二千學生中傳出了對吾爾開希的憤怒吼叫，指責他是『政府派來的走狗』」。[139]

我的情緒逐漸低沉。廣場上發生的事情，使我沮喪。我這時雖是學運最高組織的主席，但局勢顯然不在我的掌握之中。關於復課，我記得高聯確實討論過，但不記得有任何決議。依我和一些高聯常委的構想，復課應該分批分期進行，中小院校和理工科可先復課，大校和文科應該堅持罷課以保持壓力。現在這樣非程序宣佈全體復課，自然打擊我對高聯的信心。本來在高聯成立之初，我便感覺缺乏基層組織，形勢還不夠成熟到

建立這樣高層級的聯盟，因此採取消極的態度；後來高聯已實際建立起來，北大籌委會也只好維護大局；最後我被派到高聯取代王丹，又當選高聯主席，還是積極希望加強高聯的。而今卻顯示，我並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辜負了同學們的期望，這使我不安起來。我開始考慮辭職。

拒絕 CBS 衛星直播採訪

隊伍最後接近海淀時，只剩下約一千人。許多同學已被同學騎車載回學校。這時天色已黑，路邊的高樓上突然放起鞭炮和煙花，在夜色中發出絢麗的光彩和熱鬧的聲響。市民們像過節般喜慶，歡迎遊行隊伍的凱旋。

我沒隨隊返校，而是獨自回到北大南門外的家中。斜躺床上，打開電視。北京電視臺整個晚間新聞，竟沒有一句話提到幾十萬人的遊行，只有「一萬多名新團員在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儀式」。雖對中共宣傳工具愚弄百姓早已見慣不驚，但這次我還是很憤慨，當局又一次無恥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雖對遊行隻字不提，新華社卻異常迅速地向全國通報了復課的消息。

這時，柴玲匆匆奔回家，焦急地告訴我CBS的記者在北大門口等我，他們準備用五分鐘的時間對我進行採訪，並用衛星直播傳回美國。柴玲穿梭於家與校門之間，來回三趟，我都堅拒。

我記著Eric與我的約定，但我不想去，獨自回家也是有意迴避他們。不是因為害怕，我肯定已在國安部掛上號，秋後算帳少不了我的份；而照當時的情形和王丹、開希的經驗，名聲越大知名度越高，便越有輿論的保護作用。迴避記者的原因，一是紀律，即我在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堅持的那條「常委個人不得接受記者採訪」的紀律。二是我決心辭職，回頭去完成論文。我們那台計算機應已修好，論文必須在五周內完成，還有大量的準備要作，我自己就得「復課」。三是希望有人來接替

我在學運組織中的工作。民主運動是眾人的事業，爭取來的權利人人有份，應該有更多的人參與。

北高聯好似空中樓閣

想到辭職，我對北大籌委會有很深的留戀，對北高聯卻有更深的擔憂，近日的感受證實了我最初對這個組織潛在危機的估計——這是一個佔據領導地位，卻沒有領導能力的組織。

這不是說北高聯的領導人物沒有能力，而是結構上有根本缺陷——它超越了運動發展的階段，在各校自治會還沒鞏固，多數學校甚至還沒有明確的自治會時，便在缺乏基層組織的情形下成立了更高層的組織，因此其代表性有問題，其決策也沒有一個有效的執行系統來完成。這個階段它應扮演協調各校行動的角色，但從一開始就自視為向各校下達命令的權力中心。最初四二三圓明園會議上的各校「代表」，並未經過選舉或委任，很難確定代表誰。許多學校實際上先有高聯「代表」，後有本校自治會。像北大這樣學校的自治會都還在起步階段，北高聯卻已很快跨過籌備階段，在四二八宣佈正式成立了。

這好比沙灘上的高樓，雖能登高望遠，卻不腳踏實地。它吸引了太多的注意，聚集了太大的權力，卻讓權力空中樓閣上的人手足無措，因為基礎不穩搖搖欲墜，沒有足夠的根基與信心去操作。因此，空中樓閣上的領導人，很難不犯「利用組織名義發表個人見解」的錯誤。四二七前夕擅自以主席名義撤銷遊行計劃如此，五四擅自宣佈復課也是如此，而且都是個人行為、非程序行為，組織卻無從阻止。這在後來的「個人絕食」，乃至隨後廣場上開希等人不斷的非程序行為，顯得尤為突出。這是很奇怪的現象，領導民主運動的組織，因結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民主形式，一些人就很方便地鉆空子，一再重複獨斷行為。

我那時還無法看得這麼清楚，只是朦朧的感覺，覺得自己

無力扭轉這個局面。我既沒法將這種感覺清楚地告訴大家，又不願意在這樣的錯誤結構中混下去，就只好辭職。

趙紫陽溫和的亞行講話

5 月 4 日，趙紫陽在亞行會上的一篇講話，語氣與「四二六社論」大不一樣。他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提出要「冷靜、理智、克制與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並說學生「絕對不是要否定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不過趙還是留了個尾巴：「中國這麼大，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是不難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會懂得這點。」

趙的講話明顯是個暗示，但我當時卻沒能注意到，否則可能影響我對局勢的判斷。我也不能想像後來鄧小平會拋棄趙紫陽。許多學生，包括我與柴玲，直到趙紫陽下臺前，對他並沒有特別的好感。我當時把他視為投機家，他去朝鮮避風就是一例，這種印象一直影響到我在學運期間對他的評判。後來證明這一評判很有問題。

5月5日　星期五　晴

柴玲王丹跟我一道辭職

上午待在家中沒去籌委會，卻同柴玲一起去商場買了一隻雞和一些蔬菜，決心恢復學生生活，重新將思路集中到論文上去。

下午我與柴玲一道回籌委會，一同向籌委會辭職。當時大家非常吃驚，我們一進門時，大家還因為好久都沒見到我們而

出來迎接。當時在場的王丹也跟著辭職。[140]

寫《辭職書》

下午、晚上在北大圖書館寫《辭職書》，卻用了許多時間看法律方面的書籍，結果沒寫完，第二天上午在北京圖書館才寫完。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辭職書》主要內容。這是我在運動中寫的第二篇文章。與四二七寫〈我的民主宣言〉不同，這次是在寫到對未來中國民主道路的設想和申明自己辭職原因時，略費一些思考。我對學生組織有很深的留戀，對學運則更有一層責任感，因此我沒寫負面的感受，也沒明確說辭掉的是高聯主席一職，而是想用自己參加運動的經歷和感受，從正面來對學運「作最後一次鼓舞」。

《辭職書》分三部分。首先是簡歷。我簡單回顧了自己的成長經歷，提到八七年元旦被捕和八八年參與行動委員會，尤其是這次參與北大籌委會，「我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竭力維護以後學生自治組織的民主機制。」但我很遺憾，沒有年長成熟的「黑手」真正走到前臺：

「我以為由我這麼個從沒系統學習過政治、社會和法律的理科學生，在這次民主運動中充當一個重要角色，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點，分析了運動的進程。其中提到「政府作了許多實質性的讓步」，然後重點提出「校園民主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之突破口」，建立推和鞏固進校園民主的獨立學生會，並實行「教授治校」。[141]

第三部分，目前的任務及方式。我認為五四後的三個重點是：復課對話（可改為部分同學靜坐甚或絕食，以要求對話）、加緊自治組織的合法化進程、加強同社會各界的聯繫。

寫完《辭職書》，我複印了30份。[142]

5月6日　星期六　陰

北京圖書館

大清早便同柴玲一道騎車去紫竹院附近的北京圖書館，她要為明年的論文草擬一篇開題報告，然後趕著送到北師大她導師處；我則要繼續寫完《辭職書》，好去北師大交給高聯常委會。

北京圖書館我很熟悉。八八年暑假中，我在這裏連續自修了三個星期的計算機專業課程，從而取得了9月舉行的全國計算機程序員水平考試的高級程序員資格。那時每天早晨帶了書包和午飯，騎車二十分鐘到此，新書閱覽室和寬敞的自習室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去高聯交《辭職書》

十一點半，我騎車趕到北師大西南樓400室，準備在北高聯常委中午的例會上，正式呈交《辭職書》。這時常委還未到齊，高聯秘書長、政法大學的王治新在桌上寫著甚麼，師大自治會的同學和幾個不認識的人在交談。我既準備辭職，一進屋大家熱情迎接我時，我只好苦笑一下，有一些情況匯報上來，也暫時讓王治新記錄在案，留給常委會討論處理。

這時，有同學來報告五四遊行時女生被毆打的情況。原來，五四早晨，雖然北京高校多未遇到警察的粗暴阻攔，但有幾個東城區的學校情況則不一樣。其中北京化工學院的學生剛出校門不遠，嚴陣以待的警察便圍上來，見學生勢單力薄，便大打出手。一位女生躲閃不及，被打到骨折，有醫院的X光照片和診斷書為證。問題是這位女生剛進大學，一方面膽子小，又是從農村來的，比一般人更珍惜唸大學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對學生自治會沒有信心，擔心將來北高聯被定為反革命組織，

恐怕她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了。於是她寧願忍氣吞聲，也不願北高聯出面為她申冤。擔心秋後算帳的心理不難理解，因為學生運動從來都沒勝利過。

這天來的常委不多，實際上會沒有開成。王超華、周勇軍來了之後，我將《辭職書》遞給他們，二人皆沉默，不作評說，超華更以一種不解的眼光看了我一下。一年後在華盛頓，超華問我，方知道我辭職之前的心情。

劉曉波來找我

交完《辭職書》出來，一個青年教師模樣的人在門口等我。他說他叫劉曉波，是北師大的講師，剛從美國趕回來。此前我在北大三角地讀到過《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有劉曉波的署名。而在三年前，我還在北大聽過他的演講。我很少在北大聽演講，因此印象很深。印象最深的是劉曉波在臺上的自我心理剖析。他說有一次去一家報社編輯部，自我介紹「我叫劉曉波」，回家後他妻子問：你對人講「我叫劉曉波」時，內心是不是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快感？就這一快感，他在臺上自我剖析了很長時間。

劉曉波剛從美國回來，聽說我是北高聯主席，希望同我交流一下看法。見他口氣很謙卑，我很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剛剛辭職。這時，劉曉波一愣，然後輕輕地不知道說些甚麼，轉身就走了。

回北大交《辭職書》

下午回到北大籌委會，我遞上《辭職書》，幾個同學都想挽留。當時在辦公室裏的有謝劍、王有才、蔡健和幾個秘書等人。這時學運開始走向低潮，他們很不希望我和柴玲離開。我感到很難過，大家在一起這麼久，相互建立起信任與尊重很難

得，特別是在這緊張而危險的運動中。感情與理智各有自己的主張，堅持回到論文中的主張佔了上風，我已下定決心。

民意投票 2/3 繼續罷課

我正要走出籌委會辦公室，彭嶸氣喘噓噓地闖進來。他既不滿高聯宣佈復課，也不滿籌委會的動搖態度。他對大家喊到：「幹嘛沒完沒了地討論？現在只需踏實的行動。我們挨門挨戶去每個宿舍發問卷，晚上收回來不就知道同學們是否要堅持罷課了嗎？」

在彭嶸的催促下，北大籌委會將是否復課的調查問卷發到每個宿舍，進行「民意投票」。結果在一千多張問卷中，2/3贊成繼續罷課。這樣的結果也許會使彭嶸感到不夠滿意，但卻解決了北大籌委會在這個問題上的猶豫與反復。此前，五四當晚籌委會宣佈堅持罷課，五日上午重申罷課，傍晚卻貼了一張《復課宣言》，反對復課的同學當即撕毀，於是5日晚又在三角地進行辯論，午夜時分才作出緊急通知：「六日繼續罷課」。但這些都不如一千多張問卷投票那樣具有說服力。【143】

在這張民意投票上，還加了另一個內容，即對學生會的不信任投票，結果記得是72%不信任學生會，贊成罷免之，暫以籌委會取代其作用，這樣便使北大籌委會在形式上的另一半完全合法化了。而此前研究生會已內部罷免了原主席團。我記得當時是由謝劍提出加此內容的。

回遙感所復課做論文

離開29樓，我騎車回遙感所，心裏惦記著那台新修好的計算機。一進大門，所裏的人歡迎英雄一般迎接我。我不大習慣被人稱慕，趕緊上樓去看計算機。這時所長與黨委書記正下樓，先愣了一下，然後用一種含混的、估量過的熱情向我打招呼，所長連聲說「好，好」，握住我的手，又趕緊說有事，走

了。書記較熱情些，對我說「你回來了？這很好。學生是愛國的，學習也不能放鬆了。」言語之間，細細打量我，使我頗不自在。

1987年元旦我因遊行被抓進派出所，事後聽那個女黨員勸告給這位所長寫了一封七頁的長信，敘述那日的經過。但寒假完回到所裏，所長卻從未找我去談話。半年後，我以為情勢「寬鬆和諧」了，卻猛然聽到原先我的班主任四處對人說：「遙感所快要開除封從德了！」

所裏還有位老先生，共產黨進北京前便已教書。有一天，他一改平日的沉默，突然在只有我們兩人在屋時，對我講起了關於我的導師和所裏這些人的一切。原來，這麼一個三十來人的小小研究所，卻有那麼複雜的明爭暗鬥。

導師「又看到了希望！」

我的導師叫馬藹乃，生於上海，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其實她對共產黨一片情深，屬於「第二種忠誠」那種。據說文革時她也左得可愛，當時破四舊女生流行剪短髮，而馬老師的頭發短到以致於有次上廁所差點兒被誤認為流氓給轟出去。鄧小平上臺後一切都在恢復，卻無法恢復這一代人的青春。於是他們用了一個簡單的算術，一天要幹二天的事。馬老師的學術成就都在這幾年完成，出國研究、寫論文出專著，重新入黨，還做了副所長，主管所裏的教學。她曾同我解釋為甚麼當副所長，因為「終於明白了沒有權就沒有錢（科研經費）」。果然，到1988年10月底，我們幾個研究生終於有了自己的計算機。半年來，我就是靠這台機器完成我的論文。

上樓到計算機房，一試，電腦確實修好了。不一會兒，馬老師也進來，見我在用功，滿意地稱道一聲，卻同我聊起了學運。她顯然已經知道我捲入了運動，這次卻沒責備我。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她很嚴厲地說，「學生的基本任務在學習，國家

的事則在其次」。那是在 1987 年 4 月，我被捕獲釋後的新學期。當時我們還有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她幾乎不準備指導我的論文了。

但這次她的態度完全兩樣。她激動地說：「在你們運動起來之前，我以為中國沒希望了，年輕人越來越差勁，我在所裏也只是混一天算一天；現在你們學生帶頭起來遊行，我又看到了希望，中國又有希望了！」她還說：「我們這一代，也是真心愛國。八三年我在美國，那裏的人希望我留下做教授。但是我好不容易有機會報效祖國，你說我回來是為甚麼？但回來後，剛一兩年還可以，現在是越來越沒希望，精力都沒用在學術上，成日必須與各種人事周旋，不這樣，更沒有經費搞科研，不信看某某老先生，他骨氣雖硬，但就是憋著出不了成果，他過去的研究被別人盜用發表了，他也沒有辦法。」

然後，她又給我講收我作研究生的內情，原來所裏確實開會討論過是否開除我，她頂了很大壓力才保住我。我想她是不願意自身的悲劇在我身上重演，才十分嚴厲地要我莫問國事。她自然清楚我關心學業超過關心國事，也看重我的發展，因此在我行將畢業時，她熱切地希望我做她的博士生。但我去美國留學的決心已定，沒有答應她。

辭職後接受 CBS 採訪

去遙感所之前，我遇到Eric。他依舊十分殷勤地希望同我預約一個採訪，我告訴他我已辭職，可以接受採訪了。我們約定晚上七點在塞萬提斯像見面，那有片草地，周圍是松樹，我很欣賞那兒的恬靜氣氛。為何選擇塞萬提斯像下？我對 Eric 說：「我覺得自己是個唐吉訶德！」

晚上七點，我和柴玲準時到達塞萬提斯像。塞萬提斯銅像是八七年荷蘭的一個市長來訪時贈送給北大的，真人大小，還佩了一把劍。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在中國耳熟能詳。我

覺得中國的民主運動就像唐吉訶德那樣，屢敗屢戰。

記者們也準時到達，Eric和CBS的高級記者，一個胖胖的美國人。採訪開始，我才發現與那高級記者談話很吃力，我的英語顯然還不過關。雖然三個月前我的 TOEFL 考了 633 分，但口語卻是另外一回事，許多政治辭彙我也不會說。我大概講了學運這時的幾點成就：一是官方被迫在某些方面實質上讓了步，如違反《十條》的天安門遊行政府也實際上默認了。二是這次學運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如有了自己的組織，開始利用法律的武器，準備起訴人民日報社等。三是得到了社會的廣泛的支持，上百萬市民在四二七與學生一道遊行。

註：

【106】王有才回憶說，北大籌委會當時投過票，決定讓封從德去北高聯替下王丹。撤下王丹的原因，主要是籌委會內很多人、特別是趙體國和楊國忠不喜歡王丹熱衷於跟記者搞些記者招待會，卻不願意參與組織活動，因此代表性很差。而封從德被選派去高聯後，王丹就不再是北高聯常委，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大家對沈彤也有類似看法。見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107】王有才修訂補充:「應該說，在你沒有離開北大籌委會之前，我一直在你所負責管轄的範圍內工作，這也是我不願意你離開北大籌委會的原因。(另外，你去北高聯能當北高聯主席也是與我希望北大主導發揮作用一致的，所以我是不同意一些人提議撤換你的代表資格的。)當時對話代表團我個人也是支持熊焱、沈彤去的。當時你應該是北高聯主席，所以應該不會希望你去的。因為北高聯更重要。」

【108】據項小吉回憶，吾爾開希並非拒絕入場，而是因為在門口「說是北高聯的代表，結果沒讓進」，而項小吉與周勇軍「說是

政法大學的代表，結果進去了……周勇軍剛說完『我是北高聯主席……』何東昌就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們不承認北高聯，北高聯是非法組織。』我和周勇軍就退場了。」見項小吉「回憶對話代表團」，《新聞自由導報》1991年5月31日。官方資料的說法是「『高自聯』主席吾爾開希接到參加對話的通知，到達對話地點全國學聯後，突然拒絕出席對話會，並在門口向記者發表談話，謊稱政府不讓他參加。」見《70天大事記》第19頁。

【109】據5月1日北高聯的《聲明》，這次對話長達三個半小時，但電視轉播時有刪節改動。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109頁。參與對話且講得最好的項小吉，後來也證實「播出的是部分實況，但還有精彩的實況沒有播出。從法律上講這種只反映部分實況往往會是一種欺詐行為，有違公正原則。」見其「思念與雜想」，《民主中國》1992年6月號79頁。

【110】王超華回憶說是她代理主持的。見《回顧與反思》第71頁。

【111】王超華回憶說，當時除了合法化、復課的議題，「還有一個內容，是組織完善。封從德介紹北大經驗之後，高聯就開始討論規章制度，其中包括一校提議，八校附議，還有幾分之幾才能否決，還有七個常委意見內部不統一，如果是三個常委的意見被四個常委的意見否掉的話，這三個常委可以再提交全體代表大會，不能在常委內部以簡單少數多數這麼決定。總而言之做了很多章程的制定。」見《回顧與反思》第71頁。

【112】實際上當時各校還是有不少捐款，據報導26日政法大學已有一萬三千元、師大已有一萬八千元。見《香港經濟日報》27日3版。另據官方資料，4月27日「劉曉波匆忙從美國趕回北京，並立即與『臨時學聯』頭頭王丹、吾爾開希接上頭，轉交了他與王炳章（『中國民聯』骨幹）等人捐贈的數千元美鈔和近萬元人民幣，作為動亂活動的經費。」見《70天大事記》第18頁。不知這筆捐款是否存在，反正我在北大

或高聯對此一無所知。

【113】王丹和吾爾開希對學運組織隱瞞了他們的媒體策略，無論是「個人記者會」還是「便衣盯梢」，其實都是二人製造個人形象的媒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直到1991年巴黎會議上大家都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據當時接近二人的香港記者記述，「四二七大遊行後，學潮曾經沉寂下來，學生代表欲維持這股聲勢，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首先是吾爾開希匿藏起來，王丹以至其他同學散佈二人生命有危險，已被點名，隨時被公安逮捕。後來二人都承認這是策略，因為怕同學情緒渙散，再策動不起來。」(《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頁。據稱這個主意是王丹出的：「我們可以製造緊張氣氛」，見舒琪《天安門演義》第24頁，到海外後吾爾開希承認其實沒有便衣跟蹤)。據當時隨行的程真回憶，她也完全不記得有便衣跟蹤這回事(程真「六四口述實錄」)。又據在場的沈彤回憶，二人的「個人記者會」確實很「個人」，吾爾開希對記者澄清說他不是藏人，王丹澄清說他沒私吞捐款(“*Almost a Revolution*”，第208-209頁)。據記者羅綺萍的文章介紹，「吾爾開希還挺會與記者打交道，差不多每晚都親自或叫他的摯友到記者聚居的飯店」，見《香港經濟日報》5月11日3版「一個學運領袖的誕生——吾爾開希」。「個人記者會」是王丹和吾爾開希以個人超越組織的第一次突出表現，第二次是發起「個人絕食」。第一次時，學運組織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想到後來絕食的失控，就是因為已經形成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局面造成的。當時大家只是覺得個人見記者會帶壞風氣，但聽說有便衣跟蹤，二人又要求組織保護，也就沒多說甚麼。這樣也就未嚴格追究、對外澄清，這是學運組織的一個嚴重失誤，而我作為北大代表和高聯主席，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114】見中共國家教委「六四」後編印的《驚心動魄的56天》第68-69頁(香港註釋本第60頁)。王有才、彭嶸參加了這次

投票活動，也都記得那時完全按照章程罷免了研會主席團。彭嶸記得後來再也找不到研會主席黃維，直到「六四」後袁木到北大做報告，黃維唸問條，説「我是研會主席，會如實唸條子」，這時彭嶸在臺下喊「黃維，你早就被罷免了」，黃極其尷尬。見王有才、彭嶸「六四口述實錄」。黃維後來任復旦大學先進材料研究院院長。

【115】當時我完全想不到，所謂「便衣盯梢」其實是王丹和吾爾開希的媒體策略，為了引起外界關注「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詳見29日「個人記者招待會」一節的註。

【116】也可能和昨天一樣是王超華代理主持的。

【117】如28日辭職的馬少方就是另外一個藝術院校——北京電影學院的。

【118】實際上我這時犯了一個嚴重失誤，沒有意識到媒體的重要性，沒有對外宣佈高聯新換主席的消息，也沒太在意吾爾開希和王丹愛出風頭的毛病，致使外界很長時間都以為他們是北高聯的主席或負責人，導致名實不符及他們得以輕易凌駕於組織之上開展各種「個人行動」，如非組織化的「個人絕食」，而學運組織無力阻止。外界誤以為吾爾開希一直是高聯主席的例子很多，而對王丹則稱為「北高聯負責人」，但也有稱王丹為「高聯主席」的（如《香港經濟日報》5月3日8版）。

【119】後來才知道趙體國對沈彤和周培勝很有看法，並影響到柴玲等籌委會成員，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此前他辭過職，原因主要是對沈彤和王丹有看法。

【120】官方資料説有「美聯社、美國之音等20多家外國和港台地區新聞機構的40多名記者到會採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3000多名學生旁聽了新聞發佈會。」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62頁。

【121】一些官方資料誤記為王丹主持了這次記者會，如《中國六四真相》第254頁。

【122】這可能主要得怪我沒有盡力推動。我總以為讓一讓別的院校可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卻沒想到後來反而對大局不利。我做主席後也沒有在記者會上亮相說明北高聯的人事變動，致使外界一直誤以為高聯的主席還是吾爾開希甚至王丹，這反而助長了二人進一步凌駕於學運組織之上。如果當時就順水推舟把高聯遷至北大，五四宣佈復課、乃至個人跨越組織而發動絕食的混亂局面應該就會得到較好的控制，而校園民主的計劃也就能夠更好地推行。「六四」後我一直反省此事，覺得難辭其咎。

【123】據張伯笠回憶，對話前郭海峰征詢他意見時他支持郭去。後來郭受到大字報批評，張伯笠還在《新聞導報》第2期刊出一篇對郭海峰的專訪「為他主持公道」。見《中國之春》1994年2月號66頁；專訪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514-516頁。

【124】這個讓步在絕食後顯出弊端，即學運形成多頭組織，相互間的溝通和信任產生很大問題，如五一四對話就沒有協調好。

【125】一說主席制是在5月7日實行的。熊焱則記得他曾做過一段主席。5月11日晚高聯取消主席負責制，改為常委負責制(《70天大事記》第30頁)，大概是為了削弱開希的影響力，以阻止絕食。5月7日，開希在我辭去高聯主席後回任。

【126】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大家對沈彤、孔慶東跑去校黨委獻媚的反感。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

【127】沈彤對他落選這一段的憶述偏差很大。他很不滿意王丹當選，把他的落選歸因於柴玲故意沒通知他，又將熊焱描述為一個不講道理的膽小鬼，還借我的口說楊濤任主席的這屆籌委會只有3天任期（“*Almost a Revolution*”，第214-215頁、《回顧與反思》第78頁）。而實際上，籌委會五一改選後就進入黃金時期，變得非常堅固而穩定。外界不清楚甚至低估北大籌委會的作用，一是因為其中主要成員守規矩不去見記者出風頭，二是愛出風頭被內部邊緣化、但對媒體影響卻比

較大的成員誤導外界所致。

【128】據李祿在巴黎會議上的介紹，他到北京前「曾經串聯過十幾所大院校，在南大也參加一些社團，也是南京學運的發起人。南京到26日之前有三次大規模遊行，這三次都與我有關。」「四二六社論」形成的危險意識促使李祿離開南京，「到了北京後我去了各個學校，凡是有自治組織的學校我都去，凡是有廣播站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去演講」，並由此結識了一些活躍分子。見《回顧與反思》第499-500頁。

【129】這段試圖接觸鄧小平的經歷，柴玲在91年巴黎會議上有詳細敘述。見《回顧與反思》第112-113頁。

【130】一年後常勁才告訴我，那是他主持的理論信息部起草的，王丹拿到媒體上去唸，所以外界都以為是王丹起草的，且以為他代表北高聯。實際上學生組織做的大量工作都被一些個人拿去出風頭了，致使外界誤以為他們代表了學運組織。沈彤5月1日告訴記者，北大籌委會向高聯「提議發表最後通牒」(即12條請願)，但仍未獲高聯正式接納。見香港《華僑日報》2日2版。

【131】據吳稼祥說，張炳九是「新權威主義」陣營的「北派」領軍人物，當時在北大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他於1986年4-5月間，在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沙龍演講」中，作了題為《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協調》的系列演講，提出了「半集權制」政治體制是導向多元民主的過渡性階段的論點。新權威主義當時很得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首肯。據張伯笠說，張炳九是北大黨委辦公室主任，見《中國之春》1993年6-7月號合刊45頁。

【132】4月26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萬人大會上宣佈關閉《世界經濟導報》，撤銷總編欽本立的職務。江澤民因為緊跟中共強硬派有功（後來又將萬里扣留在上海），而最終取代了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

【133】我到海外後才知道，開希雖然躲起來沒來開會，卻在會後立

即召集眾多記者宣佈五四遊行方案，以至於外界當時乃至很多年後，都以為吾爾開希當時還是北高聯主席。我在4月30日當選主席後，沒有以適當的形式通告外界，導致某些個人與組織的脱節乃至凌駕於組織之上。這是我的責任，這時的遜讓實際上起了反效果。王有才對這種脱節現象評論道：「這才是問題的本質——就是説，學生運動和有些號稱『學生領導』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在五四的時候，你[封從德]是北大自治會的負責人和被派到北高聯的常委——當然，北高聯的選舉選你當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一個結構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你至少瞭解北高聯的情況和北大自治會的情況，所以你的發言、或北高聯其他常委經你們討論決定的發言，都是有效合法的；如果像王丹的發言就是不合法的，從理論上，至少以北高聯的名義是不合法的；周勇軍，是沒有經過你們同意他發言，也是不合法的。就這麼回事。他沒有合法性，當然他可以發言啦，但是沒有合法性，就是作為北高聯的甚麼是沒有合法性的。」見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134】運動期間我一直以為鄭義是作家班的，可能是因為他名作家，又老呆在作家班的緣故。我在北大碰見他幾回，還聽過他出主意。

【135】1991年巴黎會議上王超華説，3日晚北高聯常委還來北大討論過復課且準備次日宣讀決議，我則完全沒有記憶，也許就是因為睡著了。直到那時我的概念還是分批復課，理工科中小規模學校先復課，較大的、文理科學校可堅持罷課，保持對官方的壓力。一年後超華又回憶到那晚的一個「不正規的高聯常委會」(《百姓》1992年6月1日第10頁)，其中有幾點我不太理解：(1) 為何不是我而是另外一個「北大同學」在那個「不正規的高聯常委會」上？超華説開希、周勇軍與會，我沒印象那晚見過他們，超華提到與會的「北大同學」顯然不是我；(2) 超華提出「開希唸完《宣言》讓周勇軍唸

關於復課的決議」——但當時根本還沒有任何決議，據超華講直到4日在廣場上都還沒有復課決議(《回顧與反思》第75、114-115頁)；(3)當時我是高聯主席，還是超華推舉的，即便要唸宣言或決議也應該是我，為何在我沒有參加的「不正規的高聯常委會」上就另定人選呢？另據香港記者記述，周勇軍「承認5月3日北高聯商定三個方案，即5月4日遊行畢，宣告(一)5月5日復課，(二)5月8日復課，(三)各所高等院校自行決定何時復課。」(黎加路，《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8頁)。既然有三個不同的方案，顯然並未作出決議。

【136】這幅對聯當時還流傳另一個版本：避實就虛政府言啥立本/裝瘋賣傻國家何日東昌/袁〔緣〕木求愚〔魚〕。見《八九民運史》第190頁。

【137】據王超華回憶，周勇軍宣佈復課就是在孫中山像下。王超華還說是她建議周勇軍宣佈復課的，但由於周勇軍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宣佈復課，卻大大出乎她的意料，全場「當時在孫中山像前頭就跟他炸窩了。所以一回來，我和開希就說罷免他。罷免是我們兩個說的。」王超華又說，她曾到北大隊伍中叫我和王丹去孫中山像下與其他常委匯合，但我們顧及安全沒去，我完全沒這印象，且與我當時的心情很不吻合——當時我們找聚會點都快急死了。見《回顧與反思》第75、115頁；《百姓》1992年6月1日第10-11頁。《中國六四真相》則說是在紀念碑臺階上宣佈復課的，見該書第287頁。

【138】後來王超華回憶說昨夜高聯常委討論過復課，我完全沒有印象(見3日最後的註)；又說4日在廣場上最關心湊夠五個常委沒有，以便做復課決議，可見那時都沒有決議，復課是周勇軍擅自宣佈的。王超華和吾爾開希隨後就提議開除周勇軍。見《回顧與反思》第114-115頁。《香港經濟日報》6日3版記者羅綺萍引述王丹說3日他沒參加常委會、封從德代表北大擅自投票復課事後也沒交代，則完全是想當然——記

者顯然不清楚復課的討論及宣佈過程，更不知道當時我是高聯主席，王丹並不是北大駐高聯常委(她一日前甚至報導説王丹是高聯新主席)；王丹若真的那樣講，則明顯是在誤導記者。

【139】中國時報《北京學運50日》第39頁。

【140】一位香港記者也説王丹五四遊行後「已退出北大籌委會、北高聯常委」，見《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8頁。

【141】前天見丁校長，對《辭職書》中校園民主這部分有很多啟發，尤其是他提出北大可以試行「教授治校」的構想。另據周鋒鎖回憶，五四到絕食前，清華籌委會也與校方達成校園民主的共識：「我們完全跟校方都達成了一致，這裏面最根本的一個就是校學生會的完全直接選舉，另外一個就是校園裏的學生辦報的完全自治開放。這兩點呢,就是在當時經過了很多的努力，基本上是已經做到了。」他們當時還有一個《校園民主大綱》，內容也包括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看來也是被整個大多數包括官方開明人士所接受的一個框架，可惜當我們正式公佈的時候，就是5月13號，絕食開始了，而把校園民主和新聞自由這方面的努力給淹沒了。絕食計劃被提出來以後清華是很積極地反對，我想北高聯也是。」見周鋒鎖「六四口述實錄」。

【142】一年後，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余茂春給了我一份複印件。1998年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另外，香港專上學聯的學生也收集到這份《辭職書》並刊在他們出版的資料集中，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433-437頁。

【143】「民意投票」的數字有三種記載，但大致差不多：(1)《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84頁：1263張有效問卷，64.2%贊成繼續罷課，24%反對，11.8%棄權；(2)《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152頁，北大籌委會公告：發票數1476，992贊成(67.2%)，354反對(24%)，130棄權(8.8%)；(3)同書第154頁，北高聯聲明：853贊成(74%)，301反對(26%)。

另外，高聯還決定：1. 先由北大和北師大聯合罷課，再號召全市罷課；2. 活動以校園為主，辦講壇、出報紙、搞印刷，在校園內搞遊行示威活動。

6. 低潮到絕食 (5.7-5.13)

5月7日　星期日　晴

計算機硬盤又壞了

上午去遙感所，繼續寫論文，但是很快我用的那台計算機又壞了。其實，那台計算機並沒有修好，毛病同二週前完全一樣。這個重複的「偶然」，使我更加看清了學術在當今中國沒有前途，也讓我徹底下決心再次加入學運的行列。其實，我這幾天雖說已先「復課」了，心卻還在籌委會。

這時我去三教實地考察北大同學堅持罷課的情況。三教是北大新蓋的教學樓，五層樓房有四五十間教室，能容納三千學生。樓外高牆上那兩個「罷課！」依舊醒目。但進樓一看，大出我之所料：六成教室都在上課。

這與前次宿舍投票的結果正相反。我想，這是因為有些同學雖然投票罷課，但頂不住復課的潮流。如果一個班裏 1/3 的同學復課，那麼對不去上課的同學便十分不利，而這時就要期末考試了，不去上課必然吃虧。這種情形下，多數同學都得為自己打算，「反正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

中午在學三食堂打了飯，到籌委會，大家十分親切，依然忙碌。

認識「右派」沈澤宜

柴玲介紹了一位叫沈澤宜的老師給我。柴玲這時也回籌委



〔圖 29〕1989 年 5 月 7 日，沈澤宜對封從德和柴玲的影響很大，他是 1957 年北大右派學生，林昭的同學。

會了，見到我，將我叫出樓，與這個老師走到哲學樓，這裏安靜，沒人來打擾我們。沈老師是湖州師專中文系的副教授，【144】詩人，因到北大參加學術會議，正好趕上學運。〔圖 29〕

在哲學樓，沈老師給我們回顧了五七年北大學生運動的歷史，和他以後的命運。他是那麼激動，許多話在心中憋了幾十年。五七年時，沈老師是北大中文系學生。那次學運也發生在 5 月，他記得是 5 月 19 日開始的。起初只是在大飯廳（今學三食堂旁邊的電影院，離三角地不遠）外，貼有幾張並不激烈的小字報，針對黨團組織提意見。當晚他很激動，與同學張元勛用毛筆大字寫了一首詩《是時候了》，也貼到那牆上。從此，轟轟烈烈的五一九運動便在北大校園內如烈火一般蔓延。那首詩充滿激情，沈老師背誦了一段，內容是號召人們準備戰鬥，向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發起猛攻。他提到北大的譚天榮、人大的林希翎和清華的孫寶琮。他提到當時一份叫《廣場》的學生刊

物，及五四操場的一次學生集會。那時的學運，與今天的學運有無數相似之處。最後的失敗是慘痛的，他希望我們這些新學運領導人牢記歷史的教訓——絕不要相信共產黨。

為甚麼不能相信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從來言而無信。五七「反右」毛澤東所謂「引蛇出洞」的大「陽謀」，起初鼓勵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真有許多意見提出來，這些知識分子就都被打成右派。僅官方統計，北大右派一千多，全國則是55萬。處死的處死、判刑的判刑，沈老師本人被留校察看一年，後被流放陝北11年，文革中再被抓進監獄一年多。他一直沒能結婚。

沈老師還向我們講了一段親身經歷，他在運動中最後的一幕：當時為辦《廣場》雜誌他們募到一些錢。他和兩個同學去印刷廠聯繫，廠黨委書記很親切地接下稿件和錢。但等他們按時去取印刷品時，出來的卻是一群拿著木棍、怒氣冲冲的工人，指責他們沒有階級感情，竟敢批評共產黨。他們被扣留了半天，結果空手而歸。

「這麼一段歷史，完全被共產黨掩蓋得無影無蹤。他們就是不讓人們知道歷史，要割斷學生運動之間的思想聯繫，好讓學生永遠處在低水平上盲目行動。」沈老師最後說。

我們都希望他為北大同學講講這段歷史，於是決心在晚上為他舉辦一個演講會。我們一道來到28樓，找到趙體國，讓他找一個安全的房間，讓沈教師好好休息一下，我再三叮囑趙體國，一定要保證沈的安全。然後，我又到籌委會，請人寫了一張通告：

自由論壇

一段被埋沒了的歷史——1957年北大學生運動

今晚六點，三角地

由當時的親歷者演講

38樓交《辭職書》

北大為高聯提供了辦公室，在38樓129室。下午二點有個常委會，我去交我的《辭職書》。我去時還沒開始，但已有激烈的討論。我將複印稿交給王超華，希望她在北高聯開會時散發給各校代表。她還是一副漠然的表情，讓我感到一層隔閡。

高聯這時已購置了一台複印機，可能是用美國留學生寄來的捐款。記得4月底曾討論過，大約有七八千美元，折合人民幣有五六萬。當時急需印刷設備，以大量出版《新聞導報》和其他宣傳品，於是一致同意用這筆錢買一台複印機。記得是由美國的同學匯到四通公司，再由四通公司提供複印機，這樣既方便又安全。

我又到籌委會宣傳部找人將《辭職書》抄成大字報，同學見那麼長一篇，都不太願意。還是柴玲的人緣好，她找到一個同學願意抄。事後，他們都說此文寫得很誠懇感人。

到農工大找大哥

我準備將文章輸入計算機，因此下午又到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去。我大哥是那裏的博士生，他有台計算機可打中文，用打字機打在蠟紙上，這樣用油印機便能很方便地印出大量的文章來。

那裏離北大騎車需二十分鐘。我一進校門，驚訝地聽到他們學校廣播站裏播送的顯然是學生自治會的內容，這是我知道的第一個自治會成功佔據校方廣播站的學校。

找到了大哥，但那台機器的打印系統出了問題，因此我沒能如願。大哥對我的態度也出我意料。他得知我又捲入學運中後，居然沒有一句批評，只是保持沉默。記得兩年前他得知我被公安局抓了之後，深為擔憂，同我爭論了一個晚上。他本人那時剛入黨不久，就逼迫我立即寫份入黨申請書。但那晚的爭論之後，他感到我確實已有獨立的思考，就不再逼我了。這次

大哥沒說甚麼，但我感到我們的隔閡減少許多。

沈老師的演講會

下午五點，我趕回北大，籌備沈老師的演講會。[145]演講會時間訂在六點，正是同學們吃完晚飯而天又沒黑，聚到三角地讀大字報的時間。我將籌委會的音箱、話筒搬到28樓下，再抬一桌子使演講人站得比聽眾高，便自然能吸引周圍的同學來聽。

天公不作美，演講剛開始便下起雨來。雖是這樣，28樓下還是聚集了上千同學聽演講。沈老師講了一個多小時，把給我們講的故事又敘述了一遍，依然那麼激動。聽的人越聚越多。最後，沈老師朗誦了那首詩《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年青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
一齊都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
背地裏憤慨，
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是時候了，
向著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與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為甚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
為甚麼，有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甚麼，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談？
為甚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廣播討論堅持罷課

沈老師演講後，大家通過廣播系統熱烈地討論起來。基本上都是堅持罷課的內容。有的同學認為罷課是自願，上課是權利，籌委會不能干涉；但更多的同學激動地指責復課的同學「沒有良心」。這次聚會，多數是些堅持罷課的同學。

一度大家情緒比較激動，指責擅自宣佈復課的周勇軍，憤慨地喊「打倒學賊！」當時有個同學給我說了一個情況：4月18日幾千同學在新華門靜坐請願時，周勇軍等學生代表進去與政府人員談判，出來時，軍警正在打學生，這時有幾個便衣護著周勇軍，對士兵說：「不要打這個同學！」講這情況的同學

並不認識周勇軍，但他認出就是廣場上宣佈復課的人：「別的代表都挨了打，就他一點事兒都沒有……沒錯，就是他，白白胖胖的，穿一身西服。」

5月8日 星期一

李淑嫻的錄音

這天在籌委會廣播站聽到幾個同學採訪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的錄音。黨內文件指責他們夫婦是學運煽動者，李淑嫻對此非常憤怒，甚至寫了上訴書交到物理系黨委，希望黨中央組織調查文件中的種種不實之詞。她認為用文件散發這些不實之詞，是「有組織的造謠，是組織對一個黨員的迫害。」她反駁道：說我們能把全國幾百萬大學生煽動起來遊行，簡直是把我們捧成神了，要真能煽動，才真是我們的光榮！你說能煽動，你怎麼不煽動煽動試試？

談到王丹，她稱他是「看著長大的好孩子」，但這並不能證明她給王丹出謀劃策煽動運動。她是人大代表，「與自己的選民接觸，瞭解民意，難道有錯誤嗎？！」

我決心改造廣播站

由於計算機徹底壞了，想做論文也沒用，於是心思完全回到學運。但既已辭職，我也無心再回籌委會常委會去成日開會。到各部門轉一圈，大家依然歡迎我。經過一番考察，發現廣播站是個薄弱環節，而缺乏交流渠道是籌委會與普通同學之間許多誤會的根源，我認為自己比較適合去主持廣播站，並在三角地辦一個「自由論壇」。這時的廣播站要麼唸稿子，要麼名人演講，都是關在28樓一個房間裏進行的，而不是直接面對聽眾。這樣單向發聲，聽眾沒有參與感，熱情不高，效果不

好。我決心改造廣播站，將話筒拿到群眾中去，昨晚沈老師演講會的成功加強了我這個決心。

想法雖好，做起來卻非一帆風順。傍晚，我好不容易調整了廣播時間，將話筒拿到三角地去主持，但衝突還是爆發了。這時實際主管廣播站的是無線電系的陳林，他習慣將廣播內容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擔心敞開的園地由大家即興演講，難免出現反黨言論，給政府以口實，不利於學生組織。陳林的顧慮不無道理，但還沒理解我的想法便要辭職。由於廣播器材和線路都由他安裝，這樣辭職有點用技術來要脅的意思。我沉默了一會，接過了陳林手中的話筒，說：「你不幹我幹，明天晚上還在這裏公開演講。你難不倒我！」其實，我從小對電器很感興趣，眼睛近視不是因為讀書，而是製作收音機每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撥弄電子元件的後果。

在場的同學熱情地為我鼓掌，支持我的行動。我隨即用廣播招募到一個懂技術、願跟我一塊幹的同學，約好明天一早重新佈置廣播線路。

學生罷課，老師罷教

於是，和昨天一樣，大家通過廣播系統熱烈地討論起來，這就是「自由論壇」。快結束時，許多同學商量著要拉起隊伍遊行，準備鼓動同學們去教師宿舍區遊行，請求老師出面支援，參加罷教罷課。喊了半天，總共聚了一千人。

這時已十點半，我們出西門進到蔚秀園，氣氛便莊嚴起來。北大教師宿舍區分散了好幾塊，蔚秀區是教師最多的一片。我們在蔚秀園裏高喊：

「學生罷課，老師罷教！」

「師生團結，堅持罷課！」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打著的橫幅上寫有：「堅持罷課，絕不罷休」，「爭自由

求助師恩」之類。許多黑屋子開了燈，但很少老師下樓，只在窗戶邊為學生助陣，有的甚至放了幾支煙花。快出蔚秀園時，有些青年教師下來在路邊歡迎同學，有位老師舉了一張趕寫成的橫幅：

「我們的血是一樣的熱！」

從西門回校園，沿未名湖北岸走，這裏的幾幢紅樓住有一些青年教工。然後大家去了未名湖邊的朗潤園，重複在蔚秀園喊的口號，又原路回來，等到了去東門的叉路口，選擇去中關園的同學只剩下三百多人了。最後由南校門返校，我們整理隊伍，排開方陣，打出橫幅和旗幟，唱著國際歌，整整齊齊進了學校。在南校門那條住有大部分青年教師的大路上威風一陣之後，終於解散，各自回宿舍休息去了。

5月9日 星期二 多雲間晴

創辦北大自由論壇

上午，同昨晚約好的同學去中關村購置電訊器材。我們買了一百米電線、兩個燈泡、一隻話筒、一隻小型工具包、一把電烙鐵及一些雜物。回校後便改裝廣播系統，將話筒牽到三角地，再從廣告欄後面27樓廁所內接來電源，現場演講設施便安裝好了。

我想好名稱，請同學寫了一張海報：

自由論壇——學運向何處去？
自由演說，自己負責
北大言論自由的陣地
今晚六點至十點

自由演講效果顯著

經過兩天摸索，這天傍晚六點正式開始「自由論壇」。

「自由論壇」採用自由演講的形式，強調「自由演講，自己負責」的原則，這時實際上已不單純是籌委會的宣傳機構，而是一種近乎中立的輿論陣地。這種形式極富感染力，因為上來演講的同學都是即興演説，有感而發。由於抒發感受的機會實在不多，又積鬱太久，個個都感情充沛。演講者能既時得到反饋，因此觀點敘述得更加詳盡分明。講得好的，大家鼓掌希望繼續；講不好的，很快就得下臺；觀點不同，當場辨論，大家對問題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和更為深入的思考。

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陣地，也是群眾激情得以發洩的場所，減輕了籌委會許多應付建議者的壓力。通過自由論壇，同學們可以方便地向籌委會提出建議，使許多熱衷於探討戰略的同學有英雄用武之地，且當場獲得反饋，問題越辯越明。籌委會也可以公開地向大家解釋自己的決策原因，使組織程序透明化，拉近與同學間的距離，這正是我當時追求的目標。這樣的效果，是關在屋內唸稿或演講的「正規形式」所望塵莫及的。

陳林看到自由論壇的效果，對我的態度也大大改觀，轉而盡力協助我。

5月10日 星期三 陰，小雨

自行車大遊行

下午二點從學校出發，作「環城自行車大遊行」，聲援記者爭取新聞自由。[146] 這個主意，是楊濤在8日晚的籌委會上提出的。[147]後來北高聯作了統一安排，發動全市高校一齊出動。這樣的遊行很具「中國特色」。大部分同學都有自行車，大家已倦於徒步長征式的單調遊行，因此很容易接受。形式既

新穎，又能形成浩大的聲勢。這時北京的學運已滑入谷底，需要浩大的聲勢助威。

薊門立交橋是預定的各校會師地，這裏是全市高校的幾何中心，政法大學和北師大就在附近。北大的隊伍幾乎是最後到達，這時已被擁擠的人群阻攔，不能通行。我指定一輛小三輪為指揮車，讓二人坐在車上打著大旗，請同學們讓出快車道，疏通了道路。交通終於沒有長時間的堵塞。

隊伍從薊門大橋向南走，經禮士路到復興門，上到西長安街。這時大家跟著政法大學的隊伍向西，去中央電視臺，在發射大樓下，喊了半個多小時的口號：

「中央電臺，顛倒黑白！」

「人民日報，胡說八道！」

然後去宣武門附近的中宣部、和平門附近的新華社，照例都喊一通口號，再繼續向東，穿過前門，再上長安街向東，目標是人民日報社。

在東長安街上，我們得知離人民日報社的下班時間只差不到半個小時，於是將兩隊人馬派作為先遣隊，飛奔而去，要趕在下班前將他們攔住。最前一隊人馬三十來人，打著「北京農業大學」的旗幟，「北京大學無線電系」上百人緊隨其後。經建國門外大街的一座立交橋向北拐，上東大橋街，再走五六里，便找到了人民日報社所在的三里屯。

人民日報門前抗議

人民日報社的大門很氣派，水泥墩的柱子之間一道橫廊，上面安放著幾個斗大的字「人民日報」，是照毛澤東的書法放大的。大門連著兩側的高牆，裏面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其中的人真的不知世人的呼聲嗎？四二六社論由此而出，完全違逆人心。

人民日報社大門前有塊空地，同學們便滯留在這裏喊口號。前面的同學喊夠了，才緩慢地向前挪動，後面的接著喊。

門外群情激憤，門內則空空蕩蕩，沒有幾個人影。後來聽說報社的編輯、記者們那時候也在籌劃衝出這堵高牆與學生一道遊行。我們正趕上下班時間，很多人圍觀，同學就開始演講。有的市民圍上來，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北大作家班今天非常出眾，聯合了許多知名作家，如鄭義、趙瑜、蘇曉康、柯雲路等，每人胸前斜披掛一道白布標語，註上大名和作品，威風凜凜地或坐在三輪車上，或走在隊伍前面。三輪車上張伯笠打著一面白布大旗，走在北大隊伍前列，「北大作家班」幾個剛勁的大字寫在旗上，很是醒目耀眼。

柴玲和我登上三輪車，拿著話筒帶領大家喊口號，下面是一片黑壓壓擁擠的人群。〔圖 30〕

「人民日報，造謠日報，不說真話，好好改造！」

「袁木袁木，造謠有術！東昌東昌，騙人有方！」

「立本立本，說話沒準兒！」



〔圖 30〕1989 年 5 月 10 日，柴玲登上三輪車，在人民日報社的大門帶領大家喊口號。

柴玲一直帶著喊到嗓子發啞。眾人很高興跟著喊這兩句口號。一個半小時後，直到學生隊伍走得差不多了，我才蹬上自行車，去追趕前面的隊伍。一路上都有市民立在路邊為同學們鼓掌，這時約在七點，市民已下班吃飯，天還沒有黑。我們剛走幾分鐘，有個市民捧了一籮筐油條從路邊迎上來，招呼我們：「嗨！學生，餓了吃點再走！」再走一段路，又有一個個體戶模樣的人端了一籠屜包子立在大街上，讓同學們拿了吃。一派簞食壺漿的景象。

聲援北航

從三里屯，經東直門，沿護城河再過安定門、德勝門，到了豁口，才趕上大隊人馬。這裏是各校分道之處。過北師大、北太平莊，到薊門橋時隊伍僅餘不到三千人，大部分是北大同學，也有語言學院、清華的同學。「北大作家班」的大旗和三輪車做了指揮車，我們商量著北行去北航。這時，天已開始黑下來。

去北航遊行是大家臨時的決定，因此我先進學校，一來通知北航的同學，二來也好安排遊行路線。我記得北航北面還有道小門，從那裏去清華可省很多路。我找到北航學生宿舍區，向他們喊了幾聲「遊行隊伍要進校了」之後，趕快折回頭，剛好在路口迎上隊伍。我走在三輪車旁邊，帶著隊伍向北拐，不一會便有北航的同學過來。

選擇北航是為了聲援。北航是學運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最近校方壓力極大。據說校方管黨務的是方勵之的兄弟，卻很左。北航的學生自治會在校方的高壓下，只能秘密活動，加上是工科學校，功課壓力很大，因此北航同學復課的很多。【148】

因為曾是軍事院校，北航的教學區是保密區域，用高牆圍起，門口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我們遊行到這裏，自然是進不去的。圖書館不在教學區的圍牆之中，館前有個空場，我們聚在那裏，隨三輪車上的錄音機高唱《國歌》與《國際歌》。圖書

館內有許多同學自習，紛紛開窗或乾脆出來隨著遊行。到了學生宿舍區，有北航同學給我們介紹11樓罷課最堅決。這裏有幾排三層高的宿舍樓，我們抵達時，樓上樓下口號聲連成一片。我們的口號是：「北大北大，聲援北航」，「北航北航，罷課不怕」之類；樓上的同學則喊：「北航北航，罷免校長！」之類的口號。

便衣嚇唬柴玲

出了北航北門，是一片農田。這時天已經全黑了。路很窄，兩旁稀疏的楊樹枝在晚風中沙沙作響。同學們誰也不再大聲説話，靜靜地推著自行車向西走。一路上黑燈瞎火，柴玲同我默默地走，間或對我輕輕講起今天隨作家班遊行的感受。她沒騎車，隨那架三輪車遊行。她同我説起鄭義，説起趙瑜，説到種種有意思處。不一會兒遇到鐵路。從這裏，向西可去中關村，向北則去清華。疲乏的同學要向西走，堅定的同學要向北，於是產生短暫的爭論。

混亂中，柴玲走在隊伍後面，同另一個人聊天去了。後來她告訴我，那人坦言他是便衣。這讓我吃了一驚，不免為她擔憂起來。但便衣對她並沒惡意，也許只將她當成一個天真可愛的小女孩。她從便衣處得知反革命罪已加刑到十七年，又問他對學生領袖會不會下毒手，於是又得到一句更可怕的坦白：「幹我們這一行的，本來就是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那人個子很高，使我想起王振群。

清華學生廣播站

隊伍終於選擇去清華。進清華南門很順利，比我與熊焱那次容易多了。進校前我們整齊了隊伍，清華同學帶路，不久，一隊清華同學出來歡迎，隊首還拉了一塊紅布橫幅。這時下起

了小雨，兩支隊伍在雨中會師。他們有三百人，我們有一千人左右。隊伍走到清華的「三角地」——學生食堂前，有個清華同學認出我是4月20日在清華演講的北大籌委會成員，於是請我上他們的廣播站，「再為清華同學鼓動鼓動」。

清華學生的廣播站，在那幢十幾層的研究生樓第六層的中央活動室中。室內空蕩蕩的，只有一張桌子上放了廣播器材，滿地的電線各處的喇叭。室內有三四個同學，其中一個拉我到旁邊一間宿舍，商量我演講的內容。他們似乎有審查我演講內容的意思，只是不很明顯，可能擔心怕我講得太出格收不回來。

清華校方比北大強硬，學運情況介於北大與北航之間。他們的特點是基層鞏固而高層鬆軟；自治會領導層常處於半隱秘狀態，又時常宣佈更迭和解散。但有一間這樣規模的廣播室卻出我意料之外。我記不清這些同學中是否有周鋒鎖，但後來在廣場上，當我們各建了一個廣播站時，我對他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149】

在清華廣播站我講了十幾分鐘，主要介紹今天的遊行、北大近日堅持罷課等情況，並向他們報告有關堅持罷課的消息：北師大罷課堅持到8日，明天將重新罷課；北外已於今日恢復罷課，農大明日罷課。我也向清華同學介紹北大「自由論壇」的形式，希望他們也去北大演講。

北大隊伍只在清華校園走了一圈，便趕著回校了。我一個人從清華西門出來，雨還在下。回校之後，找了一間同學宿舍睡下。

5月11日 星期四 陰

沈老師離京前給我名單

上午在29樓時，聽說沈老師要離京返校，便出來送他去

火車站。他住在北大南門外的海燕旅社，我們就一道走著去那裏。一路上，他又同我講了許多。他感到政府現在是在採取拖垮學生組織的策略，並用「黑手」、「長鬍子的人」等字眼來威脅知識分子，使學生不能取得以前歷史的經驗教訓，切斷民主運動之間的聯繫，使每次運動皆在迷茫中窒息。

於是他又講了許多五七年北大學生運動的情形，最大的教訓是學生對共產黨的欺騙性沒有足夠的認識。「那完全是一場騙局」，他激動地對比當時共產黨在前後幾個月間180度的轉變，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引誘知識分子提意見時的「開明」態度，到一下子翻臉不認人，進行「反右鬥爭」的殘酷鎮壓。「有天夜裏，毛澤東來到北大校園，北大黨委書記陪同，打著手電看完了大飯廳周圍貼的大字報，一直沉默不語，最後說了一句話：『北大的學生，百分之四十都是右派！』」而直到判刑之前，許多北大學生還對共產黨存有幻想。

沈老師給了我他幾個北大教授的地址，也有方勵之的，希望我去找他們。

到了海燕旅社，我等在樓外，不一會他提一隻破舊的黑色手提包，右手拿一把傘。這是他上京來的全部家當，我心頭一酸，卻從此更敬仰他的人格。沈老師不讓我去火車站送他，說一週之後，他將學校的事情處理完，會再來北京找我。

翻錄磁帶徵集簽名

回到北大，我趕緊去電教取翻錄的二百盤磁帶。內容是方勵之採訪與沈老師演講的錄音。我因主辦托福班，一直與電教人員很熟，翻錄磁帶對他們也有收益。將磁帶取回29樓，交給籌委會宣傳部散發。

吃過午飯，我又到電教大樓。這裏有一個計算機室，我準備用計算機打印一個徵集簽名的樣式，邀請戈爾巴喬夫到北大

來演講。這是北大籌委會這幾天開會提到的事情，智囊團一個老師建議籌委會，向校方提出給戈爾巴喬夫頒發「名譽博士」的證書，即支持他在蘇聯的改革，也成為北大的榮譽。

由於我不太熟悉中文系統和打印機，一直試到下午三點半，才在十幾張式樣中挑出一張滿意的。到27樓的複印社複印了足夠一萬四千北大學生簽名的數目，帶到籌委會，讓大家到各系徵集簽名。

教授們婉拒出山

我帶了兩盤翻錄的磁帶，去北大教師宿舍找沈老師介紹的那些老師。但都不巧，沒有人。方勵之的工作地址是沈老師給我的，但那時我無心去找他。一來傳聞他有心避開學生，不願增加運動的複雜性，二來也受我一個文科朋友的影響。他說，「方勵之和溫元凱怎麼能評為中國幾大思想家之一？真是笑話！」

傍晚按名單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幾位教授，他們都用委婉的語氣拒絕出山。我在三角地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其智慧與勇氣，但與面前的人有一段極不真實的距離，使我既疑惑又沉重，不理解他們那種驚弓之鳥的樣子。還好，有一位教授【150】在沉吟片刻之後，交了四百元人民幣到我手中，說：「我年齡已老了，心臟也不好，不能對你們有甚麼用，只能用這點剛收到的稿費，略表我的一點心意。」我將那盤磁帶各給了他們一盤。

下午五點是北大老師下班的時間，我準備去教師宿舍區找名單上的那幾位。去之前，我先到王丹的宿舍，見他愣愣地坐在桌旁，似乎在想甚麼。當我向王丹提到那幾個老師的名字，希望他同我一道去時，不知何故，他似乎有一種不屑的表情，言詞之間頗不願意。於是我又同他聊了些別的。

學生運動走向低潮，自治會在艱難中維持，人心浮動，動嘴提議的人多，實際投入的人少。王丹按照之前與我的約定，也辭去了北大籌委會的職務，但顯然他的活動並沒停止。從他的表情看出在這種形勢下，他也很困惑。我們都有一種失落感，卻不清楚失落了甚麼。

我說：「我今晚要罵人。」

王丹說：「好，我也正想罵人。」【151】

自由論壇上熊焱發火

晚上的「自由論壇」依然由我主持。幾乎不用甚麼開場白，便有同學拿了話筒講起來。冷場的情況不多，很快便又有人鼓起勇氣拿過話筒，大家報以鼓勵的掌聲；若講不好，則用掌聲轟下去。

王丹和我都沒有照先前說的去罵人，只是含蓄地提到一些阿Q，只顧在精神上勝利，實際上卻是害怕。不過，見同學們情緒激昂，我又抨擊了另一種心理：「不要因為恐怕自己走得太遠，就要拉著別人一道走！」我以為，民主是大家的事業，不應該是少數組織者的「己任」，否則在運動高漲時便會貪功，低落時則怕受罰。基層的群眾也不能將運動看做是組織者的事，這種心理只能造就新的專斷。當時一些同學有股情緒，以為復課的同學背棄了運動。這種情緒本屬正常，但指責得太過火時，我又感到必須加以控制，因為我們並無權利阻止任何人上課。最後，我對知識分子的表現也表示了失望。

王丹說了甚麼記不清了，倒是熊焱不指名地罵了起來：「有那麼一個教授，我們只是想借用一下電話，他卻不給！」這段話讓我吃了一驚，後來柴玲去問他，才知道熊焱指的竟是其岳父。原來，美國來的捐款需同北大籌委會聯絡，熊焱想用一下岳父家的電話，卻遭到拒絕。熊焱與丈人在政治觀點上的

不和是很早就有了的。他實在是個按捺不住火氣的人，在他的意念之中，似乎正義感比親情更重要。

王丹柴玲等準備發動絕食

柴玲晚上告訴我，她已開始在許多學生宿舍串聯，準備發動絕食。特別提到兩個宿舍的「哥們兒」對她的支持。【152】後來我才知道，發動絕食的另一條線索，是王文、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楊朝暉等六人11日中午在一間小飯館內吃飯時商議絕食。【153】這兩條線索有甚麼聯繫，王丹與柴玲有過甚麼共識，我則不清楚。

關於絕食，大約在5月9日便有一張大字報，署名「25樓部分博士生」，其中提到，絕食是學生可以利用的最激烈手段，但勿輕用，方式可以是到天安門廣場上輪流絕食，每次保持在二百人左右為妥。【154】

之後不久，這些博士生中有個認識我的，【155】見到我又提及此事，商議結果，認為可在校園內發起「哀兵之勢」，坐在宿舍內絕食。那時許多人想到絕食，是因為眼見復課勢頭很猛，對話似乎遙遙無期，在諸多方案中，絕食最為悲壯。大家甚至考慮過軍隊包圍學校的可能性，因此在那博士生同我討論之後，我曾秘密地讓管財務的蔡健撥出一筆錢來，買一千米白布和足夠的麵包。白布用在絕食的宿舍樓外，靜靜地垂下大幅的橫幅標語，使校園產生一派悲壯氣氛；麵包則是準備作長久堅持，以防軍隊將我們困在樓內。不過，這個計劃最終並沒實施。當時對絕食的考慮還不很嚴肅，隨後也將之淡忘。【156】

今天，「42樓部分研究生」又貼出一張《緊急建議》：

「鑒於目前嚴峻的形勢，我們建議破釜沉舟，採取如下緊急措施：A. 集體絕食，具體時間、地點可商量；B. 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於戈爾巴喬夫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作最後拼博。成敗在此一舉，同胞們一起努力。」【157】

這時，同學們感到的「嚴峻形勢」和希望採取絕食等激烈手段，與一條線索的發展有關：即政府一再地拖延對話的時間，顯然是想趁學運走向低潮時拖垮學生組織，使對話不了了之。

對話一拖再拖

每天都有關於對話團與政府交涉的消息，這時同學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否對話上。5月6日，23所高校署名的《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請願書》由團長項小吉、副團長沈彤等人遞交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希望在5月8日下午三點聽取答覆。這次對話請願的口氣，比5月2日王丹遞交的對話請願的口氣要緩和許多，既未明確指定官方代表的級別，也沒在對話細節上提要求，基本上是意向性的請願，首先要求對安排對話進行磋商，因而對對話也就有了更長期的打算，不再是一蹴而及的單次性對話。5月8日下午三點，項小吉等四人去國務院信訪辦等處詢問結果，答覆是政府請「學聯」去收集如何搞好對話的意見。這又是一場騙局，所謂「學聯」完全是官方組織，政府根本沒有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的意思。然後又是「在5月11日答覆」、「5月13日某時答覆」之類的情況通報張貼在三角地，這幾日的各種遊行，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為了支持對話團向政府施壓。

聽到柴玲說要絕食，我沉默了一會兒，這時是否應該採取這種最後手段，我無法作出判斷；她似乎也沒有得到籌委會多數的支持。籌委會有種種顧慮，要反復討論表決，【158】這太慢，因此，柴玲想先發動基層的同學。對此，我採取了聽任的態度，只準備在我主持的廣播站方面提供公共言論的平臺，卻不願意在聯絡上有甚麼幫助。我不清楚她在發動絕食時串聯了甚麼人。

5月12日 星期五 陰轉晴

廣播站、自由論壇時間表

清晨六點，我被鬧鐘吵醒，趕緊到29樓106辦公室，將廣播器材搬到28樓去。蔡健在屋裏值班，燈開著，見我進門，雙眼還迷迷糊糊。我將擴音器、話筒和導線等搬上28樓2層的樓道中，放在桌上，接上導線試好音，準備開始一天的播音。

這時，我已制訂了一日三次播出時間。早上六點半至八點，中午十一至十二點，下午五至六點。然後是每晚的「自由論壇」，一般從七點至十點半，最多不超過十一點，因為27樓的「部分教工」和學校周圍的居民提過意見。我們在28樓頂上增設了四隻高音喇叭，有一只喇叭正對27樓。有一晚接到他們的「建議書」，希望我們十點半結束，在場同學多不以為然，認為是官方動作。但在別人眼裏，十點過了就要休息，我認為不能去猜測人家的動機，因此堅持在十一點收話筒。

早晨先是轉播官方新聞節目，實際上接替了校廣播站的功能。校廣播站已經有一兩個星期沒有播出了。轉播中共「喉舌」是必要的，這是我們探究官方態度與動向的一個渠道。然後，我們又將美國之音的新聞錄音作為對照提供給同學們，這是獲取大陸各地民主運動最新消息最正確、快捷的途徑。有時，躺在 28 樓上就可聽到樓下三角地的大字報內容。

白天廣播隨時可用，播出學生組織的各種通知。中午廣播時多播一些稿件，也請人演講。但每天最重要的還是晚上的「自由論壇」，吸引的人也最多。

陳林等無線電系的同學還組裝了一套調頻廣播系統，校園附近都可方便地收聽。

包遵信在民主沙龍演講

下午三點，「民主沙龍」在塞萬提斯銅像下的草坪上集

會。我帶了廣播站的小錄音機和話筒，去現場錄音。草地上近百人，或坐或站，圍成一個大圈。我坐在最裏層，以便錄音。〔圖 31〕

王丹遲到十來分鐘，領著包遵信匆匆趕來。包遵信是歷史學家，他講民主與人權，認為四二七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頁，是人民力量的勝利，與「五四」運動一樣將名垂青史。[159]

在等王丹、包遵信來的時侯，大家已自發講了一些。其中一個口才極好的武漢同學，給我深刻的印象。我認出他就是昨晚在自由論壇上介紹武漢的學生運動的那同學。他對「在場的便衣同志們」開玩笑，說自己是不怕坐牢的。「我若坐牢，是一份光榮，終究會得到人民的承認；而我出獄之日，則是你們坐牢之時！」



〔圖 31〕1989 年 5 月 12 日，包遵信在民主沙龍上講話。左邊是封從德拿著話筒，在為廣播站錄音。

學運組織反對絕食

柴玲後來告訴我，那天下午她與北大籌委會同北高聯商議絕食時並不順利。北高聯基本持否定態度，王超華極為反對。但由於高聯在絕食後轉而領導絕食，柴玲從此對超華頗有反感。北大籌委會本來就致力於校園民主建設，[160]這時更從現實角度出發，認為此事關係重大，需要考慮許多善後工作，而這時一來忙於運動中一些具體事務（如組織聲援農大罷課、歡迎今晚趕來的「上海七人聲援團」之類），二來籌委會人手不足，於是在起初持謹慎態度，最後答應負擔起對絕食同學的後援、保安等工作。[161]

自由論壇上柴玲王丹倡議絕食

首次公開組織絕食的場合，是 12 日那晚北大三角地的自由論壇，這是繼4月19日以來最為壯懷激烈的一夜。氣氛從一開始便十分熱烈。柴玲作了一篇簡短的絕食倡議，感人至深。王丹從人大趕回來，向同學們傳達當晚在人大的幾個學者的演講內容，作為一種鼓舞。他提到遠志明、于碩等名字，都是我第一次聽說。他引述他們演講中精彩的內容，使大家感到知識分子開始起來支持學生運動了。但大家很遺憾北大教師的沉默，說：「北大師生是五四的先驅，現在別的學校老師都敢站出來支援學生，北大老師為何不敢？

有個身材健壯而表情純真的物理系學生，聽到大家決心絕食，非常激動，說：「我以前想先沉下來多讀點書，深入研究中國的國情，我想做一個未來的毛澤東。現在我要加入絕食！」

群情激憤中，當場有好幾個同學發表演講，宣佈參加絕食。有位同學朗誦了他的詩作，內容是「紀念碑」，非常感人，用了許多隱喻。演講內容廣播站都有錄音。我說要將同學們的絕食通電全國。當絕食同學倒下後，我會組織第二批絕食

隊上陣。這時我更關心絕食的組織情況，擔心沒力氣跑前跑後，就沒有參加絕食。[162]

群情昂然之後，王超華[163]代表北高聯作了「理解與支持」的聲明，希望絕食同學注意身體，並承擔了後援與糾察保衛工作。作這樣的聲明，實在證明絕食不是學生組織的本意，他們只是將絕食同學視為一個因支援學運而新興的、與以前學生組織幾乎平等的團體。[164]

北大21樓全體青年教師決定支持絕食同學的請願活動，並要在同學們出發前於燕春園（北大最好的餐廳）為大家餞行。他們將這樣的聲明在廣播中播出。

在自由論壇上，王丹與柴玲似乎是共同倡議者。在我的印象中，柴玲在最初發動上的感染力和組織作用比王丹更大些，因此，後來在廣場上柴玲成為絕食總指揮，我並不吃驚。這個印象並不是我同她的關係使然；實際上我們一直是各行其事，能在一起交談幾句的空檔都很有限。[165]

5月13日 星期六 晴 晝25℃ 夜8℃

翻錄二百盤錄音磁帶

廣播站六點半開播。七點吃過早飯後我到28樓找陳林。他答應過整理昨晚自由論壇的內容，我好拿到電教樓翻錄，以廣為傳播。到他宿舍時，他還沒有整理好，我接著弄好後，去電教聯繫翻錄二百盤，又取回前日翻錄的二百盤磁帶，並在複印社作了磁帶的封面，圖案複印的是四二〇警察打人的照片，以便擴大宣傳作用。

將二百盤錄音帶搬到28樓的廣播站，請了兩個同學幫忙裝盒與散發，許多來廣播站的外校同學都免費送了一盒，或視情形收幾塊錢。[166]

彭嶸趙體國帶領宣誓絕食

忙完這些事，我聽說絕食同學要在29樓外宣誓，便又帶了小錄音機去作錄音。近千學生圍在29樓外「民主與科學」（D & S）金屬雕像的臺基周圍。雕像是我們82級學生在1986年畢業時捐建的，將D和S兩個英文字母塑作立體模型焊在一起，很有現代風格，卻取材於五四運動的兩個主題：民主（DEMOCRACY）與科學（SCIENCE）。這個口號在中國喊了70年，而今同學們卻還要從這裏再出發，並為之絕食，實在是中國的悲哀。

彭嶸站在臺基上，用話筒召集絕食同學，舉行宣誓儀式。臺基上立一塊黑板，寫有絕食誓言，趙體國立在旁邊，掃視頭纏白布帶的絕食同學，然後拿起話筒，用他那天生帶有軍人風格的語氣與神態，抑揚頓挫地說：「你們都明白絕食意味著甚麼嗎？那意味著你們必須拿出獻身的勇氣！別以為絕食之後還能偷吃點東西，誰要是抱著這樣的僥倖心理就不要在這裏宣誓；誰要是絕食之後還這麼做，誰就是對別人的出賣！」〔圖32〕

趙體國的話很有分量，講得也很是時候。這時北大還只有幾十個同學自願絕食，都是些最硬氣的學運分子。許多同學還在猶豫，趙體國這時的警告，保證了參與者的素質，無論是身體還是意志上的。昨天我擔心絕食是否真能堅持，柴玲依然帶點玩笑的口吻，但今天的氣氛卻嚴肅多了。

只見趙體國舉起右手，同學們也舉起右手，然後一字一句清晰洪亮地唸起《絕食宣言》：

「我宣誓」——「我宣誓」，嘩地一大片。

「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宣誓人」——「宣誓人某某某」。嘩，又是一片。

然後，絕食同學去燕春園。



〔圖32〕1989年5月13日，出發前，趙體國拿著話筒、彭嶸(左一)帶領北大絕食同學宣誓，封從德在人群中拿著錄音機和麥克風錄下誓詞。

柴玲唸《絕食書》

我回到廣播站不一會兒，柴玲趕來。這時正有一個外校同學同我商量甚麼事，好像是何貴方，柴玲便抓起話筒，在一邊動情地唸起了《絕食書》。

這便是《絕食書》，後來幾乎每本八九民運資料集都必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柴玲起草的。她在校園一個僻靜的地方，寫下這份宣言，然後找北大作家班的白夢作了潤色。【167】當她在廣播站唸這篇足以代表一代中國青年學子心聲的誓言時，已經非常嚴肅，再也不是昨日那種開玩笑的神態了。

我雖繼續與那同學討論，卻從一開始便為柴玲錄了音。當她唸到一半時，我已被《絕食書》震撼。之後，我在廣播中反復播放其錄音，常常都會淚流滿面。後來知道，許多人都流了淚。【168】

「絕食書。絕食書。」開始是她輕細柔弱的聲音，給人一種好像是在同人低語的感覺，又像在提醒世人，顯得既無奈又堅決。

> 在這陽光燦爛的5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將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是，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心甘啊！
>
>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存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知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
>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
> 我們不喊，誰喊？
>
> 我們不幹，誰幹？
>
>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稚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

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真誠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真誠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一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舉在你(們)的心口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了甚麼？

可是，我們的感情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饑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幾十萬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經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些卻需要我們這麼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且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而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當饑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時，當死亡正向他們靠近時，你們難道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

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還是鎮壓？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169】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別。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效。

祖國，母親！在這個自然的、嫵媚的5月，我們去絕食了。我們……永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北京大學絕食團全體成員
1989年5月13日

這篇《絕食書》一般都加了一個後綴，即13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貼出的《絕食宣言》：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

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代表團的對話；

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導。

絕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5月13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

《絕食書》帶來巨大衝擊

除了北大籌委會以外，許多學生組織都刊登了《絕食書》，如「北京大學絕食團全體同學」、「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北京農業大學自治會民主振興印刷所」等。

柴玲的《絕食書》錄音，我後來僅複製了三份，許多同學在北大或廣場的廣播中錄了音。那三份原始錄音帶，一盤傳至天津、一盤留在籌委會，最初錄製的那盤母帶一直我帶在身邊，直到5月底戒嚴後，才交由一個作家妥善保存。很遺憾，當時由於運動節奏太快，我沒能將其大量翻錄，或是當時誤以為錄在此前的那二百盤中了。

柴玲唸的《絕食書》對北大同學帶來巨大衝擊，許多同學

站在28樓下，滿懷激情地聽這柔弱而激昂的聲音，許多是在她的感召之下才加入絕食行列的。等我中午因為別的事到29樓時，發現門口的絕食名單上已達到 160 多人，且已停止報名。[170]

十二點二十分，北大絕食團與籌委會組織的糾察隊、救護隊、宣傳隊與後勤隊共約400多人，從南校門集隊出發，開赴北師大與其他高校絕食團會師，然後共赴廣場。[171]

《絕食書》雖經白夢潤色，但多處還能顯出柴玲的想法。柴玲既敏感，又最勇於講出自己的感受，因此成為這場運動靈魂人物。在一次自由論壇上或甚麼場合，她用了一句十分精練的話，來表達發動絕食的意圖：

「我們要看看政府的面孔，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172]

這實際上是她寫《絕食書》時的主調。在她的意識中，認為之所以有這樣專橫的政府，實在是因為有這樣不爭的人民。

又如，《絕食書》中多次提到「死」，提到「不願意」、「不追求」死。這並非故意煽情，實在是她內心矛盾的一個焦點。青春年華，我們的共同生活剛剛開始且充滿希望，她很眷戀自已的父母家庭，有深厚的責任感，最不願意使他們傷心。她雖因學運而歡欣鼓舞，但若非我的緣故，她不會捲入學運核心。她知道投入學運意味著甚麼，又厭惡政治，因此要在這麼多顧慮與眷戀中去準備迎接死亡，實在過於沉重。實際上，整個學運中她皆在天人交戰，當意志衰退而在我們獨處時，便現出內心的恐懼，這時我便用少許言詞來安慰她。我自已也有恐懼的時候，但也許是因為被抓過一次的緣故，恐懼的時刻既已經歷過，清楚被捕並不如想像中的可怕。

去大使館邀請戈爾巴喬夫

送走絕食團，我安排人馬去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遞交邀請

戈爾巴喬夫的簽名。Eric來問我何時出發，我告訴他兩點鐘。張智勇來廣播站說他準備了兩封書面邀請函，正在請俄語系老師翻譯。中午我去29樓籌委會辦公室取簽名名單，一天半時間，北大徵集了三千多簽名，包括幾百名教師。

下午二點，我臨時廣播徵集了二十個自願同學，又用十米長的紅布，請張智勇寫上「歡迎戈爾巴喬夫來北大」的橫幅，卷在我的自行車框裏。等張智勇將邀請函帶來時，便在兩點半出發。

張智勇還是那副書生樣，白淨的臉，梳光的頭，整整齊齊的西裝，斜挎一隻頗似小藥箱的書包。我們一道騎車時，他也講起他自己。原來他入北大國政系作研究生以前，是外交學院的學生，他的導師是一個著名的外交官，當時正在莫斯科籌辦迎接戈爾巴喬夫訪華事宜，他若不捲入學運也很可能跟著去蘇聯。這大概就是他積極迎接戈爾巴喬夫到北大的原因。[173]

蘇聯大使館在東城區，我們路不熟，Eric帶來的CBS採訪車一直跟著我們，在前面帶路。臨近蘇聯大使館，我提議整隊，於是大家一字排開，一手扶著車把，一手搭在臨近同學肩上，橫在大街上先前騎。前面有兩人一左一右拉起紅色橫幅。市民見到「歡迎戈爾巴喬夫到北大」，驚奇而不解，只在街旁停下來觀看。

開希搶先張智勇沮喪

到了大使館門前，才知我們晚來一步。十來個記者告訴我們，十分鐘前，吾爾開希率北師大同學已將歡迎戈爾巴喬夫去師大的徵集簽名送交大使館。據說師大四天內徵集了六千簽名。張智勇沒料到開希會搶先，顯然許多記者也隨師大隊伍去天安門了，因此，他顯得有點沮喪地罵了一聲「這個混蛋！」

當十來個記者圍上來提各式各樣問題時，張智勇現出十分鎮定的神情，用流利的英語得體地回答，應對自如。我只是站

在一旁，手裏拿著裝有四十張徵集簽名的原件，當記者問起北大徵集簽名情況時，便拿出來，並告訴他們三千簽名是在一天半倉促徵得的。簽名複印了兩套，一套放在北大籌委會留底，一套交給中國外交部。原件送給蘇聯大使館，希望轉送到戈氏手中。

等了十分鐘，一個參贊和一個一秘出來同我們接洽。張智勇又同他們交談，結果他們答應將信與簽名送至戈氏。他們說大使不在，去別的地方辦事了。他們正緊張地準備戈氏的訪華。

從蘇聯大使館門前出來向南，到東四附近的中國外交部。在大門口士兵把守的傳達室，求見外交部長錢其琛不成，張智勇又在那裏寫了一封短信致錢，說明北大學生希望戈氏訪北大的心願，又附上簽名複印件，交外交部辦公室轉送。

五點四十分廣場正式絕食

下午四點半，事情辦完。大家商量，決定去天安門廣場看看絕食情形。到了廣場，我們又將橫幅打出，並不大引起廣場上的人注意。這時廣場上共有兩三萬人，八百位頭纏各色布帶的絕食同學，和二千名後援同學，加上圍觀群眾，圍聚在紀念碑北側的旗杆下，氣氛很沉靜，沒有口號，沒有歌聲。五點四十分，王丹拿著話筒站在絕食同學中心，宣佈正式開始絕食。〔圖 33〕

兩桶黃漆寫「絕食」

當我離開廣場，經天安門城樓時向南一望，很難看清紀念碑前的同學在做甚麼，於是決定回校後製作一面大旗，寫上「絕食」二字，使長安街上過往市民一目了然。於是趕在下班之前，在西四買了二十米的黑布、針線、兩桶黃漆和幾支排



〔圖 33〕1989 年 5 月 13 日，王丹、馬少方、吾爾開希（由左至右）等絕食發起人帶領絕食隊伍進入天安門廣場。

筆。紀念碑前旗杆之間的距離我用目測估計在六米左右，因此將二十米布四折，便能製成一面五米寬、四米高的大旗。

途中又想到，戈氏訪華在即，政府也許會迫於形勢的壓力，同意與絕食學生對話，【174】或許將於今晚七點的《新聞聯播》中宣佈，因此決定先回家看電視，再決定是否寫這面旗。結果不巧，自行車胎走到薊門橋時便癟得不能騎了。這時，正好一個工人騎著三輪車，另一個坐在上面。我向他們求救，見我是學生，他們很爽快地讓我坐到車上，用手扶著自行車跟著走。

工人同我談起四二七遊行，不時稱讚學運，他們捐了一天的收入，又用車幫助走不動的同學。他們是真正感到了學生是在為他們說話，也就真心地幫助、支持學生運動。

新聞聯播沒提絕食與對話

差五分七點，於是我辭別這些工人，去一棟十幾層高樓（青年公寓），希望能找家人看《新聞聯播》。樓下有間理髮室，裏面三個吊兒郎當的青年，還有一個摩登女郎，正有說有笑。我說明來意，三人奇怪地打量我一番，本要轟我走人，但再想想，又叫我等一下。他們找到另一個管電梯的青年，領我上他家。

這青年的母親不到五十，顯得很年輕，知道我是學生，便領我進裏屋，將電視打開，正好七點鐘，新聞聯播剛開始。從三輪車下來到找著電視坐下看，五分鐘不到，如此迅速讓我暗自驚奇。

我仔細聽內容提要，又看了幾分鐘國內政治報導（習慣放在新聞聯播之首），皆未提及廣場絕食，也沒講是否對話，於是起身準備繼續趕路。那青年的母親從廚房端來一杯礦泉水，很熱情地要我喝完再走。我告訴她學生已在天安門絕食，她既吃驚又不解，擔心同學們的身體。她很樂意聽我介紹學生們的訴求，說完我便告辭了。

從大樓出來，找到修車鋪，也沒時間補胎，只是打上氣，趁氣還沒跑光，趕快騎上一段。人大附近那個修車老頭，不久前還敲我竹槓，多收了三毛錢，現在卻說：你是學生，我不收你錢。他平日一副沒睡醒的樣子，今天卻精神多了。

高興旗同我一道製旗

回到北大，「自由論壇」的喇叭還在響，我逕直抱上布匹和油漆到29樓，準備在那裏製旗。高興旗在宣傳部。他十幾天前來提建議，我就說你不要動口不動手，結果就進了籌委會。他很熱心地要同我一道製旗，我們就一道帶上布、筆、油漆桶和一隻飯盆，到二體前的藍球場去。路上遇到四個女生，邀她

們去縫製大旗。女生中兩人是四川老鄉，三個來自政法大學。

到了藍球場，六人一齊上陣，卻發現縫製速度太慢。高興旗自告奮勇，將布帶到一個老師家，用縫紉機來縫。半小時後，便帶回一面十分平整的黑色旗面，五米長，四米寬。

要在大旗上寫兩個大字，卻發現油漆不夠。才把「絕」字的左偏旁寫完，已用了一桶油漆。於是，高興旗又去找來水盆，將油漆稀釋在水中，十分精打細算，終於把「絕食」二字刷了出來。這是我一生中寫的最大的兩個字。

這時已是晚上十點。我們六人舉著旗，到三角地「自由論壇」給同學們展示一番，最後將它搭在29樓外「民主與科學（D & S）」塑像的灌木叢上，好讓油漆晾乾，然後便分手了。

聽鄭義分析時局

廣播裏不斷呼籲徵集禦寒衣服。今晚氣溫很冷，絕食同學白天出發時沒考慮到在廣場上怎麼過夜。許多同學將棉被、大衣送至29樓，棉被堆在29樓外，如小山。籌委會則組織了三輪車趕送廣場。

這時遇見鄭義，他說話既柔和又堅定。我那時並不認識他，後來同柴玲描述起來，才知應是《老井》作者鄭義。柴玲十分敬佩鄭義。我發現他對時局的分析十分深刻，不似那些堵著籌委會大門提不著邊際的建議、發空泛而熱切議論的那種人。他掌握許多北京市委、中央對學運的消息，他的分析也令我十分信服。

然後去28樓廣播站，取中午柴玲《絕食書》和昨晚「自由論壇」的錄音，以便明天送電教翻錄。廣播站似乎又改回在屋裏唸稿的形式。當我到二樓走廊中的廣播站時，一個女孩攔住我。我說明來意，得到一種官僚主義的冷漠回應。好在陳林或周培勝從房間出來，我才取了那兩盤磁帶。十一點半到廣播站邊上周培勝的238房間找到一空床，十分困倦地躺下。睡之

前，沒忘了將手錶的鬧鐘撥到清晨五點。[175]

註：

---

[144] 湖州師專現為湖州師範學院。沈澤宜老師從頭至尾都沒隱瞞自己的身份，這在當時需要極大的勇氣，超乎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時當局正在抓「黑手」，「六四」後中共出版物上也有沈老師的名字（如《驚心動魄的56天》第86頁）。沈老師當時應該沒有提到林昭。也許是感情上的原因，他不願意提起；也許是林昭的遭遇太悲慘（林昭1968年4月被秘密處決），他擔心嚇壞我們。我第一次全面瞭解林昭，是2004年看胡傑拍攝的《尋找林昭的靈魂》，上面也有沈老師，才知道他們的關係。

[145] 這個演講會是「自由論壇」的雛形，但官方資料再次誤稱為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18時至19時30分，王丹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又一次主持召開『民主沙龍』，煽動堅持罷課和挑起新的事端，引起千餘人圍觀。一自稱福州市(其實是湖州——作者註)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沈澤宜的人在演講時煽動學生堅持罷課。」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86頁。另外，《中國六四真相》第317-318頁則只記「王丹主持『民主沙龍』號召堅持罷課」，完全忽略了將兩次重大學運串聯起來的沈澤宜演講會，甚為怪異。

[146] 9日下午，200多名記者到全國記協遞交聯名信，信中有1013位記者簽名請願爭取新聞自由(《驚心動魄的56天》第89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第91頁說有200甚至500名；《快報》9日8版說有100多名、《文匯報》10日2版說有數十名、《明報》10日2版說是30多名記者去遞交的；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第327頁則說只有2人去遞交，顯然有誤)。關於五月上旬新聞界蓬勃的請願活動，詳見陳小雅

《八九民運史》第225-251頁「新聞界接過『接力棒』」一節。

【147】據周鋒鎖回憶，其實自行車大遊行的主意最初來自清華。《中國六四真相》第339頁則說是北高聯的通知，目的有三：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聲援北航、中央美院等院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艱難處境」；聲援5月9日的記者請願活動。

【148】據王超華回憶，北航校方一反之前的寬松，五四後「見學生復課，態度立即轉為強硬。」其他一些院校的學運骨幹也開始遭到清算。見《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5月29日。北航校黨委副書記方復之是方勵之的哥哥。

【149】我當時並不知道清華籌委會成員大多數是從官方學生會來的。周鋒鎖參與學運的情況可參見其「六四口述實錄」，包括他在1988年組織過清華物理系學生會直選，1989年4月23日參與創建清華籌委會，組織募捐、宣傳，25日和張銘一道通過基層架構阻止官方學生會背景的清華籌委會與當局進行假對話，五四後推動清華校園民主，絕食後在廣場跟張銘一起建立「學運之聲」廣播站等經歷。

【150】北大哲學系的湯一介教授。其父湯用彤是著名的佛學大師。幾年後，我在巴黎和萊頓大學還與湯一介、樂黛雲夫婦見過幾面，他們與我的導師很熟。他沒誑我，王超華的回憶和當時的記者都説他那時正犯心臟病。

【151】王丹不高興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他們發動的絕食受阻。當時我並不知道，王丹與王文、吾爾開希等六人在駐北大的北高聯會議上要求發動絕食，被高聯否決。這個備忘錄寫在1991年巴黎會議之前，因此還不知道5月11日那天高聯會議的詳情。

【152】我沒有印象她提到過王丹。王丹如何請她參與發起絕食，我到1991年巴黎會議才瞭解一點。王丹、吾爾開希和馬少方等發起絕食，是相信了「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的內幕消息，吾爾開希「10日晚曾經到田紀雲的辦公室」見到田紀雲及趙紫陽的秘書，並相信「中央有緩和的態度了，

如果我們再一加壓的話，就很可能答應我們早期提出的要求。」另按梁二回憶，最起勁推動絕食的是王文，「他的動機是想混入高聯……他是找不著事幹想鬧一鬧。」見《回顧與反思》第90、94、127-128頁。馬少方在「歷史鞭打現實」一文中說吾爾開希簽名絕食是別人簽的，但王超華說她「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見同書95頁。

【153】官方資料將絕食說成是北高聯發起的，又將王丹當作高聯負責人，其實都不對(《驚心動魄的56天》第94頁、《中國六四真相》第350-351頁，該書第776頁又說「5月13日學生的絕食請願就是王軍濤親自策劃的」)。發起絕食的六人中，王丹、馬少方曾任高聯常委，吾爾開希在我辭職後回任主席，但按高聯秘書長王有才的理解，「吾爾開希和王丹他們搞絕食的時候已經不是北高聯成員了」、甚至從4月29日起王丹就不能算高聯成員了，「這導致他們無法掌控學生組織之後他們又想搞新的，這就是絕食的真正來源」(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學運組織雖否決絕食，但終究沒能擋住一些個人的非組織行動，致使絕食成為走向社會且組織混亂的巨大行動，最終導致運動失控。實際上，絕食是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大分裂，開始了個人超越組織的混亂局面。

【154】最早的絕食倡議是在4月19日晚，據北大作家班的張伯笠回憶，著名作家鄭義就用張伯笠宿舍的床單寫了「絕食」二字，由白夢和數學系二人扯著床單帶到新華門徵集簽名並絕食(《回顧與反思》第51-52、57頁)。我在5月6日寫成的《辭職書》中也提及絕食，建議運動「形式可改為由一部分同學靜坐甚或絕食，以要求對話。」據香港記者的文章介紹，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發起絕食可能是受到香港專上學聯的啟發，後者在4月26日上午列席了臨時高聯的會議，提議到廣場絕食作為抗議「四二六社論」的方案之一。見羅綺萍：「絕食行動之風從何刮起？」，《香港經濟日報》5月16

日3版；李蘭菊：「香港學聯的支持與協調」，《回顧與反思》第323頁。

【155】大約就是計算機系的那個博士生，6月4日「北大博士生的故事」一節還會提到他。

【156】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都不清楚，當時的北大籌委會也和北高聯一樣，反對絕食。自從5月6日我兩邊都辭職後，我就一心撲在廣播站和自由論壇上了，組織內部的決策過程瞭解得不多。

【157】轉引自《驚心動魄的56天》第93頁。又見《70天大事記》第30頁。

【158】常勁的回憶顯示，當時北大籌委會既不支持絕食，也不相信幾個個人能發動起來絕食，故採取拖延與觀望態度。他們當時在積極推動校園民主建設。常勁還記得5月10日自行車遊行後，王丹到北大籌委會辦公室來徵求絕食簽名沒通過，然後就跑到廣播站上去簽名，一天下來他都沒簽到甚麼人，至少是簽了一天，籌委會幾乎沒人幫他。見《回顧與反思》第93頁及常勁「六四口述實錄」。

【159】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第78-88頁記錄了那天演講的錄音內容。

【160】北大籌委會不贊同絕食，11日還宣佈要求政府在一個星期內答覆對話。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93頁、《中國六四真相》第349頁。對北大籌委會反對絕食的詳細情況，可參見常勁「六四口述實錄」。

【161】當時我並不清楚高聯反對絕食的決議經過。會上馬少方採用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說法：「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這令王超華、梁二與王治新非常反感，當場爭論得拍桌子紅臉。後來超華還差點斷指，並懷疑「是馬少方鼓搗起這個絕食。如果不懷疑他的話，我就懷疑他背後那個所謂的內線，那個內線一定是別有用心。那就是馬少方太老實，被人利用了。」實際上王超

華得到的內幕信息正好相反：「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不過，吾爾開希的一個經歷支持了馬少方的理論，他「10日晚曾經到田紀雲的辦公室」見到田紀雲及趙紫陽的秘書，並相信當局有讓步的意思，「如果我們再一加壓的話，就很可能答應我們早期提出的要求。」見《回顧與反思》第90、94、128頁。另外，據高聯秘書長王治新回憶，當時(5月12日左右)的高聯會議上，所有的高聯常委，「都簽了字的，包括吾爾開希和王丹，都簽了字的，就是不參加絕食。作為北高聯的聲援就是不參加絕食。但是積極的配合絕食的同學啊、這個決議是有的。」後來高聯因為開希不守約定和紀律，要求北師大撤換開希，由梁二接任師大駐高聯代表和常委。但因為吾爾開希和王丹在媒體上的影響力，外界還是以為高聯支持絕食，即便高聯發過聲明也無濟於事，繼續以為這二人代表了高聯，致使北高聯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領導行為也出現混亂。見王治新「六四口述實錄」。

【162】這是我後來在廣場上推動分批的「馬拉松絕食」的原初構想。這時我並不清楚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反對絕食的內部會議詳情，後來才從柴玲那裏聽說。

【163】王超華回憶說，那晚她去找了戴晴，後來感覺是戴晴利用上層關係促使了中共高層下決心與學生對話。見《回顧與反思》第96-97、98-99頁。

【164】個人化的絕食而不是組織化的絕食，是學運組織分裂的開始，當時的學生組織似乎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大家的政治經驗實在不足。幾個人能不顧高聯和籌委會的反對，形成鬆散的絕食團，另外幾個人就能忽視絕食團，而形成指揮部。絕食團是對北高聯的第一次「政變」，指揮部是對絕食團的第二次「政變」，是廣場上後來越來越多裂變的開端，是廣場上缺乏統一指揮難以進退的根本因素。非程序行為從違反組織決議的「個人絕食」開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學運亂象

自此一發而不可收拾。這是我以後才明白的。

【165】按常勁等人在巴黎會議上的回憶，大部分北大絕食同學是受柴玲感染報名參加絕食的。此前北大籌委會並不相信王丹能組織起來絕食，就讓他貼大字報公開徵集簽名絕食，只有40人簽名。柴玲演講後簽名達到220人。見《回顧與反思》關於絕食發起過程的討論。王有才對最初簽名的第三人就是他的名字很不高興，因為那不是他自己簽的，「我問王丹，王丹說不知道。我問王丹的意思實際上我是有把握才問這個問題的。」後來他只好參與絕食，高聯其他骨幹還以為他很積極支持絕食，弄得他很尷尬（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直到十年後，王丹還撰文稱絕食倡議得到北大籌委會「王有才等的支持」（「絕食是怎樣發起的」，《蘋果日報》1999年5月9日）。

【166】很希望這些磁帶有人保留下來。

【167】白夢認為他也應該算是《絕食書》的作者之一，而不僅僅是潤色，因為他對文字做了大量的加工。不過，《絕食書》的基本思想應該就是柴玲的，王超華回憶說，12日中午聽到柴玲「幾乎是把《絕食宣言》裏的那點話都說出來了」。見《回顧與反思》第96頁。我也有同感，13日中午聽到柴玲唸《絕食書》時覺得很熟悉，就是柴玲的思想和語言，很有共鳴。

【168】當時很多人，包括沈彤和李祿，「聽柴玲演講的時候哭了」。見《回顧與反思》第84、106、164頁。

【169】當時各校刊印的《絕食書》裏，都沒有「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還是鎮壓？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這兩句，因此後來的書刊中皆缺此二句或有誤。

【170】據說最後北大出發時的絕食同學有二百多位。可能我的記憶有誤。

【171】直到出發絕食，大家還不知道當局答應對話的情況。另外，

在去絕食的途中，李祿告訴柴玲一個上層內幕消息：如果沒有絕食，鄧小平本來準備交給趙紫陽來和平解決。見《回顧與反思》第104頁。

【172】這其實就是《絕食書》中學生組織刪去的那兩句話。1990年寫此備忘錄時，讀到的是刪後文本，就以為只是在別的場合説的。學生組織刪這兩句話頗有深意，也顯出學運積極分子與學運組織的差別。

【173】我因此一直以為張智勇本科是俄語系的，後來采訪時才知他學的是英語。

【174】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官方已經答應對話。很奇怪的是，官方最早通知對話是在5月12日晚上，但13日到廣場絕食的同學們並不知道。分析詳見5月14日的「組織混亂源於絕食的非組織性」一節中的註。

【175】13日晚，統戰部長閻明復與絕食學生和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有個協商座談。王超華回憶説，她和劉曉波的發言「最硬」，要求平反動亂。梁二的回憶更有意思，座談會後，「我記得當時王丹和吾爾開希在一個密室裏接受閻明復的請求的時候，閻明復是跪著哭的。這是吾爾開希的自述。」見《回顧與反思》第100、103頁。吾爾開希五一六下午在廣場上對同學們稱，他對閻部長有絕對的信任，當與此有關。

7. 廣場廣播站 (5.14-5.23)

5月 14日　星期日　晴 晝22℃ 夜10℃

帶黑色大旗到廣場

清晨五點前，鬧錶還沒響，我便悄悄起身，編輯整理兩盤錄音，一是柴玲唸的《絕食書》錄音和趙體國帶領唸的《絕食誓言》；一是 11 、 12 日「自由論壇」的精彩片段，包括王丹報告人大的情況、柴玲的「絕食倡議」和那首「紀念碑」詩，並在兩面都反復錄製了《國歌》與《國際歌》以隨時備用。

夜深人靜中，又到 29 樓將黑旗收好，從籌委會辦公室抱了廣播器材到28樓，接好線，準備六點半準時開始一天的第一次播音。在準備廣播時，遇見在樓下看大字報的地球物理系青年教師，即1988年6月學潮那晚請我與柴玲到他宿舍的那位。我告訴他自己的自行車壞了，但還得去廣場，他十分爽快，回家將自行車推來，放在樓下，又將鑰匙扔上樓來。

六點半開始奏《國歌》，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與報紙摘要》，六點四十分，將廣播站交給陳林，便騎上那青年教師的自行車，帶著黑旗，趕赴廣場。

絕食要求：平反與對話

剛到廣場，有同學告訴我，凌晨二點半，中央政治局常委、教委主任李鐵映、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一道

到紀念碑，勸說同學停止絕食返校休息，但他們對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不置可否，大家便對他們不加理睬，十幾分鐘後，他們便無趣地離去。

《絕食宣言》中的兩點要求，即平反與對話，後來柴玲告訴我是她堅持的。此前許多人提了許多絕食要求，但柴玲堅持只提兩點最基本的，一來政府有可能妥協；二來若政府連這樣兩條簡單明確的要求都不能答應，則其毫不講理的面目昭然若揭；第三，簡單明確的要求最能贏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柴玲與絕食初期的同學

到了紀念碑前排旗杆下，還見到些北大和高聯的同學，很感親切。熊焱熱切地拉著我的手，給我介紹情況；不一會，他們將柴玲找來，沒談幾句她又因有甚麼事離開了。〔圖 34〕

這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柴玲的身份正起重大的變化，後來一直忙於各項事務，也不清楚她是何時、在何等情況下成為絕食團的總指揮。[176]在外界看來，柴玲似乎是絕食後才突然冒出來的，但對北大同學來說，她實在是一步一步取得眾人的信任與愛戴。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認知差距，在於她遵守北大籌委會的紀律，在此之前幾乎不與媒體私下接觸。她也不是像一些評論家猜想的那樣「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學生領袖」，實際上她對政治既沒好感也沒安全感，雖參加了籌委會工作，還是一直猶豫是否繼續堅持這十分危險的行動。她實在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學生，喜歡跳舞喜歡玩，在興頭上可以通宵不睡地和著眼淚讀小說。她能夠一步一步走上舉世注目的歷史舞臺，在於直到這時學運都還維持在十分純潔的狀態，大家只憑一顆良心和滿腔熱血。這時大家既無打算、也沒感覺到是在「搞政治」，對於將來多是抱存一個理想而沒有明確的藍圖，更沒設想自己將會扮演何等角色。

一個沒有私利的組織是最容易平等的，風險比榮譽多出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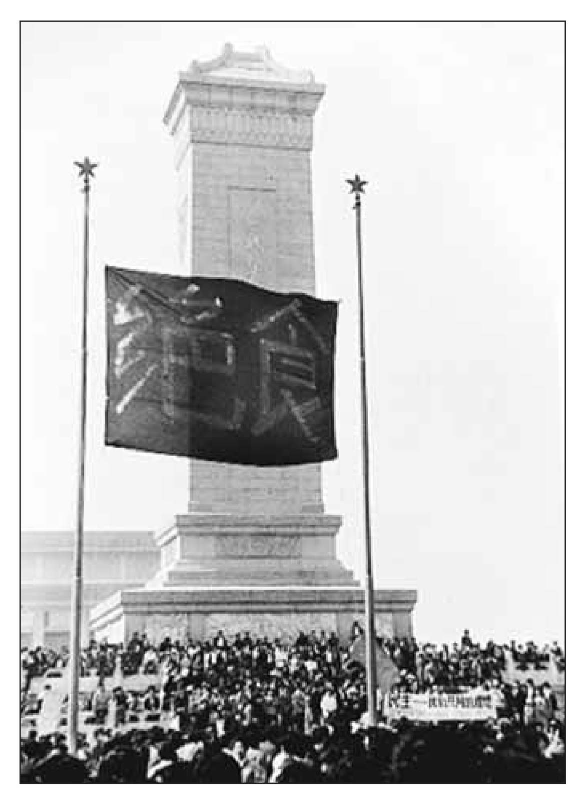
〔圖34〕1989年5月14日，清晨，柴玲向在廣場上過了第一夜的絕食同學講話。

多，因此大家根據能力選拔出信任的同學，對於敢於承擔重任的同學更有一種尊敬與信賴。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到北京之前，學生組織內部的普遍心理。然而，隨著戈爾巴喬夫的到來，全球上千記者蜂擁至北京，將北京學運的消息傳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中國的傳媒也一改以往封鎖、歪曲新聞的作風，突然開放了幾天，全中國與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天安門廣場的一舉一動，學生運動走向了社會，也就日漸不能維持它原初沒有名利、派別之爭的狀態。但在15日之前，我們對這種變化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更沒有任何強烈的感受。

黑旗營造哀兵之勢

我叫上幾個同學，將黑旗升上旗杆。折騰了十來分鐘，才將這面 4 米高、 5 米寬的黑布大旗醒目地懸在紀念碑前旗杆上的 7 米高處。

後來走到長安街向南望這面旗幟，我非常失望。雖然看見一面大黑旗，旗上的字卻很難認清。一來布太薄，半透明；二來油漆太稀，字也透明；三是黃色並不顯眼。本來，黃色是人眼最敏感的顏色，沒想到旗面及字本身都透光，黑與黃反差又不大；這時北風又將旗面向南吹出一個凸形，更難看清那兩個字。我很後悔沒用白石灰書寫，在這種情況下黑白的反差應最分明。〔圖 35〕



〔圖 35〕1989 年 5 月 14 日，封從德製作的 4 米高、 5 米寬的「絕食」黑旗醒目地懸在紀念碑前旗杆上。

採用黑布來製這面大旗，是為營造哀兵之勢。絕食本是無奈悲哀之舉，黑色正具有「莊重與悲哀」的意味，也同常用的紅旗形成強烈對比，更能吸引國人的注意。

我對馬少方的印象似乎是從這時開始的，他很熱情地幫我升旗和介紹廣場上的情況。

廣場急需廣播站

同柴玲、熊焱等人的交談中，我瞭解到廣場上急需要一套能統一指揮大家行動的廣播系統，他們很希望我能儘快在廣場上建立一個廣播站，既能統一行動，又起宣傳作用。

這是我的專長，正好這幾天又在管北大廣播站，我自然很樂意幹。但馬上發現錢不夠。我有北大湯一介教授捐的四百元錢，想找大家湊一千元，但怎麼也湊不夠。王丹說沒錢，熊焱沒有，柴玲也沒有。正在這時，王文介紹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為我們解了燃眉之急。她悄悄湊到我耳邊要我跟她走，她可以借給我一些現款，只是不希望聲張，大約是擔心便衣盯上她，做為一條罪狀將她趕出北京。

我們謹慎地約好十五分鐘後到北京飯店找她。她給了我身上帶的錢，告訴我房間號便走了。

任畹町給我一篇文章

這時，任畹町在廣場找到我，給我一篇他寫的文章，論共產黨全方位控制社會的「八位一體」，是一份書寫、裝訂得很好的複印件，大約有五、六頁大紙。【177】

任畹町後來被北京市長陳希同罵作「三朝元老」：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有他，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牆」運動也有他，為此他牢滿七年；八九民運還有他。在當時學生同知識分子眼裏，他的觀點過於激烈，很難接受。他激動時會喊「打倒共產黨」。因此，大家雖然敬佩、同情他的經歷，但在實際

行動中則不得不與他劃清界線，以免被政府抓住把柄。在整個運動中，他孤立於運動主體之外。他顯然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當他將自己的文章送給我時，目光中充滿了對理解與同情的渴望，這副渴望的目光，使我有一股心酸的感覺，永遠也不能忘懷。每當我想起任畹町，便與這樣的目光聯繫起來。

蔡詠梅借錢採購廣播器材

到北京飯店時，我已晚了十幾分鐘。我第一次走進這麼高級的旅館，蓬頭垢面，很慶幸門衛沒攔我。蔡詠梅的房間比較樸實。她請我坐下，倒了兩杯茶，又拿出一些雞爪來請我吃。我急於向她借錢購置廣播器材，便推辭，在她堅持下嚐了一隻，味道自然不錯。她邊吃邊同我聊天，但聊些甚麼，我全無心思。

最後，她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疊鈔票，數了數當中的人民幣，大約一千一百元，加上廣場上給我二百多元零錢，共約一千三、四。這麼一大筆錢，也沒讓我寫張借條。雖說是「借」給我們，但當時我更感覺是為了不給中國政府留下把柄，說是「海外勢力的勾結與收買」。[178]

她包租有出租車，她說可以帶我到城中采購器材，我自然很高興地答應了。我計劃建一個用蓄電池供電的廣播系統（以免官方供電系統的控制），因此關鍵是要買到經久耐用的大功率蓄電池。我準備用汽車電瓶，但因為是星期天，許多汽車修配站都關了門。出租司機花了約二個小時，四處碰壁之後，終於在建國門附近的一家汽車修配站找到了一堆電瓶。電瓶價格很貴，二隻12伏的汽車電瓶要五百元。我顧不了這許多，咬牙買了下來。

包遵信同蔡詠梅很熟

在車上，我才有心思同蔡詠梅聊起來。她近40歲，交談

中才知是我同鄉，成都人，去香港才幾年，做了記者。報社老闆一來看中她是大陸人，文化水平不低；二來更看中她辦事幹練，於是學運一開始便派她來北京，這是她第二次來，大約5月27日又要返港。

蔡詠梅同我談起運動中的一些人物。她與包遵信很熟，出租車中有一部衛星轉接電話，她與包遵信通話，聽得出是關於學生們請包今天下午到廣場演講的事。包似乎有些不滿意，因為學生方面還沒有徵得他同意，便將他要去廣場的消息散佈了出去，他只得將原來在甚麼地方開會的計劃作個調整。其實，我也有包遵信的電話號碼，但還沒有同他通過話。蔡詠梅也提到王丹與開希。她對開希評價過高，我沒説甚麼，只是默默一笑。

售貨員一下子熱情起來

買到電瓶，已十一點半了。她十二點還有約，因此我們又很快地趕到西單百貨商場去買擴音器、音箱、話筒和導線等。

售貨員開始的態度如往常一樣，愛搭不理的，因時至中午，管貨的人已經吃飯去了。還是蔡詠梅有經驗，同她聊起來，得知是為了廣場絕食同學置辦器材，她們一下子熱情起來。管理員沒有回來，找了一位科長，在倉庫中取出一隻認為很理想的擴音器，是一部與話筒連在一起的擴音器，輸出功率能到25瓦，只要200元，比一部大功率的擴音器便宜了許多，我當時也只能出得起這個價錢。

因為沒有高音喇叭，便買了兩隻10瓦的音箱。買高音喇叭要去新街口，這時已十二點半了，考慮到記者還有事，路又堵塞，雖然蔡詠梅説可以改變約會，我也沒有打算去，廣場上的同學還等著廣播站用呢！又買了幾百米導線，一包工具包等，便回廣場。

廣播站功率不夠理想

回到廣場，大約是下午兩點。車開進廣場，在絕食同學外圍的東面停下，我先下了車，擠到絕食團，找了幾個糾察隊員幫忙搬東西。這時廣場已聚集了幾萬群眾，但守護絕食同學的糾察線還沒有後來那麼嚴格。只須申明是學生，我便進到絕食團。

絕食團在紀念碑北面，按校劃地形成一個整齊的大方塊。絕食同學稀稀拉拉坐在石板上，沒有帳篷，驕陽之下，拿各色衣服頂在頭上。周圍人群站著圍觀，形成一個盆地。彭嶸拿著一個大喇叭指揮糾察隊維護秩序，隊形整齊，守在外圍的糾察隊也就很輕鬆，任何人進絕食團都很顯眼，絕無藏身之處，所以還用不用擔心便衣混入。〔圖 36〕

將廣播器材從車後蓋搬出來後，謝過蔡詠梅，她忙自己的事去了。兩個音箱一東一西，放在絕食團兩側，連著話筒的小擴音器與電瓶放在紀念碑正北面對著絕食團，用導線將兩只百米外的音箱連在擴音器和電瓶上，試試音，才發現25瓦的功率不夠理想，音箱周圍20米內才聽得清楚，四周的噪音將聲音壓



〔圖36〕1989年5月14日，彭嶸在指揮糾察隊維護秩序，保護絕食學生。

住了。

無論如何，廣場上畢竟有了一個指揮系統，只要大家安靜下來，絕食團的所有成員還是聽得清楚。這個廣播系統，在當晚的幾次重大爭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忽然得知對話開始了

下午五點過，有同學來報信，說政府已與學生開始對話了！[179]這個消息非常出乎絕食同學的意外。大家既著急又生氣，不清楚學生一方是誰，對話進行到何種程度，有沒有現場電視直播，非常擔心政府又導演一場四二九那樣的假對話。這時，絕食已成為運動的焦點，絕食就是為了對話，沒通知絕食同學便與政府對話，實在不應該，因此大家既不理解也很焦急。

從廣播中得知這個消息，絕食同學異口同聲要求派人前往對話現場觀察，若不滿足絕食宣言關於對話要「公正、公開」的要求，便立即聲明不承認這次對話，並設法暫停對話。所謂「公正、公開」，一須是真正的學生代表，如對話團和北高聯，而不是官方學生會、學聯的代表；二是要現場直播，最好中外記者可列席旁聽。

對話現場並不遠，就在廣場西不到兩里的六部口統戰部裏面。半個多小時過去了，還沒人回來，大家又派了第二批自願者趕往現場。圍著廣播話筒，一直有激烈的議論。

官方拒絕現場直播

後來有同學回來說，對話沒有現場直播。政府解釋為「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設備，都已準備用作採訪戈爾巴喬夫的訪華活動，而唯一的機動採訪車正好有技術故障」云云。這樣的解釋，無法令同學滿意，大家本來就對政府缺乏信任，這種說

法更讓人覺得是哄騙人的藉口。後來又傳來消息，說政府答應將對話現場的錄像，在對話結束後的四十分鐘內在中央電視臺播放。這依然不能令同學們滿意，擔心政府在轉播過程中動手腳，將關鍵部分刪剪，因此大家還是不能讓這場不合正當程序的對話進行下去。

從對話現場回來的同學試圖說服絕食同學認可這場對話，因為參加對話的學生，都是學生運動組織方面的代表。【180】於是，在廣播中有激烈的爭論。絕食同學不放心，認為政府的藉口實在可笑，堂堂十億人的中國，竟不能安排一次現場直播？！因此多數的聲音還是要暫停這種沒有保障的對話。爭論中，有個中央電視臺的技術人員說：不能直播完全是騙人，直播其實很簡單，即便政府沒有直播設備，從民間也能借到。

柴玲也去了對話現場，事後提起，每每惋惜一番:「要是能將《絕食書》在全國的電視上唸一下，你想會如何？」認為北師大的程真唸的那篇《媽媽我餓》的文章，實在沒她唸的《絕食書》感人。「我只是去晚了一步！」

我的妥協方案：語音直播

我一直像主持「自由論壇」那樣主持著大家的討論，將話筒遞給最急切的同學，若講不好，便在大家的噓聲中將話筒收回；講得好，眾人的鼓掌便鼓勵他繼續講下去。

我自已則不多講甚麼，有時稍作點評論，更多是維護討論秩序。見大家爭執不下，我提出一個妥協方案：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現場語音直播，對話完後再照政府的許諾在電視中放錄像帶，絕食同學可用收音機聽到對話實況。如果廣播與電視的對話時間一致，則證明沒有剪輯，同學們便可以宣佈絕食勝利結束，撤出廣場。而絕食請願的第一項要求，即「平反」，可以在對話中達到，只要政府方面說：「學生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即可。這樣，既滿足了絕食同學的要求，政府在技術上又不會存在任何問題。語音直播再簡單不過了！只需

電話即可。將現場實況訊號連接到廣播電臺上，根本沒有甚麼技術困難。[181]

語音直播的建議被在場同學普遍認同，卻不知受了何種阻礙，政府始終沒有妥協，廣場同學一直沒有聽到現場直播。[182]最後，在群情激憤中，同學們派出了第三批代表，堅決要求中止對話。

事後的分析與當時的情況

從事後分析來看，這次對話是「學生與黨內開明派合作」的大好機會，統戰部長閻明復是趙紫陽的親信，[183]他出面對話，如果成功，「趙派」便佔上風，在全國電視的直播中對學運定下調子，以後「保守派」便很難翻過來。另一方面，學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組織，當局實際上默認了學生組織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組織」的說法。

但是，歷史往往偶然。當時的現實情況是，同學們多不知閻明復何許人也，更不清楚他與趙紫陽有何關係；實際上，對趙紫陽本身同學們亦不信賴，這時大家的主流思想還是「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無論趙紫陽還是李鵬，大家只把他們當作中共官僚機器中的一個部件，本不抱任何希望。大家要改造的是整個系統，這時要的是整部機器的正面回答。

其實外界不知，造成絕食後混亂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學運組織已混亂。五一四對話時缺乏協調的關鍵原因，就在於此；此後的種種混亂，乃至無法及時撤出廣場，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這裏多分析幾句。

組織混亂源於絕食的非組織性

學運組織開始混亂，源於絕食的非組織性，[184]源於「明星」凌駕於組織之上。本來，學運組織並不贊同絕食，尤其是

名義上是最高組織的北高聯。高聯常委多不贊成絕食，因為種種內部消息顯示，學運低調對「黨內開明派」有利。然而，一些個人借助「明星效應」，拋開組織，居然成功發動「個人絕食」，外界就更把這些「明星」誤認為學運「領袖」，這些「領袖」也就更能凌駕於組織之上。十分滑稽的是，外界不知道，發起絕食的吾爾開希與王丹雖被普遍認為是北高聯的主席、領袖，而實際上他們當時連正式常委都不是。這些「明星」熱衷於見記者，熱衷於見中共領導人，熱衷於成為媒體焦點，卻很少關心組織運作，因此，外界誤認為的「領袖」與實際的組織運作嚴重脫節。此其一。

其二，形勢判斷失誤，導致北高聯進退失據。高聯常委多數不贊成絕食，他們得到種種內部消息，認為學生冷靜下來對「黨內開明派」有利。北高聯起初沒意識到絕食勢不可擋，堅決反對，自然失去絕食的領導地位；絕食後，卻轉而要領導絕食，則更令同學們不解。對話團獨立於北高聯，可說是時局需要、權宜之計；而絕食團的形成，則完全是對北高聯的「反叛」，是廣場上一系列組織分裂的開端。從此，北高聯被迫與一系列組織爭奪運動領導權，最終因「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支持廣場指揮部而被徹底邊緣化。

第三，廣場上的權力真空，導致學生組織之間交流不暢。既然廣場上缺乏權威組織，絕食同學便不知在眾多傳言中該信任誰。這也是大家選派代表去對話現場的原因，只有自己選出來的代表才可信賴，而參與對話的是些甚麼人物，多數同學並不清楚。因此，雖然政府方面，閻明復的表現，得到參加對話的同學的信任，但這種信任卻難以傳達到廣場，沒有一個組織將之穩固並傳播下去。

第四，這就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局從未允許民間有一定的政治空間，導致臨到運動高漲時，卻找不到可以進行談判妥協的民間代表。這是長期打壓公民結社自由的一個惡果，至今依然如此，且越來越危險。

絕食非組織性源於高聯懸空

我當時沒太注意到絕食的非組織性，是很大的失誤，雖然我到廣場的本意是要加強絕食同學的組織性。這裏再進一步分析一下導致絕食非組織性的組織方面的原因。

學運組織權力過於分散，是這次運動一直存在的問題。這雖源於胡耀邦之死的偶然性導致學生組織的倉促成形，但北高聯的最初形式和一再的錯誤，則是權力分散的直接原因。成立高聯本是希望運動有個統一的指揮。但由於其形成超越了運動發展的階段，在各校基層組織還沒有鞏固的情況下，便成立試圖統一號令各校行動的上層機構，無異於空中樓閣。而由於缺乏基礎與監督，這些號令經常只是少數幾個高聯成員的主觀想法，甚至僅是一人的指令。

絕食凸顯了高聯的空中樓閣狀況。高聯的懸空致使她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和權威來阻止絕食。高聯不能阻止幾個明星式的個人發動的「個人絕食」行動，更加顯示根基不穩，並非一個上令下達的堅固整體，而是個「佔據領導地位，卻沒有領導能力」的組織。故絕食一發動，高聯的領導地位便受到嚴重打擊。

廣場絕食同學與對話同學間的行動與溝通，本應靠這最高組織來協調，但這時的高聯卻基本上已經癱瘓與失靈，最突出的反映是：衝進對話會場代表絕食學生喊停的，恰恰是高聯的主要骨幹王超華。對話團可能以為與政府對話是他們的事，沒有事先告知絕食同學；[185]對話團與絕食團之間誤會的關鍵在於缺乏一個協調組織，而這本應是北高聯的角色。至此，廣場上出現了嚴重的權力真空。

十二學者來廣場

廣場絕食後，學運走向社會，成為中國政治中舉世注目的一個焦點，也吸引了社會各界越來越廣泛而深入的關注、支持

及參與。怎樣對待上千的絕食同學，成了每個中國人的良心考驗；怎樣處理學生運動，更成了中共頭痛的政治問題。這時，各種社會政治力量開始影響學運。

晚上，十二位知名學者、作家來到廣場，好像是王超華引他們來的。[186]據說他們下午已在統戰部對話地點，在學生與政府之間周旋，希望促成實質性的對話。[187]

這十二位學者是：嚴家祺，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包遵信，《走向未來》叢書主編；于浩成，群眾出版社社長；劉再復，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李澤厚，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美學專家；李洪林，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戴晴，《光明日報》記者，中共元帥葉劍英養女；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河殤》總撰稿人；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蘇煒，剛從美國回來的青年作家；麥天樞，作家，《中國青年報》記者；李陀，《北京文學》副主編。

這十二位學者被帶到廣播站，擠在同學當中。這時廣場上除了上萬學生，還有四五萬圍觀的群眾，整個紀念碑上都站滿了人。因為臨近夜晚，道路上的車輛少了，噪音也就小了，只要群眾安靜下來，廣播的聲音還是能讓多數人聽清。

學者們宣讀了一份《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主要是針對政府的三點要求：「1. 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運的學生『秋後算帳』。2. 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3. 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對靜坐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罪人。」[188] 另一方面也呼籲學生「發揚這次學運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出天安門廣場。」並「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然後幾個人又作了即席演講。溫元凱複述了《緊急呼籲》

針對政府的三點要求，接著說：「我們經過研究，如果政府不答應條件，我們將和同學一起行動。」蘇曉康則把廣場學生吹捧了一通，學運如何偉大、理性，學生如何比政府官員和文化精英都聰明很多，當局如何無能等等。最後他說：「正因為如此，你們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我們還有沒有理性？(他用提高了的音調問同學們，受了他們讚揚的學生便齊聲高喊：「有！」)那好，如果政府作出讓步之後，我們能用我們的理性回答他們。」

但是政府作了甚麼讓步，大家還沒看到，絕食學生卻已讓步到最低限度了——「平反」和學生組織合法化都暫且不提了，對話也不再強求電視直播，只要求語音實況轉播，並希望在對話中提出及解決平反與合法化的問題。這已經是妥協的最底限了，但沒得到任何明確的答覆。

這時，戴晴代表學者提出一個方案：[189]政府方面，由趙紫陽或李鵬出面，今晚到廣場上來，對絕食同學說一聲「同學們，你們好」這樣的話即可；同時允許將十二學者的呼籲登在明日的《光明日報》上，算作是官方的公開正式讓步，等於是否定了「四二六社論」，並默認學運組織的合法性。[190]學生方面，則在趙或李來廣場後就停止絕食、退出廣場，為明日戈爾巴喬夫到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讓出場地。

這樣的方案，雖對戴晴算是「偉大的勝利」，卻不是廣場絕食同學們的偉大勝利。幾個學者的演說一方面將同學們捧上天，一方面又盯準運動中同學們常提到的「理性」二字，特別是蘇曉康運用他的演講才能，使同學們能夠附和著他的提問齊聲高喊。但是，戴晴將這麼個「妥協方案」亮出來時，全場學生則回以靜默。

戴晴見沒人附和她的方案，便尷尬地試探：「同學們覺得怎麼樣？要是沒意見，我們就去請趙紫陽或李鵬出來向大家問好，並準備明天在《光明日報》上將我們的文章見報。」

反對戴晴的妥協方案

戴晴這麼一說，學生不再附和知識分子。在那短暫的沉默中，時間似乎凝固了。對這樣的建議，絕食同學怎麼會接受？這與絕食的要求差得太遠，且毫無保障。也有一些同學將他們看做為政府的說客，或視作知識分子「軟骨病」的表徵，從而很是反感。【191】在學者勸說大家理性時，廣場氣氛還一度傾向於退讓；但當大家得知退讓只是換來趙李一聲問好，堅持到底的情緒便佔了上風。

我意識到，去留須由絕食同學決定，於是鼓勵大家拿起話筒討論。廣場上聚滿了人，廣場上的華燈照著一層一層的人群，在黑夜中沒個邊際。我從沒面對這麼多人講過話，講話前先用了半分鐘的沉默和手勢，要大家安靜下來。夜裏的廣播聲能傳的很遠，我見大家已靜下來都能聽得見時，才拿起話筒講：

「要留還是要撤，是不是最好由絕食同學自己來決定？」【192】

這時，便有部分同學反對戴晴方案，廣場上的情緒整個扭轉過來。【193】幾個星期來的經驗，令我深知這批共產黨培養或迫害下成長的知識分子的懦弱。他們害怕共產黨，沒有膽量和能力承擔啟蒙者的角色，也沒為運動提供成熟的理論或戰略。學生組織缺乏有膽氣的學者作參謀，運動缺乏思想體系。戴晴明顯有一種精英意識，以為一說甚麼民眾便會跟從，對民主既沒有體驗，也沒有信心，更不會與民眾「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經過廣播辯論之後，絕食同學投票表決去留，結果是絕大多數不願接受戴晴的方案。【194】

將話筒交給開希

子夜後，開希來到廣播站，主張撤出廣場。和他一起來的

還有幾個同學。[195]我依然像主持「自由論壇」那樣維持辯論，將話筒交給要講話的人。但開希這幾個高聯同學一來，我知道圍在我附近的都是一派的主張，於是有意限制給話筒他們。這時王超華很激動地衝著我說：「你不能把持著廣播站，這是獨裁！」[196] 她這麼一喊，我只得將話筒交給開希。這時我已累得精疲力竭，便蜷縮在地上睡著了。

大約到凌晨三四點，開希的喊聲吵醒了我。他激動地論述為明日歡迎戈氏而讓出廣場的重要性，並「以個人名義」請求絕食團東移。[197]「我們只是挪一挪，讓出半個廣場，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要愛國啊！」開希叫著，一些學校的旗幟開始東轉。一隊一隊的學生，隨著飄揚的旗幟，有秩序地撤出原來的地方。隊伍迂迴曲折，形成了幾條人流的通道。

絕食學生有人來組織，我就可以鬆口氣了。我悄悄離開廣播站，走出廣場時，乘公共汽車回北大家中睡覺去了。

5月15日 星期一 晴而多雲 晝22℃ 夜15℃

「柴玲要自焚！」

到家天已大亮，睡到下午二點，醒來做麵條吃。想到同學們廣場東轉，是為了歡迎戈戈爾巴喬夫，讓他能向紀念碑獻花，又想到昨晚政府宣佈今日白天廣場戒嚴，因此估計會有事情發生，便匆匆趕往廣場。北京市政府昨晚宣佈在今日對天安門廣場戒嚴，留作歡迎儀式的禁區。我因此趕回廣場，而沒能將柴玲的《絕食書》錄音帶翻錄出幾百盤來散發。

為了趕時間，我第一次坐出租車。一路上，見各校學生打著大旗，紛紛趕往廣場。車開到宣武門東大街，交通完全堵塞。交錢下車，走到廣場，才發現根本沒有甚麼戒嚴。廣場上亂糟糟的，但氣氛有如過節一般，個個喜氣洋洋。

幾百個堅持不肯挪動的絕食同學留在紀念碑北面旗杆下，廣播站卻已搬走。一進同學圈，便有人著急地告訴我，「柴玲宣佈要自焚」，準備「用一個人的死換來千百個絕食者的生」，希望我去勸她，一定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他們說還有一些人要跟著柴玲自焚，抗議政府一再愚弄學生、不進行公開對話。

我趕緊找到柴玲，關切地問怎麼回事，她一笑置之，說已經過去了，反倒安慰我不要擔心，像沒事兒似的。

絕食團指揮部已經成立

我回家睡覺的這一上午，廣場有多少變故，我不清楚。【198】學生組織的複雜化，使許多支持學生的力量感到無所適從。高聯因為反對絕食等原因喪失了廣場領導權，而廣場又急需一個能代表絕食同學的權威組織，因此絕食團指揮部就產生了。而高聯開始意識到喪失對運動領導權的危機，反過來支持絕食，試圖重新取得運動的領導權，在廣場上同指揮部的摩擦就不可避免。

柴玲很反感高聯在絕食前後的反復，我關於高聯「懸空、名不符實，佔據領導地位，缺乏領導能力」的判斷，加強了她這種反感心理。我們都感覺到北高聯主要是由王超華的大量工作所維持，【199】而何貴方曾說他才是社科院選出的代表，每當提到王超華時，他總用十足不屑的語氣說超華在社科院並沒有代表性，大家並沒有選她做代表。何貴方熱情豪放，對學運很熱心，他的否定在我們對超華的判斷上也起了作用。【200】李祿稱超華「馬列主義老太太」，語出當時一部電影，頗有諷刺的味道。超華投身學運，本來最先接觸到的是柴玲與我，我們對她的印象都極好，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實在是件悲哀的事。

廣播班子與民主共性

柴玲如何成為總指揮我也沒太留意，心裏惦記著廣播站。

沒有廣播站，廣場同學很難組織起來。到了紀念碑東側才找到廣播站。陳林已買來好幾隻高音喇叭，我就用廣播求助，希望懂技術的同學幫忙。很快就有同學趕來，迅速將二隻喇叭安在華燈柱上。

然後我開始建立一個廣播班子，都是臨時根據需要，利用廣播徵聘來的。我徵請男、女播員各一人，於是來了廣播學院的王童和北師大的女播音員。還來了許多專業播音員，有一個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他說：「白天，我是政府的喉舌；晚上，我要做人民的喉舌！」〔圖 37〕

我們邊幹邊摸索出一套廣播站運作流程。我們分出這樣幾種角色——

總負責：我作最後審稿與綜合調度，並作為廣播站的代表，接洽處理各方面的事務；

站長：負責日常事務，先後有張伯笠、白夢、王童；

審稿：白夢、何貴方，將各方面傳來的大量傳單、文稿和



〔圖 37〕1989 年 5 月 15 日，廣播學院的王童和北師大的女播音員。

通知，根據重要性和內容進行篩選；

播音：王童和北師大的女播音員；[201]

技術：管設備維護；

秘書：將廣播內容全部錄音，並管理磁帶和文稿。每天都有能裝一大紙箱的文稿；

糾察：保護廣播站不受衝擊。

經過幾次調整，絕食團廣播站逐漸從初期的由我一人掌握，改為「總編輯負責制」、「站長負責制」，白夢和王童逐漸取代了我的事務性作用，使我得以抽身出來，處理廣場上更多的事務。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絕食團廣播站也傾向於不「參與任何派別之爭」，成為獨立的學運新聞機構，對各派學生組織一視同仁，誰有通告、宣言，他們都負責播出。這又頗有新聞獨立的意味。

審稿並非新聞審查，但內容過於激烈的，如「打倒共產黨」之類，我們一般不播；尋人啟事播過一段時間，後來不得不中止。好文章層出不窮、應接不暇。各界聲援學生的文章，簡短而感人。知識分子、記者、工人、市民的佔大多數；農民、個體戶、企業家、軍人的也時有所見；警察、士兵甚至便衣的也有，或是親自來廣播站演講，或是寫幾句話，表示不願再跟政府走。這類消息，初期極鼓舞士氣，隨著成百上千的絕食者一個個倒下，我們便聽從醫生的勸告，逐漸減少這類新聞，以免絕食同學過於興奮不利健康。[202]

糾察力量也非常重要。幾天下來，廣播站成了廣場上的實際指揮所。即使這樣純潔的學生運動，其中的種種紛爭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動用糾察隊的「武力」來應付各種「奪權者」。這方面的情況，我後面會詳細討論。

從學運中這許多自發過程的體驗裏，我逐漸堅定一個信念：民主程序是保證決策穩定性的有效方式；它可以在堅持民主原則的人群中逐漸摸索出來；它具有普適共性，事先取得這

些共性的知識，有利於民主建設的迅速成長。

抓住一個造謠的便衣

廣播站審稿制度的確立，與我們抓到的一個便衣有關。這天我正忙著甚麼，突然聽見廣播一則消息：「七萬首鋼工人罷工！」廣場上一片歡呼，卻沒讓我激動。相反，我有點不安，這麼大的事情怎麼之前沒一點預兆。作為廣播站負責人，我有責任保證其信譽。

我轉身問播音的王童：誰送的消息？查證核實沒有？王童一副歉疚的表情，他聽到這消息太振奮了，立即就像報喜一樣地播了出來。再一查，送消息的人早已不見蹤影。大家只記得是個工人模樣的人擠進了廣播站，急急地遞給他們一張紙條便走了。我腦海裏浮現出了八七年元旦遊行時那四個「工人老大哥」。成立廣播班子時，我已宣佈過審稿制，希望大家在重大消息播出前儘量慎重查證。這時，王童、白夢與何貴方都有點不好意思。他們太希望這是真的了。我對大家宣佈，再有人來報告這樣的消息，先將他留住，由我親自處理。我特別叮囑糾察隊配合行動。

果然，晚上十點左右，又有人來報「首鋼工人罷工」的消息，立即被糾察隊扣住。我要看證件，他立即緊張起來，說有事情，抽身要走，幾個糾察隊員將他圍住。這人二十左右，中等個兒，瘦瘦的，顯得緊張而機靈，言談舉止很像個待業青年。我們將他帶到邊上一個僻靜處，他害怕起來，帶了哭腔申辯他住在某街某樓某單元，只是忘了帶證件云云。看他這副模樣，我們已明白他是政府收買的人無疑，於是，在鄙視與不屑中放他走了。

廣播站更正了「首鋼罷工」的消息，說明正在查實之中，希望以後來通報類似消息的人提供更詳實的內容。但次日官方新聞還是煞有介事地辟謠，說學生在廣場廣播中造謠，美國之

音則在傳播謠言。[203]

只有我們幾個知道是怎麼回事。

知識界遊行聲援絕食學生

15日下午，「中國知識界」的大字橫幅出現在廣場上，許多知名學者除嚴家祺、包遵信之外，費孝通、馮友蘭等學術名人也加入了遊行聲援的行列。他們與昨日勸告學生保持「理性精神」、「退出廣場」的少數知識分子大不相同，今天這些知識界名人對絕食同學說：「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是你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站起來了，我們跟你們走！」聽到這些話，我心中沒有歡欣，反而很覺悲哀，怎麼老師走在學生後頭，還說要跟著學生走呢？

熱情的售貨員

15日下午，我去前門電器商店購買廣播器材，卻遇到了我不曾想到的動人場面。售貨員一見我是廣場上的學生，立即親熱起來，一邊很殷勤地同我說話，一邊迅速找我需要的貨物。另一位售貨員則遞上一杯茶，要我喝了再走。她們工作時間不能去廣場，顯然是想從我這裏聽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也借此表示對學生的支持。

我藉此機會，宣揚了一番絕食學生的訴求，和這場運動的目標。一杯茶喝完，我急著要趕回廣場，她們無論如何也不放我走，又冲了一杯「雀巢」咖啡，非讓我喝了不可。這種咖啡在大陸很貴，但她們毫不在惜，只希望我能多留一會，多與她們聊聊。臨走之前，她們發現我的手髒得不成樣子，又拉著我進裏間的水管去洗。我買的東西，她們用了一種極精細的方式包裝起來。

我從來沒遇見過這樣的售貨員。運動之前，她們總是對顧客兇巴巴的。

校醫說絕食可進流質

傍晚六點左右，北大副校長陳家爾帶領教師聲援隊伍來到廣場。[204]陳家爾和一名校醫來到廣播站。陳講了幾句話，便將話筒遞給醫生。這位主治醫師說：「絕食不是絕水，不僅可以喝水，也可進流質。按國際慣例，絕食只是不進食硬性食品，但可用飲料、牛奶等流質。印度的甘地便是飲用牛奶堅持絕食了四十九天。」

醫生的話，既有權威，又非常及時。這時同學們已絕食四十八小時，但對「絕食」的概念還不清楚。有的同學擔心政府造謠，甚麼也不入口，有的只喝點水，拒絕任何飲料和牛奶。因此，兩天下來，絕食同學的體質迅速下降，這時已經有上百人倒下，救護車笛聲不斷，有的同學進了醫院也拒絕飲用流質養料。因此，北大主任醫師的講話，不知挽救了多少同學的健康。

從此以後，絕食同學便可坦然地喝市民送來的各種飲料。冷飲、牛奶不斷送到廣場上，有的市民甚至將巧克力、蜂王漿加到水中。這時，絕食隊伍中傳來憤怒的抗議聲，他們擔心這麼多營養物質損害了絕食者的聲譽——「我們是來絕食的，不是來療養的！」他們派了代表到廣播站這樣呼籲。

幾乎同絕食者一樣

同學的心理，與政府一段新聞有關。14日晚《新聞聯播》中，報導了廣場上的絕食請願，但配合的畫面則是一個學生坐著吃麵包的特寫，這個鏡頭放了很久。

其實，廣場上的學生並非全在絕食，更多的是糾察隊和聲援的同學。看過電視的人轉述時非常氣憤，後援同學則回避在廣場公開吃東西。這天下午，當我拿起一塊麵包時，感覺無數隻眼睛在無形中注視著我，就像做賊一樣。我趕緊將麵包放下，從此不在廣場吃任何東西，幾乎同絕食者一樣了。這天晚

上我第一次暈倒就近打點滴，三天後我再次暈倒送往醫院住了一天。

我第一次暈倒

15日晚，我感到乏力，便睡在離絕食團廣播站南面不遠的同學堆中，沒有大衣，倦縮著身體靠著旁邊熟睡的同學取暖。我不願留在廣播站睡覺，那裏大衣也不夠，且常有人來報告情況，無法休息。

饑寒交迫中，我的身體開始發抖、抽搐。有同學發現了，便叫來醫務人員，將我抬進了廣播站東面的協和醫院臨時救護棚。量體溫、血壓、打點滴自不用說，記得當時血壓低到五十幾，但醫生說還不危險，幸好沒有發高燒。我在這裏美美地睡了一覺。

在救護棚裏，我認識了蕭鋒。他是協和醫科大學的青年老師，也是該校附屬醫院的門診醫生，通過他，又認識了另一位年輕的醫生柳田。二人都三十左右，名字是否這樣寫則不確定。

開始，他們只將我當普通學生對待；天亮時，我說要回廣播站，他們只是不許，還勸我不要繼續絕食。後來有同學來看我，他們才知道我是廣播站的負責人，按住我打完點滴後，才放我走。當時我讓他們將點滴的速度加大，等我走出來時，手臂已又腫又麻了。

5月16日 星期二 晴 晝27℃ 夜14℃

新聞聯播報導絕食

清晨，我從饑寒交迫中醒來。這時廣場上人數最少，但也

有好幾萬人，多數睡在石板地上，有的則三五成群議論紛紛。我從廣播站走出，穿過橫七豎八躺著的身體間的狹小通道，去人大會堂東側上廁所。

七點。新聞聯播。我驚奇地聽到官方對絕食的正面報導：多少學生繼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如何請願等等。我感到十分振奮。這可是全國都能聽到的新聞聯播！

雖然美國之音、BBC等廣播也能聽到，但因是短波，又被當局定為「敵臺」，在大陸收聽的人並不多，且主要限於學生、知識分子階層。當局新聞聯播正面報導學運，意義非同尋常。除了覆蓋面很廣以外，因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它播出絕食的消息，多少帶有承認的成分。

我感到十分鼓舞，更相信我們在廣場上堅持下去，可以喚醒民眾，而要解決問題，必先暴露問題。黨派之爭依然不在我的考慮中，對中共的政治人物，我都沒有信心。唯一有些好感的是鄧小平，但政治人物的人格受政治地位的限制，我們不能對任何人抱希望，而要決心改造這種專制體制。作為學生，能做的我們都做了。

救護車「生命線」

16日整天都在救護車淒厲的鳴笛聲中度過。為了救護絕食同學，糾察隊拉起了一道「生命線」。這是一條用同學身體做圍牆的通道，有三米寬，救護車能順暢無阻，從廣場東面一直通到紀念碑北面，在那裏形成一塊空場，停有四、五輛救護車隨時待命。每出去一輛，便由廣場東面停著的救護車群中補充一輛。

自從15日凌晨開希用讓絕食同學東轉後，廣場學生的隊形便完全混亂了。絕食同學已不在一起，幾百絕食同學堅持在紀念碑北的原地，更多則隨各校隊伍分散各處。「生命線」和各條小通道更將隊形分割得亂七八糟，廣場秩序越來越混亂。

每當有同學倒下，便有人來廣播站喊：「救護車，救護車，請到某處地方某面旗下，有絕食者昏倒！」這樣的喊聲不絕於耳。張伯笠統計著倒下的人數，寫在一面標有絕食時數和昏倒人數的黑板上。[205]

勸阻絕水

絕水是16日的另一個危機。這可能受了昨日「自焚」風氣的影響。昨天上午柴玲等人宣稱要自焚，因為他們是絕食的發起者，不忍其他同學先他們而死；晚上更有十一名師大的同學宣稱在子夜自焚，抗議政府麻木不仁。他們被同學們勸住了，因為這樣做的後果，將引起更多人傚仿而送命。

但絕水不同。在希望速戰速決、對政府實在悲憤的同學眼裏，這是個好方法。他們願意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為賭註，來考驗官僚的良心，激起更大的義憤。但這樣發展下去，後果依然會很嚴重，據説絕水一天以上，腎功能極易衰竭而致殘，嚴重的還會死亡。因此，雖然自己曾提出自焚，指揮部的柴玲和李祿這時轉而竭力勸阻絕水的同學。指揮部的責任是要保證沒有一個絕食同學死亡，爭取無人致殘。

人民大會堂北和新華門前，十七個學生與青年教師宣佈絕水，廣場上也有十幾個南開大學同學絕水。這種危險的傾向正在蔓延。柴玲和李祿拖著疲乏的身體四處奔走勸阻。

當時，絕食團指揮部還沒有完善的運作系統，它經常召集決策大會，依靠廣播站進行指揮，往往臨時徵召一隊糾察完成某項具體任務，而許多實際事務主要依靠普通同學自發處理。這些無名英雄自覺地維護秩序，勸阻市民不得衝擊政府機關，搞宣傳、演講、傳遞各種信息。沒有誰指揮，也不需要誰指揮，都是那麼自覺、默默無聞地盡自己職責，這是怎樣一個偉大的民主運動！

但是，當需要統一指揮處理的事務，常常呈報到廣播站來。柴玲與李祿常不在廣播站，因此許多時候我就得暫時充當

指揮。由於新華門來的絕水警報太多，雖然指揮部已經採取行動，我還是不放心，決定去看看。

人民大會堂北側的情況並沒有匯報的那麼嚴重。一排長長的警衛戰士靠門站著，他們腳下坐著一排學生糾察隊，有七八級臺階，學生坐在臺階頂上，臺下一群市民在圍觀，但沒有衝擊大會堂的跡象了。我沒有去長安街上看，後來才知道中央戲劇學院的絕水同學便在那裏躺成一線。到新華門前時，我見到四個學生和老師，一面白布橫幅上寫著「中國科技大學青年教師」。見幾個穿白衣服的醫護人員守在旁邊，我略感放心。

廣播站成了廣場的中心

16日白天，「絕食團廣播站」依然在建設之中。上午，我們用塑膠布與竹竿搭一個簡易棚，以防日曬雨淋損壞器材。各種消息匯集到這裏，各種物資匯集到這裏，各種人物也匯集到這裏。廣播站成了廣場的中心。

這時的物資，主要是飲料和藥品，特別是生理鹽水。醫院平日絕不發放給普通百姓的營養品，這時都慷慨地運來了，成箱的「人參蜂王漿」堆在一起。這樣，我們又不得不兼管物資發放。雖然我們一再強調這裏不是供應站，但還是有無數市民、醫生將這裏當作運動的中樞，他們並不分誰是頭，只管往發佈消息和命令的學生廣播站送東西。

各樣的人物來到這裏，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議，更是將我們弄得頭暈腦脹。他們那股熱忱難以阻擋，卻不關心是否找錯了對象，也不在意如何實施。最後，我們不得不用廣播徵用了一隊糾察，隔開這股潮流，開始了廣場的「新官僚」作風。

廣場上，大家忙碌著，歡躍著。

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協調

16日下午，我到新建成的「學運之聲」廣播站去協調，但

不很成功。它設在紀念碑底層東南角上，北、西兩面靠著紀念碑底座，以軍用帆布搭了個簡易防雨棚，面積約十平米，比「絕食團廣播站」大多了。外面一道糾察隊，將廣播站與圍觀的群眾分開。我好不容易才擠進了糾察線。

「學運之聲」廣播站由清華同學建立，功率強大，我進去後才知道原因。原來他們直接用廣場路燈上的交流電，擴音器也比我們多，真不愧為工科高材生。因為在紀念碑東南角，他們又拉了一隻喇叭放到更南面，因此，他們的覆蓋面主要是外圍市民，不似「絕食團廣播站」只在絕食同學中間。

我希望給他們最好的那盤磁帶，心想市民聽了柴玲唸的《絕食書》一定有許多人潸然淚下。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竟說要審查磁帶內容後才能播放。我在十分繁忙中抽出時間來這裏，本希望協調兩個廣播站的關係，比如交流優秀稿件，聯合播出重要聲明等，但沒想到受此冷遇，失望之下便沒有給他們磁帶。不過，那天晚上，兩個廣播站之間還是建立了「通訊聯繫」，各派一個糾察隊員互通情況，交流優秀稿件。

走到廣場南面，我見一隊五千人的「市民聲援團」正在浩浩蕩蕩地遊行。他們前排由三輪車開道，準備繞廣場一週！我趕到隊伍前感謝他們，隨後趕回廣播站，為他們的遊行播放《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以壯聲勢，並播出這個消息以鼓舞絕食同學的士氣。

閻明復來到廣播站

下午五點半，統戰部長閻明復來到廣播站。王丹和開希隨其左右，還有一些高聯同學也跟了來。半小時前，王丹來過廣播站，神秘地請我們準備一個「重大行動」，暗示有甚麼重要人物要到廣場上來。〔圖 38〕

《北京青年報》1989年5月18對閻來廣場的情景的報導，標題是「我的感情是屬於你們的」，摘要如下：

5月16日下午，絕食已經進入第三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同志突然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團的廣播站前。他身穿駝色西裝，內襯藍豎條紋襯衫，沒繫領帶，沒繫扣子，西服的兩個兜蓋折在兜裏；他的身邊只有一位手持步話機的警衛人員。

絕食團圈內一陣騷動。一位學生領袖帶頭喊著：「一二！坐下！」「一二！安靜！」另一位腋下夾著氧氣袋的學生領袖抓著兩個麥克風，用嘶啞的嗓音激動地說：「我首先擔保閻明復同志，他是我們的朋友，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場內漸漸安靜下來。面對學生，背後是紀念碑和大會堂，閻明復激動地搖動著麥克風：「我只是想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黨的事業要你們繼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用生命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

「我們只能這樣！」一個悲愴的聲音傳來。

閻明復說：「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以這幾天的英勇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



〔圖 38〕1989 年 5 月 16 日，統戰部長閻明復來到絕食團廣播站。封從德將話筒遞給閻明復。

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很快對整個局勢做出全面的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志們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做為代價，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而且完全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第二點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學們保證，同學們所擔心的秋後算帳，絕對不會有的，同學們的行動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支持。」閻明復最後說：「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跟你們回到學校去。我相信真理早晚會證實，這一天會很快到來。」……（講話內容根據現場錄音記錄）

這是一篇相當詳盡的報導，從中可以看到中國記者這幾天享受到短暫的新聞自由。《北京青年報》、《科技日報》、《工人日報》這些共產黨的「喉舌」，走在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前列。絕食這幾天，幾乎所有報刊都享有了短暫的新聞自由，甚至連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也大幅報導絕食。

報導中「一位腋下夾著氧氣袋的學生領袖」是指吾爾開希，當時大陸記者對他還很陌生。他一手拔出插在鼻中的輸氣管，一手抓著麥克風，很有一番英雄氣概。說完便倒下，旁邊醫生手忙腳亂地將他抬上救護車。這番情景十分感動在場的同學，但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一再重複，引起許多同學的疑惑甚至反感。問題的關鍵不是開希是否真有心臟病，而是學生領袖是否應該不擇手段大出風頭，照開希的說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個人魅力」？同學們對此普遍持否定態度。中國人對出風頭極為反感，開希是否明白自己過多地在群眾面前作戲劇性的悲壯舉動會招來反感？他似乎是個很少顧及別人議論的人，這是他勇敢的一面。與開希的形象成鮮明對照的是王丹。他總是一副儒弱書生的形象，插著手站在一邊，該他說話時，便用平和的聲音輕輕道來。他的形象似乎更為大家所接受。

我站在閻明復右後側。報導中帶頭喊「一二！坐下！」的

就是我。開希和閻明復講話時，我退到後面。我意識到這是閻明復與絕食同學之間的事，我的職責是保證廣播系統暢通。但不知為何，當我站在閻明復右後側時，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偏偏拍了我的一個特寫，晚上看了電視《新聞聯播》的同學告訴我，説我的特寫持續了幾秒鐘。許多親友由此得知我已捲入學運，為我捏一把汗。

閻明復走後，絕食團各校代表開了一個會，討論是否聽從閻的勸告撤出廣場，會後各校代表回去統計，結果是百分之九十的絕食同學堅絕不撤。這個會議是李祿和柴玲召集的，我並沒有參加。這時我還沒有參加指揮部。【206】

趙、戈談話意味深長

16日晚，轉播中央臺的新聞節目時，我聽到了趙紫陽下午對戈爾巴喬夫講話時，「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共的秘密」——「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圖 39〕



〔圖 39〕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見面時透露了中共的秘密。

我吃了一驚，第一個反應是「這傢夥，怎麼把鄧小平拋了出來？」趙紫陽的弦外之音太重，含沙射影，不像是老練的政治家所應持的風度。我不相信趙紫陽能扳倒鄧小平，但趙這麼說，意味著甚麼呢？我沒細想，但有兩點很明顯：一，趙、鄧出現分歧；二，趙這番話是講給國人聽的，顯然是要利用學運，至於是甚麼目的一時很難判斷。趙鄧分歧卻是我絕沒料到的。我思及鄧林到北大對同學們說的話，「老頭子現在也身不由己」，那麼，鄧是否已經倒向支持李鵬那班傢夥了？這太危險了。【207】

廣場上瞬息萬變的氣氛和繁雜的事務，使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願再想下去。我們這時「不參與黨派之爭」的觀念還很深，對黨內派別根本摸不清楚，對趙不明朗的作風也沒有信賴感。「我行我素，以靜制動」，我決定了這樣的行動方針。政治鬥爭就是力量對比。現在的關鍵是要看民眾的民主力量是否已足夠動搖黨內既得利益階層的權力基礎；我對柴玲一直陳說這樣的觀點。現在是檢驗十年改革中積累的這股力量的時候，根本的決定因素在此。因此，我們作為學生，能夠起到的作用就是要激發起這股力量的覺醒，而它是否足夠強大，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這也是我們堅持「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的緣由。

阻止衝擊大會堂

一些危險的信號在顯現。表面上，百萬人來廣場聲援絕食，氣氛熱烈而祥和。但從中午開始不斷傳來告急，成千上萬人圍聚大會堂東門外，試圖衝進去。絕食團指揮部已經動員過幾批糾察隊去阻攔都未奏效。許多同學跑到廣播站來，希望更多同學去阻攔激動的群眾。按分工，北大等校自治會和北高聯才是處理這類事件的組織。開始我只是將這類消息向這些組織轉達，但情況越來越緊急。

最後，晚上八點左右，我決定去看一下現場的情況，於是帶上幾個糾察隊員，去了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大約四五萬人圍聚在那裏，大會堂東門外的臺階上卻只有一層軍警在把守，竟然比平時還少！我擔心這是政府的陰謀，他們正在等著鎮壓的藉口。我們五六人形成一個小分隊，插入人群，向最前面擠去，邊擠邊用話筒開道；「這是絕食同學！請讓開！」快到最前排時，看見陳明遠老師站在臺階上，郭海峰站在一邊。於是，我們請陳老師給群眾演講，勸說大家離開此地。

陳明遠的演講非常成功，但也沒能帶領人群離開。許多市民喊「學生萬歲！支持學生！」於是陳明遠問：「我們撤不撤？」眾人喊「撤！」於是陳老師帶頭從臺階向下走，附近的群眾也轉身向下走去，形成一股人流，在場的小部分便跟著陳老師散去。

但是，後來跟著人流的群眾發現走到了馬路上，並沒有甚麼新奇的事發生，更多人又回頭湊在人群中看熱鬧。大家議論紛紛，氣憤地指責當局不顧學生死活。這是一個發洩多年不滿的機會，反正法不治眾，在少數市民的衝動口號下，大家便如潮水一般，一拍一拍地向前湧。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沒有足夠大聲的話筒，讓每個人都能聽清陳老師的演講；也沒有足夠的糾察隊員，來阻擋如潮的群眾。政府已經無恥到了極點，看著那排單薄的士兵，我讓糾察同學撤出現場。不知為何，一個小時後我又回到這裏時，大部分人已經散去。北京市民的自覺性超出了我的估計，學生的理性行為和陳老師的演講在相當的市民中起了作用，他們阻止了人群繼續升溫。【208】

百萬人多次上街反對政府而沒有任何暴力事件，這可能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

柴玲暈倒，我暫代主持大會

16日，絕食第4天，柴玲在饑寒交迫勞困交加中暈倒，無



〔圖 40〕1989 年 5 月 16 日，絕食第四天，柴玲在饑寒交迫、勞困交加中暈倒。

法理事。[209] 晚上，指揮部來人（好像是郭海峰）到廣播站來找我，希望我能暫代柴玲作臨時總指揮，主持當晚的絕食團代表大會。我沒加考慮便跟他們去開會。當時廣播站實際上已經是廣場上的指揮中樞，加上此前自己在學生組織中的經歷和信任基礎，因此，對臨時代理總指揮我並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的。〔圖 40〕

當時絕食團指揮和廣播站並沒甚麼明顯分別，而我認為凡事皆得實際去做，沒考慮過名分。後來即使王文、郭海峰等人對指揮部發難，也沒對質疑我臨時代理總指揮和後來成為絕食團的副總指揮。倒是後來記者知道了我和柴玲的關係，才產生「革命夫妻」這個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形象，因為王文綁架事件曝光我們更被指責為「夫妻店」，實際上我的出任卻非柴玲的請求。我們既有這種關係，就得承擔它所帶來的誤解與麻

煩，這種誤解既滑稽又無聊。即使在那時，我只是將柴玲看得很普通，完全沒有意識到她的頭銜和這頭銜在傳媒中的地位——事實上，我在運動中一直憂心的倒是許多人在鏡頭前的表現會「帶壞風氣」。

李祿主持會議的才幹

在這晚的代表大會上，我真正認識了李祿。他比我們都有才幹。我雖代理總指揮，但對主持絕食團二、三百代表的大會還是感到很吃力。這時，作為副總指揮的李祿，逐漸用他的才識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鬆了一口氣。我驚訝地發現並欣賞起他主持會議的秩序和效率。

李祿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二三百人的大會上，他能從廣場上昏暗的燈光下辨認出誰不是某校昨日來開會的代表。他還能記住幾天來所討論過種種紛亂議題的細節，指出當前講話同學的矛盾之處。大家發言後，李祿所作的歸納性小結，既準確又精煉。

我看見一個高效而有秩序的會議：首先宣佈討論範圍和議題，經大家增刪後，將各議題按優先順序排列為議程，然後嚴格按議程討論。討論規則：不許插話；舉手發言；發言限時三、五分鐘；只講論點、不作闡述。最後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通常發言的人總喜歡長篇大論，既多餘，又易橫生枝節引發無休止的爭論。

議題討論完，李祿便將大家基本一致的觀點歸成一大類，將其他不同的方案明確描述出來，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細分ABCD，讓代表們記下，回各自學校的絕食同學中去，將每個絕食同學對各項爭議議案的投票數字統計上來，匯報指揮部，然後在廣播站宣佈各項投票結果。絕食團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爭論的問題，都經過全體絕食成員的投票。

我相信，凡開過這些會的人，都會記得李祿的才幹。那

晚，我對李祿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頭腦那麼清晰，對民主程序那麼在行——這正是運動當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頭腦讓更多人頭腦清晰，開會時他總說「要相信別人的頭腦」，使許多自大狂覺悟；他說「只講論點，不許闡述」，使大家發現闡述細節的不合適宜；在同我與柴玲商討局勢與戰略時，他一句「要用大思維」，使我們衝破了廣場上瞬息不變的現實事務的局限。那時，我對李祿的才能佩服得可謂五體投地。從此，我絕對信任了李祿。

與市紅十字會交涉

會上，我問絕食團共有多少人，當時報給我的數字是3144。從此，在我心目中便有了3144個絕食團員，我的一切行為要對他們負責。[210]

16日深夜，可能是北高聯的熊煒，找我同去廣場東面歷史博物館前，與北京市紅十字會商議救護事宜。車裏有市紅十字會的兩個主要負責人：會長是位婦女，五十左右，一副黨委書記的樣子；副會長也五十多，乾瘦的老頭，顯得精明而謙卑，像個外科醫生。他們將我們迎上一輛救護車，便令司機開到長安街上。

他們自稱受北京市政府的委託，來廣場護理絕食學生，強調「完全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立場」。然後說，他們發現廣場上的救護工作沒有統一協調指揮，完全是各個醫院各自為政，出現許多混亂；現在是將各個醫療單位組織起來的時候了。接著，他們便要求：由市紅十字會來領導，指揮廣場上的醫務、救護工作。他們保證市紅十字會能出十幾輛救護車和幾十名醫務人員。

我想起蕭鋒他們正在自發籌備的「救護協調小組」，又想到下午同學們對市紅十字會「黃衣幫」的不滿，便警覺起來，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此前，從下午開始，許多同學氣憤地跑

來匯報，穿黃制服的市紅十字會的救護人員十分粗暴，抬著擔架在絕食同學中橫衝直撞。昨夜認識的兩位醫生蕭鋒和柳田告訴我，市紅十字會是北京市政府的下轄機構，聽北京市委的調遣；而今天凌晨，市紅十字跑到中國紅十字會借制服，兩位醫生覺得是在搞甚麼陰謀。蕭鋒和柳田還希望與學生一起成立「救護協調中心」，我很贊同，便拜託二人負責串聯醫務人員，我去組織學生一方。熊煒找我去與市紅十字會協商，大約就是因我這樣的角色。

因此，現在面對市紅十字會的要求，我很為難，只能對他們說，希望他們與其他各大醫務單位協商，組織「救護協調中心」，而我也得回廣場與同學們商量決定。乾瘦的副會長一副焦急的神色，說恐怕這樣太慢，廣場上很快可能爆發瘟疫。但他們那種急切，使我更擔心他們帶有某種使命，因此堅持回去商量。相較之下，我更信任蕭鋒他們。我答應之後再聯繫。「談判」就此結束。【211】

半夜回到廣場，紀念碑上正在舉行各校代表聯席會議。我轉達了市紅十字會的要求，代表們似乎都沒感到有甚麼必要由一個醫療單位來指揮其他醫療單位的行動，更譴責起市紅十字會成員今天在廣場上的粗魯行為。會後我又找到蕭鋒他們，提到市紅十字的要求，他們只是露出一副鄙視的表情：「哼！這些人！……」但是，蕭鋒他們籌辦「救護協調小組」也不順利，組織操作他們並不在行。這種情形下，我後來就沒與市紅十字會聯繫。【212】

5月17日 星期三 多雲 晝30℃ 夜15℃

趙紫陽的書面講話

清晨七點，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裏，聽到

趙紫陽代表政治局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的書面講話。他希望同學們冷靜，顧全大局，停止絕食。又說「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中央對大家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將進一步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趙這番話，除保證不「秋後算帳」有點實際意義以外，對學生所提出的兩點要求並無回應。他試圖給學生一個理解、同情的印象，但給人感覺不是在耍手腕就是太軟弱無力了。趙紫陽依然不能給我們信賴感，但他顯然與李鵬不同。這是我當時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應。【213】

5 月 17 日是 16 日的延續和發展，各方面的程度都迅速地增長。上街遊行的人更多，最多時超過一百萬；聲援學生的社會階層更廣泛；送到廣場上的、到指揮部來送稿件、要求廣播的人更多；到指揮部提建議的人多到應接不暇；糾察隊一層又一層，通行證發不過來。而學生組織內部的矛盾也更趨激化。

兩個廣播兩個聲音

上午，我去「學運之聲」同他們進一步商量協調兩個廣播站時，才發現情勢有些不對頭。那裏的糾察隊得知我是絕食團指揮部的，無論如何不讓我進去，急得我兩眼冒火。我一再向他們申辯自己是絕食團的副總指揮，他們卻只認北高聯簽發的通行證。我自然沒有，也絕沒料到有此必要。

焦急無奈之中，突然發現王超華在學運之聲棚子裏。她證明了我的身份，為我放行。這時我感到的還只是今非昔比的感慨和對新形成的官僚主義無可奈何。但從超華見我的異樣與迴避態度，我隱隱不安。【214】她代表北高聯，在學運之聲進出自如，廣播站裏的人似乎都聽命於她。

廣場上出現了「兩個聲音」，許多同學向我抱怨，有的則表示擔憂。為此，我向學運之聲建議，兩個廣播站將播音的覆

蓋範圍劃分一下，以免互相干擾。他們態度輕慢不願理睬，還找了一個理直氣壯的藉口：「我們是中立的廣播站，不向任何組織負責！」

我有些火了，便大聲與他們爭辯。這時，清華的周鋒鎖過來作和事佬，大約還感念我兩次去清華演講的舊誼。他安慰著我，將我勸出廣播棚。我雖忿忿，卻覺得周鋒鎖是個十分沉穩的人，句句都在理上。

回到絕食團廣播站，才知昨天超華到絕食團借走了五千元。[215] 我們自然將此事與一系列情況聯繫起來：今天「學運之聲」突然增多的喇叭，近日北高聯在廣場上勢力的迅速擴張，紀念碑三層上很快出現了北高聯聯絡處、財務處。因為高聯在名分上的優勢，到廣場的各種支持包括捐款便很快轉移過去。不到兩天時間，高聯便重新掌控廣場，自然就需要一個指揮系統，也就是學運之聲。

對王超華的不解

我深知王超華的耐力和組織能力，從此對她很是不解。她成日廢寢忘食東奔西跑，說話總是啞著的嗓子，只在開會的空隙，打個盹休息。隨著後來衝突日益嚴重，這種不解越來越強，使我既遺憾又感慨，卻一直鬧不清她「究竟是為了甚麼？」何貴方將她視為一個野心家，但她為何總在暗中發奮而公然不博取名利呢？我依然不解。學心理的柴玲將其解釋為心理原因，可能還有些道理。

當時我的行動基於這樣的認識：這次學運只是一次「新啟蒙運動」，是社會運動的初級階段。學運應是理想性的，因此不能超越運動的階段而企圖追求實際的社會、政治功效。政治鬥爭的結果是由雙方力量對比決定的，學運只是喚醒民眾力量，而能否實現民主，得看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間的實力較量。因此，學運不應當參與任何黨派之爭。民眾剛剛感覺到在

廣場上站起來了，廣場是喚起全國民眾覺醒的旗幟，這面旗幟不能倒。一個簡單的事實，會促使全國民眾思考：在廣場上，還有那麼一批人敢於直抒己見。這是提高公民意識的關鍵，因此在廣場上堅持一分鐘，在全國便有千百人覺醒，中國日後的民主化將依靠這批覺悟起來的人。另外，我還認為，廣場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撤還是留，而是如何按民主程序將運動好好地組織起來。

北大對廣場的支持

北京大學既然是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歷次學運的先驅和中堅，現在在廣場上自然會顯出它的實力。【216】北大學生人數最多，校領導也最開明；最早提出「請願七條」；最早成立自治組織，其民主建設也最完備；最先發起全市性大規模遊行，也是唯一堅持罷課從未復課的學校；絕食活動實際上是在北大醞釀開始的，《絕食書》也在此產生，參加絕食的同學在各高校首屈一指。廣場上北大糾察隊最多；【217】也只有北大才在廣場上設有專門的供應站，這裏有廣場上唯一的專用電話。北大的校方和教職員工為絕食同學提供了慷慨的支援。

北大在廣場上甚至有兩個供應站。一是「北大供水站」，設在紀念碑二層東南角，除生理鹽水以外，還供應茶水和麵包，大約5月16日前後便設立了。開初只為北大同學而設，後來成為整個廣場的供水站。

另一個供應站是「北大聯絡站」，設在廣場東面歷史博物館前，比供水站晚兩天建立，是北大校方在聲援浪潮最高漲時設立的。這裏既有從歷史博物館拉出來的專用電話線，又有校車每日在廣場與學校之間穿梭，將大批的麵包物資源源不斷地運來。這裏甚至有電視，據稱是四通公司捐的，為了讓廣場學生看到預期的電視直播對話。

北大聯絡站的電話是程序控制電話，因此可以直撥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這在當時中國還是少有的。每天都有全國各地

高校的學生利用這條線路瞭解北京學運的最新動態，南京大學更是每天都保持聯絡。後來，世界各地的捐款也曾利用這部電話與廣場聯絡。此處實在是個運作得很好的聯絡站，北大籌委會派專人值班，晝夜輪換三班。

新聞自由與名人上街

這幾天中共對報刊的控制有所放鬆。5月17日，中國幾個「民主黨派」主席登報聯名，要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共高層趕快與絕食同學對話。而中共的下屬機構如共青團、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全國婦聯等也上書中央，作類似的要求。知名作家如冰心等人，也聯名作同樣的要求。更多的知名學者如嚴家祺、包遵信等人更聯名發表措詞更為激烈的宣言。但是，他們的聲音在廣場上的驚濤駭浪之中顯得微弱，「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218】

看到那許多學者、教授、某某知名人士，將他們的大名和頭銜寫在綬帶斜挎上身，或寫在醒目的標牌橫幅上，或登報、或在廣播裏宣揚，我突然感到滑稽與悲涼。就在一週前，這些人還是怎麼請也請不出來。我對所謂的精英確實有些鄙視。我更願意將一個工人的文字交給播音員唸，而不願意聽那些知識分子經過修飾的空洞文字——他們文章的份量在於他們的名字，而一個普通人的字裏行間卻透出人性的光輝與情感。我更願意留在廣場同學之中，或與街上的民眾走一起，從中吸收精神的養料供我靈命的生長；而不願意坐下來聽精英的「參謀」與空談。

好在，並非所有知識分子都在空談，譬如沈澤宜。

又見沈澤宜

沈澤宜老師是我們非常尊敬的一位知識分子，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無論是我，是柴玲，還是許多在北大籌委會和廣場

指揮部接觸過他的同學，都會非常懷念沈澤宜。長期的監獄與流放生活，使他更深入瞭解國人的苦難，卻沒有動搖他摒除這苦難根源的意志與他詩人的熱情。他由於長期受到打壓和邊緣化，不像那些「精英」那麼為外界所知。【219】

這天，我驚喜地在絕食團廣播站又見到了他！沈老師回湖州師專處理完教學任務，又趕赴北京，正好一個星期，正如他回去時對我承諾的那樣。他要在重新投入學運，找回他逝去的青春。

沈老師見到我也非常高興。他告訴我，到了北京後，他馬上去北大找我們，終於在廣場上找到了我。從他平凡而不平靜的幾句話中，我感到受人完全信託的溫暖。沈老師的意志和精神在一股強大的感受之中傳遞給我，從此，我有了一種歷史感。我相信自己當時非凡的精力中有他二十多年前的青春力量。

沈老師只在廣播站做一些非常細微的事，很少給我們提甚麼戰略或建議，但他是我和柴玲的一個精神支柱。

5月18日 星期四 陰有陣雨 晝26℃ 夜12℃

轉移絕食同學上車避雨

昨晚的天氣預報說今日有陣雨，廣場上就已不安起來。絕食四天多，昏倒上千人。這時一場雨，不僅絕食同學身體頂不住，最可怕的是雨後迅速滋生的病菌，隨時可能帶來一場瘟疫。對八八年上海流行的甲型肝炎和北京流行的紅眼病，大家記憶猶新。

黎明，郭海峰來絕食團廣播站報告，他已同市公交總公司協調，將70多輛聯通式公共汽車調到廣場北部，為絕食同學避雨之用。【220】張伯笠接受柴玲的封號，用紅筆在白紙上寫了



〔圖 41〕1989 年 5 月 18 日，70 多輛聯通式公交車停在廣場北部，為絕食同學避雨之用。

「營地轉移總指揮」字樣，貼在胸前，走馬上任。柴玲則在學運之聲廣播向絕食同學發出「上車避雨」的動員令，並要求所有的糾察隊都聽從伯笠的調度，同時請求護理人員協助體質虛弱的絕食同學。廣播站也呼籲其他單位有大轎車的也開到廣場來。〔圖 41〕

轉到公車上避雨，北高聯與絕食團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能夠利用學運之聲的大功率廣播來統一指揮全場行動。張伯笠的任務是將廣場北部滯留的市民移走，留出足夠的空間將公共汽車開進來。李祿則負責組織絕食團的糾察隊和醫務人員，形成一條通道，將絕食同學接上車。我則留在廣播站，用廣播協調各方面的行動。

很快可能與高層「對話」

忙亂中，一個北師大女生來指揮部，細聲細氣地說「我是

開希的秘書，他有件事要我轉告你們。」當時我吃了一驚，吾爾開希居然還有女秘書。開希要她轉告我們，很快可能同國家領導人對話，請絕食團指揮部也派人參加，有車已在東南角等候。【221】

當時我沒看重這件事。首先，程序上就不對，對話應是對話團的事，他們更有準備。其次，現在指揮部忙著將絕食同學轉到公車上避雨，根本沒有功夫顧及別的事；如果要對話，也得安排別的時間，有些從容的準備才行，單方面隨叫隨到在程序上更不對，還不用說有沒有尊嚴。我認為將同學們平安轉移上車才是頭等大事，因此決定不去。當時似乎也沒有足夠人手能夠代替我們指揮部的成員。這裏是我們的崗位，對3144個絕食同學負責，是我們的首要責任。指揮部其他成員人也是這個看法。

於是，18日與李鵬的會談，絕食團指揮部的人都沒去。更有意思的巧合是，當吾爾開希、王丹等人與李鵬見面時，絕食團指揮部的主要人物：郭海峰、柴玲、張伯笠、李祿，實際上都紛紛躺在醫院裏了。我在當晚也被送進醫院。

指揮部幾乎全都暈倒了

郭海峰辛苦一通宵，聯繫來70多輛公共汽車，之後便昏倒了。張伯笠臨時總指揮幹了不到兩個小時，也累倒了，被抬入醫院。這時李祿和柴玲也已相繼昏倒入院，但當時我還不知道。上午九點左右，我接過張伯笠的「營地轉移總指揮」標貼，貼到胸前，趕往廣場北部去接任。真有點前仆後繼的味道。【222】

我到廣場北部時，70來輛公共汽車和包圍現場的糾察隊已經在那裏。空場太小，應廣播站呼籲而趕來的大轎車很快就到，於是我指揮成百糾察隊員向南擴充場地。費了很大力氣，才在廣場北部形成一條東西貫穿的空場，70餘輛公共汽車都集

中在東面。又在西面設了一個車輛入口，凡是大轎車都放入，其他車輛一律攔在外面。

這時又得知，南面毛主席紀念堂與前門之間還有許多大轎車。我攔了一輛打著「聲援北京學生」小旗的小轎車趕過去。這是天津市政府某單位的公務車，今晨從天津趕來送捐款。車裏有三人，他們很爽快地答應為我作「指揮車」。到毛紀念堂南面空場，見四輛轎車停在那裏，有一輛是北航校車，司機們正不知應往何處。我們帶著幾輛車往回開，費了好大周折，才帶進北部空場。

這時，廣場北部的糾察隊正很有秩序地護送絕食學生登上大轎車。一條寬敞通道通向廣場絕食的同學，身體孱弱的絕食者則在糾察隊員或護理人員的攙扶之下慢慢地向大轎車移動。我到車上檢查，發現有些沒絕食的人也上車避雨，便將他們叫下來。

我回到廣播站時，大約是十一點。後來的情形記不大清楚了，大約這時我又暈倒，躺到廣場上的臨時護理棚裏去了。這種棚子我待過兩次，這次是怎麼昏倒的我卻記不起來。

與李鵬會談開希失言

正當指揮部轉移絕食同學上車避雨，累得大家都昏倒的時候，李鵬找了一些同學舉行會談。這次會談被外界視為「對話」，以為是電視直播全國的，甚至以為各大報刊都無刪剪地轉載了，所以當時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影響。[223]我也沒料到有這麼大的影響，否則就會考慮參加，至少也會推薦指揮部中一人去。18日我沒能看電視或報紙，實際上當天把此事全忘了。「六四」後才看到報紙，真是痛心疾首。一是後悔指揮部沒去參加，二是因為吾爾開希說的那些無根據的蠢話。[224]

這次會談，政府方面有總理李鵬、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和北大校黨委書記王學珍（他

倒是向著學生的）。學生方面，則有熊焱（北大絕食代表，並非代表對話團，不知為何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與沈彤未到會）、王超華（北高聯實際領袖）、王治新（北高聯秘書長，政法大學學生）、邵江（北大駐北高聯常委）、甄頌育（政法大學學生）、程真（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吾爾開希和王丹（二人因頻繁的媒體曝光而被外界誤認為北高聯的領袖，其實當時並沒有甚麼具體職務）。

會談中，開希犯了一個大錯——他一再強調學生領袖與學運組織的無能為力，甚至說廣場學生背離民主程序。會談開始不久他便說「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要說服我們這些人。我們很想讓同學們離開廣場，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99.9%服從0.1%——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最後這句話在會談結束前他又強調了一遍。

這話實在太離譜！

最致命的是，開希這句話，很容易被誤解為學生組織完全沒有權威，學運完全失控，為主張鎮壓的強硬派提供了藉口。如果學生頭目都「不能左右夥伴們的行動」，那麼中共當局就有理由使用武力來恢復秩序了。李鵬很高興抓到吾爾開希的這句話，先講一通北京現在是無政府狀態、動亂是客觀事實、政府有責任恢復正常秩序，然後說「你們這幾位不能左右絕食學生的行動」，為當晚宣佈的戒嚴打下完美的伏筆。其實，幾個小時前李鵬剛剛在鄧小平家參與了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調動軍隊戒嚴，這時在電視上會見絕食學生，只不過做個姿態對外表示盡了最後的努力，並誘導學生公開承認收拾不了局面，而為當局提供戒嚴找到及時的藉口而已。【225】

其次，開希這麼講會使外界誤解要求民主的學生很不民主，以為絕食同學全然喪失理智才會「99.9%服從0.1%」。吾爾開希的說法當然不是事實。首先，在沒有達到請願兩條的要求時，絕食同學大多數不會復食撤離廣場，這一點王丹當場就

有更正。其次，「尊重少數」的原則並不導致「多數服從少數」，學運組織也絕非毫無權威，後來絕食團指揮部主導的復食證明了這一點。其實，開希這麼說，真正的原因是他和王丹作為媒體明星的懸空，造成他們的無力感。當時二人在學運組織內部因為不守規則早已被處分而沒甚麼影響力：北高聯一再決議要求二人不得代表高聯；[226]指揮部和對話團裏二人更沒甚麼影響。二人真正的影響力都在媒體上。而吾爾開希想當然地以運動全權代表自居，這才有「99.9%服從0.1%」這樣的胡言亂語。

熊焱講得最好

如果說開希是一時興起的胡話，令人費解的是王超華，照理說她比較成熟，但這時也來支持開希的觀點。她說：「我同意剛才一個同學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種決議，但不能代表廣大同學的話，也是沒有用處的。」開希超華「示弱」的因由，我認為是高聯與絕食團的磨擦所致，這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無力感的來源。從超華14日衝進對話現場喊停的舉動看，她很堅持程序，而要走正當的程序，就得通過廣場絕食學生的代表大會，而不是參與會談的這些人能夠在沒有滿足兩條要求的情況下決定的。

整個會談中，熊焱講得最好，最能體現絕食同學的心聲。他的話簡樸有力，思路清晰。第一次他說：「不管政府是否承認是愛國民主運動，歷史會承認的。但是，為甚麼還特別需要政府及其它各方面的承認呢？這代表了人民的一種願望：想看看我們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實問題就在這裏。第二，我們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人，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甚麼面子及其它甚麼東西都就放下來，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人民是會擁護的。第三，我們對李鵬總理有意見，並不是對你個人有甚麼

意見，對你有意見，因為你是共和國總理。」

熊焱第二次發言是在會談即將結束時，非常簡短有力：「親愛的李鵬同志，剛才您說了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好像社會上有動亂的跡象，我要講學生運動與動亂的關係，學生遊行與動亂沒有關係，望能及時解決。」熊焱真不愧為對話團的人，我為是他的北大同學與戰友而自豪。

李鵬的發言則漏洞百出，既明顯又可笑。例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而且我也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要編這樣的政治笑話，恐怕還很難。例二，「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但是就在當晚，他便宣佈戒嚴，正是為了「制止首都的動亂」。例三，李鵬說「北京這幾天已經陷入了無政府狀態」，並稱「絕沒有把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意思」，卻毫不檢討自己作為政府總理的責任，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後來，新華社發了一則消息，北京市在5月份犯罪率減少，交通事故下降，明顯是社會安定的確證，再次證明了政府的無能——簡直是給李鵬一記響亮的耳光。【227】

閻明復透露趙紫陽舉動

閻明復的發言實際上是在為李鵬做鋪墊。他說：「同學們自發產生的三個方面的組織，對局勢的影響是越來越差了，現在事態的發展不是按你們的意願進行的。」而且他早在「十三號晚上就跟吾爾開希和王丹講：事態的發展已經超出學生發起人這些良善的願望。現在已經不是你們能夠影響的了。」總之學生自己收拾不了局面，政府就必須干預了。

閻明復還有一個說法比較蹊蹺：「中央領導同志本想到廣場上去看望同學們，因為沒與你們聯繫上，就沒有辦法進去，這一點你們可能都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從上下文看，閻明復顯然是指17日趙紫陽試圖到過廣場。這很可惜。如果趙

到廣場登高一呼，全國的學生和民眾都會跟他走。閻明復這麼說，是否暗示趙紫陽已失去了鄧小平的支持？16日趙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番話，將鄧抬出來作擋箭牌，已說明了他的失勢，且必然激怒鄧小平。很可能是趙既不甘心作鄧垂簾聽政下的兒皇帝，又實在沒有發動政變的實力與魄力。

閻明復透露的趙紫陽的舉動，讓我想起兩件事。一是趙紫陽16日在人民大會堂樓頂，用望遠鏡偷偷觀察廣場，被香港記者用長焦距鏡頭攝下來，第二天我們便得到了刊登此照的香港報紙。二是16日晚上在廣播站，有個來人說他叫周舵，四通公司某研究所的，和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有關係，表示希望與學生首腦見面，並稱有來自趙紫陽的情報需要聯繫。他大約是見我像個播音員，不久就走了。我不知道閻明復所稱的「因為沒與你們聯繫上」，是否包含周舵的這次努力。

我裝備了一輛指揮車

我雖記不得5月18日下午的那場大雨中，我在何處（也許那時就是我第二次暈倒的時候），卻很記得之前或之後如何裝備了一輛指揮車。

我聽說在紀念碑東南角停有一輛大客車，司機願意為指揮部效力，便去了那裏。我們先讓大客車繞過「生命線」，開到紀念碑東邊，然後將廣播器材搬到車上，又買了四隻高音喇叭裝在車頂上。到了傍晚，一切裝備齊全，張伯笠在車兩側寫上六個大黑字：「絕食團指揮車」。何貴方覺得不夠氣派，又用五米長的大紅布，寫上醒目的「指揮車」幾個字套在車頭，才算滿意。〔圖 42〕

建立指揮車，有當時的實際需要。因為絕食同學已經移到廣場北部的大客車上，我們在紀念碑附近的兩個廣播站都失去效力。有了指揮車，我們不光能到廣場各處，還能開到廣場以外的地方去指揮各處的糾察隊，這在戒嚴後尤其發揮作用。

傍晚，指揮車裝備好後，昏倒入院的柴玲和李祿回到了廣場。興奮中，我們決定開車到長安街上巡視一番，鼓舞士氣。車上有柴玲、李祿、張伯笠、王童、陳林和我。當王童用播音員的標準發音向街上市民與糾察隊員宣告「這裏是絕食團指揮部」時，路旁掌聲雷動，歡呼雀躍。

這時長安街的交通已由學生管理。人們自覺留出一條通道，讓救護車能以最快的速度通過，這便是從廣場延伸出來的「生命線」。每隔五十米，便有一個糾察隊員站在路中，臂上套著紅袖章，手中輪換揮著紅、黃、綠三色小旗來代替紅綠燈，嘴裏的鐵哨同救護車的笛聲此起彼伏。在一個交通島上站了一位學生，腳下蜷臥睡熟著另一同學——他們是在輪班值勤！

見到長安街上井然的秩序，我們非常感動。王童繼續在廣



〔圖 42〕1989 年 5 月 18 日，封從德為指揮部準備的指揮車成為流動廣播站和宣傳車。

播中說些鼓舞士氣的話，我們便從窗口向值勤的糾察隊員們遞送飲料。在糾察隊指揮下井然有序的街道上，我感到非常自豪。相信任何人投身到如此宏大的場面，都會感到自己是無限與永恆的一部分。

我提議馬拉松絕食

天黑後絕食團在指揮車上開常委會，討論是否復食等問題。【228】這時，絕食團的七名常委是柴玲、李祿、張伯笠、郭海峰、王丹、王文和我。當李祿和柴玲提出指揮部成員與常委都應該復食，至少是內部秘密復食時，靠在車門的王丹幽幽地說：「我覺得這樣對不起絕食的同學，我會沒有資格再對他們說甚麼。」

這時我很為難。首先我沒絕食，至少名義上沒有。其次，復不復食都有道理。柴玲、李祿、張伯笠、郭海峰因為身處漩渦中心，成日應付各種緊急事務，肚裏沒食頭昏眼花是可想而知的，而他們又是最應保持清醒頭腦的人。當時我覺得王丹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他既沒參加廣場實際運作，又在薊門飯店包有房間，並不睡在廣場上，是學生領導中少有的一次也未昏倒過的人。但王丹所言畢竟佔據著中國傳統中的「道義」。指揮部常委若公開宣佈復食，必然引起激烈的爭論，甚至帶來混亂；若秘密復食，洩露之後後果也很難設想。

因此，我提議接力絕食，或稱「馬拉松絕食」：當昏倒人數過半時，便換上另一半同樣人數的新絕食同學；不許兩次絕食，不許出院後繼續絕食。我相信這是既能保護同學身體，又能吸收更多的人參與絕食鬥爭的好辦法，當時只要一廣播，我相信徵集一萬人做後備並不困難。這也是絕食之初我就有的多輪絕食的想法的改進版。但是很可惜，這個方案雖有討論，卻沒通過施行。

王文在那晚的議論中頗有些孩子氣的表現，他特別想當副總指揮。柴玲開玩笑稱他還是一個「小弟弟」，當時我們都笑他，覺得他可愛而固執，都沒想到後來他能做出一些越過底線的事。

《科技日報》

指揮車回到廣場，在昏暗的燈光下，有兩個記者將一大摞《科技日報》從車窗遞進來。我們就地向同學散發，幾百份報紙很快便發光了。那兩個記者頗為自豪，報紙以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自由，正面報導廣場上的絕食請願。這是建國四十年的頭一次。

防備黃衣幫將公車開走

大約晚上十點左右，指揮部得到情報，北京市紅十字會的「黃衣幫」將於深夜一二點左右，到絕食同學的公共汽車上，以檢查身體為由見機行事，把絕食同學強行拉出廣場到各醫院去。

我們立即緊急會商對策。我說此事交給我，我到北大隊伍中拉一隊糾察來處理此事。到了北大營地，正好遇到大學同學張大鵬，他是北大武術冠軍，是廣場上北大糾察隊的隊長，於是我請他立即召集部下執行緊急的秘密任務。他聽了很高興，三分鐘便把隊伍帶到了指揮車下。我命人將指揮車隔開，同三十來個北大糾察隊員討論怎麼不讓汽車開走。將車胎放氣是一種方法，電瓶短路把電跑光是更好的方法。我命大家只是做好準備，黃衣幫一旦動手，我們才行動。

果然，兩個小時後，市紅十字會的人來同指揮部聯繫，要在深夜派會員上車為同學們檢查身體，我們自然是大大方方地同意了。這時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讓我沒能堅持在現場指

揮。

我終於徹底垮了

18 日深夜，我終於徹底垮了。這次比前兩次嚴重許多。

指揮車上無休無止的事務，無休無止爭論，不知何時是盡頭，我開始感到特別煩躁，然後頭暈起來。起初我硬挺著，不讓眼睛閉上，不讓頭耷拉下來，終於熬不下去了，便縮在座位上，想休息一下。這時我全身發冷抖動起來，饑餓擊垮了我的身體。這時我頭腦還清楚，以為自己頂得住，以為睡一覺就會好的，但身體從發抖變成痙攣，終於癱在座位下面。

我這麼突然一癱，將柴玲和李祿嚇了一跳，北大女生蔡金青離我座位不遠，她驚叫起來。於是眾人用廣播呼叫來救護車將我抬出去。忙亂中，我的眼鏡不知滑到甚麼地方去了。我並沒有完全暈過去，被人抬上擔架還很不情願，申辯著不讓人抬走，但我的身體已不聽使喚，劇烈的顫抖，無法支撐著起來，終究還是被呼嘯的救護車拉到一家醫院。

醫院的燈光在夜色中格外明亮，我還記得怎樣被抬下救護車，怎樣換到推車上，推進醫院燈火通明的大門，又怎樣通過一部電梯到某層樓上，然後被推進病房。這過程中，我一直自責自己不夠勇敢，沒有用意志力控制住身體的軟弱。這時我還相信意志能支撐身體，感到自責和慚愧。但一進病房躺到病床上後，我便再無知覺了。

後來柴玲責備我，說當時我已「植物神經紊亂」，說這是醫生的診斷，堅持爭辯說我當時病得不輕，但我還是認為是太累太餓的原因。我相信只要吃點東西，休息一下很快便能恢復過來，而當時我沒用全部的意志力來支撐身體，是因為實在不願意在指揮車上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我只是希望找個機會離開，卻沒有想到意志一鬆懈便成這個樣子，而自己既無法辯解又無法控制了。

5月19日 星期四 多雲 晝26℃ 夜12℃

北大第一醫院

從昏睡中醒來，已是中午。躺在病床上真舒服。我已經好多天沒在床上睡覺了。

這是一間急救病房，只有兩個床位，另一個病人已經走了，只剩我一人。床邊支架上掛著一瓶點滴，垂下一根乳黃色的橡皮管，針頭插進我左胳膊的血管中。記得昨晚「搶救」我時，醫生見我抽搐得很厲害，大約用了高濃度的鹽水，順著我的血管流向全身時，所到之處都伴著一陣火辣辣燒灼的疼痛，讓我幾乎叫起來，呲牙咧嘴，醫生換了兩次液體，才將濃度減到我能忍受的程度。

床邊打瞌睡同學這時也醒了。他叫劉瑩，北大化學系八六級的，是昨晚專門來陪我的。我既感動又覺得沒有必要。這時進來了一個年輕的護士，於是我們有了一次暖融融的談話，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陌生人中間也能感到就像回家的溫暖。我堅持自己身體已經恢復，需要立即回到廣場，但她都在一種略帶不經意的安慰言詞中，輕輕地將我的要求擋了回去，微笑中似乎在說：你這樣的病號我見多了。

護士告訴我這裏是「北大一院」，我聽成「北大醫院」，嚇了一跳，以為回了北大，怎麼跑這麼老遠，莫非城裏的醫院已經裝滿了絕食同學？她見我驚訝的樣子，微笑著解釋，幾十年前北大在沙灘附近，這家醫院確實是北大的附屬醫院，離廣場並不遠。

劉瑩向人介紹我時，總稱我副總指揮，護士自然將我視作英雄。當時所有絕食同學都有一層光環，可以想像醫護人員是怎麼看待昏倒的同學。護士同我講，醫生很擔心我病情，又笑我固執。在我表現順服時，她以為我是羞愧了，又拿平和的語

氣來安慰我。這時我便好奇地問起昨夜讓我發痛的點滴液體是甚麼樣的成分，才知道醫院用了一種最好的進口藥，名稱我記不得了。

熟悉一點，便聊開了。她家住清華，父母是老師。每天清早起來上班，騎車要一個鐘頭。她說，這些天從來沒這麼大的勁頭，院裏的大夫、護士都是這樣，加班加點地護理絕食同學，不再有人報怨甚麼。藥房將各種最好的藥都拿了出來，但是，市裏卻來了通知，這些藥都得記清帳，以後很可能是要醫生護士出錢的！我想起廣場上的大量捐款，我以為這些錢是應該付相當部分給醫院。

拜託護士藏好文件

有同學送來一封柴玲的短信，希望我好好休息，不要急著回廣場。幾個醫生進了病房，給我再次作身體檢查。血壓已接近正常，並無甚麼危險的症狀，於是我又提出要回廣場，他們並沒堅決地阻攔，卻堅持要我再輸二瓶液再走。我高興地順從了，請那護士滴液的速度加到我正好能忍受的程度，又睡過去。能有一張乾淨舒軟的床，真是幸福。

下午五點我再次醒來，點滴已快完了。劉瑩幫助我收拾東西準備回廣場。我西服口袋裏裝滿了各式廣播稿、宣傳單、名單和一些會議記錄，亂糟糟的一團，我用塑膠袋裝起來交給護士，請她代為保存。這時我已完全信任她。我又想起在海淀家中書桌上放著我四二七那天寫的文章，也請她回家時到那裏將它取走。我覺得前途未卜，凶多吉少，難有機會回家。拜託她收藏這些文件時，護士眼睛發亮，表情嚴肅，似乎在接受一項莊嚴的任務。後來她真的去了我家。

理想的旋風，在廣場上颳起而加劇。它的能量使每一個到過廣場的人暈眩，又向全國四面八方輻射。

在醫院裏勸同學復食

離開北大一院前，我洗了個澡，身上多日的污垢一掃而光。護士端來一碗粥加兩隻雞蛋，非讓我吃了再走。醫院的主任大夫和院長也來了，他們得知我是副總指揮，便希望我去勸隔壁的那些不肯進食的同學。

他們帶我到隔壁一間重病房，有個同學滿身的輸液管，似乎是被護士綁在病床上的，嘴裏嚷著「絕不復食！」掙扎著要起身回廣場。我們進屋後，他用戒備的目光看著我們，仿佛遭綁架要灌他毒藥似的。他顯然是外地同學。院長介紹我的身份時，我將學生證和足以證明我是副總指揮的證件給他看，安慰他，使他明白進了醫院聽從醫生的治療不算違反絕食團的紀律，而且出了院不能再絕食，「這是指揮部的決定，否則如此下去對同學們身體有危險。誰這樣耗下去，誰就是不顧其他絕食同學的死活！而願意輪替絕食的人多的是。」在勉強與疑惑中，他終於接過了護士遞給他的那碗粥。

院長鬆了一口氣。克服了最頭痛的堡壘，其他同學就好辦了。

新聞聯播李鵬與學生會談

這時已傍晚七點。我聽說李鵬與絕食同學的會談已在電視裏放了，便與劉瑩到隔壁看《新聞聯播》。這是一間20平米的大房間，原來可能不是病房，因為有許多病情稍輕的同學都躺在地板上，下面只墊了一床棉墊。大家都在專心地看電視。

我們來晚了，只看到李鵬昨天與絕食同學會談很短的一節，[229]聽到李鵬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學生是在搞動亂。」我還以為李鵬已經軟下來，是準備向同學們妥協的信號。當時我還不知道趙紫陽清晨到廣場落淚的事。[230]〔圖 43〕

看完李鵬與學生昨天會談的新聞，我同劉瑩告別了醫生護



〔圖43〕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在溫家寶陪同下進絕食車看望絕食學生，流著淚說「我們來晚了……我老了，無所謂。」

士，下樓在大廳裏等了半個小時，才等到一輛開往廣場的救護車。司機的神色非常不好，旁邊的醫生一個勁地誇他，他已經三天三夜沒怎麼闔眼了，而又無法找到替代的司機。司機說：「再要我這麼著開下去，非出車禍不可！咱了不打緊，人家父母辛辛苦苦拉扯出個大學生，不容易。」

大部分同學堅持絕食

急救車到歷史博物館前停下，我們下了車，謝別醫生和司機，向紀念碑方向走去。我沒急著去廣播站與指揮車，更情願在廣場同學中泡一陣——好不容易有段清閑的時間，正好瞭解一下同學們的心態。

與十幾個清華、人大和北師大同學交談的結果，大部分同學要堅持絕食與留守廣場。大家甚至有一種樂觀氣氛，認為勝利在望了。連日來上百萬人的聲援遊行，包括中共機關、各報社，甚至士兵、警察、法官都到來聲援絕食，大家相信黨心民

心都在學生一邊，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政府不會讓步，而且有些同學說李鵬與學生會談就是一個信號——第一次真正與學生代表會談，而且全國電視上都看見了。

半小時前宣佈了復食

但當我回到指揮部時，一盆涼水從指揮內部潑來：絕食團指揮部剛剛宣佈了「復食」！[231]

當時大約晚上十點，我穿過幾層糾察線，上到停在廣場北部的指揮車時。我見柴玲、張伯笠、李祿和幾個秘書、廣播員在指揮車裏，氣氛十分惶然。我質問他們為何宣佈復食，語氣很不客氣。李祿上前來，壓抑著情緒同我解釋，這並不是指揮部幾個人的決定，他們如何召集各校的絕食代表，如何多的多數贊同復食。[232]

我好像不認識眼前這個李祿了，絕不相信多數絕食同學願意在堅持了七天絕食、沒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時候，會投復食的票。我要求他拿選票給我看，李祿又解釋說這是幾十個代表作的口頭表決，沒有選票作記錄，這更讓我覺得有問題。[233]按絕食團的民主程序，重大決策都應該徵求每一個在廣場的絕食成員意見，且都應有書面記錄，通過各校代表回本校去逐一詢問後，統計匯總上來，且以往開會的代表，動輒三百。而這樣的程序，以前正是李祿所積極推行和堅持的。

我覺得指揮部的行動全亂套了，真恨自己留在醫院裏的時間太長，晚來了一步。如果我在，我相信能阻攔這樣的非程序行為。

李祿得到密報

在我的追問下，李祿終於講了這樣決策的背景：他得到絕對可靠人物的密報，李鵬很快就會宣佈「軍管」，[234]很可能明天早晨清場。因此李祿構想：學生絕食是「軍管」的根據，

若我們宣佈停止絕食而李鵬依然宣佈「軍管」，則能將李鵬政府毫無道理和人性的一面昭然揭露於世人面前。這一點當時我聽了覺得有點甚麼不對勁，卻又一時不知如何說。李祿又說，由於這樣的情報與策略是秘密的，不能讓李鵬政府知道，因此他才召集了這個秘密的緊急會議，在一輛客車上，同幾十個學校的代表共同作出了這樣的決議。

正當李祿同我解釋的時候，「砰」的一聲，指揮車外的絕食同學為發泄不滿，用石頭將車窗砸壞了一塊，接著傳來他們憤怒的聲音。他們既不滿意宣佈的復食決議，更不滿意這決議並沒徵詢他們的意見便作出了。這股強悍的憤怒，讓人感到指揮部似乎已出賣了三千絕食者七天的艱難奮鬥。

這正是我所擔憂的：指揮部這樣非程序的行為，將失去它的民意基礎。

我與李祿的分歧

對李祿的這套作法，我不能贊同，我們的分歧主要有四。首先，要不要堅持民主程序。我更相信「重大決策須由全體直接投票」，只有三千多人的絕食團，在是否復食、是否撤離廣場這樣根本性的決策上更得如此。即每個成員都直接參與的重大決策，指揮部便是穩定而有權威的，一般成員也清楚要做甚麼。「參與感與公開性」是我當時所追求的；而李祿相對於我這種直接民主而言，便較有集權的趨向。

其次，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相對而言，在我更堅持民主是目的，而李祿則將民主視作手段。既然是手段，便可根據實際效力將這手段施用或收回——這正是沈老師那次演講中所批評共產黨之處，而我很傾向沈的思想。

第三，是否介入政治運作。我認為學運不應該、也不能夠追求短期的政治功效。學運只是將社會矛盾表面化，而這矛盾的結果要看雙方的實力對比。具體來說，中國的民主化是否能

在這次運動中爭取到，完全看民主力量與保守力量間的較量，而這較量本身不是學生應做或能做的事，我們只做自己的能做而應做的事。這便是堅持這次學運是「新啟蒙運動」和「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的認識根源。但是，李祿的認識與行動，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這個範圍，他要以學生運動作為一股力量，參與到中國社會的政治運作中。

第四，此前的曲折。「五四」周勇軍擅自宣佈復課，這也是影響我很深的一個經歷。當時全國學運正在蓬勃興起，而北京卻偃旗息鼓了，這對全國都是一個打擊。當局正好利用，馬上將消息播向全國，使我們無力回天。而這樣非正常形成的低潮並不會將學運降溫帶入校園民主的構想，反而強力反彈，導致非程序的絕食，從而形成學運的失控局面，個人大於組織，組織出現分裂，加上極度擴大的場面，再要組織好就難了。我不願意這樣的惡夢再次發生，而李祿則對這些曲折體會不深。【235】

這些就是我當時的認識基礎，而在指揮車上並沒有時間多想。當時只是感到形勢緊迫，車外有憤怒的同學，也有政府的便衣，他們隨時可以將這樣的消息向政府通報，然後廣播、電視一齊宣佈：「學生復食了！」我能想像各地跟進同學的沮喪。

重新投票大多堅持絕食

我決心立即扭轉這樣的局面。我不能看著絕食同學唾棄指揮部，不能看著民主程序遭破壞，於是對李祿和柴玲吼道：我剛做過調查，多數同學是堅持絕食的，我要重新組織投票。我抓過指揮車上的話筒，宣佈了同樣的意思。車外同學一片歡呼。

李祿雖然阻攔我，卻並不使勁。他似乎很有把握，說「你可以重新召集代表來作決議」。但柴玲顯得卻怒不可遏，撲來

搶我的話筒。她說，不能容忍我脫離指揮部的多數而擅自行動，而我卻是鐵了心要維持絕食團的民主程序。柴玲認為我瘋了，說我身體不正常；而我則認定她的輕信使她幻想著李祿所設計的「悲壯場面」。

我迅速在車上宣佈重新投票的辦法，召集各校代表到指揮車來後，找了一隻電動話筒便下了指揮車。車下很快便聚集了黑壓壓一大片代表。為了確保代表的合法身份，我設置了兩道糾察線。外圈將絕食車整個包圍，並在北面圈出一大空場，第二道糾察線便在空場中心圈出開會的場地。代表們持學生證進了外圈，等來得差不多了，我才將裏圈的糾察線開一入口，指定幾個北大同學守門，嚴格檢查代表資格。

代表進完後，我讓大家坐在空地上，要發言辯論的同學舉手起立，講完便坐下，這樣保證了會場的秩序，這在情緒激動的同學中是很重要的。復食和絕食兩方面的論證都有，我宣佈開始表決。首先統計參加投票的學校，以保證代表不重複投票。我讓大家將自己的校名寫在一張紙上，然後交上來逐個核對，這樣排除了好些重複的代表。統計結果，記得有八十來個學校，北京大約三十多，外地五十左右。然後進行初步的估計投票，即各校將絕食總人數和堅持絕食的百分數的估計數分別報上來。在代表們作估計時，我提醒他們將會逐校公佈代表的估計以作核查。如果某校絕食同學認為代表的估計與實際相左(如多數願意復食說成多數堅持絕食)，可以馬上投訴，指揮部到該校查實後將取消該代表的資格，由投訴人取代。因形勢緊迫，我採取這種估計投票的方式，以爭取時間。我相信代表們會作一個客觀公正的判斷。

投票的結果，80%多的學校代表估計他們學校的90%至95%的同學會堅持絕食。北京的高校相對保守一些，記得清華代表甚至認為多數同學是要復食了。用各校人數乘以估計百分比，得出80%以上的絕食同學堅持絕食，與李祿主持的投票結果正好相反！

有了這樣的結果，我卻上不了指揮車去廣播新的投票結果，於是就到絕食團廣播站去。[236] 絕食團廣播站是我組建的，這時廣播站站長是王童，主編是白夢與何貴芳，他們非常信任和支持我。當我宣佈新的投票結果——多數堅持繼續絕食時，廣場上一片歡騰。我又作了各校代表情況的詳細匯報，報出代表姓名、所報本校在廣場絕食總數、估計支持繼續絕食的百分比，請在場的同學查證。沒有學校來投訴或更正。據此，我相信手中的一張張投票具有合法效力，足以證明多數同學願意堅持絕食，至少比李祿所主持的代表會的投票更具權威。

學生組織對局勢的影響力

這兩次投票的區別，顯示學運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完全一盤散沙只顧往前衝，學運組織也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對運動完全沒有控制力。李祿利用「秘密情報」和指揮部的統一意志來影響投票結果，這說明如果學生領導層能夠統一意見達成共識，還是有足夠的影響力來中止絕食甚至撤出廣場。雖然同學們已絕食到第七天，但絕食團指揮部還是能夠宣佈停止絕食。而我採用的是更直接更基層的民主，在戰略上相對容易盲目，卻更能統一眾人的意志，誰是誰非，留待歷史評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缺乏代表性與合法性的組織便缺乏權威。絕食同學幾乎每天都有一次參與重大決策的投票機會，因此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威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之上的，而這原則正是同學們的基本理念。

李鵬楊尚昆宣佈戒嚴

在絕食團廣播站第二次播出投票結果之後，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政府在廣場上的廣播系統便開始播出了李鵬與楊尚昆在「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這時是十二點十五分。政府的廣播系統遍佈廣場，包括幾百盞華燈柱上的豎式音箱。我們暫停了廣播站播音，好聽清講話內容。李鵬高喊「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而幾個小時前我在電視中還聽他說「從來沒有說過學生是在搞動亂」！楊尚昆則用四川口音抑揚頓挫地說「軍隊進城，絕對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話外有音，使我想起一個月前鄧小平指示調到北京的38軍帶上棉衣。他們在做「對付學生」以外的準備。【237】

李鵬與楊尚昆的講話在廣場上不斷重複播放，試圖威懾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則一遍遍播放《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廣場上的同學們也跟著齊聲高唱，以鼓舞士氣，壓倒政府的廣播。

又過了半小時，傳來指揮部宣佈「廣場上20萬人大絕食！」【238】我聽到了很不以為然：這又是何苦？！剛宣佈復食又宣佈大絕食，想製造悲壯氣氛嗎？難道幾千人七天的絕食還不夠悲壯嗎？二十萬人又怎麼絕食呢？我對這種「戲劇性」的舉動很不以為然，這會給人以輕浮的印象：學生是不是在鬧著玩？這時，學運之聲播出北高聯的呼叫，要王丹、柴玲和我等人趕快去那裏參加高聯緊急擴大會議，我沒去。半小時後，學運之聲廣播站也宣佈「20萬人大絕食！」

這是一個不平靜的夜晚。「部隊將在凌晨兩點開始清場」的謠傳如旋風颷在廣場上，每個人都在等待著這個時候的到來，既緊張又興奮，真正是眾志成城。但是兩點、三點……甚麼也沒發生。我摸到一處不顯眼的塑膠棚下，很快就睡了。

5月20日　星期六　晝25℃　夜15℃

在北大聽李鵬《戒嚴令》

這天早晨去了一趟北大，大約是請求北大籌委會增調特別

糾察隊。回到北大籌委會，一切都很親切，大家親熱地同我打招呼。楊濤「五四」後去了趟西安發動全國學運，這時早已回來了，他繼續作北大籌委會的主席；蔡健、常勁、王有才、謝劍等人主持著日常工作。一切都是那麼熟悉。大家還讓我到廣播站介紹廣場的情況，我就說廣場氣氛十分緊張，希望北大同學多些增援。

早晨九點，從北大籌委會廣播站中聽到李鵬頒布的《戒嚴令》：「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所謂「部分地區」，按市長陳希同在緊接著的政府一號令中的指定，包括東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朝陽、石景山和豐臺區，實際上就是除幾個郊區縣以外的整個北京市區和近郊。陳希同一連發下三條號令：一號令針對市民與學生，禁止遊行、罷課、罷工、串聯、演講、發傳單等等。二號令針對外國人，不許介入違反戒嚴令的任何活動；三號令針對記者，不許進入任何機構進行採訪。

聽完戒嚴令，我中止了原定計劃，決定立即趕回廣場，因為這時離開始戒嚴的十點不遠了。正好籌委會的應華江要帶錢去廣場，有輛汽車馬上就要走。

戒嚴時刻的北京街頭

應華江這些天穿梭於廣場與北大之間，負責設在廣場邊的「北大物資站」與校方和各界聯絡。那輛汽車正是每日穿梭的小貨車，應華江安排我先上車後，又緊忙跑回29樓，同另一個女同學，抱著一個破舊的大口袋，匆忙上了車。那隻口袋裏，裝有五萬元人民幣。

小貨車急速行駛在北京大街上，這時十點正，卻連一個軍人的影子也沒有，與我想像的大軍壓境全不一樣。只是站在街上的觀望議論的人少了，糧站、銀行等處排隊的人多了。北京城瀰漫了一層人心惶惶的空氣。

車內還有一個穿白衣的醫務人員，大概是北大校醫。他很有經驗，當車開到人多路堵的地方，便將一支畫了紅十字的小白旗，伸出窗外搖晃著，路上的人即刻閃出一條通道，讓「救護車」先過。有時兩旁的人還夾道歡迎，鼓起掌來。

車開進政法大學的家屬大院，司機要等一個朋友，於是我們都下車透透空氣。一些老人在邊上議論著甚麼，仔細一聽，才明白糧站、銀行前排隊的人，是要搶購糧食，提出存款——「馬上又要兵荒馬亂了……！」

十幾分鐘，車又發動起來，一路順風到廣場。離廣場越近，增援的旗幟越多，越沒有戒嚴的樣子。浩浩蕩蕩一隊摩托將整個長安街塞了好幾分鐘，足有五百輛摩托，風馳電掣地在街上飛奔。這就是著名的「飛虎隊」，成員多是個體戶和待業青年。〔圖 44〕



〔圖 44〕1989 年 5 月 20 日，戒嚴後，幾百輛摩托組成的「飛虎隊」風馳電掣地在長安街上飛奔，為民主運動傳遞信息。

耿力是李祿的中學同學

我趕回指揮部，李祿沮喪地告訴我，指揮車被郭海峰他們開跑了，到現在還沒回來。這意味著指揮部將無法指揮，而絕食團廣播站也被學運之聲的強大功率壓住，為了不造成兩種聲音的干擾，幾乎處於停播狀態。李祿告訴我這樣的情況時，像是怕我責怪他似的，大概是因為昨天他想將指揮車開到離廣場很遠的各處糾察隊去「鼓舞士氣」被我阻止過。現在，戒嚴和復食都已成事實，昨晚的衝突早已過去，我們之間信任依舊。【239】

由於18日夜裏被抬到醫院時，我的眼鏡不知去向，我得去前門配眼鏡。陪我去的同學叫耿力，天津來的，說要來擔任我的保安工作，實際上我更將他當秘書用。這時因為形勢緊張，學運組織中已有保衛制度。有人大概圖簡便，將負責保安的同學稱為保鏢，我很不習慣這樣的稱呼。

耿力的年齡比我小一點，身材卻粗壯結實，一米八的個頭，典型的北方人。使我驚喜的是，他竟是李祿的中學同學。他家也在唐山，中學與李祿同班。當我問起李祿的情況時，他似乎與李祿並不十分熟悉，只記得李祿成績不錯，野心不小。這使我更相信李祿不是許多人懷疑的那樣來路不明了。此前柴玲曾告訴我，大約是16號晚上，陳明遠和幾個同學盤問李祿，要他出示學生證，令李祿十分厭煩，用了一句極其惡意的話，將陳明遠連氣帶嚇轟走了。當時柴玲竭力為李祿辯護，因為她最早認識李祿，對李祿的言行和才幹都十分信任。對李祿的審查，不光出於「防止便衣混入」的謹慎，而且帶有廣場權力鬥爭的因素——對他審查最起勁的是馬少方和王文，他們似乎不甘心於失去「絕食發起人」所應有的地位。這正是柴玲感到悲哀之處。現在好了，我有了進一步的人證，說明李祿的身份。



〔圖 45〕1989 年 5 月 20 日，直升飛機在廣場上空盤旋，撒下宣佈戒嚴的傳單。

北高聯取代了指揮部

戒嚴的首日，廣場上的空氣緊張到了極點。下午直升飛機在廣場上空盤旋，好像在提醒人們空降部隊隨時可以落到廣場。當它撒下滿天飛舞的傳單時，人群從緊張變成好奇，追搶傳單先睹為快。傳單上沒甚麼新鮮內容，大號鉛字印的只是李鵬楊尚昆昨夜的講話。【240】〔圖 45〕

北高聯這時成為廣場上的主要領導力量，【241】而絕食團指揮部隨著絕食結束已經完成使命。學運之聲廣播站的聲音覆蓋整個廣場，絕食團廣播站基本上沒甚麼動靜，避免雙重聲音。各式各樣的「十萬火急」在廣播中散佈出緊張的空氣。下午，廣場周圍的自來水被政府切斷。地鐵停駛。東長安街上發現一隊油罐車，全是部隊車牌號碼，有人説裏面裝的是毒瓦斯！廣場上開始散發消毒水、濕布、漂白粉，以防軍警的瓦斯。廣播站裏，兩個空軍士官宣佈與學生站到一邊，並介紹怎樣用風箏

與氫氣球來防止空襲。幾十萬市民聚集在廣場上，幾十萬市民到各路口設路障堵軍車。

夜間，柴玲懷著類似四二六那天淒然的心情告訴我：「暗殺團已經摸進了廣場了」，我只當她是輕信了謠傳，平靜地告訴廣播站與指揮部的其他同學「以靜制動」，便睡覺去了。我不願這類傳言使我們心神不定，亂了自己的陣腳。

5月21日 星期日 晴 晝27℃ 夜17℃

第二次「狼來了！」

廣場成了謠傳集散地。各種未經證實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又向四面八方輻射。有稱鄧穎超說「誰鎮壓學生，我就公開退黨！」有稱中共剩下的兩個元帥，聶榮臻和徐向前，不贊同軍隊進城，說：「誰下令向學生開槍，老子就斃了他！」【242】有人甚至拿了一份有中共七上將姓名的「致中央軍委公開信」到指揮部來。還有傳言說「首鋼22萬工人開始罷工」……若按這些傳言，戒嚴部隊應在清晨5點集合，7點清理廣場。但當太陽升起我從喧鬧中醒來時，發現除了更多的流言以外，甚麼事情也沒發生。

這是第二次喊「狼來了！」上百萬的市民連續兩個夜晚等著狼來卻毫無收獲。這是不是政府的計策，先讓人到廣場上來散佈謠言，將學生和市民拖垮，再出其不意，突然下手？無論如何，這對政府是有利的，他們只須以逸待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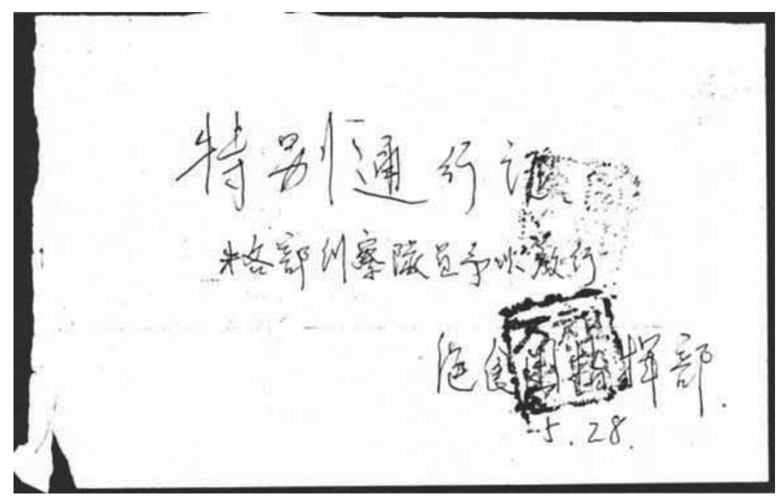
學生組織受這股謠傳旋風的衝擊最烈，北高聯、指揮部與廣播站成了謠傳中心的中心。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我們不得不採取一些基本的防禦措施。於是發口罩、組織糾察隊去發動組織市民攔軍車……一切都在緊張中奔忙。然而，在指揮部內，我依然希望大家以靜制動。

難以通行的通行證

北高聯同指揮部的摩擦在繼續加深。近幾日，廣場上的秩序日趨混亂，令人擔憂。各式各樣的糾察隊層出不窮，許多地方，特別是紀念碑和學運之聲廣播站附近，指揮部的人都沒法通過，因為糾察隊受北高聯之命，只認他們簽發的「通行證」。

所謂通行證，只是在一張紙上寫「通行證」幾個字，再蓋上高聯的「祖國萬歲」圖章，註上日期即告完事。有的寫上「特別通行證」，高聯常委簽上字，就有更高的效力，可以出入北高聯下屬各部。絕食團指揮部也發行過通行證。〔圖 46〕

發通行證大約始於16日，起初二個組織的通行證可通用，後來兩邊摩擦越來越大，相互限制通行的情況便越來越多。由於北高聯勢力越來越大，我們那些天的行動越來越受限制。大約從18日開始，每天頒發新的通行證，這不光是為了防止偽造通行證，防便衣混入，實際上也有爭取勢力範圍的意味。


特别通行证

各部纠察队员予以放行

绝食团指挥部

5.28

〔圖 46〕1989 年 5 月 21 日，指揮部簽發的通行證，上有高聯的「祖國萬歲」圖章。

兩個「財務部」

高聯在廣場上的勢力擴張，得力於它名正言順。起初，各種捐款和信息都向絕食團廣播站匯聚，自從學運之聲將絕食團廣播站壓下，北高聯在紀念碑二、三層設立機構，將斗大的「財政部」幾個字貼在紀念碑三層西側之後，這些捐款和信息的重心便向高聯轉移。許多市民和同學來到指揮部，說是要向北高聯提建議，完全將指揮部視為北高聯的下屬執行機構。本來這樣理解是合情合理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實際運作中卻全不是這麼回事。

由於高聯掌握了絕大部份捐款，對他們財務上的投訴也越來越多，許多便是在上述的誤會中告到我們指揮部的。多數投訴是講糾察隊亂花錢的情況，本來這些錢是給糾察隊員買飲料和食品用的，但許多情形下換成了高級香煙，甚至皮鞋之類。也有指稱北高聯內部人員私吞捐款。最大的問題是財務上沒有統一入口和出口，個別市民或學生到街上募捐卻不上交。

絕食團指揮部也有一個「財務部」，但我所知甚少，那些日子主要忙於廣播站的工作，只記得部長等幾個管財務的是北大同學，他們說北高聯的財務制度不健全，寧願交給北大更保險，有一次將很大一筆捐款轉移到北大籌委會。【243】這兩天，絕食團似乎已瀕臨財政枯竭。應華江抱到廣場的那一大包錢，應該不是給絕食團的，而是給北大物資站的。

一次「未遂政變」

與北高聯的衝突需要有個了結。這天中午，當我和李祿討論起北高聯時，我們都認為這個組織不能繼續在廣場上領導下去了。高聯組織上的散漫狀態將為學生運動帶來無窮的後患。當時我對李祿說，讓我來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我太相信絕食團的純潔與正確，又太相信北高聯的無能，非常厭惡它名不符實、政出多頭的虛浮作風，但因它佔住了名份，便將實幹的絕

食團壓制住。

我來到北大營地，希望拉起一隊糾察，佔領學運之聲和紀念碑，指揮權便可以統一。但北大糾察已出去堵軍車了。這時碰巧遇到北師大的楊朝暉。他也是六個絕食發起人之一，在廣場上也有相當聲望，熱衷於組織糾察隊，當時他手下正好有上百名糾察隊員集結待命。於是，我向他解說高聯這樣下去廣場上會群龍無首，說明佔領學運之聲和紀念碑的意圖，楊朝暉二話沒說，返身就去召集手下的糾察隊。我在絕食團廣播站被甚麼事耽誤了一會兒，等我再趕到紀念碑南面時，卻發現甚麼動靜也沒有。有同學告訴說，有一隊糾察隊紮著紅絲帶，已經向廣場東南走了。我趕去，正好見到楊朝暉在一片空場上操練他的人馬。我問他為甚麼沒有按預定方案佔領紀念碑，他只是支吾，說情況太複雜，他不好下手。

後來李祿告訴我，當時他在紀念碑附近，看見楊朝暉喊著「一、二、一」，糾察隊員一齊衝上紀念碑臺階，臨到與上面的糾察隊對峙時，又喊「一、二、一」，一齊退下來。從此，李祿便稱楊朝暉為「軟皮蛋」。組織這次「政變」，我費了不少精力，看到楊朝暉也下不了手，覺得這樣搞難於得到支持，也就罷休了。【244】

火車送來的糾察隊

我很有興味地觀看楊朝暉如何操練他的隊伍，想瞭解這些糾察隊到底是怎麼組織起來的。我發現他們其實是外地學生，大約剛下火車便被徵為糾察隊員了。

楊朝暉對糾察隊員們講完話之後，便要他們去北京火車站去阻攔從那裏來的軍隊。從前門東大街一路小跑，楊朝暉喊著號子，隊伍「唰唰」的腳步聲非常地整齊。我也隨著隊伍，順路還買了包子分給大家。到了北京站，我見楊朝暉對那些剛下了火車甚麼也不知道的同學說：「我是糾察隊長，你們都跟我

來，廣場需要你們！」他的糾察隊原來就這樣很快地壯大了。

我見楊朝暉依然沉醉在操練隊伍上，便一個人進到站臺。這時我發現一輛火車上全是解放軍，約有一千五百士兵。士兵們都穿著白襯衣，因為天熱，有的下到鐵路中，將地上自來水管的水澆到脖子上解暑。月臺上有些學生和市民，並不多，有的到車窗下給士兵遞水，一面向他們宣傳著甚麼。沒有一絲緊張的跡象。我更相信軍隊在這裏只是起威懾作用。

王文用我的學生證取錢

下午，李祿開始同指揮部的人商量鎮壓後的對策。無論如何，我同意作一些必要的準備。李祿說，絕食團目前財政基本枯竭，剩下只有七千人民幣。他罵起一個幾天前管一筆錢的同學，名字記不清了，大約是絕食團開始錢多時，柴玲讓他保存了一筆，現在卻沒影了。那筆錢至少上萬。我答應去籌措一筆錢來備用，我相信我還能在高聯借到錢。糟糕的是，正好這之前王文找過我借學生證，很著急地對我說他如何如何需要到北高聯財政部去申請三千元錢，但沒有學生證作為抵押。在他迫切懇求下，我將學生證借給了他，卻從此再也要不回來，後來因為沒有學生證，還給我帶來許多麻煩。

我去北高聯借錢，管出納的同學將一小盒零錢給我，也不仔細數一下，說算是兩千吧，簽個字就爽快地給了我。北高聯這時也正在準備轉移財物，想借更多是沒希望了，但後來仔細一數，實際上只有1092元零幾毛幾分，其中不少是一分二分的紙幣！

李祿堅持轉入地下

傍晚七點，指揮部成員聚到一座小帳篷中，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李祿帶著沉重的表情稱他得到「絕對可靠的情報」：今

夜凌晨一點，部隊必來清場，鎮壓在所難免。讓大家相信鎮壓必行無疑後，李祿說，在這樣的局勢下，我們應該做的就是避免無謂的犧牲。指揮部的骨幹分子肯定首當其衝要被搜捕，因此，他說，我們必須保存民主運動的火種，鎮壓一來，指揮部的人馬全部轉入地下活動，而從現在起，指揮就應分散化裝，混到學生堆中去，以防便衣跟蹤，「能多跑一個，就多一份力量」。[245] 李祿講完，大家一陣沉默。指揮部成員在鎮壓面前首先轉入地下，這太不符合身先士卒的道義了。但是出於策略考慮，大家還是默認了他的觀點。

我覺得非常衝突，一方面覺得對不起廣場同學，另一方面，李祿說的也有道理。[246] 由於復食，絕食團已不復存在，指揮部實際上也已結束使命，不起領導作用，[247] 與其白白作無謂犧牲，不如好好安排下一步行動，作長期地下鬥爭的準備。這時，《絕食書》中「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的觀念佔了上風。其實，繼續地下活動需要的克服的艱險和恐懼可能更大，而經過了八七年那次短暫拘捕和這次運動初期的恐懼，這時我已經不怎麼害怕了。

見大家認可李祿的意見，我不再說甚麼，開始籌劃如何組織下一步的地下活動。首先是分散後如何聯絡。郭海峰和我設計了一套密碼解釋給大家聽，讓大家記住每個人的代號，然後商定了一些聯絡辦法。按李祿的設想，鎮壓第一天，我們分散到北京近郊，視情形再作下一步打算。我們分散後就按這套密碼聯絡。其次是應急經費。我們將還能掌握的現金匯聚起來，每個常委分到一千元。一來不讓中共一網打盡，把錢白白交出；二來在地下活動中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李祿將這筆錢叫做保命費或逃亡費，後來惹出許多不必要的聯想與麻煩，真是始料未及。

李祿廣場上的婚禮

傍晚，柴玲為李祿安排了一次「廣場上的婚禮」。〔圖 47〕



〔圖 47〕1989 年 5 月 21 日，指揮部批準李祿與趙敏結婚，並在廣場上舉行隆重的婚禮。

此前，柴玲已同我商量，要將李祿的婚禮與我們的結婚週年紀念一起辦。我們是1988年5月20日登記、22日辦喜宴的，正好一週年。這時，李祿的女友又正好從南京大學趕來，真是因緣和合。柴玲笑著説，沒想到李祿還有這麼漂亮的女朋友；現在，形勢變得這麼嚴峻，我們現在就辦喜事。柴玲擅長安排富於人情又與眾不同的場面。

「刑場上的婚禮」是中共教科書中的一篇課文，一對共產黨戀人被國民黨押到刑場上處決時，當場宣佈他們的婚禮。目前大軍壓境，極具悲壯情調的「廣場上的婚禮」真是再合適不過了。這也有助於調劑廣場上的緊張空氣，讓全世界都能看到，我們追求的是美好的生命。這詩一般美麗而激昂的場面，正如柴玲和著希望與眼淚的《絕食書》，是用青春的生命寫成的傑作。

柴玲領著新郎新娘，到紀念碑周圍轉了一圈，受到同學們狂歡節般的歡迎。繞回絕食團廣播站時，李祿非得拉上我，要柴玲與我作伴郎伴娘。張伯笠突發奇想，在一張牛皮紙上用毛筆寫成一張「結婚證」，上書「絕食團指揮部批準結婚」，又

將指揮部的大紅印章蓋在上面，宣佈二人婚姻正式生效。

到了廣場北部，在幾十輛大客車前，我們正式為李祿與趙敏舉行了結婚儀式。大家圍成一個大圈，由一些穿白大褂的醫學院師生維持著裏圈，席地而坐。我與柴玲起先還老老實實地攙著新娘新郎，漸漸地，張伯笠在興奮之中取代了我們，於是，我們也找了一塊空地坐下。

李祿今天的打扮實在不怎麼樣，光著膀子，只穿了件背心。這大概是結婚場面中的另一項世界記錄了。應柴玲要求，我將黑西裝脫下，李祿穿穿還算合身，卻更顯得不對勁，不久就又還給我。張伯笠在李祿、趙敏背後高舉起「結婚證」，讓記者們劈哩啪啦地拍照。他又高聲地唸了一遍，算是正式公證他們的婚姻：

「李祿，男，23歲，與趙敏，女，25歲，自願結為夫妻，白頭偕老。絕食團指揮部批準結婚。特此證明。1989年5月21日。」

結婚場面豐富多彩，完全出乎我們的想像。我們還沒有走到大客車前，便有人送來了鮮花花藍。郭海峰抱來了一隻大西瓜，這才五月份，怎麼就有西瓜。這時又有人送來兩大瓶香檳。我真不知道這麼多稀奇的東西都是怎麼來的。學運期間，似乎一切都成為了可能，一切都在眾人的熱情下低頭讓路。

更多人獻出的是他們的熱情。眾人齊聲喊到：「新郎講話！」於是李祿說了一段非常符合他的性格與當時心情的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我的口號是：既要戰鬥，又要結婚！」眾人一陣鼓掌，接著又喊：「新娘唱歌！」於是趙敏大方地唱了一段民歌，嗓音非常好聽。李祿開始與她合唱，後來大家都跟著齊唱，優美的歌聲將大家帶到對未來生活的美麗嚮往之中，廣場上緊張的空氣一掃而空。

指揮部成員分散躲藏

指揮部成員最後分散是在天黑之後。郭海峰抱著那隻大西

瓜，闖進柴玲為李祿和趙敏騰出的一個帳篷——他們的新房，搞得李祿哭笑不得。於是指揮部的人馬乾脆就在這間帳篷作最後的分別。指揮部當時在場的常委記得有柴玲、李祿、郭海峰、張伯笠和我。王文拿走我的學生證借了高聯的錢後就不見蹤影；王丹基本上本來就不在廣場；王超華也很少參與指揮部的活動。大家記住密碼和聯絡方式，各帶一千人民幣，便互相告別。

要開始新一階段的行動了，我有點興奮。既然是要組織地下活動，便得改頭換面，使便衣認不出來。我的辦法很簡單，只須將身上的黑西裝一脫，眼睛一摘，再將頭髮弄一下，立即形象大變。身上這套上好的西裝，是去年結婚時置辦的。將它脫下瀟灑地往帳篷裏一扔，心裏又有點捨不得，用帳篷內的被子將它蓋住。

互道珍重，叫上耿力，我開始轉入地下。我要耿力將身上的牛仔裝也扔掉時，他老大不情願。在一個僻靜處，我告知一切，他還是捨不得將這麼好的衣服白白扔掉，於是他拉住一個同學，換了一身普通的運動衫。

我想今晚只是避開廣場，就在附近，等明天看情況再說。前門最合適。我們在前門附近找了很久，都說客滿。最後有一家才告訴我們：「上面有通知，客店不許讓學生住。誰留誰吊銷營業執照。」

回絕食團廣播站見到沈老師

走投無路，只好回廣場附近，找到塊石板躺在上面。這時大約剛過子夜。在石板上不知睡了多久，寒氣將我們凍醒，我們只好背靠背取暖。這時我們都覺得荒唐，與其在這裏守夜，還不如到廣場上隨便找塊空地和棉衣睡覺來得合理。那裏既可就地觀察，危險程度也是一樣的——誰又認得出混到了同學堆中的我呢？

大約淩晨二點過，我們回到絕食團廣播站，見王童抱著話筒在打瞌睡，沈老師激動地拉著我和耿力：「我絕不離開廣場，堅決同你們在一起！」一句話說得我十分的感動，又十分的慚愧。我無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同他解釋指揮部的決議，只好找個藉口離開了廣播站。沈老師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精神的高峰與象徵。他的一言一行，都透著不滅的熱情與堅定。【248】

我同耿力來到協和醫院的臨時護理棚，準備隨時跟著這裏的救護車撤走。以前我兩次暈倒，都是送到這個棚裏。雖然絕食已經結束，身體虛弱的同學依然還在不時地昏倒，所以這時的醫務人員並沒鬆閑下來。

5月22日 星期一 多雲 晝27℃ 夜15℃

開希亂喊撤，我離開廣場

淩晨三點半，學運之聲的喇叭開始響起來，廣場上的緊張空氣達到了頂點。大家都聽到了政府將於淩晨五點動手清場的消息。這一次，似乎真的要「狼來了」。

這時，從響徹夜空的高音喇叭中，傳出吾爾開希急切的呼叫。他剛從「與中央領導有直接聯繫的人」那裏，得知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清理廣場。【249】他聲嘶力竭地喊道：「民主運動已經失敗！有絕對可靠的消息要清場！鎮壓馬上就要來臨，流血的衝突即將發生！為了在場上百萬市民和學生的生命安危，我們必須撤出廣場！」開希的聲調實在駭人聽聞，在急切的喊聲中，透出他對運動失敗的悲哀和對眾人生命的憂慮。

但是，開希這悲觀的論調，一定是受了那邊廣播站裏其他同學的阻撓，因此他不得不說：「現在我要同北高聯常委先商討一下，半個小時之後，宣佈我們的行動方案。」

四點一刻，開希的聲音又傳來。大家都屏息細聽：

「我以個人身份，懇求大家相信我，相信我的每一句話都是確實的。為了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請大家撤到建國門去，撤到使館區去。我們不是撤退，只是轉移！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外國使館的庇護。」

當場一片反對之聲。[250] 又是「個人身份」，顯然沒有得到高聯常委會的支持，而拿起話筒說個人的話。不久後王超華在廣播中說吾爾開希並不代表高聯，高聯沒有這樣的決議。[251] 聽到要撤到使館區去，以尋求外國勢力的庇護，我相信許多在場的人都同我一樣地皺眉。

我讓耿力裝著昏倒的樣子，將他扶上一輛去「北大一院」的救護車離開廣場。耿力一個大活人要裝病被人用擔架抬進醫院，很不自在。他認為我的身體弱許多，要我躺下，好讓我有個休息的機會，醫生檢查我們的身體的結果，我們都被送到病床上打點滴。這是我第四次打點滴。我本想找兩天前那護士，希望在她家暫時躲避，不巧她不在。

在北京站遇到一位作家

上午我們醒來，偷偷從病房溜了出來。在街上等不到公車，便出十元錢請一蹬三輪車的載我們去北京火車站。這時北京街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堵軍車的民眾已經回家休息去了，天光大亮，平安無事。只剩下一排排拉圾桶橫在街心，十字路口有許多路障。

到了天安門，我們請三輪車工人繞廣場一週，想最後看一眼廣場。廣場上旗幟依然飄揚，走動的人不多，大家都睡去了。這時我一心一意地去執行轉入地下的計劃，根本沒想到回廣場去看看。地下活動計劃既已確定，我就堅持地走下去，不存一絲懷疑。[252]

到了北京火車站，我們毋須買票，順著擁擠的人流便通過

層層關卡。近日鐵路系統對離京返回原地的學生大開綠燈。

在候車室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猛然發現了北大作家班的一個作家。他戴了一副大墨鏡，身穿牛仔裝，行李鼓鼓囊囊的，一手牽著夫人——他倆我在北大作家班都見過。一見這副打扮我便明白了。有意思的是，我還來不及問，他向我壓低聲音解釋說：「我回東北老家，去那裏發動人民！」要我是個便衣，他這幅鬼鬼祟祟的樣子，早盯上了。

從北京到天津，火車要走兩個多小時。車上並不擠，找到硬座坐下後，我很關切地聽收音機中的官方新聞。新聞中提到飛虎隊「在街上橫衝直撞」；鄧穎超在闢謠，說她沒有罵過李鵬和共產黨；全國總工會也在闢謠，說沒號召過全國總罷工；聶榮臻、徐向前二元帥也闢謠，昨日對幾名分別到他們家中爭取支持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說：「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近日廣場上盛傳他們宣告支持學生；萬里在加拿大說，要堅決保護青年愛國熱情，也要堅定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總之，沒有部隊已經開進北京城區的跡象。

在天津準備設立秘密電臺

火東到達天津西站。新建的天津西站很秀雅，建築風格十分別致。我看見進站口很鬆，許多天津學生自由地成群結隊上火車。耿力向我解釋說，天津市長李瑞環非常聰明，他讓火車站對離開天津的學生全放綠燈。學生一走，天津便能安定，管你北京鬧得怎麼樣！

到了耿力的學校，他帶我到他宿舍去休息。這是一個不大的學院，也罷了課，學生宿舍空了許多。耿力的同班同學見他從廣場回來，熱情地打招呼，探聽情況。對這個學校的地理地形，我很滿意，它既不在市區引人注目之處，學校人又少，耿力的宿舍正好在三層頂層的一個犄角。在這裏設立一個秘密電

臺，是非常好的地方，我對以後的地下活動有了更多的主意和信心。

耿力搞了點東西吃之後，我們到校外的一個公共澡堂去洗澡。途中經過自由集市，見到人們悠閑地為小日子作各樣的奔忙，似乎到了另一個世界。這裏的澡堂很有意思，一個大池子能容百十號人。洗完澡回到宿舍，一直到傍晚方起，才乘車到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去，想看看這兩所相當於清華與北大的天津最高學府的學運情況。

天津大學和南開「籌委會」

天津大學的前身是北洋大學堂，始建於 1895 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學，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還要早三年。歷史既較長，也自然有些「革命」傳統。我們剛下公共汽車，便聽到陣陣口號聲，學生隊伍正衝出校門到街上遊行。跟耿力去天大的朋友宿舍沒找到人，又到研究生樓去，遇到一個曾與耿力一起發動天津學運的同學。他介紹天津學運情況，天大類似清華，比較穩重；南開類似北大，比較奔放。這是工科學校與文理科學校學生成分與學術空氣使然。

南開大學與天津大學僅一牆之隔，正如北大與清華一樣。兩校間有條大路相連，我們便順了這條路來南開。一到南開，頓覺氣氛活躍許多。南開的歷史也不短，周恩來曾在這裏作過學生，他的塑像與「我是愛南開的」這句話刻成的石碑，一起放在辦公樓外。

南開也成立了籌委會，也設在他們的研究生樓裏，也是天津高校自治聯會的總部所在地。樓前也有個自由論壇，也是有線廣播，上千佇立聆聽的同學和激烈的辯論與熱情的演説。這時的南開籌委會，同北大籌委會在4月底的情況十分相似。很多人湧到接待處，一個公開的宿舍；而要找到核心人物則頗費周折，且經人引領。我從北京來，大約費的周折還少了許多。

接待處在一樓，要見到主席，須經一秘書帶到頂樓的某一房間。

南開籌委會的主席是一位三十來歲的研究生或博士生，顯得十分成熟和深沉。他大約是昨晚在天津各高校的代表大會上才當選的天津高聯主席。他有兩、三個勤勉的秘書，和一個十分精明能幹的副手。我將錄有《絕食書》的那盤磁帶交給他們的秘書處翻錄。時間倉促，只談了半個多小時，他的副手便帶著我們到各個熙熙攘攘的辦公室參觀，看他們印的傳單，然後在夜深時帶我們去一個臨時找到的宿舍休息。

留在宿舍的四個同學，大約也是學運骨幹分子，在關燈後的「臥談會」中十分熱烈地討論著昨天的改選和學運的戰略戰術。通過主席的介紹和靜聽這些同學的議論，我知道了天津同學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態度：北京旗幟不能倒！天津應該保北京！——保北京也就是保天津。

我一面繼續盤算著如何組織地下活動，一面又非常想念廣場。

5月23日 星期二 陰，陣雨 晝29℃ 夜14℃

決定回到廣場

在南開宿舍裏醒來後，籌委會的同學帶我們去食堂吃飯，然後到廣播站參觀。廣播站原是一間活動室，空空的，有個架高的木箱鎖住的電視機和一張乒乓球桌，幾張凳子，然後就是桌上的廣播器材和延伸各處的電線。過了一陣，進來一位三十來歲的女博士生，是個十分活躍的骨幹分子。她將錄有《絕食書》柴玲錄音的那盤磁帶還給我，說已轉錄，在廣播中放過，「很多人感動得掉淚」。

然後被領到一個房間，竟然是梅菊在等我們。我和她見過

兩面，作為天津代表，她旁聽了決定四二七是否出校遊行的那個北大籌委會擴大會議，以及決定五四如何遊行的那個北高聯會議。和她一起的那個男生也來了，我真高興現在作了他們的客人，交談也親切許多。梅菊這個名字很特別，她有點胖，特別熱心，笑容中透出善良與聰慧。

天津同學與北京有直線電話聯繫，到現在還沒有任何鎮壓的消息傳來。我和耿力趕回他學校，也沒有任何指揮部的人來聯絡過。天津的氣氛讓我更加意識到廣場才是戰鬥中心，是我應該回去的地方。於是我們決定返回北京。

從天津乘火車到北京，不用買票，很容易上車。前面說過，這是李瑞環的謀略。我們那節車廂很空，除了我同耿力之外，另外只有兩個人，離我們不遠。這兩人是「小倒爺」，興致勃勃地談論他們倒賣的鋼材、化肥甚至小轎車，似乎學生運動反官倒，與他們全不相干。一路上我仍舊密切注意收音機中的新聞，揣摸時局的變化，依然沒有絲毫鎮壓的動靜。

到了北京站，上到東長安街，在路口攔了一輛卡車回廣場。這輛車從西安千里迢迢趕來聲援北京學運，車上是些從那裏和沿途載上的工人、農民和學生、市民。長安街的交通秩序，依然由學生指揮。

聯席會議「任命」指揮部

車到天安門前，我們下了車。廣場上依然人山旗海，熱鬧非凡，至少有三十萬人。重新沐浴在這股激流中，覺得十分的親切、振奮。趕回絕食團廣播站，柴玲興奮地告訴我，指揮部原班人馬已取代了北高聯，接管廣場指揮。新成立的「廣場臨時指揮部」，從今天中午開始有48小時的指揮權，高聯則撤回北大校園整頓去了。[253]

柴玲還告訴我，這是在昨天一個「聯席會議」上通過的，廣場臨時指揮部將對這個聯席會議負責，在兩天內籌備成立廣

場正式的指揮機構。聽說這個聯席會議是由一些知識精英組成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心中對其代表性不免有些疑問。以前北高聯因為它的建立過程缺乏代表性，已經有很多教訓。由這個缺乏代表性的聯席會議「任命」的廣場指揮部，會不會產生同樣問題？【254】

李祿見到了我十分高興，張開雙臂，咧著大嘴：「老封，你可回來了！這下可好了。」他好像完全忘記了「保存火種」的提議。「老封」這個稱呼，是由柴玲叫開的，從北大籌委會裏就這樣了。從此以後，直到「六四」凌晨，指揮廣場實際運作的重任，主要落到我們三人身上。這段時間，我們合作得親密無間，從中我真正體驗到甚麼是友誼和信心。

妖風暴雨毛幽靈

下午四點，我剛回廣場不久，正當百萬人遊行抗議戒嚴的時候，北京上空突然烏雲密佈，狂風大作，雲色由灰轉黃，由黃變黑，濃厚的烏雲壓得人們 喘不過氣來。緊接著，廣場上妖風四起，一陣陣強力的旋風將地面的紙片、破布和形形色色的東西捲起，不知帶到了何方。剎那間，廣場乾淨了許多，各式帳篷在狂風中搖搖欲墜，廣播站的塑膠頂篷幾乎散了架。人們在驚詫中四處奔散，找尋避雨的地方，有的乾脆幾人拉塊塑膠布靠在一起，幾十萬人很難同時找到避雨之處。風沙颳得人臉疼，然後便是傾盆大雨，其中竟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過天晴，西斜的太陽放出桔黃的光芒，射在人們臉上發燙。【255】

這一切，竟發生在不足半小時之內。我萬分地驚詫。

不久，郭海峰來指揮部報告，糾察隊捉住了三個便衣，他們將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巨幅毛澤東畫像用水彩染污了。這是毛澤東的幽靈在興風作浪嗎？我更加詫異。

郭海峰同我講，下午二點，這三人用水彩顏料灌在空雞蛋殼裏，擲到毛主席畫像上，當即被在場的學生和市民抓住。他



〔圖 48〕1989 年 5 月 23 日，天安門上的巨幅毛像遭潑污後被蓋住，城樓下打出橫幅「這不是人民 / 學生幹的」。

們被審查了兩個小時，開始甚麼也不說，後來才掏出證件，說是湖南毛澤東家鄉來的教師和記者。「他們的證件像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禍於學生運動！」因此，在召集記者宣佈「這不是學生幹的」之後，三人已被移交公安局。[256]〔圖 48〕

我認為這樣處理有些欠考慮，因此責備了幾句：幹嗎移交公安局？如果三人並不是便衣呢，豈不斷送了他們的前程？以我的設想，開個記者會，陳明事件經過，當場將他們放了即可。一週前我在廣播站就真的抓到過前來造謠說「首鋼工人罷工」的便衣，結果還是把他們放了。現在事已至此，已無法挽回。

從運動一開始，學生和民眾就非常注意分寸，不給政府留下任何鎮壓的把柄。因此，北京的社會秩序一直相當穩定，甚至社會風氣好轉許多。當時，毛澤東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並

沒徹底轉變，在物資飛漲的今天，其威望反而有所回升——因此，如果不將這次污損毛像事件的真相及時公諸於世，政府完全可以藉機誹謗學生運動，最後達到鎮壓目的。

王文要當副總指揮

晚上，王文到廣播站來找到我，顯得有點氣急敗壞的樣子。他拿著新成立的廣場臨時指揮部成員名單，氣沖沖地問我，「為甚麼沒有我的名字在上面？起碼我也得是個副總指揮吧？！」

我因為沒有參與臨時指揮部的成立會議，無法同他講出個所以然來，便用好話安慰他，然後在副總指揮的一行上，添上了王文的大名。這時，他露出一絲笑容，卻又惡狠狠地說：「柴玲不是個東西。老封你是好樣的，我剛才不是衝你生氣。」後來，我一直自責沒堅持原則，做了個好好先生。此事並沒就此了結，後來的事情證明，王文一直對能不能做副總指揮耿耿於懷，終於引發後患。

註：

【176】我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才弄清楚，絕食團指揮部是在15日上午成立的。

【177】這篇文章題為《四月人民民主運動何處去——三論我國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據陳子明妹妹陳子華披露，當時陳子明派人印刷了300份供其散發，後又指派社經所辦公室人員印了1000餘份，並給任畹町1000元印刷經費，且表示可以派人擔任任畹町的秘書協助他工作。見陳子華「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一文和《黑手備忘錄》第491-492頁。

【178】蔡詠梅當時是《香港時報》記者。後來我給了王文錢請他如數還給蔡詠梅。

【179】當時我忙於建廣播站，不知就要對話，並未注意到熊焱柴玲王丹開希等人已離開廣場去對話了。據學者分析，廣場不知道對話是因對話團把同政府的接觸保密，詳見後面「組織混亂源於絕食的非組織性」一節中的註釋。

【180】也許程真就是那位「從對話現場回來的同學」。程真回憶說，對話第一個發言的就是她唸「給媽媽的一封信」，然後大家委託她去廣場向絕食同學說明情況，但她沒找到我或柴玲(程真離開對話現場很早，不知道柴玲已在現場)。王超華在巴黎會議上回憶說，程真帶了一盤錄音帶去廣場，這應該是誤記，因為程真很早就離開了對話現場，即便有錄音帶也沒甚麼內容；如果真有對話現場錄音到了廣場，廣播站不可能不播，按當時的情形那是誰也擋不住的。見程真「六四口述實錄」及《驚心動魄的 56 天》第 134 頁。

【181】柴玲在 1991 年巴黎會議上說，此前他們已經討論過現場直播問題，就算沒有電視直播，「但是廣場[官方]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於技術性的問題，把對話的記錄直接送到廣播電臺需要一個小時。在晚一個小時的情況下，同學還是答應，只要能夠聽到現場直播。」(《回顧與反思》105 頁) 這和我的提議不謀而合，可見對話未能現場直播並非技術障礙，而是政府缺乏誠意。

【182】對話內容當時既沒直播，後來也沒全程轉播。據《新聞導報》記述：「14 日晚，廣場上的同學空等了一個寒冷的夜，第一盤對話的磁帶，也並沒有在電臺、電視全部播出。對這樣的對話，同學們只表示憤怒。」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 545-546 頁。對話團長項小吉也說，對話時中共電視臺和廣播「對此都無報導，學生再次感到受騙。」見「回憶對話代表團」，《新聞自由導報》1991 年 5 月 31 日。

【183】這個流行的傳言受到《天安門文件》的挑戰，這本書中將閣

明復稱作「李鵬的心腹」之一，見該書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第447頁。

[184]「明星政治」導致非組織性、假組織性，後來在海外民運中充分暴露其弊端。

[185]很奇怪的是，官方答應對話後十幾個小時，絕食學生都不知道。據沈彤回憶，「5月12日晚上中辦在拖了六天之後突然通知，對話安排好了」(《回顧與反思》第85頁)、「中共中央辦公廳方面突然連夜通知我們要進行對話是因為絕食的消息已經很快傳到了『上面』」(《新聞自由導報》1991年5月31日；官方資料說是13日凌晨四時官方答應對話，「但天明之後，『高自聯』頭頭又自食其言，取消了這次對話」，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94-95頁、《中國六四真相》第374-375頁)。13日到廣場的絕食同學完全不知道官方已答應對話，王丹甚至說不知對話團的存在。據趙鼎新研究，「對話團的領袖把同政府的接觸看作是自己的特權，並經常將這種接觸保密」，「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學生領袖王丹。他在一次採訪中告訴我，甚至是直到絕食開始之後，他才知道有對話團的存在。」見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和八九北京學運》第123、124頁。據沈彤回憶，直到14日中午信訪局長鄭幼枚才通知對話團準備下午對話的準確時間，且沒有現場直播，對話團沒與絕食團或北高聯商量便答應了。見沈彤"*Almost a Revolution*"，第244頁。

[186]王超華回憶，14日上午閻明復答應由中央電視臺對全國實況轉播對話，她就去了戴晴主持的十二學者討論會。王超華對那次討論會的憶述有些片面，似乎學者們去廣場只是勸學生撤，卻沒提他們作為勸撤前提的針對政府的三點《緊急呼籲》。會後王超華趕到對話現場，得知沒有實況轉播，就衝進會場喊停，三小時的對話至此中斷。見《回顧與反思》第101-102頁。香港《天天日報》15日12版報導，十二學者是在晚上8點10分到統戰部的。

【187】這個理解與後來戴晴的説法大相徑庭。按戴晴的回憶，他們似乎只是來勸學生撤離廣場的，這與史實不符。另外，我在1990年寫備忘錄時，都還以為絕食團指揮部這時已經成了，柴玲已成為總指揮，其實這是第二天的事情。

【188】這三點是針對政府而言的。「六四」後這些學者中的許多人、尤其是戴晴，刻意回避這三點要求。其實，這三點要求比當時學生的兩點絕食要求還要高，政府根本沒有做到，戴晴等人也沒有「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189】我們當時都被戴晴騙了，以為她是代表十二學者提出的。其實這兩條是戴晴背著其他人擅自主張的，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後來據于浩成、蘇煒、鄭義等人的回憶，戴晴這種做法讓很多知識分子窩火，從此疏遠她。譬如李洪林當時就說：「戴晴那樣説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説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蘇煒，「十二學者上天安門」，《民主中國》1992年6月，第81-84頁）一些香港記者也見證了戴晴那時的孤立處境，詳後註。不過，李洪林在海外長年沉默後，2005年在大陸寫了一篇回憶性的評論，這時他不僅全盤接受了戴晴廣泛傳播的虛構故事，更將《緊急呼籲》説成是單方面針對學生的勸撤呼籲，還説學生代表也都接受了(「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爭鳴》2005年6月1日）。

【190】第二天《光明日報》確實刊登了，但根本起不到否定社論、默認學運組織合法性的作用，而且將《光明日報》學者們的呼籲順序顛倒過來，重點變成針對學生該不該撤，而不是針對政府的《緊急呼籲》三點要求。據當時北大學生辦的《新聞導報》報導：「緊急呼籲聯名者5月16日在『5.16聲明』新聞發佈會上向《光明日報》提出抗議，它顛倒了呼籲書的前後順序，內容與文字也有重要的改動與刪減。其原文應該

如下（經錄音整理）：〔後面是〈緊急呼籲〉三點要求〕」。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537-538頁。包遵信在《未完成的涅槃》第124頁也證實，新聞發佈會上他「就5月15日《光明日報》登載〈緊急呼籲〉一事發表了一項抗議，又將〈緊急呼籲〉重新宣讀了一遍。」

【191】知識分子在學生心目中一落千丈，其實是戴晴在搞鬼。其他知識分子中更覺得被戴晴耍弄了。見蘇煒、于浩成、鄭義和蔡詠梅等人的回憶。鄭義回憶中有三段關於戴晴。一是5月14日，「戴晴的努力適得其反，有學生對我說那是『拉偏架』、『勸降』，對知識界產生戒心」、「當她以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說出那句著名的話（「如果趙紫陽或李鵬來對大家說一句『同學們，你們好』，大家就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好不好？」）之後，她的那點本來有限的政治影響力便即刻化作煙雲飄散！」二是5月15日，戴晴在電話中對鄭義「勃然大怒，口氣之決絕，令人大吃一驚」，並「砰地掛上電話。後來才明白是昨日她組織的『十二學者天安門廣場勸降』(學生語)被學生噓了，一些學者還說她騙了他們。看來我是撞到她火頭上了。」三是5月22日，知識界大遊行，戴晴要接「知識界」大旗，被遊行總指揮趙瑜轟走。後來趙瑜對鄭義說起，「頗為憤憤：『這種人，見形勢又好了，全上街了，又來搶大旗！我把她趕回去了，我說：戴晴，回到你的隊伍裏去！』多次遊行中，並無人有搶鏡頭的意識。」（見鄭義《歷史的一部分》第50、70和93頁）這一「搶鏡頭被呵斥」的場面也被香港記者抓拍到，趙瑜背對鏡頭，正走向高舉「知識界」大旗的戴晴當時尚是一臉興奮璀璨的笑（照片見《百姓》1993年1月16日，第33頁）。這一場面也被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仔細記錄下來，「趙瑜毫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蔡詠梅瞭解道，戴晴被其他知識分子疏遠，就是因為5月14日的斡旋，「他們感到受了欺騙，被人利用了，而且認為戴晴在其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

色。」見香港64記者：《人民不會忘記》第254頁。戴晴自己也說「當時，我在北京多孤立呀！5月19日學生點了八個知識分子的名，願意聽他們的意見，我是其中之一，但其餘七人都拒絕與我去勸學生撤離廣場(其中有嚴家祺、包遵信、李大同等)」，結果她只好同何新、李銳一起在張郎郎家勸熊焱。見《開放》1993年2月號46頁，金鐘對戴晴的採訪。

【192】戴晴傳播的一個謠言後來流傳甚廣，並成為《天安門文件》作偽的一個證據。那謠言說：當學者們勸說學生撤離時，柴玲遞給封從德一張條子，上寫「請在廣播站帶領學生連續唸《絕食宣言》三遍」，封從德宣讀後學生們就失去了理性。這個編造的故事很荒唐，因為如果帶大家唸三遍，領一遍跟一遍總共六遍，就得一個小時（柴玲一人就唸了十分鐘），十幾萬人齊聲吼，那將是何等的壯觀！這樣的壯觀場面，未見任何人記得，當時的錄音中也沒有，更未見任何報導。這段謠言是戴晴根據蘇曉康說的故事虛構出來的，而張良又拿來冒充是中共三個情報機構當晚的報告抄襲進《天安門文件》，美國學者們再翻譯成各種語言，甚至在他們的研究中也信以為真。這是迄今為止中外學者對八九民運史研究很膚淺的一個顯例。參見《民主中國》1990年6月第2期第22-23頁；戴晴，〈廣場斡旋〉，《百姓》1992年8月16日，第26-31頁；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第395頁及英文版“*Tiananmen Papers*”，第169頁；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和八九北京學運》第139頁；及我的詳細證偽，「《天安門文件》五大疑點」（http://www.64memo.com/b5/1315.htm）。

【193】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將戴晴的妥協方案記作是「十二學者妥協方案」，可見受她蒙騙的人不在少數。同學中也有支持戴晴方案的，但反對的更多，包括領他們來的王超華。見這晚的錄音 http://www.64memo.com/b5/12164.htm 。

【194】柴玲記得當時絕食團64代表中46人投票決定不撤；王超華

說高聯常委也有過一次表決，決定轉移（《回顧與反思》第131-134頁）。按當時情形，高聯起初既然反對絕食，對絕食同學就自然失去領導權，撤留顯然不是高聯能決定的，這樣表決既顯得滑稽，又與當時王超華在廣播中說高聯與絕食團一致「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相抵觸，應該是記憶錯誤。

【195】我記不清一起來的是不是高聯的同學。如果是，則他們似乎因為開希主張結束絕食而達成了一致。此事有些混亂。按照梁二與王超華1991年在巴黎的回憶，絕食當天他們便已通知吾爾開希和王丹，不得再代表高聯發言，因為他們此前已不遵守高聯的決議（《回顧與反思》第101、160、182及296-297頁）。這可能就是為甚麼14日夜裏開希說是「以個人名義」要求廣場同學東移的原因。

【196】超華有些回憶文章可能引起誤解，似乎我限制了她的發言。我確實限制過吾爾開希的發言，因為他的非程序行動會導致廣場上的混亂。但我完全沒有針對超華，實際上根據廣場上的一盤錄音，王超華在十二點半還以高聯常委身份在廣播中說：「現在北高聯、對話團和絕食團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基本態度也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這晚的錄音及全文參見http://www.64memo.com/b5/12164.htm。這段話也可證明超華有些回憶與實際情況差距很大，譬如她說她只是對政府強硬、對同學則沒有表達堅持到底的強硬立場（這與事實相反），而那晚到了討論要不要東移時，她還「主要是說學者們的意見應當聽取（這與她不久前剛說的話正相反），他們勸不動我們時，出了廣場就都流下眼淚(這是虛構，實際上學者們是因為被戴晴玩弄而很憤怒）」。見《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5月29日。

【197】那時我還不知道，他「以個人名義」的原因，按王超華、梁二、王有才和王治新等人的回憶，是北高聯在5月13日已正式通知吾爾開希和王丹不能代表高聯（見前面的註）。其實這時他們並非高聯正式成員（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後來開希又好幾次「以個人名義」進行凌駕於學運組織之上的非程序活動。

【198】1991年巴黎會議上我才清楚，15日早晨李祿找到柴玲，向她建議成立絕食團指揮部，參加的條件是在鎮壓前率先自焚，以少數的犧牲換取多數絕食同學的生存（《回顧與反思》第136、144、165、171、173頁；李祿“*Moving the Mountain*”，第139頁。這條件在我16日晚加入指揮部時，已經沒人提了）。這個自我任命的過程突如其來，門檻又幾乎高不可攀（自焚），對其他學生領袖來説無異於又一次「政變」。如果説抗拒北高聯的絕食團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分裂，指揮部的形成則是第二次大裂變，既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延續，又是廣場上後來越來越多的裂變的開端。譬如，與指揮部宣佈成立幾乎同時，人大絕食同學也脱離了對話團或北高聯的領導，理由同樣是「既然絕食是一部分同學不滿政府，自己報名、自發組織、自發進行的，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怎麼做。」（《回顧與反思》第155頁）李祿這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一些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了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絕食發起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了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6月1日凌晨，王文等人甚至發動綁架（《回顧與反思》第138、147-148頁；李祿“*Moving the Mountain*”，第146-148頁）。〔圖49〕

【199】王超華回憶説，當時一位絕食團同學幫她豎起北高聯的牌



〔圖49〕1989年5月15日，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在歷史博物館前召開的記者會，前排左起是柴玲、李祿、王丹、馬少方、楊朝暉。

子，「其實就我一個人堅守在那兒。」後來高聯常委也逐漸到廣場，有時能開籌委會，但無法召開各校代表會。見《回顧與反思》第156、159頁。

【200】據李祿回憶，何貴方「一直認為王超華不僅沒有代表性，而且是一個特務。」代表社科院的一個博士生也説超華不是代表。加上超華想要綁架柴玲、另立學運之聲、收下支援絕食上百萬的捐款不轉過來等等，所以就有很多矛盾。見《回顧與反思》第160頁。

【201】鄭義和他的妻子北明也在廣播站做過總編和編輯。最近整理《八九學運備忘錄》原始打字稿才發現，1991年巴黎會議期

間，白夢出示了兩份當時廣播站印的工作人員名單影本(現已找不到，以後找到會放在六四檔案網站上)，《回顧與反思》中沒有收錄，《備忘錄》中打字記在末尾，現全文轉錄如下：(1)「天安門大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總負責人：封從德、張伯笠；總編：陳建祖、鄭義、白夢；第一組：編審：鄭義；編輯：北明；播音員：張德成、紅梅、吳燕；第二組：編審：白夢；編輯：？立平、鄧錦祥、馮紅平；播音員：劉志剛（後手寫為「王童」——作者註)、石冬青、董巍；記者部主任：白夢；記者：王燕、郭恒忠、劉深、黃森磊、鄭月、馬建國；存稿：[空一行]。凌晨5點—上午10點：第一組；上午11點—下午4點：第二組；下午5點—下午10點：第一組；下午10點—晚2點：第二組。」這份名單大約是5月16-18日印的；(2)「天安門廣場民主之聲廣播站——站長：[空一行]，總編：白夢；副臺長：袁倚天；副總編：羅勇；編審：[空一行]；編輯：郭恒忠、于燕紅、周圍、紀平；播音：王志剛(後手寫為「王童」——作者註)、梁昕、楊眉、周圍、紀平、應偉；技術：袁倚天、楊春彥、紀平；？？：王春、王凱麗；聯絡：金曉紅。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其中，[空一行]是指原件該行後面為空白，沒有名字；問號「？」是字跡不清之處。

【202】王超華和張伯笠對絕食團廣播站的看法正好相反。超華認為過於激烈，伯笠則稱當時很多激進的稿子都不准播，所以有些人很不滿，經常要衝廣播站奪權。見《回顧與反思》第155、187頁。

【203】《人民日報》1989年5月16日報導：「美聯社今天的一篇報導說，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通過喇叭稱，『首鋼的23萬職工中，已有7萬人本週一罷工』，支持學生運動。首鋼的負責人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204】丁石孫校長當時在國外，也發表了同情學運的講話。

【205】據中新社報導，北京58所醫院累計診治察看絕食學生9100

人次，其中留院察看8151人次（《明報》5月25日）。但其中所言「沒有一人因絕食死亡」則不實，至少駱一禾是因絕食死亡的，詳見6月1日正文的註。類似數字又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145頁。

【206】李祿和張伯笠也記得這次有五十多個代表參加的會議，投票結果還是不撤。見《回顧與反思》第142-143頁。

【207】趙紫陽在「六四」後的「自我辯護」中說，「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此前他多次向來訪的外國首腦講這個問題。趙紫陽還舉了兩個例子，說明談這個問題效果很好：一是他在5月13日與工人對話時也這樣說了；二是陳希同針對「垂簾聽政」的議論，向大專院校的政工幹部做解釋時，也說了中共的這個內部決定，效果也是好的，且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1997年趙紫陽補充回憶說，此前鄧小平說自己要親自說那句話，但上午見戈時忘了（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255-257頁）；2001年，趙秘書鮑彤在接受採訪時也記得這個情況，並說那句話是他為趙起草時加進去的。其實，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重大問題請小平同志掌舵的決議》就是鮑彤起草的（嚴家祺，「鮑彤的思想和人格」）。因為趙對戈講的這句話，鄧女兒鄧楠打電話給趙，厲聲質問：為甚麼把鄧在中央具有最後拍板權講出來，這是明擺著將社會矛頭指向鄧，將火引向鄧！（吳庸，「『四二六社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

【208】對於阻止衝擊大會堂，柴玲、李祿、程真、梁二、開希和劉燕也起了很大作用，見《回顧與反思》第145-146頁。

【209】柴玲在16日上午九點記者會時暈倒過一次，見《中國六四真相》第415頁。

【210】據官方資料，16日上午馬少方在記者會上說絕食學生人數是3160人（《中國六四真相》第415頁）；到5月18日，北京以外14個城市出現高校學生絕食請願，總人數約2500人

(《驚心動魄的56天》第119頁)。由此可見,當時絕食總人數在5660人以上。據劉衛和辛苦回憶,湖南長沙聲援北京的絕食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400多人」;「5月17日,西安有250人在新城廣場省政府樓前絕食,同時在鐘鼓樓前有100多人絕食,蘭州有300多人在省政府門前絕食。」見《回顧與反思》第336、340頁。官方資料則說蘭州只有112人、長沙近300人絕食,見《中國六四真相》第508、542頁。

【211】正當我在同市紅十字會交涉的時候,王超華向官方建議將我和柴玲控制到醫院軟禁起來。見王超華的回憶,《回顧與反思》第162頁。

【212】官方資料稱,市紅十字會與北高聯熊焊達成協議:從17日凌晨1時起,由北京紅十字會全部接管對絕食學生的監護、搶救和治療工作,但在凌晨「4時許『高自聯』單方面撕毀協議,宣佈市紅十字會不受歡迎」,一度將他們趕出廣場,後又請回。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109、111頁、《中國六四真相》第418頁、《70天大事記》第38、40、41頁。其實,張伯笠也認為北京市紅十字會負有特殊任務:19日凌晨他在指揮車上輸液,「北京市紅十字會主席也就是北京市衛生局局長硬是賴在車上不走,他是陳希同派來監視我們的。」見《中國之春》1994年5月號45頁。官方資料說熊焊當時是北高聯常委,但據周鋒鎖回憶,那時清華駐高聯代表應是張銘,熊焊大約跟吾爾開希私交不錯,但因沒參加清華第二屆籌委會,他當時沒有明確的學校授權。見周鋒鎖「六四口述實錄」。

【213】沈彤回憶談到趙書面講話的背景,5月16日夜裏「統戰部方面八次過來,叫我一定要去統戰部,統戰部的副部長,給我們匯報政治局常委會六人會議的內幕。所謂六個人,當然是加上鄧小平了,五比一通過否定學運。」見《回顧與反思》第162頁。但據《中國六四真相》,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緊

急會議沒有鄧小平，但有楊尚昆和薄一波，加五常委共七人。會上意見相持不下，才決定次日請示鄧小平，並由趙發表書面講話。見該書第426-431頁。而據楊繼繩記錄的趙紫陽回憶，5月17日「在鄧家開會之前，我〔趙紫陽〕的意見是多數，我、〔胡〕啟立、喬石、〔楊〕尚昆，都是一致的。」見《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76頁。可能沈彤說的是17日晚的情況。

【214】王超華後來回憶說，5月16日夜裏，她向官方的人建議將柴玲和我軟禁在醫院。見《回顧與反思》第162頁。

【215】梁二回憶證實王超華和他確實到過絕食團借錢，是以建立宣傳部、廣播站等名義申請的；自5月17日起，他們就開始以北高聯名義在紀念碑上接收捐款，但「財務當時在廣場上確實沒有任何制度」。常勁記得當時王有才說高聯有二百萬的捐款。見《回顧與反思》第242-243、249、250頁。「王有才口述實錄」提到他交涉過兩筆巨額捐款，但最終都未拿到。一筆是三千萬，跟紅十字會談判轉到北高聯；一筆是12億台幣，6月3日與一個叫陳百楝的台灣人在北京飯店商談。

【216】北大對廣場支持的總體情況，可參見《回顧與反思》第176-180頁常勁的概述。常勁修訂補充道，「5月14日我派宋玉成代表籌委會聲援絕食指揮部負責廣場的物資供應(我在北大負責籌集物資，與北大校方談判爭取到了大水桶、陽傘等物資送往廣場，並通過廣播站募集數車棉被和北大教師借出的二百多張行軍床送往廣場，有一張床是馮友蘭教授借出的)，宋非常有效地建立了廣場上的物資供應系統，15日我上廣場時，北大供水站和物資站工作井井有條，負責絕食同學的供水需求和北大上千糾察隊員的飲食需求。宋是地球系氣象專業八六級學生，住我宿舍的對門。我們一起創辦『北京大學學生教育研究社』，在社團部註冊時因為團委不許我們使用『北京大學教育研究學社』的名稱，變成這麼一個怪

怪的名字。」

【217】據常勁回憶，5 月 16 日「北大在廣場上的糾察已經達到兩千多人，佔據了廣場上絕大多數的位置」。見《回顧與反思》第 177 頁。

【218】由於昨日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洩露天機，17 日的口號也變得非常激烈，矛頭直指鄧小平要鄧下臺，「學潮演變為『反鄧運動』」(香港《華僑日報》19 日 2 版)。最為激烈的是嚴家祺、包遵信等知識界人士發表的《五一七宣言》，稱鄧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高呼「打倒個人獨裁！」張伯笠回憶說，17 日晚嚴家祺、包遵信、李洪林和于浩成來到絕食團廣播站，嚴宣佈「鄧小平辭職了！」並稱消息絕對準確(《回顧與反思》第 186 頁、《中國之春》1994 年 3-4 月號合刊 76 頁及張伯笠《逃亡者》第 8 章)；但據嚴家祺修訂，他雖然「在 17 日後明確表示要求鄧小平下臺，但在社科院、在任何地方沒有說過『鄧小平辭職了』這樣的話」，實際上，張伯笠當時並不熟悉他們幾位，把人都弄混了，譬如包遵信當時根本沒在場，在場的還有高皋和社科院的同事(嚴寄給我一張《開放》上的照片可以作證)。嚴家祺進一步澄清道，「我起草《五一七宣言》，對鄧小平作了嚴厲指責，如果我知道『鄧小平已經辭職』，我在 5 月 16 日到 5 月 28 日之間寫的文章『口氣』也會不同，我在社會科學院也從沒有談起甚麼『鄧小平已經辭職』。總之，我根本沒有聽到鄧小平辭職這樣的說法，我怎麼會向張伯笠談甚麼『鄧小平已辭職』呢？特別是，張伯笠說到包遵信在場，事實上，香港 2004 年 6 月製作並發行的 TVB 檔案《離家十五年》中有 1989 年 5 月李洪林、于浩成、嚴家祺、高皋在天安門廣場與張伯笠談話的鏡頭，有我(嚴家祺)說的一些話，從當時錄影和我談話的內容可以看到，我並沒有說甚麼『鄧小平辭職了』這樣的話。」不過，這個傳言當時確實存在，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 336 頁記錄了當廣場學生聽

說「鄧小平下臺」時的激動場面。另外，包遵信回憶說，最早向他提出「倒鄧」的是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5月16日晚七點多來找他說：「我們覺得現在應該明確提出『倒鄧』，大家商量請您出頭，發表一份聲明。如果需要和其他人聯繫，我們可以幫助跑。」包遵信認為他所說的「我們」可能是指陳子明等人的社經所那些人，因為邢在該所兼職；而凌晨一點他回家時，看見陳子明留給他的電話號碼，他打電話過去，陳卻說沒甚麼事，只是去看看他。包遵感到很信奇怪，因為他與陳子明之前沒甚麼來往，「看看我為甚麼還要我給你打電話，還是有甚麼事電話裏不便說？」見《未完成的涅槃》第132、134頁。

【219】關於沈澤宜，請參見5月7日「認識『右派』沈澤宜」一節的註。

【220】官方資料說公車是市紅十字會主動調派的，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116-117頁。

【221】一天前，17日晨戴晴派人去廣場廣播站傳遞官方信息：會有袁木一級的人到廣場親口告訴學生「一俟安排好對話，實況直播」；加上趙紫陽已承諾不秋後算賬，學生這就撤離廣場。但那天甚麼也沒發生，此後也沒有任何實況直播的對話。而聽戴晴的口氣，似乎她已與中共最高當局商量好了。見張郎郎「到天安門捎個口信」，《九十年代》1989年6月號14-15頁。

【222】主持「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周鋒鎖也在18日中午暈倒被送進醫院，見其「六四口述實錄」。而據一直在北京與王丹有交情的一位香港記者稱，「王丹是絕食團指揮部中，唯一一個絕食七天，沒有暈倒也沒有進醫院的。」見《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8頁。

【223】李鵬見面會內容遭刪節的情況，海外媒體多有報導，見5月19日香港《快報》、《明報》、《東方日報》、《香港時報》和《香港經濟日報》3版（程真當時拿著會談錄音，「由於恐怕

刺激同學，引起騷動，沒有將廣播刪去的地方向同學宣佈，也沒有用自己的廣播播出對話情況。」）這個見面會外界一般誤解為「對話」，但即便官方公佈的資料也不敢稱之為對話，因為會談結束時北高聯秘書長王治新就否認説「這不是對話」，閻明復也當場認同。後來，參與會談的程真干脆稱之為「談判」。有關5月18日李鵬見面會不能稱為對話、更沒有「電視直播的對話」的詳細分析，見封從德《天安門之爭》第144-160頁。與會者程真、王治新也提到刪節的情況，見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224】這個效果很可能是中共精心安排的。倉促召集的見面前，吾爾開希和王丹被單獨叫到一個房間與中共統戰部長密談一個小時，出來後二人宣佈「閻部長説了，今天就我們兩人主談，其他人儘量不要發言」（王超華、梁二、程真、王治新都記得這句話），因此程真、梁二等許多同學基本上沒有發言。實際上是中共抓住二人愛出風頭的弱點，刻意安排這兩個大學新生儘量曝光，以便抓住他們説話的漏洞，同時迴避和那些較有頭腦的研究生同學交鋒，而且這次會談也完全避開了真有準備的對話團。見《回顧與反思》第163頁王超華、梁二的回憶及程真、王治新的「六四口述實錄」。

【225】次日晚，李鵬就在黨政軍大會上宣佈戒嚴時説「絕食學生代表也表示，他們已不能控制局勢」，所以當局要迅速結束這種狀況。「六四」後逃亡途中，我讀到吾爾開希對李鵬説的這些莫名其妙的話，簡直是痛心疾首。

【226】吾爾開希與王丹在絕食後被高聯排除在外，見《回顧與反思》第101、160、182及296-297頁。

【227】見5月25日的《人民日報》頭版、《中國六四真相》第669頁。

【228】我一直不知道吾爾開希在絕食第五天（5月17日）已復食（中國人權“*Children of Dragon*”，第83頁吾爾開希自述「我在絕食第五天已復食」；“*Almost a Revolution*”，第281頁記述18日

見到開希吃飯；《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21頁）。吾爾開希說是因為心臟病發作，醫生要求他復食的，而他已經十幾次進醫院了。《香港經濟日報》記者羅綺萍最早報導吾爾開希患的是心肌炎（5月18日3版），吾爾開希自己也說是心肌炎（2004年5月25日BBC訪談）。然而，心肌炎患者不能飲用含酒精飲料，否則有心肌梗塞的致命危險，但吾爾開希又常對外說他愛豪飲啤酒，還自己釀啤酒喝，並因此而發胖。侯德健認識吾爾開希的大夫則「說吾爾開希沒甚麼病」，所以劉曉波和侯德健都「知道他是裝病，而且警告過他不能這樣做」（見金鐘對侯德健的採訪，香港《開放》1990年7月號46頁）。

【229】將18日中午的事情拿到19日晚間新聞聯播中播放，說明當局對這則已是舊聞的「新聞」的重視程度。實際上這則「新聞」這兩天反復播放，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以製造李鵬已與絕食學生「對話」而且「電視直播」的假象，甚至連王軍濤、胡平這樣的民運人士都相信且堅持這一假象。

【230】19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趙紫陽、李鵬、溫家寶、羅幹等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流著淚說「老了，無所謂」。見《70天大事記》第46頁。

【231】據報導，晚上九點指揮部與高聯宣佈四點聯合聲明，建議停止絕食、改為靜坐，並呼籲工人不要罷工、市民不要遊行、外地同學不要來京。「該聲明有52票贊成、14票反對、1票棄權」。見《香港經濟日報》20日3版。得知學生宣佈復食，官方「中央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見《八九民運史》第321頁。

【232】另一方面，下午四、五點，王丹、吾爾開希、程真、馬少方和劉燕等人已在統戰部得到戒嚴消息並復食。其實吾爾開希在兩天前已經復食（見5月18日「我提議馬拉松絕食」一節的註）。據沈彤回憶，在統戰部復食時「氣氛開始比較活躍。那時知道戒嚴的事情反而感到輕鬆了。大家很高興，互相簽

字、照像啊甚麼，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沈彤問這總指揮部幹甚麼、怎麼與絕食團協調、怎麼組織撤離？開希接連回答三句「我當總指揮。」(《回顧與反思》第202-203頁、"*Almost a Revolution*" 第288頁）劉曉波也提到過吾爾開希「當上總指揮再說」的心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182頁）。張郎郎說19日上午「統戰部和吾爾開希談好瞭解決絕食的方案，結果吾爾開希回廣場宣佈卻被學生罷免」(《九十年代》1989年7月號46頁），應該是誤記。

[233] 李祿回憶說，當時他和柴玲、張伯笠主持了代表會，80%投票同意結束絕食。張伯笠說代表有「173票贊成，28票反對，7票棄權」，並強調代表們並不知道要戒嚴（李祿 "*Moving the Mountain*"，第164頁、《回顧與反思》第169-170、196頁）。但在後來的文章中，張伯笠又說是「17票反對，33票棄權」，而且是在他這個主持人講完後立即表決的，「顯然，全體代表都被我的講話所感動。我沒有給任何人再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提出絕食團指揮部決定將絕食鬥爭改為靜坐鬥爭，請全體代表表決。」(《中國之春》1994年5月號47頁）文中後面他與我爭執的部分，有很多虛構的情節，如說我重新召開的代表會在衝突之前(實際是在之後)且沒有審查代表資格(那次審查非常嚴)，及後來他與幾個常委開會罷免我(根本沒有發生)。

[234] 當時我們把戒嚴叫做軍管。李祿回憶錄中沒有提他事先知道即將戒嚴的可靠密報，只說是從親趙紫陽的三所一會《六點聲明》中分析出軍隊要介入；書中對與我衝突過程的描述則多有錯誤，如說我當時從未進過醫院休息不好因而急躁，又說我在組織重新投票時才暈倒，從而完全不提重新投票的結果。見 "*Moving the Mountain*"，第164-165頁。

[235] 實際上當局很快就播出快訊，稱廣場學生已經復食，而毫不提及第二次投票的情況。

【236】王超華記得我還去過「學運之聲」，她在那裏也宣佈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之後她被幾個醫生模樣的人強制「拉去醫院，而且第二天早晨不讓回來」。辛苦也見證當時廣場上的絕食同學對指揮部宣佈復食非常不滿，並非李祿所言僅僅是未絕食的同學反對復食。見《回顧與反思》第204-205、212頁。

【237】據稱，5月19日鄧小平飛往武漢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組織「第二指揮中心」；此前，5月8日，鄧小平在北戴河召見各大軍區負責人，調集幾十個野戰軍赴京(《八九民運史》第310頁引述《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313頁引述《流血的改革》)。但據楊繼繩記錄的趙紫陽回憶，「整個動亂期間[鄧]小平一直在北京，並不是傳說中他在外地」(《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77頁)。關於赴京部隊總人數有18至35萬幾種說法：18萬（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第497頁）、18-25萬（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第283頁）、35萬（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329頁引述《明報》1989年7月號「黨指揮槍？槍指揮黨？——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一文）。

【238】張伯笠的回憶解釋說是他講錯了，他本想宣佈「20萬人大靜坐！」這個錯誤的「大絕食」，致使本來力勸學生復食的陳明遠後來帶病絕食，見《香港時報》22日2-3版「陳明遠續絕食聲明」，其中說「5月19日我和我的朋友通過種種努力，說服了絕食同學[復食]」，爾後因為當局宣佈戒嚴，廣場同學激烈反對，立即宣佈廣場30萬人（原文如此——作者註）大絕食，因此他也恢復絕食。

【239】據王超華回憶，20日中午王丹主持過一個各校代表會，討論了萬一軍隊進來怎麼辦，最後任命了一個青島來的學生當總指揮。辛苦說會上選出王丹作總指揮，王超華則記得代表們對王丹做總指揮意見特別多，任命他是名義總指揮，執行總指揮是青島學生。見《回顧與反思》第212-213頁。

【240】宣佈戒嚴時，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的社經所團隊做了兩件相

反的事情。一方面，他們找了一些知名學者發表《我們知識分子的五二〇誓言》，以人格、良知和全部尊嚴「莊嚴宣誓：決不背叛愛國學生的生命和熱血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決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脱，決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決不出賣自己的良知，決不向專制屈服，決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宣誓人：包遵信、嚴家祺、蘇曉康、王軍濤、沈大德、吳庭嘉、閔琦、陳小平、李德偉、謝小慶」（包遵信回憶説，是社經所專職人員謝小慶通過電話找他簽的，他不記得有最後「決不稱臣」那句，見《未完成的涅槃》第267-269頁）。另一方面，他們開始組織逃亡。王軍濤回憶説：「19日晚，國務院發佈戒嚴令……我與子明、衛華再度商議……我提出……應當為他們準備安全藏身之處。……5月27日……佈置一旦鎮壓發生我們的應變措施……費遠在人人大酒樓安排了對天安門廣場的緊急疏散措施；謝小慶承諾將人安排在昌平某地；畢誼民聯繫外地建立最後的藏身地；我還讓劉丹紅設計疏散後團隊成員聯絡方式和密碼。……5月31日，我決定撤出運動，同時還將劉剛和張倫從第一線撤下來休整。」（《黑手備忘錄》第122、128-129頁；封從德「八九學運的組織與『黑手』」http://www.64memo.com/b5/14344_11.htm）因此據陳子明妹妹陳子華透露，「六四」屠殺時參與聯席會議的社經所人員多不在北京市區。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他們這些行動。

【241】這時高聯在廣場的活動顯得混亂，柴玲説高聯「指揮混亂，不斷政變，兩天之內已經換過二百多位主席」雖然很誇張，但確是被廣場代表大會要求回校整頓的重要原因。見《回顧與反思》第215、224頁。

【242】柴玲記得王文得到但阻斷了一位元帥傳遞來的信息，見《回顧與反思》第230頁。

【243】最近常勁告訴我，5月19日晚是他帶著大約四五萬元回北大，且是我批準的。我對此印象已很模糊，只記得當時確有

錢轉移回北大，實際上絕食團指揮部管財務部的就是北大籌委會的同學。參見《回顧與反思》第255頁。

【244】因堅決反對撤離，一週後楊朝暉擔心指揮部推動撤離計劃，「更一度醞釀接管指揮部廣播站。」見《香港經濟日報》5月29日3版。

【245】奇怪的倒是李祿在回憶錄中說他沒有離開廣場，在凌晨一點聽到政府宣佈五點清場後就睡著了，並說那晚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顯然他不知道開希喊撤的混亂場景)。另外，李祿書中也完全沒提那個「絕對可靠的情報」。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72、175頁。據李錄修訂，他沒有離開廣場是因為本來他就打算是留在廣場上同學生們一起面對鎮壓。他不想讓大家知道他自己的計劃主要是想讓指揮部其他的同學能夠順利離開廣場保留火種。指揮部的同學們分手後他就去睡覺了，因為很累他睡得很死，等他醒來才發現一切正常，大家預見的鎮壓行動並沒有發生。

【246】這時我還不知道15日李祿提議的加入指揮部的那個條件。

【247】當時廣場主要由北高聯主導，因為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功率要大得多。

【248】那時我還不知道林昭，以及沈澤宜與林昭的故事。

【249】那個「與中央領導有直接聯繫的人」就是鄧樸方，但鄧樸方沒有直接見吾爾開希等人，而是殘聯一個韓姓副主任(應該就是何維凌，詳下)及另一位自稱代表胡啟立的人見了他們，並嚇唬了他們一通。而鄧樸方也派人找過北大籌委會，但未獲信任。柴玲當時得到的信息顯示，鄧樸方打心眼裏瞧不起這場運動，說「天還是天，地還是地」。見劉燕、梁二、柴玲、常勁和王超華的回憶，《回顧與反思》第214、229、263-265、292頁。據朱嘉明證實，開希那晚見的人就是何維凌，他與鄧樸方是大學同屋同學，當時就在鄧樸方的康華公司，但他當時更重要也更神秘的身份，是組織了一個可能有官方背景的「斡旋小組」，21日晚見吾爾開希的是他，29日晚見

包遵信的也是他，但到了30日早晨就被秘密逮捕了。據分析，逮捕何維凌可能是因為李鵬不願意學運和平結束。見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第251-255頁；《開放》1991年5月號13頁聞天翔文章、7月號25頁金鐘文章及71頁陳一諮訪談；《前哨》1991年7月號86頁文章。

【250】《香港時報》23日2版報導説，「天安門廣場反對吾爾開希要求的聲浪，連兩公里外的北京飯店也可聽到。」

【251】王超華也回憶説這句話就是她説的，見《回顧與反思》第267頁。據梁二回憶，至遲在5月17日吾爾開希便被高聯徹底解職，荒唐的是他在22日凌晨喊撤後被高聯「罷免」，外界幾乎都還以為他被「罷免」的是「北高聯主席」一職(如《明報》23日頭版、《星島日報》27日2版等等，從報導看，是吾爾開希誤導或不予澄清的結果)，而不知道這時「實際上他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梁二語)」，見《回顧與反思》第160、182、296-297頁。此後，據報導，王丹在凌晨六時帶領廣場20萬學生宣誓堅守廣場：「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我們要獻出鮮血和生命，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堅持鬥爭到底！絕不退出廣場！與市民共存亡！」然後齊唱《國際歌》，場面悲壯感人。見《香港時報》23日2版。實際上在21日下午，北高聯在廣場上主持過一次投票，32票贊成撤離，14票反對，2票棄權；但在當晚王丹又在紀念碑北側召開緊急會議，否決撤離廣場。見《中國六四真相》第584-585頁、《驚心動魄的56天》第133頁、《回顧與反思》第213頁。《70天大事記》第52頁則記該會爭論激烈「最後交『高自聯』常委會決定，不同意撤」，顯然是將王丹等同高聯常委會了；《驚心動魄的56天》將未能實施撤離決議歸因於「幕後人物的干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342頁分析了「幕後人物」，認為是陳子明、王軍濤、王丹等人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高聯組織的混亂和喪失權威也由此可見一斑。

【252】後來有人指責這次轉入地下是逃跑，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不會約定秘密聯絡方式了，我也不必去天津設立秘密電臺，更不會與柴玲分散行動。六四後逃亡，我才是和柴玲一起走的。

【253】48小時臨時指揮權的協議是王超華與張伯笠在23日凌晨三點的一個代表大會上作出的，「六十多個院校表決要求高聯交出權力」(王超華，《回顧與反思》第215頁；香港《信報》24日8版報導：69校投票，45票贊成，20票棄權；《70天大事記》第56頁記錄了當時的五點決定：1. 成立臨時指揮部，代理高聯行使兩天職權；2. 堅決不撤；3. 籌備長期穩固的廣場指揮部；4. 其他組織均告無效；5. 選舉柴玲為總指揮。) 該協議因王軍濤、王丹等人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介入而廢止，高聯從此失去廣場指揮權。王軍濤回憶說：「(23日聯席會議)會後，我立即與王丹等人去北大見北高聯，介紹會議決定。因為北高聯與絕食團有協議，北高聯撤出廣場48小時商議運動方向等大事，然後再回來重接指揮領導權。當晚，我與王丹等趕到北高聯會議時，他們仍在商議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門廣場指揮權的事項。王超華力爭能在北高聯重返天安門廣場後主導撤出天安門廣場。在王丹、吾爾開希、劉剛和王志剛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勸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見《黑手備忘錄》第125-126頁。聯席會議與臨時指揮部是在幾乎同一時間 (22日晚) 同一地點 (紀念碑上) 籌備成立的(包遵信回憶說，他是王軍濤用車接他去廣場的，陳子明已等在那兒，與會者多是社經所人員，加上學生約50多人，見《未完成的涅槃》第232-233頁)。25日凌晨，高聯作出決議正式承認指揮部，但「作為北高聯派出機構」，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11頁。臨時指揮部成立時準備在廣場堅持一到兩週，見《八九民運史》第331頁引述《平暴紀事》第101頁臨時指揮部「關於當前學運籌略的建議」。

【254】我記得柴玲當時用的是「任命」二字，巴黎會議上老木也說聯席會議「任命」了廣場指揮部、「指揮部必須聽從聯席會議的決定」，柴玲說「任命我是總指揮」，李祿則記得柴玲告訴他有一個聯席會議「由組織的形式形成授權」予指揮部。見《回顧與反思》第220、225、233頁（在275頁李祿非常質疑「任命」二字）。但在實際上，聯席會議又任命了與指揮部平行的另外一套班子，聯席會議本身則成了指揮部的參謀機構，關係非常混亂，詳細討論見5月24日正文「聯席會議和指揮部雙重架構」一節。據包遵信主導的《新聞快訊》23日第2期的說法，「會議決定，聯席會議是最高參謀機關，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為最高指揮」（《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620頁），二者關係既含混，又忽視了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存在。另外，王超華也否認高聯接受聯席會議領導，見《回顧與反思》第277頁。在其「六四口述實錄」中，王有才對聯席會議有很深刻的批評，他認為聯席會議無權任命指揮部，並認為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這些人有政治意圖，「實際上是一個自任團所，突然之間借助這個機會，想插入做領導」，他們「老是用更高、更大的組織來駕凌」，卻又躲在後面，不到學生團體中去解釋其主張和做法，結果事情永遠搞不好，且非常危險，王有才作為高聯秘書長甚至都不認識他們，因此對中共突然判了陳、王13年感到很驚訝。

【255】據報導，當時的時間順序是：二時多，三壯士污毛像；三時半，遮蔽毛像；約四時，狂風暴雨，重新掛上毛像；約四時半，雨過天晴。見《香港經濟日報》24日3版。按當時照片看，重掛毛像時天色全黑，需要強燈照明。

【256】湖南三壯士是喻東嶽（當時22歲，湖南瀏陽報社美術編輯，「六四」後被判20年徒刑，1991年冬在獄中被折磨得精神分裂，2006年才獲釋出獄）、余志堅（25歲，湖南瀏陽縣達滸鄉漣頭小學老師，無期徒刑，2001年出獄）、魯德成（26

歲，湖南瀏陽汽車運輸公司工人，16年徒刑，1998年出獄）。官方資料稱當時有4人，還有一位「湖南瀏陽官渡中學教師裕鳴飛」（《驚心動魄的56天》第141頁未記其他3人姓名；《中國六四真相》第650頁及其英文版"*Tiananmen Papers*"，第284頁註記了其他3人姓名，並稱是國安部5月23日關於廣場情況的報告），其實是誤將余志堅算作兩個人，因為余鳴飛（裕鳴飛）就是余志堅，是他「1984年從湘潭師範學院畢業後一直用的名字」，見余志堅「五二三事件真相」一文。但同為官方資料的《70天大事記》第57頁則正確記為3人，可能是《天安門文件》誤抄了《驚心動魄的56天》等資料而沿襲其中錯誤。據包遵信回憶，當時知識分子也擔心會是公安人員搗鬼，他讓甘陽寫了一篇《警惕新的「國會縱火案」》發表在北明編輯的《新聞快訊》第3期上，見《未完成的涅槃》第173頁。

8. 廣場指揮部（5.24-6.2）

5月24日 星期三 晴 晝30℃ 夜14℃

廣場指揮部成立誓師大會

上午十點，剛回到紀念碑南側，便聽到紀念碑上的高音喇叭中響起了柴玲的聲音，她正帶領廣場上的十萬學生宣誓：[257]

「為了促進民主進程；為了維護憲法尊嚴；為了保衛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顛覆；為了十一億同胞不在軍管恐怖下流血犧牲，不受法西斯專制統治；為了千百萬兒童享受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我們願意以全部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誓死保衛首都北京，誓死保衛共和國。排除萬難，鬥爭到底！排除萬難，鬥爭到底！」

兩個組織在這次「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上宣告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簡稱廣場指揮部）和「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簡稱聯席會議）。指揮部作為實際運作機構，統一指揮廣場行動；聯席會議則以社會各界對學生的支持力量，作為後援、監督和顧問。廣場指揮部的成員由絕食團指揮部的原班人馬構成，聯席會議雖號稱「首都各界」，實則由一些「黑手」私下串聯而成。

兩個組織形成兩套人馬。指揮部的構成是：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封從德、張伯笠；七人常委——前四人加郭海峰、王丹、王超華（王超華很快辭職；[258]郭海峰任秘書長；王丹很少在廣場）。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

(負責人劉蘇里)、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王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他們應該都是社經所團隊人員。[259]

聯席會議和指揮部雙重架構

這個設計存在好多問題。首先是關係不清。這兩個組織究竟是上下關係,還是平行關係?一會兒說是聯席會議「任命」了指揮部(這「任命」的合法性哪來?),一會兒又聯席會議只是指揮部的參謀機構(既是參謀機構,又為何下設五個執行部門?),總之一筆糊塗賬。另外,指揮部上設兩個聯席會議,一是社經所團隊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一是廣場學生的營地聯席會議,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指揮部到底聽誰的?5月27日關於撤離問題上的反復,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其次是雙重任命,聯席會議與指揮部的部門重複,出現兩套人馬。譬如指揮部有糾察總指揮張健,聯席會議又任命了糾察總長張倫,結果廣場上形形色色的糾察隊很難整合,更不知道誰聽誰的;而兩邊的宣傳部長,張伯笠和老木,遇到具體問題就掐起來,誰也不服誰;[260]聯席會議後勤供給部的王剛,起初也被我任命為指揮部的後勤部長,但他很多時候不在廣場,我就依托其他人來處理財務與後勤工作。參謀部我基本上沒意識到其存在,部長劉剛我沒印象在廣場上見過;而聯絡部長起甚麼作用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劉蘇里後來作了發言人。這些負責人本身可以說十分傑出,但這架構設計很不合理,部門重疊致使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掩蓋實情,責任不清。「黑手」們設計權力結構時,顯得羞羞答答。[261] 聯席會議下屬五部名單並不反映實情。五個部長我都不太認識,實際運作中也不起核心作用,核

心成員也沒將自己的大名公佈出來。五部只是運作機構，成員多不知名，沒有公信力何以「各界聯席」？核心成員不公開，也會造成責任不清的問題。[262]

最後，關鍵問題還是在於：「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是自我任命的，而不是由下而上推選的結果。這些知識分子依然有一種傾向，要「由上向下」地「領導運動」，而不是由下而上地由民眾推著前進。「聯席會議」其實是支持民主運動的一些「黑手」的用武之地。[263]

北高聯撤回北大整頓，是在疲乏而不甘心的情形中無可奈何之舉。其導火線是開希22日凌晨喊撤不得人心，根源則在這個組織於結構上的虛弱，使它既不願又不能領導廣場上的行動。絕食團指揮部人馬接管廣場，但是，北高聯高高在上的名稱卻無法避開人們對它的期望和困擾。

我決定整頓廣場財務

經過仔細考慮，我選定了自己的角色：管錢。我擔心廣場上的捐款出現嚴重混亂，成為學運的一個污點。同時又感覺到，無論在不在廣場，運動要持續下去，必須有足夠的後援。基礎組織工作既是我之所長，又不喜歡拋頭露面，更不顧及羽毛潔身自好，這個角色很適合我。[264]

其實，這時廣場上已有捐款出現混亂的跡象。有傳聞說一些學生領袖或糾察隊長開始腐化，[265]又說有些北京小青年拿個箱子到街上捐了款放到自己的腰包中。捐款的數目動輒上百萬，絕大多數落到高聯手裏，大家已十分擔心如此發展下去會出甚麼醜聞。當時的印象是高聯在理財上很混亂，一直不公佈帳目。總之，當時我對柴玲說：共產黨只須兩點便可摧毀學運形象：一是財務，一是學生領導的生活作風，這也是共產黨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的整人法寶。

大約十一點，我帶上原來絕食團廣播站的幾個糾察隊員，

去紀念碑三層東側的北高聯「財政部」接管廣場財務。出乎我的意料，高聯財政部毫無抵抗，只說「好吧，你們來管管看」，頗有不以為然的神情，似乎是說，以後有你們頭痛的。

北高聯只留下九千元

然而，我接管的幾乎只是一個爛攤子。北高聯已將絕大部分的捐款轉移走了，只剩下九千元毛票，按分和毛計算的兩大箱零錢。高聯財務本應由師大常委梁二負責，但我只見到財政部長陸明霞和一位管帳的女生。那女生張口便橫眉怒目，口氣十分衝。[266] 陸明霞則謙和得多。當時給我印象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卻搞不清為何要這樣。

除了絕大部分款項不移交，帳本和扣押的學生證也沒交給我們，無疑是個爛攤子和空架子。陸明霞交給我們兩個大紙箱毛票，起身便要返校，還說這兩箱子夠你們支持幾天。我攔住他們，當面清點，結果這兩箱足有五斤重的散錢，只有九千多一點！

捐款是給廣場同學的錢，我通過陸明霞向高聯要求：三天之內轉交帳本，至少給個副本，以使帳目前後不糊塗；扣押的學生證立即送回廣場。兩天後我們只得到了一堆學生證。由於沒有帳目記錄，同學來銷帳取走學生證時格外輕鬆，這可能使一些同學以為廣場財務有隙可乘而放縱起來。

財務統一入口和出口

要管好廣場上的財政，我感到最緊要的是統一入口和出口。於是，首先任命一位絕食團的同學作財務部長，讓他找人在紀念碑上坐陣，這裏是廣場上捐款的唯一入口和出口；然後組織一個財務糾察隊，到廣場和街道各處巡查；我則帶上另幾個糾察隊員，去廣場上其他組織巡查，取締一切其他名義的捐款，以確立廣場指揮部在財政上的領導權。

財務部設在的紀念碑上，貼上「財務部，捐款處」幾個醒目大字，提醒人們這裏是廣場的財務中心。我又讓財務部長收集所有指揮和常委的簽字，以便批錢時核對筆跡。依我的設計，捐款入口只能由財務部收取，出口則有三：一是常委批條，限二千以內；二是財務部長批條，不作限額；三是後勤部支出，每日最大，購買食品、器材等。

下午我帶了幾個糾察隊員去外高聯，想和他們的財務或後勤部長交涉。歷史博物館臺階上有一條橫幅，上書「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橫幅前有個大紙箱，寫有「捐款箱」幾個字。外高聯成立已好幾天了。我問那裏的同學，每天收到多少捐款，他們只是一絲苦笑：「今天一分錢還沒有」。這些同學並不知道我的身份和意圖，從他們樸實的神情中，我相信他們沒有隱瞞，即使誇張也差不太遠。與絕食那幾天不同，市民聲援的熱情在下降，外高聯又不在中心地帶，因此很難得到捐款。

外高聯財政部長李耕耘

見到外高聯的財政部長李耕耘，我向他解釋新成立的廣場指揮部財務部的統一廣場財務計劃。李耕耘是一個十分誠懇的外地學生。他哭窮，我相信是真的。我的著眼點是統一財政，並不想沒收捐款；相反，還答應在以後指揮部財政好轉後撥款給外高聯，只是希望他們將那隻虛設的捐款箱取消。就此，我們達成了口頭協議。

李耕耘帶我參觀了外高聯的大本營——歷史博物館下一個很大的帆布帳篷。裏面很空，有台油印機，幾個同學在印刷宣傳品。他向我介紹，外地同學的積極性十分高，他很希望指揮部能夠儘快撥款或分配幾台油印機給他們。我後來將這些要求告訴財務部長，讓他儘快滿足外高聯的要求。在帳篷裏還遇到外高聯要開會，我沒多待，回廣場去了。

到廣場北部，見天津大學帳篷前也擺了個捐款箱，同樣與他們商議，取消這樣的捐款箱，統一由指揮部收、發捐款。廣

場北部，還有「市民敢死隊」、「長白山飛虎隊」和「自由寨」等帳篷，顯得有點散漫。

傍晚，郭海峰來到指揮部找我，他急需一筆錢而財務部長不批。原來，有家公司願將一批對講機用極低價賣給學生，大概只是原價的一、二成，實際上是變相捐贈。郭海峰很喜歡現代化玩藝兒，提出要五千元，財務部當然不能支付，這時總共才有九千元。我對廣場以後的財政收入也無把握，因此請郭海峰申請二千元，但到部長那裏依然行不通，他從那裏變得出錢來呢？

連勝德的委任狀和「政變」

這天中午，外高聯主席連勝德發動了一次「政變」。我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去，發現進不了那裏的糾察線。連勝德盤腿坐在帳篷外的地上，半閉雙眼像尊羅漢，卻不時地簽發各樣的命令和「委任狀」。這種狀況沒持續多久，指揮部的糾察隊便又重新佔領廣播站，趕走了連勝德。但他的意志卻驚人地堅強，居然又坐在廣播站附近的地上，依然發著他的命令。令我驚嘆的是，居然有人聽他的！

不久他找到我，講明意圖，我才明白其中的奧妙。他對我說：「廣場指揮部不合法，不能代表廣場上的多數同學，它只是由69個學校選出。我們『廣場統一指揮部』則由300多個學校選出，我是總指揮，郭海峰和吾爾開希是副總指揮。你可以作秘書長。吾爾開希那裏有一千萬的捐款，我們可以好好大幹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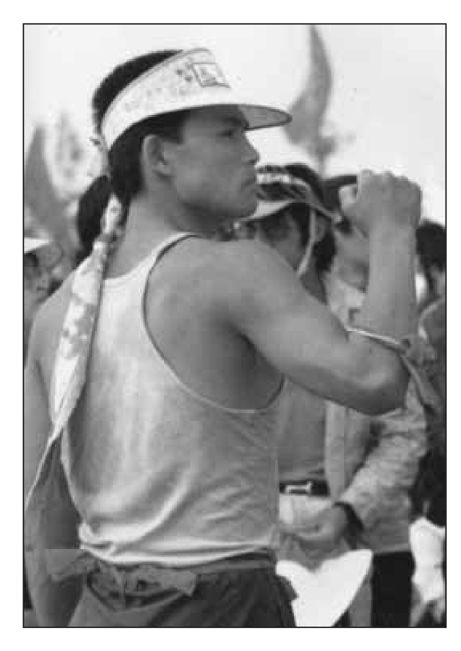
對他這番封官許願，我心裏覺得好笑，沒說出來。連勝德也有過人之處，畢竟真有一群外地同學聽他的號令，而且他還掌握了相當的糾察力量。沒探清虛實之前，我不去碰他。關於捐款，高聯財務主管梁二在兩天後的記者會上只說有98萬5千元。【267】

這天晚上，我們還真的收到一份傳單，宣佈「廣場統一指

揮部」成立、指責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非法，於是在廣播中嚴肅地駁斥，讓廣場上的同學不要相信它。這時，指揮部掌握二個廣播站，也就掌握著廣場上的指揮權。因此，廣播站成了激烈爭奪的焦點，一些諸如連勝德的外地學生以為廣場指揮部要宣佈撤離廣場，每天幾乎都有「政變」，有時一天能有好幾次，但基本未遂。【268】李祿因為鎮壓這些「政變」，得了「土匪頭子」的美稱。我也開玩笑地說：「這下我可理解鄧小平為甚麼強調『安定團結』，也理解了李鵬為甚麼頒佈戒嚴令了。」當時，指揮部既要防軍隊進城清場，又要防止學生內部的「政變」，真是兩面夾擊。【269】

海運學院特糾與張健

控制了連勝德的政變後，海運學院二十多位穿白色制服的學生，做了學運之聲廣播站的特別糾察隊。他們這身整潔的校



〔圖 50〕1989 年 5 月 24 日，張健是指揮部任命的糾察總指揮，「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連中三槍。

服很有氣勢，而他們則是連續十幾個小時站在廣播站外面，其忠實令人感動。

保衛廣播站還有一隊糾察，隊長是張健。他身穿綠上衣，帶一寬沿帽，帽沿上紮一根紅絲帶，配上他健壯的體魄，十分剽悍，異常勇敢果斷。20日戒嚴令一下，他便組織了一個「學生敢死隊」，開敢死隊的先河。我們很容易說服了他率部保衛廣播站，後來柴玲任命他作指揮部的糾察總指揮。〔圖 50〕

連勝德後來成了廣場指揮部的死對頭，經常發動各樣「政變」試圖佔領廣播站，耗費我們極大精力。有一次李祿咬著牙說要「把他放倒」，也就是暗中找人「斷他兩根肋骨」，讓他到醫院去了事，可見對他厭惡到何等程度。當然，這只是說說解氣而已。

第一次財務後勤大會

晚上，我廣播召集了「第一次財務後勤大會」，請廣場上所有與財務、後勤有關的正副負責人都來參加，以劃清各機構的權限，好統一管理。經我一下午的實地調查，這樣的機構有：指揮部財務部、絕食團財務部、後勤部、外高聯財務後勤部、北大物資站、北大供水站、紀念碑三層食品供應站、三層特別物資供應站等，還真是機構林立。

結果，真有十幾個負責人到紀念碑二層來開會。經過討論，我任命一位同學作為指揮部的財務部長；王剛為後勤部長，主管紀念碑二層的「食品供應站」；又正式確立了三層南面的「特別供應站」供應非食品物資，和廣播站、糾察隊等機構的食品；外高聯、北大物資站均與廣場財務部建立聯繫，以滿足他們的特殊需要。

這次會議確立了財務部的權威，初步劃定了各個後勤單位的關係，後勤部長的地位也得到確立。只有後勤部長可以像常委那樣直接批錢到財務部去領，其他機構一律得到財務部申請，財務部長全權審批。

5月25日 星期四 晴 晝28℃ 夜15℃

後勤部長王剛

後勤部長王剛個頭不高，精瘦而幹練，一頭長髮有點藝術家的放蕩不羈，又帶點北京人的油滑，大面龐，兩只大眼炯炯有神。除了這些印象，我完全不知他的背景。

這天上午，王剛居然聯繫來兩大卡車麵包，剛從北京某家食品廠的生產線上烘烤出來，而且還是賒賬！北京工人支持學生的一片心意顯而易見。王剛乾淨俐落地指揮人馬，將一箱箱麵包從車上搬到紀念碑二層北面。我十分滿意他的工作和幹勁。王剛希望財務部儘快還清賒帳，因為「這是我的哥們兒支持學生才批給我的，要是以後查出來了，他會吃不了兜著走！」〔圖 51〕



〔圖 51〕1989 年 5 月 25 日，後勤部長王剛賒賬從北京某食品廠運來兩大卡車麵包。這時廣場支持一天的食品供應約需四萬元。

我問王剛目前廣場支持一天的食品供應約需多少錢，他說四萬。這時，廣場上大約還有五萬以上學生，而且來來往往，流動性大，實際人數會更多，因此四萬元也就夠給每個同學發一塊麵包。加上市民送來的五花八門的食物，廣場上同學勉強充饑而已。

廣場財政吃緊

昨天廣場財務部收到的人民幣只有兩萬多，其中二萬還是中央電視臺轉送來的全國各地捐款。廣場財政入不敷出，我面臨巨大挑戰——十萬張嘴等著要吃，怎麼辦？我決心不讓學運因為錢而半途而廢。

在絕食團廣播站，我將廣場財政吃緊的具體情況，向同學和市民作了詳細匯報，著重提出幾個具體數字：一是高聯只留下九千元，希望他們能交出部分捐款；二是北京市紅十字會約有40萬元捐款沒有轉到廣場上來，這些捐款註明是給廣場學生的；三是廣場上僅食品支出一天就得4萬元，開銷龐大，入不敷出。我呼籲市民繼續到廣場財務部捐款，沒想到後來得到最大響應的卻是香港和海外。

從接收財務的第二天起，我便每晚都向外界公開財務情況。

帳篷和手提步話機

帳篷是廣場後勤另一個頭痛的事。柴玲23日一上任便四處奔走搞帳篷。昨天幾乎整天都不在廣場，許多重要而緊迫的事情要找她商量都不見人影，我有點責備她，她一下很激忿：「你知道現在廣場上甚麼最重要嗎？帳篷！」[270]

整頓廣場秩序，是廣場臨時指揮部48小時權限中一條明確的任務。沒有帳篷，便很難設立確定的行政機構，各校同學

也沒有整齊劃定的位置，廣場就顯得既零亂又繁忙，指揮部運作效率極低。

中午，郭海峰告訴我可以去何處取帳篷，我喜出望外，決定親自去一趟。他又交給我一部嶄新的手提步話機，通訊半徑達8公里。

下午三點，我按郭海峰的說明，乘車到天安門東邊一點的南池子大街口上，有一高一矮兩個同學已經等在那裏。他們按約定紮了根紅布條在臂上，打著規定的手勢。他們也有步話機，但與我的聯繫不上。

八頂軍用帳篷

高個兒操著北京口音，指揮客車開到西四一家物資部門，不一會兒，店員搬出一大堆的軍綠帆布帳篷和支撐用的鐵杆、繩子之類。堆得像個小山，卻只有八頂帳篷，足見每個有多大了。這是軍用帳篷，當時還屬於國家控制的統配物資，這家店鋪冒著風險支持學生。我們費了很大勁，將八頂笨重的帳篷塞進客車，謝過幫忙的市民，我們上車直奔廣場。

分配這八頂帳篷也費了些勁。高個兒要扣留帳篷作「糾察總部」用。他不知我的身份，這時我只得自報家門顯示權威，以阻止他扣留帳篷。經妥協，我讓卸下一頂帳篷，再將其餘七頂拉到紀念碑後勤部。糾察總隊用一頂帳篷也是合理的。

柴玲聽說來了一批軍用帳篷，非常高興，要分配給指揮部各部門作辦公地點。王剛卻另有想法：廣場同學風餐露宿，學生領袖怎麼能搞特殊化？當然，他還是給後勤部留了一個帳篷，說是作食品倉庫之用。結果，還沒來得及商討如何分配，不同學校或機構便搶走了。指揮部只得到一頂帳篷作總部用，其餘五頂都被外地學校領去作廣場營地帳篷了，好像外高聯也領了一頂。在夕陽的餘輝下，大家高高興興支起碩大的帳篷，每頂20平米，能擠下30人睡覺。

李祿主持營地聯席會議

25 日這晚，李祿大顯身手。

傍晚七點，廣場指揮部廣播召集所有高校的代表，到紀念碑二層開會，討論決定廣場去留。為這次「營地聯席會議」，指揮部重發了代表證，並在紀念碑上設了雙重糾察線，以確保代表們的合法身份，不致便衣混入。晚上九點，大會正式開始。300多名代表圍坐在紀念碑二層東北角，黑壓壓一大片。二個廣播站這一夜都停播了，只偶爾播出重要通告。【271】

柴玲首先代表指揮部，簡短說明召集這次「營地聯席會議」的緣由——營地聯席會議是廣場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各校代表須研究決定學運的戰略方向：下一步怎麼辦，是撤還是留，撤怎麼撤，留怎麼留。然後，她將話筒交給李祿，請他主持大會。張伯笠、郭海峰和我則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這次大會開了五個多小時，李祿過人的記憶力和掌控會場的能力起了關鍵作用。每個代表發言前必須自報家門，這保證了發言者很難假冒。因為廣場上各校學生的流動性，許多第一次參加大會的代表對開會規則不熟悉，搶話筒、搶發言的現象又籠罩了會場。李祿不斷重申開會紀律：舉手發言，由主持人決定發言秩序；不許打斷別人發言；發言人必須言簡意賅，「只講論點，不要論證」。李祿還告訴大家，學生組織同萬里曾積極接觸，但結果令人失望，希望大家不要對政府再抱甚麼幻想。這時，有外國記者從紀念碑欄杆後面伸了一只亮得晃眼的照明燈，準備拍攝會場錄像，當即被幾百人齊聲喝退，不敢再開燈。許多同學不願被攝進電視鏡頭當中。

我在大會上透露了北大籌委會的「空校運動」計劃，即全國高校徹底罷課，發動同學自行回家宣傳民眾，讓校園成為空地，迫使政府對學生的訴求讓步。這樣廣場大部分同學可以撤走，只留下象徵性地看守各校大旗。但代表們十分懷疑其可行性，因此這一提案沒進入表決方案中。「空校運動計劃」是下

午楊濤向我介紹的。[272]

四大方案

李祿將同學們提出的各種議案組織成四大方案，提交給大家逐步修正、補充，最後定案準備投票。這四大方案是：

甲方案：堅持廣場，主動出擊，給政府更大壓力。又分：A. 包圍中南海；B. 控制某些重要機關，如電臺；C. 再次絕食；D. 發動罷工。

乙方案：積極對話，堅守廣場，取得一定進展如取消戒嚴之後，即行撤離廣場。

丙方案：保持學運純潔性，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堅守陣地，不與政府談判，等到答覆為止，傳達民意，無論政府採取何種態度，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丁方案：維持現狀，自生自滅。不組織各校聯合行動，各校自行決定行動方向。[273]

會場辯論非常激烈。記得武漢大學的代表認為，學運已喚醒全國人民，我們應體面退出廣場。政法大學的代表當即反駁說，我們到廣場來時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條也沒有兑現；相反，政府不僅宣佈學生運動是「動亂」，而且頒發了戒嚴令，現在回去是死路一條，必然遭到進一步的鎮壓；因此目前應該和平死守，直到勝利。

四項方案充分辯論後，進行分組投票。三百代表分成四個小組，按華東、華北、華南和西南分區，讓代表回去到各校將四個方案徵求本校同學意見後分區投票。

正要投票，大約淩晨兩點半，柴玲突然發佈了一個「緊急動員令」。她說，有消息稱淩晨三點將有軍事行動，廣場全體同學必須馬上處於緊急狀態，所有同學必須服從指揮部的指揮。而在兩個小時之內，實現一些戰略部署，部分外地同學回各地發動，宣傳當地群眾，部分留下，在上午十點前完成整編，使廣場實現半軍事化。她還說，軍隊隨時可能從人民大會

堂、歷史博物館和天安門衝到廣場上來，因此我們必須作好隨時轉移的準備，向高校區轉移。具體方案十點以後再定。於是大會休會，各校代表回校組織同學，同時徵集對四點方案的意見。

崔健與搖滾樂在廣場

從紀念碑上往北看，正是上萬同學在觀看崔健的搖滾樂音樂會，氣氛之輕鬆彷彿是另一個世界。這麼強烈的反差使我明白，一切事情是否輕快美好，全看你以甚麼態度來對待。

我並不信「狼來了」的呼聲，依舊找地方睡覺去了。

5月26日　星期五　晴而多雲 晝33℃ 夜18℃

投票結果97%要堅守廣場

凌晨五點的投票結果在上午九點由柴玲在廣播中宣佈：廣場上的最高決策機關「各校代表營地聯席會議」投票確定的學運方向是——「堅守廣場，主動出擊」方案。

投票情況是：300多個高校出席會議之中代表，288校投了票：

甲方案即「堅持廣場，主動出擊」方案獲票162票，佔56%，通過。

乙方案即「積極對話，堅持廣場」方案獲80票，佔27%；

丙方案即「保持純潔，不作談判」方案獲38票，佔13%；

丁方案即「維持現狀，自生自滅」方案獲8票，佔3%。[274]

我建議責任常委制

25日中午，「廣場臨時指揮部」的48小時執政期限到期，

自然過渡為「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繼續行使廣場指揮權。這時，北高聯已無力重回廣場執政，[275]廣場上再無其他力量能取代廣場指揮部。

我建議指揮部採用「責任常委制」，七個常委各管一部分，分工合作。我認為目前的總指揮負責制，三個副總指揮沒有明確分工，似乎甚麼都可管，又甚麼都可不管，很沒效率。這個設想也因廣場運作實在太緊張，説是七人，但王丹、超華很少在指揮部，[276]郭海峰神出鬼沒，常搞些具體的單幹，因此指揮部實際上還是柴玲、李祿和我，有時加上張伯笠，作為領導核心，在實際運作中達成默契：柴玲調度全局，負責各樣機構的組織、任命與授權，並代表指揮部接待記者並與各界聯繫；李祿逐步成為廣場上的鐵腕人物，組織、控制廣場上形成的各式半軍事化力量，預防和彈壓各式「政變」；張伯笠則負責宣傳。我將自己的角色劃定為「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財務/後勤責任常委」。

財務、後勤部長的調整

這天，財務部長累垮了，精力與精神都垮了。此前，絕食團的財務部長王樹東就曾精神崩潰。廣場上不斷有陌生人來呼救，吼著要錢，又不斷傳來種種亂花錢乃至私吞捐款的報告，作為財務部長，一方面有提供資金的責任，另一方面卻因責任重大而必須留心，並説服要錢的同學削減預算——整天處於這樣的焦慮，精神很快就會崩潰。

我正發愁找誰接任，清華附中的那兩個高中生來了，我便將這份信任和責任交給了他們。興XX、雷XX是廣場上唯一的中學生部長，恐怕也是學運中唯一的中學生部長。但我任命他倆作財務部長時，全沒想到他們是中學生，正如沒因張倫、劉蘇里並非在校大學生而見外一樣。他們都參加了廣場上的絕食，同一般大學生並無區別。我完全信任他倆的誠實與純潔，兩人共同承擔這份艱苦的工作能夠分擔壓力，比任用一個人要

好。

後勤部也有變動。幹練的後勤部長幹了兩天後，也說不想幹了。許多時候找不到王剛的影子，有時他又突然說要回家。最嚴重的是有人指控他可能私吞捐款，但在沒有證據之前，我寧可不信，依然如故地任用王剛。我更願相信他是累壞了。這天晚上，由於王剛太長時間不在，我只好任命了兩個都姓王的清華同學作後勤部長；但淩晨他們告訴我，清華籌委會決定撤回校園，他們是籌委會成員，也只好向我辭職。後來王剛又回到紀念碑，繼續作他的後勤部長。

楊濤來廣場推動空校計劃

下午，北高聯主席楊濤[277]來到廣場，正好指揮部在商討下一步具體行動計劃，於是，楊濤作東租一輛出租車，請我們到車上開會。廣場上緊急事務太多，需找到安靜的地方才行。在北京飯店外面等出租車時，遇到從飯店大門出來的丁小平！我幾乎一個月沒見到這位北大籌委會的首屆召集人了。他依然是那麼激動而堅決，拉著柴玲的手說：「你們堅持留在廣場上，幹得好！我在聯絡各方面力量支持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他仍舊挎著那只破書包，說完後就匆匆地走了。

柴玲、郭海峰、張伯笠、何貴方和我，加上沈老師，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能找到的重要人物都一道，與楊濤上了一輛麵包車。我們讓司機在廣場和故宮附近隨意轉圈，開始了廣場運作的討論，很快又演化成學運戰略的討論。楊濤抽著香煙，顯得成熟老練。雖然還不滿二十，他的心理素質比實際年齡要大許多。

楊濤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學生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情緒化的運動——如絕食就是一次最成功的情緒引導——我們只能用情緒化的手段去引導學運，而不能試圖用太多的理性去控制。因此，北大籌委會建議廣場同學撤走，開展全國性的『空校運動』，這不需費很大的力氣去組織，便可對政府施加強大

的壓力——一日不答應條件，一日不返校復課。」[278]

我補充空校計劃實施方案

我對空校計劃非常感興趣，認為是個極好的戰略，與學運「新啟蒙」的目標及疲軟的現狀相適應。仔細考慮後，我還補充了一整套實施細節：[279]

「空校戰略最大的問題是，學生分散回家後的組織十分困難。我估計，大家一散，學生組織便無召號力，因為缺乏媒介。因此我考慮，若真要實施，必須在行動之前就安排好重新聚集的時間、地點和目標，且讓每一個同學都清楚而容易做到。我初步設想，我們可宣佈：在施行全國性的空校運動之後，每個星期日中午，在各大城市的市中心廣場，都舉行一次大規模集會遊行。

「這有幾方面好處：一是同學們可以定期聚攏，保持運動的熱情；二是對社會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三，對政府造成更大的威懾，逼迫它答應我們的條件——政府不可能在全國實行戒嚴，北京現在學運勢頭已衰，應將重心轉移到各地，一個廣場變成一百個廣場；四，這也是各地成立自治學聯的好機會，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建立全國自治學聯，擴充和發展學運組織，而現在就可以利用各地骨幹分子匯聚廣場的好機會，在空校之前，召集各地方與全國性學聯的籌備會議，以便日後聯絡。……」

沈老師潑了一盆涼水

有了這麼光明的前景，我們陶醉在對未來的憧憬之中。夕陽西下，暮時的陽光分外艷麗。故宮的紅牆黃瓦讓柴玲心生感動，她突然建議：「我們回北大去怎麼樣？未名湖落日的黃昏一定很美。我好久沒去了。」大家一致贊同。然後，一片寧靜。大家欣賞著窗外流動的街景。柴玲再一次喚起了大家對生

命美好的感情。

這時，一直沉默不語的沈老師，突然潑了一盆涼水：「我不贊成空校計劃，廣場絕不能撤！你們怎能想像政府會是多麼卑劣而凶殘。如果撤出廣場，離開學校，學生凝聚起來的力量立刻就會消失，政府正好利用這一時機，『關起門來打狗，堵住籠子抓雞』，而且沒人知道你是怎麼被抓、怎麼被秘密處死！現在我們在廣場上，全國和全世界都關注著我們，至少還有輿論的保護，政府不敢明目張膽地下手。總之，廣場大旗絕不能倒；一倒，全國的運動也就結束了！」

因為是學生討論戰略，此前沈老師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在我的邀請之下，他才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個人的慘痛經歷，我們大家都清楚，[280]他本人就是中共陰狠殘酷的見證。他這番話極有說服力，大家又陷入沉思之中。

李祿也反對空校計劃

北大未名湖，暮春的夕陽灑下一片金黃，在垂柳與晚風之中，波光粼粼的湖面印襯著多姿的樹影，岸邊漫步的青年成雙結對，凝重的色彩和輕盈的氣氛，宛如一幅昇平盛世的油畫。我們在三分欣賞七分感嘆中，跟著慢行的汽車靜靜地把這幅美景刻在記憶中，做好不再見它的準備。

繞了一圈未名湖，車開到 47 樓作家班所在的 3 單元前停下，大家約好半個小時再回來聚合，便分散各行其事去了。我想回籌委會看看，來到29樓門前，一眼看見一隻立式話筒，很適合在廣場上用於開記者會。這一定是從四通公司轉來的美國留學生捐的物資。我找到管後勤的蔡健，他一口答應，以示對前方的支援。

七點半，大家上車徑直奔回廣場，正遇到李祿。我們向李祿介紹了「空校運動」的構想，他立時很著急，說：怎麼能撤呢？昨天營地聯席會議不是剛決定堅守廣場的嗎？！

空校計劃並未就此擱置。後來，柴玲、楊濤和我分別在聯席會議、北高聯和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又提出過，但可惜都沒有得到熱烈的回應，最終沒有成為新的戰略部署。【281】

「王丹的叔父」．「逼宮」

廣場上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來提建議。我曾應邀到一個帳篷聽了半個小時，覺得他們的分析和建議都合情合理。我問他們：指揮部人力有限，你們能否參與運作？結果他們只願「動口不動手」。雖然這是個人選擇，但振振有辭背後的怯懦卻顯而易見。

這天，在指揮部的帳篷裏，我遇到一個古怪的老頭。他自稱「江西大學哲學系教授，王丹的叔父」，年約六十，瘦骨嶙峋，雙眼炯炯有眼，一副仙風道骨的老者之風。指揮部的一個秘書小女生在幾分無奈中將他介紹給我，好像推掉一個包袱。我搬了一張凳子請他坐，聽他的高見。

老人確有奇招。他說：「你們遊街，應該喊鄧大人萬歲才行呢！來，我教你們，起碼要做到這幾條。嗯，讓大家都舉著左手，這樣（他左手舉起，揮著拳頭），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再舉起右手，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鄧大人萬歲！萬歲！萬萬歲』然後再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他一口氣背出20條文革口號，舊詞新意，耐人尋味。我能想像，喊這類口號遊行會產生甚麼樣的效果。但指揮部實在太忙，而且這樣的事，我覺得應該是高聯或聯席會議來組織比較合適，因此我建議他去找王丹。後來我問起，王丹說根本沒有這門子親戚。【282】

另一個來獻計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個中年人。大約是深夜找

到我的。他的計策是「逼宮」，他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作法，往往是一些軍人圍住皇宮，逼迫皇帝答應請願要求。他說，現在我們可以沿用這一套做法，只須靜坐學生到中南海各個門口靜坐即可，市民也會去聲援，將中南海圍個水泄不通。中南海是國務院等機構的辦公地點，也是中國最高決策們的住處，只須將它圍住幾天，使它無法辦公或運轉不靈，便會有效果。

我估計這一行動的心理效應比實際無法辦公要大，因此在晚上的營地聯席會議上提出討論，結果不受重視，有人覺得這應是北高聯的事。

法國電話要送捐款

凌晨二點，我到歷史博物館前的北大物資站等一個法國來的電話。此前，有同學匯報，法國和西德的中國留學生募集了一大筆捐款，打電話到廣場來聯繫。我十分重視這筆捐款，因為有這麼一筆20幾萬法郎的外幣，馬上就可以改善廣場財政的拮据局面。但是，法國方面已在半小時前來過電話，與我正好錯過，我再等這電話，卻一直沒接上，以後也沒收到這筆捐款。這一晚，我一直睡在北大物資站的帳篷內，守住電話機。

5月27日 星期六 晚小陣雨 晝32℃ 夜16℃

這一天最重要的，也是最沒效率的事情，是參加「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乘地鐵參加聯席會議

上午十點過，柴玲與我、老木、張倫等人跟著劉蘇里乘地

鐵趕到社會科學院一座研究所大樓。劉蘇里是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絡腮鬍子，人高馬大，十分健壯，眼神和語氣卻很柔和，顯得和藹可親。他是聯席會議的聯絡部長，這時自然成了我們的嚮導。

快到前門地鐵站，CBS的記者Eric趕了上來，追著柴玲同她搭訕。他用他殷勤和謙卑的態度，已經同好多骨幹分子建立了近於朋友的關係。他同柴玲談到我時，很理解地說了一句：「老封是個有主意的人，他不願見記者是因為他有長遠打算。」當時使我一驚。我們同Eric解釋，今天是秘密會議，記者不便去。並向他透露了傍晚將有一個重要的記者會，他也就走開了。

我第一次參加聯席會議，確實感到些神秘。地鐵不知往甚麼方向坐了幾站，上到地面，繞過一條大街和一片廢墟，來到一幢高樓下等候安排進樓。這就是社科院了，樓下還有士兵設的崗哨檢查進出人員的證件，如北航教學樓下的崗哨一般。我也是第一次進社科院，不明白為甚麼要有軍人崗哨。

柴玲不讓連勝德進去

等候過關時，連勝德突然出現。他同每一個人搭訕，很想擠進這次秘密會議，但他的神情語氣卻顯示他不屬於這個團體。柴玲悄聲對劉蘇里說：「不能讓他進去！他參加我就不參加！」結果，十分鐘後，我們都通過了崗哨，除了連勝德。

從電梯上到很高的一層，又經過迷宮一般的曲折樓道，終於進到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寬敞會議室。會議室中央大通桌四周圍坐有十幾人，記得有包遵信、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劉蘇里、老木、張倫、邵江、梁二、柴玲和我，還有我不認識的王軍濤、甘陽、劉剛等，【283】還有工自聯等組織的代表。

這次會議從上午十一點開到下午五點過。包遵信作開場白，介紹說此會總召集人是王丹。這又使我吃了一驚。聯席會

議應是知識分子挑頭，聯繫社會各界為指揮部作後援與參謀，怎麼還讓學生來組織呢？而王丹在學生組織實際運作中並不突出，卻來承擔這麼個角色，也很奇怪，更不知道這是通過甚麼程序產生的。王丹這時並非高聯正式成員，在指揮部的職位也形同虛設，我在廣場很久都沒見到他了。【284】

原計劃堅持到6月20日

會議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討論《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包遵信將事先準備好的一份草稿逐條唸給大家聽。精英們熱心於推敲字句，在「這次學運和民運」與「這次民主運動」之間，「純粹自發」與「基本自發」之間，展開了雄辯。有人在打磕睡，我和柴玲卻急得不得了——要是在廣場上，一分鐘也是那麼珍貴啊！兩個小時還沒討論一半，大家肚子已經咕嚕叫，於是每人一個盒飯。這是我在廣場後吃到的真正像頓飯的東西。

討論到第九條時，引起了我和柴玲的注意：學者們起草的《十點聲明》建議廣場同學堅持到6月20日召開人大後才撤。【285】但是，我們卻沒想到過還要堅持那麼久，幾乎還有一個月。

指揮部建議提前撤離

針對《十點聲明》建議6月20日以後才撤，柴玲提議聽一聽指揮部的實際運作情況再定，大家表示同意。於是，柴玲介紹了廣場上的混亂局面，然後提出推行「空校運動」，也就是昨天我們與北高聯主席楊濤商量好的那套撤離計劃。王丹和開希一聽就急了，都反對「空校」，王丹馬上說「空不了」，開希則要帶人南下去爭取各地都來聲援北京。只有反對，沒見支持，與高聯主席商議的「空校計劃」既在指揮部內部也有反對，拿到聯席會議也遭到反對，看來是難以推行了。【286】

我利用這個機會發言說，廣場沒法堅持到6月20號，——

因為根本錢不夠。精英們似如夢初醒，驚異地問：不是有那麼多捐款嗎？我借機向大家匯報財政情況：捐款是不少，但絕大部分都被北高聯在23日帶回高校了，究竟多少，指揮部至今也沒交接到高聯的帳目。高聯24日只給指揮部留下九千元，每天雖有約二三萬元的市民捐款，但起初光為十幾萬廣場同學買麵包，每天就得花四萬，加上廣場外的和雜費，每天得五萬。因此這幾天的麵包都是賒賬買來的，至今還是財政赤字！大家便把目光投向梁二，他是北高聯的財務主管，就坐在我左邊。梁二申辯說：北高聯並非大家想像的那麼有錢，若按每天五萬算，絕對堅持不到6月20號。

梁二說話鼻音很重，含含糊糊地說了一通，就是不解釋為甚麼至今不移交或公佈北高聯的捐款帳目。我則堅持說，廣場捐款是給廣場同學用的，你們挪用回校園算甚麼？！我繼續施壓：鑒於廣場財政無法維持，我希望儘快撤離，否則我只好辭職。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人建議「堅持到5月30日」，我要求餘下的這三天，北高聯應當轉十五萬到廣場，梁二最終答應給十萬。【287】

劉曉波力薦開希作人民發言人

另一項引起劇烈衝突的提案，是吾爾開希想作「人民發言人」。會上，劉曉波用了近半個小時，長篇大論為何要設「人民發言人」代表整個運動，又為何得由開希來做。他的理論是，中國也需要「瓦文薩」，依靠其「英雄凝聚作用」才能形成一種「民間制衡力量」。他反覆論證說，唯有吾爾開希才最適合於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288】

然而，開希似乎並不滿足於劉曉波的贊美，又補充了一大堆理由，宣稱他如何勝任「人民發言人」。最後，他乾脆說他自己「最有個人魅力」、「知名度最高」，說如今這場全民運動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而他因為「個人魅力」而在同學中樹

立了崇高的威望，在傳播媒介中也最有知名度云云。他坐在會議桌的主席位置上，儼然已將自己看成是這場運動的象徵，成為「人民發言人」了。

大家聽了，鴉雀無聲。有的仰頭，望天花板吐煙圈。開希是怎麼回事，我太清楚了：拿到話筒前，懇切之極；拿到話筒之後，則完全可以拿組織的名義，來說他自己的話。五一四夜裏如此，五二二淩晨也是如此，他因此也早就被北高聯開除出局，只是由於傳媒，尤其是幾個香港女記者，已將開希樹為學運領袖，為不導致表面的分裂，才不好說甚麼。現在又要來覬覦整個運動的最高代表地位，對運動的潛在危害將難以估量。

我打破會場上的沉默，沉著臉說：「設立人民發言人很好，運動實在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但其人選，第一，必須具備起碼的政治素養和社會經驗；第二，既是發言人，必須具備遵守組織約束的習慣，要能對他有所制約，他也只是代表組織說話，而不是以組織名義說他自己的話。」

開希非常尷尬，針對我的二點質疑，他底氣不足地紅著臉辯白說：「雖然沒有許多在座的那麼豐富的政治素養，但我吸收力強，又有劉老師的指導；既然是大家推選出來的，自然對我有制衡力量，我也願意接受大家的監督。」

但我已有經驗，知道開希拿到話筒後與之前說的是兩碼事。我當時一定是很激動，但要是不能阻止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我簡直覺得會是對歷史的犯罪。柴玲也加入反對的行列。我們覺得這麼無謂地爭論下去，實在沒有意思，時間已是下午五點，「十點聲明」的新聞發佈會又定於七點開始，我還得去安排，於是起身退席。快到電梯時兩個人趕上來，可能是王軍濤和包遵信，【289】其中一個中年、體形稍胖的學者模樣的人，勸慰我們幾句，語氣相當理解。他說「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隨即，大家也就此散會。

安排傍晚七點的記者會

回到廣場，我先讓兩個廣播站宣佈七點鐘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的消息。不一會兒七點快到了，又找到那隻立式擴音話筒，上好電池，扛到紀念碑二層北側。這裏已坐滿了中外記者，有一二百位。我讓他們都坐到臺階上，由糾察隊隔開，話筒放到臺階下的空地上，這樣，每個記者都有合適的拍攝角度。

還差幾分鐘就七點了，這時只有我一個人站在上面，我很不自在，便急忙離開，到聯席會議聯絡處去了。聯絡處是在聯席會議上約好大家在記者會前會合的地方，位於紀念碑底層東北角的三角處搭起的棚子，沿上掛一塊紅布橫幅，醒目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聯絡處」幾個大字。棚外有一隊糾察把門。

柴玲、李祿、老木、超華和另幾個北高聯常委已經到了，[290]在棚裏東倒西歪地坐著，超華靠著牆席地而坐，用完全嘶啞了的嗓音同其他北高聯的常委商量著甚麼。開希進了棚子，見聯席會議發言人劉蘇里還沒有來，估計記者會一下子還開不起來，便說要以「個人名義去頂一陣子，記者們都很關心我的情況」，說完便出了棚子。劉蘇里七點過才到，還說發言稿還沒整理出來，我只好到紀念碑上宣佈記者會推遲到七點半開始。

記者會上宣佈 30 日撤出廣場

記者會終於在近八點時開始了。王丹首先向一百多位中外記者宣讀《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宣佈 30 日撤出廣場，然後勝利大遊行。[291]在他唸到聯席會議的簽署機構時，我十分吃驚地聽到有這麼多：北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市民聲援團、市民敢死隊。我想，至少外高聯和市民敢死隊並沒參加這



〔圖 52〕1989 年 5 月 27 日，柴玲、吾爾開希、王丹在記者會上宣佈 5 月 30 日撤離。

個聲明的討論。

記者會上，幾乎所有重要的學運骨幹都露面了，一共將近二十人。對面是上百名中外記者，背後是上千多圍觀的同學。這是舉世注目的焦點，我卻寧願扮演一個技術角色。〔圖 52〕

柴玲和超華分別介紹了指揮部和北高聯的近況。然後我介紹廣場的財政情況，將廣場財務部怎樣只從北高聯接了九千元，怎樣賒帳買麵包至今欠下一萬五千元，紅十字會怎樣扣住六十萬捐款不給學生，一一向記者作了介紹。當記者問起時，也承認財務管理上存在有待改進之處。總之，只要我知道的情況，都一五一十地向記者說個清楚，竭力將指揮部的財務公開化。我相信領導行為公開，才符合廣場同學的最大利益，才能維護學運的純正風氣，也使我們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支持。這樣地暴露問題，對北高聯既是壓力也是督促。我相信只要帳目公

開，貪腐就很難滋生。民主運作的最好策略是誠實與公開，這是我在學運中一直堅持而不斷鞏固的信念。

廣場上的自由論壇

記者會後，我去主持廣場上的「自由論壇」。昨夜聽到兩個清華同學議論，廣場上為甚麼沒有自由發言討論的地方？我於是問：咱們組織一個自由論壇如何？他們很高興，就一起商定了具體辦法。今天沒有見到他們，我只好自己幹。好在絕食團廣播站的何貴方極熱心，於是我們將廣播棚裏的話筒拉出來，又搭一張凳子，我便站高了，宣佈開始廣場上的首次自由論壇。

這時的絕食團廣播站已不重要，因為指揮部主要用學運之聲廣播站。用絕食團廣播站做「自由論壇」，就再合適不過了。自由論壇是我得意之作。見到那麼踴躍的發言，個個慷慨激昂，實在是精神的盛宴。我照著在北大主持自由論壇的經驗，對圍上來越來越厚的人牆說：

「這裏是絕食團廣播站的自由論壇節目，這裏是廣場上言論自由的陣地。自由論壇的宗旨是實踐和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自由論壇的原則是：自由發言、自己負責。」

人們實在有太多的話要講，也憋得太久了。傾刻間，十來個人擠過來要搶話筒，差點將我從凳子上擠下來。於是，我得首先控制秩序：「舉手發言，由主持人決定發言順序。不許搶話筒，不許打斷別人的發言。」幾十隻手紛紛舉起，這時柏籬外已經圍了上千人。我按舉手的先後和視舉手人的急切程度，酌情決定發言順序。頭兩個發言者講得並不好，但大家還是靜下來聽。輪換發言人時，又有些人不守規矩要搶了話筒。我堅決地要那人交出話筒，然後再將話筒交給那人，讓他發言。他講完後，也負責地將話筒還到我手中。大家開始慢慢地習慣了這套基本的程序。

自由論壇主要有三類發言，一是抽象討論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二是譴責政府行徑，三是廣場撤留。這時市民和學生對堅守廣場、堵住軍隊還有堅強的信心。這種聲音應該有偏差，因為這時在廣場的多是些頑強分子，激情澎湃。沉浸其間，我也深受感染。

有個十八九歲的外地學生給人印象很深。他剃個光頭，昂首挺胸地說：「我（他指著自己，拖長聲音），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事家，也是世界上第二位的演說家！（場面突然沉靜許多）今天下午，我，命令我手下所有的敢死隊，都躺到軍車下面去，他們碾不過來！只要我一發功，坦克也碾不過來……」這番自大狂的演說，讓人想起「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大家一陣哄笑。這老兄分不清是叫好還是哄他下臺，我上去取走話筒，對大家說：「自由論壇，自由發言。發言人有亂說的自由，但大家也有不願聽的自由！請發言人尊重大家，做到簡短、精練而說理清晰。」

我因為還有別的事，便將自由論壇交由何貴方主持，並宣佈「自由論壇」以後每天在廣場上開放兩次：中午十一點至下午一點，和晚上八點至十點。

回北大促高聯轉捐款

到北大物資站棚中打電話，聯繫高聯轉交捐款。沒人接，於是回了一趟北大。[292] 到了 29 樓，我找到梁二。這時他變卦了，說他個人無權決定將十萬元錢轉交指揮部，因為高聯目前是九名常委集體領導，須先經常委會通過才能發放。

對這番冠冕堂皇的遁詞，我簡直快氣暈了！這麼多錢，你們藏回學校幹甚麼？廣場上幾萬同學怎麼吃飯？在我的逼迫下，高聯開始派人去找常委。王超華來了，人大的常委也來了，楊濤也來了。但四名常委還是不能開會。在37樓106那間空空的會議室裏，我把住門，不許任何人離開。梁二倒在一張

桌子上睡覺。

每個常委都承認應該給廣場錢，但就是不願根據緊急情況作個特殊決議，變得非常守規矩起來。王超華似乎很同情我的理由，但又說即使常委會通過了，也無法馬上拿到錢，因為高聯捐款已分散好多人保存，有的還存到了銀行，一時半會取不到手。我一聽更有點急，擔心存到銀行的錢被政府凍結。【293】

最後，楊濤想出一套妥協方案：首先由北大籌委會為高聯代支三萬元，以解燃眉之急；高聯儘快開會撥款，再向廣場追加七萬，還北大三萬。楊濤是北大籌委會的主席，有資格作出這樣的建議，他也估計高聯常委會肯定能通過〔因為目前已有了四票〕，大家都點頭同意，然後回去睡覺。

這時已凌晨一、二點。我請楊濤同我到校外海淀的家。路上，我同他談到王超華，說很不理解她在絕食後的行為，覺得她是個無私奉獻的人，廣場上數她最辛苦，沒日沒夜地運籌著高聯的各項事務，但又覺得她對廣場運作實際上起了分化力量的作用，如另設廣播站，竭力擴大北高聯的勢力而不願與絕食團人馬溝通等等。因此，實在不知道她想幹甚麼。

楊濤只是低著頭抽煙，沉默許久，才說了一句：我也在想這點。

穿過曲折的胡同進到我們那個小院，才發現沒帶鑰匙。好在門上有塊玻璃本就壞了，用紙糊上的，這時我們只得憑此窗口，用了很狼狽的姿式，勾頭哈腰地鑽了進去。

沒有更多的精力聊甚麼，我們很快便睡著了。

5月28日 星期日 陰 晝29℃ 夜16℃

途中給張伯笠兩千元寫書

上午醒來後，見過房東郭大媽。她告訴我有個護士來過，

拿走了甚麼東西，語氣十分負責任。我告訴她有這麼個人，請她放心。

同楊濤一起回到北大，果真從籌委會取出了三萬元錢。出納是個胖胖的女同學，一絲不苟地將錢數過一遍。楊濤打趣說要我請他客。他也想到廣場去一趟，於是我們步行到黃莊出租車站去叫出租車。

與我們一道返廣場的應該有劉光，就是那個機靈的武漢同學。因為我記得，當我們在車上互相吹捧調侃時，劉光極為不滿地輕聲制止了我們的胡說八道，眼神瞟了一下司機，意思要我們注意影響，這時我們方知失言，連忙收斂起來。劉光大約對我還不放心，後來乾脆做了我的保安，成天穿一件白大褂跟著我，向我提了不少寶貴的建議，「六四」凌晨決定撤離，也是他在一旁催促我。

車到歷史博物館前時，遇到張伯笠，他說目前形勢險惡，他準備潛藏起來，寫一部關於學生運動的書，好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真正做了些甚麼。我從不勸人參加運動，以為自己沒有資格要求任何人。伯笠要寫書，我反倒認為這適合他，於是抽出兩千元塞給他，讓他放心地去寫書。這兩千元，是我接管財務後唯一一筆自作主張處理的撥款，因為擔心會散佈恐懼心理、降低同學們對指揮部的信任，就沒有告訴財務部。幾天後清帳時果然少了二千整，財務部當作幾十萬捐款帳目中的小誤差公佈了出來，連記者都認為這已經相當準確了。其實只有我心裏知道，他們管的帳一分也沒有差！這件事的處理，我自以為問心無愧。但這畢竟違背民主程序，我心裏一直覺得有愧於財務部。

黑名單與「40 本護照」

風聲依然很緊。郭海峰跑來對我說要多加小心，幾十個人的黑名單據說已經擬定，並問我是否要辦理一個護照留條退

路。他說，已經有外國使館答應協助學生骨幹隨時潛逃，並說準備了 40 本護照。[294]

我回絕了郭海峰。我很擔心外界這樣看學運：這幫傢伙只是因為考不好托福不能出國留學才這麼鬧騰，以便爭取外國人的同情。也很擔心這會敗壞風氣，動搖軍心。對外國人以這樣的方式來援助學生，我十分的懷疑；如果是真的，則很不以為然。我更擔心政府藉此大作宣傳，支持學運的民眾知道此事後一定難以接受。

實際上當時我的托福成績很高，出國留學沒問題，但因學運起來看見中國有了希望，為了這希望就一切都可以拋下。此前可能也是郭海峰，給了我一張美國大使夫人包柏漪的名片，說有困難可找她。但我從來沒有想到要用。

不過，我只是回絕，卻沒勸阻。因為我感到不應該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去要求別人，我還是堅持參與民主運動是自發自願的事。

全球華人大遊行

中午，為響應留美學生倡議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北高聯號召全市學生和市民參加，但人數比起以前少很多。大約是政府阻撓，下了通知，參加遊行就扣工資。

我騎著自行車，順著遊行隊伍到了新華門西的十字路口，這時突然想到前晚那個中年人提到的「逼宮」，便沿皇牆繞了中南海一圈，發現故宮七八道門口各安排一些學生圍住其實並不難，但怎麼讓人響應呢？學生們一直還對政府抱有幻想，既不願離開廣場，也不願與政府發生進一步的直接衝突。我沒再多想。

回廣場途中買兩支雪糕解饑渴，聽到市民議論，有的說廣場太亂，有的說政府混蛋，有的說學生該撤，但大家依然對學生抱有極大的信心，以為政府總會讓一步。

澳門東亞大學 37.5 萬港元

下午回到紀念碑財務部，有兩個澳門東亞大學來的學生要將一筆為數37.5萬港元的捐款轉來。他們同我商量，大家認為不將現金轉到廣場財務部為妥，而傾向於交給「香港物資聯絡處」。他們要我寫一紙證明，我便寫道：「得悉澳門東亞大學二位同學XXX、XXX已將捐款37.5萬港元轉交給香港物資聯絡站，以作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的物資供應所用，特此向澳門同胞致謝。 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財務、後勤責任常委封從德 1989/5/28 4:35PM」【295】

具體的用字遣詞和記錄的時間不一定精確。當時我批的任何條子都註明準確的時間，形成一種風格，以為有防範偽造的潛在功能。

柴玲準備南下發動自治

下午二點過，一個高鼻子的外國青年上到紀念碑三層找我，悄悄遞給我一張條子，是柴玲寫的，約我去前門肯塔基炸雞店見面。我感覺奇怪，也沒多想便帶著耿力趕去。肯塔基炸雞店是一家美國人經營的速食店，對一般中國百姓是很貴的地方。柴玲不到廣場上來找我，卻叫人約我來這裏，自然不是為了吃飯，我相信有甚麼重大的事，她不便在廣場的繁亂中同我商量。

到了肯塔基炸雞店，店內店外都沒見柴玲的影子。正尋視間，迎面來了一個短小傢伙，陰陽怪氣地說：「啊哈！財政大臣，你不是說沒有錢嗎？怎麼突然闊起來了？」我記起來，這是昨天死活纏著我批錢的一個學生，自稱攔軍車的糾察隊長。他沒有學生證，我當時就沒答應他的要求。現在遇到他滿嘴流油地譏刺我，他桌邊還有幾個難兄難弟，我無心理會，繼續急切地尋找柴玲。我很擔心便衣將她綁走。找不到柴玲，那個外國青年也不見了，我又回到紀念碑。

下午五點過才見到柴玲。她準備轉入地下，離開廣場南下，去發動各地「聯省自治」。本來有輛車已聯繫好了，臨時找不到我，只好放棄。她覺得廣場堅持不下去了，空校撤離方案又難推行，很多人都在覬覦廣場指揮權，於是萌生辭意，要去南方「真正地大幹一場」。她認為沿海幾省很有希望，「只有幾個有經濟實力的省份脫離中央而自治，才是對首都民主運動最有力的支持。」

在蘇公家廟家裏採訪

她拉我到長安街上，一輛麵包車等在那裏，是一個香港女記者【296】包租的。記者想到我們的小家去對我們作一次採訪。柴玲已經答應了，這同她臨行前的惜別心情相一致。家是她感情固著的地方。她根本不是政治家。

車上還有另一個人，就是幾小時前來找我的那個美國留學生，有個中文名字叫金培力。【297】他說他很不喜歡吾爾開希，覺得他肯定是在裝病。真誠在任何人的眼裏，都是基本的價值標準。他剛給柴玲作了一個錄影採訪，幾乎是她的「遺書」。

車很快就到了我們在蘇公家廟的家外面，穿過曲折的通道，進了小門，來到我們那個有大槐樹的小院。隔鄰的房客正好買了一張沙發籐椅放在院內，我們就乾脆坐在上面，讓記者拍了幾張照片，又讓她進了我們那個凌亂的「窩」拍了幾張作留念。並沒有在這裏作甚麼採訪，不到十分鐘，我們便出了來，匆匆奔回廣場。

我當時怎樣評價柴玲的計劃，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我沒有南下的打算。對她要不要南下，我大約是不支持也不反對，只是覺得廣場上還有許多事要做，指揮部剛剛接手就撒手有些說不過去，至少得向大家講清楚，辭了職再走。我也提醒她，一旦離開廣場，離開北京，可能隨時都有危險，比在廣場上危險

得多。我知道如果她真決意要走，攔是攔不住的。

廣場議會上柴玲提出辭職

柴玲聽了我的話留在廣場，在當晚「營地聯席會議」上提出辭職。這又是一個三百代表的大會，大家圍坐在紀念碑二層東北角，指揮部帳篷外的空地上。

勞累和沮喪之下，柴玲講了幾句語無倫次的話，在場代表們哄了起來。這時李祿趕緊接了話筒替她解圍。他說柴玲從絕食一開始便作了同學們的總指揮，如今累得快崩潰了，又說了幾句安定情緒的話，會場氣氛很快緩和下來。這時，柴玲找回了思路。

柴玲向幾百個同學講了她辭職的原因，身體支持不住，能力不夠，沒能將廣場秩序整頓好，希望大家選出更有能力的同學來擔當重任。她講得很生動，好幾次大家報以掌聲，全無先時那樣的反感。她又講到自己的悲哀， 指出廣場上許多不良的現象，依然得到大家的贊同：「外地來的同學，本來是說到北京聲援，現在卻要在廣場上奪權！有的同學來北京白天遊長城，晚上回廣場睡覺。你們想一想，你們到底是來幹甚麼的？！」【298】

這一番話對外地同學很有觸動，沒有人反駁她，有人勸慰她說：「柴玲，你不能走！我們願意聽到你的聲音，聽你指揮。你還做總指揮，具體的事情由我們來分擔。」面對代表們的熱忱，她苦笑了一下，甚麼也沒說，坐到邊上，再也不說甚麼了。我想她一定很感動。

楊濤提空校反成整頓總指揮

大家提了許多建議，希望改組指揮部，加強廣場上的整頓工作。有個糾察隊長說也要辭職，他說廣場上愛發號司令自封

指揮的多，通行證發得亂七八糟，令他無所適從。楊濤更代表北大籌委會，對廣場秩序提了許多不客氣的批評，建議大家撤出廣場，各回原地，發動全國性的「空校運動」，擴大運動的宣傳面。[299]

開始大家對他有點抵觸，後來乾脆選他出任「整頓廣場總指揮」。這時，他激動地說：「我低估了大家的熱情，請大家原諒，我收回原來撤離廣場的建議，從明早開始，我一定不辜負同學們的期望，將廣場整頓好。」代表們報以熱烈而信任的掌聲。

凌晨兩點半，大會決議：堅持到6月20日，在人大召開之前，不撤出廣場。[300]

5月29日　星期一　晴 晝30℃ 夜17℃

楊濤要回北大

上午再見到楊濤，我大吃一驚，他用沉靜的語調對我說：「我要回北大了！」本指望他將廣場整頓一番，我問為甚麼，他說：「沒有帳篷，我怎麼整頓廣場？昨晚說好了是有200張香港帳篷的，但到現在哪還有影子？廣場太亂了！」

我完全理解頭天晚上雄心勃勃，第二天一早起來冷了一截，是怎樣一種心理過程。一些基本環節上的脫序，不知耽誤了多少事，打擊了多少人的熱情。我知道，楊濤對廣場再也不會有興趣了——他本來就是抱著消極態度到廣場上來的。[301]

張智勇搭建小帳篷

然而這一天，在紀念碑和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確實新架設了幾十頂鮮艷整潔的小帳篷。這是張智勇的功勞。昨天下

午，他到指揮部來領命，要求與香港人聯繫並指揮糾察隊員清理場地搭設帳篷。我記得他那副懇切的眼神，似乎在說：雖然以前在籌委會我不受大家信任，現在我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的動機和熱情。這是一件具體而費力的任務，我自然覺得他不妨一試。經我推薦，柴玲在廣播站宣佈了對他的任命。當我見到五顏六色的旅行帳篷整齊地排成很有氣勢的方陣時，很為張智勇高興。〔圖 53〕

這些帳篷從香港運來，每頂有五六米平方，能睡上八個人。

港人到廣場，不僅帶來帳篷，還有許多其他物資，還有錢。他們發現一個問題——不知道該將捐款交給誰。他們只知道幾個出了名的學生，到了廣場後，非當面見這幾個人，有了他們的簽名也願意轉交捐款，但吾爾開希、王丹甚至柴玲並不容易在指揮部找到，財務部更沒他們的影子。我只好去找王丹和柴玲給我寫一張「信任書」，好讓我在財務部有權以他們的名義接受捐款。這實在是個難受的事情，我感到也很滑稽。



〔圖 53〕1989 年 5 月 29 日，從香港運來的帳篷整潔地架設在紀念碑和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

記得找王丹的過程中，進到廣場西部的北大場地，一個簡易棚子，很寬敞，能容十幾人。一地的被子，有的還在睡覺，而且裏頭竟有一對夫妻！不過我到時，男生已起身，守在妻子邊上，看著她酣酣地睡。廣場上突擊戀愛我早有耳聞，甚至傳說有不少對「露水夫妻」，沒想到北大棚子裏更是毫不顧忌。

棚裏還有一個廣播系統擱置沒用，幾個高音喇叭堆在一角。陳育國老師在那裏，我同他聊了一會。我建議他們在廣場西部也建一個自由論壇，省得閑著沒事，也能發揮北大的水平。這時北大在廣場上靜坐的同學，不超過二百人，更多的是作各種的糾察隊或組織宣傳工作，還不計去堵軍車的。

潘毅與香港物資聯絡站

快到中午時，兩個中學生財務部長突然提出要辭職，要我中午就找人來接手。我很驚訝，我非常信任他倆，卻沒想到這時要失去兩隻膀臂。原來，雖然大學生都「停課鬧革命」，但中學生卻並沒有罷課，他們待在廣場已經好幾天，而他們又是功課最緊張的高二學生。我不能要求他們留在廣場，就請他們堅持到今晚十二點。幾天的經驗，使我摸清了廣場財務的要點，這下子正好促使我下決心重建廣場財務制度。

下午，後勤部長王剛來向我抱怨：香港運來了大批物資，但對廣場後勤部不信任，在廣場東北角另設一塊專用場地，並另找了一批外地同學作那個物資聯絡站的學生方面負責人。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不光是廣場指揮部的權威的問題。港人這麼做是因為不瞭解情況，只看到廣場表面的混亂，卻不知道這樣做會給廣場上的後勤供應帶來進一步的混亂——以後再有物資來，送到哪裏？有兩個物資供應系統，怎麼保證分配均衡？

於是，我急忙趕到廣場東北角。只見一堆物資和三四項小帳篷，周圍用尼龍線圍了一個30平米的場地，靠在廣場東面的

鐵欄杆上梆了兩根竹杆，竹杆間拉起了一幅長約五米的橫幅，寫有「香港支援大陸民運物資聯絡站」。因為剛剛設立，物資並不多，主要是200頂旅行帳篷、衛生清潔用品和藥物。聯絡站的負責人叫孫長慶，是東北來的學生。〔圖 54〕

半小時後，香港方面的負責人也來了，三四個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個女孩，叫潘毅，性格氣質正如她名字一樣，透出一股堅韌不拔的豪氣。她個子不高，跟柴玲差不多，嬌小羸弱，也披一頭短髮，戴著一副小白框眼鏡。她說話行動非常果斷爽快，我同他們很快便達成了共識：香港物資聯絡站有必要以獨立形式在廣場上存在，但是供應的物資首先要通過廣場後勤部，以便統一分配。他們並且答應，以後廣場上的食品供應，由他們負責撥用專款和採購，廣場指揮部只需組織人馬接收和分配即可。這給廣場承擔了最大的經濟負擔，從此廣場財務部開銷銳減。這時廣場上的同學人數也以每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銳減。



〔圖 54〕1989 年 5 月 29 日，香港支援大陸民運物資聯絡站為廣場學生提供麵包、帳篷、衛生清潔用品和藥物。

民主女神遇到財政赤字

下午六點，中央美術學院的趙少若來財務部找我。幾天前他已來過一次，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副期盼的眼神。那時他申請幾千元錢，說八大藝術學院校準備聯合塑一個「民主女神」石膏像立在廣場上。當時恰逢財政赤字，我沒批或只批了很少一點。他那副不被理解的沮喪神情給我印象很深，但他並不糾纏，這很少見，使我對他的氣質有些感動，也有點慚愧。大約這也是我逼北高聯交錢那麼不講情面的一個原因。我不清楚他們後來怎麼籌措到錢，又籌措了多少。

這次趙少若來並不是為錢。他說「民主女神」像已經塑好，要運到廣場上來安裝，需要一些鋼管作手腳架。紀念碑二層的食品供應站正好有些鋼管，是一個軍用帳篷不齊全而堆在那裏的。我很爽快地寫一張條，讓他去那裏取。見他高興的樣子，我的內疚也減輕許多。

記者會介紹財政情況

傍晚的記者會，我向在場的上百名中外記者介紹了廣場上的財政情況：從24日中午至28日中午，我們共收到捐款105,384元人民幣，1000日元，540美元，5000多元外匯券。另外，北高聯答應轉來10萬元捐款，其中3萬到帳；由於沒有銀行帳號，下午有香港社團送來15萬港元的捐款還未入帳。我們本來打算利用一些同情者的公司或私人帳號，但恐怕政府凍結而沒實行。[302]〔圖 55〕

由於許多捐款人只認幾個有名的學生領袖，也帶來不便。於是我在記者會上竭力說明我財政主管的身份，並出示了會前王丹和柴玲為我寫的「信任書」。李祿帶著一副無奈的笑容向記者們唸信任書，我在一旁不露表情地站著，右手護著財務夾子，儘量顯出無所謂的神情。只要能使捐款轉到廣場上來，個



〔圖 55〕1989 年 5 月 29 日，封從德在向中外記者介紹廣場上的財政情況，呼籲外界不要捐現金，而是直接向香港物資站提供物資。

人的一點榮辱、可能帶給世人的猜忌，都只能拋之腦後了。我既然選定了這一角色，就必須做好，並承擔這角色所要求的一切。這是我的責任。【303】

有記者問，廣場財務是否存在貪污現象，我承認有此跡象，指揮部也得到投訴，但目前還沒有力量組織深入的調查，因此至今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說明這一問題。我的回答一定使記者們感到十分驚訝，大家都沒想到我會這麼坦率地承認。我始終認為，行政儘量透明是最好的策略。為了將這個問題講清楚，我詳細說明了幾點：

第一，指揮部和「營地聯席會議」下了決心要整頓廣場。目前廣場上多是外地同學，各個糾察隊各自為陣，山頭主義嚴重，使廣場上一切管理陷入了混亂，包括財務。【304】

第二，有虛報人數的情況發生，也有個別私吞捐款的跡象。當時耳聞最多的問題有三（當然我沒點名細說）：一，幾天前北高聯還在廣場時，大家發現高聯財政部出納女生突然買了金首飾，追問下才承認和一男生串通私吞了一筆捐款，數目不詳；二，好幾個同學疑心後勤部長虛報了購買麵包等食品的

費用；三，郭海峰將捐款的小數點向前移一位，十幾萬變為一萬多，被追查時他解釋說純屬筆誤。

第三，我通過記者再次呼籲：最好捐物資而不是現金，交給「香港物資聯絡站」或北大物資站。因為現金需要一套完善的財務制度和人馬才能管理好，目前廣場不具備此條件，現金易於滋生貪污現象，而物資則很難貪污；其次，廣場得到捐款後，外匯還得先兑換，還得再組織人力採購，不如直接捐贈廣場上需要的物資來得便捷，而捐款留給北高聯或大陸各地的運動為妥。

最後，我向記者們宣佈，針對廣場上這些財務問題，今晚將召開廣場上的「第三次財務後勤大會」，我初步考慮在財務部設立三個小組，即捐款、出納和監督小組。我向記者們承認，由於我本人沒有管理財務的經驗和專門知識，在5月24日接管廣場財務時，沒能同時設立一套督察機構來監督廣場上財務的運作情況，是我的錯誤和失職。

召集財務後勤大會

晚上十點，我在絕食團廣播站播出一個通知：

「廣場上的同學請注意，廣場上的同學請注意。為了整頓廣場上的財務秩序，保證廣場上的捐款得到合理的利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將於今晚十點半，在紀念碑二層東北角召開第三次財務後勤大會，希望所有關心廣場財務，願意到財務部貢獻力量的同學參加。我們希望參加者具備如下條件：第一，神經堅強，有極強的説服能力；第二，具有獻身精神，能夠在廣場上長期堅持下去；第三，具有一定的財務經驗和財會知識。請同學們注意：廣場財務部是一個摧殘人性的地方，必須具有堅強的神經。開會時間：今晚十點半。地點：紀念碑二層東北角。歡迎一切具備上述條件的同學參加。會議召集人：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財務後勤責任常委封從德。」

在通知中，我特別強調需要「神經堅強」、管錢「摧殘人性」。這是經驗之談。如果算上絕食時期，指揮部的財務部長已經有二人精神崩潰而辭職，今天的兩個財務部長也要辭職。管錢不僅需要耐心和細心算清帳目，更要有耐心審查申請，費盡全力去說服精力過剩又急等錢用的同學，口才必須很好。還得時刻擔憂支出去的現金是否給對了人，而那人你根本不認識，責任巨大時間緊迫又難以考察，很快就會神經衰弱。而且，在這裏工作無名無利，沒有獻身精神很難幹下去。由於昨晚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已經決定堅守廣場到6月20日，因此要求「能夠在廣場上長期堅持下去」，以免行政班底老是換人。因此播出這個通知時，我故意用了一種略帶誇張的語氣將這些條件老實告訴給大家，心想只要有幾個人來接替與XX他們，便很滿意了。

沒想到，十點半我到紀念碑二層時，發現來了20多個同學應徵。我的徵召廣告，可能正好契合同學們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也呼應了同學們希望為這場歷史意義重大的運動，做點甚麼光榮、平凡事情的心理，才來了這麼多人來響應。

完善財務制度選舉財務部長

按直覺，我一手建立了這個新生組織的結構，將其完善和適應廣場情況。從這一經驗中我體會到，只要憑著自己不偏不倚的公正判斷，就能將事情辦好。我是這樣構造新的財務部：

第一步，討論財金制度，通過討論顯示各人的水平。我向大家介紹成立新財務部的目的，即完善廣場財務管理，杜絕貪腐現象，使支持民主運動的捐款能合理利用。然後，我向大家唸了下午趕著起草的一份「廣場財務部財金制度」草案，除堅持「統一入口，統一出口」，還確立了「定期公佈帳目」的原則，實現財政透明化。這兩條以前也有。

「財金制度」草案的新內容是：採用部長負責制，部長擁

有批准與否決的權力，指揮部常委的批條須經部長認可方能通過；同時，為制衡部長的權力，財務部分三個小組，即募捐小組、出納小組和監督小組，部長只能指導前二個小組的工作，而監督小組則具有財務方面最高的監督與否決權力，不受部長領導，可以調查廣場同學任何人的財務使用情況，甚至可否決部長乃至總指揮的任何財務方面的決定。

我下午琢磨了兩個小時的這一套「財金制度」，得到了在場同學的認可與讚揚。有個女同學站起來說：「你並不是對財務一竅不通嘛，這套財金制度既簡單又抓住了重點。」不過，她還是補充了幾點意見，經大家商議，最後，我們確定了三個小組的名稱應該是：捐款小組、財務小組和督察小組。

這個女同學叫姚曉燕，武漢來的，中南財經大學財會系學生。經她解釋，我才明白所謂「出納」是兩方面，一個管出，一個管進；另外，出納與會計應是死對頭，絕不能一人兼任，否則只須在一進一出的帳目上同時作手腳，便可私吞而不留痕跡。這樣的角色也最好不在一個小組裏，以防串通合吞。不過，為方便起見，我們還是將二者合到「財務小組」中。

第二步，選舉財務部長。發言前需報上姓名、學校和專業，簡要介紹自己在財會方面的實際經驗。大家根據前面發言的水平，最後投票選舉。結果，姚曉燕當選財務部長。

討論發言時，女生比男生更顯本領。我記得還有一個中央財經學院的女生叫王紅，也很出眾，但說話有點急，有些名校優越感，結果敗給姚曉燕，還有點不服氣。姚曉燕的和善可親與認真負責的態度，可能是大家選她的主要原因。

建立三個小組「財務糾察隊」

第三步，建立三個小組。根據興趣與自願，大家分別報名參加三個小組，然後每組分開討論本組具體行動方案，根據發言水平，選出三個組長。捐款組針對如何與各方聯繫，儘量迅

速取得各地來的捐款；財務小組針對如何理清帳目，製訂一套簡便可行的出納制度；督察小組針對怎樣確保統一入口統一出口，監督追蹤開支的使用情況，以防止和查處任何貪腐行為。

三個小組的討論選舉結果是：捐款組設立了二位「名譽受款人」，請王丹與柴玲擔任，他們也參加督察組的的工作。【305】王紅當選財務組長，管出納，而由部長姚曉燕兼任會計。這兩個稍有不和的女同學分擔這兩個重要的角色，顯出這個小組同學的良苦用心。督察組人數最多，十幾個同學組成「財務糾察隊」，他們本就對廣場財務不放心，為維護學運的純潔才來的，督察組長叫郝建江，是一個結實的北方男同學。

根據大家討論認同的「財金制度」，各組組員對組長負責，組長對部長負責，部長對財務/後勤責任常委負責。督察組長直接向財務/後勤責任常委匯報工作，有相當大的權限，可干預任何人的經濟問題。關於出納制度，我提出指揮部七個常委及二個物資站長有權批條要求取錢，但規定上限為一千，且須部長審批並受督察組監督，部長可批二千以內的現金，再高則需常委會通過決定。

組長選出後，我便讓姚曉燕開始工作，主持一個短暫的組長會議，協調好各組之間的工作，同時商量一下今晚怎樣具體接管上屆財務部的工作。具體問題我不參與，我只是要求姚曉燕向我匯報工作。

這天晚上，我介紹她與興XX認識，使他們好交接工作。交接工作在十二點之前準時完成。這時，我已經睡覺去了。

5月30日 星期二 晴 晝32℃ 夜17℃

女神像與規劃圖

早晨，趁一段清閑，到廣場北部去看「民主女神」像。上



〔圖 56〕1989 年 5 月 30 日，民主女神像面對毛像，象徵著民主與專制的對峙。

萬市民被女神像吸引圍觀，廣場又增添了熱鬧氣氛。這座7米高的石膏塑像有如此魅力，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意識到藝術的價值，從此以後，我吩咐財務部，只要是各大藝術院校申請款項，都儘量滿足。〔圖 56〕

剛回到指揮部，同柴玲李祿正商量如何整頓廣場，郭海峰捧著一張「營地帳篷整頓規劃圖」顛顛地跑進來，同我們介紹他的整頓計劃和已取得的進展。柴玲當即任命他為「營地整頓總指揮」，並在廣播中宣佈，讓糾察隊都聽從他的指揮，協助他在紀念碑北側清理出八個方形區域，以便架設新到的簡易帳篷。

記者會上介紹新財務部

上午，指揮部又在紀念碑北側臺階上，召開一個中外記者

會。李祿代表指揮部說「現在局面已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學運發展處於一種非常悲哀的境地。我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對話的資格。我們希望恢復對話，但政府必須答應四點：一，撤銷戒嚴令；二，撤回軍隊；三，保證不秋後算帳；四，實現新聞自由，公開報導。只有政府答應以上要求，我們才與政府對話。今後，我們仍堅守廣場，進行各種和平形式的鬥爭，同時發動更廣大的同學參加到這場運動中來。」【306】

我則向記者們介紹了新財務部，講了昨晚財務後勤大會的情況，重點強調督察組的作用和新的財務制度。我強調廣場上只有一個捐款處即財務部，提出私吞捐款的行為將提交以後的「廣場法庭」審判！廣場就是一個共和國的雛形，這時我確實感到了成立法庭的必要。

另外，廣場財務部不負責同學們返校的車旅費，不為個人欠帳還債，除炊食以外不負責個人的生活費；這些規定都針對近日許多外地同學回去前，總到財務部來要路費的情況。

然後我請姚曉燕和王紅介紹目前財務情況。她們說，目前結餘六萬多人民幣，由於麵包等飲食由物資處直接提供不必從財務部支出，加財務部力行節流，今日僅支出四千多元，是戒嚴後廣場開支最少的一天。另外我又告訴記者：據悉郵局也有60萬人民幣的捐款，因為沒有帳號而無法收到；紅十字會的60萬港幣的捐款至今未轉到廣場上來。【307】

姚曉燕得到母親的支持

中午我到財務部，姚曉燕對我講她母親來了，要領她回家。她母親得知女兒上北京來參加學運，擔心地趕來，沒想到自己的孩子竟做了廣場上的財務部長，就更擔心了。我有點著急了，剛選出個部長又出這種事。姚曉燕似乎在逗我，笑著對我說，她已經說通了她母親，讓她留在廣場上為同學們服務。不一會兒她母親果然來了，為她買了一種人造毛的大衣以便晚

上禦寒。

姚曉燕的母親講了幾句話令我非常感動。她說，剛一聽到女兒作了部長，很不放心，怕以後被政府秋後算帳；但到了財務部，見到同學們都這麼熱忱，見她女兒將財務部管得井井有條，加上這兩天在廣場上所見所聞受到了感動，她願將女兒「獻」出來，為學生運動出力。她並不掩飾對自己孩子的驕傲，說她女兒從小就有條理，她和她老伴都是搞財會工作的，女兒唸的又是大學的財會系，因此她認為女兒在廣場上是有能力將錢管好的。最後她拉著我的手說，她馬上就要乘火車回家了，見到有這樣一班同學組成的財務部，她很放心；又說，將女兒交給了我，交給廣場，希望我能夠照管好她——彷彿我是她們的親人一般。這樣的信任，令我大為感動。

新財務部的效力

新財務部的效力很快顯現出來，特別是督察組。馬少方是少數幾個與廣場指揮部保持良好關係的北高聯常委。【308】28日我聽到他在廣場上的自由論壇演講很有水平。上午他找到我，說有意組團南下，在南方宣傳和發動民主運動，請我批給他五千元人民幣。經過一番討論，我批給他三千元，馬少方很高興地到財務部支領。但是，不一會兒又來找我，說被財務部長和督察組否決了，很是失望，要求我利用自己的權威幫他成行。最後還是沒給他撥款，因為財務部長和督察組認為這不是廣場財務部應該負責的範圍——這樣的活動應該由北高聯這樣的組織來支持才合理，而高聯正有大筆的捐款。

我一方面礙於面子，因未能給馬少方批錢而感到慚愧；另一方面對財務部履行權責而由衷地高興——這是真正的權力制衡在發揮效力，有了這樣的制衡機制，證明講面子的中國人再也不必唯上司之命是從，當時內心真是歡愉，從這一點上看到了我們中國未來的希望。



〔圖 57〕1989 年 5 月 30 日，香港支聯會代表岑建勛與柴玲、李祿和封從德（由左至右）在絕食團廣播站帳篷外見面。

東亞大學的幾個同學得到我的感謝信後，還希望拍一張指揮人員的照片作紀念和證明。正好，柴玲、李祿也在紀念碑三層，我們三個便高高興興地拍了一張照片。我穿的那件白襯上，有許多同學的名字——我記不住那麼多同學的名字，上面少數是簽名，多數是我自己寫的，因此許多名字都是倒著的。

岑建勛帶來香港捐款

深夜一點過來了兩個香港人，岑建勛和李偉傑，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代表。柴玲、李祿同我都去同他們見了面，是在絕食團廣播站西邊的幾個小帳篷外。〔圖 57〕

岑建勛一頭的捲毛，頭頂有點禿，眼睛大而圓，面龐也大而圓，說話動作熱切，滑稽如一頑童。他費了好半天勁，才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這幾個字用廣東音濃重的普通話抖出來。他是香港的影視紅星，剛剛主持了有上百萬港人參加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式的募捐演唱會，幾乎所有香港娛樂界的紅星和一些台灣歌星，包括鄧麗君、梅蘭

芳、成龍以及侯德健，都參加了義演。他說，本打算募捐一千萬港元，結果竟募得二千六百萬！【309】這對我來說更是一個喜訊，我知道，以後學運再也不用為錢發愁了。我們在小帳篷前面合了一個影。

整頓廣場會議

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的棚子裏，指揮部開了一個整頓廣場具體措施的會議。有幾個香港同學參加，其中也有潘毅。他們是代表「香港物資聯絡站」來詢問我們需要何等物資，他們好組織募捐和採購，結果我們開列了一個清單，如一千把掃帚、多少垃圾袋、對講機、話筒之類。

討論到架設帳篷，我說郭海峰作為營地整頓總指揮，還在積極組織。幾個香港同學大不以為然，說真正搭帳篷時，他便沒影子了，那張帳篷設置的規劃圖還是他們畫的，郭海峰只是熱衷於帶著這張圖去向記者們炫耀，言詞間頗為不屑。

討論到整頓紀念碑，我躍躍欲試，對於這麼久都沒能將廣場上的組織機構安頓好，我很不滿意，相信辦到並不那麼難。這時我已經感受到將各種機構安置在固定地點的重要性。流動造成混亂，辦事找不到管事的人。糾察隊的層層關卡和五花八門的通行證，已成為一種障礙，使指揮部與大眾隔絕，給人新官僚的形象，嚴重危害了同學們對指揮部的信心。

我的辦法是：將紀念碑上的空間騰空，作為指揮部各部門的固定辦公點；取消通行證，換用工作證。我計劃用一百個糾察隊員，在明日清晨先用尼龍線將紀念碑圍起來，暫時只許人出不許人進，將紀念碑騰空，然後迅速安置好各個部門的帳篷，不許其他人上紀念碑安營紮寨。隨後宣佈取消通行證，換用工作證。這時各色通行證已經意義不大卻礙手礙腳，換用工作證，普通同學只須用學生證便能進出一般的關卡，除非各部門要召開內部會議等，才檢查工作證。我考慮，工作證應該由

各部部長發放，且每天更換，以隨時清點當時的人數並保證不被人假冒。

取消通行證換用工作證

因此，我對大家說：只要明天清晨七點給我準備一百名糾察隊員、二百張工作證和一捲尼龍繩，我便能將紀念碑上的秩序清理好；之後進一步整頓廣場，在剩餘同學中選拔二千人組成半軍事化編制留在廣場上，其餘都離開廣場回家去。【310】

李祿答應幫我聯繫糾察隊；印製工作證的任務交給北大的一個博士生，他是李祿近日竭力推薦的；尼龍繩我請香港同學準備。安排完了之後，大家便散會，各自準備去了。

那個博士生我不熟悉，不清楚他的能力。他沉默寡語的樣子使我想起王遲英。我決定自己也去準備工作證，便到絕食團廣播站南側的《絕食快訊》編輯部的棚子裏去，請他們幫忙印刷。

《絕食快訊》的總編輯也是個北大的研究生，幾天前我到這裏來找地方睡覺，見到他乾脆麻利的工作作風，非常欣賞。當時，他將第二天要出的一期《絕食快訊》的大小事項非常明確地對同學逐個安排任務，然後宣佈解散，讓大家回去睡覺，約好第二天下午再將各人的工作拿回來匯總；他安排完後，自己也回城裏的家中洗澡睡覺去了，一副非常幹練的樣子。因此，我很放心地將印製工作證的任務交給這個總編，自己就在棚裏睡去。

5月31日 星期三 陰 晚有雷陣雨 晝28℃ 夜17℃

沒能實施整頓計劃

清晨整頓紀念碑的計劃，沒能實施。六點半我到學運之聲

廣播站時，廣場上絕大部分同學還在睡覺，我等著糾察隊的到來，和工作證與尼龍繩。七點過一點，那個博士生將工作證送了來，證實李祿的眼力不差，他確實是個實幹的人。但糾察隊過了半小時才來，是墨軒帶來的「工人敢死隊」的 20 個人。

20個人力量不夠。一股強烈的無力感襲上心頭，精力和意志突然有一種衰竭的感覺，覺得自己再無力氣去實施昨晚的計劃了——身邊沒有清楚我的意圖的人協助，聲帶啞了，無力向糾察隊員們交待我的意圖，也無力一個一個地說服紀念碑上各部門和學校的同學聽從我的意圖。終於，我放棄了原計劃，只是請墨軒將20名敢死隊員帶好，將紀念碑三層守住。還有一點做到了，那就是在廣播中宣佈取消通行證，撤銷許多糾察線。

這個問題是我沒處理好，實際上有些越權。我只是一時的意氣，不滿廣場的凌亂，便在不清楚廣場的各部門設置，特別是摸不清紛亂的糾察系統的情況下，貿然挑頭站出來清理廣場上的組織秩序，產生孤立無助的感覺便是自然的。

因此，我在指揮部中再次建議採用「責任常委制」，七個常委各負一方面的責任，大家分工合作。只由幾個指揮來處理具體事務，分工既不明確，人手也不夠——這時對廣場秩序的實際處理，只有李祿、柴玲和我三個人。七個常委中，除我們三個以外，郭海峰愛搞單幹，沒有明確的角色，幹一些零星的工作；張伯笠說是分管宣傳，常常不見人影，這兩天又躲起來了；王丹忙於四處見記者，在指揮部中純屬虛職；王超華更不在廣場，設在北大的高聯才是她發揮影響力的地方。【311】

整頓廣場糾察力量的困難

對廣場糾察隊系統我也很不滿意，一直想整頓卻力不從心。指揮部成立時任命的糾察總長張倫，三天後就卸任，可能是因為工作緊張而胃病發作。【312】我記得在紀念碑上見到他最後一句話是：「我實在不是做糾察總長的材料！我本來只想給

指揮部做參謀。」這麼一個大個子也經不起幾天的折騰，可見統協各路糾察多麼不易。後來，好像出現了好幾個糾察、敢死隊的「總指揮」。[313] 真正在這方面用心用力的是李祿，但他只是用副總指揮的名義去協調各路人馬，暗中將那些素質不錯的「軍事人材」糾合起來，緊急時候拉出一隊人馬來應付種種「政變」而已。

我曾有心出馬整頓糾察隊，將廣場作半軍事化的編制。但一方面財務與後勤的事情本身既重要又繁雜，抽不出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我也不夠那股「豪氣」使各路英雄都佩服的力量。現在財政狀況剛有好轉，我剛一試便知難而退了。廣場上紛亂的事務使我們沒有精力專心於整頓組織結構。

媒體中運動的名實脫節

媒體因為對學運組織內部情況不瞭解，導致運動的名相與實情嚴重脫節。當你致力於兼顧紛繁事務和組織建設時，你發現那些報導學生運動的媒體所發出「學生領袖」的聲音，與廣場上的現實差上十萬八千里。好在這些媒體都還在千里之外，對北京和廣場上的同學影響不大，否則，一定會使廣場上的指揮系統更為混亂。

對媒體的關注，是到廣場之後我們從港人帶來的報紙開始的。這時我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知道必須宣揚我們的主張，否則在實際的運作中將因全國種種誤解而使我們陷入被動。比如捐款，若港台華人還分不清楚廣場指揮部與北高聯的區別，以為是後者的下屬，大量的捐款和物資還是到不了廣場來。

因此，指揮部我們三個後來逐漸在實幹中形成了較明確分工：柴玲作為總指揮，一方面通過媒體宣揚指揮部的形象和政策，一方面起任命各種幹部的作用；李祿主管情報、聯絡和廣場秩序，兼內務與外交；我則依然主管財務與後勤，有時也兼

管兩個廣播站的宣傳工作。

在北京飯店接受香港捐款

下午兩點，柴玲、李祿同我一道去北京飯店，與香港人商討接受捐款等事宜。岑建勛依然那麼熱情洋溢，見到我們三人髒兮兮的樣子，劈頭便說：「你們先洗過澡再說！」我們確實都好久沒洗澡了，廣場上甚至洗臉都難。岑建勛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一疊錢，遞給身邊的一個年輕記者，請他為我和李祿各買一套內、外衣褲，還對另幾個港人打趣地表白說：「這可是我自己掏錢幫他們買衣服，並沒有貪污捐款啊！」柴玲在同金培力作錄像那天已經換過合身乾淨的衣服。

我第一次到北京飯店，第一次領略裏面的豪華，進而對廣場上的權力鬥爭有了新的一層擔憂——我聽柴玲說，李祿告訴她政府在收買外高聯的人，為他們在北京飯店包租了幾個房間；也到過指揮部試圖收買他。【314】

洗完澡，同岑建勛他們商議怎麼處置這筆龐大的捐款。我先介紹了廣場上的情況，然後，堅持對東亞大學捐款所提方案：暫不要送現款到廣場，目前廣場上同學已經不多，而食品與一些物資的供應，已經有「香港物資聯絡站」提供，廣場財政部花不了多少錢，而且還有六萬元人民幣可以維持一段時間。【315】

但我還是接受了兩筆錢，即香港華益公司的職工集體捐獻的一萬港元和送這筆錢來的先生私人捐的一萬元港幣。有兩個香港記者和一個 NBC 的記者在我接受捐款時拍了照。柴玲則就岑建勛的請求，寫了句感謝香港民眾對大陸民運的支持的話。

每日財務公報

下午六點，我到財務部檢查工作，聽取財務部長的匯報。



〔圖 58〕1989 年 5 月 31 日，廣場指揮部貼在紀念碑上的「每日財務通報」和「財金制度」。

財務部負責起草「每日財務公報」的同學叫趙雨。當我向他要今天的草稿時，他很尷尬。我又發現，安排他書寫「財務部」三個大字招牌也沒完成。這是一個瘦小的同學，顯得有點不靈活。他對我的意圖很沒有感覺，不知這兩件事的重要性。我當著他的面，對財務部長提出批評，責備他沒有督促好下屬的工作。姚曉燕很認帳，說是她的責任，馬上要趙雨去寫，又宣佈凍結財務，以便清算帳目，起草公報。

在我的督促之下，半個小時之後，趙雨終於寫成了一份「財務通報」，我很快就在七點鐘例行的記者會上宣讀了這些詳細數字和相關情況，記者們開始對廣場財務工作有所瞭解和信心。之後，我又將通報貼到三層紀念碑東側，與「財金制度」貼在一起，打算以後每日貼下去，使廣場上的帳目徹底公開。〔圖 58〕

另外，財務部得到北京市紅十字會的通告，說收到的 80 萬元人民幣已用於救護和廣場清潔衛生防疫工作，因此不會將捐款轉交指揮部。他們說：沒有此項義務！海外電匯的捐款因

遭到政府凍結而無法提取，財務部正與有關方面交涉。

公安局前工自聯要求放人

下午五點，聽到學運之聲廣播站呼籲同學們去北京市公安局門前，抗議政府逮捕三名參加運動的工人，「工人自治會」已經在那裏與公安局交涉，要求放人。

廣場上約有三分之一的人一下子向廣場東南方向湧去。這時天色陰沉，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在紀念碑上俯視這股人流，感覺有些異樣，政府是要施行「調虎離山」之計嗎？這麼多人一下子離開廣場，本來空虛的廣場人數更見少，這時加上市民，總共不足三萬。我很擔憂廣場上的便衣超出學生人數，很容易將廣場佔領。

波士頓大學錄取通知書

這天晚上，在絕食團廣播站，我收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給我的錄取通知書。波士頓大學遙感中心接收我作博士研究生（Ph.D. Candidate），免收學費且每學年九個月給我 8200 美金的研究助理獎學金（Research Assistantship）。另外還有一些特別優待，如准許妻子一同進入美國，我是 F-1 訪問學者簽證，她則持 F-2 配偶簽證；也有准許我們做工的 W4 格式的工作許可證。這是一封包裝精美的海外特快專遞，上面的郵費50美元令我咋舌。通知書是5月25日簽發的，不到一個星期就到了我的手中，是我的導師在所裏收到，立即叫師兄送到廣場上來的。〔圖 3〕

我是今年 2 月份才與波士頓大學聯繫的。1 月份我的托福(TOEFL)成績是 633 分，按普林斯頓考試中心的統計，我比所有參加考試的幾十萬學生中 95 %的英文水平都好，包括像印度、香港這樣以英語作第二語言的國家和地區。另外，我的

本科成績和研究生成績，按美國以總分為 4.0 算，分別是 3.68 分和 3.88 分，大大超過了他們區分特優學生的 3.5 分標準。我的研究項目也是遙感方面最領先的衛星圖像處理中的人工智慧應用。因此，超過任何一間有研究遙感的大學錄取線，收到錄取通知並不讓我感到意外。

然而，做了十年的美國夢，這時已沒有以前那樣的吸引力了。學運帶來的新希望，對中國未來的希望，已經吸引了我全部的嚮往。為此我可以拋棄一切。不過，我還是很興奮，自己躲到帳篷的一角，反復端詳那些黃黃綠綠各式好看的文件。雖然沒有我過去想像中那麼激動，但這畢竟是我懷抱良久的夢，而這個夢竟然成為事實，這些紙張可以將我帶到一個新世界去！當我找到柴玲告訴她這個好消息時，她也顯得無動於衷！她是不能滿意於我能將她帶到美國的得意，還是同我一樣，也滿腔熱情懷抱著對中國未來的新希望？我只端詳了一會兒，便將這美國夢藏到帳篷的一角。

王府飯店三方協調會

晚上十點，與柴玲李祿一同去北京飯店。香港同學認為北京學運組織面臨內部危機，希望幾個學生組織能夠碰碰頭，達成一些共識，於是作東請來北高聯、廣場指揮部和外高聯的骨幹參加。到了北京飯店後又移至王府飯店，可能是防止老在一個地方而被竊聽。這晚來參加協調會的，香港有邱延亮、岑建勛、林耀強和李蘭菊；廣場指揮部我們三人都去了；北高聯有王超華、梁二、王正雲、程真等人；外高聯有甚麼人參加我記不得了。

除主題是協調三方關係外，具體內容記不清了。印象較深的，是當時王超華說了甚麼，當即遭到李祿和柴玲反駁，我則認為超華所言有合理的成分。[316]李祿和柴玲事後對我很不滿意，認為超華在拆指揮部的臺，而我只要「堅持立場，我們便

能將她駁倒」。對我而言，重要的是這次會議的目標——三方的協調與統一，至少不互相拆臺。林耀強剛回了一趟香港，很擔憂學運組織之間的不和，廣場這麼亂，許多港人都建議他不要送捐款到北京。邱延亮提了一些建議，並強調不要對外透露這次會議，使中共抓住甚麼把柄。他說話非常平和，有條理，見解獨到而深遠。最後，我們一致同意明日傍晚舉行記者會，由三方學生領袖露面，以平息外界關於學生組織內鬥的謠傳。

這天晚上，我和柴玲找了一間小帳篷休息。這是我們夫妻兩人在廣場上第一次能在一間帳篷中休息，平常除了開會，我們單獨在一起聊聊天的空閑都極少。帳篷在絕食團廣播站西側那幾頂「團中央」中的一頂。大約是李祿讓人為我們留的，邊上另一頂帆布帳篷中還安排了四五個糾察隊員作保衛，由糾察隊長張健負責。

6月1日 星期日 晴 晝28℃ 夜16℃

柴玲和我凌晨遭綁架

凌晨四點左右，我們正在睡覺，突然感到一陣氣悶，我的雙手被人反剪到背後，同時另有一隻手將一塊粗糙的毛巾塞到我嘴裏，再用另一塊毛巾繞著嘴和耳根綁住我的頭。這一切都只在十幾秒鐘之內完成。我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再一看，柴玲也被人鉗制住了，但對她似乎要放鬆一點，沒有堵住她的嘴。這時，我聽到她憤怒地喊：

「王文，你要幹甚麼？」

王文就是那個人小心大，自詡為絕食發起人和絕食團團長的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的學生。他常常為指揮部中沒有他的位置而惱怒；又經常在財務部轉悠，他領的一筆三千元錢是借用我的學生證卻至今沒有還給我。這時，他發狠似地對柴玲低聲喝

斥道：「住口！老實一點！讓你幹甚麼就幹甚麼，別跟我們過不去！」

毛巾並沒有將我的嘴完全堵住，見柴玲在掙紮著要反抗，我怕她吃虧，為了緩和帳內的氣氛、鬆懈王文一夥人的警覺，便說：「你們這是綁架！柴玲，隨他們便，看他們能怎樣。」又對王文呵斥道，「你得考慮後果。」不知何故，王文對我反倒客氣起來，心虛地對我說：「老封包涵著點，我們不是衝你來的，沒辦法，我知道你還不錯。」

柴玲很機靈，對著押著她雙手的那兩個人說：「你們總得讓我們穿好衣服吧！」帳內這四人鬆了手，背過面去讓我們穿好衣服。大約他們是以為我倆絕不是他們的對手，也以為我們放棄了反抗。乘穿好衣服的一瞬間，柴玲猛然撲到帳篷口，向外高聲喊叫起來：

「來人呀！有人綁架總指揮！」【317】

我跟著高喊了幾聲，王文等人正忙著重新制服我們，帳外已經聚攏了一堆同學，將幾個綁架者團團圍住。為了查清原委，大家都說去指揮部說個明白，即紀念碑二層東側的那個軍用帆布帳篷。不一會兒，糾察隊員自覺地在帳外圍成一道封鎖線。

指揮部帳內的對質

指揮部帳內除了四個綁架者、我和柴玲以外，郭海峰、張伯笠也趕來了，還有幾個總部秘書原本在帳內。李祿最後趕到，一進帳篷，便審視著幾個陌生人質問：「怎麼回事？！」這時王文等人依然很囂張，四個綁架者中三個來自外地。文事必有武備，李祿感到形勢不利，便悄悄地讓一個秘書出去搬兵。

王文回答李祿，說要調查指揮部的財務問題。這顯然是藉口，不是綁架的真實動機。他藉口一筆舊帳，就是21日晚轉入

地下的活動費，問「為甚麼你們分了一千元，而我只得了一百？」更讓我吃驚的是郭海峰，這時顯然為王文幫腔，表白起來：「我當時就很內疚，不應該這樣離開廣場，就和王文一起去找柴玲，我不想用這筆錢，至今一分也沒動。我想問你們都將錢作甚麼用途了？」

郭海峰為甚麼要這麼表白？我大惑不解，因為當時郭海峰是積極支持這個計劃的，各個委員的秘密代號和聯絡密碼就是他同我一道設計的。雖然那種內疚心情我想誰都有，而且計劃提議人李祿後來甚至說他根本沒離開廣場，但郭海峰為何又要如此表白呢？顯然他在綁架事件中和王文早有密謀，二人也確實在某些方面氣味相投，他這幾天從財務部批不出多少錢也很不滿。對五二一轉入地下，我最擔心的就是這會使指揮部陷入糾纏之中，但當時既是大家的決議，是在緊急形勢下作的選擇，你又是積極贊同與配合，如今卻拿到一些不知情的人面前胡說，這算甚麼？見他竟站到王文這樣的人一邊，顯示自己的清白，我實在有點忍不住，說道：

「首先，這純粹是一次綁架，這個問題你們得說清楚。其次，審查帳目有財務部和財務督察組，你們並沒有資格。另外，王文和郭海峰，你們在財務上的問題我還正要找你們。王文，你領高聯三千元錢時，借了我的學生證至今還沒還，你得說清楚幹甚麼去了。」

王文支吾了幾句，語焉不詳。郭海峰將十幾萬捐款的小數點向前移一位變為一萬多的事，我一直沒有對外說。其實，他在北大作召集人掌握捐款時，就曾將大數寫小，現在反倒疑心起別人了。【318】

郭海峰偷錄對質內容

柴玲很沉得住氣。她用平靜的語氣講述了當時的經過。當她用「保命費」來稱呼當時給每個常委的一千元錢時，我既擔

心這樣的詞會引起不必要的猜測，又驚訝她似乎全無顧慮，依然用坦然而平靜的聲音講下去。這是她單純的地方。柴玲講，當時決定七名常委每人分發一千元「保命費」，以便「保護學運的火種」，由邵岩提款分給大家。至於她那一千元， 150元用於購置衣服， 50 元用於出租車，其餘給了秘書處和保安。

郭海峰聲稱分文未動，但沒說去向，更沒上交回來；李祿說全交給他親戚保存了，張伯笠只說收了錢，沒講用途。我本來想詳細解釋我那筆1092元錢是怎麼回事，但被柴玲等人後來的辯論打斷了。很有意思，當時無人追問我的帳目。

然後，郭海峰又追問柴玲從北大取走二萬元買對講機一事，柴玲承認錯用了一個叫李晶的同學，他拿走了一萬八千元就不知去向了。最後，王文和郭海峰又指責我和柴玲在開夫妻店，這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實在是一種忌諱，也是我一直有點擔心和顧慮的，沒想到這時爆發出來。

爭辯中，我發現郭海峰偷偷地在用一台袖珍錄音機錄下了對質內容，擔心這些內部爭執傳出去之後被他們片面引用，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和麻煩，因此指出他在偷錄。這時郭海峰尷尬地說，他只是要將錄音存文件，好以後調查，保證不向外界透露。

剪斷線路、灌醉保安

這時，李祿召集的糾察隊來了，幾個綁架者見勢不妙便開溜。王文罵罵咧咧地出了指揮部，來到北大供水站，用事先準備好的鉗子將學運之聲的廣播線給剪斷了。

後來，我們發現不光廣播線給剪斷了，廣場上與外界聯繫的唯一一根電話線也斷了；夜裏二、三點，李祿被人叫醒，說是有重要情況，請他出了廣場接收大筆捐款，結果卻甚麼事也沒有，顯然是調虎離山；同時，負責我與柴玲安全的糾察總長張健等人被人給灌醉了 。[319]

外高聯罷免連勝德

不久，早晨六七點，又傳來外高聯總指揮連勝德想召集一個記者招待會，宣佈大撤退的消息。此前，他已透過奪取的廣播站宣告大撤退。這並不是外高聯的集體決定，其常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罷免連勝德的總指揮職務，宣佈換上另一個外地同學接任，並成功地阻止了連勝德召開記者會的企圖。

這一系列事變，李祿覺得很可能是政府的一次陰謀。特別是他正好有證據，證明政府曾經同各個學生組織接觸，且已收買了外高聯的一個副總指揮。這名副總指揮曾與國務院辦公室的一個秘書秘密會面，答應撤出廣場。這個秘書為他在北京飯店包租了幾個房間，作為這項秘謀的指揮部。這無異於收買。這個國辦秘書也來過廣場指揮部，自稱代表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對柴玲、李祿暗示：「你們若能使同學們撤出廣場，就是國家和歷史的功臣；若有甚麼困難，廣場上還有許多人可以協助你們，聽你們的調遣。」【320】

因此，李祿一方面組織糾察隊，將王文等幾個綁架分子拘押起來，準備送到北大去審問詳情，只是因為聯繫的車晚了一步抵達，才讓這些人溜掉了；另一方面，則安排了一個記者會，將這一危險的信號公諸於世，以便同學們和輿論界提高警覺。

記者會講述綁架情況

記者會大約在上午十一點召開。聽柴玲講述我才知道，除王文以外，另兩個綁架者她都認識，叫陳偉和陳來，還有一個不是學生，另外還有一位曾參加過絕食的市民。我們敘述事件經過時，由原來在指揮車上作廣播員的蔡金青翻譯成英文。當時還以為她是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其實她是北大生物系的本科生。

李祿特別強調這是一次有預謀的綁架活動，因為昨晚我們



〔圖 59〕1989 年 6 月 1 日，劉光、柴玲、封從德和張伯笠（由左至右）在綁架案後的記者會上。封從德和柴玲在演示遭綁架時的情況。

的住處是臨時安排，因而是非常秘密的，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加上剪電線、灌醉張健和綁架發生後連勝德宣佈大撤退等等，他認為有的學生領袖已被政府收買。

我向記者們具體演示了遭綁架時的樣子，王文等人怎樣用毛巾堵住我的嘴、怎樣反剪我雙手，並告訴記者，我們曾經多次聽説政府組織了一個綁架隊，專門綁架學生和工人領袖，不過我們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恐怖心理戰」而未加理會。

劉光穿了一身白大褂，像是醫務人員的樣子，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對外説是我的醫護，實際成了我的秘書和護衛，幫了我很大的忙，常常在恰當的時候提醒我應該做的事情。〔圖 59〕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柴玲和李祿從昨天起便籌備為小朋友們在廣場上舉辦一些聯歡節目，買了些小禮品如汽球送給他們，又帶他們參觀民主女神像，他們在同政府爭奪下一代。凌亂的廣場依然有節日氣氛。我則依舊忙於財務與後勤工作。

王運則解決送水問題

紀念碑第三層南側的「特別供應站」的工作，我一直很不滿意，這天我終於有精力去處理。這個供應站本來是設計為供應廣場靜坐同學的飲食以外一切其他物資需要，但宣傳部要蠟紙、紙張；廣播站要電池、盒飯；糾察隊員要鐵哨等等，我在「特別供應站」都找不到這些物資。經過幾天的接觸，我認為是能力問題。

這時，我發現一個能力非凡的同學，叫王運則，剛從外地來。他到指揮部來毛遂自薦，說見到廣場這麼亂，他想出點力，只要許可他組織一個廣場流動送水隊，無需任何送水工具，他自己會想辦法解決。我自然非常高興地答應了，並在廣播裏宣佈了對他的任命，希望同學們協助他。【321】

他真的沒讓我操一點心，等到傍晚他來找到我，讓我參觀他的送水隊時，我發現已經有相當規模：六七個隊員，一輛舊三輪車，上面四五隻大小形狀各不相同的水桶，地上還有一大堆水桶，熱開水涼開水都有，好像有市民專門為他們送開水來。他們每隔半個小時便到廣場上轉一圈，真正是流動送水，使許多口乾舌燥卻不能動的糾察隊員與各部門的骨幹解了渴。

我非常驚異於王運則的組織才能，更感佩他的實幹精神，這是運動中少有的既動口又動手的主動精神。因此，我有意讓他負責「特別供應站」的工作。但我不能馬上撤銷原班人馬的職位，只是介紹王運則同他們認識，並讓他們合作。我認為王運則的才能會自然顯現出來，而他們也會服他。

六部口郵局查捐款

今天，財務部督察組的工作有了重大進展。上午他們查出在六部口郵局中有一筆捐款，全國各地匯來的，可能去向不明。郵局有人到過廣場指揮部的秘書處來通知。我聽了督察組長郝建江的匯報之後，馬上同他到秘書處，但是秘書長趙世民

和我認識的田群都不在，問那幾個忙碌中的秘書，他們對郵局捐款一事也不知情。

於是，我、郝建江和捐款組的一個同學，來到六部口郵局，向管匯款的工作人員陳明身份和來意，但他卻說自己無權將這筆捐款交給我們，要我們去西城區郵局找李科長；問他捐款數額是多少，他說郵局的規矩要保密。我們只得再到西城區郵局，好半天才找到，這李科長又不在，等了一會兒，寫張條子給科長，再奔六部口郵局。這一次郵局的人卻說，捐款已經有人提走了！

我們大吃一驚，連忙追問是甚麼人來提的，又具體有多少款項。在幾分神秘中，那人才輕聲地告訴我們，捐款大約有五萬，三個學生模樣的人來提走的，說是廣場指揮部秘書處的，並且有郵局的通知單，他只記得其中一個姓丁。督察組長郝建江立即來了精神，說秘書處確實有一個叫丁們的人。

我們立即又趕回廣場，這時大約已經下午二點了。到了總部秘書處，沒有見到丁們，到財務部一問，秘書長剛來交過一筆捐款，數目只有三萬五千多元人民幣。這裏面大有問題。趙世民和丁們這一下午都沒見到人影。此案由督察組正式立案追查，這是第三屆財務部設立了督察組以來，第一樁確鑿的大案。我這時才放心地離開了財政部。

三方聯合記者會

晚上八點半，北高聯、外高聯和指揮部的首領在紀念碑二層集體亮相，對百多位中外記者宣讀一份「三方聯合聲明」，以顯示學生領導層的團結。這個「三方聯合聲明」，實際上就是前天上午李祿在記者會上宣讀的一份關於撤離廣場、與政府對話的四項前提條件，即解除戒嚴、撤軍、保證不秋後算帳和解除新聞封鎖，加上王超華補充的一些內容，算作是一個聯合聲明。

財務方面，姚曉燕向記者作了具體介紹。另外，我還代表指揮部倡議設立一筆「絕食團員基金」，這是處理目前大量的廣場捐款的一個好辦法，也是許多捐款人的初衷，柴玲介紹了絕食同學的身體損傷情況，至少有一名確切知道的同學需要換腎。【322】

王超華則代表北高聯，宣佈了調整後的組織結構，指出吾爾開希和王丹已不再是北高聯常委，新的常委由北大、清華、人大、北航、法大、師大、民院、北京經濟學院和社科院等九所院校的代表組成。至於外高聯甚麼人參加、三方具體分工等，我記不清了。

6月2日 星期五 晴 晝33℃ 夜18℃

回北大搬兵

上午回北大搬兵。廣場秩序日難維持，我終於醒悟到是因廣場人員結構變化所致：外地同學佔八九成，北京同學幾乎都回校休整去了，只留下了一些看護大旗的在輪班站崗。外地同學既成主體，他們不僅通過「營地聯席會議」參與決策，自然也要求參與廣場運作。但因其流動性太大，許多人到京幾天後又走了，因而其組織過於鬆散，無法形成領導核心。他們有些人為了取得領導權，一次次發動「政變」」騷擾指揮部和廣播站。這種行為本身說明缺乏民主理念，企圖用非程序的武力方式接管廣場權力，而不是在「營地聯席會議」上提出彈劾或改選。這使我聯想到中國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無論如何，我們得盡一切力量去維持廣場上的秩序。這是我們作為廣場上三百代表選出的指揮人員的責任：只要沒被撤換，只要沒有決議撤出，我們就必須在廣場上堅持指揮。

因此我決定回北大求援。我計劃組織一批高素質的北大同

學，成立一個類似軍事化的特別糾察隊，以保證廣場指揮部的政策得到強力推行。我想到「海運學院」糾察隊整齊的海員制服帶來的威懾印象，於是決定購置一批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T恤衫作為制服，籌建一個有明顯標誌的強力組織。這樣的制服不光對不守秩序的一些外地同學可能造成震懾，也能給這些特別糾察隊員們帶來一種自豪感，就像軍服帶給軍人的榮耀；而且外地同學一般來說是佩服北大學生的，這種心理有利於幫助維護指揮部的政策。T恤衫很便宜，大約四元錢一件，成批購買會更便宜。

今天，劉光跟我一道去北大。還沒到北大，在黃莊，迎面來了一輛大卡車，上面站滿了人，一面「北大敢死隊」的紅旗迎面飄揚。到了北大，才知道校園都快空了，往日的熱鬧繁忙氣氛降低許多。原來，一方面因為「空校運動」走了許多；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同學組成了各樣的糾察隊堵軍車、向市民宣傳、到工廠發動罷工去了。

001與北大糾察隊

羅凱雄主管在北大糾察隊的徵召工作。他告訴我，已派出第27支糾察分隊，目前最多還能調一百人到廣場增援。我有點失望，但還不肯罷休。北大糾察總部的徵召處設在29樓外的自行車棚裏，安置了兩張床做椅子，還有一張書桌。

羅凱雄向我介紹了一位博士生，說我應該請他去廣場指揮糾察隊。這個博士生很壯實，35歲左右，嗓音宏亮，雙眼有神，以前當過坦克兵。他說在部隊裏幹的是「隊伍組織」，怎樣迅速編制一支軍事化隊伍、怎樣訓練隊員，他全有一套。他還作過一年的偵察兵，相信廣場上沒人能與他比試。他說我應該認識他，因為大約在20號左右時，他是廣場上的「001」。[323]

這引起起了我的注意。我確曾聽說過001，武功和組織才

幹不錯，但過於粗暴專斷，當時北高聯本想起用他整合廣場上已經淩亂的各個糾察隊，但是上任不到一天，他便在一片怨聲之中被哄出了廣場。但我不記得過這個001，今天見面，覺得他並沒那麼野蠻，反倒感覺他相當幹練。他對我講，只需200人，如何如何訓練和操作，他便能在二天之內將廣場徹底改觀。

這使我十分感興趣。我想看看他的學生證，這突然使我們陷入僵局。不知何故，他說唯一的條件就是無法讓我看他的學生證。而我則絕不願意起用一個身份不明的人，何況他在廣場上已經有過敗跡，我無法向廣場上的同學交待。這個角色實在至關重大，在瞭解他的身份上，我絕不讓步。羅凱雄也說，他實際上並不熟悉這個001。

在北大買T恤衫

既然無法起用一個可靠而有能力的人來整合廣場糾察系統，我只好還是依自己的計劃籌建一支隊伍。劉光已經去了學校商店，回來時說那裏的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T恤衫已經不多了，不到一百件，不過他們可以立即再去運貨，明天便能取得。

正當這時，籌委會突然通知，一個小時以後，即中午兩點，北大同學騎車去《北京日報》社燒報紙，抗議歪曲報導。《北京日報》社離廣場不遠，我相信到那裏用聚集的同學們組織一支上百人的糾察隊不成問題。於是掏出身上所剩的三百元錢，請一位籌委會的同學幫我們買T恤衫並立即送到《北京日報》社前去找我們。

我到籌委會借錢，沒找到管錢的蔡健，卻遇到計算機系的博士生朋友陳良華。他問我是否還要考GRE的計算機方面的試題，他已經為我搞到一份去年的試題；我說都這時候了，以後再說吧。又請他墊錢，希望湊齊300件T恤衫，以後由籌委

會報帳。他十分爽快，鄭重地答應了。我這才和劉光脱開身，放心地直奔《北京日報》社。

焚燒《北京日報》

北京日報社在廣場往東三里的東單西裱褙胡同34號，我們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我們約好的送T恤衫的同學也應該到了，便到大街上等，但十幾分鐘都沒遇到，只好再到報社門口去。這時，已經有近千同學聚在報社的鐵柵欄門外，門上報赫然貼有一張大字報：「中國記者的恥辱——只有五天的新聞自由（5.5-5.19）」

北大籌委會的凌傑遠負責這次行動。他臂纏一根紅絲帶，脖上挎隻電動話筒，一副指揮打扮。還有幾個籌委會同學協助他，大家向鐵門裏喊了一陣口號，便開始燒報紙。大家圍成一大圈，一張張報紙投進火堆；鐵門裏是幾幢三層高的紅磚樓



〔圖60〕1989年6月2日，北大學生聚集在北京日報社門前焚燒報紙，抗議歪曲報導。

房，一半窗戶都打開了，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們都探出頭來觀望，只差沒有鼓掌支持了——他們實際上是向著學生的，許多人參加過遊行，只是政府的高壓使他們閉上了嘴。〔圖 60〕

我很高興地同淩傑遠打招呼，並同他講了自己拉一支隊伍的計劃，希望他協助。淩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但他覺得這裏不是地方，於是在燒報紙的行動結束時，用話筒向同學們講了廣場指揮部告急，請大家到歷史博物館集合，在那裏再請我向大家具體介紹情況。陰差陽錯中，我既沒等到送T恤衫的同學，走到歷史博物館也晚了一步。淩傑遠和幾個同學在那裏，等了一陣不見我的影子，便進廣場去了。

四人絕食行動開始

這時是下午四點過，我正沮喪地要回指揮部，突然聽到一陣熟悉的歌聲。是侯德健帶著廣場上的人，齊聲唱他那首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唱的歌——《龍的傳人》：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
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

這是一首典型的愛國歌曲，正如《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一樣，雄渾蒼健，救亡圖存，與同學們的悲壯心情相呼應。

原來這是四人絕食行動的開始。這四人是：侯德健（大陸無人不知的詞曲作家）、劉曉波（北師大講師）、高新（師大周報前主編、共產黨員）和周舵（北大社會學講師、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他們代表知識分子發起絕食行動，絕食時



〔圖61〕1989年6月2日，高新、劉曉波（拿話筒者）、侯德健和周舵在紀念碑上進行48至72小時絕食，吸引了大量民眾到廣場。

限48小時（侯德健）至72小時（其他三人），之後將組織下一輪知識分子絕食。其實，從前兩天開始，便有「首都各界千人大絕食」的倡議，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參加了頭輪絕食。【324】〔圖61〕

劉曉波宣讀了他們的一份冗長的《六二絕食宣言》：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

這份宣言，是典型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話語展現。其中批評學運的部分有些也切中要害，如「組織混亂，缺乏效率」和「特權意識」嚴重等等。宣言唸完後，立即發生了他們自己所批評的特權現象。當四人從絕食團廣播站出來，要到紀念碑的帳篷裏去開始正式絕食時，記者、學生和市民混為一團，我從遠處便能看見那條通道上的騷亂。後來，具體安排這項行動的李祿告訴我，當時有一百個人擔任糾察護衛工作，四人非常威風，凜然不可一世的樣子，活脫脫的一個特權意識的真正寫照。【325】

秘密總部三人碰頭會

送完四人上紀念館，李祿與我和柴玲去「天壇醫院」的救

護棚——指揮部的「秘密總部」，是在那個醫院的一個實習研究生幫助下而建立的。這時廣場上的醫務工作已經不那麼緊張，許多原先搭好的救護棚都空閑了下來。設立秘密總部，不過是為了提高開會效率，避免瑣事干擾。而這兩天大量外地學生離京回家，召集營地聯席會議已有困難。【326】很有意思的是，許多事情我們不管也會自然解決；而我們管得越多，就有更多的瑣事找上門來。

這是一個非常結實的帆布帳篷，內部面積約有九平方米。兩張大床墊佔去一半的面積，我們東倒西歪地躺在上面，要開始討論。柴玲叫著肚子餓，跟著我們的保安便去找了些盒飯來，這是我們在廣場上享受的「特權」。

我有一個保安人員，柴玲有兩三個，李祿則有三四個。現在跟我的是劉光，他時常提醒我不要去管瑣事，他來處理就行了。劉光說，不要以為我是幫你，你現在的一分一秒對中國的未來具有意義，我為你做一些瑣事，時常為你提示，是希望你有一個更安靜清晰的頭腦。這令我很感動。比起耿力的沉默和忠實，劉光更機敏而周到。

我們的幾個保安人員

柴玲因為在北大籌委會作過秘書長，用助手比我有經驗。她的兩個貼身人員都叫機要秘書，為她起草一些命令與通告，跑跑聯絡等。對她幫助最大的叫馬斌，柴玲稱他本事極大：既會開車又會武術。這種超出平常同學太多的技能，使我對他沒有十足的信心。當時我認為柴玲容易輕信人，十分擔憂她吃虧上當。

有天晚上，柴玲情緒十分沮喪，幾乎相信運動會徹底失敗，學生命運將十分慘烈，秘密處決、終身監禁、流放沙漠……我發現馬斌和兩個同學一直在對她製造緊張氣氛，講如何如何防範政府甚麼甚麼迫害。我很不客氣地對馬斌等人說，

「我想和柴玲單獨談談。」馬斌言猶未盡不肯離開，柴玲對他發了一通脾氣，其實她對這個同伴非常信任。她曾告訴我，馬斌是因為她一次甚麼事而大受感動，流著淚說死也要保護她這樣純潔的人。我們終於可以單獨一起散散步，我甚麼公事也沒向她提，這時安定她的情緒、提高她的信心比甚麼都重要。最後她帶著疲倦的微笑，回到了同學們中間。

李祿的保安對他更為忠心，也更有行動能力。他們效忠李祿的情形大約與馬斌相似，李祿說轟他們也轟不走。李祿在糾集一批有能力的人這方面，可以說很有天賦。他說他無論到甚麼地方，三天之內，總能有三四個朋友圍在身邊。

這天下午，除李祿、柴玲和我以外，還有劉光和李祿的兩個護衛。兩個帶著一種不信任的眼光看著劉光，要同他掰手勁，卻都被劉光制服了。事後劉光告訴我，他們是在試探他的虛實，我覺得既滑稽又單純可愛。

空城計得不到多數支持

在秘密總部，我們分析了近來的形勢演化和未來的趨勢，進一步安排下一步工作，並明確了分工。

這幾天廣場氣氛緩和不少，大家對軍隊的警惕鬆懈下來，精力卻轉向內部的混亂。趙紫陽下臺已成定局，但當局一直未能強力實施戒嚴、佔領廣場，這令我們大惑不解。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政府確無能力控制局面，要麼採用拖延戰術伺機而動。前一種可能性不大，雖然同學和市民們還在善良地期待著某些人的辭職和軍隊撤軍。

針對政府採用拖延戰術準備拖垮學運，我們有兩種選擇：要麼撤出廣場；要麼堅守到底。前者配合施行空校計劃，給軍隊唱「空城計」，使政府無從下手。但這樣的戰略已經多次證明得不到廣場上的多數支持，【327】無法實施，我們若勉強推行，結果很可能是指揮部出局，廣場進一步混亂，終究還可能

給學運帶來滑稽且悲劇的結局。另一方面不可預料的，是政府和軍隊控制局勢之後，對學生的反撲和秋後算賬。中共歷史表明，當局慣用兩面手法：一方面瘋狂地鎮壓和屠殺異議分子，一方面拼命欺騙愚弄普通百姓。學生骨幹可能暫時逃脫追捕，但誰能說得清，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將掩蓋多少秘密搜捕和鎮壓？誰能說得清，反右迫害死了多少知識分子？誰又能說得清，1960年左右的天災人禍死了多少人？誰能說得清，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有多少人傷亡和入獄？歷史將再一次重演。

持久戰與啟蒙目標

既然撤不了，剩下的合理選擇只有堅守廣場與政府「打持久戰」了。這既符合廣場上的現實，又符合學運的「啟蒙」目標——還有甚麼比廣場上成千上萬人，在中央政府眼皮底下揭竿而起的事實，能夠使千百萬做慣奴隸的國人更加驚異、興奮、深思和覺醒呢？

無論是撤是留，最後遭到鎮壓是無疑的。與其在校園或逃亡中悄悄而分散地被各個擊破，不如在廣場這麼個舉世關注的新聞焦點地帶，集體而公開地表現我們的氣慨，在壯烈中轟轟烈烈地倒下——這無疑將是一首雄渾的史詩，我們付出的任何代價都將更加趨近我們的目標：擦亮國人眼睛，使麻木昏睡中的億萬靈魂甦醒。

這時，我們既對「人民政府」和「人民軍隊」還沒絕望，又設想國際輿論會對我們起一種保護作用。【328】事後證明，我們的分析有太多理想和善良的成分，完全沒料到當局的兇殘可以到何種程度。面對鎮壓，實際上人人都在心裏迎接這一挑戰。

其實，這時我最擔心的是內戰，是全國大亂。因為見到廣場糾察力量的混亂局面，在這最後幾天，我幾乎動搖了對民主

的信念——這教育程度最高的團體嘗試民主時尚且如此混亂，一旦中共真的垮了，全國會是怎樣一種混亂局面？共產黨真要失去對軍隊的控制，這時軍隊對誰效忠？對民眾嗎？誰又代表民眾呢？誰能保證軍隊不因各部的歧見而分裂，甚至演變為內戰，各以人民的名義和控制混亂局面的藉口，來謀取小集團的私利？……這一切，我只有感性的擔憂，卻沒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斷能力。

李祿準備取代柴玲

持久戰成為既定方針，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實施。本來我們三人的默契是：柴玲務虛我們務實，李祿主外我主內。但這樣的格局在現實面前也開始不那麼合理了。

廣場長期的混亂狀態，使李祿越發相信強力的必要，對柴玲的柔弱也就不能滿意了，柴玲的任命常常出問題：任命過張銳作學運之聲廣播站站長，不到一天便發現此人徒有其表；任用幾個秘書處骨幹也能力平平且有貪污之嫌；[329]糾察系統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作徹底的整頓……。李祿曾在柴玲不在的時候，對我打哈哈説柴玲的能力實在有限。我也希望柴玲退下來休息，希望李祿能出馬統領廣場，毫不擔心他會像開希那樣專權。我對民主力量既有信心，也認同混亂之中需要集權的觀點，而這個角色非李祿莫屬。他被幾個同學私下稱作「土匪頭子」，廣場上的各路糾察隊對他不是佩服就是敬畏。

但是，走這一步的最大危險，是領導層權力重新分配可能引發廣場進一步的不穩定。要作這樣的調整，須經廣場營地聯席會議表決，還得向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通報，操作起來這麼複雜，又有多少人明白這一步的必要呢？不過，李祿還是逐步作了準備，比如更多地在各種公開場合露面，作為輿論和心理上接納他的準備。他盤算著進一步利用海外媒體來鞏固指揮部的既有權威，約好了美國之音下週一（6 月 5 日）的專訪。李祿

還沒來得及走到這一步，屠殺已經來臨。

另外，還有一件現在看起來有點可笑的計劃或設想，當時卻很認真而嚴肅——李祿說，利用海外千百萬的捐款，我們簡直可以宣佈組成臨時政府，以同鎮壓後的政府抗衡。他還提到，在江浙一帶的某個「梁山泊」上有上萬人和幾千條槍的武裝，他與之有聯繫，屆時完全可以去落草，重走毛澤東上井崗山的路。這些自然是李祿的「大思維」在作怪，但是在當時，雖有幾分疑惑和驚異，擔心偏離非暴力原則，我對他的魄力還是由衷地敬佩。【330＊】

財務制度修正案

傍晚在絕食團廣播站，遇到了張伯笠。雖然這兩天沒見到他，他卻似乎沒有離開廣場多遠。我忘了怎麼得知他與趙世民那筆隱瞞的捐款有關，但清楚記得他向我承認時的直率和慚愧。我將他請到一個僻靜的帳篷裏，輕聲而嚴厲地問他是否知道這筆捐款的下落時。他猛然一驚，隨即低下頭說：「我們確實壓下了一萬一千多元錢，不過這是為創辦民主大學留下的基金。我們覺得財政部現在的財務制度太嚴，擔心屆時要錢受憋，不得已才這麼做的。作法當然不對，我承認。」

伯笠既已認帳，也就沒必要窮追不捨。我讓他將這筆錢到財務部過帳，下不為例。民主大學需要多少錢，可以商量。對於伯笠所稱財務制度過嚴，我也有所察覺。財務部的權限看來過大，似乎用心也多放在追求少出多進、避免失誤和防止貪腐上。現在廣場財政寬松一些，我決心對財務部的授權做些調整。

於是，我同財務部長姚曉燕商量，新的財務權限劃分考慮改為：督察組只有監察權，沒有干預和否決權；財務部長應審批大量瑣碎的小筆款項，限制在一千元之內；常委、正副總指揮可批示一至兩千，但一日最多只能批三千元；財務後勤責任

常委可以批示兩千至五千元的用款；五千元以上的重大用途須經含財務部長和督察組長在內的常委擴大會審定；兩個供應站站長的批錢實報實銷，不作限制，但使用情況由督察組派人監察。

姚曉燕很高興地贊同這個更改。她說，讓她來批小筆申請才是對的，以前大筆用款由她批，動輒兩三千，她因為並不清楚廣場上的具體需要，常常不敢批。這項財務制度修正案沒遇到甚麼阻力，也沒專門開會便通過實行了，我見到柴玲、李祿和張伯笠之後，高興地告訴他們，他們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一天批出三千元來。

政策推行部和T恤衫

柴玲的工作有了進展。這晚，十幾個同學跑來，要分擔指揮部的重負。這是近幾日柴玲仔細地走訪廣場上各帳篷中的同學所得到的回報。這些同學要成立一個「政策推行部」，只要指揮部有甚麼計劃和政策要實施，他們願意串聯各個帳內的同學，全力推行實施。

李祿則拉起了另一套更為強有力的糾察力量，指揮叫〇〇八，據說手下有二三百人，十分聽從命令。李祿說，他對這個「總部特別糾察隊」很有信心，他們都對李祿說只聽三個總指揮的命令。那晚我進過〇〇八總部特糾大本營的帳篷。〇〇八正向下屬發出一道道的命令，見我來了便同我聊了幾句。他說話、發令總坐在一個被窩裏不動彈，手下對他的尊敬態度給我極深的印象。

我這方面的進展，則是組編了一個北大糾察隊。北大送T恤衫的同學沒有在《北京日報》社前找我們，便送到了絕食團廣播站。有80件，我讓人將衣服搬到秘密總部，等著北大派遣第28支隊的糾察來廣場。這晚北大第28支隊終於來了，雖然只有30來人，我還是很滿意，將那批「號衣」取出來，分藍白

黃三色，各人套在外衣上，顯得精神抖擻。我馬上用這支隊伍清理紀念碑，很快便將紀念碑南側的外地同學睡覺帳篷遷走。他們一字在紀念碑上排開，煞是威風。他們還分出一隊來守護學運之聲廣播站。明天，還將有一批北大糾察隊來增援。

木樨地警車撞死三人

子夜前，一個糾察隊員從木樨地跑到廣播站來，向指揮部匯報一樁流血事件：一輛武警吉普車高速闖入人行道，造成三死一傷。事件發生在晚上十點半，一連串軍車，以一輛三菱牌的武警越野吉普車開道，因為高速行駛，加上路面有水打滑，先撞到一輛三輪車後，衝入人行道，先後撞倒四人，結果三死一傷。[330]

這個同學非常氣憤：「這輛吉普前後都沒有車牌，但肯定是武警的車！裏面的司機一點事也沒有，群眾上前責問他幹嘛開這麼快，他反倒說：『沒你的事，我要趕去執行任務！』大夥兒氣極了，圍上去要揍他們，但不到五分鐘便來了增援的警車，將他們帶走了。」

這件事十分蹊蹺，但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鎮壓的前奏，很可能是政府激怒市民以製造鎮壓藉口的陰謀的第一步。大量混雜的噪音和繁忙的瑣事，已將我的神經麻痺了。「狼來了」的呼聲太多，我們反倒不相信這次狼真的會來。

辛苦情報處與台灣簽名

6 月 1 日或更早，紀念碑二層東北角總部秘書處的大帳外搭起一個旅遊帳篷，帳篷上「情報處」幾個大字特別醒目。情報處長名字怪怪的，叫辛苦，[331]蘭州大學來的。因為李祿十分器重他，我也對他另眼相待，相信李祿的眼力不會太離譜。

辛苦是西安人，三年前考進蘭州大學物理系。後來，我發

現他做事還是有板有眼，在廣場最後幾天，每天都為總部的每個總指揮和常委提交一份「情報通報」，簡要地匯報收集到的各路情報，特別是中央高層的權利鬥爭和軍隊動向。他以一種莊嚴的態度認真地作著這個工作。

這天，他得到一個秘密情報：某醫院中有位絕食同學已經不治身亡，但北京市政府壓著醫院不讓洩露。辛苦和另一同學來到財務部，對我講明情況，要求購置一台高級微型照像機，我為他批了一筆錢，他們準備取得這方面的證據。此事結果我沒聽到辛苦再向我直接匯報，但是柴玲後來相信，確實至少有一位同學身亡。【332】

這晚，柴玲收到一包厚厚的郵件，是一本署名給她的厚厚簽名冊，足有兩斤重，是台灣師範大學徵集的十萬人簽名原件。封面上寫著：「北平師範大學柴玲收」。

神秘的愛華會主席

凌晨一兩點，李祿將我和柴玲叫到總部秘書處的大帳內，去見一位重要人物。這人姓董，自稱是美國一個華人社團「愛華會」的主席。李祿已同他接觸過兩日，相信他能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捐款和物資，甚至對以後流亡地下組織（李祿稱之為「流亡政府」）的支持。他五十多歲，西裝革履，戴副十分講究的金絲眼鏡，一副歸國華僑的打扮。方面大耳，濃眉大眼，寬肩長腿，十分健壯，一米八的個子，只是肚子稍腆。

但他一張口講了幾句，我就感到彆扭。他說他是華僑社團的主席，僑界都知道他，專程為支援大陸民運而來。又說他馬上要回美國，十分希望瞭解我們需要甚麼物資，他可以組織人從美國空運來，比如藥品、帳篷，他們很容易辦到。但他最後說，這次只是冒險進到學生指揮部的帳篷，因此並沒有將捐款帶來。他叫我們凌晨三點再到廣場外甚麼地方見面：「你們三人都要來，我需要三位的簽名才能將捐款送給你們。」完全沒

有商量的餘地。

對他這副高傲的命令語氣，我們既反感又擔憂，不明白為何三人都得去。他走後，我們決定不去赴約。後來就再也沒見過這位「董主席」。我心中一直犯嘀咕：這倒底是個甚麼人物呢？

註：

---

[257] 王軍濤回憶説他起草了學生宣誓的誓言。王丹在21日傍晚兩次帶領廣場同學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喚起共和國美好的明天」（香港《天天日報》22日頭版）。在24日廣場指揮部成立大會上，王丹宣讀了聯席會議的宣言「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稱「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只要我們堅持下去，這個無能政府是一定會倒臺的。」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145-146頁。據包遵信回憶，這篇宣言是他的主意，甘陽起草，但不記得怎麼就成了聯席會議的聲明，王軍濤説是拿到聯席會議上唸通過的，見《未完成的涅槃》第172頁

[258] 王超華在23日已退出臨時指揮部，見《回顧與反思》第270頁。

[259] 這些名單裏都不見吾爾開希。和媒體造成的「民運領袖」的印象相反，當時吾爾開希被所有的組織排除在外，5月24日師大自治會改選，吾爾開希甚至被自己學校選掉，只因他及時趕回，才補為「名譽主席」。（梁二，《回顧與反思》第293-294、296-297頁，裏面對吾爾開希的職務有個綜述。）

[260] 期間指揮部可能還任命過一個叫易水的同學為宣傳部長，見

《回顧與反思》第233、239頁。

【261】整個運動中，我都不清楚這些『黑手」的內情。甚至到了海外很久，我還以為聯席會議是由「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加上其他組織如工自聯等演化而成。其實，聯席會議是由社經所團隊(「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的王軍濤在前臺、陳子明在後臺，拉上包遵信和王丹以及劉曉波、吾爾開希等人運作操辦的。王軍濤將王丹算作社經所團隊的人，陳子明則不以為然。其實不僅是我，大多數學運骨幹在運動中都不瞭解這些「黑手」，參見王有才的「六四口述實錄」。

【262】實際上，聯席會議的核心人物陳子明、王軍濤想掌握運動的領導權，但又不將自己的名字公佈出來，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混淆。陳小雅《八九民運史》披露了陳子明早在4月底就提出的三線計劃，即「一線由學生組成，向政府施壓；二線由對學生有影響力有社會知名度的知識界人士組成；三線由陳子明主持，專司和政府談判。」(見該書第11、348、359-360頁）。陳子明否認這一計劃的存在，但陳小雅說她有三個人證。王軍濤說，「5月13日，研究所[社經所]作出決議介入運動，我是一線，子明是二線。」見《開放》1994年6月號27頁，胡平對王軍濤的採訪。

【263】很可惜的是，他們住在高級飯店裏面，熱衷於躲在研究所大樓內開會，而幾乎從不到運動的主體中去説服大家，不到廣場學生的營地聯席會議上去影響學生，就連像高聯秘書長王有才這樣的學運骨幹都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見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其中稱最關鍵是這些人包括王丹在基層的活動太少，而基層的人對他們也有看法，所以他們無法掌控運動，「他們失控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直接去和學生的主要人物、或主要的組織去談嘛。他們怕嘛，這個也很能理解，他主要是怕。怕也沒用啊，最後共產黨還是把他們查出來。在中國就是有一些人，一直喜歡搞暗箱操作——毛澤東的説法：三個人把這個事定了，然後來開會大家通過——就是用

這個方法，這個方法不是民主的方法。」)

【264】這個選擇也有負面作用：因全力管財務，我基本上沒法關注其他事，致使很多重大的方向上的問題，我都沒辦法去註意。將自己局限在技術角色上，也是源於我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作方向性判斷，正如我「五四」後辭職的心理原因一樣。

【265】後來有記者報導了一些「領袖」的腐化情況，如香港《天天日報》記者看見「吾爾開希、王丹和馬小芳(原文如此——作者註)確是在高級飯店召開會議，並叫了外國高級飲食和洋煙等等。粗略估計這次開會消費約六十元外匯券，相當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四分之一月入總數。同時，吾爾開希還在建梅飯店租用了九個房間，一天的消費便須一千八百元外匯券，還未列入租用汽車和膳食費用。」見該報6月2日5版題為「民運領袖奢華一面 / 開會飲食外國貨品 / 廣場這邊皆饑寒 / 那廂生活多享受」的報導。

【266】這個女生應該就是四川來的李紅宇，她的男朋友在清華。按梁二、王超華等人的回憶，陸明霞和李紅宇將錢轉移到師大和人大，陸只得到幾萬，剩下的絕大部分錢和帳目都讓李紅宇帶到清華，李不願交出錢和帳目，聲稱要以非政治色彩的普通學生身份接管這筆錢，以後再捐給地下政治組織作活動經費，高聯常委會見追不回錢就被迫認可了。1989年9月李紅宇與清華男友在四川被捕，當時她手裏有5萬8千美金，23萬人民幣。見《回顧與反思》第248、249、255、260-261頁。

【267】關於吾爾開希亂花捐款的情況，Joseph F. Kahn, "*Better Fed Than Red*", (*Esquire*, September 1990, pp. 186-197)一文中有詳盡敘述。

【268】但也有暫時成功的。例如白夢談到連勝德在5月26日對他的一次綁架：連不滿白夢在22日晚的會上提出讓絕食團指揮部作廣場臨時指揮部，指責是「預謀好的叛變行為」，於

是帶了特糾隊員團團圍住廣播站，並將白夢反綁起來，要求他「在廣播台宣佈，解除柴玲、李祿、張伯笠的一切職務，廣場總指揮是連勝德。」見《回顧與反思》第287頁。

【269】關於廣場上的種種「政變」，可參看《回顧與反思》第279-290頁。「政變」的頻率與規模，外界怕是難以想像。外高聯、北高聯都對指揮部（尤其是廣播站）發動過大量「政變」，每次都不成功。「政變」原因多是擔心指揮部組織撤離，但也有擔心指揮部不撤的，兩邊意見正好相反。

【270】從後來的資料看，她有時不在廣場可能還和參加聯席會議有關。

【271】有評議認為廣場上的營地聯席會議其基本成員流動性太大，因而代表性不足。此論雖不無道理，但不知道還有甚麼更好的形式，既符合當時的現實，又符合民主的原則。

【272】據王有才口述實錄，空校計劃是謝劍提出來的，加上楊濤，三人討論比較多。據邵江回憶，24日北大幾個研究生向籌委會寫了一張大字報建議空校計劃。台灣《聯合報》26日報導，25日深夜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有一北大同學提出空校計劃，但大家懷疑其可行性而沒能通過。」與此同時，25日晚北高聯也有北大同學提出空校計劃，應該就是楊濤，見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21頁。但我對楊濤25日來廣場與我討論空校計劃記憶很模糊，我印象深的是26日白天的討論。另外，柴玲當時也有類似的呼籲，25日「11:00，柴玲在天安門廣場廣播，要求廣場的外地學生留一部分聲援北京學生，其餘回當地發動群眾，以強有力的行動聲援北京。」見《70天大事記》第60頁。

【273】可能是後來柴玲宣佈時修改了詞語，丁方案外界報導的是「得到承諾，主動撤離」。

【274】稍後報導(27日)的丁方案是「得到承諾，主動撤離」，可能是後來柴玲宣佈時修改了詞語。但最初的用詞就是「維持現狀，自生自滅」的放任方案，一些早期報導（如《快報》26

日）和李祿與我的記憶皆如此。無論如何，丁方案也並非無條件的撤離，而是有條件的（「得到承諾」）。總之，當時「堅守廣場」的投票加起來超過97%。

【275】當時我不清楚這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北高聯沒得到聯席會議支持。王軍濤、王丹等人要求北高聯不要再回廣場的情況，見5月23日「聯席會議任命指揮部」一節的註。

【276】當時我並不知道王超華已在23日辭職。見《回顧與反思》第270頁。

【277】據北高聯副主席王超華回憶，五二三高聯整頓後「北大主席就是高聯主席」，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確稱楊濤為「北高聯主席」（《新聞自由導報》1995年6月9日）。北大籌委會副主席常勁則說，5月15日以後高聯負責人就是楊濤。見《回顧與反思》第217頁。

【278】楊濤在昨晚的高聯常委會上已提出「空校」方案。據北高聯秘書處《會議簡報》，「5月25日晚10點……北大楊濤同學提出『空校』的提案，認為學生應回家搞宣傳工作，6月22日再回京統一行動。對此，在場代表就廣場撤不撤得下？回家後被家長說服教育或回家後校方宣佈放假怎麼辦等問題提出疑問，楊濤作了回答，對於此項提案未作最後表決。北高聯秘書處 1989.6.26」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21頁。據沈彤回憶，戒嚴後楊濤也對他提到過「空校」方案，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307頁。

【279】可惜這些實施細節並沒在後來的空校運動中落實。常勁說，「這個空校運動考慮得不夠成熟，所以造成了北京市一半的學生開始返回家鄉，可我們沒有很好地組織他們到底回去幹些甚麼。」見《回顧與反思》第291頁。

【280】不過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沈老師提到的「秘密處死」背後林昭悲慘的故事。沈老師在整個運動中，對柴玲、我和廣場指揮部，都有極大的影響。他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入獄、流放十幾年。他曾詳細地對我們講述毛澤東的

「陽謀」、中共歷次秋後算帳、出爾反爾的情況，和他許多同學入獄、流放和遭處決的悲慘結局。曾幾何時，我對運動中的人和事也極度失望，想離開廣場，逃離中國，但當見到沈老師那麼堅定、執著而大無畏的神情，便自慚形穢。沈老師的言行令我認識到，中國真正的脊樑多是默默的，為了他們我不能氣餒。

【281】柴玲在三個會議上提出過「空校計劃」：27日白天首都各界聯席會議、27日晚又在指揮部會議（柴玲提出「主動組織學生宣傳隊伍南上北下，發動全民運動，部分外地同學亦回家鄉進行宣傳」，見28日香港《快報》）和28日晚廣場營地聯席會議。

【282】據香港《明報》27日報導，26日王丹在北大貼大字報「來自廣場的緊急呼籲」：建議組4支隊伍，每支200人，去廣場輪流值班，並稱「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當時北大留在廣場上的同學已很少，王丹當是為了增援廣場。又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07頁，落款註明是「王丹/89.5.25急就」；《中國六四真相》第727頁。

【283】我一直以為陳子明也在其中，後來陳子明說他並不在。嚴家祺也說他不在裏面，但中午他曾從門口看見裏面的人在吃盒飯。

【284】我本以為王丹是學生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橋樑，但王超華和沈彤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似乎很不接受這個說法（《回顧與反思》第109頁）。從越來越多的資料來看，可能是王丹不斷媒體曝光而塑造的知名度讓王軍濤等人將他認作學運領袖，而在聯席會議極力抬舉王丹。據張倫回顧，「聯席會議的主要發起和組織的人，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這批人」。包遵信的回憶與陳小雅的分析也印證了這一點。整個運動中我始終覺得，這麼一場驚天動地的運動，竟不得不由一群少不經事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285】「堅持到6月20日」是昨天聯席會議的一個決議。據官方資

料，5月26日「王軍濤、包遵信、王丹等40餘人在社科院召開聯席會議，形成四條決議：要求李鵬下臺；軍隊撤離；天安門廣場靜坐堅持到6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那一天；組織學生動員工人罷工」(《中國六四真相》第728頁；《驚心動魄的56天》第151頁)。據高聯秘書長王有才的「六四口述實錄」，他當時對聯席會議這個決議「感到很惱火」，認為「這是廣場學生很難撤下來的重要原因」。另外，當時提議「堅持到6月20日召開人大」其實很奇怪，當時運動主流是在爭取盡快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26日嚴家祺、包遵信發表「告李鵬書」，提出「推倒李鵬政府的二個步驟」：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和人大臨時大會(《天安門一九八九》第342頁)。此舉當是受厲以寧、胡績偉等36位人大常委聯名要求召開緊急會議這一事件的影響。此事由來已久，17日36名常委既已聯名，到25日已有57名人大常委聯名(《東方日報》26日)，離法定自動無條件召開緊急會議的半數(78人) 並不太遠。官方資料稱57人聯名是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授意，胡績偉定稿，曹思源拼湊名單而成(《70天大事記》第51頁、《中國六四真相》第685-687頁）。

【286】記得柴玲在聯席會議上提議「空校」撤離方案、而王丹和吾爾開希都反對「空校」的，還有劉曉波和邵江二人的回憶。其實對這段討論我的記憶反倒有些模糊，是邵江回憶時提醒我，我才記起。很可惜當時沒有竭力推動此方案。當時我對撤留問題最關注的是程序問題，相信必須依照廣場上多數同學的意願辦，卻並沒注意到廣場同學因為流動性的緣故，多是新來北京的外地同學，廣場是他們在北京的住地，自然多不願意撤。現在指揮部裏面李祿、沈老師反對，聯席會議裏也多不認同空校，加上營地聯席會議一天前剛剛決議堅守廣場，我自然感覺推動空校撤離方案不太可行。

【287】因柴玲和我的反對而將6月20日改為5月30日一事，廣見當時的報導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如香港《文匯報》29日：

「廿七晚，提前撤離廣場的決定，是由於聽取廣場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封從德的意見。」另見香港《大公報》29日、《香港經濟日報》29日3版吾爾開希訪談、老木《回顧與反思》第236頁、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179-180頁、王軍濤《黑手備忘錄》第128頁。吾爾開希訪談稱：「各界聯席會議在週末晚宣佈建議學生於5月30日撤退，是柴玲及封從德堅持的結果，並非像外界所以為是北高聯堅持的結果。事實上，〔吾爾開希〕他本人贊成6月20日才撤退，只是他尊重聯席會議的決定，才在記者會公佈5月30日撤退」（到1989年7月23日吾爾開希還說當時要求撤離廣場是錯誤的，見《爭鳴》1989年9月號28頁；但到了1995年媒體受影片《天安門》引導大批判柴玲時，吾爾開希又自稱當時「是絕對主張撤離的」，見《開放》1995年6月號8-9、42頁。）劉曉波的記述是：「最先發言的是柴玲，她介紹了廣場上的令人沮喪的局面，『外高聯』和廣場指揮部的衝突、外地學生在北京造成的不良影響，最後她提出了『空校運動』。王丹和吾爾開希都反對『空校』，王丹認為『空校』是不可能的……接著是封從德發言，他講了廣場上的物資管理狀況和財政狀況。他說廣場上每天大約需要五萬元人民幣，要求『高自聯』撥款。邵江和梁二代表『高自聯』參加會議，他們說這要開籌委會討論決定。」邵江也回憶說，當時開希與王丹都不贊成「空校」，王丹說「空不了。」老木回憶說「封從德和柴玲當時神情非常疲憊，也非常激動，要求撤退。」王軍濤則寫道：「5月26日，甘陽對我……建議提出以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學潮時撤出廣場……我支持甘陽在會上提出自己的設想(其實是會上的決議，見註【285】——作者註)……但5月27日，來自廣場指揮部的柴玲和封從德提出財政困難無法堅持，資源只能維持兩天，他們希望北高聯移交社會捐款給廣場指揮部；否則，學生將撤出廣場。北高聯財務主管解釋，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移交給

廣場。封從德表示，那就撤出廣場。我們立即根據他們的動議修改原來的決議中的撤出日期，採納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在30日全球大遊行撤出廣場的說法。」包遵信也說27日聯席會議前他看過甘陽起草的《十點聲明》(《未完成的涅槃》第241頁，該頁說25日晚準備宣佈撤應該是27日的情況)，官方資料則說是包遵信牽頭起草的(《中國六四真相》第776頁）。

【288】關於「人民發言人」，劉曉波書中只有一句話：「吾爾開希還就設立民間發言人一事大談起來，無非是證明他最有資格充當這種角色。」完全沒提他對吾爾開希的推舉（《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180頁）。其實，劉曉波兩天前曾和美國的陳軍通過話，籌劃成立一個民間機構並利用吾爾開希的知名度請他做發言人(同書第173頁)。而吾爾開希則「不諱言劉曉波是他的軍師」、「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劉曉波」(《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頁、9月1日第51頁）。梁二在巴黎會議上詳細介紹了劉曉波對開希的指導：「開希為甚麼會出現這樣高來高去，脫離群眾基礎的現象呢？這實際是曉波給他造成的虛假現象。曉波一直提倡所謂『民間制衡力量的英雄』、『英雄凝聚力的作用』。曉波當時對開希講：『開希，你現在應該樹立自己的形象。』所以開希就一直到處找名聲，到廣場要總指揮，到師大要主席，到高聯自己充當主席，總而言之，我想是他受到曉波的勸說。開希第一信奉精英主義，第二希望自己成為『瓦文薩』。我覺得曉波這一點對他產生了很強的誤導，以至於開希對師大失去控制，在廣場上失去同學的信任，這都是有大的影響的。在這裏對曉波提出一些批評。開希一直也比較信奉這個，實際上在當了名譽主席之後，他也就完全『名譽化』了，一直跑聯席會議，一直再沒有回到師大處理實際事務。」見《回顧與反思》第294頁。

【289】我一直以為當中一個是陳子明，直到2007年他在網上澄清

不是。

【290】有些人回憶說記者會前後李祿和一些人有激烈爭論，5月30日撤離的方案又被改回到6月20日，王丹唸的十點聲明稿紙上劃得亂七八糟，王丹唸完後就宣佈辭職等等，這些我都沒有印象。也許我只顧籌備記者會而沒留意？據柴玲1991年回憶，記者會時李祿告訴她：政府與學生變節分子勾結，準備架走堅持廣場的骨幹人物，所以30日撤退的議案就被否決了(《回顧與反思》第227頁）。1995年我與李祿作過電話核實，李祿說，當他聽見柴玲回到指揮部(張伯笠也在場)時說30號撤的建議，便說：那麼就在「營地聯席會議」上提吧，看通得過不；今晚召集營地聯席會議，不知還來得及不。李祿自傳中提到了他當時反對的兩條理由(第180頁)，同頭一天他反對「空校計劃」的兩條是一樣的。李祿在電話中還印證了老木說王軍濤也支持不撤的情況。李祿的回憶是：當時柴玲說，本來知識分子也不是說30號撤；這時，王軍濤拍拍李祿的肩膀，很誠懇地說：要是同學們願意堅持到6月20號，我們全力支持；你們指揮部說要甚麼吧，人力財力，我們都可以提供。說完，大概也是王軍濤，當即將「5月30日」劃掉，改回為「6月20日」。這可能正好是我主持「自由論壇」的時候，很快我又回北大去取錢，因此這一反復我當晚並不知情。第二天回廣場，也沒在意。撤不撤，當時我其實無所謂，最關心的還是通過民主機制沒有。李祿自傳中將記者會上宣讀的《十點聲明》說成是堅持到6月20日那個版本（這是誤記），卻沒說明怎麼又改回到這個版本的。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79-181頁。

【291】當時散發了《十點聲明》的三種版本：(A)關於堅持到6月20日的原版，包遵信和陳小雅書中採用的，以及紐約市公共圖書館MUNRO Collection收藏的三種傳單，都是這個版本；(B)關於30日撤退的修訂版。這兩個版本老木作過解釋但不很清楚（《回顧與反思》第236頁）。實際上，據各方

資料可知：堅持到6月20日的原版由甘陽起草，5月26日經王軍濤首肯拿到27日聯席會議上討論，當時他們以為肯定會通過，就直接讓負責《新聞快訊》的聯席會議宣傳部長老木去印刷了，老木甚至說那就是「決議」。但在27日聯席會議上討論時被我和柴玲質疑，改為30日撤退，結果老木「當時就火了」，極不情願地同甘陽重新「炮製了一個關於撤退的《十點聲明》」即版本B。第二天應該還有第三個版本（C），與堅持到6月20日的原版一樣，但加了一個解釋：聯席會議最初草擬的聲明就提出要堅持到6月20日，但聽了指揮部柴玲等匯報後才改為5月30日撤出廣場，見香港《大公報》29日。

【292】從各種資料看，這晚指揮部討論過撤留問題，但遭到外高聯同學的猛烈衝擊。當時的廣播站長白夢回憶：那晚「好幾個人連續衝擊廣播台，一會要包圍，一會要包圍」，他實在受不了，第二天就辭職了（《回顧與反思》第285頁）。實際情況是，絕食發起人楊朝暉因堅決反對撤離、擔心指揮部推動撤離計劃，「一度醞釀接管指揮部廣播站。」而「外高聯深夜議決接管廣播站，凌晨派數名學生衝入廣播站」(《香港經濟日報》29日3版）。原因是「進京的學生大都抱著一腔熱情而來，對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抱有很大期望，對撤退多有抵觸，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北京是全國學運的焦點，是一面具有巨大象徵意義的旗幟，這旗倒了，將是對全國學運的沉重打擊。今天凌晨，因而發生了外省市高校學生代表要衝進學生廣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學生領袖理論的事件。」（香港《大公報》29日）柴玲在會上提到「南下北上，發動全民運動，部分外地同學亦回家鄉進行宣傳」（香港《快報》28日），當與「空校計劃」和「聯省自治」的設想都有關係。其實廣場指揮部無權決定撤留。堅持到6月20日的最後決議是在28日晚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做出的，此前已有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北高聯的類似新決議。

【293】他們當時沒對我講實情，1991年巴黎會議上梁二才道出真相：實際上當時是提不出來錢，高聯財務部那個兇巴巴的四川女生李紅宇，已將絕大部分錢和帳目都藏到清華她的男朋友處，且不願交出錢和帳目。結果「六四」後這五萬八千美金、二十三萬人民幣全部被當局繳獲。見《回顧與反思》第249、255、260-261頁及5月24日「北高聯只留下九千元」一節中的註。

【294】包遵信在回憶中提到「聽說有人準備逃到國外，27日下午老木也來問我，我把他罵了一頓。」他和嚴家祺在31日下午通話時都說準備好了坐牢，見《未完成的涅槃》第262頁。

【295】此事在香港《華僑日報》5月29日頭版有報導。香港《天天日報》30日12版也報導「封從德……呼籲各界之捐款最好能以物資形式轉交」。我們31日凌晨與岑建勳見面時，「封從德表示……目前天安門學生最需要的，並不是金錢，反而是物資的供給。」見6月1日《香港時報》8版、《華僑日報》24版和《快報》23版等。

【296】香港《天天日報》的記者梁淑英。她對此次採訪及來我家採訪的回憶，見《人民不會忘記》第213-215頁。當時我還不知道，那天中午她同金培力一道對柴玲做了錄像採訪。該錄像成為1995年記錄片《天安門》的主要線索，製片人卡瑪（文革中多次受周恩來接見的紅衛兵頭目）採用移花接木等「蒙太奇」手段來妖魔化柴玲，尤其是將梁淑英和金培力分別問的兩句話剪輯在一起，從而羅織成「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的駭世奇聞。實際上在1989年6月初，錄像談話的內容就在多種報刊上摘要公佈過；1991年巴黎會議上，柴玲提到過這段錄像（當時還沒有任何爭議）：28日「同記者作了一個採訪，說我最後的話：『我被推為廣場總指揮，只能以組織名義講一些事情，我個人的情感只能壓抑住。現在我要以個人的身份說一些我對這個運動的感觸。我覺得到現在為

止，運動已經沒有任何實質上取得勝利的可能性。中國人的民主素質太低，我要逃亡，我要繼續把民主的教育、啟蒙作下去，培養新一代的具有良好民主素質的人。廣場的旗幟是絕對不能倒，但是如果真正取得實質性勝利的話，除非有一個條件，發動各省自治。』」見《回顧與反思》第227頁。

【297】 Philip Cunningham。當時我以為他是北師大的留學生，其實他在語言學院學中文，並為BBC做兼職工作。

【298】 據29日《文匯報》，柴玲因「結束靜坐主張遭反對」而提出辭呈。實際上柴玲這時受到很大壓力，夾在撤與不撤截然對立的兩派之間，且在聯席會議和廣場上都感受到一些人極大的權力爭奪。28日凌晨，外高聯擔心指揮部宣佈撤離，派代表連續衝擊廣播站企圖奪權，廣播站長白夢不堪其擾已在白天辭職（詳見5月28日的註記）。關於撤與不撤爭論雙方所持的理由，李祿在巴黎會議上有個綜述，見《回顧與反思》第303-304頁。

【299】 據《北高聯簡報(3)》，楊濤參加了當晚的高聯常委會，應該是在凌晨一時三十分會議結束立即趕往廣場的。高聯「最後決定所有常委分頭到廣場瞭解情況並與在場同學協商，整頓廣場秩序」，但依然沒有「空校」決議，也未提是否在5月30日或6月20撤離（《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51、354頁）。楊濤是主張撤離的人中少有的到營地聯席會議上來直接與廣場學生代表討論的。很多人在「六四」屠殺後說自己之前如何勸撤，其中很多是不負責任的，這些人從來不到這個「學生議會」上來勸撤。從楊濤的經歷看，學生議會並不排斥任何人任何言論，但楊濤雖主張撤，也很快就被廣場氣氛轉化。可見絕食到了廣場之後再要撤就太難了，而其中的民主程序問題一直是個難題：一方面，要不要遵守廣場上的學生議會的決議？另一方面，學生議會是不是真有代表性？如果沒有，廣場上怎麼才算、又如何構建一個具備充分代表性，因而也具備充分權威的機構可以決策？這個難題至今

沒有解決，甚至很少人討論。另據官方資料，王丹當晚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呼籲大家「去天安門廣場堅持」，見《驚心動魄的56天》第156頁。

【300】李祿回憶説，這晚的主題不是撤不撤，而是如何整頓廣場秩序（《回顧與反思》第239頁），與我的印象差不多。會上堅持到6月20日很容易就通過了，沒有太大爭議，因為此前，28日晚七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已重新宣佈建議將5月30日撤離改回6月20日（香港《文匯報》29日頭版），並解釋説「『聯席會議』最初草擬的聲明就提出要堅持到6月20日，但後來聽取了廣場總指揮柴玲等匯報廣場情況」等才把建議改為於5月30日撤出廣場（香港《大公報》29日頭版）。另外，北高聯常委28日晚亦作出四項決議：（1）廣場靜坐請願繼續堅持；（2）繼續全面罷課；（3）號召離校宣傳；（4）健全高聯組織。見香港《文匯報》30日。據包遵信回憶，北明編完四期《新聞快訊》後就不見了，王軍濤等人多次催促，在29日的聯席會議上老木主動請纓繼續編輯，31日出了第五期，當中《紅旗不倒，正義必勝》一文特別強調：「牢牢地守住天安門廣場，繼續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掌握在我們手裏，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並且列舉了三條理由。見《未完成的涅槃》第183-185頁。

【301】楊濤要走的真正原因我一直不清楚。

【302】這些數字見香港《大公報》1989年5月30日2版。

【303】荒唐的是，我到了海外才知道，有香港記者以柴玲給我的「信任書」為根據，説我「拿著一張蓋滿柴玲及指揮部印章的『手諭』，四處給記者及同學看」，並「以此為依據，履行總指揮之職……其間並無經過任何民主程序。」其可悲如是。好在當時不知道，否則很可能使我因人言可畏而止步不前了。

【304】5月底香港學聯在廣場做了一個簡單統計：訪問30位同學，全是外地來的，「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站的支援」，7人表示

「不會留在廣場」；4人「要看情形」；1人「拒絕回答」；16人「將堅持留下」。見《回顧與反思》第325頁。

【305】二人實際上沒起作用，但媒體喜歡報導名人，捐款也喜歡捐給名人。

【306】張伯笠回憶說，5月30日他與李祿和官方代表接觸，直接向對方提出了這四點要求。這是三次這類接觸的最後一次，詳情見6月1日「外高聯罷免連勝德」一節的註。

【307】這天的財務數字可見5月31日各報報導，但記者記的不甚確切。從5月29日起，我們每天都對外通報財務情況。根據一張貼在紀念碑上的「每日財務通報」的照片，5月31日募得4,105.90元人民幣、1,832元兑換券、280,000日元、60,000元港幣、200美元和67.2斤糧票，總支出7,597.11元人民幣。6月1日總支出13,284.10元人民幣、2,000元港幣、700元兑換券，募得2,555.22元人民幣。《香港時報》6月3日2版公佈了姚曉燕對記者報的賬：2日截止的捐款：港幣152,070元，外幣130元，外匯券2,893元，人民幣72,500多元。

【308】當時我不知道，馬少方在絕食前已經不是北高聯常委。見馬少方的自述。

【309】這個數字應該是我記混了，2600萬是香港各界當時籌得的總數。當時「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得1300多萬、民促會420多萬、教協160多萬（《華僑日報》6月1日5版）及專上學聯600多萬（《香港經濟日報》5月26日8版）等。「六四」後這個數字幾乎翻倍，香港民間在1989年底的捐款總數為42,946,788元港幣，其中支聯會24,945,217、學聯12,537,866、中大1,699,314、教聯會2,545,391、四五行動900,000、記協319,000（《百姓》1991年6月16日第20頁）。親共的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將教協100萬捐款上交給北京官方紅十字會（《華僑日報》6月2日5版），並不是給學運組織。程介南2001年因以權謀私被判入獄18個月。2007年5月，民建聯主席馬力對媒體否認「六四」屠殺、否認坦克碾壓學生，甚

至說「不如找一隻豬，用坦克車輾過，看看是否會變成肉餅？」引起廣泛的憤怒與聲討。

【310】當時我還想用這個辦法推行前幾天與北高聯主席楊濤商議好的「空校」撤離方案。

【311】據報導，這時北高聯9常委是：社科院王超華、北大楊濤、北師大梁二、清華周鋒鎖、人大方克、政法張志清、民院王正雲、北航鄭旭光。28日議決的北高聯各部委主要負責人（臨時）：秘書處王有才（北大）、財務部陸明霞（師大）、宣傳部楊國忠（北大）、外聯部王丹（北大）、後勤部範曉賓（清華）、內聯部熊文革（師大）、組織部王治新（政法）。見《香港時報》6月1日2版、《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351頁。

【312】張倫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說他29日晚上撤離廣場，因為身體的原因，王軍濤5月30日將他送到北京昌平縣去休息；出來之後，對留在廣場的同學內心深處一直有很深的歉疚感。當時我一直以為張倫是在校學生，不清楚他其實是聯席會議任命的。他沒說那是掌控聯席會議的王軍濤等人在戒嚴當天就在準備的秘密逃亡計劃的一部分。那個逃亡計劃一直瞞著聯席會議「任命」的廣場指揮部。見《回顧與反思》第279、349頁。

【313】張健是柴玲任命的學生糾察總指揮，與聯席會議任命的糾察總長張倫是平行的，而且還有北高聯、外高聯、市民、工人糾察隊、敢死隊的各個總領，當時我都分不清楚。

【314】李祿、張伯笠回憶中共收買廣場學生的情況，詳見6月1日「外高聯罷免連勝德」一節中的註。

【315】此事當時有廣泛報導：「封從德對岑建勛表示：目前天安門學生最需要的並不是金錢，反而是物資的供給。每日平均所花用四萬元人民幣，由於近日人數銳減，30日當天只花了八千元。」（6月1日《香港時報》8版、《華僑日報》24版和《快報》23版等）

【316】大約就是三方聯合指揮，共同管理廣場，如從北高聯和外高聯也請一人到指揮部做副總指揮。李蘭菊回憶說，這次會議已達成初步共識，但後來高聯常委會否決了與指揮部合作，令他們非常失望。王超華和梁二則質疑李蘭菊的記憶有誤。見《回顧與反思》第326-327頁。

【317】1991年7月中旬，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記者Andrew Higgins在巴黎親口告訴柴玲和我：「侯曉天（王軍濤前妻）承認，王文綁架事件是王軍濤策劃的。」我詢問過王軍濤，但未得到明確回覆。另外，1991年巴黎會議上李錄提到與王有才的分歧很大，「最後發展到王有才以高聯的名義，命令北大的特別糾察隊去廣場綁架他」（《回顧與反思》第340頁）。王有才否認綁架，但承認北高聯確實「是有一個怎樣解決李錄問題的議案」，認為李錄解決了，學生們就能撤出廣場（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318】後來王文和郭海峰把偷錄的錄音交給香港記者，記者公佈的內容中卻沒有涉及二人財務問題的這一段內容。一些港人如學聯主席林耀強、著名藝人岑建勛等都聽過錄音，也都對記者說感覺沒任何問題，完全相信柴玲和我的清白。

【319】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一位也叫楊濤的在廣播站工作過的外地同學說，張健當時並沒醉，而參與綁架的陳來、陳偉是「絕食以來最堅定、激進的學生」，他們不可能是為了撤退而綁架（《回顧與反思》第289頁）。楊濤的回憶常常不準確，最近我得到張健的電郵，證實確實有人給他「一瓶罐裝啤酒，對我來說本不會醉倒，除非裏面有甚麼藥物。我睡著了，而且睡得很死。綁架發生時，有人說大喇叭廣播多次，我都沒有醒來。我就睡在廣播站，他們都知道我在那裏，怎麼沒有人來叫我啊。直到事情結束了，才有人叫我。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啤酒裏面放了東西，一是知道我在這裏就不叫我。」

【320】李祿回憶錄中說官方試圖收買指揮部這件事發生在5月26

日，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79頁。在巴黎會議上，李祿說那個被收買的學生叫萬朝暉，指揮部6月1日開始得到大量情報反映中共的異動，並至少有三次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會談，其中一次發現當局為萬朝暉在會談的旅館中專門租了一個套房，李祿由此推斷他已被政府收買。見《回顧與反思》第240、305頁。李祿兩處提到「萬朝暉」時沒做任何身份介紹，也未見任何資料提到他，也許是「楊朝暉」的口誤或筆誤。據張伯笠回憶，30日下午2點，他與李祿代表指揮部「和中共中央、戒嚴指揮部的代表進行了最後一次接觸」，中共代表沒答應指揮部關於恢復對話的四點條件，還警告二人「儘快撤回學校，軍隊已決定要儘快清場，」並稱可以空降三個師，加上地鐵運來兩個師及人大會堂6萬特種部隊，「我們可以三個人對你們一個學生」，但不會開槍。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號86頁、1995年7月號25頁。

【321】據常勁修訂補充，這位同學是北大的，之前曾在北大設在廣場的供水站工作，戒嚴後供水站撤銷，人撤走但有些設備還在，因此他可以輕車熟路很快解決供水問題。

【322】也許就是駱一禾，但他是因腦溢血而非腎住院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已於昨日去世。駱一禾，北大「五四文學社」詩人，1961年2月6日生於北京，1984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其後至《十月》雜誌擔任編輯，曾兩度獲得優秀編輯獎。1986年有「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處天下之危」的詩句。1989年5月13日，他與妻子（張玞，北大博士生）一道參加天安門廣場絕食，當場因腦溢血暈倒住院，期間當局嚴密封鎖消息，5月31日去世，年僅28歲。香港《天天日報》6月2日12版報導了駱一禾去世的消息，並稱還有三位絕食同學成為「植物人」，這是北大籌委會在校內廣播的。實際上，北大籌委會在5月18日就廣播過兩位絕食同學死亡：一是中央音樂學院女生，一是北大作家班學員。見《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第182-183頁。

【323】據常勁修訂補充，絕食後北大派到廣場的糾察隊有上千人，因為其流動性，對主要負責人實行編號制，如001、002、003……。因為換人不換號，這樣每個崗位總有人負責，羅凱雄、劉剛（不是被通緝那個）都做過001，韓少華、吳軍（地球系青年老師）則擔任過002，還有其他人也到廣場替換過他們。去替換的主要還是原北大糾察隊那些人馬，如孟昭強、凌傑遠（地球系研究生）等等。

【324】我當時不知道，「首都各界大絕食」也是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討論決定的，保安後勤都是聯席會議負責，且「打算組織第二批、第三批……這樣接力式地把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讓，取消戒嚴令」(《未完成的涅槃》第256頁)，但包遵信認為這樣做不一定好，「不太贊成知識分子進行絕食。劉曉波認為廣場缺乏興奮劑，想藉著絕食將學運推向高潮，製造新聞點」(295頁)。他們本計劃千人參加，結果報名人數很少。包遵信和劉曉波的回憶顯示，這次絕食主要由劉曉波推動，他排斥了其他一些想參與的人，目的是取得廣場的指揮權。奇怪的是，即便找不到人加入絕食，三天前還大力推舉吾爾開希的劉曉波，這時卻拒絕了開希，「不願意有再多的人與我們四人共同分享這榮譽、這英雄的美名」；而聯席會議上除了陳小平，就只有開希支持他的絕食計劃（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193頁和香港《大公報》5月31日頭版）。另據官方資料，一些知識分子26日晚在北大已經提出29日在廣場上舉行5000人的「知識分子大絕食」（《驚心動魄的56天》第151頁、《70天大事記》第63-64頁）。此前，據包遵信回憶，知識分子在5月17日還有「一次流產的絕食」，因為有人爭當絕食負責人而取消（《未完成的涅槃》第265-266頁）。

【325】三年後，劉曉波忘情地回憶了他們在紀念碑上的特殊待遇、俯視眾生的快感和「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而飄飄然」的感受（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204-210頁）。據包

遵信5月31日對記者說，他「不太贊成知識分子進行絕食。劉曉波認為廣場缺乏興奮劑，想藉著絕食將學運推向高潮，製造新聞點」(《百姓》1989年7月16日第21頁）。包遵信還質疑「如果沒有劉曉波等人絕食」，是否還會有六四「那麼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但也肯定他們最後說服學生撤離所起的作用（《未完成的涅槃》第257-258頁）。

【326】據官方資料，僅5月29日一天離開北京的外地學生就超過3萬人，當時進京離京的學生已達37萬人次；在5月31日廣場上還有22個省市自治區的180所高校的旗幟（《驚心動魄的56天》第161、164頁），比22日的319所高校少了一半(《中國六四真相》第619頁)。大量學生離京也與29日開始的「空校運動」有關，但很可惜沒有像我26日建議的那樣事先安排好定期定點的重新聚會。

【327】譬如5月27日聯席會議上柴玲提出空校未通過；5月28日晚營地聯席會議上楊濤提出空校也未通過；我也在一次會議上提出過。

【328】我們低估了中共的殘暴，過高相信國際影響的保護作用。其實，鄧小平早就說過「不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

【329】由於貪污嫌疑的細節我已記不準確，且事關人名節，我在1990年的備忘錄中就沒細說，但1991年的巴黎會議對此有所討論。李祿回憶說，在營地聯席會議上公開過秘書趙世民的問題，當時甚至「有人建議我們自己設一個法庭判一下」。張伯笠解釋說，趙世民截留的一萬多元是準備給民主大學用，張還任命趙為民主大學副校長。見《回顧與反思》第240、258-259、302頁。後來，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詳細說明了那筆錢的用途：買錄音機6千元、旗幟等物品3千元、給民主大學基金會2千元，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號87頁。

【330*】我可能是將李祿的報告誤解為他的計劃了。據李祿修訂，那並不是他的計劃，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給他提供的情報和建

議：如果發生鎮壓，我們可以利用海外千百萬的捐款，甚至可以宣佈組成臨時政府，以同鎮壓後的政府抗衡。那位知識分子還提到，在江浙一帶的某個「梁山泊」上有上萬人和幾千條槍的武裝，他與之有聯繫，屆時我們完全可以通過他去落草，重走毛澤東上井崗山的路。現在看來這個情報和當時在廣場上所得到的很多其他「情報」一樣都屬子虛烏有。

【330】香港《天天日報》6月4日頭版對此事件有詳細報導，其中兩名死者身份是：王新明，女，36歲；田永林，男，37歲。傷者27歲，山西大學畢業生，英文教師。肇事司機係武警北京總隊五支隊司機陳福玉，男，27歲。車牌為31WJ1525，WJ即武警的拼音。

【331】後來知道他的真名叫辛蔚榮。「六四」後流亡美國，畢業於耶魯大學，曾任全美學自聯理事、副主席。後回國經商。

【332】可能就是駱一禾。見6月1日註。

9. 最後的時日 (6.3-6.4)

6月3日 星期六 陰 晝32℃ 夜20℃

繳獲的槍械交給公安局

昨晚我在〇〇八的大帳中睡覺，這一夜再發生了些甚麼，我毫無所知。睜開眼睛，太陽已經老高了。【333】

上午，一大堆軍械堆到學運之聲廣播站棚外的糾察圈內展覽。軍鞋、鋼盔、菜刀、匕首甚至槍支彈藥，不知何處弄來的。據說，淩晨有三支白衣綠褲的軍人隊伍強行向廣場突進，這些東西就是遭遇百萬市民連夜傾城出攔時，突然後撤過程中丟下的。〔圖 62〕

後來，張華潔跑回絕食團廣播站來，也說他帶領的糾察隊收集了一大批軍人丟下的槍支彈藥。他很擔憂，說，看樣子是當兵的故意丟下的，因為群眾並沒有十分衝擊他們。「完全沒有必要，也不可想像軍人會丟下武器逃走！」

我當即同他商量，希望他組織好糾察隊員，收好武器以防意外，不讓政府找到鎮壓的藉口，同時儘快將收集到的所有槍械交給公安局處理。後來，張華潔回到指揮部，說公安局開始時不願接收槍支，後來在同學們義正辭嚴地再三要求下，終於收了，並開具了一張收據，列了清單，蓋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大紅圖章。傍晚，柴玲帶著這張收據和一些軍人棄下的物件，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展示學運的「非暴力」原則：我們絕不願意動武。【334】



〔圖 62〕1989 年 6 月 3 日，軍人遺棄的軍鞋、鋼盔、菜刀、匕首，被學生和民眾收集到一起交給當局。

請高聯派人加入指揮部

中午的例會還是在「天壇醫院」帳內。李祿很有點埋怨地問我和柴玲清晨都跑那兒去了。他說，那裏各路消息十分緊張，都說軍隊已經開始行動了，他為了安定廣場上的情緒，守著廣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放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歡樂頌》。

林耀強來過廣場，建議廣場指揮部以增設「副總指揮」的名義，吸收北高聯和外高聯的同學加入廣場運作，使這些養精蓄銳的人才有用武之地。[335]大林（我們這樣叫他，算是暱稱）是以中間調停人的姿態來提這些建議的，他暗中做了不少建設性的工作。對這一建議我很感興趣，問李祿和柴玲，他們也說求之不得！這實際上是一個三方聯合陣線，十分有利於各個學生群體的通力合作。林耀強約請三方面的人都去北京飯店商議實施細節。

下午兩點過，當我步行去北京飯店走在長安街上時，突然聽到一陣陣沉悶的「炮聲」。等消息傳來，才知是六部口和新華門前有軍警施放催淚彈所弄出的聲音。

林耀強約的時間是兩點半。但我們等到三點，還沒甚麼人來開會，我們便只好到北大即北高聯的總部所在地，去找高聯的人。

開希要做副總指揮

在北大 29 樓的一幕，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大林騎著一輛自行車，後面帶著梁二、前面擁著程真，興致勃勃地繞著「民主與科學（D & S）」雕像周圍的小路玩。一幅太平圖景，同我惦記廣場焦慮的心情形成強烈的反差，使我感觸頗深。

另一幅場景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在 29 樓外。自行車棚下坐著大林、開希、人大駐北高聯的常委和我。開希已經得知廣場指揮部願意接納二名北高聯的代表作副總指揮，便十分熱切地要到廣場上來，他說，我是最該到廣場上作指揮的了。希望超華到廣場，誰也沒爭議；另一個人我願意是楊濤，但絕不願意開希再到廣場上來攪混水。因此我正色對開希說，我們請的是北高聯代表，目前師大駐高聯的代表是梁二，你在高聯沒有任何身份，怎麼能請你去？

開希十分機智，說「我是北師大自治會的主席，而北師大自治會是主席負責制，我現在就宣佈撤銷梁二駐北高聯代表的身份，由我代替。我現在就是北高聯的常委了，你還有甚麼意見？」弄得我啞口無言，心想，這叫甚麼民主程序？

超華、楊濤正好都不在，我又急於要回廣場，開希利用這個時機，拉上人大那個同學，要到廣場上來擔任副總指揮。那個同學在幾番推辭之後，終於抵抗不住開希的三寸不爛之舌，蹬上大林租的車，和我們一道趕往廣場。

當我們在歷史博物館前下車，往絕食團廣播站走時，我內

心不安起來：帶開希來廣場作副總指揮，柴玲和李祿怎麼會答應？開希興沖沖地拉著人大同學走在前面，我向大林悄聲講了自己的憂慮：高聯沒有正式決議指派開希，廣場指揮部如何接納？不用我闡述，大林已深表同情地連連點頭，原來他也有同樣的憂慮：開希這不是又要亂來？[336]

廣場宣誓與民主大學

晚上九點，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337]

> 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九點過，張伯笠跑到指揮部來，說他決定就在今晚十點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開幕式，請我們都去講講話，最後柴玲代表指揮部去了。天安門民主大學張伯笠自任校長，請項俊任教務長，項俊是個民主黨派人士，但很年輕。[338]

「他們真開槍了！」

天黑後，各路消息傳來：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

晚上十一點鐘，第一個死訊傳來，據說是北師大的女生，於十點二十分在西長安街被軍人打死。[339]接著，流血傷亡的噩耗如冰雹一般猛烈地砸來。有些糾察隊員滿身是血地跑來，用顫抖的聲音講述一幕幕令人難以置信的見證。

一個在軍博堵軍車的糾察隊員說：十點過那裏響起了槍聲，開始大家都不怕，以為是橡皮子彈。看到躺下的屍體和地上的鮮血，才知道是真子彈！「他們用的是真子彈，而且是開花子彈！」他沿著軍博南側的胡同走回廣場，與士兵同步，只隔一排民房，因此能偷偷觀察他們怎樣殺人、收屍。他看見士兵開著垃圾車在後面，見到地上的屍體便用塑膠袋裝起來往車上搬，有的乾脆潑上汽油燒掉！而且還看見士兵自己在燒軍車，是指揮一些便衣燒的。

北大籌委會的姬軍也滿身是血地跑到指揮部來，對柴玲激動地講述他在長安街上如何與軍隊遭遇，一個九歲的小孩如何死在了他的懷裏。血衣一件件地送來，血淚見證在廣播中不斷地控訴，形形色色的子彈也來作證：從食指粗的彈頭到連殼長達八九厘米的重機槍子彈、開了花的彈頭、手術室取出的開花彈頭的碎片……一切都證明，他們真開槍了！

開希講話後「暈倒」

十一點過，吾爾開希跑進絕食團廣播站。這時，指揮部人馬全在這裏，我坐在廣播員和審核編輯間，直接主持這個關鍵時刻的廣播工作，正如廣播站初建時那樣。見開希激動地跑進來要講話，我們都攔不住。只聽開希激動地高喊：

「他們已經拿起了屠刀，我們要團結起來，嚴懲殺人犯李鵬！用我們的血淚，誓與廣場共存亡！」[340]

他的話並不太長，但好幾次我都差點切斷電源。好在剛講到這些，他便喘氣要昏倒。這時，隨同的兩個醫務人員趕快護住他，廣播裏傳出緊迫的呼叫聲：「救護車，救護車！」開希喜歡昏倒，我早有耳聞，很多人認為他是為了製造悲情而裝病。這一次他就倒在我的面前，滿面紅光，兩眼有神地左右掃視。[341]

很快，一輛救護車開到廣播站外。那兩個醫護人員即刻抱

來兩大包氧氣袋，插進開希的鼻孔。見到人們將開希送進救護車，我實在鬆了一口氣，他不會再到廣場上來惹麻煩了。[342]

轉移財務部

以前認識的那個大個工人找到指揮部來，談了幾句我便感到他的恐惶。他希望跟著指揮部走，無論指揮部到那裏都願意。我安慰他説，指揮部轉移時一定會帶著財務部一道走，希望他到財務部的糾察隊，因為我感到這時保衛財務部的糾察人手不夠。我送他到紀念碑三層，介紹他給姚曉燕和郝建江，並讓他們凍結財務，清點帳目，隨時準備轉移。

劉光這時也急迫地催促我：必須趕快轉移財務部，再晚怕是救護車都全撤走了。我同他商量過轉移的辦法，就是利用廣場上的救護車，將財務部的同學「救」出廣場。這時，我還沒完全意識到形勢的嚴峻，只是想不到萬不得已財務部不離開廣場，離開也不要太遠，準備天亮可能沒事再回來。聽到劉光這麼急迫地催促，才想起姚曉燕的母親的託付，於是決心轉移財務部。

我到紀念碑三層，將姚曉燕和郝建江單獨叫到一個帳篷中，對他們宣佈轉移。我讓他們帶上幾個得力人員，悄悄進了「北大特糾」的棚子，孟昭強在這裏負責，我請他派幾個特察守護。

為指揮部留下五千元

在這個棚子裏，我又對大家講了眼前的危急局勢，與大家商定轉移方案，並為指揮部人員留下五千元，以備不時之需。後來我有些後悔沒有多留些，記得這時財務部還有七萬多人民幣，港幣則約三十萬，但由於之前王文的綁架案，我不願再引起猜忌，心裏卻又實在覺得對不住指揮部的同學。

我宣佈了行動方案，指定二人護送這筆錢。當我點這二人的名時，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期待著接受這項重要的歷史使命。我同二人商定好聯絡方法，並對他們說，萬不得已時可以毀掉錢，但必須保住帳本，以對歷史有所交待。他們保證，將以生命來保護它。這時，劉光已在棚外等得不耐煩了。他在廣播站呼叫救護車，我親自背著其中一個同學，穿過馬路到歷史博物館前，這時只剩下二輛救護車了，而且都正發動著，隨時要走的樣子。

我和劉光將兩位同學送上救護車，這時一個年輕人愴惶跑來，醫生無論如何不讓他上車，開著車走了。這人追了幾步，抓住車後甚麼地方吊在車上，但不到一百米便摔了下來。劉光輕蔑地罵了聲「膽小鬼！」

6月4日 星期日 陰 下午雷陣雨 晝30℃ 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祿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343】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做指揮部。我讓李祿和柴玲等人兩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篷。這個方位最不容

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344】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祿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裏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只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345】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346】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〇〇八和北大 28 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兩箱「北京大學」T 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

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麼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347]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他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348]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

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〇〇八的下屬、北大28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他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兩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仗，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349】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採

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裏，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

這時是凌晨三點三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四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

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四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七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350】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裏。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351]李祿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祿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祿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地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困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

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佈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裏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淀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只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説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352】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佈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扎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

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搜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四點五十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兩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裏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祿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353】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祿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祿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裏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

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354]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 11 名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 300 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 11 個同學！[355]〔圖 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



〔圖 63〕1989 年 6 月 4 日，六四凌晨 6:20，三輛坦克揚長而去，毒氣瀰漫。目擊者迅速上前搶救靠在柵欄上的體育學院學生方政。馬路邊有 11 人死亡。

〔圖 64〕1989 年 6 月 4 日，六四凌晨 6:25，方政的雙腿被坦克碾斷，兩個人試圖幫他包紮被碾碎的雙腿。





〔圖 65〕1989 年 6 月 4 日，在西單一家商店的牆上，赫然寫著幾個烏紅的字：「這不是漆，是人血」！

證明這裏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圖 65〕

「這不是漆，是人血！」

這時六點半，天已濛濛亮，市民們彷彿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週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甚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漆，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迴響，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

學等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淀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祿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淀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二十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裏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兇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

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裏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裏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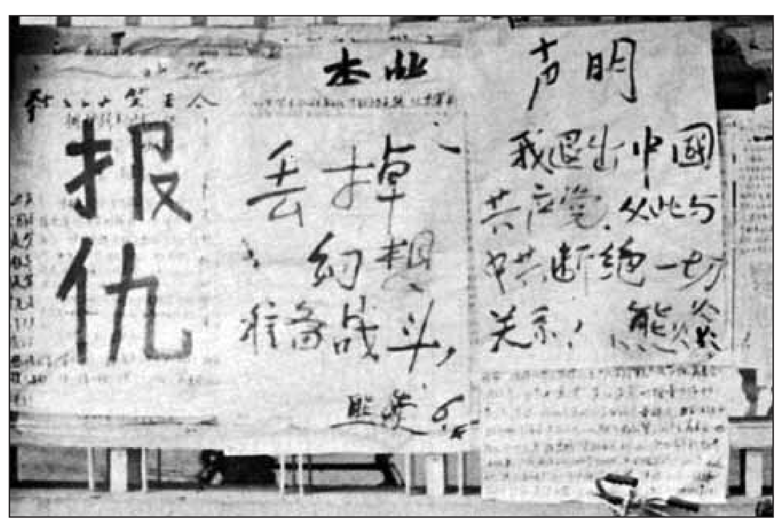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



〔圖 66〕1989 年 6 月 4 日，六四上午，指揮部帶領學生從廣場撤退返校，途經中關村。前排中央左起：李祿、柴玲（著間條衣者）、封從德、張伯笠、邵江、白夢。



〔圖 67〕1989 年 6 月 4 日，熊焱在六四當天憤然宣佈退黨，並號召「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356]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357]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裏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圖 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 29 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 28 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358]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祿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359]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祿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

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祿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裏，請他保留或處置。【360】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裏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楞是堅持分文不要！[361]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只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362]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

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託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裏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

那裏躲避。[363]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裏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註：

---

[333] 6月3日早上，王超華號召罷工罷市。見「訪學運領袖王超華」，《爭鳴》1990年4月號。

[334] 這個原則可能沒有得到完全貫徹。據馬少方回憶，「6月3日晚的天安門廣場『工自聯』帳篷裏，見周勇軍和許多工人朋友一起在那裏忙著製造汽油彈，他的勇敢，也讓我佩服。」見馬少方「歷史鞭打現實」，《「六四」參加者回憶錄》第102頁。

[335] 可能這就是5月31日晚三方協調會上商議過的方案。據柴玲回憶：6月2日那一夜，她和李祿、王超華、鄭旭光及外高聯的同學談了一夜，決定請北高聯和外高聯各增加兩個常委的名額。見《回顧與反思》第230頁。

[336] 據李祿回憶，吾爾開希到了指揮部正式要求六小時指揮權，當時柴玲和李祿都分別問「你作總指揮有甚麼打算？」他説，「我也不知道。」見《回顧與反思》第308頁。

[337] 李祿説3日下午六至八點他主持了最後一次記者會，並提出「打倒李鵬偽政權」，開希也在場。記者會上報告了凌晨的交通事件、六部口、大會堂事件，及到公安局送槍的證據和收條。兩位傷者也來作證，其中一位是那個著名的拿著鋼盔的人（國家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兵）。見《回顧與反思》第308頁。〔圖68〕

[338] 張伯笠在巴黎會議上詳細回憶過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晚上十點開始，柴玲剪綵，馬少方、老木、趙瑜致賀詞，這時名譽校長嚴家祺趕到，上第一課，講了大概四十五分鐘，十二



〔圖68〕1989年6月3日，染滿血漬的國家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兵，手執打傷他的鋼盔，大聲道：「看著我，這就是我愛國的下場。」

點五十分結束時，軍隊已進入廣場(《回顧與反思》第302-303頁)。但據包遵信回憶，當晚嚴家祺與他通了三次電話，十一點左右回到家時、十二點多和一點左右(《未完成的涅槃》第263頁)。嚴家祺在1990年5月回憶說他是在十二點離開廣場，此前十一點半他到廣場講了二十分鐘左右就回家了，離開廣場時並沒聽見槍聲(法文《北京地震》第503頁嚴家祺訪談)。不過據他現在的修訂，那個記憶並不正確，應該是十一點前就離開廣場了，「在接受法國記者採訪時，對1989年6月3日晚那一天的時間估計，不像留在廣場的人那樣精確，有一、二小時的誤差。而今天看來，6月3日每一小時情況都不同。」

【339】備忘錄原文是「軍事博物館附近」，但比軍博更往西的還有五棵松、公主墳，故此改為「西長安街」，具體地點、姓名

待考。

【340】我得到一盤當時的錄音，其中有開希的部分原話：「[前斷]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我們必須用我們的血、我們的汗、我們的淚，來堅決要求嚴懲殺人犯李鵬！李鵬不死，不足以平民憤！血絕不能白流，我們的同學不會白死的。嚴懲殺人犯李鵬！〔後斷〕」據《華僑日報》4日頭版報導，吾爾開希在廣播站説「學運經歷過一段和平階段，現時有需要作出正當防衛，並不違背非暴力原則。」而《驚心動魄的56天》第177頁説吾爾開希當晚稍早前在北師大廣播站號召「同學們要拿起家伙自衛」。

【341】很多人相信開希的暈倒不是真的。李祿記得當時廣播站的王童拿起話筒喊「吾爾開希又……暈倒了」，還説那個「又」字拖了很長時間(《回顧與反思》第308頁)。侯德健認識吾爾開希的醫生，所以和劉曉波都「知道他是裝病，而且警告過他不能這樣做」(見5月18日「我提議馬拉松絕食」一節的註)。

【342】據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回憶，吾爾開希離開廣播站後還去紀念碑逗留了半個小時，然後乘救護車離開廣場(《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221-222頁、《開放》1990年7月號46頁)。而據陳子明妹妹陳子華透露，王丹按王軍濤等人逃亡計劃的安排，當晚不在北京市區。官方資料説，王丹是在晚上十一點離開北京的，見《70天大事記》第79頁。沈彤在回憶錄中詳細描述了他在「六四」阻攔軍隊及之後躲藏的經歷，並稱他是在6月11日離開北京的，但有人指證他在「六四」當天就乘飛機去了美國。沈彤在5月18日已經去公安部取得護照。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279-280、327-334頁。

【343】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像記錄是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NHK電視臺播放過。

【344】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麼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制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面。

【345】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 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凌晨兩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遭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 2/3 ，還有 1/3 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346】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面，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 309 頁。

【347】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説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註：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制，儘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説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第 339 頁）。

【348】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

【349】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説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佈

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麼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 197 頁。

【350】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七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7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七點，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 199、201 頁。

【351】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352】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4 月 18 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353】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2至3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354】張伯笠在 1998 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 11 個同學之後，「李祿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只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祿、墨軒帶著一部

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麼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355】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5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9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4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歲，已通過考研，「6.4，凌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11位死者，中間差了4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 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 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 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份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

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只有1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2人失蹤，總共只有3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356】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瞭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一、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派出28輛校車數百人去幾十家醫院的調查結果，將近三千；二、美國學者Timothy Brook書中有六四當天11家醫院的死亡數字共478人，據此他推測整個北京124家醫院應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61-162。「六四」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廣見6月29日港台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誇大，又說「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六四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號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六四」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號46頁)。李祿則在7月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357】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

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叭」；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裏，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六四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歷，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臺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號87頁。

【358】徐璐，台灣《自立晚報》記者。

【359】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360】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偷偷告訴他北大已證實有4人死亡，他記得名單上有化學系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系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叫嚴勇是計算機系博士生，很活躍很

支持籌委會，而嚴文本來卻並不熱心於學運，但六三晚上卻非要借籌委會的攝像機去拍攝，為歷史作證。那台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經常勁同意給嚴文用。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六四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他為記錄歷史尋求真相而付出了最高昂的代價。

【361】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362】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363】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是他和蔡健商議，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蕓（北大圖書館系學生）取五千元，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後　記

下面，我大致講一下我們「六四」後逃亡的經歷、我在海外流亡的情況、及與本書相關的逐步探尋和認識八九學運真相的過程。逃亡經歷有的地方至今還得模糊處理。

「六四」後的逃亡

我和柴玲6月7日晚到達武漢大學。從離開北大到北京火車站的經歷，這裏不能細講，因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騎車帶著柴玲，一邊騎一邊睡，結果栽倒。穿過長安街時很驚險，軍隊控制著路面，民眾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險。火車票是隨機買的。我當時的安全策略是：切斷一切親友的聯絡，沿途不留任何痕跡，隨機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隨機下車隨機換乘，這樣，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裏，當局自然無從猜出我們在哪兒。結果正好買了兩張去廣州的票。火車開到武漢長江大橋前，因學生臥路，就走不動了。車上，我們認識了一位台灣商人，他似乎黑白兩道都通，願意幫我們，並約11日中午在廣州白雲山賓館見。火車在長江大橋前堵了很久，我擔心出問題，便與柴玲下車，換公共汽車去了武漢大學。

到武大時，那裏的學生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聽他們說，頭天晚上的追悼會規模極大，從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國講述了「六四」凌晨他親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壓學生的慘景。我們在那裏也看見了官方電視上的曲解畫面，滿是民眾燒軍車殺解放軍的鏡頭。另一方面，我們沿途收聽美國之音和BBC，死亡數字越來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懷疑這些數字，覺得有必要對外講明真相以正視聽，就暫時放棄沿途不

留痕跡的安全原則，約了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李海濤為我們準備錄音設備，讓柴玲做了一個40分鐘的錄音。我請李海濤翻錄30盤磁帶，到街上散發，以保證傳到海外。兩天後，蔡崇國游水到香港，將磁帶交給電視臺播出。[1]

做完錄音我們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隨機乘坐公共汽車去南昌。很多年後才得知，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有幾個便衣一直跟著我們。這消息是從公安局內部傳出的，時間地點全部對得上，很難有假。那幾個便衣上岸時就去打電話，請示是否抓捕，結果我們已經不見了。也許是偶然，我們命大；也許他們根本就同情學運，故意網開一面。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廣場，我們看見民眾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我們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台短波收音機，當時國內民眾為了收聽海外電臺瞭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機幾乎脫銷。

之後又是隨機地選乘火車，經湖南株洲輾轉到達廣東某市。在那裏有一段奇遇，遇到後來救助我們的一群義人。詳細情況還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況現在可以說一說。

在國內躲藏十個月

遇到那群義人的機緣說來很奇妙。我們去那個地方是因為坐錯了車，而他們本來也不會在那裏待那麼久，就這樣萍水相

---

[1] 據何頻「民運人士李海濤和孫健尚陷囹圄」一文，李海濤當時34歲，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蔡崇國的同學），1990年6月16日被捕，8月29日被判4年徒刑。起訴書中提到他錄製和傳播柴玲錄音，直到89年6月11日還組織了「六四死難者週祭」校內遊行。起訴書中說，「次日（6月9日），李海濤等人將這一講話錄音磁帶複錄了一百餘盤，先後在武漢大學、中南商場等地播放、出售，致使柴玲的反動講話錄音流傳至香港、台灣、日本等地，造成極壞的影響。」見《百姓》1990年10月1日第28-29頁。實際上，那盤錄音6月10日就在香港電視臺播放了，全球各家電視臺也很快轉播。

逢遇到一群修煉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學生，他們趕緊把我們藏到家裏。過了幾天通緝令下來，21個學生的照片出現在全國的電視上，他們才知道我們具體是誰。這一藏，就是十個月。

當時我們的價值理念截然不同。煉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則是西化、反傳統的。他們幫我們，只是覺得政府不該殺學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雖然觀念不同，還是冒險相救，納粹時期德國基督徒救猶太人的情形，大概與此類似。幫忙最多的我們叫他大哥，後來我們的錢用光了，大哥把他準備結婚的錢全拿出來。這些都令我十分感動，但我觀念發生徹底變化，卻源於一次闖關中的奇遇。

起初我沒想闖關出國，只想留在國內靜觀其變。觀來觀去，卻是誰誰被捕、誰誰逃到海外繼續民運的消息。藏在一個小空間久了很是無聊，聽美國之音說秦城監獄裏七個同學關在一起，還讓我很是羨慕：一來不再擔驚受怕，二來大家一起正好切磋。當然他們遭的罪遠沒這麼羅曼蒂克，這都是窮極無聊時的想入非非。

於是我跟大哥商量闖關。起初他不同意，覺得風險太大。好說歹說同意了，就有個條件——我必須一起求觀音菩薩保佑，並唸「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因為我是當事人，當事人不求，光他們求是沒有用的。六字大明咒也叫六字真言或觀音心咒，據說消災除障的神力極強。我跟他們唸了一週，直到學會金剛唸，也就是唸在喉嚨裏而不出聲，後來整個闖關行動中都保持金剛唸的狀態。這一週他們還用來布氣場，並帶我做上香、念咒等一套儀式。考慮到大家的安危，我不僅不能拒絕，還很誠心地參與這些祈禱儀式。

然後我們就去闖邊境。大哥和我順著田埂走，快到盡頭時，突然從樹後跳出兩個士兵，用當地話問我們幹什麼的。大哥很鎮定，上去跟他們聊天，問他們怎麼會在這裏。士兵說是專門「抓小道」的，很多北京來的學生就從這裏跑出去。奇怪的是，我就在面前，只要問我一句我就暴露無遺，可他們始終

就沒理我，只查大哥的證件，最後讓我們過去了。大哥很警覺，此前已探過幾次，這條路都沒士兵，怎麼今天冒出兩個來？他決定撤銷整個行動。

在往回走的途中，經過一片農田。正不知該走哪條路，見一農家婦女在耙地，另一塊田裏還有一些人。大哥上前跟她聊天裝作土地調查，這位婦女開口就問是不是北京來的學生啊，又指著小路盡頭大馬路上的一個小棚子說，你看那邊有輛吉普車，當兵的在抓北京來的學生。我們一看，20多米遠處果然有輛吉普車在小棚子後面冒了個頭，於是趕緊從另一條小路走了。

走了老遠上到大馬路，找到招呼站，準備坐公共汽車回去。大哥擔心我們一起目標太大，就讓我先走，並說前面過橋沒有邊防軍崗哨，過橋後到哪兒下車匯合。結果車在橋前被邊防軍攔住，上來一個個地查證件。我緊張到極點，假裝掏兜，還好我上車時選了窗邊坐不太顯眼的地方，他們沒查我就查後邊的去了。他們查完後邊走回來時，我的心已經提到嗓子眼了，盤算著是裝聾還是作啞。然而奇跡再一次發生，他們沒問我就直接下車了。

此前此後還有一些奇異的遭遇，包括此前半夜在黑黢黢的山脊梁上遇到走黑道的神秘人物，嚇得我們躲在山梁上半個小時不敢動，這裏不細說了。總之，我沒在預定地點下車與大哥他們匯合，而是獨自去了邊境小鎮。試了一下午也沒成功，偷偷接觸幾個入境的華人都不敢幫我。最後遇到兩個進大陸送聖經的荷蘭傳道人，他們商量後同意回去幫我傳遞信息，找人來營救。我等了幾個小時，這時天色已晚，才不得不離開。幾年後我又見到其中年輕的荷蘭傳道人，他叫Otto，女兒剛出生，正好在6月4日，他告訴我當時消息確實傳到了，但來營救的人卻沒找到我。乘車離開小鎮還有一次盤查，這次比較鬆，軍警探個頭瞅瞅，就揮手放行了。

這是我們在國內逃亡時唯一的一次外援，可惜沒有成功。幾經周折回到大哥家，他們驚訝到說不出話。他們以為我已經被捕了，趕緊將柴玲轉移走，從此我們就一直分處兩地。中間只有一次機會去看柴玲，她在我「被捕」後差點去自首，顧及大哥等人的安危才打消這個念頭。後來她又曾去軍隊醫院割雙眼皮，因為通緝令上說她是單眼皮。

走出無神論的樊籬

大哥後來對我說，那個農家婦女就是觀音菩薩化身。我沒大哥那種確定，但幾次化險為夷的經歷，卻讓我不得不認真面對。如果說這一切都是偶然，可在不到2個小時內，連續3次逃脫魔掌，碰巧的概率也太小了。科學講眼見為實，擺在眼前的這些現象讓我不能盲目否認。此前我被灌輸了很多無神論的觀念，從沒認真想過天地、宇宙、人生是怎麼回事，這時我開始認真思考這些問題。這之前他們勸我煉功我都沒心情，這次我決定試一試。

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跟阿婆（大哥的母親）煉功。先上一柱香，再打坐。聽阿婆講，她練功時能從天目看到師父，是位中年婦女。這讓我想起絕食時，一個中年婦女跑來廣播站說：「我帶來二十幾個弟子，有辦法讓你們絕食不會餓死」，我問怎麼配合，她說「你廣播一聲，學生們心裏接受就行」。我跟阿婆描述那婦女的樣子，她說就是她。後來大哥帶回一本有幾個氣功師照片的書，阿婆指著一個說，就是她。我一看，正是到廣場的那位女氣功師。她「六四」後也被捕了，當局用了別的理由抓她。

煉功後，慢慢就有了很多體驗，包括一些比較神秘的體驗，這裏不多說。後來我在原始森林裏面還呆過三個月，周圍沒人煙，走好遠才有一座廟。那段時間是練功最好的時期，到後來都不想離開中國了，成天研究起子午流注。但後期幫助我

們的人太多，大部分是在氣功團體中慢慢發展的外圍成員，一個環節出紕漏，百十號人都得遭殃。所以最後有機會出去時，我還是決定走。

離開前一晚，大哥對我們說：「出去後多讀書，少碰政治。不要宣傳我們，練功講行善積德，不求功名。你可能塵緣難了，有朝一日你回來，還需要躲藏的話，你還可以來我這裏。」那晚，我向觀音菩薩發了一個大願，出去後要竭盡所能求取真知，然後迴向有情眾生。臨行前，大哥還找人用《周易》卜卦，結果是「大過」卦象，利有攸往、亨，意即能通過，其象曰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大矣哉，但一塊大木浮在水中，還是有風險。在行前的晚餐上，大哥將我們交給阿洪。阿洪是後期發展的功友，他有辦法將我們偷渡到香港。本來最後逃出來的管道只要幾個小時，結果我們花了 108 個小時。

在國內逃亡過程中，我一直沒有同家人聯絡。很多年後才得知，劉光冒險去了我家，告訴我父母我們還活著。這個動作確實很危險，當時我的所有親友都受到密切監視，不僅我的父母兄妹，我在宜賓的所有親戚、我的中小學同學也都在監視網中，有的家附近乾脆住了警察24小時等候我們自投羅網。劉光在一年後又與北京學生串聯紀念「六四」，結果和彭嶸等人一起被捕，他被關在武漢的監獄。

總之，我們的逃亡策略是成功的。比較一下就知道：聯席會議王軍濤、陳子明、王丹等社經所圈的人在「六四」前兩週就在準備逃亡，結果不是走投無路就是被自己人出賣，除了張倫幾乎無一漏網。廣場指揮部事先則完全沒有出逃計劃，卻反而大多數都到了海外：李祿、辛苦、白夢最早，柴玲、我和張伯笠則晚很多。就連受傷在醫院的張健也逃脫了，只是留在國內 12 年，直到 2001 年才到法國。

初到海外的大困惑

我們在香港停留的時間很短，這段經歷在拙文「阿洪：地

地道道的「六四」無名英雄」中有較詳細的描述。該文收在拙著《天安門之爭》中，六四檔案(64memo.com)網站上也有，在此不贅。

1990年4月，柴玲和我到達巴黎。「六四」屠殺十個月後我們居然還能逃脱，當時成為全球轟動一時的新聞。民主中國陣線（民陣）專門為我們在巴黎新凱旋門舉辦了記者招待會，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聲明歡迎我們去美國。法國最先接待我們，因此我們還是申請了法國的政治庇護。到巴黎後，我讀報刊雜誌，發現外界對八九學運的瞭解極為表面，幾乎就是外行看的熱鬧，於是萌生記錄歷史的念頭。隨後幾個月我更意識到，這場運動雖在海外得到某種程度的延續，但因過分媒體化，已從民眾的運動蛻變為明星的運動。這時我也感受到柴玲與李祿的變化，我們出來不久，李祿趕來法國看我們，我就説今後我們各自走的路會很不同，後來竟是不幸而言中。我固執於運動自發的本色，拒絕扮演明星，而柴玲因被推舉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對我説是「穿上紅舞鞋，只能在舞臺上旋轉不止」。為此我們分歧很大，此後我們就漸行漸遠，終於在年底簽訂並公佈了我們的離婚協議。我一直認為，守不住本色，名與利就是最大的毒品，比海洛因還容易讓人執著，但將終受其害。

「六四」一週年前夕，我們來到美國。紐約肯尼迪機場陰霾的天空，預示著前面道路的崎嶇。柴玲忙於周旋在上層路線，國會、白宮、媒體專訪，繼續旋轉不止；我則跑到留學生的群體中去，或去找因「六四」而流亡的同學。在夏天和秋天，我兩次在舊金山找到常勁，同他核對「六四」史實。與此同時，我參與了全美學自聯二大，主張其非政治化，並與蕭強、傅新元組建人權委員會，後來又參與了全球學聯的活動。在華盛頓的時候，由全美學自聯安排，我在美國國會作證，要求美國對中國進行有條件的制裁，條件就是尊重人權、釋放「六四」良心犯。國會聽證會上與我對立的是一個女留學生龔小夏，她為美國商界背書，要求無條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不附加任何人權條件（十年後民運中的王軍濤、王丹、陳一諮等人也持同樣立場，美國政府最終在這一問題上放棄了人權原則）。然後我隨學自聯的時和平去了黑堡附近的幾所大學，與那裏的留學生聚會。在波士頓與留學生交流，當中認識一位四川老鄉，MIT計算機系的高材生，世界級名師帶的博士生，很快就要畢業，家庭事業極其美滿，卻偷偷對我說想自殺，覺得機械化的人生了無生趣。

他的話對我有衝擊，加深了我當時對科學和現代人生價值的疑惑。這時在一些朋友的協助下，我已重獲波士頓大學的博士獎學金，但我很快放棄，回到法國。不久又因列席民陣二大來到美國，就轉學到舊金山硅谷中一所計算機學院學電腦碩士，計算機學院院長陳樹柏教授找到台灣的一家電腦公司為我提供半工半讀的獎學金（見目錄前圖四），但最終還是放棄回到法國，這件事我一直感到很慚愧，1993年還專程去過他家向他道歉。

1990年秋在舊金山是我人生最衝突的時期，生命在四個方面撕裂，構成了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蛻變。我決定遠離明星民運、放棄多年的美國留學夢、回法國棄理從文修習宗教學、並與柴玲離婚。從此，我脫離了現實社會的一切固有軌道，既非在中國原有的留學——工作——成家立業的軌道，也非流亡海外跟隨潮流從事民運的軌道。追尋真知堅守真實，為此而脫軌、放下乃至出家的心態，是我此後人生軌跡的基調。

回巴黎修習宗教學

蘇格拉底說，人生貴在省思（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生命固著在無神論或進步主義、科學主義之上是悲苦的。這種悲苦不在物質層面而在精神和心靈的層次上，這我很早就有體驗。在北大那幾年，別人都欽羨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品味其中的缺失。缺失的不是物質的前途與希

望，而是內心的自在。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生存焦慮（Angoisse existantielle）。初到海外，我有緣接觸到各界一些成功人士，他們許多顯然並不自在，心靈被俗世纏繞，束縛得很緊。高處不勝寒，越高越虛幻，因為知道很多外界不瞭解的真相，世事常顯得虛假，在虛假中你還得偽裝，同臺演出世俗的大戲。我常想，佛教說「境由心造」，大概我那時的感受其實正是自己心境的反映吧。

到巴黎後不久，因一奇妙的機緣，遇到我的導師。那是在著名的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他和蘇曉康一起演講，題目是中國的社會。蘇曉康自然還是《河殤》那套思路，我的導師則把「社」與「會」拆開講：「社」是土地神壇，「會」則是因神壇而起的各種集會（如香會、茶會、撣塵會），「社」與「會」就是中國民間的基本組織方式，由廟宇分香等制度將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連接起來。這令我耳目一新，就站起來講了幾句在國內民間社會的際遇，並見證在黨文化下我們對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無知。導師聽了很高興，邀請我去他家。從此我跟了他十幾年，直到我博士畢業。我的導師是荷蘭人，卻在台灣做了道士，又在巴黎教了三十年書帶了幾十個博士，歐洲的道教研究就是他領銜主持，在世界道教研究領域他也是泰斗。他的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叫施舟人，頗有佛道渡人的意涵，也與原名Schipper的意思暗合。施先生的人生經歷非常傳奇，父母都是基督教牧師，他自己甚至三次受洗，但二次大戰嚴重動搖了歐洲的精神世界，他去巴黎盧浮宮本來是學藝術史，受到中國藝術的吸引開始研究道教，然後去台南認一道士為義父，得以修習正一道（天師道）科儀。1968年，他受張天師冊封的符籙成為正式的道士。後來為了女兒的教育，又回到巴黎教書並研究道教。

我遇到施先生時，他剛接掌法蘭西學院中文圖書館。這是歐洲最大的中文圖書館，我曾將自己關在裏面通宵達旦地讀書。後來施先生做了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和萊頓大學漢學院

院長，我跟著他在巴黎與萊頓兩地跑了兩年，研究明代的國家禮儀。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去拜見余英時教授，余先生指導我從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開始研究。然後我到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待了半年，研究迄今倖存的國家大禮——祭孔儀式，實地考察了台灣11個縣市幾乎全部孔廟，並在史語所黃進興研究員主編的《大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分析「台灣祭孔典禮」的論文。其實我的導師很希望我去台南，跟隨他的師兄陳榮盛道長做道士，我悟性不夠，始終沒聽從，但每次經過台南都去看望陳道長。導師希望我做兩個博士論文，在巴黎用法文研究道教與中醫，在萊頓用英文研究儒教禮儀。在萊頓大學的論文擱淺，原因竟與「六四」和李鵬有關。那時我的開題報告（相當於碩士論文）已被評為全院第一，拿到獎學金本不成問題，但在校級學術委員會上，一個台灣來的梁姓教授竟提出，李鵬正要訪問荷蘭，若給我獎學金，萊頓大學與中國的學術交流恐怕會受影響。此事讓我明白，就連西方學術界也是那麼害怕中共，國內知識分子的犬儒病就很能同情了。

我最後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黃帝內經．素問運氣七篇研究》，2003年7月3日在巴黎索爾邦（Sorbonne）通過答辯。五運六氣是中醫理論的宇宙論基礎框架之一，而七篇大論乃其奠基之作，於唐代中葉插入《黃帝內經．素問》，後一度成為顯學。其成文年代在學術界長期辯難不休，我的論文在查考過往研究的基礎上，解開了這個千年謎團。我引入音韻與避諱兩個新的分析方法，得出結論：七篇大論應成篇於南北朝後期，約西元5世紀下半葉至6世紀上半葉之間。該論文還對七篇中的運氣學說作了仔細分析，顯示其為陰陽五行系統的發展與革新，兩個疊合的系統奠定了中醫的理論框架並共同指導此後的醫學實踐。論文還將《素問》運氣七篇完整地翻譯成法文並作了相應的註釋。我的論文共有550頁。

通過對中醫經典和其背後中國哲學的宇宙觀的研究，我明白了為甚麼中國文化一直不重視創世神話。直到漢代，創世神

話在中國百家典籍中闕如。勉強可以算得上的盤古神話，三國時期才出現在陰陽家的書中，很難說不是受西域的影響。中國不重視創世神話，是因為中國特殊的宇宙論。中國人對時空及宇宙起源，有一套特殊的看法，簡單來說就是循環觀。對比一下就很清楚，猶太教與希臘哲學奠定的基督教，及由此形成的近現代科學，都將時間看作一條直線，因而有創造、末日、進步等概念。直線需要起點，創造就是起點——在宗教是神創，神的話語（logos ，約翰福音說的「太初有道」）創造世界，在科學則是宇宙大爆炸學說，而大爆炸的零點科學家無解，或只能歸於創造神；直線需要終點，末日就是終點——末日審判、世界毀滅等等；起點與終點間則是進步，因此進步主義在西方很流行，接著在全球也很流行。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時空觀是循環，而非直線。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朝代盛衰……萬事萬物莫不在循環之中。老子甚至說「有無相生」，有生於無，無也生於有，可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循環觀導致中國文化不太需要創造神，因為根本沒有起點和終點。這在先秦古籍中尤其如此，譬如根本沒有「始終」這個詞，一概倒過來用「終始」來表述（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用「終始」來表述，就因是循環，終始相連，周而復始：一個朝代結束了，新的朝代開始；冬去春來，哪兒是始，哪裏是終？循環觀導致不太需要創造神，缺乏創世神話則又加強了循環觀。這和創世論與時間直線觀互為加強是一個道理。

追尋真知探索宗教

1990年秋，我在舊金山遇到基督教。一個叫「愛華會」的基督教群體，他們主要是來自香港和上海，有位上海來的姊妹在文革中拿一張紙畫上鍵盤堅持練習鋼琴，另一位香港來的弟兄通過禱告找到工作並追求到太太，他們誠心相信在困苦中得到了上帝的眷顧。當時我住在一位羅醫生家，每週都有幾次查

經班。幾週下來，他們已稱我主內弟兄。他們非常善良，從生活到靈命給我許多幫助。我最終沒有受洗，因為他們每做見證，總說如何燒了佛像，拆了祖先牌位，將儒釋道全當偶像崇拜來貶斥。我剛得到國內義人救助，無法相信他們因信奉儒釋道而難以進天堂。如果上帝將印度、中國這樣的巨大文明體置於不顧數千年，因沒聽到福音就難以上天堂，上帝豈不成了種族主義者？

回法國後我開始學習法文，同學中一半是穆斯林，精神面貌比歐洲同學要好很多，我就向他們請教宗教問題。開始我們用英文，然後到清真寺，裏面也有很多法國人，就逐步用法文討論。我的靈命需求猶如真空開了一個孔，沒日沒夜拼命吸收，三個月下來就會說法語了。那些穆斯林很認同各民族文化都有可取之處，他們常借用先知穆罕默德的話：「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我發覺伊斯蘭教義很純淨，上帝（阿拉）的概念非常抽象，行為規範則貼近日常生活。穆斯林很自豪《可蘭經》直接來自於上帝的降示，並稱之與科學吻合而不相悖，如「用水創造一切生物」。伊斯蘭文明曾在科技方面領先世界，尤其是天文、航海和數學。譬如現代教科書都說哥倫布15世紀末發現新大陸，但不知道他所接受的地球為球形的觀念則是來自於伊斯蘭世界。後來我在《元史．天文志》中發現，穆斯林至遲在13世紀就應已完成了全球航海，並有現代意義上的地球儀，知道地球水陸比例為7:3，且有經緯度的概念（「至元四年(1267年)，紥馬魯丁造西域儀象：……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三分為土地。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這比哥倫布早了兩百多年，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

我很深地進入了伊斯蘭的精神世界。對此我不僅沒有中國文化的包袱，反而慶幸沒包袱而容易接受另一個文明體系。我開始學習阿拉伯文，學會唸《可蘭經》的一些章節，尤其第一章「發提哈」，那是每日默誦19遍的禱告文。為了去巴基斯坦學習伊斯蘭教，我參加了在法國為期40天的「達瓦」，也就是

到各地清真寺巡迴見習。在一個清真寺裏，兩個白衣少年含著淚對我說，昨晚夢見會有一個中國人要來這裏。他們才十歲多，目光那麼天真無邪，不可能是在編故事。這種奇妙事情還很多，這裏不多說。不過，我並沒做完「達瓦」。走到一半時，一個意外讓我從伊斯蘭教中出來。

那是1992年秋天，熊焱從秦城監獄出來後到了美國，立即打電話給我。我很想同他分享伊斯蘭的心靈世界，談了幾句就明白，那離他實在太遙遠。那時萬萬想不到熊焱後來會成為基督教牧師，否則還會同他更深地探討。這件事讓我極度焦慮，我發現自己走得太遠，以致與以前的同伴都難溝通。接下來兩週我的嘴唇與喉嚨腫得不成樣子，以至於難以下嚥。一天晚上，在巴黎北郊最大的清真寺，我做了最後一次伊斯蘭的禱告，向上帝訴說我要出離伊斯蘭的因由，並求祂「引我上正路，而不是迷誤者的路」(這是「發提哈」中的一句)，如果錯了，就請顯示跡象阻止我，否則就讓我順利地走前面的路。結果，我就很順利地出來了。

接下來的故事還很長，這裏不多講。總之，之後我又經歷了源於錫克教（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調和信仰）的一種混合信仰、佛教、道教，最後回到儒教。1994年初我還差點出家，結果發現廟裏也不清淨。這時讀了所有能找到的錢穆關於儒家的書，驀然發現孔子的智慧，他對宗教深邃的洞察，也明白了中國精神的本源所在。

孔子的智慧，在對宗教的深刻體察，並將價值中心落回到現實人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對祭祀禮儀瞭如指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面對驅除疫鬼的宗教儀式則畢恭畢敬。但「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正如莊子所言「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將死後才能明瞭的鬼神天堂地獄之事擱置起來，而將注意力集中在現實人生。以前讀孔子，總以為他不過也是人，不像耶穌自稱是神那樣有信服力；經歷了這些宗教之後，才發現孔子的智慧實在超群，免去了我們無限

探求形上問題的困擾。所謂中國精神，就是「當下即永恆」，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道不遠人」，「當下」(here and now)就能找到價值的中心。「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如果每一當下都鄭重其事地做好，死後若有天堂豈能得不到永生？於是，永恆就在現世中尋求，所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所謂子孫繁衍香火不絕，祭祖以配天，慎終追遠環環入扣以回溯到天、道、上帝，以「參天地之化育」，終至「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樣，中國人的生命價值就可以在經史中尋求，而經史所載的都是現世人生的行跡，而非虛無縹緲的來世。

這個價值中心能解決各種宗教偏於一端的偏執，相互矛盾的極端傾向在「中庸之道」中得到圓融的解決。我考察的各個宗教，其中修行很高的人（如伊斯蘭教中的蘇菲、天主教的隱修士）最後都將日常人生當作最好的修煉課題。佛教進入中土，也漸漸向中土價值傾斜，極度講求出家的佛教也變成追求平常心、平常道的大乘佛教，尤其是禪宗的盛行。另一方面，中土信仰也受佛教影響，道教從在家火居的天師道變為出家修行的全真道，儒家從講求內聖外王文治武功的漢儒，演變為靜思文弱的宋明理學。宋明以降，三教合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最難消化的印度佛教也在中土生根開花，展現出人文化成之奇妙景觀。這些說來話長，篇幅限制，在此打住。

總之，價值與永恆的問題得到解答，我的心病也就很快癒合。說來很奇妙，「六四」後好幾年，每每做噩夢，除了血腥殺戮，常常夢回北大，或在火車上，或在校園內，或回老家，總有軍警追捕，最後都在緊張中驚醒。自從1994年讀了錢穆的書，了悟孔子之道，這樣的噩夢就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巴黎會議與《回顧與反思》

1990年秋，從舊金山返回巴黎後，我內心極度疲憊。四方面的「離婚」令我身心憔悴，整日昏沉。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導

師。作為心理療法，施先生要我寫下自己的經歷，不是為了出版，完全是留給自己。他看得很清楚，只有真相和對真相的堅守與探尋能將我從困惑中解脫出來。於是我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下了35萬字的《八九學運備忘錄》。那種昏沉狀態從一動筆就開始消失了，到寫完時已無影無蹤，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義——真相，堅守與探尋真相——無論生命的真知，還是歷史的真相。

寫備忘的過程中，我發現對許多人和事的瞭解並不透徹，於是又花了幾個月時間組織巴黎會議。為此我參加了巴黎「中國民主之家」，並當選中方主席。這是一些法國社會名流與中國留學生合辦的組織，這些社會名流主要是當時密特朗總統的幾位密友，包括法國人權部長、文化部長和巴士底歌劇院長，著名的聖羅蘭公司還提供了一間離參議院不遠的店面作為辦公室。我花了兩個月時間籌款，天天打電話，並聯系「六四」流亡學生與學者。最終得到美國一些「六四」基金會和法國人權部的捐款，共計80,868.99法郎和7,500美元（合約2萬4千美元），於是請來自世界各地的17位流亡學生到巴黎，於1991年7月17日至24日花了一週時間共同回顧與核對史實。

那次會議是學運組織各方面人物到得最全的一次，指揮部、對話團、北高聯和北大籌委會幾乎都到齊了，還有幾位參與了外省高聯的活動。會議沒事先預定議程，而是首先討論回憶大綱和引言順序，及各階段的主持人。每個階段由幾位主要當事人做引言，然後大家補充和質疑。雖然用了一週時間，卻還是很難回顧和核對所有細節。會議全程錄音，並決定以後謄寫出記錄稿後發言人對內容只減不加，以保證文本都經集體核對。

會後，我用剩下的經費請人謄寫錄音全文，由何平與劉學偉完成。然後去德國，請兩個留學生組織（八九學社與萊茵筆會）參與編輯，由石川和李勤完成。編完後將初稿寄送與會者刪訂，清樣也給我看過。最後刪節的部分並不多，刪節是因為

顧慮到在國內甚至獄中的人的安全。兩年後，終於出版了巴黎會議的全文記錄——《回顧與反思》。當時的經費極為有限，只印了 300 本。

《天安門》背後的戴晴

《回顧與反思》出版後，我以為可以放下了，因此關注點全在宗教上，參與了許多宗教團體，最後回到學院研究宗教學。但 1995 年 4 月底，柴玲的一個電話打破了我平靜的新生活。

原來，海外最大的中、英文報紙突然長篇累牘地討伐柴玲，並「揭露」八九學運組織「有陰謀挑起中共屠殺」。聯合報系的薛曉光和《紐約時報》的 Patrick Tyler 根據當時尚未上映的紀錄片《天安門》，指柴玲「期待流血、自己逃生」，並說這就是那個「陰謀」的證據。那時我還不知道，就在 1995 年 4 月，戴晴已在她的新書中宣佈：「柴玲在[1989 年]5 月 28 日向一位美國記者的哭訴即將披露於世」。[2]

戴晴宣佈的內容，與兩個記者「揭露」的內容完全一致：

「(柴玲說)『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當她被問到自己會不會在廣場堅持時，她說『不會』，『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她隨即要求記者：『這個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戴晴是在1995年4月的一段補註中宣佈上述內容的。那個補註的正文說，「陰險的見習政客們正用犧牲別人的生命來為自己鑽謀」，那是她從1992年陸續發表的一系列回憶文章的一個中心思想。她對柴玲恨之入骨，四處宣稱要「審判柴玲」。

---

[2] 戴晴《在秦城坐牢》第 103 頁。

柴玲的電話讓我大吃一驚。我知道，如果我不出面澄清，外界很難明白當時的複雜性，而極易相信戴晴和《天安門》妖魔化的剪輯。此後我寫了十幾篇文章，從各個角度進行澄清與分析，後多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在那些文章中，我介紹了我所瞭解的柴玲那段錄像的一些背景（如「空校」與南下發動聯省自治的計劃），證明柴玲沒有在錄像中說出的她要離開廣場去做的事，其實比留在廣場更危險，而其實她並沒有走，而是一直堅持到「六四」。我又比對錄像全文與那剪輯出來的兩段話，發現它們不僅在錄像中相隔40分鐘，而且根本是對兩個記者講的！我還發現，《天安門》甚至將別人說的話也掐頭去尾，變成柴玲自己的話。

對柴玲錄像，民運陣營內分歧很大。鄭義、白夢和張伯笠都在廣場廣播站工作過，這時奮起維護學運和柴玲。但令我非常驚訝的是，外界稱為「民運理論家」的胡平，竟然對八九民運的瞭解有極大偏差，他和哈佛畢業的龔小夏、丁學良等人，對柴玲進行口誅筆伐式的道德批判，而不顧史實。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其實都是戴晴的朋友，戴晴的書就是由丁學良寫的序。這年六四前後，我去了一趟美國東岸，在紐約《北京之春》「民運群英會」上，大家辯論得很激烈。李祿和張伯笠告訴我，王軍濤在背後使勁要整跨李祿和柴玲。王軍濤那時剛出國不久也在波士頓，據說經常和卡瑪、龔小夏等人聚會，可能還有戴晴；他們的矛頭本來主要指向李祿，有一次請白夢去，要他收集李祿的黑材料，白夢最終沒幹。此事後來王炳章也提到過。這些人對李祿剛出的自傳性紀錄片《移山》很不憤，後來「人權觀察」創始人伯恩斯坦寫信將李祿保下來，卡瑪才沒在《天安門》中提及李祿，後來她將那封信的事放到她的網站上。

那次旅行我在紐約和波士頓都見到王軍濤。那時我剛得到陳小雅《八九民運史》書稿，裏面「三線計劃」一說給我很深的印象，即陳子明、王軍濤等人利用王丹、包遵信、嚴家祺等

在第一、第二線對抗中共，自己卻在三線準備與李鵬進行政治交易。我在紐約「群英會」上提到此事，王軍濤自然有一套解說。隨後我去波士頓，與吳文津館長商談整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六四資料，王軍濤在那裏等我，繼續解釋「三線計劃」。下午柴玲開車送我去機場，車上還有王軍濤和楊建利。王軍濤對柴玲說：你知道為甚麼大家要整你和李祿？因為你們占盡風頭，擋了大家的路。當時令我大吃一驚，楊建利多年以後還記得柴玲當時氣得沒法開車，半路換他才開到機場。

《天安門》上映後，我才明瞭其中戴晴的作用。整部紀錄片可以說是為戴晴設計的。那麼多對學運有重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採訪，影片中沒有嚴家祺、包遵信、鄭義，也沒有陳明遠、方勵之、徐良英，當然更不會有沈澤宜，卻由戴晴扮演知識分子的代言人。該片畫龍點睛的一句話就是戴晴說的：「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意思是「六四」悲劇就是這種對抗的結果。「毫無理性的政府」早在八九年就暴露無遺，九五年《天安門》要揭示的，自然是「毫無理性的學生」。為此他們找到了柴玲在「六四」前一週的錄像講話。

卡瑪隱匿了文革暴力

柴玲的錄像講話自然是一個好靶子，九〇年我在海外讀到時也很皺眉頭。但《天安門》沒好好用，犯了許多紀錄片不該犯的忌諱，將製片人特殊的用心暴露無遺。白夢很快就有反彈：「自從兩年前戴晴女士打著『持不同政見』者的旗號，喊出要『審判柴玲』的呼聲以來，海內外不斷有人呼應。直到一個曾經像特殊貴族一樣在中國長大，並與中共高層有深厚淵源的美國人 Carma Hinton ，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並斷章取義地選取資料拼湊成一部叫《天安門》的影片，終於使這種聲音變成了合唱。」

當時我以為言重了，還在《天安門之爭》中說「不相信甚

麼『親共背景』」。我雖然也在《天安門》中受訪——那是在1990年7月的波士頓卡瑪家裏——但我見到的卡瑪，與文革造反派頭目完全聯繫不起來，她自然也不會對我說起她在中國的光輝歷史。不僅卡瑪，就是戴晴，那時我也不知道她在中共軍隊情報部門的經歷，更不知道她們還是中共紅色貴族學校101中學的同學。白夢稱卡瑪為美國人，其實還是搞錯了，絕大多數《天安門》觀眾也都誤會了，其實卡瑪並不是甚麼地地道道的美國人，而是文革中當紅的造反派頭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紅人。卡瑪曾受到周恩來、張春橋等中共領導人多次接見，在《人民日報》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見她及一家人的報導與照片。[3] 從最近由卡瑪表弟陽和平(宋慶齡為他起的中國名字)在網上披露的記錄看，1971年11月14日夜間，周恩來與這家子通宵達旦談了6個小時，周與卡瑪熱絡得很，說「卡瑪你比我強。我犯過路線錯誤，你沒犯過路線錯誤」。卡瑪問起林彪事件，周恩來竟說「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周恩來還說「卡瑪你在中國住整整21年，經過了中國的革命，到山西去證明了這個真理。」[4]

卡瑪到山西去證明了甚麼「真理」呢？據陽和平透露，就是造反、抄家：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

---

3 見《人民日報》1971年5月25日、7月25日、10月6日、11月14日、1977年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1日。其中好幾次都有照片。僅在1979年11月，《人民日報》就8次提到過卡瑪，表彰她的「光輝事跡」。

4 「周恩來總理接見韓丁一家時的談話記錄」，見中國紅色旅遊網(crt.com.cn)。

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5]

直到今天，這一家子還念念不忘他們在文革中的風光，陽和平還四處演講，向青年學生頌揚文革。卡瑪則繼《天安門》之後，又拍了一部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為打人殺人的紅衛兵造反派遮遮掩掩，同時還辦了個同名的網站。就是這個網站，令王容芬忍無可忍，她在文革剛開始就直指毛澤東是納粹，並宣佈退團，為此差點送了命。王容芬寫了篇文章，揭露這個「歌頌毛澤東、展覽暴力的文革網站」，文中指卡瑪是一個「鐵杆毛分子」：[6]

「（文革初期）陳葆昆老師被打死的時候，卡瑪是101中學高一學生，參加了造反，外國專家局有她造反的足跡，外語學院有被她欺侮誣陷直至入獄的歐裔教師和家屬。那時她叫卡瑪麗達，60歲以上的北京人，很少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它比宋要武、彭小蒙們響亮，僅次於蒯大富、王大賓們。卡瑪麗達是外籍人員子女造反派的頭頭，人民日報上有她的照片。」

我從王容芬這篇文章開始瞭解到卡瑪隱匿的文革經歷，她在文革中還有許多驕人的事跡，這裏不多引述。總之，瞭解了卡瑪刻意淡化的這些文革暴力的背景，我才明白，《天安門》紀錄片其實是一些經歷過文革的極左派，對八九年無論是他們看來偏右的學生，還是當權的右派鄧小平一起算的帳。難怪卡瑪為顯示其「中立」，四處標榜《天安門》不僅受現今中共當局禁止，也受到天安門學生的批判。一位美國檢察官哈里斯

---

5 陽和平，「也談人性、惡和文革」，《批判與再造》，2007年2月。此文廣見於網路。

6 王容芬，「紅衛兵、毛分子、反人類——分析一個為文革張目的野蠻網站」，2007年12月22日《觀察》網站首發。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6897

（Benjamin Harris）看了卡瑪的影片後，開始奮力追蹤打人殺人的紅衛兵造反派，他這樣評論道：「卡瑪繼承了韓丁家族的家風，即拿虛擬作品當紀實作品寫」。《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天安門》也是如此。

記憶的戰爭

影片《天安門》並不是記憶戰爭的結束，而只是其開始。「六四」後，這是第一場大戰，《天安門》成功地誤導了無數的年輕人，包括最近遭到罷免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長陳一諤，他很委屈地說他的「六四」知識來自於這部影片。他說看了《天安門》許多遍，因此就有那些同情中共鎮壓的情緒，而對八九學運也才有那麼多背離史實的偏見。他是有毒「真相」的一個受害者。

實際上，「六四」屠殺的硝煙還未消散，這場記憶戰爭已開始醞釀。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其實就是一種軟性的暴力，是伴隨直接暴力（武力）、結構性暴力（惡法）的第三種暴力：文化暴力。中共當局首先歪曲屠殺的真相，掩蓋受難者人數，污蔑和平的民眾先有「暴亂」，大肆追捕和監禁參與者，並立即出版大量充斥著謊言的宣傳品。當局的鎮壓行之有效，很多人不僅不敢承認自己原先支持運動的立場，反而紛紛跟著中共的意願表態。久而久之，就連民運陣營的許多人也弄不清真相，或不敢堅守真相。

《天安門》之後，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完成博士論文，由此得到許多史學訓練；二是投入這場記憶的戰爭。1996年秋，就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同一天，我給《北京之春》寄去了數萬字的文章，批評胡平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中的史實錯誤。但很不幸，這篇接續之前討論的文章無法在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發表，於是才在友人的建議下，於1998年出版了《天安門之爭》一書。書中除了那篇文章，還收錄了摘自《八九

學運備忘錄》中的有關回憶，為遭《天安門》妖魔化的學運澄清史實。同年，全球數十位六四學生召開電話會議，我提議建立六四檔案，得到大家的認同。1998年，我和巴黎幾位六四同學成立了「天安門紀念協會」，以落實那個提案。這時，我開始重操電腦舊業謀生，進入互聯網資料庫行業；2000年籌劃、2001年正式建立「六四檔案」網站(64memo.com)，那時我看出剛出版的《天安門文件》有許多疑點，於是在該書中文版出版的同時開通了六四檔案網站。這個網站從2002年4月開始得到「中國人權」組織的財政支持，2005年秋我到紐約在「中國人權」總部工作，2006年開始「六四口述實錄」項目。但是，2007年準備出版《六四口述實錄》時，卻遭遇意外擱淺，本來項目已設定、且已請丁子霖教授寫好了序言，卻無端被當時的「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偷偷撤銷項目預算和人力。這時，該組織已嚴重偏離原先救助國內人權受侵害人士的初衷，而且不久後又發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一位主要和國內人士聯絡的同事，因為幫助師濤等受雅虎出賣而遭當局判重刑的人士，卻被執行主任無端解雇，我忍無可忍，就在2008年4月底辭職。

辭職的代價是沉重的，我立刻就沒有了收入，因為是外籍勞工，也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甚至在美國的居留也成為問題（後來經過多方努力才有些許好轉）。但是，這些代價並非枉然，這樣的困境反而給我時間整理早已完稿的《八九學運備忘錄》。從2008年5月起，我開始整理這份已經打好字的手稿。6月遇到在香港經營晨鐘出版社的詩人孟浪，他也參加過八九民運，接受過「六四口述實錄」的採訪，對我的書很有興趣，願意幫我出版。之後除了謀生和為居留問題奔走，及參與一些支持國內的民主、人權活動以外，全部精力都放到這部書上。

我首先將《備忘錄》進行壓縮，精煉其文字並刪減不必要的枝節瑣事，這樣到年底共去除了12萬字。同時開始加註。註越加越多，到了2009年初我才明晰一個新的框架——這部書應

該分為兩個部分，主觀記憶與客觀核實：由《備忘錄》原文作為正文，這是主觀記憶部分；由大量的相關資料的梳理分析糾正或印證正文，構成客觀核實部分。這個新框架令我豁然開朗，原先缺乏的動力終於找了回來。加註的過程，其實是集大成。我開始夜以繼日地進行梳理分析，將十幾年積累的「六四」研究成果，摘其精要放到註中，最後這些註居然有6萬多字。

在加註過程中，有許多驚心動魄的新發現。很多原來模糊不清的點，一下子成為一些清晰的線索——我似乎明白當局從一開始就埋伏在運動中的控制手法。當局順理成章地在運動中安插了許多自己人、或當局瞭解其人性弱點而能夠容忍的人、或寧願是這些人而不是別的「死硬分子」的人，讓這些人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如果我的分析並不完全錯誤，甚至在運動之前，當局就可能已經讓這些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並由此受到海外媒體關注；在突發的學運來臨時，讓他們進入運動的領導核心，但在四二七大遊行前夕突然去阻止遊行；之後，讓他們製造新聞，進一步受到海外媒體關注，成為「領袖」和明星，但在五四後校園民主蓬勃發展時，突然發起有利於強硬路線的非組織的絕食；在學生佔領廣場後，進入指揮核心，利用全國電視轉播的與李鵬的會談高度曝光，以穩固其「領袖」地位；但在會談前安排好，由比較幼稚的低年級學生主要發言，以便找到學運的漏洞，為已經定好的鎮壓尋找藉口；在廣場後期，讓這些人發揮作用堅持到最後鎮壓，並將試圖運作撤離的人秘密逮捕；在六三夜間，又讓這些人製造燃燒瓶等暴力「武器」，為當晚的鎮壓提供口實，並在紀念碑清場時，配合當局「廣場沒放一槍、沒死一人」以將鎮壓的焦點轉移到「是否有天安門屠殺」這個荒唐的焦點上的策略；在「六四」後的所有官方宣傳資料中，拔高這些人在的運動中的作用與地位，將他們沒參與的事情也說成是這些人主導的，使海外媒體也不得不跟隨這些突出的重點，以奠定這些人日後在海外

民運中的「領袖」地位，並在當局早就分佈在海外各界的秘密或統戰網絡中得到幫助，佔據資源，繼續在關鍵時刻發揮別人發揮不了的作用……

當然，所以這些線索僅僅是線索，在中共秘密檔案解密之前無法證實，而且我也並不相信所有這些線索都一定曾經發生，也並不相信中共的情報和統戰機關真有天大的神通，但經過大量的資料分析與梳理之後，我相信這其中的一部分必在當局的精心設計之中。這些線索是否純屬臆測？從東歐原共產國家秘密警察的解密檔案來看，當局不做這些手腳才是奇事。從這部《日記》的大量註解中，我相信讀者也會看出許多端倪。我希望未來的民間力量組織者們，不要再犯我們犯過的錯誤，通過包括本書在內的經驗積累，比我們更聰明，更有智慧。

這場記憶的戰爭遠未結束。真正的六四檔案，只有在官方資料解密以後才能確實建立。到那時，我們再來重新修訂這部《六四日記》吧。

2008年4月30日至2009年4月27日

封從德 謹識於美國舊金山

附　錄

大事記

1989 年

4 月

15 日　胡耀邦逝世。

19 日　北大籌委會成立。

22 日　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北京大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學生代表跪呈請願書。無限期罷課。

23 日　北高聯成立。

26 日　《人民日報》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27 日　百萬北京市民與大學生遊行，衝破軍警阻攔。

29 日　袁木等人與官方學生會代表「對話」。

5 月

4 日　趙紫陽發表溫和講話。十萬大學生遊行，北高聯宣佈復課。

13 日　數百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平反「動亂」和直播對話。

14 日　統戰部長閻明復等與學生對話，因官方未守諾直播，對話破裂。十二學者上廣場斡旋未果。

15 日　吾爾開希喊東移。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柴玲任總指揮，李祿副總指揮。戈爾巴喬夫抵京。

16 日　閻明復上廣場勸撤。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

17日　百萬市民大遊行。
18日　絕食第六天，李鵬與絕食學生見面。
19日　復食。
20日　李鵬宣佈戒嚴。北京市民開始阻截軍車。
22日　吾爾開希喊撤遭「罷免」。
23日　北高聯退出廣場。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立。
24日　廣場指揮部成立。
25日　廣場學生聯席會議通過「主動出擊」方案。
27日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三十日撤，未獲廣場學生聯席會議通過。
28日　柴玲作錄像談話。全球華人大遊行。

6月

2日　劉曉波等「四君子」絕食。
3日　晚上軍隊強行進城，屠殺開始。
4日　凌晨五點，紀念碑上最後數千學生撤離廣場。

組織簡介

簡 稱	全 稱	成立時間	主要成員	備 注
北大籌委會	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	4.19 晚	常勁、趙體國、丁小平、封從德、熊焱、郭海峰、楊濤、王丹、沈彤、楊丹濤、柴玲、蔡健、謝劍、歐陽、孔慶東、張伯笠、王有才、孟昭強、楊國忠、張智勇、彭嶸、邵江、李海、王遲英、姬軍、湯葉、武運學、楊通學、馬學禮、肖旭、周培勝、高興旗、應華江、羅凱雄、凌傑遠、韓少華、劉蓉、林金松、李明奇、羅勇等	簡稱「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
北高聯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	4.23 晚	劉剛、周勇軍、吾爾開希、王超華、封從德、楊濤、梁二、鄭旭光、張銘、周鋒鎖、王丹、馬少方、王治新、王有才、邵江、翟偉民、王正雲、馬少華、張志清、熊煒、石翁、陸明霞、楊國忠、范曉賓、熊文革、李紅宇、劉燕等	4.23 至 4.28 稱「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中共稱「高自聯」
對話團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	5.3	項小吉、熊焱、沈彤、江棋生、浦志強、張志清、李鵬、童屹等	
絕食團廣播站		5.14	封從德、張伯笠、白夢、鄭義、北明、劉志剛（王童）、張華潔、何貴方、陳建祖、沈澤宜、袁倚天、羅勇、張德成、紅梅、吳燕、？立平、鄧錦祥、馮紅平、石冬青、董巍、王燕、郭恒忠、劉深、黃森磊、鄭月、馬建國、于燕紅、周圍、紀平、梁昕、楊眉、應偉、楊春彥、王春、王凱麗、金曉紅等	

簡稱	全稱	成立時間	主要成員	備注
絕食團指揮部	高校學生絕食團指揮部	5.15 晨	柴玲、李祿、郭海峰、封從德、張伯笠（王丹、吾爾開希、王文、王超華曾任常委）、何責方、邵岩、王樹東、蔡金青	5.13 至 5.15 晨的「絕食團」主要是幾位絕食發起人，但未形成組織。
學運之聲	學運之聲廣播站	5.16	張銘、周峰鎖、王超華、張銳等	
工自聯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5.19	劉強、劉煥文、沈銀漢、韓東方、趙品潞、呂京花、岳武等	間稱「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或「京工聯合會」
外高聯	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5.19（？）	連勝德、葛剛、李耕耘、侯鍾瑜、陳來、陳偉等	相對於「北高聯」
廣場指揮部	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	5.22 晚	柴玲、李祿、張伯笠、封從德、郭海峰、辛苦、老木、張健、王剛、潘毅、姚曉燕、王紅、郝建江、劉光、耿力、蔡金青、溫傑、項俊、趙世民、丁個、田群、〇〇八、王運則等	5.22 晚至 5.24 稱「廣場臨時指揮部」
北知聯	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籌)	5.23	嚴家祺、包遵信、遠志明、老木、榮劍、鄧正來、王魯湘、謝選駿、王潤生、甘陽、蘇煒、鄭義、陳宣良、王志剛、張曉明、沈大德、張曉剛、蕭延中、閔琦、趙瑜、顧昕、董郁玉、厲劍等	又稱「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包遵信提供的名單中還有許良英、劉再復、于浩成、李洪林、蘇曉康、柯雲路、龐樸、侯仁之、季羨林、陳小雅等九十人
聯席會議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5.23	陳子明、王軍濤、包遵信、劉剛、王丹、吾爾開希、甘陽、劉蘇里、劉曉波、邱延亮、張倫、老木、王剛、邵江、吳仁華等及廣場指揮部	又稱「首都各界保衛廣場聯席會議」、「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參考資料綜述

本書引述的資料，大部分都可在「六四檔案」網站（64memo.com）上查閱。該網站目前有三千萬字文字資料、五千幅照片及大量的音像資料。還有更多的資料（數十本書、近萬幅照片和資料影本、數千個視頻短片及一些錄音等）有待整理上網。下面的簡化書名對應於註中引用的書名，各書全名記在條目後面。

1. 原始資料

1. 原始音像：本書引用了兩個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錄音，一個是5月14日晚11點至凌晨的錄音，記錄了同學們對戴晴等人發言的反應。該錄音帶是人民大學講師于碩給我的，錄音者是其朋友，社會學青年學者。我已將它放到六四檔案網站上 http://www.64memo.com/b5/12164.htm 。另一個是6月3日晚至4日凌晨的，本書引用了吾爾開希那晚在廣場廣播站講話錄到的一部分。該錄音帶還有廣場喊撤時的錄音，可以證明喊「撤離」與喊「留守」的音量不相上下，這段錄音的文本也可參見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該錄音帶是人民大學的顧曉陽給我的，我也將把它放到六四檔案上。原始錄像廣見六四檔案(64memo.com), youtube.com 及 youmaker.com 等網站。

2. 當時的傳單等印刷品：本書參考了紐約市立圖書館的 Munro Collection中的幾百張傳單等印刷品，包括當時的北大學生的《新聞導報》和知識界聯合會及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新聞快訊》 。

3. 當時的報章：本書主要參考五類資料。一是香港支聯會收集的報章縮微膠片，主要是該機構收集的當時在香港的中、英、日文報章內容（本書基本上只引用了中文報導），包括香

港的《明報》、《星島日報》、《大公報》、《文匯報》、《信報》、《快報》、《成報》、《東方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天天日報》、《港人日報》和《香港經濟日報》，大陸的《人民日報》、《羊城晚報》，日文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中國新聞》、《日本海新聞》、《每日新聞》、《沖縄タイムス》、《南日本新聞》、《大眾合同新聞》、《神戶新聞》、《富山新聞》、《熊本日日新聞》等，及英文的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Hong Kong Standard, New York Times, Times, Independent, Wall Street Journal, Daily Telegraph, Financial Times, The Guardian, International Review, China Daily* 等。作者在 2007 年得到這些資料的掃描件，這些報章不僅有頭版，裏面所有報導學運的版面都有收藏，但可惜有不少日期和版面並不完整。二是香港支聯會資料中心編印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1989 年 10 月，香港，共 512 頁)，其中匯集了 1989 年 4 月 16 至 6 月 29 日之間的各報頭版，包括《人民日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快報》、《東方日報》、《明報》、《香港時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Hong Kong Standard*。三是台灣《聯合報》數據庫中關於當時學運的四千多篇報道。四是作者 2006 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收集的《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相關報導。五是作者從網路下載的《人民日報》當時各日的全部版面。

4.《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1991年10月初版，共830頁）。這本資料冊側重於學運資料，收錄了其他已出版的資料冊所沒有收集的材料，包含了大量當時的傳單等印刷品及大字報謄寫文本，尤其重要的是收錄了許多天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自由論壇）的錄音內容，及北高聯和北大籌委會的決議文本。

5.《中國民運原始資料精選（大字報、小字報、傳單、民刊）》共二輯（十月評論社，香港，1989 年 11 月）。

6.《八九中國民運紀實》(紐約吳牟人等編，1989年8月，共 1010 頁）。當時各種報章內容選編。

7.《火與血之真相》(中共研究雜誌社，台灣，1989年10月，共1394頁)。這是台灣的大陸研究集大成的資料冊，當中收錄了大量的八九民運原始資料。

8.《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台灣，1989年12月，共608頁)。收錄了八九民運的重要資料和報刊文章，有的資料比較罕見，如侯德健在「六四」後不久寫的『我的親身經歷』。

9.《天安門一九八九》(聯合報編輯部，台灣：聯經出版社，1989年10月，共531頁)。這是台灣《聯合報》關於八九民運的資料與圖片冊。該書由余英時先生作序，乃六四後最早的一本大部頭資料匯集。柴玲「遺言錄像全文」也在此書中錄出，比其他一些資料匯集中的都更完整，但也刪減近半，亦非原來的問答形式，使對答不甚連貫。該書出版倉促，許多基本事件之描述並不準確。

10.《海外留學生電子郵件》(英文 *Electronic Mail on China 18 Feb.-4 Jul., 1989*, E. Stahle 和 T. Uimonen 編輯，斯德哥爾摩，1989年，共818頁)。當時分佈在全球的海外留學生交流和討論八九民運信息的電子郵件內容。

11.《北京地震》(法文資料冊：*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Edited by J. P. Beja, M. Bonnin, A. Beyraube. Paris: Gallimard, 1991. 589 pages.) 該書由巴黎的三位中國研究學者合譯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大字報、聲明等)，本書引述了他們在1990年4月和5月分別對吾爾開希和嚴家祺的採訪記錄。

2. 當事人回憶

12.《回顧與反思》(17位八九學運骨幹，德國：萊茵筆會，1993年6月，共252頁)。這是1991年7月17-24日在巴黎法蘭西學院召開的「八九學運歷史研討會」的集體回顧與核對史實的錄音記錄。參與者包括常勁、柴玲、李錄、封從德、

張伯笠、王超華、梁二、沈彤、白夢、老木、張倫、蔡崇國、辛苦、劉衛、劉燕、楊濤、李蘭菊。雖然歷時一週，時間依然有限，因此還有大量細節未來得及核對，但總體而言，這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由學運當事人聚在一起面對面的詳細回顧與核對。其中大部分經歷都與本書相關，因此是本書最主要的參考資料。

13.「六四口述實錄」(六四檔案網站上本書作者採訪的幾十位八九學運和民運的當事人的口述錄音回憶，大部分已整理成文)。本書引述了常勁、王有才、彭嶸、熊焱、周鋒鎖、王治新、程真、王磊、張智勇等人的口述錄音內容。

14. 載有大量當事人回憶的雜誌：一、民運報刊：《新聞自由導報》、《北京之春》、《中國之春》、《民主中國》；二、其他刊物：《百姓》、《開放》、《九十年代》、《爭鳴》、《前哨》等。

15. “*Almost a Revolution*”(沈彤的英文自傳《幾乎一場革命》，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342 pages.)全名“*Almost a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a Chinese Student's Journey from Boyhood to Leadership in Tiananmen Square*”(「幾乎一場革命：一個從童年時代到天安門廣場領袖的中國學生的故事)。該書有多個版本並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但沒有中文版。由於沈彤在「六四」期間大量的媒體運作，包括獲選1989年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年度風雲人物，該書現在成為西方一些學校的中國現代史參考書。但該書記述的可靠性一直受到其他當事人的質疑，沈彤在1991年巴黎會議上的回憶與該書中的記述也多有出入。據報導，沈彤現在已回中國與當局合作監控異議人士。

16. “*Moving the Mountain*”(李錄的英文自傳《移山》，London: MacMillan, 1990. 211 pages.)該書出版時刪去了大量細節，部分敘述不甚可靠。沒有中文版。

17.「勸阻絕食失敗記」及「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王超華，《百姓》1993年1月16日，第31-33頁及1993年2月1日

號，第44-48頁）兩篇文章連載，敘述相當詳實，作者強調自己希望廣場學生撤離，但未記述自己代表北高聯在廣場廣播站表達與絕食學生要堅持到底的一致目標。不過，總的來說，王超華的回憶比較認真和細致，本書還引述了她在其他一些雜誌及《新聞自由導報》上的回憶文章。

18.《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著，台北：時報文化，1992年，共252頁）。該書作者回憶的「六四」前的經歷，及「六四」後坐牢時配合當局稱未見天安門廣場死人而作的嚴苛懺悔。該書對八九學運多為負面描寫，在批評吾爾開希、柴玲、李祿等學運人物及一些支持學運的知識分子時帶有強烈的主觀情緒。該書面世後立即受到著名作家、八九民運參與者鄭義的激烈批評（「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上、中、下三篇分別刊於《中國時報週刊》1993年9月11日，頁78-81；9月18日，頁80-81；9月25日，頁80-81）。

19.《歷史的一部分》（鄭義著，台北：萬象，1993年3月，共608頁）。全名《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該書前半部記錄了作者與妻子北明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積極支持這場運動的知識分子的行動與心路歷程。

20.《在秦城坐牢》（戴晴著，香港：明報，1995年4月初版，共282頁）。全名《在秦城坐牢——自己的故事（二）》。該書作者回憶的「六四」前的經歷，與她在1992年發表在《百姓》雜誌上的文章大同小異（「廣場斡旋」，《百姓》1992年8月16日，頁26-31；「斡旋失敗學生仍然絕食」，《百姓》1992年9月16日，頁30-33。又見林道群、吳贊梅編，《悲劇的力量——從民主運動走向民主政治198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其中的主調是抹黑八九學運、否定八九民運；在1995年出版前的補註中，她宣佈後來在影片《天安門》中刻意剪輯的妖魔化柴玲的那兩句著名的話「即將披露於世」，詳

見本書後記「《天安門》背後的戴晴」一節。

21.《未完成的涅槃》(包遵信著，台北：風雲時代，1996年，共608頁)。全名《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這是包遵信先生生前遺留的關於他參與八九民運最為完整的回憶，其中雖有少量記憶混淆之處，但總體上給人感覺的誠實可靠的，行文具有歷史學家的嚴謹。

22.《天安門之爭》(封從德著，香港：明鏡，1998年，共482頁)。全名《天安門之爭：「六四」的內情》。該書是為澄清影片《天安門》中扭曲的學運史實而結集的多年的文章，尤其是與「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作者胡平的商榷文章，對《天安門》的史實質疑，及摘自《八九學運備忘錄》中的有關回憶，

23.《逃亡者》(張伯笠著，出版社不詳，1998)。對應的英文版《逃離中國》(*Escape from China*.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98. 271 pages.)本書引述的是《逃亡者》的網絡版，見http://www.zhangboli.net/books/fugitive_gb/fugitive-ct.htm。其中的很多內容已發表在1993年的《中國之春》上的系列文章中，張伯笠當時任該雜誌主編。張伯笠是報告文學作家，對歷史的敘述也帶有報告文學的色彩。

24.「絕食是怎樣發起的」(王丹，《蘋果日報》1999年5月9日)。王丹這篇短文，是外界看見的他關於八九學運過程主動進行回憶的唯一一篇。其中講述的事實也可能比較準確，問題在於好些關鍵地方王丹沒講: 一、北高聯當時多次決議反對絕食；二、北大籌委會也反對絕食；三、六人發起絕食是在遭到組織反對後的「個人發起」；四、發起絕食的主要理論依據是「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 五、高聯議決王丹開希絕食後不能再代表高聯並取消常委資格。因此這篇短文在敘述史實的同時掩蓋了一些關鍵點，會對讀者產生誤導，尤其是學運組織是否決議支持絕食這一點。文中稱絕食倡議得到北大籌委會「王有才等的支持」，應與事實背離，王有才在「六四口述實錄」中否認他當時支持發起絕食，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已經被公佈在絕

食簽名上。

25.《黑手備忘錄》(陳子華等著，紐約：明鏡，2004年，共578頁）。這主要是社經所團隊參與過運動的十幾位分別的回憶文章的匯集，本書主要參考或引述了其中劉剛、王軍濤、張倫、李進進和陳子華的文字，尤其是劉剛的「北高聯成立的前前後後」一文及王軍濤關於聯席會議的回憶。陳子華在書中論斷「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與史實嚴重背離。

26.《「六四」參加者回憶錄》(紐約：明鏡，2004年，共292頁）。十幾位八九學運與民運人士的回憶文章和網絡文章的匯集。書中王丹「八九民運大事記」一文稱，「六四」死亡人數「應在三百人左右」，與官方數據相同。

3. 研究著作、官方資料等

27.《八九民運史》(陳小雅著，台北：風雲時代，1996年，共608頁)。全名《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敘述八九民運全景的史書，該書其實在1993年已經完稿，因此沒來得及參考《回顧與反思》中的學運內情，有些部分還受到一些知識分子包括王丹等人的片面敘述的影響，但總體上說是全面而客觀的，書中關於知識分子參與運動的情況比較翔實。另外，書中提出的分析趙紫陽的線索，及分析陳子明等人的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三線計劃」的線索，至今還有指導性的意義，後面的研究可以在此書基礎上進一步理清官方與民間在運動中的動力學意義上的參與軌跡。關於「三線計劃」，陳小雅與陳子明的妹妹陳子華(也曾任社經所所長)有兩篇重要的文章進行辯論：曉華(陳子華）：「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1999年7月8日；陳小雅：「答曉華」，1999年7月10日。兩篇文章見陳小雅《佛之血》(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2003）第191-219頁。

28.《驚心動魄的56天》(中國國家教委．香港註釋本，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6月，共243頁)。全名《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原版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大地出版社於1989年8月出版，共231頁。該書原為中共之「內部材料，不得公開引用」，但實際上大量記載了運動的過程與內容，史料價值極高，且有很精確的時間標定。經「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註釋，又更加詳細地糾正了原文的片面記載，很有參考價值。

29.《70天大事記》(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共108頁）。該書一些內容與《驚心動魄的56天》互補。

30.《中國六四真相》(張良編著，明鏡，2001年4月，共1067頁）。對應的英文版《天安門文件》"*Tiananmen Papers*"（Compiled by Zhang Liang. Edited by Andrew Nathan and Perry Link, with an afterward by Orville Schel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531 pages.）該書從1998年策劃，到2001年出版。編著者張良是化名，從書中內容看，大概是中共中央辦公室或國務院辦公室的一位或幾位秘書，有分析認為其背後是楊尚昆、楊白冰派系的中共人物，因為書中與眾不同地說他們反對「六四」屠殺。本書作者在分析「六四」資料時發現，該書完整地拷貝了戴晴自1992年起廣泛傳播的關於5月14日的一個虛構故事，卻赫然納入那天中共三個情報部門向中央遞交的報告內容，說明《天安門文件》至少有一部分資料抄襲了後來的回憶，卻將戴晴文字中的錯誤也抄了進去。許多人士分析指出，該書還有大量的內容有作偽的明顯痕跡。不過，一般認為，該書大部分內容還是編輯了當時中共內部的各種「內參」資料，因此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中共情報部門當時的內部報告，只是無法完全分辨每一部分的真實性。

31.《北京學運50日》(中國時報記者群，台灣：時報文

化，1989年6月20日，共206頁）。這是有大量插圖的學運過程描述。

32.《人民不會忘記》(香港64記者，香港：1989年12月增訂版，共384頁)。全名《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該書是64位香港記者在「六四」的文章，有回憶，有補充報導，也有綜述和分析。

33.《天安門演義》(舒琪，香港：創建，1989年11月，共151頁）。該書雖為演義，但從內容看，作者對接近王丹、吾爾開希的記者很熟悉，至少是熟悉他們的報導。

34. “*Quelling the People*”（Timothy Br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ronto: Lester Publishing, 199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9 pages.）全名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該書詳細描述了「六四」屠殺的過程，並對死亡人數有翔實的調查和估算。作者當時在北京，他在「六四」當天收集到北京11家醫院的478人死亡資料，並由此推算整個北京124家醫院應該有2800人死亡。

35. “*Black Hands of Beijing*”（G. Black & R. Munro,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3. 390 pages.）該書主要記述陳子明、王軍濤與韓東方三人的經歷，但前二人在獄中，他們的「六四」經歷主要由社經所的白樺和張倫等人轉述，因此許多內容並不可靠。

36.《天安門》(卡瑪 Carma Hinton、高富貴 Richard Gordon等，香港：明鏡，1997年3月，共379頁）。該書是記錄片《天安門》的腳本。

37.《尋訪六四受難者》(丁子霖著，香港：開放，2005年，共417頁)。該書58篇文章是丁子霖教授15年間尋訪六四受難者家屬的歷程的詳細記錄，書中還有186位「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受難情況。

38.《國家社會關係和八九北京學運》(趙鼎新著，香港中

文大學，2007年8月，共541頁）。這是一部社會學專著，闡釋八九學運的進程，作者採訪了70位當時的運動參與者。該書是從2001年英文版翻譯的。

39.《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共622頁）。書中第六章「國殤——北京政治風波」是對八九民運的描述，附錄中有三次訪問趙紫陽的談話記錄，及趙紫陽自我辯護發言。

40.《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宗鳳鳴著，香港：開放，2007年1月，共399頁)。作者是趙紫陽的生前密友兼氣功師，該書記錄了1991年7月10日至2004年10月24日的34次談話內容，包括中共高層處理八九民運的決策過程的內情。

41.《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著，美國：真相，2007年，共541頁）。該書按每小時的時間順序詳細描述了「六四」屠殺的過程，是目前為止最為詳盡的相關描述。

42. "*Standoff at Tiananmen*"（Eddie Cheng, USA: Sensys Corp., 2009. 308 pages.）作者是北大物理系80級學生，參與組織過1985年的學潮，後留學美國。該書大量參考了當事人的文字與口頭回憶，是目前為止敘述八九學運與民運最為可靠的英文敘述。

（封從德）這部《日記》確是關於六四學運的最可信、同時也最詳盡的一部記載。

他從參加（六四）運動之始，便遠離名利之場，而默默地在人群喧嘩的後面從事於實際的工作。……他事實上超越了運動，但所作所為又是在一個更高的精神世界推動著運動。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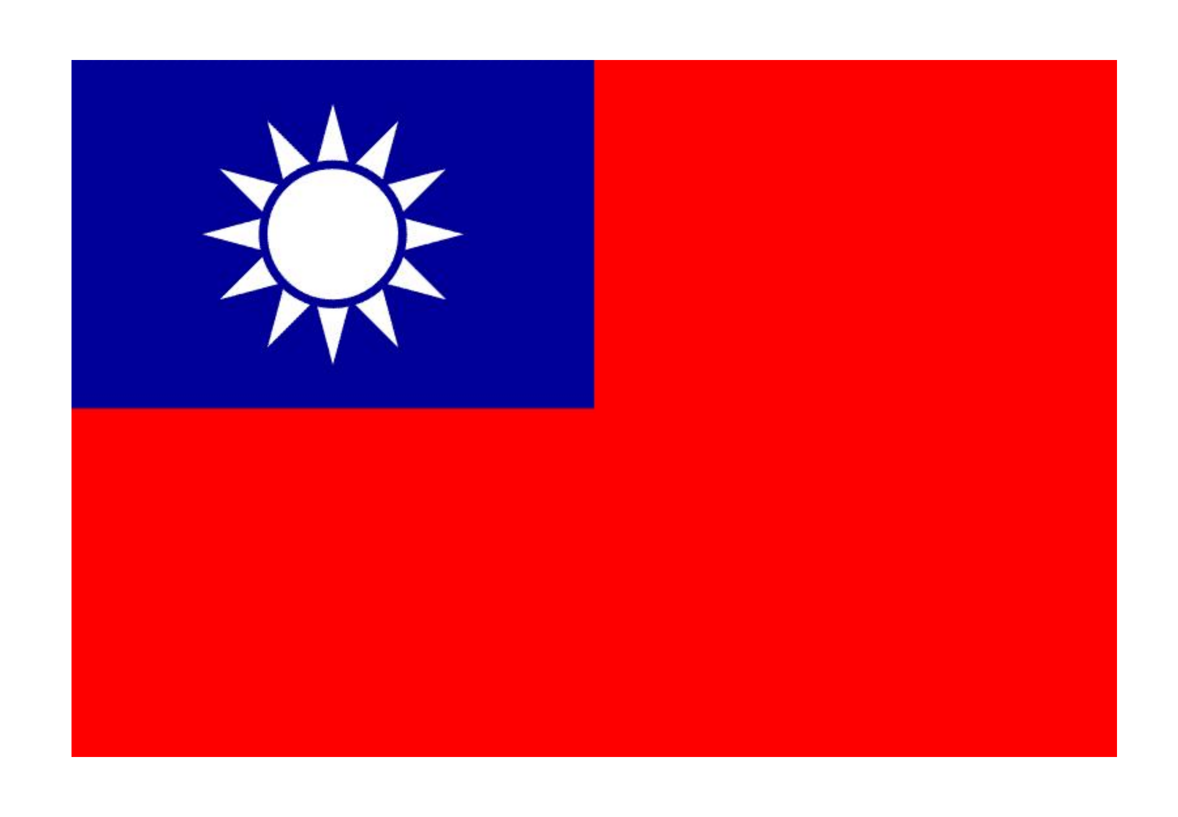
（《六四日記》）這本書用大量的事實推翻了今天北京仍然堅持的「動亂、暴亂」的不實之辭。我相信，「六四大屠殺」的真相一定會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得到揭露，中國大地上一定能夠重新恢復正義。

——嚴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

（這部《六四日記》）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且充滿人性發見。通過這部作品，讀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領域內——無論高尚與卑微，奮發與無奈，希冀與苟且，權變與堅持，愚昧與賢明——窺見當日學運與天安門廣場的真實狀況。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的復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進入了永恆的行列……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作者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